剑桥 (上)

美国对外关系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Warren I. Cohen, Editor

【美】孔华润（沃沦·I. 科恩） 主编

第一卷 共和制帝国的创建 (1776-1865)

第二卷 美国人对机会的寻求 (1865-1913)

新 华 出 版 社

《共和制帝国的创建》是一本专业性与可读性完美结合的外交史著作，论说技巧精湛娴熟，引人入胜。

——小阿瑟·J. 斯莱辛格，纽约城市大学

在《共和制帝国的创建》这部结构谨严的著作中，布拉福德·珀金斯论述了共同塑造美国外交行为模式的诸种因素——立宪主义、经济与领土扩张，乃至美国例外论的昭彰事实。读者目之所及，处处可以领略作者的渊博学识。

——诺曼·格雷布纳，弗吉尼亚大学

拉夫伯的新著《美国人对机会的寻求》之所以是一部重要著作，根本原因在于：它率先就美利坚帝国的现代化历程提出了一个极具原创性的全新命题。……拉夫伯的研究成果对于外交史和宪政史研究均有重要意义。这是一项大胆的学术努力。……阅读此书，轻松愉快，如沐春风——刺激、生动、新颖……修辞的力量，荡气回肠。一如作者关于巴拿马运河与中美洲的著作，论及美国与之打交道的那些国家和社会，无不驾轻就熟，令读者眼界大开。

——《美国与东亚关系杂志》

真是令人欣喜，新近问世的这部四卷本《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为读者重新审视过去两百年的历史，从中获得理解冷战后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现状的有益启示，提供了极大便利。这四本书，每一本皆自出机杼，立一家之言。四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分别对一个特定时期作了清晰的概括。每本书均以大量研究成果为基础，是数十年学术积淀的产物。没有哪一本仅以大事编年为能事。

——迈克尔·曼德尔鲍姆，《世界政策杂志》



责任编辑　王晓顺
　　　　　许　新
封面设计　肖　东

ISBN 7-5011-6665-X/D·1058
定价：120.00元（上下册）

剑桥 上

美国对外关系史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美】孔华润（沃伦·I. 科恩） 主编

Warren I. Cohen, Editor

第一卷：共和制帝国的创建（1776—1865）

◎【美】布拉福德·珀金斯／著 ◎周桂银 杨光海／译

第二卷：美国人对机会的寻求（1865—1913）

◎【美】沃尔特·拉夫伯／著 ◎石 斌 刘飞涛／译

Volume I: The Creation of a Republican Empire, 1776-1865 / Bradford Perkins

Volume II: The American Search for Opportunity, 1865-1913 / Walter LaFeber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美）孔华润主编；王琛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5

ISBN 7－5011－6665－X

Ⅰ．剑…　Ⅱ．①孔…②王…　Ⅲ．对外关系—国际关系史—美国—1776～1991　Ⅳ．D8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36073号

京权图字：01－2003－2108

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

〔美〕孔华润（沃伦·I. 科恩）　主编

王琛　等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http：//www.xinhuapub.com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66.25印张　插页4张　850千字

2004年5月第一版　2004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665－X/D·1058　定价：120.0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010－65895562　65897685）

主编导言

本人编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的主旨，乃是让广大读者得以赏阅历史学界顶尖学者所奉献的鼎乘之作。我并无思想或方法上的先入之见。我期望美国外交史领域的几名一流学者摒弃门户之见，与我共同努力，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我向头三名学者发出的邀请均被一一接受。大约10年前，我在构思这个项目时，根本没有想到冷战会突然终结，以致这套书的最后一卷会以一个完整的时代而告终，就像前三卷定好的时限那样。当我写完第四卷时，苏联帝国的崩溃令我惊讶不已，但却使这套书有了一种完整性，而在别的情势下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第一卷由布拉福德·珀金斯教授执笔，他是专攻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美国外交的杰出史家，也是活跃于当今外交史学界的老前辈。珀金斯认为，年轻的共和国的对外政策，乃是物质利益、文化和各种民族价值观的产物。他描述了美国立国之前即已存在的一种美国行为方式，展示了革命以及共和国初期的经历又是如何塑造了这种行为方式。通过对宪法和外交的探讨，他梳理出一条能够贯穿于其他各卷的主线：从华盛顿开始，历届总统都始终如一地力图主导政策，而这与制宪会议参加者的意图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珀金斯执笔的这一卷，书名就预示了其无可回避的主题：在意识形态上信奉行共和主义价值观，矢志不渝地向整个北美大陆

推广这些价值观，扫除一切无论是人类的还是地理的障碍。他认为，美利坚帝国的崛起，乃是源于对土地和资源的贪婪，而不是对其他民族的统治权。然而，正是这种对其他族裔——土著美国人、墨西哥人以及特别是非洲裔美国人——的统治权，导致了内战及其期间的外交——这是本卷作者讨论的最后一个事件。这本杰作，概述了美国崛起为一个国家并奠定了在19世纪行将结束之际成为世界强国之基础的那些岁月。

第二卷的作者沃尔特·拉夫伯，是外交史学家威斯康星学派最令人尊敬的一员。该学派的成员受教于弗雷德·哈维·哈林顿和威廉·艾普尔曼·威廉斯及其门生，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杀进学术舞台时被贴上了“新左派”的标签。拉夫伯执笔的这一卷，涵盖了19世纪最后1/3时期，并延续到20世纪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执政结束的1913年。他探讨了美国经济力量的增长与扩张主义之间的联系，增加了种族主义的主题，特别是用来分析土著美国人和菲律宾人。令人印象至深的是，他反对美国是在追求秩序这种观念。他指出说，美国人在国外寻找经济和传教活动的机会，而对他们给其他国家带来的混乱状态毫无顾忌之心。中国或墨西哥爆发的一次革命，不过是美国人为越来越多的好处付出的代价，特别是这种代价由当地人所付出时，尤为如此。他的另一个不可回避的主题，是运用外交来扩大总统权。

第三卷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由美国历史学家协会前主席、我们这一代最具创见性的国际关系史学家入江昭执笔。入江昭出生于日本，受教于美国大学，执著于研究权力政治中无处不在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特别是研究美国与东亚国家直面相撞时的境况。入江昭的这一卷，开篇时简略交待了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的不断演变的并由欧洲主导的国际体系。他分析了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威尔逊主义，以及它是如何运用于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作者对他所说的20世纪20年代的

“文化方面”的讨论，最为突出。入江昭认为，他所写的这个时期构成了“美国的全球化进程”——在这个时期，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领袖，并为筹划和维持国际秩序提供了经济和文化资源。他指出，非西方民族觉醒了，他们期待着美国的支持和鼓励。他在终卷时预见说，跟着世界的美国化接踵而来的，将会是麻烦。

我所写的那一卷的许多内容，一如入江昭那样，也集中在美国—东亚关系上。我的朋友迈克尔·韩德将我归入外交史学家“现实主义”学派之列。我同珀金斯、拉夫伯、入江昭、厄内斯特·梅以及诸如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迈克尔·霍根和梅尔文·莱弗勒这些年轻朋友相互交往并受其影响，注重研究美国政策的国内根源，观念、态度和经济考虑的作用，包括传教士在内的非政府组织的影响，以及技术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在这套书的最后一卷《苏联强权时期的美国（1945—1991年）》中，我还大大借用了从政治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那里汲取的知识。

我那一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落幕之际，终于1991年苏联的消亡。我写到了美国领导人对于战后世界秩序的设想，指出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苏联对这个设想构成的威胁。“安全困境”的概念，亦即每一方的防御行动看来都是对另一方的威胁，在我对冷战起源的分析中占据着突出地位。我还强调了两种政治制度的重要作用、美国国家强盛而政府软弱的矛盾处境以及斯大林式政权的隐秘性和残忍性。在这一卷中，我指出了战前殖民帝国纷纷崩溃、亚非拉一系列新近独立国家相继出现以及美苏力图迫使它们加入华盛顿和莫斯科各自设计的国际体系所引起的混乱的重要意义。最后，我叙述了德国和日本作为大国的重新崛起、苏联的分崩离析、美国的发展趋势及其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在世界事务中的游移不定的方向。

无论各个作者处理其研究对象的方式是多么的大异其趣，这

四卷著作均有着许多主题可以遵循。首先，美国矢志不渝地追逐着财富和权势，珀金斯和拉夫伯对此做了生动描述。入江昭展示了美国在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崛起为世界领袖之后是如何运用其财富和权势的，我则探讨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这一时期美国作为霸权国家的行为以及它对其统治地位面临的威胁所作的反应。

第二个至关重要的主题，是争夺外交政策的控制权。每一位作者都指出了宪法体制所带来的总统与国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从 1789 年至今的各位总统如何力图绕开宪法对其权力的种种限制。民主政府所面临的威胁，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尼克松—基辛格鬼迷心窍地弄出水门事件和里根弄出伊朗门闹剧予以说明。

最后，我们都关注着世界舞台上所见的那种美国特性的构成因素。存在着一种把美国同世界其他地方区分开来的独一无二的美国对外政策吗？我们考察了美国价值观的演变过程，并将其同美国的国际行为进行了对照。此外，我们对美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对国内秩序的影响不无顾虑，对托马斯·杰斐逊的那个正直而有德行的共和国构想已遭遗忘忧心忡忡，这些对美国人以及美国人宣称“注定领导”的世界来说，都是不祥之兆。

孔华润（沃伦·I. 科恩）

内容提要

在《共和制帝国的创建》一卷中，布拉福德·珀金斯教授追溯了从殖民地时代到内战结束之际的美国对外关系，他所特别关注的，不仅是该时期的外交争论，而且包括美国处理国际关系的独特方式的起源和发展。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从外交角度描述并分析美国如何诞生、如何变成共和制国家以及如何扩展为大陆帝国这个进程的。

本书开篇是那些围绕着美国革命、法美同盟以及和谈进程的事件，和谈进程最终为美国革命画上了句号，并使美国拥有了一个延伸至密西西比河的“大帝国”。该书继而叙述了由法国大革命所触发并导致 1812 年战争的一系列事件，以及美国对拉美革命的反应和门罗主义的出台。珀金斯教授还关注美利坚“帝国”的领土扩张，诸如路易斯安那购买，同西班牙签订的使美国获得佛罗里达并将边界推到太平洋的 1819 年条约，得克萨斯的兼并，俄勒冈争端的解决以及迫使南部邻国把西南地区和加利福尼亚割让给美国的墨西哥战争。作者指出，在内战期间，北方卓有成效的外交对于维护帝国的统一发挥了可谓不小的作用。因此，在 1776—1865 年期间，美国获得了独立，维护了国家的商业权利，并通过谈判和强取豪夺奠定了成为未来世界强国的地理基础。

珀金斯教授在揭示贯穿于《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所有四卷

之主题的同时，还考察了美国外交中的宪法因素，讨论了宪法条款的来源、制宪人的意图以及随后的宪法权力的发展和关于宪法权力特别是关于总统宪法权力的争论。

前　言

本卷考察了美国立国以后大约一个世纪之内的对外关系，因此肯定不可能是详尽无遗的。尽管我本人确信并未漏掉重大事件，但我却认为可以略去那些在我个人看来同主题不大搭界的细微末节。

本卷主题正如书名所示，是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的共和制帝国的创建。毫无疑问，领土扩张构成了主要篇章；但同样重要的，是独立地位的确立，独特的世界政治观的产生，共和主义宪法的制定与共和主义外交风格的形成，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对赢弱的年轻共和国构成的威胁，以及内战期间千方百计地摧毁帝国的徒劳。

读者们很快就会发现，我的笔下并无那种圣徒传记的风格。美国人及其决策者们时不时地误入歧途，有时则受龌龊冲动和无知偏见的双重驱使，至少某些巨大的成就是以较小的代价获得的。本书只是一家之言，尽管我希望我的这种一家之言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因此，每当我认为必要之时，我会毫不犹豫地作出否定性的评判。

本书的大部分是以我本人为早期著作对国内外各种文件所做的研究为基础的。不过，在这些部分，我还汲取了其他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那些在我本人的著作面世以后所撰述的作家；在其他部分，我甚至是更多地借鉴了专业同行们的研究。如果本书有

什么优点的话，那得归功于他们。

我要明确地感谢我的同事悉尼·法恩、小肖·利弗莫尔和热心肠的“业余爱好者”沃伦·波伊特拉斯，他们帮我通读了书稿。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南希，她一如既往地帮我通读书稿，并给予我鼓励和支持。我还要感谢我的小儿子詹姆斯，他总是不停地询问我何时才会完成案头工作。

第一卷

共和制帝国的创建

1776-1865

Volume I

The Creation of a Republican Empire

Bradford Perkins

【美】布拉福德·珀金斯／著

周桂银　杨光海／译

目　录

第一卷
共和制帝国的创建(1776—1865 年)

目　录

第二卷

美国人对机会的寻求(1865—1913 年)

第一章 画布和透镜

亚当斯的一生

1775年6月17日，一个8岁的男孩在母亲的带领下来到他家附近的一座高地上，眺望着远处班克山战役的硝烟。美利坚国家或者建立国家的要求，要等到下一年才成为事实。13个英属殖民地和150万自由自在的人民，散落在从帕萨马魁迪海湾到圣玛丽河的大西洋沿岸。

在遥远的内陆，惟一的一群定居点位于肯塔基。整个英属北美只有10个城镇的人口超过了5000人，虽然费城的居民多达3.5万人之众。在这个规模仅次于伦敦的大英帝国第二大城市，这个男孩的父亲正供职于大陆会议。

3年之后，约翰·昆西·亚当斯远渡重洋来到欧洲。在这以后的革命岁月中，他主要是担任他父亲（约翰·亚当斯）和弗朗西斯·达纳的秘书，前者先后在巴黎和海牙担任外交官，后者则是派往卡特琳娜女沙皇宫廷的特使，徒劳无益地争取着俄国（对美国的外交）承认。1783年，亚当斯在经过长途陆上旅行后重返巴黎，此前不久，他父亲、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杰伊和亨利·劳伦斯刚刚同英国签订和约，结束了美国革命，为美国争得了一个领土延伸到密西西比河、面积近90万平方英里的“大

帝国”。

经过哈佛的短暂求学生涯（在住校两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并从事了几年的律师职业之后，年轻的亚当斯转而投身于政治。他赞成第一次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在国际事务中进行有效谈判所必不可少之大权的宪法，政党兴起之时，他和他父亲一样成为联邦党人，尽管是一名持有独立立场的联邦党人。

1794 年，华盛顿总统派遣年轻的亚当斯出任荷兰公使，后来短暂地出使伦敦，处理《杰伊条约》的善后事宜，该条约是新政府签订的第一个重大的国际协议。1797—1801 年他父亲担任总统期间，他仍在国外任职，作为一个局外人观察着本国同法国的不宣而战的战争，在美国两次被拖入由法国大革命所触发的大规模战争中，这是第一次。杰斐逊执掌大权后，他丢掉了职位。

1803 年，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党人把亚当斯选进了参议院。经过三个星期的艰苦不堪的马车旅行后，他晚了一天才抵达华盛顿，没能赶上对路易斯安那购买案进行投票。其他所有联邦党参议员都反对此举，其根本原因是，他们担心向西部拓殖会导致本党失去权力和影响。亚当斯本人认为这次购买是违宪的，他这个立场并非不合情理，因为连购买人杰斐逊都是不那么半心半意地认为，宪法的任何条款都没有授权政府可以兼并领土。然而，这位新参议员所重视的是国家的发展壮大，他还乐于看到法国失去北美大陆的立足点，故而投票赞成拨款 1500 万美元，去做成这笔交易。

大约与此同时，欧洲的战火在短暂告停之后再度点燃。不久，在英法两国的双双打击下，美国的商业损失惨重。亚当斯的一些联邦党同僚，特别那些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同僚，受着同情英国和仇恨杰斐逊之情绪的驱使，走到了叛国的边缘。亚当斯恰恰是反其道而行，赞成对侵害美国利益和荣誉的行径进行抵抗。1807 年，他任职于批准杰斐逊实行外贸禁运之要求的参议院委

员会，尽管这个要求遭到其他联邦党人的普遍反对。他对该委员会的一位同僚说：“这个措施会让你我丢掉位置，但是，个人私利绝不应该同公共利益作对。”这个预言果然言中：在亚当斯结束任期以前，马萨诸塞州就选出了继任的参议员。他旋即辞去了参议院的职位。

1809年，詹姆斯·麦迪逊在参议院拒绝了他的第一个候选人以后，提名亚当斯出任驻俄公使。在圣彼得堡，亚当斯成为俄国政府正式承认的第一位美国公使，他尽心尽力地为美国商业争取良好待遇。他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建立起密切关系，两人常常在涅瓦河畔共同散步，纵论天下大事。在任期快要结束之时，亚当斯亲眼目睹了拿破仑1812年入侵行动的失败。在给他父亲的信中，他写道，“那些长期以来一直害怕普世王朝幽灵的政客们，现在可以放下心来了。”在这里，他说的是那些总是用令人生畏的拿破仑作为理由而要求同英国保持密切关系的美国人。

同时，他从远处愈益沮丧地观察着美国政客之间勾心斗角而且实在是丢人现眼的小丑行径，他们在英法两国对中立贸易的攻击面前，却想去调和那些不可调和的利益——和平、繁荣和尊严。当英国终于在1812年减少对美国贸易的攻击行动时，亚当斯感到欢欣鼓舞。但不消几个星期他便得知，在这个消息送到华盛顿以前，麦迪逊和国会已经决定诉诸战争了。亚当斯为这次战争灾祸感到遗憾，他认为“战争的首要根源和理由不早不晚就在战争爆发时消除了”。他还认为，这次战争也许算是对美国共和制度的一次必要考验吧。

至此，在亚当斯47岁的生涯中，他始终处于外交的边缘舞台，充当着一个演员，但算不得是重要角色。在后来的16年里，他将是个主要人物，先是充当结束1812年战争之条约的其中一个谈判代表，继而担任了近八年的国务卿，最后成为总统。在担任国务卿期间，除了其他诸事以外，他还谈判缔结了1819年

《西班牙条约》[1]，为美国获得了佛罗里达，将西部边界一直推到太平洋，在 1823 年秋门罗主义的出台过程中，他发挥的作用甚至不亚于总统本人。

亚当斯本人 1825—1829 年的总统任期，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令人不快的，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把握住正勃然兴起的杰克逊美国的精神气息，虽然他是第一位放弃齐膝马裤而代之以现代长裤的最高行政首脑。他没有妥善处理好主要的外交问题，限制美国与英属加勒比殖民地的贸易，以及未能从新近独立于西班牙的墨西哥购买到得克萨斯，所有这些，都完全符合他的执政风格。

亚当斯谋求连任败于安德鲁·杰克逊之手后，在众议院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涯，以辉格党人的身份服务了 17 年之久。在他的生命走向尽头之时，被称为天定命运的扩张主义浪潮席卷美国上下。长期以来，亚当斯就是个扩张主义者，他在多年前写道，美国"命中注定要扩展到囊括整个北美大陆，上苍和大自然命定它成为联合在共同的社会契约下的人口最多、实力最强的人民"。然而，往昔的激情业已风流云散。他不仅根据秘密的法律和外交档案，而且引用《圣经》的字句，来证明美国对整个俄勒冈地区的要求。一次，他让众议院文书朗读《圣经·诗篇》："祈祷吧，我将赐给你们异教徒世代相传的遗产，让你们拥有天涯海角。"亚当斯认为，这明确地指出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不过，在波尔克总统通过妥协解决争端时，亚当斯并未提出抗议。在他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允许的前提下，他极力反对得克萨斯兼并和美墨战争。在这两件事上，他后半生的那种废奴主义心结发挥了主要作用；他认为，这些扩张动力受到了蓄奴制度的驱使，并不符合国家的利益。

---

① 即《亚当斯—奥尼斯条约》。——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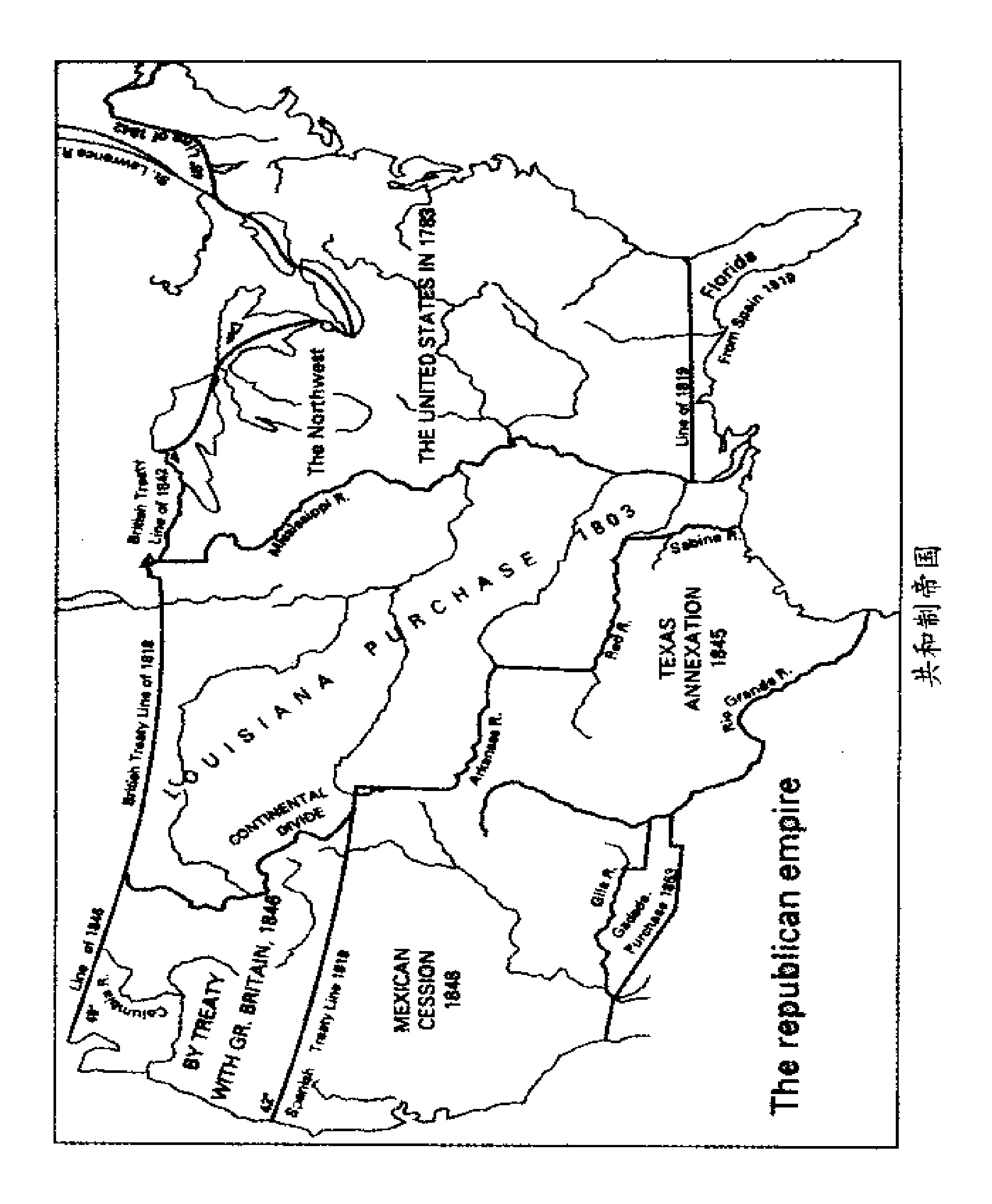
1848年2月，亚当斯突然中风倒在众议院的地板上；两天后，他在国会山撒手西去。他以前的政敌和新近的盟友、来自密苏里的参议员托马斯·本顿感慨道：“除了工作岗位，死神又能在哪里夺走他的生命?”就在亚当斯倒下的当天，美国总统接到报告说，墨西哥已经同意割让西南地区和加利福尼亚，以此作为和平的代价。这些地区的获取，加上俄勒冈争端的解决，使美国的面积增加到300多万平方英里，成为一个拥有2000多万白人人口的大陆帝国。[①]

1775年以来的形势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向前发展着。合众国巩固了独立地位，制定出一部能够确保国家行使权力的宪法，度过了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危险重重的岁月，并通过谈判手段和巧取豪夺奠定了成为未来世界强国的地理基础。然而，正如亚当斯忧心忡忡的那样，对得克萨斯的兼并和从墨西哥夺取的领土，使得他那无比热爱的联邦陷于分裂之中，蓄奴州和自由州较着劲儿地要把各自的制度扩展到新领土上去。美国的未来道路，必须通过1861—1865年的那次内战予以确定。[②] 在1865年以后的年代里，国家注入了在20世纪成为美国权势之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工业实力，不过，其必不可少的基础，却是在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政治生涯及其后几年的那个阶段打下的。

---

① 1853年，根据加兹登购买案而从墨西哥获得的一小块领土，使得48个州拥有了一个完整的边界。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分别获得于1867年和1898年，并在后来独立建州。

② 无独有偶，战时外交的一个主要角色是约翰·昆西·亚当斯之子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作为林肯派往英国宫廷的公使，他千方百计力争挫败南部邦联获取英国支持的企图。



共和制帝国

利益

美国对外政策的推动力量，同其他国家相比，颇为相似但又

不尽类同。所有国家都同样地注重国家利益，同样地渗入范围更大的文化，在透过国家的而不是普世的价值观这面透镜观察世界事务时同样会出现扭曲，只不过有时扭曲得轻微，有时扭曲得严重。不过，这中间的每种力量或每个因素，还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美国特性。

威廉·艾普尔曼·威廉斯的《美国外交的悲剧》一书，是多年来外交史领域最负影响的著作，至少从1959年问世以来，历史学家们（和辩论家们）就已采纳了他那个美国始终是个“扩张主义国家”的命题。当然，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个不言而喻的命题。每个国家都以其自身利益为第一要务，甚至那些自称代表了全世界愿望的国家，如1776年后的美国、1789年后的法国和1917年后的苏联，都概莫能外。除了为数不多的国家对其力量限度有着自知之明外，绝大多数国家一有时机就会努力扩张其权势，势力强盛者会露出全球野心，而实力稍弱者则会谋求地区影响。

毫无疑问，无论在独立前还是独立后，美国人——至少是许多美国人——都是扩张主义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甚至在认为“美利坚”仅仅是个地理概念之前就是如此。他们为此感到骄傲不已。1771年，耶鲁的一位年轻毕业生蒂莫西·德怀特发表了他的第一首爱国抒情诗。这位写下了许多爱国诗词、训诫文章和哲学著作的作者，笔端流露出这样的诗句：

啊！充满光明和荣耀的大陆啊，
把你的权势扩及到遥远的海洋，
让它在你的四周流淌；
把你的荣耀普照到天涯海角，
让野蛮民族向你俯首臣服。
你的子孙将航行到冰雪之地，
扬起风帆一直抵达亚洲彼岸。

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如出一辙的沙文主义诗句同德怀特遥相呼应。不仅如此，他的预言还大都应验了。美国的统治扩及到"遥远的海洋"，延伸到长达一千多英里的太平洋沿岸。美国人也确实迫使"野蛮民族"墨西哥和印第安人部落臣服在它的权杖之下，他们"扬起风帆"走遍全球。他们是否获得了世界性的"荣誉"或影响这一点，倒是大有疑问；他们在其他大陆既受尊重又遭蔑视，但更糟糕的是，他们有时会落到无人理睬的境地。然而，德怀特年轻一代的努力，却确定了内战前时期的美国外交的议事日程。

建国初期，对外贸易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尽管国计民生所必不可少的农业仍占主导地位，但市场经济正稳步成型，国外市场迅速成为整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产品的出口率之高，任何时期都难以望其项背；许多重要商品的价格水平，基本上取决于出口价格。至少在约翰·昆西·亚当斯担任总统以前，每一位最高行政首脑都将精力放在发展贸易以及承担贸易的朝气蓬勃的商业船队上。

甚至在北美还是殖民地时，而且总的说来是对英国忠诚有加时，美国人就对英国《海上贸易条例》体制下的重商主义持有分歧，因为该体制实质上主要把北美的贸易限制为在帝国内部进行交换。他们想要自由自在地同尽可能多的国家进行贸易，交换他们所选择的任何商品，无论这些国家是在大英帝国以内还是以外。合乎逻辑的是，他们立国之后的政策就同其他国家不尽相同，而总的说来，他们谋求不加任何束缚地发展商业，而不是通过立规立矩来加以推动。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美国人的基本目标与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相比，并无多大差异。

清教徒从普利茅斯岩石海岸跨出第一步以及弗吉尼亚人沿詹姆斯河逆流而上之时，领土扩张便告揭幕。在殖民者作为英国臣民的年代里，他们热烈拥护帝国的扩张，敦促伦敦特别将法国人

从他们一心想要开发的领土上赶走。独立之后，他们继续推动这个进程。到1865年之时，美国业已扩张到太平洋，共和国公民们自豪地宣称，美国已成为一个帝国了。

这种向成片地区的大规模扩张，颇为不同寻常。最能与此相提并论的，是始于十五世纪末期并在十九世纪基本宣告结束的沙皇时代的俄国扩张。在那个漫长的过程中，俄罗斯人从原先那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聚集地向四周扩张，这与美国人从大西洋沿岸向西推进如出一辙。不过，俄国扩张的核心目标，在于确立起对广大非俄罗斯人口的统治权，俾使中心能够剥削后者的劳动成果。另一方面，美国人并未企图降低土著美国人或墨西哥人的身份，让他们充当葡萄园的徭役。这样说，并不是要拔高美国人的道德情操，他们的扩张目标同样是自私自利的，他们的扩张手段常常是残忍无道的，特别是同印第安人打交道时尤为如此。但是，他们追求的是土地和资源，而不是去统治别人。假如印第安人干脆消失得了无踪影，他们倒会由衷地感到高兴，因此，他们所夺取的墨西哥的半壁领土上只有区区数千居民，并非偶然。美国的这种扩张主义是独一无二的。

在德怀特的清单中，还有一类旨在扩大影响和尊严的“荣耀”目标。美国人自认为是个模范社会，命中注定要去改造世界。正如约翰·昆西·亚当斯的父亲在1765年写道：“我向来是怀着崇敬和惊奇的心情认为，北美的拓殖乃是上苍教化和解放全世界所有奴性十足之人的宏伟计划的开端。”这表达了一种早已广泛流传的看法。美国革命的成功以及共和政府的建立，增强了这种情感；绝大多数美国人相信，法国大革命、拉美革命和欧洲1848年的反叛，证实了这种看法，尽管历史学家们仍在就他们这个观点有多大的精确性进行着争论。因此，在1850年出版的《白鲸》这部小说中，赫尔曼·梅尔维尔能够写道：“我们是世界的自由之乡……让我们永远记住，在人类历史上几乎亘古未见的

事情是，我们国家的私心，就是永无止境地行善施好；我们不能为美国谋取好处，但却必须向整个世界提供接济。”在约翰·昆西·亚当斯终其一生的整个时代里，美国人自始至终都在追求着被尊为世界楷模的目标。

这种傲慢之见在内战以前往往还是无甚恶意的，它只是偶尔地付出代价，如果同以后进行适当比较的话。许多其他国家在历史上都经历过傲慢阶段，有的阶段几乎与美国历史一样悠长。最后这一种扩张形式，如同其他形式那样，是任何一国外交中根深蒂固的利己主义的产物。美国的形式不尽相同，但其题中之义却未有变换。

价值观念

当然，形式来源于美国文化的价值观念。无论在哪个国家，那些手握决策大权的人，不仅受着可资利用的信息的影响，而且为看待这种信息的价值观所左右。在美国立国之时，以及在此后的许多年里，绝大多数国家的对外决策都取决并附属于相对不多的几个人的控制，它至多受立法机构的监督。乔治·坎宁在1822年出任英国外交大臣后，被看成是第一个向全体政治大众寻求较广泛支持的欧洲外交家。美国的情况则与外部世界迥然相异。革命领袖和后来的政府官员们必须在政策上找到全国一致的意见，他们的政策必须符合或基于国家的价值观。概言之，从一开始，“文化背景就不只是外交舞台的一道幕布，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齿轮”。[①]

核心观念的延续是如此久远，以致一直到我们所处的时代；

① 莫雷尔·赫勒尔德和劳伦斯·S. 卡普兰：《文化与外交》（康涅狄格州西港，1977年），第Ⅸ页。

它们根植于美国世界观的程度之深，在今天看来都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它们虽然部分地汲取了他人的思想，特别是17世纪英国人的思想，却与美国革命时期欧洲的主流价值观大相径庭；在多年的时间里，它们在美国的影响要比在其他国家深入得多。此外，其影响之增强，还源于从独立到内战的一系列显而易见地、一步一步地证实了这些观念的事件。确实可以说，如果认识不到殖民地时代和建国初期所勃然兴起的那种意识形态的深入而又持久的影响力，就不可能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

最重要的观念乃是心向共和制度，这与其他地区近乎普遍信奉君主制度的做法泾渭分明。虽然欧洲人可以就王权的合适限度进行辩论，但至少在法国大革命以前（这种辩论在绝大多数国家还将持续好多年），君主制度带来的稳定，被普遍认为是政治秩序所不可或缺的。[①]

美国人拒绝君主制思想，主要在于他们从革命前的争执中汲取了或对或错的教训，同时也是因为在殖民地时代他们在各地所推行的共和主义实验总的说来是富有成效的。"到18世纪时，"埃德蒙·S. 摩根写道，"人民主权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他还说，实际上，甚至在推行平等主义的殖民地，精英分子毫无疑问地掌握着统治权，但人们却很少探讨这一点："在政府历来为规模相对不大的精英集团所控制的那个社会里，人民主权……成了流行小说。"[②]

在独立之后的一代人或更长时间内，美国人对其民有政府实验的命运不无担忧。杞人忧天的悲观主义者们，对现行共和制度中的种种失误痛心不已。一些人担心共和制度会被蛊惑人心的宣

---

① 1789—1815年法国大动荡期间，联邦党高层人物常常拿英国君主制的稳定性同暴民政治进行比较，后来又同英国敌人的专制政体进行比较，但就连这个小集团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抛弃他们所确定的美国共和制度。

② 埃德蒙·S. 摩根：《创造人民》（纽约，1988年），第143，148页。

传所破坏，另一些人则看到了迫在眉睫的贵族控制或独裁专制阴影。然而，没有哪个真正意义上的美国人表示要抛弃共和思想本身，而只是想矫枉归正。美国人一致认为，共和制度以及作为其杰出的实践先驱的美国，代表了当今和未来的希望。

同共和主义密切相关的是政治的和经济的个人主义观念，在共和国的成长过程中，两者之间的联系愈益紧密。在1853年出版的阿历克西·托克维尔所写的杰出论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美国个人主义的支配地位是其主题，有时成为赞誉对象，但常常是批评有加。美国人不像1789年之后的法国共和派，他们很少谈论那种超越个人看法的“国家意志”。虽然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远远超出了那些对建国之父的政策表示敬意的辩论家们的期望，同样地，虽然合作性经济努力日益重要，但个人的自由创业仍是典型形式，这与美国立国时的农业国性质完全一致。正如托马斯·杰斐逊在1815年写道，美国结合了共和主义和个人主义两大主题，因而是“一个模范政府，它通过一种自始至终都从属于人的个人意志的组织形式，确保了个人的权利和劳动成果”。

对共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那种切切实实的普遍支持，却没有转化成外交上的一致意见。事实上，早在18世纪90年代汉密尔顿派和杰斐逊派之间发生的那场尽人皆知的观点冲突之前，争执不下的、有时是异常激烈的政策分歧就已出现，并一直持续到内战以后。然而，政策分歧并没有冲淡实际上为每个美国人都分享着的那套共同价值观念，这些观念深深地影响着所有辩论中的争执双方，彼此都在刺激对方提出针尖对麦芒的政策，同时对这些政策加设了种种限制。

可以说，这些信条是他们的意识形态，但并非像意识形态那样充满了消极含义；也可以说这些信条是他们的理想，但又不像理想那样完全富有积极意义。它们意味着，美国人以及在很大程

度上包括他们那些可能更老于世故的领导人们，从心底里厌恶君主制中央集权政府。（比照这个标准，约翰·昆西·亚当斯对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尊敬算是个例外。）这些观念还意味着，美国人是有所保留地——正如下文即将指出的那样——欢迎并赞成革命的。1796 年，华盛顿总统表达了一种全国性的看法，他言之凿凿地指出，他“只要看到一个被压迫民族举起自由大旗，不管在何时，也不问在哪个国家，都会抑制不住地心潮澎湃”。主要是因为——但不全然如此——受着不干涉主义理念的支配，美国人甚至很少考虑采取积极行动，去支持那些反对君主制度的斗争。但是，华盛顿、亚当斯及其国人同胞的愿望同样重要，从而时不时地使美国的政策具有鲜明色彩。

透镜

每个民族都是通过那个形成于自身经历的透镜来看待世界上的一切外人的。即使在今天，美国国务活动家以及那些记载其言行举止的人们，通常都忽视了这个简单明了的、不言而喻的道理。正如雷金纳德·斯图尔特评论说：“美国已从历史上得出结论，他们在评判他人时很难置身其外。但他们几乎没有认识到，他们自身的价值观把他们那个借以观察世界的镜头弄得有多脏。”[①] 作为经历之产物的信仰体系，决定了美国人观察世界事态并在随后做出反应的方式。

当然，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一面镜子。比如，俄罗斯人对世界事务的看法，就被从 18 世纪初期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直到 20 世纪希特勒所发起的一系列侵略的记忆所扭曲。但是，如同

① 雷金纳德·C. 斯图尔特：《美国扩张主义和英属北美》（查佩尔希尔，1988 年），第 XⅢ 页。

美国那样，每一面镜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如果忽视了国家热心于推动个人主义这个事实，我们就无从解释美国的商业政策；闭关锁国的体制和中央集权式的控制明确地遭到谴责，“门户开放”政策得到青睐。美国一心要获取领土，在很大程度上是贪婪欲望的产物，其基本动力则源于文化价值这面透镜，它使得美国人自认为给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俄勒冈、墨西哥等等地区带去了进步和发展。

相似地，美国人对外部革命的反应，基本上折射出他们对自身的革命所持的看法。他们坚信，他们推翻了专制暴政，避免了血腥无度和社会动荡，缔造了一个共和国，而这正是上帝为全世界所预设的道路。因此，他们欢迎反君主的起义，但又走不出那个经常循环往复的“希望和沮丧的周期”，[①] 在革命越过了纯粹的政治界线而导致镇压、波拿巴主义和深刻的社会变革时，他们又会畏缩不前。恐怖统治导致了原先一致赞成法国大革命的美国人分道扬镳。1848 年的“革命之春”，乃是由巴黎的一次起义所激发的六个欧洲国家的反君主的和民族主义的大爆发，它博得了（来自美国的）阵阵掌声，但法国所发生的过激暴力，旋即导致许多美国人退避三舍。在这期间的 1830 年，还发生了另一场法国革命，这是一次朝向自由主义而远非共和主义迈出的一步，但却赢得了杰克逊总统的赞誉之词，因为“英雄式的和解……使得革命免除了恐怖”。两相对照，发人深省。

美国人做出反应时，通常是忘记了他们那种革命得以成功的两大特殊环境。阿列克西·托克维尔这位算得上是对美国社会最具洞察力的外国分析家，早在 150 年前就注意到这些因素了。他写道：“同保全自由的方式相比，没有何物更能创造奇迹，但与

---

① 迈克尔·H. 韩德：《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纽黑文，1987 年），第 97 页。

学会自由相较，又有何事更难!”在作为殖民地的绝大部分历史时期，美国人都实行着货真价实的自治，他们最终获得自由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使得共和制度既顺理成章，又易于运转；为了造就共和制度得以茁壮成长的环境，他们无须废除等级制的政治特权，或改造经济秩序。其他国家不是那么幸运，在他们越过了美国人所认为的革命的适当界线时，他们也就失去了美国的同情。

美国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高自大情绪，所以总是按照其他民族不如美国人的标准来解释他们不能建立基于个人主义的共和制度这个事实。1787 年，杰斐逊在写到欧洲人民时说：“再过 1000 年，他们都到不了我国芸芸众生目前所在的起点。”法国爆发革命之际，杰斐逊正担任着美国驻巴黎公使。他起先认为，对法国来说，适当的解决方法是有限君主制而不是共和主义，因为法国人离自治还差得很远。数年后，当拉美国家揭竿而起反对西班牙统治时，事实上每个美国人都欢迎反叛之风，但包括杰斐逊在内的许多人不无理由地怀疑真正的共和制是否会随之建立起来。“他们不具备好政府或自由政府的首要条件”，约翰·昆西·亚当斯断言道，“军事独裁和基督教专制给他们的教育、生活习惯及其所有制度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这两种显然不尽相同的反应方式，事实上是同一个镜面折射出来的。美国式的共和制度是最高级的政府形式。那些在共和制上妥协让步的人，可能因其历史原因生来就低人一等，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已铸成大错。在其整个历史上，美国人就是如此这般地看待外国的。

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还有一句话大致指出了这面镜子所折射出来的第二种曲解。托克维尔用他那特有的笔触写道：“给予他们热爱平等和自由之心的，是他们的父辈；但是，赐给他们广袤无垠的大陆从而使他们拥有长久地保持平等和自由之方式的，却是上帝。”美国人拥有广袤的土地和丰饶的资源。贫困

现象当然存在，在内战前形成的那些城市里，这也许最为彰显。美国还有奴隶制度：1790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每6名美国人中有1名奴隶；内战爆发时，每8名中有1名奴隶，总数为400万。然而，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其境况比其他国家好得多；特别是土地所有者的比例，要高出其他任何一国。最重要的是，虽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周期性衰退，但高速的经济增长却是一种普遍现象。

这就铺平了通往共和制的道路，促进了国家稳定，加强了对个人主义的执著追求。"我们以为，我们发现的新生事物乃是'民主改造世界'"，一位历史学家曾写道，"但事实上，却是'富足改造世界'"。[①] 在其他国家，至少在其中许多国家里，政治变革引发了阶级冲突和经济分配对抗，造成了美国人眼中的那种非共和主义的动荡。这种紧张关系亦存在于美国，但相对说来得到了缓解。美国人就是不能理解"这种对照，即三四个像法国这样的国家争来斗去，而单单一个美国却急匆匆地迈向未来"。[②]

透镜概念还说明了另一种思维路径。多年来，学者们的时髦做法，是把理想和自身利益这两种对外政策目标割裂开来，认为它们是相互对立的。事实上，两者合而为一才是通则；国家利益和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只是例外现象。透镜对此要负主要责任。正如马克斯·韦伯多年前写道："直接支配人们行动的，是利益（物质的和精神的）而不是观念。然而，这些观念所形成的'世界表象'，往往充当了转换器，它决定着利益的动力在什么轨道上推进行动。"[③] 一言以蔽之，外交政策的形成，乃在于物质利益、文化以及透镜的交互作用和共同影响。

---

① 戴维·M. 波特：《富足的人民》（芝加哥，1954年），第134页。

② 克林顿·罗西特：《美国的追求》（纽约，1971年），第12页。

③ 转引自汉斯·J.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第4版，纽约，1967年），第8页。

较之孤立主义情结，这三个因素的和谐共存还没有得到较为明确的说明。美国人一心追求着与全世界通商贸易，但是，他们拒绝卷入其他大陆的政治事务，特别是同其他任何国家结盟。在实践上有时会采取折衷路线，其突出例证是对取得革命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法美同盟，但是，政治上的孤立仍是一个恒久不变的愿望，并日益变成一条既定原则，即使孤立这个词本身没被用来描述 20 世纪以前的政策。显而易见，这种政策乃是审慎之举：一个除商业以外的所有利益都限于自身周边地区的国家，因广阔无垠的大西洋之隔而在那个地区日益走向强盛。按照世界标准衡量，一个羸弱的国家只能眼睁睁地卷入大国之间的战争，但是，一个置身其外的国家，在那个同后来相比更认真地看待中立国权利的时代里，却能够期望着从战时贸易中获取重大利益。

与此同时，美国人认为，涉足卑鄙肮脏的欧洲政治会玷污自身清白，只能使自己堕落到与共和原则背道而驰的宫廷阴谋诡计和不计道德的民族私利的地步。卷入欧洲政治将迫使美国在原则问题上妥协让步，使得心直口快但诚实可信的美国外交家们受那些玩世不恭而又诡计多端的欧洲人的哄骗欺诈，也许最重要的是，会导致美国高高举起的那盏照亮全世界的“自由灯塔”暗淡无光。这些观念反过来形成了美国观察海外事态的那面透镜，形成了一种决定如何解释真实事态并进一步证明原先创造了那面透镜的思维模式的视角。

如我们之所见，上文讨论的各种考虑和看法，源于殖民地时期。在某种意义上，在美国立国之前就存在着一种美国行为和思维方式。至少在 1763 年前，拓殖者们还能使自身的看法融于对大英帝国的忠诚。总的说来，他们愉快乐观、颇为富足、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在下个世纪，他们会带着他们的抱负和文化进入一个更加宽广的行动舞台。

第二章 美国外交的诞生

《独立宣言》发表之前

美国革命爆发前25年，没有哪个显要人物梦想过独立，很少有人想到过任何政治意义上的“美利坚”特性。这个词本身，通常更多地出现在英国。即使在1775年4月列克星顿和康科德交火事件之后，大部分英属美国人还不能面对同母国决裂的前景。直到1776年春，约翰·亚当斯还写信给一位心急火燎的记者说：“我的朋友，不管怎么说，在独立举措上表现出来的如此巨大的不愿之情，我并不感到奇怪。一切伟大变革，特别是那些有着极大的不确定后果的变革，都会让人烦恼不已。”到此时为止，虽然亚当斯和其他人都认为独立是合乎需要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们知道，许多人仍在裹足不前，甚至连亚当斯的一些大陆会议同僚也是如此。

当然，美国人颇为自豪地意识到了自身的初步发展。18世纪中期以来，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位殖民地最有名望的人，这位宾夕法尼亚和其他殖民地派驻伦敦的代言人，经常自豪地说起这一点。富兰克林甚至提到了要建立一个美洲“帝国”。不过，对他来说，这个帝国将是那个以伦敦为中心的大帝国的一个愈益重要的组成部分，至少在美洲人口在他所说的“美洲乘法表”的作

用下超过中心地区以前是这样。在革命前夜，其他人纷纷加入到富兰克林的行列。如约翰·亚当斯的堂兄塞缪尔·亚当斯，在1774年写道："不管哪个人，只要他有那么一点点洞察力就能看出，上天将会在美洲建立一个大帝国。"两位亚当斯虽然像富兰克林那样不久就改变了立场，但他们都没有把握住，权势的要义乃在于独立。

殖民地之与英国争议的发端，终究是为了维护"英国人的权利"。拓殖者们要求恢复那部神圣的英国宪法，在他们看来，在政府权力的侵犯下，它已经满面疮痍了。还有什么比"无代表不纳税"这个口号更具有英国性呢？虽然历史上不乏大致相同的事例，也许最适当的例子乃是荷兰在16世纪对西班牙的造反，但近代时期还未曾有过从内部分裂帝国的情况。因此，1774年在费城召开第一次大陆会议之时，没有人要求与帝国一刀两断。会议采取的主要行动，包括支持马萨诸塞（正处在对驻有4000名英国军队的要塞采取暴力行动的边缘）、组织经济禁运并向乔治三世发出陈情书。这些都十分激进，而且对英国来说显然是不可接受的。但大陆会议所寻求的，仍不过是帝国的内部改革而不是帝国的分崩离析。

1775年5月的第二次大陆会议，是在列克星顿和康科德爆发步枪遭遇战三个星期之后召开的。这次会议制定了协调反抗行动的计划，弗吉尼亚的乔治·华盛顿上校受命统率"联合殖民地"的部队。无论是军队还是大陆会议，都没有被说成是"美利坚"的，直到1776年1月，华盛顿和他的参谋人员在晚餐桌上还照例为乔治三世举杯祝酒。尽管有种种迹象表明英国不会妥协，波士顿包围战也在进行之中，但许多领导人仍拒不承认事态的逻辑性。在大陆会议批准主要由弗吉尼亚代表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公告》之时，代表们表达了"与其作为奴隶生，毋宁死为自由人"的决心。但他们又表

示，“我们无意解除我们之间如此长久而又幸福地存在着的那种联合。……我们举兵反抗时，并未怀着要同大不列颠相互分离并独立建国的野心。”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杰斐逊反对旨在寻求外国援助的计划，因为它们会危及同母国的和解之举。

1775 年 11 月 29 日，在列克星顿之战七个月后，大陆会议才设立秘密通讯委员会，以便同大西洋彼岸的同情者进行联系。即使在这个时候，指示委员会同“英国、爱尔兰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朋友”进行接触的那种谨慎言辞，至少承认他们还在强调帝国内部的解决方式。该委员会很快便由富兰克林这个惟一有着广泛国外交往经验的成员负责领导，它小心翼翼地采取行动，虽然早在 1775 年 12 月就同一名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并在 1776 年初派遣赛拉斯·迪恩前往巴黎，安排物资购买事宜（如果可能就以贷款形式），并试探法国对独立决定的预期反应。

这两个行动都是高度机密的（委员会成员都是在午夜从不同方向来到同法国人接头的地点的），这部分是因为全体大陆会议要比它派出的代表小心谨慎得多。虽然英国议会在 1775 年底切断了同殖民地的贸易，但各个殖民地仍拒绝应对挑战。到 1776 年 2 月，大陆会议还第三次拒绝了富兰克林提出的向外国船只开放港口的建议。即使这样做显而易见地提供了一种导致其他国家与英国发生争吵的途径，即使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急需军事物资的反叛军队已无法坚持下去之时，大陆会议仍拒不采纳此议。直到 4 月，大陆会议才同意采取这个足以决定性地挑战帝国体制的步骤。

这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部分地解决物资问题的方案。法国或任何地方的私营贸易主都不能满足美国的要求，只有法国皇家兵工厂的物资才合乎需要。殖民地也无财政资源来偿付其所需物资。然而，只要美国人所宣称的战斗目标不过是要争得大英帝国内的更好待遇，他们就不能指望外国政府的援助，包括贷款。理查

德·亨利·李写道："只要我们自认为是英国臣民，就没有一个欧洲国家会同我们打交道或做生意。"他后来又说，"不是选择独立，而是必须独立。独立是赢得外部同盟的惟一途径。"这个观点逐渐削弱并最终扫除了不愿宣布独立的情绪。

1776 年 6 月 7 日，在得到弗吉尼亚立法机构的支持之后，李向大陆会议提交了一个关于争取独立的决议案。决议案宣称："从此以后，我们就得以采取最为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建立外部同盟了。"大陆会议在犹豫了一个月之后，同时批准了李的决议案及其弗吉尼亚同乡兼政治盟友托马斯·杰斐逊草拟的自由宣言。毫无疑问，在此以前，事态的发展就已使得独立不可避免了。不过，正是获得外部援助这个决定性的要求，而不是其他任何事态，改变了 1776 年春天的形势。

民族特性和孤立

微弱不强的国家意识以及那种不愿切断惯常联系的情绪，推延了《独立宣言》的发表。拓殖者们因为 1607 年或 1620 年以来取得的共同进步而连为一体，并以此种进步为荣。尽管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之间以及宾夕法尼亚和佐治亚之间千差万别，但他们都确信，他们所追求的那种生活方式，使得各殖民地之间的相同特性，大于其与欧洲任何社会的共同之处。随着殖民地内部联系的增强，他们愈益以一种共同的眼光来看待许多问题。这些事件和其他因素，为政治民族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不过，收获的季节是姗姗来迟的。

在革命前夜，理查德·亨利·李的政治导师帕特里克·亨利宣称道："在弗吉尼亚人、宾夕法尼亚人、纽约人和新英格兰人之间已不再有什么分别。我不是一个弗吉尼亚人，而是一名美国人。"尽管亨利后来的地方主义生涯表明他的话乃是夸大其辞，

但也许是确有所指。他的同胞——其他“弗吉尼亚人、宾夕法尼亚人、纽约人和新英格兰人”——对这个说法半信半疑。殖民地和各地区之间互不信任，新英格兰人特别是马萨诸塞人，尤为疑心重重。任何人都不会提出用议会统治来取代美洲的中央集权政府，而发动革命的目标正是如此。

在革命爆发以前，各殖民地都向伦敦派驻了保护各自利益的代表。这些代表有时是受到委托的英国人，有时是殖民者自身。他们偶尔以联合阵线的姿态出现在议会或商务部，但是，像革命前的富兰克林那样有着其他任务的人寥寥无几，因为他们只代表某一个殖民地。在最后的危机期间，富兰克林和马萨诸塞的另一名代表阿瑟·李，竟然擅自代表所有殖民地，好像他们是国家的代表。不过，虽然英国在最后的危机以前形成了对所有殖民地的共同政策，但代表们用来应对这项政策的，不过是一种松散的合作。

在战争和防务问题上，各殖民地之间的相互协调更是不尽人意。在1689年到1697年的“威廉王之战”[①]期间，康涅狄格州拒绝援助纽约州抵抗法国的进攻，可想而知，当它的邻居后来遭到入侵时，纽约州就以牙还牙了。1756年，富兰克林的那个旨在采取共同行动对付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阿尔巴尼计划”，在提交给各殖民地立法当局时，没有得到任何响应。那些支持一体化的人最终认为，这个进程必须由伦敦来推动。有一名记者写信给富兰克林说，“不管这个步骤对这些殖民地的共同安全和防务是多么必要，但毫无疑问的是，它永远也不会发生，除非我们被迫采取行动，根据国家最高当局的命令”，也就是说，根据英国议会的命令。

---

① 即9年战争，因当时的英国国王威廉三世（1689至1702年在位）而得名，这场主要在英法两国之间进行的战争同时在欧洲和美洲展开。——译者

在1756年开始的七年战争期间，殖民地的爱国主义勃然兴起。他们洋洋得意于殖民地和英国军队取得的胜利，他们有着以法国为对象的帝国主义扩张的共同愿望。然而，“美洲的自我意识……一方面完全融于各殖民地的地方忠诚，另一方面又为对帝国或‘英国’的忠诚所包容。”[①]

每个殖民地都自认为是自由的前哨，是世界上最自由的英国宪政制度的防御工事上的一个堡垒。七年战争后，当伦敦偏离其长期奉行的“令人欢迎的忽视”政策时，殖民地担心起他们的自由权利了。他们的威胁感，更甚于同法国及其（印第安人）部落同盟进行战争之时。不过，他们仍不愿团结起来，当富兰克林在1775年7月大陆会议上提出一项联合计划时，他的提议被认为是太过激进，以致会议记录将其删除了事。共同的需要最终促使美国人走到了一起。据说，这位年事已高的哲学家在签署《独立宣言》时曾经说道：“我们必须团结一致，不然，我们肯定会一个个地被吊死。”与此同时，以维护自由为宗旨的斗争使美国人认识到，他们的共同之处有多少，他们的自由权利又在多大程度上胜过其他人。正是从这里形成了一种共和主义的民族主义——年轻幼稚，既热情奔放又疑虑重重，而且与地方主义纠缠不清，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是一种即将表现出持久韧性的民族主义。

孤立主义精神的形成，与这种新的民族主义密切相关。一位杰出的外交史学家评论道：“革命本身就是一次孤立的行动，它切断了同旧世界的纽带，这是一个自认为不同于大西洋彼岸的社会的行为，而这个社会的成员及其抱负，也确实是独一无二的。”[②] 战争的迫切需要促成了1778年的美法同盟，但这个同盟

---

① 马克斯·萨维尔：《自由的种子》（纽约，1948年），第555页。

② 德克斯特·珀金斯：《美国处理对外政策的方式》（马萨诸塞州剑桥，1952年），第10页。

实际上不到五年即告破裂，虽然形式上维持了 20 年之久；此后直到 20 世纪，美国未有任何结盟之举。

孤立主义不只是一项消极的政策。美国人自认为是世界的向导。如果新的共和国想要激励其他民族的话，就必须保持其纯洁质朴的特性，绝不沾染那肮脏不堪的王朝国际政治。通过避免政治联系，新的共和国也许能够促使世界早日到达法国“政治家”（原文斜体，下同。——译者）团体以及 18 世纪英国激进派所梦寐以求的那一天。那时，统治世界的将是理性，而不是刺刀和枪炮，而共同受益的商业将使和平机制顺利运转。正如杰斐逊在 1784 年所指出的，美国人在谋求同普鲁士达成商业条约时，他们想要实现“一个对人类来说价值弥珍的目标，即完全消除商业束缚，促使所有国家实现自由而又幸福的相互交流”。在革命的一代和直至当代的后来人的头脑里，基于全球繁荣的共和主义世界的梦想与国际和平的愿望这两点是不可分割的，其最为雄辩的表述，也许当推伍德罗·威尔逊的言辞。这两个主题都是孤立主义精神的组成部分，从而使得全球抱负与政治退却自相矛盾地结为一体。

除理想主义以外，审慎小心和利益考虑也要求不卷入（欧洲政治）。在 1688 年至 1763 年的 75 年当中，大英帝国几乎有一半时间在打仗；对于殖民地来说，代价有时是巨大的。随着与英国的龃龉不断，他们开始认为，如果没有帝国的纽带——类推下去就是指与欧洲的任何政治联系——他们根本就不会卷入到战争中去。在他的其中一篇政治著作中，富兰克林让“美洲”向“英国”抱怨道，“你与整个欧洲都在争吵不休，而且把我也卷进去了……我同法国、西班牙或荷兰生来就无分歧，但我三番五次地参加你的那些战争来对付他们。”帝国纽带在最近历史中有什么样的影响，政治联系就会在未来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这种担忧，因为言过其实的、从未全然消失的缺乏自信而有

所加剧。美国人自认为是诚实无辜之人，而欧洲外交官则是狡诈无赖之徒。约翰·亚当斯说道："不可捉摸、虚浮不实、神秘莫测和绝对沉默的欧洲宫廷，将是我们那些热情奔放、脾气暴躁、性情懒散和用心不专的使节们所不能忍受的，尽管他们也是同样的沉默寡言。"多年以后，威尔逊在凡尔赛以及罗斯福在雅尔塔所遭到的批评，如出一辙。既然如此，孤立就是惟一安全的路线，一种避免受到利用的惟一途径，而且可能是避免战争的惟一途径，这些战争与合众国的实际利益毫无关系，但却会危及其独立和福祉。

1776年1月，托马斯·潘恩发表了小册子《常识》，这是历史上最卓有成效的宣传手册之一。在经历了人生的一次失败（他的政敌对一位前妇女紧身胸衣制造商的观点嗤之以鼻）和英国的一场婚姻之后，潘恩直到1774年末才来到美洲，但他很快就成为一个鼓吹自由和革命的职业宣传家。他在结束了美洲的生涯之后，又来到法国继续他的事业，无论是在大恐怖时期遭到监禁前还是在遭到监禁后。《常识》是他的第一个重大成就，是一张集所有独立观点于一身的强有力的书面动员令，它在3个月的时间内就售出了12万册。

在潘恩的主题中，有一种清晰可见的孤立主义精神诉求。潘恩认为，即使没有外国的援助，也能取得独立。一旦美国人跨过政治上的卢比孔河[1]，法国和西班牙就会出于其自身利益而提供任何用来同大英帝国进行作战的必要援助。美国一旦获得自由，就无需担心遭到攻击。"只要我们作为美国人，而不是大不列颠的臣民，法国和西班牙过去从来不是、将来也许永远不会是我们

[1] 卢比孔河（the Rubicon），位于意大利北部，公元前49年，高卢总督恺撒越过这条河流同罗马执政官庞培进行决战。"跨过卢比孔河"，是指采取断然行动，决定冒重大风险，破釜沉舟。——译者

的敌人。”独立之后，整个欧洲所追求的，只会是同美洲进行贸易，而美国的利益也将与自由贸易完全一致。潘恩写道：“既然欧洲是我们的贸易市场，我们就应当同它的任何地区建立起不偏不倚的关系。美国的真正利益，就是避免欧洲联系。”

如前所及，李的独立决议包括了一项缔结“外部同盟”要求。这并不意味着，大陆会议反对潘恩的孤立主义观点，因为在当时，“同盟”这个词的含义要比今天宽泛得多，它既指纯粹的商业条约，也包括政治联系和军事保证。美国人能否遵循其孤立主义倾向而避免后者，还有待于观察。

对欧洲的态度

李的决议提出四天之后，大陆会议任命了一个五人委员会，起草拟议中的美法条约。约翰·亚当斯承担了起草工作。他的计划，即“1776年条约范本”，并未含有任何政治妥协条款；正如其名所示，它旨在确立起一种对外关系模式，而不是由反叛者向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国家提供特惠待遇。

“条约范本”对现行原则的最大偏离之处，乃是建议美国人与法国进行贸易时必须享有法国商人的特权，一如法国人与美国进行贸易时享有特权那样。总之，商业往来不应有国家之分；整个文明世界，至少是所有那些接受美国计划的国家，都应当平等地互通贸易。认识到战争不可能立刻废止，而只能谋求最大程度地限制其影响，“条约范本”确立了关于战时中立国权利的最大自由原则。如果法国或美国其中一方与第三国交战，处于和平状态的那个贸易伙伴将得到最高程度的宽大待遇，这远远超出了18世纪——按照现代标准是特别宽大的——的通常做法的范畴。中立国可以同其贸易伙伴的敌国进行贸易，甚至包括军需品。借助这两大条款，亚当斯以及——大陆会议接受了他的主张——新

国家的短期目标是力图减轻战争的影响，长期目标则是建立起一个能够减少国际冲突的贸易体系。

这种进步，当然要取决于建立起一个将世界各大国连为一体的条约体系。同法国的条约只是其中的第一步，但它会带来重要而又直接的好处。任何通商条约都会有助于打破英国对北美贸易的垄断。就法美贸易而言，互惠将会改变法国平常所奉行的重商主义路线。相互保证宽大对待战时中立国贸易，显然有利于美国，它弱小无力，但又对贸易深为关切。一如既往，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不期而遇。

无论是亚当斯——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者——还是他在大陆会议的支持者，都不希望“条约范本”在付诸实施时会一事无成。他们迫切需要推动独立事业，而条约力图通过两种途径达此目的。一方面，与美国的任何条约都可能使巴黎同伦敦一战；另一方面，剥夺英国对北美贸易垄断的前景，可想而知，会让法国不可抗拒地接受这么一个条约。

亚当斯的冷静考虑，得到了富兰克林的靠不住的坚定立场的支持——如果亚当斯性格上的那种胸襟狭窄的历史记录可以相信的话。但他在大陆会议上遇到了挑战。像几乎所有代表那样，亚当斯的堂兄塞缪尔·亚当斯和理查德·亨利·李赞成“条约范本”，而且都希望避免与欧洲的政治联系。但是，他们问道，预期中的商业好处足以用来争取法国站在美国一边吗？美国还需要付出政治和领土贿赂吗？李甚至提议说，如果法国参加，美国就同意打下去，直到它的盟国收回在七年战争中丢给英国的加勒比海岛屿。

李的提议未能通过，因为他走得太远了。不过，大陆会议的许多代表认为，尽管是勉为其难地认为，必须给予某种超出“条约范本”的东西。结果，9月24日批准了（外交）训令，与

“条约范本”连在一起的是一项政治建议，但这项建议是如此有限而又令人生疑，以致它充其量只能算是对于法国的一个小小的刺激因素。训令称，美国反对法国恢复对加拿大的统治，它只是保证说，如果美国先于法国同英国媾和，那么在英法战争仍在进行之时，美国不会援助它的前母国。这项政治保证是再有限不过了；如果法国因为法美联系而卷入战争，年轻的共和国甚至不能答应在战争结束以前继续站在法国一边！

在战争严重受挫而法国又不急于签订条约之时，大陆会议表现得过于自信了。1776 年 12 月，在亚当斯已经返回马萨诸塞老家后，新的训令提出，美国一旦同英国媾和，会提前六个月通知法国，它甚至答应支持法国重新得到加拿大。大陆会议勉为其难地提出上述建议，但军事形势一有改观，马上就收回了后一项建议。亚当斯的期待，永远是他那些同僚的希望。

法国的援助

美国人在开始革命时就认识到，法国是惟一能够提供决定性援助的国家。七年战争以来，法国领导人一直梦想着报仇雪恨，1774 年后担任外交大臣的韦尔让伯爵，几乎在革命爆发之时就赞成向美国人提供援助。在他看来，“英国王室在北美的困境，就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我们不能白白地错过。”[①] 他从十足的重商主义信条出发，认为大英帝国的分裂会使其失去大量的北美贸易，而这是英国商业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②] 反过来，经济损失会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特别是打击英国的威望。因此，通

① 西蒙·沙玛：《公民》（纽约，1989 年），第 48 页。

② 事实上，殖民地购人的商品不到英国出口的 1/5。毫无疑问，即使在美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至少还有部分商品仍然输往美国。

过援助美国革命取得胜利，法国就能维护自身的利益。

在推销上述主张方面，韦尔让得到了浪漫主义剧作家（《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婚礼》）和冒险家皮埃尔·卡隆·博马舍的帮助。1775年，博马舍前往伦敦执行一项非同寻常的使命：弄清一名法国叛逃者的性别，此人曾是法国军官，现在却以女人的面目出现；一旦弄清此事，他便要通过爱情手段或金钱诱惑——不管哪种手段，只要合适就行——收回那些万一公开就会置法国于尴尬境地的文件。博马舍牢骚满腹地说，“向一个龙骑兵上尉大献殷勤”并不是他的分内职责所在，但他尽到了义务。博马舍在伦敦办差的时候，与大陆会议的秘密代表阿瑟·李接上了头。李暗示说，反叛者如果得不到援助就会向英国军队投降，而这位法国人的浪漫主义性格不可避免地使他接受了不只是这种暗示的表面价值。在韦尔让的鼓励下，博马舍炮制了一系列报告，以便递给路易十六。

执掌法国财政部的杜尔戈侯爵是个精明能干的人，他的看法更加老道世故。他正确地预见到，如果英美分裂动摇了《海上贸易条例》体系的话，那么英美贸易将会增加而不是减少。他警告说，与英国发生冲突，将会使那个他正在谋求进行改革的财政体系背上难以承受的负担。这个预言也成了事实。1789年，召开三级会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开辟新的岁入财源，而这次会议促成了法国大革命。最后，杜尔戈指出，美国模式对君主制度构成了威胁；在鼓励民众向统治者造反这件事上，他看到的只是危险。

这种冷静而又理智的看法，轻而易举地遭到压制。博马舍向犹豫不决的国王进言道：“陛下，如果您本人不想受到侮辱和削弱的话，那么您就得侮辱和削弱英国人。”在《独立宣言》发表以前的1776年5月，韦尔让（和他的代理人博马舍）就已获胜了。法国决定从皇家仓库调拨物资，但交易是通过奥尔塔列和谢

这家商业公司作掩护的，该公司的头头就是博马舍——再合适不过，如果不是不能胜任的话。杜尔戈挂冠而去。

那些自认为计谋多端、胜算一筹的国务活动家的草率妄动，更为清晰地表现在西班牙的政策上。1777 年弗洛里达布兰卡伯爵上台执政以前，如同巴黎的那些人一样，马德里的领导人急于援助敌人的敌人，去帮助美国人对付英国人。西班牙当局认识到革命的疾病也许会扩散到本国的殖民地，他们也有点儿担心美国会谋求以西班牙为对象而进行扩张，特别是向路易斯安那地区，他们还像法国人那样不期望新国家茁壮成长进而摆脱附庸国地位。对当时欧洲国家政策的一个颇有启发意义的评论是，尽管有这些考虑，西班牙还是积极地支持法国的援助决定，而且赞成韦尔让的看法，认为战争迟早会跟着爆发。

本杰明·富兰克林出使巴黎的经历，已成为美国传说的一部分。他的两个不太张扬但喜欢争论的同僚赛拉斯·迪恩和阿瑟·李所大为沮丧的是，他们根本就是相形失色。这位哲学家兼国务活动家充分地发挥了作用，他向各行各业的法国人发出呼吁，无论是改革派还是未来的现实政治家，也无论是皇亲贵族还是普通百姓。国王对富兰克林的大受欢迎气恼不已，便将一把镶有此人肖像的夜壶赠给这位美国人的其中一个最狂热的女性崇拜者。对许多人来说，“博士”的身上似乎汇集了让—雅克·卢梭的几乎是田园牧歌式的民主——富兰克林装模作样地戴着毛皮帽也许帮了大忙——和伏尔泰的理性执著。当这位美国人和伏尔泰在法国科学院见面时，两位名流热烈地相互拥抱，观察家们评论说，这是新一代和老一辈的联合，或者是梭伦[①]和苏格拉底的会见。

1776 年 12 月抵达不久后，富兰克林、迪恩和李受到了路易十六的“秘密”接见。战争期间，他们争取到超过 800 万美元的

---

① 梭伦，公元前 638—公元前 559 年，雅典立法者和改革家。——译者

资助和贷款。法国的盟友西班牙拿出了另外 65 万美元；到战争结束时，荷兰则提供了由法国担保的 180 万美元贷款。

这些美国人无论是在凡尔赛受到款待还是他们的其他许多活动，都未能长久地保得住秘密。很少有哪个美国外交使团受到敌国特务的如此深入的渗透。此外，富兰克林至少时不时地出于政治原因而泄露秘密情报，而这通常是为了吓唬英国人。迪恩也许就是英国的特务（他在 1781 年站到英国一边），而且肯定是个利用内幕消息谋取私利的投机家。李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接受英国的佣金。伦敦方面最重要的特务是迪恩的秘书爱德华·班克罗夫特，而迪恩对于调查班克罗夫特不忠一事表现出一种难以理解的毫不关心态度。特务与其主人进行联系的其中一种方法，肯定会使博马舍欢喜不已：班克罗夫特常常把那些看上去像是情书的信件放在杜伊勒利王宫的一个树洞里，英国特务拿到后，把隐显墨水情报显现出来，然后传递给伦敦。英国人从未完全相信过班克罗夫特，他们曾经截获过他的那些大多是关于投机的私人信件，从而得到了他没有传递的更多秘密。

法美同盟

时间足足过去了一年，3 个美国人仍未达到他们那个最重要的目标——法美条约。他们确信，那个远在 3000 英里以外而且落后于现场事态好几个星期的大陆会议没有搞懂欧洲政治，他们决定放弃原先的训令。因此，他们主动采取一种新的行为方式，它与哪怕是最著名的欧洲外交家的行为方式都大相径庭，后者在谈判中偶尔拥有较大的自由，但实际上从未置训令于不顾。在很多年里，他们的行为得到其他美国代表的竞相效尤，其合理性同样地得到证明，至少在 1848 年以前是如此，其时，尼古拉·特里斯特为了同墨西哥缔结和约，公然藐视波尔克总统，甚至拒绝

服从召回令。这些做法有时会得手，如获得路易斯安那一事，有时则会造成进退两难，但它们都是美国所特有的。

就富兰克林及其同僚而言，开始时一无所获。即使他们保证不同英国单独媾和，法国也不为所动。法国宁愿奉行一条小心谨慎的政策，保持非正式的、有名无实的秘密联系。在国王的许多臣仆看来，与革命者结盟是一条值得怀疑的政策。训练有素的军队认为，即使法国提供援助，也很难相信一帮乌合之众能够打败英国军队。虽然韦尔让几乎是毫无疑问地期望与英国一战，但他估计法国海军要到1778年才能作好准备。

"我们正在上演一出令所有观众高兴不已的剧目，"身在欧洲的一位美国代表写道，"但似乎无人愿意付钱给演出人员。我们所能得到的，似乎只有掌声。"在这位观察家看来，观众的态度似乎是未来前途的一个不祥之兆。"波旁王室在我们艰难困苦之时不下决心提供援助，将使我国人民有理由不同他们结成具有约束力的联系，如果大功告成的话。"事实上，那些一直通过奥尔塔列和谢公司付钱给演员的观众们，正准备走上舞台。

1777年10月，约翰·柏高英将军及其5000名官兵在萨拉托加向叛军投降。伦敦开始真心诚意地谈论做出让步，虽然是独立以外的让步。卡莱尔勋爵为首的一个代表团被派往美洲进行谈判，还有代表同富兰克林和迪恩（伦敦认为李这个人顽固得不可救药）进行了接触。富兰克林故意让法国人得知，美国人已被两年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有可能满足于帝国改革。

韦尔让大大利用了萨拉托加的消息，因为这似乎表明，如果给予充分援助的话，至少美国人是打不败的。他还利用了英美可能实现和解这个绝无事实根据的传闻。西班牙转而奉行谨慎路线的事实并未难倒法国。在得到国王首肯的情况下，韦尔让签订了一项商业条约。更为重要的是，他建议签署一项在英法战争爆发时即行生效的同盟条约，美国三人代表团表示赞成，因为双方都

期待着早日结成同盟。两个条约是秘密的，但由于班克罗夫特告密，伦敦不到两天就已获悉。

1778年2月6日的条约再次暴露出美国政策的内在矛盾。大致遵循约翰·亚当斯的1776年方案的商业条约，体现了美国对自由主义、孤立主义以及和平的诉求。未得到大陆会议授权但最终获得批准的有条件的同盟条约，则使美国卷入世界政治。法国允诺保证美国的独立，并保证不去恢复加拿大，作为交换，美国代表作了两项承诺。他们使本国承担了不单独媾和的义务："在未得到另一方首先予以正式同意的情况下，双方中的任何一方不得与英国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如果细加揣摩，这项保证乃是把美国的未来命运同法国在欧洲、加勒比海和印度的野心捆在一起。代表们还使本国有义务在战争结束后帮助法国保卫其在西半球的属地，而这项保证可能将美国拖入法国参加的每一场大战，因为任何敌人都会进攻西印度群岛的法国岛屿。因此，条约突出表现了早期美国外交的主题——既渴求孤立，同时又接受政治现实。因此，尽管美国在1778年取得了萨拉托加大捷，但对法国支持的需要，却迫使它在现实面前做出重大让步。

在列克星顿和康科德战役三周年之际，身带条约的信使抵达波士顿。他从这里把条约邮寄到费城，大陆会议未加拖延即予批准，无一人提出令人尴尬的政治问题，或指责代表们越出了训令。5月4日，美国正式接受条约，大陆会议为表示庆祝，打开了卡莱尔为铺平和解谈判道路而送的那瓶葡萄酒。1778年6月，英国和法国开战，有条件的同盟条约正式生效。

同盟战争，同盟外交

虽然要到三年多以后同盟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法国的军事援助对美国革命的成功却是至关重要的。法国继续提供资

助，尽管韦尔让按年度拨出。外国的物资，包括美国军队使用的大约 9/10 的弹药，有助于推动革命继续前进。约翰·保罗·琼斯之类的海盗们，则把法国（以及荷兰和西班牙的）港口作为庇护所。[①] 最重要的是，法国以及于 1779 年参战的西班牙，在印度、加勒比和直布罗陀等地牵制了英国的资源，它们虚张声势地集结军队要去进攻英国本土。但在总体上，就欧洲参战国而言，北美的战争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对所有欧洲大国来说，由法国决定援助北美反叛者而打响的战争，变成了一场重新安排旧大陆秩序以及事实上是世界秩序的争夺。

1781 年以前的军事合作并无成效。1778 年在罗德岛纽波特港和 1779 年在萨凡纳港，法国海军和美国军队的联合行动不光彩地归于失败。1780 年，罗尚博率领一支小规模部队抵达美国，但那个大肆宣扬的、规模较大的“第二师”却从未出现。1781 年夏季以前，罗尚博拒不从营地露面。后来，他同意向纽约进军，不久到达弗吉尼亚，在这里，华盛顿将军把康华理勋爵率领的一支北上部队团团围困在约克敦半岛。格拉斯海军上将率领的一支原本横跨大西洋前来援助西班牙人而不是美国人的舰队，将切萨皮克湾入口封锁了关键的几个星期。1781 年 10 月 19 日，康华理投降。第二天，一向对天主教抱着反对态度的美国人同人数更多的法国人一起，共同举行了庆祝弥撒。在以后的战争期间，北美没有发生重大的军事交火。

鉴于两国间的实力悬殊和法国对殖民地构成的传统威胁，尽管发生了令人不快的插曲，包括法美海军士兵在港口吵吵斗斗，但同盟所发挥的作用比预期的要好。出于谨慎，双方对大多数分歧都心照不宣。历史学家后来已经弄清了当时没有几个人知道的

① 琼斯利用荷兰作为庇护所以及荷兰与北美间的大规模商业往来（其中许多是军需品），在 1780 年促成了英荷战争的爆发。

事情。此外，美国领导人是心怀警惕而结盟的。他们接受了法国是为了私利而与他们联合的事实，正如华盛顿在1778年写道："我从心底里接受我们新盟友的最值得称道的感情……但是，根据整个人类历史而来的一大原则是，没有哪个国家值得更加信任，除非它受自身利益所约束。"

法国只想拆散大英帝国，它无意于为了单纯的美国利益而拖延战争。到1780年，连韦尔让都对战争厌烦不已了，因为政治盟友们难以理解那些惊人的胜利，而他在宫廷中的敌人也开始起来反对他。这位外交大臣着手寻找结束战争的途径——也许是通过俄国的调停。他向可能的调停者和其他国家明确表示，虽然法国不会公开背叛美国人，但凡尔赛不会同情他们的勃勃野心。正如韦尔让所称，法国肯定不想看到"新共和国成为整个大陆的女主人"。他不很认真地考虑让英国控制几块零星的殖民地这样的计划，同时他还坚决地拒绝支持美国对加拿大的野心，这不只是因为他期望英国继续留在那里而使美国人觉得必须仰仗法国的支持。

这位外交大臣也不赞成年轻的共和国对密西西比河谷的野心，因为法国的老盟友西班牙在那里拥有切身利益。在西班牙和美国就阿巴拉契亚山脉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领土或就密西西比河使用权问题所进行的常常是激烈异常的谈判中，法国无论什么时候介入——它通常是要避免得不偿失的卷入——它都倾向于支持马德里。此外，根据那个导致西班牙在1779年参战的条约，法国允诺帮助其邻邦从英国那里收回直布罗陀，但当这一点被证明是困难之举时，韦尔让希望西班牙人接受北美内陆的补偿。

无论是韦尔让还是他在费城的代表，都毫不掩饰他们对加拿大和西部的立场，虽然他们根本没有就此背后的反美动机进行辩解。他们的立场激怒了许多消息灵通的美国人，也许最有名望、最为健谈的就是约翰·亚当斯。不过，其他人却同意法国人的看

法，认为应当尽早地结束战争，他们包括理查德·亨利·李和罗伯特·利文斯顿，后者是一个说法语的、立场悲观的纽约人。这些人不愿意继续打到占领加拿大，或打到确保纽芬兰水域的捕鱼权，这项权利几乎专门是亚当斯的北方选民的战前实际利益。当韦尔让的美国代言人寻求并获得大陆会议批准温和的和约条款之时，他们所做的，就是去支持那些态度谨慎的人，而不是纠缠那个敌意重重的大陆会议。

缔和的策略

1779年，大陆会议任命约翰·亚当斯就和平与独立同英国进行谈判。[1] 但在进行了八个星期的谈判后，亚当斯派还是未能在捕鱼权上获得进展，而想要获得整个加拿大的大陆会议授权他只以得到其中一部分而了结。亚当斯的训令也要求他以密西西比河作为西部边界，但不要谋求当时还是英国属地的佛罗里达。

亚当斯在1778年初抵达巴黎，深感自身使命的重要性："华盛顿将军的总司令职务是非常虚弱的。"但是，英国人对谈判并无兴趣，而亚当斯几乎是立即同韦尔让发生争吵，后者不久便告诉亚当斯说，他们俩人从此以后各不相干，他宁愿同富兰克林进行谈判。这位法国大臣告诉他在费城的代表说，亚当斯"呆板、迂腐、高傲，而且以自我为中心，因此没有能力处理政治事务"。

韦尔让指示他的代表、贵族成员德·拉·吕热纳促使美国人让亚当斯闭嘴，甚至撤回1779年训令。吕热纳交相运用贿赂和哄骗，不费吹灰之力便达到了上述两个目的。一位历史学家评论

[1] 与此同时相对应的是，亲法的约翰·杰伊前往西班牙，本杰明·富兰克林则继续担任驻法公使。

道："无辜的人和腐败之流一起，一声不响地走上屠场。"[①] 1781年6月，约翰·威瑟斯庞，一个反对扩张、怀疑亚当斯、接受法国佣金的人，在吕热纳的眼皮底下，起草了新的训令。这些训令放弃了1779年的领土要求，并将亚当斯纳入一个五人委员会。[②]它们还进一步指示该委员会要服从法国大臣的意志："没有他们的知情和同意，你们……不得采取任何行动……；你们最终要接受其建议和意见的领导。"只有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两州的代表抵制这个提议，而只有弗吉尼亚一州坚决要求控制西部。一位怒火万丈的历史学家后来写道："历史上从未有哪个民族如此绝对、如此信任地选择让一个外国政府来掌控自身的整个命运。"[③]

这些奴性十足的训令不可能只是古韦纳尔·莫里斯后来所说的"第二届大陆会议里的……一大帮该死的恶棍的作品"。这些训令反映了战争打了6年但未取得决定性结局（约克敦大捷还要等上四个月）的精疲力竭状态，反映了一种绝对不能危及法国援助的情绪。它们还证明了宗派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力量，因为大陆会议显然清楚，它把权力拱手交给韦尔让，意味着捆住了亚当斯的手脚。较之革命期间的其他任何行动，这些训令明显不过地暴露出新国家的软弱无力。

虽然大陆会议先后四次搅乱了确保美国掌握自身命运的努力，但令人庆幸的是，这些训令成为一纸空文。1782年4月，富兰克林开始同英国代表理查德·奥斯瓦尔德举行名义上是非正式的谈判，此人是他的老朋友，苏格兰的一个商人，一个曾经在美国居住了6年的奴隶贩子。博士既未向韦尔让求得指导，也没

---

① 理查德·B. 莫里斯：《和平缔造者》（纽约，1965年），第213页。

② 五人之一的托马斯·杰斐逊从未赴欧履任，另一名成员亨利·劳伦斯只是到了最后几天才参加1782年谈判。

③ 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美国革命时期的外交》（纽约，1935年），第190页。

有告诉韦尔让他与奥斯瓦尔德的谈判内容（后来才把此事通报给他的同僚或大陆会议）。6月，杰伊结束了在西班牙的那次特别令人不快且毫无结果的使命，抵达巴黎，此次使命打消了他对法国友谊的幻想；10月，亚当斯在出使荷兰后返回巴黎，也自然而然地倾向于推行一条独立的政策。两人在接到训令时曾考虑辞职，但却留了下来，公然挑战这些训令。亚当斯在日记中写道："能够违反这些臭名昭著的命令，乃是莫大的荣幸。"

富兰克林和谢尔本

1781年11月底，康华理在约克敦投降的消息传到伦敦，到此时为止，这是来自诸多前线的不利报告中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它们摧毁了议会和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立法机关刚从圣诞节休会中复会，约翰·康韦将军就向下议院提出了一项决议，反对"继续在北美大陆从事进攻性战争"。虽然康韦及其支持者否认说，他们不赞成那种向美国反叛者投降的卑鄙行为，但他的决议清楚不过地表明，不能再通过军事压力来谋取有利条款了。1782年3月康韦的决议获得通过后，诺思政府宣布辞职。其继任者和富兰克林——那时在巴黎的惟一美国人——很快就进行了接触。

巴黎谈判是极其复杂的，双方之间常常尔虞我诈，而且至少就美国一方而言，它带着一种近乎偏执狂的害怕背叛的心情。伦敦的代表们通常是向各个不同的上司负责，因而常常地自相矛盾。直到最后一刻，杰伊和亚当斯仍为富兰克林那和蔼可亲、乐观自信的外表所迷惑，怀疑他被韦尔让操纵着，杰伊还向他隐瞒了一条同伦敦进行接触的重要渠道。韦尔让不希望看到美国人获取加拿大，"任何能够阻止征服该地区之举，都与我们的看法相一致"。而且，他让英国人了解到这一立场。他还得平衡他的两个盟友西班牙和美国之间的彼此不容的利益。虽然他接受英美单

独媾和的事实，部分是为了压制西班牙缔结和约，但总的说来，他是同情后者的，而如果是他划定边界的话，西班牙肯定要得到美洲内陆的那个大份。就西班牙而言，它准备背叛美国人，而且也许要背叛法国人，如果伦敦割让直布罗陀的话。

在所有这些当中，最为混乱的莫过于英国的政策，特别是谢尔本伯爵所奉行的政策。在以诺思的继任者罗金厄姆侯爵为首的政府中，有两位大臣代表政府同富兰克林进行谈判，谢尔本是其中之一。罗金厄姆在7月辞世之后，谢尔本成为政府首脑和惟一的谈判人。起先，谢尔本极为愚蠢地幻想达成一项把美国同英国紧紧地拴在一起的条约，甚至幻想使美国留在帝国内；为实现以上述条款为基础的和解，他准备付出沉重代价。他很快就放弃了保持永久联系的愿望，但仍坚持着和解的期待。7月末，他在一封写给巴黎代表的信中总结说：

> 我从未隐瞒过我在国家分裂过程中的切身感受，这个国家是用鲜血、原则、习俗以及除领土接壤以外的所有联系而统一起来的。但是，你非常清楚地了解，我早就毅然决定放弃重新统一之想法，虽然是情非所愿。同样的原因，使得我也许是最后一个决定放弃重新统一的所有希望的，使得我现在忧心如焚；而如果要放弃的话，就应当是毅然决然的，以避免未来的所有敌对之虞，并为更好地适应两国当前状态和利益的新关系奠定基础。

然而，谢尔本在公开场合从未如此坦率，即使在无可奈何地决定让美国独立之后。他在开始谈判前还是不愿意正式承认美国，这并不是因为他像美国人所怀疑的那样要为此提出要价，而是因为他要避免国内的政治烦扰。此外，他试图将废除法美同盟作为和平的条件。毫不奇怪，他的立场不被美国人理解，他们将他看做是敌人。

罗金厄姆之死使得谢尔本在短短几个月之内便大权独揽。因为他无法得到所有他的前任的拥护者们的支持，所以只是控制着下议院的少数。除了几次碰运气的外交成就以外，在议会从夏季休会复会以后，他就没有理由期待着继续执政很长时间，特别是因为他也许是当时最令人痛恨、最令人怀疑的政客了。但就目前而言，他是英国方面的最重要的人物，他可以自由行事。

谢尔本成为首相后不久，富兰克林向奥斯瓦尔德提出了一项清单，其中包括“必需的”和“适当的”和平条款，如货币补偿和割让整个加拿大。他说，这些条款将促成真正的和解。即使奥斯瓦尔德通常对美国的要求抱着温和态度，他还是报告说：“他们无论如何不能顽固坚持这些他所谓的‘适当’条款，要么他们全盘放弃。”再说，“必需的”条款要得够多的了，除最明显不过的独立以外，还包括纽芬兰外海渔场的传统捕鱼权和割让加拿大部分领土。关于后者，富兰克林根据1779年大陆会议训令提出，美国要求加拿大的领土边界必须限于英国根据1763年英王敕令而确定的范围，尽管是暂时确定的。这条边界从渥太华河经尼皮辛湖到休伦湖，从而将后来成为安大略省的大部分地区划了出来。如果尼皮辛线在1782年成为边界的话，美国就很可能对加拿大的整个西部地区拥有主权，加拿大的未来命运将大成问题。

但是，谢尔本没有犹豫不决。他立即对奥斯瓦尔德说，如果富兰克林放弃“适当的”条款，英国就准备缔结条约。谢尔本建议说，应当从预备谈判转入正式谈判。奥斯瓦尔德得到了谈判授权。几天之后，内阁对此表示同意，虽然它还决定奥斯瓦尔德应当谋求让那些失去财产的亲英派得到赔偿，确保美国还清战前所欠英国商人的债务。美国人面临着一个绝好的机会，因为除非英国人食言，否则他们不仅能够迅速缔结和约，而且还能根据和约拥有安大略地区，把加拿大限制在沿着圣劳伦斯河上游的一小块飞地上，从而决定加拿大的未来命运。

满腹狐疑的美国人

令人遗憾的是，美国人在英国的立场传到巴黎之前退出了谈判。他们这样做无疑拖延了和平，而且最终失去了尼皮辛地区。没有哪件事比1782年夏天的事态更能说明美国人的那种疑虑重重而又诡计多端的双重心态。

富兰克林从开始与奥斯瓦尔德谈判时就认为，承认美国独立必须是详细谈判的先决条件。6月底到达的杰伊，也完全同意这一立场。他们两个人都担心，如果不这样，他们将会为获得这种承认付出代价，要么是领土，要么是其他东西。他们认为，至少在谈判开始之时，奥斯瓦尔德必须出具任命他同美国代表举行谈判的委任状。对谢尔本来说，他只是提议将承认作为第一条写进和平条约。

他并不在意奥斯瓦尔德的资格问题。早在5月，他就同意"给奥斯瓦尔德必要的资格，以使富兰克林和他可以认定这种资格有助于英国和美国达成最终条约"。然而，事情还是因为一些不明确的原因出了差错，而官僚机构的贻误可能是最大的原因。8月初，当奥斯瓦德将委任状呈给美国人验查时，富兰克林和杰伊立即看到，文件根本没有提及自称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之名，而只是称要"同殖民地……任命的……一位或几位专员举行谈判"。他们扪心自问，这意味着什么呢？它又有多重要呢？

富兰克林显然不想小题大做。杰伊激动万分地说，英国想玩弄两面派手法，谢尔本有可能拒绝承认美国独立，或至少要为此索要高昂价钱。奥斯瓦尔德试图安抚杰伊，向他表明伦敦的部分训令说，英国政府的意图就是"将殖民地的独立视为当前悬而未决定之条约的基础和前提"，但他未能成功。在谈判期间曾被偶尔征询过意见的韦尔让，站在富兰克林一边，但结果却使得那个

纽约人变得更加顽固。他怀疑法国企图背叛美国人，为它自身或其盟国西班牙谋取更有利的条款。约翰·亚当斯从荷兰写信支持杰伊。最终，他迫使富兰克林同意：谈判继续进行以前，委任状必须更换，独立必须得到正式承认。

伦敦几乎是立即做出了让步。改变委任状只是一个小问题，但正式承认独立却是另一回事，在内阁看来，这需要议会来决定。不过，大臣们认为，如果奥斯瓦尔德不能说服富兰克林和杰伊放弃这个要求，那么他们在争得议会同意时就会冒巨大的政治风险。他们还重申道，他们愿意接受富兰克林的那些“必需的”条款。8 月 29 日会议的一个纪要写道：“我们将解决安大略省的边界问题，并缩小加拿大的范围，正如富兰克林博士所期望的那样。”美国人接近取得胜利了，尽管要克服大体上是庸人自扰的障碍才能取得胜利。他们所需的，不过是耐心地等上几天，等待新的训令到达巴黎。

此时，杰伊在怀疑巴黎心态的驱使下却突然改弦易辙。当他得知韦尔让的心腹热拉尔·德·雷内瓦尔带着秘密使命前往伦敦同谢尔本勋爵接触时，杰伊武断地得出结论认为，美国的利益就要被出卖了。[①] 杰伊说服富兰克林放弃了谋求正式承认的要求，如果新的委任状授权奥斯瓦尔德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话。之后，他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在富兰克林的支持下，他向伦敦传递信息，大致暗示说美国将单独媾和，而不管它对法国所作的保证。他还对传递该信息的人员说，美国在战后仍会忠于同盟，“但要

① 事实上，雷内瓦尔受派前往英国是为了试探欧洲和平的机会。他接受的训令并未要他提及同美国有关的问题，在他和谢尔本的谈判中，美国问题只是一带而过。没有提出任何“交易”，但这位法国人的评论还是导致谢尔本向国王报告说，“独立问题一旦解决，他似乎会因为其他问题嫉妒美国，而不是偏向于美国。”这是雷内瓦尔所作的三次访问中的第一次，另外两次是在英美和约签订之后，在此期间，谢尔本私下地、极为秘密地制定出英法和约的条款。

受到他们或我们对同盟所作解释的制约，却是非常困难的”。这些轻率言论远远超出了雷内瓦尔同谢尔本所说的任何话。

这些言论对于说服几个星期前就已做出基本决断的谢尔本或其同僚是毫无必要的，但它们确实改变了这位首相的想法。虽然富兰克林和杰伊两人都不厌其烦地对奥斯瓦尔德说，有利的和平条款会让美法分道扬镳，但目前只有谢尔本一个人相信。他派人将新训令送给奥斯瓦尔德，后者马上发现美国人放弃了要求预先承认的条件，一个需要议会作出决定或通过其他渠道才能达到的条件。他递上载有他的委任状的新文书。杰伊接受了委任状，虽然毫无疑问地，它至少有点儿模棱两可。委任状授权奥斯瓦尔德“与各殖民地（一个个地列出）以 13 个合众国之名而任命的专员进行谈判”。9 月底，这个得到内阁批准的委任状到达巴黎，正式谈判宣告开始。

这一系列持续了两个多月的事件，毫无疑问地反映了美国方面特别是杰伊的拙劣言行。他们未能获得他们开始谈判时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保证——预先承认独立和显然可以接受的奥斯瓦尔德的委任状，如果杰伊没有惊慌失措的话，他们是能够得到这两项保证的。他对法美同盟的背叛绝对是画蛇添足之举，而之所以没有付出高昂代价，不过是因为谢尔本早已做出决断。概言之，富兰克林和杰伊也许拖延了和平。7 月，他们的主要目标几乎就唾手可得，然而，他们因为自己所强加的拖延而一无所获，并失掉了尼皮辛地区。

《巴黎和约》

10 月 4 日，杰伊将和约草案交给奥斯瓦尔德，它大体上是根据富兰克林建议的“必需的”条款草拟的，但略去了“适当的”条款。比如，他并未要求得到整个加拿大。谢尔本在两个星

期之后作出答复，提出了自己的草案，并派出新代表亨利·斯特雷奇，以使奥斯瓦尔德变得强硬些。就杰伊和富兰克林而言，他们得到了爱好争论的约翰·亚当斯的增援，他在得知委任状问题解决之后便从荷兰赶来。谈判常常是激烈的，连富兰克林都一改往日的和事佬作风。这使亚当斯吃惊不已，他在日记中不得不坦率地写道，“他一直与我们并肩作战，完全一致，毫无分歧。”但过了不久，他们与斯特雷奇的争论便告烟消云散。11 月 30 日，和约在奥斯瓦尔德寓所签订，此时距离约克敦事件启动外交谈判整整一年。这有助于谢尔本于 1783 年 1 月同法国和西班牙缔结和约。

英国谋求的主要条款，包括补偿亲英派失去的财产，保证英国债权人收回其在革命爆发之时拥有的债务，删去那个确保美国人在英属北美水域享有捕鱼权的条款。谢尔本多多少少地承认说，他不太关心这些问题，只不过他要避免政治攻击而已。因此毫不足怪的是，尽管发生了激烈争论，他最终所得甚少。和约赋予美国人在相关水域的捕鱼“自由”，这是一个含混不清的、后来引起麻烦的词。和约还保证，大陆会议将建议合众国发还被没收的亲英派的财产，并保证还清战前债务，但是，正如众所周知，大陆会议无权完成上述任何一件事。这些条款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让步和空洞无物的套话”。[1]

和约确定，五大湖线是加拿大和美国的边界，而密西西比河则是西部边界。这样，美国人获得了一个面积可观的、远远超出当前居住范围的帝国。美国谈判代表经常受到称赞，因为他们争得了位于俄亥俄河与五大湖之间的西北地区。实际上，他们的成就有着想像的成分。有那么一个短暂时期，谢尔本曾要求把西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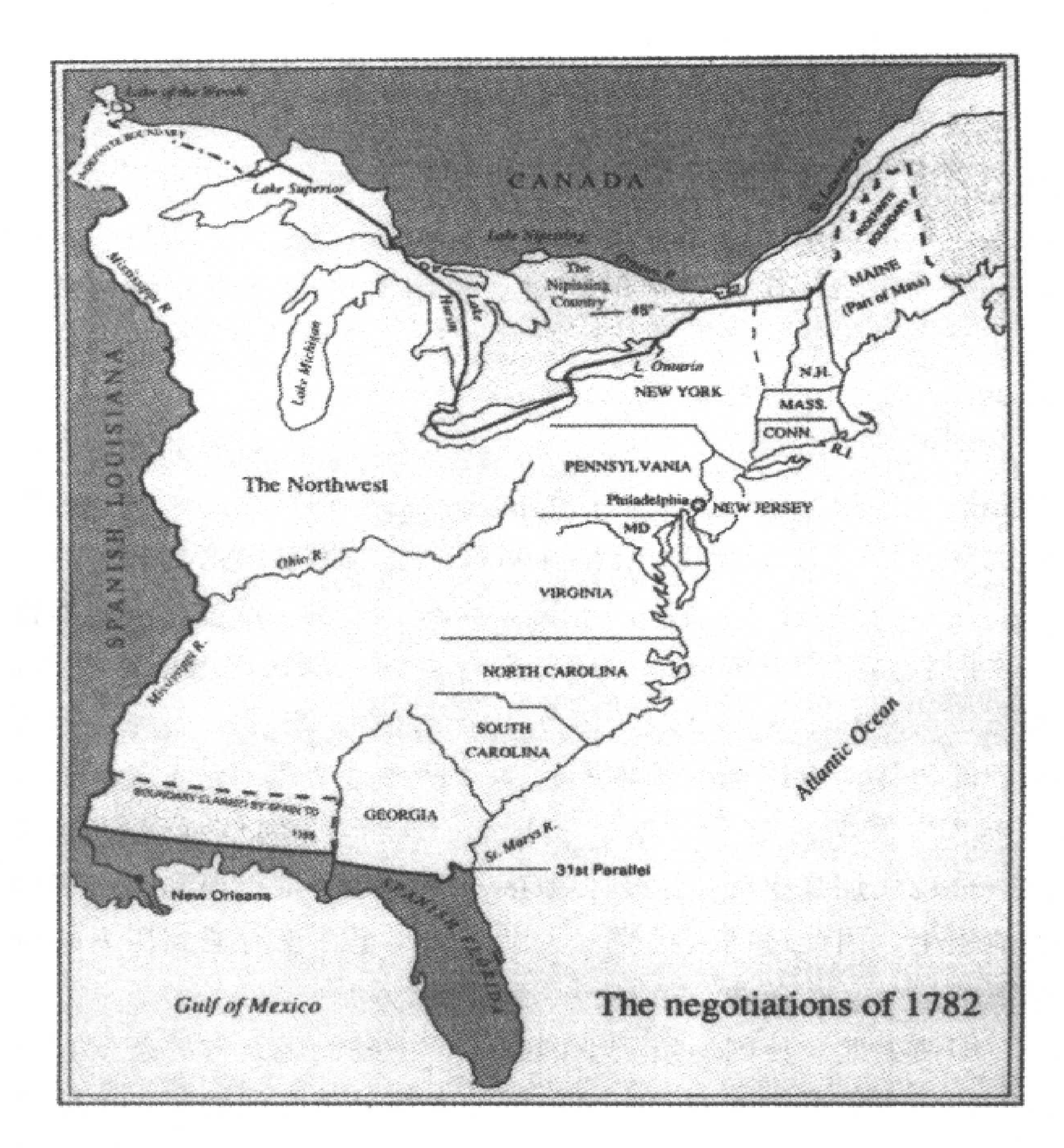
① 詹姆斯·H. 休斯顿：《约翰·亚当斯和美国革命时期的外交》（肯塔基州列克星顿，1980 年），第 128 页。

地区作为对亲英派的补偿，但除此而外，他并未努力为大英帝国守住这些领土。边界从未激起他的多大兴趣，事实上，一个扩大了的美国会成为英国的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从而可能造就一种更有价值的新殖民关系，这似乎才是他所设想的。美国人未能得到佛罗里达，作为和平的代价，英国后来同意将其还给西班牙，而英国承认密西西比河作为其西部边界，不过意味着他们还得就此与马德里进行角逐。

在谈判的最后几个星期里，获得更为有利的边界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声不响地就消失了。他们从未能够得到整个加拿大。虽然富兰克林曾提出过要求，奥斯瓦尔德似乎也抱有同情之心，但无论是谢尔本还是他的同僚，都从未考虑过此事。不过，谢尔本曾多次同意要接受尼皮辛线。斯特雷奇得到了承认这条线的授权，而杰伊的草约中也含有这一部分，但他还得到指示，要他谋求更有利的边界，也许是谢尔本所说的“法国边界”。斯特雷奇不费吹灰之力便实现这个目标。美国人未能预见到该地区的重要性——现代加拿大的工业中心地区——而是满足于得到相当多的其他领土，因此退回到接受五大湖线，甚至在没有遇到压力的情况下就接受了这条线。这是一个致命的行动。

即使如此，英国所给予新国家的，还是慷慨大方的条款。英国军队仍占领着纽约市、南部各州的大部分和其他地区，单纯就军事层面而言，进一步抵抗是可能的。但英国过于小心谨慎，以致没有继续抗争，康韦决议已说明了这一点。一个无比强大的帝国到头来在政治上无力镇压殖民地反叛的事实，又一次在历史上重演。

斯特雷奇在签署和约之后向首相问道：“我们把您从美洲的战争中拯救出来，会受到惩罚还是得到称赞?”随之而来的，既不是惩罚也不是称赞，而是诸多的批评和满怀怨恨的接受。1783年1月签署的英西、英法和约，遭到了同样的反应，2月，谢尔



1782 年谈判

本被迫辞职。

美国人之所以赢得有利的条款，主要是因为他们违背了训令，背叛了——在精神上，如果不是在字面上的话——法美同盟，从而使得谢尔本相信，美国将不会充当英国敌人的卫星国。他们可能为其行为找到了借口：欧洲充斥着阴谋诡计，如果他们还等待观望的话，韦尔让或西班牙人也许就背叛了他们。违反那个向韦尔让征求意见的训令，只与代表们和大陆会议有关，而与

法国人和他们的关系无涉。从策略上讲，虽然美国人为着所有的实际目标而单独缔结了和约，但是，他们只签订了一个“预备性的”而非最后的和约，所以他们并没有违背同盟义务。最终的和约直到1783年9月才签订的，同一天，欧洲各大国在凡尔赛正式签署了各自之间的预备性和约。美国人挑起的战争就此宣告结束，但美国人未被邀请出席各大国参加的这个盛会，而是到英国代表的寓所签署了英美和约。[①]

代表们在签订预备和约之后向大陆会议报告说：“我们有理由认为，关于边界、难民和捕鱼权的条款并不符合这个宫廷的政策，所以我们在预备性条约签署之前并未将其通报给外交大臣（韦尔让）……我们希望以上考虑能够说明我们为何在精神上（而实际是在字面上）如此严重地背离我们所受的训令。”

他们向韦尔让通报时，他对他所认为的英国的慷慨条款大为惊讶。他对雷内瓦尔说：“英国人是在购买和平，而不是缔造和平。他们的让步超出了我所能想像的一切限度。”他对美国人说：“突然签订的条约中……能够得到国王首肯的条款不多。”他还写信给吕热纳说：“我不怪任何人。我甚至不怪富兰克林先生。他也许过分轻易地听从了他那些同僚的建议，而这些人自称并不懂得什么礼节……然而，如果我们根据我刚刚目睹的事实对未来做出判断的话，我们将会为我们已为美利坚合众国所做的一切，为帮助他们获得这个名称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另一方面，这位法国大臣并非完全不乐意地看到，美国人排除了全面谈判的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是西班牙毫无希望地要求归还直布罗陀。此外，他认为，同那些忘恩负义的人公开争吵不会得到多少好处。结

① 到此时为止，所有欧洲大陆国家中只有法国和荷兰与大西洋彼岸的那个暴发户建立了正式关系，两国在1780年参战，但直到1782年才正式承认美国。连西班牙这个准同盟国都拒不承认美国，这是杰伊在西班牙履任期间感到不甚愉快的其中一个原因。

果，他甚至同意了富兰克林的要求，进一步追加了财政援助。

我们进行这一切辩解时要看到，事实依然是，美国人尽管发誓忠于法美同盟，但他们通过谈判单方面地结束了战争，从而使得谢尔本更有自信和力量去对付其他敌人。一位负有盛名的历史学家评论道："和平谈判开始时乃是单纯无知和狡诈哄骗之间的斗争，但美国人很快就掌握了足以完成任务的世故手段。"[①] 这并非夸大之词。首先是富兰克林，然后是杰伊，还有亚当斯，都让真诚愿望服从于国家利益，虽然他们一直在抱怨说，他们是一群强盗中的孤单寂寞的诚实人。他们的言行证实了博马舍在1775年致国王信中所说的一句话："陛下，各国政府的政策并不代表各国公民的道德法律。"

遗产

革命外交——更确切地说，是美国对革命外交的认识——大大促成或强化了那些持续了几代人时间甚至直到当今时代的态度。因此，最为显著的例证，便是欧洲政治内幕强化了他们的孤立愿望。美国人总是强调外国政治家狡诈成性，对自身的言行却视而不见。虽然法国应当得到相当程度的感激之情，但绝大多数美国人出于民族自豪感而倾向于贬低盟国的贡献，而且几乎无人承认西班牙曾经消耗掉英国的许多资源。许多人错误地认为，欧洲的野心拖延了和平谈判，甚至可能使美国失去西部地区。1783年6月，詹姆斯·麦迪逊提出了一个得到大陆会议一致批准的决议，该决议说："各州的真正利益要求它们尽可能地不要卷入到欧洲国家的政治和争吵中去。"

过分地强调孤立主义的力量，或至少赋予这种态度在一个世

① 莫里斯：《和平缔造者》，第459页。

纪后才有的相同形式，并不是什么难事。麦迪逊的决议案只不过是敦促美国“尽量不要卷入”。各州的联盟过于软弱，安全岌岌可危，以致不能侈谈一个国家强大以后才能纵情享受的孤立。所以，华盛顿的1796年告别演说虽然警告不要缔结“永久同盟”，但还提出说，“我们在紧急情形下可以放心地依靠临时的同盟。”在1801年第一届就职演说中重复华盛顿之警告的杰斐逊，也适应了现实。1803年，他命令谈判代表谋求同英国结盟，如果法国拒绝解决路易斯安那问题的话，只是由于拿破仑决定出售该地区，结盟才得以避免。到了1823年，他和麦迪逊——两人均退休在弗吉尼亚老家——还赞成与英国一起采取共同行动，保护拉丁美洲免受法国干涉。但是，门罗总统决定单独行动。

随着1823年12月门罗宣言的发表，原先的梦想变成了现实。门罗主义迎来了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时期，此间，美国是如此相信自身的实力，同时又是那么怀疑外国人，以致不管有什么诱惑，它都坚定不移地避免政治联系。[①] 现实和理想共同促成了僵硬的教条，而建国之父们却从未碰到过这种情形。美国人似乎已经忘记，只是由于世界政治的偶然事件，他们才能够在1823年以后恪守严格的孤立政策；他们似乎已经忘记，骨子里坚持孤立主义的第一代美国外交家，曾深深地卷入欧洲政治。

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在1775年时还是犹豫不决或一无所知的革命者，但他们却正确地预见到，他们的成功将迎来一个政治新时代。用杰斐逊的话来说，它带来了“人类理性与自由的联合”。多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美国的胜利促使爱尔兰民族主义者采取了行动，但不列颠诸岛和大英帝国并未受到运动的全面影响。英国的敌人却没有那么幸运。1789年法国爆发革命，具有

---

① 1846年美国与新格拉纳达即后来的哥伦比亚签订的、保证巴拿马地峡“绝对中立”的条约，是个最重要的例外。

美国革命经验的领袖们，包括著名的拉法叶特侯爵和托马斯·潘恩，发挥了先驱作用，直到不那么温和的人将其撇到一边。革命歌曲《马赛曲》的前身《一切都会好起来》，其歌名就来自富兰克林在华盛顿遭到失败时所说的一句话“一切都会过去的”。华盛顿将军和其他美国人被授予一串确实是仿制的巴士底狱的钥匙。1808年，西班牙发生起义，虽然没有导致在该国建立起共和制度，但却削弱了西班牙的帝国纽带。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双双激励下，西班牙在新世界的所有殖民地为了本身的自由揭竿而起，在经过长期斗争后全部赢得了独立。

历史很少是带着既定目标并沿着单一轨道向前发展的。美国在19世纪末加入了帝国扩张的大潮，非殖民化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成为普遍现象。世界上仍存在着许多独裁政权，虽然君主独裁所剩无几。但是，那些反对殖民主义和独裁制度的人，常常借鉴美国的经验。路易·科苏特、莫汉达斯·甘地、路易·梯也尔以及苏加诺这些形形色色的领导人，都是明证。1918年10月托马斯·马萨里克宣布捷克独立时，援引了美国榜样。1945年9月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时，首先就引用了杰斐逊1776年宣言的一句话，继而一如这份美国文献那样列举了殖民主义的种种罪状。甚至连列宁这个美国所支持的资本主义共和制度的死敌，也在1918年宣布，美国“为全世界树立起一个通过革命战争反抗封建压迫的榜样”。

1853年，美国外交官根据华盛顿脱去宫廷制服而代之以普通着装的命令，身着西服出席柏林的一个招待会。当其中一位被问及他和他的同事为何“像一群殡仪员那样都穿着黑衣服”时，这位机智过人的共和党人回答说：“在欧洲宫廷，我们这样的穿着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我们代表着埋葬君主制度的力量。”其他国家感到了威胁。早在1816年，西班牙的一名外交官还为本国曾在40年前支持“那场传染性的反叛和起义之火”这个“不可

饶恕的过错”而道歉。在评论几年后的门罗主义时，奥地利首相梅特涅问道：“如果这种万恶不赦的思想洪水和有害无益的先例扩大到整个美洲，我们这些政府的道义力量……又将何存？那个将欧洲拯救出一片混乱的保守制度又将何存？”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尽管“保守制度”苟延残喘的时间远远长于梅特涅的预期。

美国人不可避免地热爱那些向杰斐逊所说的“在国王、贵族和教士统治下的苦难深重”的制度发动进攻的人。他本人在巴黎担任公使期间，曾向反对波旁王朝的密谋者提供庇护和建议，帮助起草《人权宣言》这份革命派的主要纲领性文件。此外，几乎所有美国人都欢迎开始时处于温和阶段的法国大革命（就此而言，约翰·亚当斯是个例外），尽管这一点常常由于后来民主共和党人与联邦党人之间的观点分歧而被忘怀。到了 1793 年 1 月，全国还在为法国打败敌对的君主国家而欢呼雀跃，波士顿有两家后来成为相互对立的党派代言人的报纸，为纪念革命军在瓦尔米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共同支持举办了以烤牛和朗姆酒为特色的“城市宴会”。

1848 年欧洲革命风暴使美国人激动不已。在得知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普被推翻的消息后，波尔克总统在国会发表了特别咨文，称赞那些“仿效我国先例、决心得到自由”的人。当运动发展到德意志时，一家报纸绘声绘色地说，那里的形势就像“1776 年革命扩大到大洋彼岸”那样。美国驻巴黎公使理查德·拉什未待接到命令，就承认了新的法兰西共和国，波尔克总统对此举大加褒扬。《纽约太阳报》在总结舆论——至少是北部的杰克逊派的舆论——时宣称：“在挥舞不息的旗帜和高高举起的刀光剑影下，……革命的指南就是我们这个榜样、我们这片蓝天和我们这把火炬。正如我们誓言革命那样，欧洲群众也在宣誓革命。”

1848 年，令美国观察家们大为沮丧的是，路易·科苏特未能摆脱哈布斯堡帝国而赢得匈牙利的独立。1851 年，科苏特抵

达纽约，一个乐队为欢迎他演奏了《向领袖致敬》。整整六个月，他奔走于美国各地，呼吁人们支持匈牙利的事业。他所到之处，受到那些背井离乡的匈牙利人的热烈欢迎。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在一次宴会上慷慨激昂地说道："我们会十分欣喜地看到，美国模式将出现在多瑙河下游和匈牙利的高山上。"韦伯斯特等人这样或那样的过火言论，导致奥地利公使从华盛顿愤而出走。

因为美国革命既是一场殖民起义，又是一场反对君主制度的斗争，所以后来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赞成那种反抗殖民统治的举动。例如，对拉美起义的热情几乎打消了门罗总统想要推迟承认那些新国家的谨慎政策，也正是在这种热情的压力下，他决定在1923年12月宣布那个著名的门罗主义。在例外的情况下——第一个例子也许就是1899年开始的反对英国统治的布尔革命，而新近的事例则包括反对法国的越南起义和阿尔及利亚起义——舆论不尽一致，而且至少在政府层面，压倒一切的舆论是敌对的。此外，在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之间，美国对结束前者更有兴趣，它在1898年还亲自出来反对殖民主义。不过，虽然玩世不恭者正确地指出，非殖民化打破了帝国的贸易藩篱，从而可能为美国的经济利益服务，但是，政策和态度方面的反殖民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倾向，如同反专制主义倾向那样地始终如一。显而易见，两种倾向都源于美国革命。

同情不等于援助。甚至在热情最高的1789年，认真严肃地主张超出道义限度而为法国事业提供支持的人，寥寥无几。1823年，艾伯特·加勒廷的建议更引人注目，因为它是由杰斐逊派的一个非同寻常的、颇有见识的元老提出来的，他建议把海军租借给希腊人，支持他们那场反对土耳其帝国、争取自由的斗争。门罗政府虽未拼命反对，但也未加理睬。美国很少动用军队来推进革命事业，只是到内战之后，华盛顿才调动联邦军队来反对墨西哥的君主制的、殖民的冒险行为。1898年，当美国支持古巴对

西班牙发动革命时，才实实在在地动用了军队。

美国人宁愿自己是执炬者或护火人，而不是武装的征服者。1821年，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穿着教授长袍从而避免看上去是在发表正式讲话——在国庆演说中谴责了君主制度，将美国说成是“山巅上的灯塔，全世界人民都可以见到它温暖的拯救光芒”。当科苏特宣称他来到美国“不是为了寻求一处庇护所，……而是找到一个……反对压迫神圣事业的复仇人”时，他不过是要确保接待他的菲尔莫尔总统和其他每一个政治家重申不干涉原则和那个受到拥护的孤立政策。在科苏特被迫流亡海外而美国武装力量确实微不足道——此后多年一直如此——之时，不仅美国不可能采取行之有效的行动，而且美国人相信，如果美国保持着与旧世界的分立状态，并因此享有道德优势的话，其他民族就更可能向着亚当斯的灯塔走来。在科苏特访美期间，参议员刘易斯·卡斯说，最好是等待“自由思想传播……到旧的压迫制度”。

还有一个限制性因素必须指出，但它是骄傲自大而不是深谋远虑的产物。美国人常常自认为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受到上帝的青睐，有着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美德。他们常常怀疑，那些受制于绝对主义或殖民主义历史、也许就“低人一等的”不幸的民族，能否在争取自由的暴力斗争中保持平衡。

20世纪，伍德罗·威尔逊推动建立起委任统治制度，其根本目的在于使统治者服务于被统治者，而不是取消统治，至少这部分是因为他认为非洲人和亚洲人还无力实行自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只有伊拉克这个托管地取得了独立。后来，富兰克林·D. 罗斯福对英国帝国主义的谴责之词以及他手下一些人的更加难听的说法，甚至让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这些殖民主义的反对者怒火万丈。不过，罗斯福承认说，他认为“（讨论的主要对象）印度还没有做好……完全独立的准备”。一位作家最近评

论说，罗斯福的目标“是稳定而不是削弱殖民统治。他希望和平地（而且渐进地）过渡到独立”。[①]

历史记录明白无误地表明，因为美国人认为其他民族缺乏与生俱来的美德，所以他们更加坚信其自身的反帝国主义和反专制主义倾向，而不怎么相信广大世界的共和制度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他们认为自己有权批评那些正在成长的、偏离美国式道路的民族，他们常常不那么有效地谋求推动它们坚持这个方向，或完全相反，承认那些服务于其全球目标的专制政权。

美国人有时悲痛不已，因为他们失掉了他们在梅特涅时代所拥有的激进的革命形象。像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约翰·F.肯尼迪这些根本不同的领导人，都呼吁全世界不要忘记，他们的国家——用后者的话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国家”。这个说法并不中肯。按照今天的标准，没有哪个人会说，那些逼迫约翰国王接受《大宪章》的贵族的想法或亚伯拉罕·林肯对黑人的态度是激进的。同样，18世纪70年代的运动在发生的当时确实是激进的，而且肯定是有风险的，但如果放在当今背景下进行理解，其意义似乎就不那么深远了。同几年后的法国人和1917年的俄国人所不同的是，美国人无须面对无处不在的封建传统。与国王决裂是一个举世瞩目的行动，而且几乎是史无前例的行动，但它并不要求形成新的国内政治行为方式。

此外，伴随着同英国决裂而来的社会革命，按照今天的标准，至多只能算是温和的。国教消失了，北部几个州废除了奴隶制，也许还有多达10万名亲英分子离开了美国，但社会结构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为推行美国共识所需要的几项改革，既不需要动用断头台，也无需调动军队。经济体制也未出现变化。大部分

① 威姆·罗杰·路易斯：《陷入困境的帝国主义》（纽约，1978年），第9页。

美国白人认为无此必要，这与后来那些认为政治解放不过是达成更广泛的公正与平等的第一步的革命派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后来，像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这些大异其趣的领导人都担心财富的两极分化可能会危及共和制度，但他们相信，两极分化能够在现行体制内得到控制。

美国革命独有的特点，有助于解释当今许多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遭到压迫的新民族，为什么认为美国经验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指南。这些特点，有助于解释真心诚意地相信其自己至少赞成进步的共和主义革命的美国人，为什么满腹狐疑地看待那些导致内部动乱和社会崩溃的革命。因此，美国人常常问，那些通过革命上台的新政权会选择共和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吗？只有在这种情形下——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形——美国人才对他们真正地感到心满意足。

然而，这些都是后话。当《巴黎和约》签订的消息在1783年2月传到美国时——最先刊登在英国占领下的纽约的一家亲英派报纸上，美国人还未能预见到这项遗产。如果他们预见到的话，他们就不会对此感到困惑。他们有理由为取得那场开始于1775年和1776年的无畏战争的胜利而感到自豪。他们一清二楚，他们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第三章 宪法

那些挣脱了殖民主义桎梏的民族，往往会陶醉于自身的胜利，但他们几乎很快就会发现，独立仅仅是国家建设进程的一个开端。18 世纪 80 年代，美国人懂得了这个教训，尽管还有相对繁荣、自治实践这些好处。历史学家们仍在争论这样一个问题：这十年难道不是经济持续增长、政治走向成熟的时期吗？但是，当时的人却无可置疑地认为，他们处于一个“关键”时期，不仅国家处于转折关头，共和政府的命运也十分攸关。事实上，约翰·昆西·亚当斯在 1787 年的一次开学典礼演讲中使用了“关键”这个词。几年后，他的父亲写道：“我担心后人将遗憾地看待最近几年的历史。”老亚当斯写下这段话时，新宪法已经出台，他担任着副总统。作为政府工具的宪法，既是促成美国革命的政治哲学的产物，又是 18 世纪 80 年代的那些挫折的结果。

《邦联条例》

大陆会议的合法性仅仅在于各州同意派遣代表参加，它对各州没有任何强制权力。出于改善现状的目的，大陆会议制定了《邦联条例》，各州在 1781 年予以批准，但这一补救措施未能创建一个行之有效的全国性政府。得到批准的文件未能使“合众国”成为现实，因此仍然强调各州的原有主权。几乎所有的决定

都要获得13个州中的至少9个州的同意，哪怕是在大陆会议名义上拥有权力的那些领域也须如此。三番五次提出的旨在改善制度的修正案，可能——而且确实——因为某个州的否决而告失败。像杰斐逊这样对政府权力抱有怀疑态度的人也许会认为，《邦联条例》与欧洲国家的宪法相较有如“天壤之别。……当前我国政府尽管有着种种不足之处，但现存的或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最好的政府，都无法与其媲美”。那些希望看到一个真正国家的人们，却对此持有异议。

由于缺少一个行政机构，《邦联条例》为各州服务的倾向更加突出了。国会负责“事实上没有首相的议会制政府”的所有管理工作，它有时是通过各委员会来运转的。[①] 委员会制度运转不畅，因为委员会太多而没有哪个议员能够充分关注某个委员会，因为议员们竞相扩大影响，因为议员的频繁更换妨碍了连续性。秘密通信委员会及其后继机构外交委员会，从来没有完全控制过外交，没有工作人员处理通信和档案，委员会只是隔三岔五地碰头。一个委员不无厌恶地写道：“确实没有外交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存在过，没有哪个秘书或工作人员比我更想成为真正的秘书或工作人员。”

1781年，国会建立了外交部，由1位部长和4名工作人员组成，但外交部受国会严格控制。开始，部长可以参加国会会议，但他不能提出任何问题或建议采取任何行动。即使在这一切有所改变以后，他也不过是个地位不高的工作人员，收收信件，或根据国会指示起草答复件。不难理解，第一任部长罗伯特·利文斯顿在职一年就辞职不干了。在国会任命约翰·杰伊以前，这个职位空缺了一年多。杰伊确曾指导过法美领事协议谈判，因为富兰克林的粗心大意使其成为必需之举，但这难以称得上是个惊

① 小阿瑟·施莱辛格：《帝王式总统》（波士顿，1973年），第2页。

天动地的成就。如果必须提及的话，那是因为它碰巧是新宪法生效后获得批准的第一个协议。杰伊在任期间，同三个欧洲国家和摩洛哥签订了商业条约，这三个欧洲国家对美国商品而言都是小市场，而摩洛哥则是麻烦问题，因为该国同北非其他伊斯兰教国家一样企图掠夺失去了英国保护的美国贸易。杰伊试图同西班牙在商业、西部地区和密西西比河航行权问题上进行谈判，则使他与那个在他整个任期内都对他满腹狐疑的国会发生了激烈争吵。

外交体制上的缺陷，集中反映了《邦联条例》的弱点。国家得不到外国的尊重，也难以得到尊重。继富兰克林出使巴黎的杰斐逊，在 1784 年写道，美国人是“外交官群体中最没有地位、最不引人注目的人”。由于各州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因此费城中央政府不能征税，不能开展有效谈判，不能向其他国家保证它所签订的协议将会得到各州的切实履行，不能制定旨在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特惠的统一的商业政策，不能维持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陆军或海军。

这一弱点的后果随处可见。佛蒙特的领导人甚至在考虑，加入加拿大与留在美国哪一种选择更好。在西班牙与美国存在争议的地区，路易斯安那的西班牙当局正与印第安人部落和美国定居者进行密谋。加拿大官员竭尽所能地对五大湖以南的部落施加影响，虽然他们并未像美国人所想像的那样煽动印第安人向美国开战。英国驻军仍留在从香普兰湖到苏必利尔湖间的一系列据点上，伦敦的理由是，美国国会未能敦促各州执行《巴黎和约》中关于亲英派财产和偿还战前债务的承诺。据说，弗吉尼亚人质疑道：“如果我们现在准备偿还英国商人的债务，那么我们进行这场战争又有何种意义?”

最重要的问题乃是贸易。1789 年，詹姆斯·麦迪逊在回顾历史时这样写道：“我国的贸易……与革命可能产生的好处完全背道而驰，没有打开同欧洲其他国家的新渠道，而英国这个最自

然和最珍贵的渠道也因为拒不向美国开放而有所缩小。”各位驻外代表，包括最负盛名的驻法公使杰斐逊，谋求通过谈判来降低贸易壁垒，但他们几乎无法讨价还价，因为国会不能威胁切断贸易或威胁征税，所以他们几乎一无所获。

最大的烦恼，莫过于失去了与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贸易。殖民地时期，美国人与加勒比海地区和欧洲进行三角贸易，在商品和船运两个方面获得颇丰。1782 年 10 月提交给英国的由杰伊起草的和约草案，主张实施商业互惠原则，双方彼此对船运和货物开放所有港口，但在最后几个星期的谈判中，该条款却与其他几项一样销声匿迹了。档案表明，美国人在这个方面几乎没有尽力，这个失误，如同他们没有坚持尼皮辛线一样令人吃惊。美国要再过半个世纪才能恢复曾经是殖民地繁荣之主要支柱的贸易。[1]

美国的无能为力，意味着伦敦能够自由行事。谢菲尔德勋爵是一个在主张对前殖民地推行严厉贸易政策方面颇有影响的人，他提出的部分理由是，“美国无力实施报复。美国各州作为一个国家采取行动，并非易事。我们无需如此害怕它们。”1783 年，英国枢密院颁布的一项敕令规定，跨大西洋的直接贸易并非是封闭性的，正如英国所期望，直接贸易很快就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另一项枢密院敕令则严禁美国船只进出英属西印度群岛，从而使得美国船主、出口商和农民失去了传统的贸易。第一任美国驻英国公使约翰·亚当斯为改善关系做了各种努力，但统统付之东流。虽然美国人懂得，所有这些都是英国恶意的表现，但它还确实反映出，英国不过是抓住了美国的弱点。

---

① 英国在 1793--1815 年同法国作战期间，经常切断各岛屿同美国之间的贸易，并在 1815 年完全断绝了对美贸易。

制宪运动

在美国独立得到令人欣慰的承认的短短几年内，这些问题逐渐地浮出水面。国内问题也是如此，各州的问题虽不尽相同，但通常是围绕着自由与秩序、财产与个人、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这些广泛的议题。至少自1913年查尔斯·A. 比尔德发表《对美国宪法的经济阐释》一书以来，学者们一直强调并争论着国内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引发了新宪法制宪会议上的大部分讨论，并提供了各州就批准问题进行争论的主战场。

然而，美国的国际羸弱地位之成为人们担忧的首要问题，不无适当理由。“直接推动1787年制宪会议召开的，”沃尔特·拉夫伯写道，“除国会根据《邦联条例》不能有效而又安全地推行对外政策这个广为传播的信念外，别无他物。”[①] 1786年安纳波利斯会议是为了处理美国贸易的糟糕局面而专门召开的，会议本身虽然一事无成，但却促成了来年那场会议的成功召开。如果说费城会议相对而言没有怎么讨论外交和军事问题的话，那是因为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必须改革对外政策机制。他们还认为，在同其他国家发生争端时，美国外交必须进一步地得到武力支持。所有分歧几乎都集中在细节方面，而对那些影响深远的变化，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有过太多的争论。

从根本上说，不管他们多么努力地维护州权，费城的代表们都相信，中央政府必须强大到足以获得外国的尊重。对于那些反对中央集权政府的人，远在巴黎的杰斐逊入木三分地总结其观点说：“我希望美国各州在所有外交问题上团结一致，而在内部事

① 沃尔特·拉夫伯，《宪法与美国对外政策》，载《美国历史杂志》，第74卷（1978年第8期），第697页。

务上又各自为政。”尽管代表们对常备军深为担忧，将其视为潜在的专制工具，但广泛的共识是，全国性政府必须拥有战争权，从而既能威慑潜在的敌人，又能真实有效地对阵打仗。[①]

代表们同样认识到，十三个州无法单个地采取行动从外国那里获得商业特惠。因此，尽管代表们担心全国性的立法机构可能会牺牲某些州的利益，但还是赋予国会制定政策的大权，以迫使英国和其他国家放宽对美国贸易的限制。[②] 最后，代表们一致认为，如果美国要进行有效谈判的话，那么全国性政府不仅必须拥有缔约权，而且还必须有权强制各州遵守条约。

这并不是说，制宪者们要求或期望美国深深地投入到传统外交中去。即使是麦迪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样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也认为美国的驻外使节不应超过五至六个人。其他人认为应该更少。有人甚至提出，根本就不需要什么驻外使节；外国有事要谈判时，应当派代表到美国来。[③] 这种态度表明，“代表们认为，外交谈判本身应当少而又少，对外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商业关系，条约应当是为数不多的。”[④] 代表们认为，主要是通过立法机构建立一个拥有自卫和商业谈判大权的政府，将足以改变当前局面。

---

① 在费城会议召开时，美国武装部队还不到1000人；10年后，增加到大约7000人，它在部署上则主要针对西部印第安人。

② 制宪会议就此达成一致后，只得将州际贸易的控制权赋予联邦政府。否则，各州就可能限制那些从其他各州来的外国进口商品，从而破坏国家政策。如同其他授权一样，1787年还看不清这项授权的巨大意义，但“贸易条款”成为削弱州权、扩大联邦权力的主要手段。

③ 1784年，美国在国外只有两名公使以及一个同22个欧洲国家就商业条约进行谈判的委员会。

④ 弗雷德里克·W. 马克三世：《经受考验的独立》（巴顿鲁依，1973年），第155页。

宪法与外交

1787年5月，费城会议开幕，由于许多代表行动迟缓，会议比计划推迟了两个星期。罗德岛最不愿意扩大国家的权力，特别是商业方面的权力，所以拒绝派代表出席。其他各州先后派出55名代表。通常情况下，出席代表不超过30人，而讨论则控制在人数更少的一群人手中，他们自始至终一直呆在费城。特别是，这个核心团体包括了许多美国最卓越的政治思想家。对许多人来说，富兰克林和华盛顿的出席给会议披上了一件神圣的外衣，虽然富兰克林因为年老多病而不能做出多大贡献，华盛顿也只是主持而不是参与了讨论。杰斐逊称其为“半人半神的大聚会”。

但是，参加会议的不乏无名之辈和顽冥之人，缺席大会的也有重要人物。帕特里克·亨利和理查德·亨利·李委婉地拒绝出席，意味着国家主义者支配着弗吉尼亚代表团，其中最负盛名的是麦迪逊。约翰·杰伊因为担任外交部长而公务缠身，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则在国外任职。

代表们都非常年轻（平均年龄约42岁），但其中3/4在国会工作过，对《邦联条例》的缺陷有着亲身体验。事实上，所有代表都决心加强国家在外交领域的权力，如果他们别无作为的话。

那些旨在达成上述目标的条款，在宪法中随处可见。许多条款是由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委员会工作的具体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如果与国会组成和总统选举上出现的反复争论相比的话，这些条款在全体会议上均未引起广泛争论。最近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说：“制宪者试图让国会掌握发动战争和指挥战争的权力，参议院控制对外政策，而总统在代表国家处理对外关系方面只履行

象征性的职能，无论是个人地还是通过外交官。”[①] 这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虽过于简单但却未失之偏颇。

事实上，虽然许多宪法条款看起来清晰明确，“但在外交方面，宪法通常是隐晦不清、模棱两可、首尾不一的。”[②] 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会议代表无法预测未来，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不愿意把权力交给总统，但他们知道国会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处理外交和战争。这些条款是如此重要，在将来常常引起诸多争议，因此必须努力去弄清建国之父的意图。

第六条规定，“本宪法以及合众国的法律和一切条约，……都是全国的最高法律，……即使各州宪法和法律中有与之抵触的内容。”这项规定构成了宪法的核心内容，全国性主权政府得以建立，其深远意义远远超出外交领域。直到现代，它对这些领域的含义仍在争论之中。但是，这项对外交政策实践至关重要的条款，后来在外交方面遇到的挑战很少。

每一位代表都认识到，如果条约要成为国家谈判对象的话，各州就不能采取行动加以否决；如果商业立法要想达到预期效果的话，各州就无权自行征税；如果国家要发挥作用的话，各州就更不能参与外交，或为了实现自身的狭隘利益而发动战争（如对印第安人部落的战争）。[③] 这些原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在《邦联条例》时期，一个州或更多州就曾推翻过上述每一项原则。事实上，这种违反行为成为改革运动如此强大的主要原因。在会议代表中，很少有人质疑过在对外关系方面赋予联邦政府绝对权力的必要性。

---

① 伦纳德·利维：《最初意图和制宪者的宪法》（纽约，1988年），第30—31页。

② 小施莱辛格：《帝王式总统》，第2页。

③ 关于禁止此类行动的事项写进了第一条第十款，它们事实上进一步促成了“联邦法高于州法条款”。

因此，当最高法院在一个涉及条约权的案子中为推翻一项州法而首次运用“联邦法高于州法条款”时，这样做是合适的。革命期间，弗吉尼亚州冒称替本州公民偿还了所欠英国人的债务。尽管《巴黎和约》规定，“债权人……在恢复此前根据契约规定的所有善意债务方面不应遇到任何法律障碍”，但弗吉尼亚法院在战后却无视这项承诺。1796 年，最高法院受理《韦尔诉希尔顿》债权人诉讼案后，勒令债务人偿还欠款，即使他们已经向州政府支付了欠款![1] 这个判决激起了许多抗议，但却一清二楚地反映了制宪会议的意图。

一份早先提交给会议的草案赋予了国会“发动”战争的权力，而该提案得到了一致认可。但是，敌人不可能友善到在国会开会时才发动进攻。美国必须等到议员们从家里返回之后再“发动”战争吗？为解决这个问题，“麦迪逊先生和埃尔布里奇·格里先生决定加入‘宣战’一词，删去‘发动’战争，把对付突然袭击的权力交给行政部门。”这个提议得到通过，因此，宪法第一条第八款的最终用语是“宣战”，而不是“发动”战争。[2]

尽管人们仍对麦迪逊和格里提出的改动的含义进行着争论，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话：他们以及他们的同僚都不希望，既拒绝赋予总统抵抗突然袭击的权力，又不让他拥有采取军事行动的手段。参加会议的主要人物、宾夕法尼亚的詹姆斯·威尔逊打消同僚的顾虑说，“权力不会集中在单单一个人或单单一个机构

---

① 法官们倒是一致认为，弗吉尼亚负有道义责任去弄清债务人是否偿还过两次债务。

② 同一条赋予国会维持陆军和海军之权，但对常规军的戒备之心又导致制宪会议就陆军增设了“此项用途的拨款不得超过两年”的规定。

手中，以免我们卷入到战争的灾难中去”。[①]

在18世纪90年代后期同法国进行的美国第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期间，国会通过立法，就采取何种行动作出授权。此时，连一贯支持扩大总统权力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都认为，总统在打退进攻的同时，却无法根据自己的权力命令进行报复。1801年，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提出一种看法认为，在不宣而战的战争中，行动必须合乎法律。他宣称：“一切战争权力都属于国会。”未来那些为保卫朝鲜和入侵格林纳达、事先未经国会批准而“发动”战争的总统，将不得不在其他宪法条款里寻找他们所能找到的战争理由。

总统们通常引用宪法第二条第二款[②]，这里列举了总统所拥有的几项各不相同的权力，其中一项规定，他“是合众国陆军和海军总司令”。这个条款是委员会起草的诸多条款中的一条，细则委员会和全体会议几乎没有就此进行讨论。但是，这个条款的内涵显然小于最高行政首脑们后来所声称的那样。正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写道，会议代表们意识到，“在政府所关心和考虑的所有事情中，指挥战争所特别明确要求的，就是不让单单一个人行使大权。”但是，他们似乎又期望总统仅仅担任总司令，执行国会所决定的政策。在就批准宪法展开辩论期间，反对者表达了对总统所得权力过大的担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的另一篇文章中回敬道：“他的权力与英国国王在名义上是相同的，但实际上要小得多。他的权力并未超过邦联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对于军队的最高统辖权与指挥权；英王

① 虽然我们仍无完整的现成证据，但制宪会议显然想使国会掌握那种不可分割的不宣而战或有限战争的决定权。根据宪法第一条第八款，国会还有权颁发“捕获和拘押敌国船只特许权”，换句话说，即有权采取除全面战争以外的军事行动。

② 原文为第一条第二款，应为第二条第二款。——译者

的权力扩大到宣战和征召……海军和陆军，而在美国，这一切权力按照拟议中的宪法之规定均属于立法机关。"

几乎从共和国成立伊始，总统或其下属就在美国境外用兵，这通常是为了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除 1818 年安德鲁·杰克逊入侵西属佛罗里达这种为数不多的例外，军事行动的规模不大，时间不长，很少损害另一国的主权。当然，从宪法角度出发，这些行动都不能视为“战争”，大多数行动的理由甚至不是根据总司令条款而提出来的。两位学者这样写道，1950 年以前，“没有哪个法官、总统、议员或评论家提到过总统拥有发动战争的法定权力。”[①]

可以预料的是，出于对商业的关心，会议代表几乎是理所当然地认为，全国性政府必须在该领域拥有大权。正如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所指出，“联邦的重要性，从商业方面来看，是很少持有异议的论点之一，同时，这个论点实际上得到了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的人的最普遍的同意。”为挫败欧洲国家扼杀美国的企图，必须采取某种措施，“迫使各国为取得我国市场的特权而相互竞争”。这一论点得到了如此广泛的认同，以致由国家主义派和有限政府派分别提出的弗吉尼亚方案和新泽西方案两份宪法草案都同意将商业权力交给国会。

但是，南方代表担心，如果不对国会加以限制，他们的利益可能会遭到中部各州和新英格兰的侵犯。细则委员会开会时，他们想方设法通过了三项保证措施：不得禁止奴隶输入；不得对出口商品征税；所有“海上贸易条例”均得以国会 2/3 多数通过。

禁止征收出口税消除了南方对其大米和烟草出口会面临纳税负担的忧虑，但却使国家失去了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所广泛运用

① 弗朗西斯·D. 沃姆思和埃德温·弗尔梅奇：《控制战争狂》（达拉斯，1986 年），第 28 页。

的经济外交武器。事实上，这种税收可使一国提高本国商品的出口价格，或者，某些特定的税收可以用作为商业谈判的讨价还价手段。

南方人认为，需要用 2/3 多数原则来对付其他地区。否则，那些拥有巨大海上利益的州就会保护并刺激航运，对外商的入境征收重税抑或甚至禁止其进入，从而迫使南方承担剧增的运费。正如这个问题将会证明的那样，商业立法上的简单多数原则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果这项条款生效的话，美国就很难，有时甚至就不可能去推行商业外交。

绝大部分北方人以及像麦迪逊这样的少数南方国家主义者，反对细则委员会的上述提议。他们未能在全体会议中推翻禁止征收出口税条款，但在大会的一项主要妥协方案中，他们还是得到了他们所希望的大部分东西。根据古韦纳尔·莫里斯的建议，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正如这位宾夕法尼亚代表所说，其目的在于使“北方州和南方州达成妥协”。该委员会达成的一致意见是，至少在 1808 年以前不能制定任何禁止奴隶贸易的立法，但“海上贸易条例”可以通过简单多数原则通过，这一条对国家主义者和北方人来说重要得多。这项妥协不顾南方一些代表的抗议——麦迪逊未能改变本州代表团的意见——而获得通过。

这项决定具有深远影响。如果 2/3 原则获得通过，那么很可能就没有什么法律去保护美国的航运，确定保护关税，或授权与外国缔结互惠贸易协议。还因为如此，获得使新政府得以成功的经费会是件难事。1814 年以前，关税占联邦收入的 9/10，而且，在 20 世纪以前，除了为数不多的几年，关税一直是最大的单项收入。

我们到此为止所讨论的问题，尽管就对外关系而言异常重要，但并未包括传统上所说的外交权——谈判、承认外国政府、任命外交官以及最重要的缔约权。关于前两项，宪法未作任何规

定，参议院和总统之间适当的权力分配，要等到宪法实施的最初几年才能作出安排。另一方面，会议相当顺利地一致认为，外交任命与其他重要联邦官员的任命一样，应当通过总统并经参议院批准。

对缔约权的争论并不多，大部分争论是在会议临近结束时才出现的。只要这个问题一出现，代表们就会表现出他们那种被扭曲了的想法，认为未来的冲突会发生在大州和小州之间。此外，他们根本没有预见到政党的兴起，而且终将要后悔不迭。他们还清楚地表明，他们既不谋求也不期望缔结很多条约。最后，他们没有赋予总统以欧洲君主一般的权力从而让他在缔约方面发挥作用的最后决定，丝毫不意味着他们希望他控制整个缔约过程。

会议初期，代表们提出，参议院单独享有缔约权。[①]细则委员会的报告也含有同样的条款。然而，因为这份代表着会议另一项主要妥协的报告还建议所有各州不论大小都在参议院占有两个席位，所以关于条约的提议遭到反对。我们所能知道的是，这最终导致会议采纳了我们今天的这种制度，它并不是为了扩大总统权限，更不是要提高谈判效率。

如果各州在参议院席位相同，那么小州就会拥有不相称的地位。怎样才能纠正这一点呢？古韦纳尔·莫里斯建议给予众议院同等的权力。这个提议遭到反对，主要是因为代表们认为，众议院过于庞大，过于轻率，以致不能有效地履行职责。麦迪逊则建议说，适当的补救措施是，在总统选举过程中严格按照各州人口比重给予其相应地位。“参议院仅仅代表各州，”他说，“而且……因为这一点以及其他显而易见的原因（他是指委员会难以

① 有人也许会说，《邦联条例》时期的委员会外交的经历会导致制宪代表走到另一个极端，但情况并非如此。另一方面，公正地说，我们不应忘记，代表们期望参议院是一个长期的、中等规模的委员会，而不是一个庞大的机构。

进行详细的谈判），总统在缔约过程中发挥作用是适当的。”他还成功地将这项参议院控制权建议提交给另一个委员会，他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这个委员会有过多个不同的名称，而所有名称都表明它处理的是一些琐屑杂事。委员会确定的原则成为宪法第二条第二款的一部分，它规定，总统“经咨询参议院并取得其同意有权缔结条约”。会议一致通过了这项条款。

必须再次强调的是，这项有关总统的决定并非源于那种扩大总统权限的考虑。一位历史学家最近写道：“会议似乎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参议院的缺陷和众议院的弱点，而没有怎么弄清一个强力总统的固有优点。”[①]

毫无疑问，制宪者们并不希望参议院仅仅是批准总统所谈判缔结的条约。麦迪逊建议，参议院应当有权缔结和平条约，无须得到总统同意。杰伊在《联邦党人文集》一书中则坚持说，参议院应有权“缔结和批准”条约。探讨过这个问题的许多学者的其中一员阿瑟·贝斯特总结道：“缔约条款……旨在使总统成为缔约过程的一个共同参与者，而不是让他控制这个过程……整个缔约过程自始至终都将是一项共同合作行动。”[②] 在这里，历史也偏离了制宪人的意图。

宪法规定，参议院不仅要批准条约，而且必须以 2/3 多数票批准。尽管有人提出了变通建议，其中大多是只需一般多数，但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代表们还是认为 2/3 多数原则相当合适。在西部有着利益的各州代表意识到，在《邦联条例》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随时准备放弃密西西比河使用权的多数，他们还害怕

---

① 杰克·N. 拉科夫：《解开宪法之谜——对缔约条款的案例研究》，载《美国历史透视》，不定期刊物第 1 卷（1984 年），第 249 页。

② 阿瑟·贝斯特：《参议院和总统在缔结与废除条约中的作用——对制宪者本来意图的历史评价》，载《华盛顿法学评论》，第 55 卷（1979 年），第 118、135 页。

这个多数可能会投票批准与印第安人达成的、对其（贪婪）利益不利的协议。北方人则担心保不住捕鱼权。也许最重要的是，没有哪个代表团愿意缔约成为轻而易举之事，除非是缔结和平条约。“在参议院1/3议员外只要再有一人就能扼杀条约的前景，并不是引起制宪人忧心忡忡的那个原因。”[①] 他们所期望和要求的，是商业外交，而不是条约。

2/3多数原则所产生的后果，大多是间接的。只有少数一些需要多数通过的条约因为缺乏必需的2/3多数而遭否决。惟一具有真正重要意义的例子是《凡尔赛和约》，即使它得到了必要的支持，威尔逊总统也会因为参议院所坚持的附加条件而把它否决掉。同样，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在参议院1/3以外再多一个人就能扼杀条约一事。虽然联邦党人在18世纪90年代短暂地控制了2/3多数，但其对手共和党人控制的时间更长，直到1820年才告终，从这时起，几乎没有哪个政党能在参议院拥有如此强大的势力（有三次例外）。也就是说，成功的条约是国家所真正必不可少的，而不只是党派一致的产物。

2/3多数原则经常反映在谈判之中，因为那些缔约人必须认识到——威尔逊确实没有做到——失去必要的支持之危险。因此，在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中，美国的承诺并不像谈判代表原先期望的那样明确；同样，在1977年《巴拿马运河条约》中，卡特政府不得不加进一些多余的条款。此外，为了获得参议院2/3多数的支持，条约的支持者往往发现必须修改条约，或在批准决议上附加保留意见。1795年，联邦党人为了挽救美英《杰伊条约》而创造了这个策略。它在此后得到广泛运用，有时并未损害条约，有时则会导致总统或相关外国政府放弃条约。

---

① W. 斯塔尔·霍尔特：《参议院否决的条约》（巴尔的摩，1933年），第10页。

制宪会议的成就

9月中旬，制宪工作大功告成。等待着开会的宾夕法尼亚议会终于可以再次使用自己的会议厅了。制宪会议持续了近4个月的时间，激愤之情终于平息。富兰克林在一份由威尔逊代读的演讲中呼吁众人团结一致：

> 当我们召集众人以发挥其集体智慧的优势时，我们不可避免地碰到所有这些人的偏见、感情……及其地方利益。……我们希望这样的会议能够产生十全十美的结果吗？所以，先生们，我非常惊讶地发现，目前的这个制度是如此地近乎十全十美。……我情不自禁地想要表达这样的愿望，每一位对这个制度仍持有反对意见的代表，包括我本人在内，会在这种情形下有些怀疑自己是否一贯正确，并为表明我们的团结一致而在文件上签名。

包括一位未来的国务卿在内的3名代表拒绝富兰克林的呼吁，但是，妥协是如此完善，以致所有12个州的代表团都批准了最后文件，只是罗德岛仍然缺席。代表团举行了一个庆祝晚宴，然后各自返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在争取宪法得到批准的斗争中发挥主要作用。

代表们完成了伟大而持久的事业。他们的最大成就，在于他们成功地将一个软弱无力、宗派林立的各州联盟转变成一个统一国家。这个成就本身改变了美国的世界地位。为了敦促本国同胞批准宪法，汉密尔顿写道："我们美国人应不屑于成为欧洲问题的工具。让13个州团结在一个密不可分的联邦之下，为共同建立一个超乎一切跨大西洋势力或影响之控制的美洲体系并确定新旧世界相互联系的条件而努力吧！"所有代表的希望也都是如此。

如同宪法的其他条款一样，对外交前途至关重要的那些具体条款，经常是在讨价还价过程中制定出来的。需要考虑的事宜常常不见于几个礼拜才拟定一次的会议日程，有时突然冒出来，然后几乎是未经辩论就予以解决。特别是总统介入缔约进程一事，是在会议临近结束时才出现的，它之所以轻而易举地获得通过，只能用集体意志的行为来加以解释——代表们希望结束会议。除联邦法高于州法条款和明确规定“海上贸易条例”必须像任何其他法律那样经过法定程序的商业条款外，关于国际事务的条款常常表现得模棱两可，这也许是为了掩盖分歧，但另一个可以理解的原因是，代表们看不清未来形势的发展方向。

不管大会的意图何在，宪法并未解决总统与国会之间的职责之分。杰出的宪法史学家爱德华·S. 科温在一段常被引用的话中指出了这一点：

> 宪法将美国对外关系的决定权交给了谁？……许多人倾向于回答说，交给了“总统”。但是，如果有人提出质疑，他们又很难证实这一点，很难指出宪法本身对此有什么明确规定。宪法所规定的——而且它的所有规定——就是赋予总统某些能够影响我国对外关系的权力，赋予参议院某些同样笼统的权力，同时还赋予国会其他的相同权力；但是，哪个部门在决定美国国家方针上拥有举足轻重的最后发言权，则取决于具体的事态。

科温得出结论说，宪法“是引起美国对外政策决定权之争的一个导火索”。[①] 在这场斗争中，总统有着重要的优势，特别是掌握着较多的信息，并拥有迅速采取行动的能力。乔治·华盛顿以来的总统们利用上述优势扩大了行政权，其程度之大，远远超

① 爱德华·S. 科温：《总统的职位和权力》（纽约，1957 年，第 4 版），第 170—171 页。

出了费城会议的原意，超出了那些就批准宪法进行过争论的人的理解力。

宪法的批准

代表们规定，宪法必须得到九个州的批准才能生效。事实上，只要有一个大州拒绝批准，如纽约或弗吉尼亚，那么费城会议的成果就将成为一纸空文。在这两州和其他州，批准宪法的斗争可谓艰苦卓绝。

在这场斗争中，联邦党人强调那个他们所理解的激动人心、几乎不容质疑的论点：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宪法会增强国家的生存和繁荣能力。在《联邦党人文集》的头 36 篇文章中，有 25 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指出了这一点。如果说各州都没有一个同样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要批准宪法的话，那么这个论点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几乎每一个反联邦分子都表示，要在对外关系方面加强全国性政府的作用，但其中许多人抱怨说，旨在实现这个必要目标的条款实际上会危及自由。他们反对联邦法高于州法条款，特别是该条款适用于条约。"如果还有什么东西留给我们的话，"帕特里克·亨利抱怨说，"那（不过）是因为总统和参议员愿意留给我们。"他们反对条约权的分配方式，他们争辩说，这意味着总统—参议院小集团可以出卖各州的利益。一些人建议，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众议院应该参与其中，而其他人则提出，条约必须得到参议院更大多数的批准。但总的说来，反联邦分子很明智，他们没有向联邦党人的那些拥有强大民众基础的观点提出挑战。

然而，他们的批评激起了《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们在后来的系列文章中对其政敌进行反驳。麦迪逊强调指出："这类权力构成联邦政府的一个明显的和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我们在各方

面要成为一个国家的话，那么显然应该与其他国家发生关系。”缺席会议的杰伊和参与会议的汉密尔顿，各写一篇文章阐述条约权。后者断言：“我毫不迟疑地表明我的坚定立场，这是整个方案中最容易理解、最无懈可击的一部分。”对条约的共同责任意味着，一个可能会被收买的总统不能独自采取行动，但另一方面，《邦联条例》时期的历史业已表明，委员会无法轻而易举地处理复杂的谈判。杰伊提出了排除众议院的理由，他说，众议院过于庞大，以致不能秘密而又迅速地采取行动；而参议院作为一个由经验更加丰富、任期较长的人参加的一个规模不大的机构，却能够拥有上述品质。[①]

联邦党人有效地利用了他们那个最有优势的论点，因此能够赢得每一场宪法批准会议，尽管有时是微弱多数，如在重要的马萨诸塞、纽约和弗吉尼亚等州。1788 年的 6 月，新罕布什尔成为批准宪法的第九个州，另外两个州随即批准，但是北卡罗来纳和罗德岛一直撑到 1789 年。1788 年秋天选出了总统候选人，1789 年 4 月，未出任何人的意料，他们一致选举乔治·华盛顿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因为新国会已在纽约开会，政府得以开始运转。

新政府

新政府由宪法的支持者所掌控，完全在情理之中。乔治·华盛顿不仅是联邦运动的参与人，而且成为联邦运动的象征。他的第一任政府内阁组成于 1790 年，有托马斯·杰斐逊和疑虑重重

---

① 当然，参议院最后在两个方面都未发挥显著作用。一些条约几乎未加讨论即予通过，但其他条约则引起争论。虽然 1888 年前所有条约都要经过日常会议审查，但在发生 1919 年和 1920 年《凡尔赛和约》大辩论以前，参议院只开过两次会，从一开始起，“泄密”就是司空见惯的。

的埃德蒙·伦道夫两名弗吉尼亚人，还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同大多数宪法制定人相比，他是一位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国家主义者。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长，对新政府的有效运转负主要责任。在第一届国会的26名参议员和55名众议员中，有2/3曾参加过费城会议或各州的宪法批准会议，只有7人反对过宪法。费城会议最重要的人物麦迪逊，成为众议院的实际议长。国会和总统准备采取共同行动，按照切实可行的条件，将那些推动制宪运动的共同想法付诸实施，然而，他们很快就碰到了政府新宪章中的模糊不清和遗漏缺失之处。

颇为巧合的是，虽然奠定税收基础更为重要，但第一项重要的立法却是一项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关税法。正如麦迪逊原先所提议的那样，关税法案歧视那些同美国没有签订商业协议的国家的船只和货物，显然，在费城会议上和联邦党人的文章中经常遭到谴责的英国，是其矛头所在。麦迪逊说，“她的利益将受到近乎致命的伤害，我国利益则会安然无恙。”参议院不愿意发动一场可能会危及新政府所依赖的税收的商业战争，所以否决了麦迪逊的提案。这次争执预示了未来的相似分歧。

然而，麦迪逊及其政敌都想通过商业立法实现国家目标。最后通过的法案，是通过对具有竞争力的进口商品征收高额税费来保护某些本国产品。法案还要求外国船只交纳吨位税，向船只收取的港口费用，不管其运载何种货物，是美国船只的八倍之多。归根结蒂，在感情和原则上赞成自由贸易的美国人，却认为不得不按照传统的重商主义手段与其他国家展开贸易战。

华盛顿挑选在7月4日签署了1789年关税法。这项法律所产生的后果，并不如许多设计者期望的那样巨大，尽管它毫无疑问地有助于促进商业船队在不久之后的发展。要过上5年，英国才同美国达成了一项商业协议《杰伊条约》；还要过上更多年头，美国人才能获准进出英属西印度群岛各港口。然而，1789年法

律开始了一个实现制宪人夙愿的进程，即一个统一的国家能够实现13个各自独立的州所不能完成的事业。

外交体制

在关税法案成为法律的同时，建立外交部的议案也在讨论之中，而这同样是由麦迪逊提出的。辩论根本说不上激烈。毫无疑问，这是因为议员们像制宪会议代表那样，预计现代意义上的对外关系将不过是政府的一小部分活动。建立财政部的法律规定财政部长在重大事务上直接对国会负责，对比之下，麦迪逊提案宣称，外交部长应当“根据美国总统此时或彼时的命令和指导”[1]开展工作。不过，这项法律还是再三重申，外交归行政机构管辖。这样强调，大概只是要表明以下一种信念，即只有行政部门才能有效地处理具体的外交事务。当然，并无任何迹象表明，麦迪逊或其他哪个国会议员希望总统不经他们同意而制定重要的政策措施。

几个月之后的9月，国会认定，外交部长并没有多少事情可做。新法律变更了部门名称，并让国务卿履行一系列不属于外交范畴的职能：处理联邦政府与各州之间的文件往来、掌管国玺、颁布公共法律、进行人口普调等等。不久，国务卿还负责铸币事宜。

托马斯·杰斐逊宁愿继续担任驻法公使，他不喜欢刚刚加给国务卿的那些琐碎职责，只是在华盛顿唤起他的责任感时，他才接受了国务卿的任命。1790年的3月，他取代了临时负责的杰伊。杰斐逊的年薪是3500美元，手下有5名工作人员以及誊抄

① 另一方面，只有副总统约翰·亚当斯的一次投票挫败了参议院关于限制总统撤换他所不喜欢的部长之权力的一项提案。

员和译员。而陆军部和财政部一开始就有更多的工作人员，其扩大的速度也快得多。[①] 在纽约，国务院只在百老汇的一座小屋里办公；1790 年联邦政府迁到费城和 1790 年定都华盛顿后，国务院的办公室也没有增加多少。

因此，国务卿必须亲自对付几乎所有工作。至少在 19 世纪 30 年代以前，他还在亲自起草几乎所有的发给驻外公使的文件，然后由工作人员誊抄成一份正式文件以便存档，同时准备多份副件以供寄发。[②] 对国务卿来说，这并不是一份难以承受的任务：从联邦政府成立到 1812 年战争，所有的训令加起来只有不厚不薄的八卷。收件的数量虽然多一些，但并未使收件人承受不了。有时，驻外代表们心照不宣，以距离遥远或无大事可报为借口，干脆就保持沉默。1791 年 3 月，杰斐逊在训斥美国驻马德里代办时写道，"你在 1789 年 5 月 6 日的来信是我们收到的最后一封，现在，那封信大概有两岁了吧。"不过，就算是公务繁忙，美国驻外代表往往也是懒得动笔。1806 年，美国代表在伦敦进行长达四个半月的重要而又复杂的谈判期间，只给国内发回六份报告。

总的说来，在林肯政府结束前担任过国务卿的 24 人均属杰出之辈。有 6 人后来成为总统，尽管在 1830 年后担任过国务卿的只有詹姆斯·布坎南 1 人。亨得·克莱、丹尼尔·韦伯斯特、约翰·C. 卡尔霍恩和威廉·H. 西沃德也做过国务卿，他们都是卓越超群之辈，都曾追求过总统职位。两名稍显逊色的国务卿，约翰·亚当斯任内的蒂莫西·皮克林和麦迪逊任内的罗伯特·史密斯，因为犯上而被解职，其中，史密斯一案还夹杂了无能

① 1820 年，国务院还只有 14 名工作人员。1853 年设立助理国务卿办公室以前，仅次于国务卿的是 1 名"首席秘书"。

② 总统有时亲自起草重要文件，在麦迪逊不再信任其国务卿罗伯特·史密斯时，这一点最引人注目。

的因素。大多数人都遵从最高行政首脑，即使个性强硬者如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昆西·亚当斯也概莫能外。所有国务卿都经常同总统进行磋商，即使在无足轻重的事务上也是如此，如有一次，华盛顿在所有寄发文件发送以前审查了一遍。有时候，国务院几乎会在每一件重要事务上要求一个特别信任的局外人发表意见，最明显的例子是杰斐逊任内的财政部长艾伯特·加勒廷。在几位总统时期，重大问题都经整个内阁讨论，如在华盛顿、门罗和波尔克任内。国务卿通常但不总是都有自己的行事方式，但有些人经常受到上级的羞辱，波尔克的下属詹姆斯·布坎南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几乎没有人会怀疑最终权力的归属。总统控制对外政策，自共和国建立以来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如国务院基本上也由一个人执掌的事实那样。

外交机构的规模，如同杰斐逊的工作人员数量一样，反映了对美国对外关系之性质的主流观点。不可忽视的国会少数派不愿意向包括伦敦在内的那些甚至是最重要的首都派遣常驻外交官员。国会把华盛顿为维持外交代表而申请的经费从原先的 4.9 万美元削减到 4 万美元。1791 年，在外交机构建成时，美国在欧洲各宫廷只有 4 名公使和 1 位代办。此外，华盛顿小心谨慎地决定加强其职权，在没有寻求参议院批准的情况下，向欧洲派遣了至少两名私人代表。不久，欧洲战争给美国商业带来了麻烦；稍后，拉丁美洲对西班牙的成功反叛又导致了扩张，但即使到 1838 年，美国也只有 31 个常设使领馆。[①] 直到 19 世纪 90 年代，地位更高的大使馆才开始出现，因为它们被看做是非共和的。

这样，即使由于欧洲的战争，由于自身的扩张冲动，由于商

① 此外，领带和领带代表的数目当然在稳步地增加。1855 年前，他们的报酬主要是根据他们的工作来支付，因此他们的形象相当寒碜，本身常常从事一些令人怀疑的生意。

业野心，由于内战的国际影响，美国人卷入了欧洲传统外交，但是，他们也未完全放弃1787年的理想。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然而，它之所以伟大，部分是因为它不同于其他国家。欧洲规模式的外交机构十分令人讨厌，庆幸的是，美国人还认为这毫无必要。

宪法体制中的伙伴关系

正如上文所示，建国之父既不谋求也不希望新政府签订很多条约。一些人认为，同主要大国签订5至6个商业条约差不多应该是底线。新政府在头20年就超过了这个上限。尽管如此，1789—1815年间，参议院只批准了13个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大约每两年一个，其中只有五个称得上是重要条约。参议院没有否决过任何一个协议，尽管美英间一个不重要的协议因为伦敦不能接受美国参议院坚持的一项条件而胎死腹中。从单纯的统计学角度出发，在后来的25年里，缔约速度陡然加快，但几乎所有条约都不外乎是同其他国家建立正式关系，其中只有三至四个重要的协议。同建国之父的期望背道而驰的是，在条约辩论过程中，参议员所扮演的角色既不是贤哲之辈，也不是各州的代言人，倒更像是经常受到党派考虑影响的政客。

在总统和参议院之间形成真正的伙伴关系的期望也远未实现。新政府开始运转几个月后，华盛顿通知众议院说，他打算“同他们商量关于同南部印第安人通过谈判缔结条约事宜”。这次会议不欢而散。参议员们对总统那种“要么赞成要么反对”的明确态度恼怒不已，而华盛顿则难以忍受参议院吹毛求疵和拒绝立刻行动的做法。最后，在经过一段紧张的沉默后，总统做出让步。“他当时带着一种不满的情绪，”会议的参加者之一、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参议员威廉·麦克莱在日记中写道，“我愿意把他看

做是世界第一人，如果换了其他人，我一定会怀着愤怒的尊严同他讲话。现在，我正确地认为，总统想要骑在参议院的头上。”几天后，华盛顿又一次来到参议院，他看上去“温和而平静”，双方达成一致。但他没有再提这件事，他的继任者也没有。[1]

另一方面，在华盛顿要求参议院批准外交职务任命时，他首先把他为驻外使节拟订的训令提交给参议院，事实上，参议院是把这些训令与提名放在一起讨论的。这种做法结束于 1794 年，当时，约翰·杰伊被派到伦敦谈判解决一系列问题，其中许多问题过于敏感，以致不可能使受到党派情绪影响的参议院达成共识，所以，华盛顿只提交了杰伊的提名。这个做法一直延续至今，鲜有例外情形。费城会议提出的“咨询”一词，原本意味着谈判前和谈判期间的磋商，到头来只是指“同意”，即对行政部门所决定之事的事后批准。

也就是说，总统的权力还以费城会议所未曾预见到的其他方式得到了扩大。自 1792 年华盛顿政府与加拿大当局签订邮政协议以来，总统们签订了上千份“行政协定”，并未谋求得到参议院的批准。绝大多数但不是所有的行政协定都是没有争议的，因为它们基本上都是政府行为。但是，即使在立国初期，总统有时以远远超出这个限度的方式运用行政协定。1817 年，代理国务卿理查德·拉什与英国公使查尔斯·巴戈特就大湖地区非军事化问题签订了一份协定，而门罗总统只是在同年 12 月的年度咨文中向国会通报了此事。1818 年，在巴戈特的催促下，门罗向参议院提出询问：“这样一个行政协定是属于行政部门根据宪法而拥有的权限呢，还是必须咨询参议院并获得其同意呢?”参议院小心谨慎地避免直接作答，而是批准了“这个协定”，但它从未

---

[1] 1846 年，波尔克总统将英国提出的关于俄勒冈边界争端的建议提交参议院，以便在签订正式条约前征求其意见，但他本人并未来到参议院。

成为条约，正式批文也从未交换。

同样，总统早就开始令人生疑地使用其作为总司令的大权。1810年和1811年，麦迪逊认为，作为购买路易斯安那的结果，狭长的佛罗里达地区应属于美国，但西班牙拒绝承认这一要求，他“就秘密策划，派遣特务和军队，以武力相威胁，最终宣布并占领了西班牙所统治的一个地区”。[1] 在这个颇似滑稽剧的事件中，甚至连总统都私下地承认，这些行为“对行政部门的权威而言都是严重的问题”。更具重要影响的，是1845年詹姆斯・K.波尔克总统在兼并得克萨斯后采取的行动。他派遣一支由扎卡里・泰勒将军率领的军队进入得克萨斯边界以南属于墨西哥一个省的领土，可能正如波尔克所愿，这一行动导致了1846年的战争。无论如何，宪法制定人决定让总统担任总司令一职时，从未想到过有人会利用这种权力来控制政策，尽管他们认识到，在国会所宣布的战争中，必须对战场上的军队实施集中指挥。

行政协定和指挥权的扩大，不过是1787年所未能预见的两大发展事态。例如，费城会议同意赋予总统“接见大使和所有其他使节”的权力时，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含义。显然，代表们并未预见到，这个看似无关痛痒的句子会给予行政部门一种权力，以决定应该承认哪些政府，又不该承认哪些政府。但1793年以来的事实就是这样，这一年，华盛顿政府未与国会咨询就决定“接见”埃德蒙・热内公民，从而在事实上承认，那个声称仍占据着法国王位的波旁家族业已不复存在。

这些例证的意图，并不是要诋毁总统，说他们是篡权者，虽然有些总统事实上就是篡权者。如果没有那种比制宪人所设想的至少是更大的总统权，美国几乎就不可能在对外关系方面推行一

①　亚伯拉罕・D. 索法尔：《战争、外交与宪法权的起源研究》（马萨诸塞州剑桥，1976年），第303页。

条稳定——更不用说有效——的政策。制宪人兼具冷静的现实主义和一种远大见识，他们预见到一个从未存在过的世界，预见到一种乌托邦式的国际作用。然而，最值得强调的是，在乔治·华盛顿政府走上正轨前就已开始的那个进程中，建国之父的“最初意图”向政治现实拱手投降了。

不管这个体制是否像制宪人所设计的那样运转，55位宪法制订人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中心任务：在各州联盟的基础上创立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不断扩张到占据一个大陆，在世界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当然，正如托克维尔在1835年所评论说：“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好像能工巧匠创造的其中一件美丽的艺术品，它使发明人名利双收，但落到他人之手便毫无用处。”[1]宪法适应了人民的要求，人民则运用了宪法。

[1] 此处译文参考了中译本，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译本，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86页。——译者

第四章 联邦党人外交：现实主义和亲英情结

对于国家未来前途而言，从1789年华盛顿宣誓就职到1801年杰斐逊担任总统期间的12年，完全与此前的那个时期一样“至关重要”。美国人不仅要确立新政策，还得创建政府新体制。他们还得应付对外政策的挑战性问题，其中一些是邦联政府的遗留问题，另一些则是由欧洲爆发了新的战争所引起的。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证明这种新体制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在这个方面，他们完成了今天看来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事业，是美国区别于大多数其他后殖民国家的事业。1796年，他们表明，权力不仅可以从革命英雄那里移交给下一代，而且能够通过选举来实现移交。1801年，他们又证明，无需政变而改变政治方向是可能的，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现代历史上第一次由人民做出决定的选举，实现了国家权力从两大对立政党中的一方转移到另一方的平稳过渡。”①

最重要的发展，莫过于政党的崛起。宪法斗争上的联邦党与反联邦党集团，本质上是临时的联盟。只有在政府步入正轨以后，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才算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就其领袖和群众基础而言，联邦党与共和党是原先联盟的继承者，不过，例外

①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政党制度理念》（伯克利，1969年），第128页。

的情况是如此之多，以致不能认定存在着一种直系的继承关系。如麦迪逊在18世纪80年代还是赫赫有名的联邦党人，到了90年代却变成了共和党的先驱。19世纪20年代，联邦主义因陈腐老化而退出历史舞台，所谓的第一个政党制度寿终正寝。

美国获得独立之时，形成了一种大有助益的政治参与传统，但却不是那种有组织的政党传统。事实上，如同许多新近获得自由的民族一样，美国人认为政党近乎于对国家统一的不合情理的威胁。但政党还是出现了，尽管许多国会议员和至少一部分1796年总统选举团成员拒不承认属于这个政党或那个党派，而且政党纪律在很长时期内也不尽人意。1796年，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提出警告说，"要以最严肃的态度来反对政党幽灵的有害影响"，他的这种虔诚情感忽视了其政府的日益增强的党派色彩，或如许多人事实上所认为的那样，他至少认为，"政党幽灵"是反对派表示不忠的手段。联邦党1798年的《惩治煽动叛乱法》，以及杰斐逊总统封杀反对派报纸的做法，反映了同样的情绪。但到18世纪90年代末，政党斗争终于被人们所接受，如果不是欢迎的话。最重要的是，尽管有着冲突和挫折，全国上下都同意接受投票箱的决断。

显而易见，这些困扰过大多数新兴国家的成就，对于外交关系能否成功至关重要。这些成就使得美国确立起一种制度和一种程序，不管是发生口头纠纷还是暴力行动，它们都保持着稳定性和灵活性。这些都来之不易，只有时间的流逝才能突显出它们的神圣。1808年，即宪法得到批准20年之后，英国一家杂志冷嘲热讽地写道，美国体制"与其说是一个稳定持久的制度，毋宁说徒有政治实验的虚表"。这种怀疑态度在国外广泛存在，致使欧洲各国政府所给予美国的有限尊重，只稍强于其对于邦联政府。然而，时间会一清二楚地向我们——即便不是所有的当代人——证明，1789年后的岁月，是一个取得成功和进步的时期。

联邦党人、共和党人与欧洲战争

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战争的不同态度，对政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792—1815年间，旧世界陷入了现代历史上历时最久的战争，其间只有两次短暂的休整，几乎整个欧洲均卷入其中，但英国和法国是主要对手。原本由法国旧制度的倒台所引发的共和制度与君主政体的斗争，在那个自1798年始统治法国并于1804年自行称帝的拿破仑·波拿巴崛起以后，变成了一场迥然不同的战争。这个年轻的将军一度被誉为共和制度的拯救人，却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对欧洲霸权以及也许是世界霸权虎视眈眈的独裁者。亲法国的美国人不再以波拿巴取得的胜利来命名新城镇，他们还不得不以更加实际的方式去适应这场大动荡。

同样，英法两国不断变化的对美政策，也影响了美国人的态度。法国革命派起先还指望共和主义的美国会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和感激之情而支持他们，法国在失望之余——他们认为美国人背叛了法国——转而采取强硬政策，并在1798—1800年间升级为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虽然波拿巴结束了这场冲突，但他不怎么尊重这个国家，在他看来，这个国家“商人贪婪，政府软弱，军队无能”。[①] 他的态度——缺乏连续性而无法称其为政策——随着眼前的利益而变化，特别是随着他对“大棒”还是“胡萝卜”哪个更有效的估计而不断变化。

最初，英国沉重地打击了美国北方的商业，这主要是因为英国人也估计美国会支持法国。1794年达成的条约废除了这种政策，从而开始了十年相对顺利的关系。但是，正如美国后来的冷战斗士那样，英国人认为英国是“世界自由的最终希望”。他们

① 克利福德·L. 伊根：《不战不和》（巴顿鲁依，1983年），第25页。

要求其他国家容忍他们认为是打败拿破仑所需的种种措施。1805年后，这种态度意味着更加粗暴的对美政策，这反过来导致了美国敌视英国。1812年，美国对英国宣战时，英国首相抱怨道，美国应该转而“仰仗英国，感激这支保卫力量维护了她的生存”。

多年后，一位马萨诸塞联邦党人回忆道：“法国大革命在美国历史上烙下了一个炽热的印记。”这个比喻既贴切，又有点令人误解。新政府开始运转后不久，国会就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提出的一系列财政议案进行了激烈辩论，但同盟在不断地变化着，费城会议上的斗争似乎没有引起全国的注意。法国大革命改变了斗争的性质，但不过短短几年后，坚持各种立场的美国人全都以“巨大的热情以及无甚惊讶之心”观察着事态，他们得意洋洋地认为，他们的共和制榜样已经扩大到大洋彼岸。[①] 尤其是1793年英法开战之后，美国政党得以巩固，并开始争取选民。

实际上，联邦党人与共和党人都把欧洲战争看做是本国斗争的一部分。联邦党人已经意识到民主有可能走向极端，他们认为法国的事态已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不能尊重那些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共和党人一直认为，国内斗争就是保卫美国，抵御腐朽的英国模式，而现在可以看清的是，政府的政策就是试图使美国与英国和暴君联盟结成同盟，共同反对自由和法国。”[②] 因此，联邦党人将其对手称做“民主派”，甚至是更糟的“雅各宾派”。共和党人拒绝承认这两个标签，并将其对手称为“独裁者”或“英国佬”。最终，每一个政党都相信自己的宣传：共和党人亲法，而联邦党人亲英。

事实更加复杂，更加变化多端。实际上，对法国初期阶段反对旧制度的抗议行动，所有联邦党人都是欢迎的；当抗议行动变

① 戴维·B. 戴维斯：《革命》（马萨诸塞州剑桥，1990年），第32页。
② 兰斯·班宁：《杰斐逊派的立场》（伊萨卡，1978年），第211页。

成暴力，尤其在1793年和1794年的“恐怖时期”，当那些真正的和莫须有的反对派被送上断头台后，他们为此扼腕叹息。用汉密尔顿的话来说，他们拒绝认为“美国的事业和法国的事业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二者之间不止是自由与无法无天的差别”。他们怀疑美国的共和制度，因为美国人并未起来反对那个恐怖肆虐、财产遭到没收、政府不甚稳定的国家。他们将这些灾难归咎于民主的过激行为，后来，他们又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做出解释说，拿破仑专政是民众无法无天的产物。多年后，两国恢复了因18世纪90年代的情绪而中断了的友好关系，约翰·亚当斯给蒙蒂塞洛的贤人[①]写信说：“我憎恨法国大革命，因为我坚信，它不仅阻止人类的进步，而且导致历史的倒退。”

特别是在拿英国同法国做比较时，一些联邦党人认为英国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近乎十全十美，或至少是“所有那些不同于野蛮和邪恶之辈的人的……庇护所”。这种观点根本得不到普遍接受，联邦党人也根本不是英国的忠实朋友，尤其是在当政期间。至少连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都承认说，“我国政府的真正政策，乃是在精神和实质上对英法两国采取同样友好的态度。”他经常抨击英国的政策，尤其是它的贸易政策，尽管如此，他坚持不懈地实现对英和解，甚至到了把一些内幕消息透露给英国代表的地步，这不仅是因为他对英国有着基本的认同感，而且在于汉密尔顿认为美国这个新国家若失去对英贸易便不能生存。

汉密尔顿在党内的眼中钉约翰·亚当斯，不仅憎恨而且不相信英国。英国公使却对亚当斯在1796年当选为总统表示欢迎，他报告说，“这并不是因为我在亚当斯先生身上看出他有任何偏向于大不列颠的倾向，而是因为他痛恨我国的敌人。”亚当斯讨厌法国的激进主义，像大部分联邦党人一样，他认为英国保卫了

---

① 指托马斯·杰斐逊，蒙蒂塞洛是他的居住地。——译者

美国免受法国之扰。亚当斯的支持者、众议员费舍尔·埃姆斯认为："摧毁英国佬的炮弹会将我们自己击倒在地。"然而，在1826年去世以前，亚当斯对英国佬的盛气凌人外表下的妒忌和复仇之心一直深信不疑。尽管亚当斯堪称美国历史上最记仇的人，言辞偏于强硬，但他的观点而不是那些亲英分子的看法，代表了所有联邦党人的立场。

如果说亚当斯认为法国大革命"阻止人类的进步"的话，那么共和党人则相信它是开始于1775年的世界运动的一部分。一家报纸宣称："法国的事业就是人类的事业。"此外，共和党人担心，法国的失败会激起世界各地的反动势力，用杰斐逊的话说就是，"全世界的自由都有赖于这场斗争"。他认为，如果法国的敌人得逞，"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可能不会罢手，他们至少会强迫我们改变我国的政府形式。"尽管对大恐怖有着不同程度的疑虑（杰斐逊百思不得其解地问道："难道以前取得过流血如此之少的成就吗?"），共和党在好几年里一直坚定不移地采取"亲法"态度。他们认为，联邦党人对两国间正在形成的紧张关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后来，事态发生了变化。1798年，美国驻巴黎代表的报告公布于众，披露法国代理人X、Y、Z先生曾索取贿赂，以此作为通过谈判解决分歧的代价。共和党人竭尽全力阻止随后的轩然大波升级为战争，但他们此后再也不信任法国了。几个月后，波拿巴推翻了当权政府，共和党人对法国的疏远宣告结束。1799年，法国的共和制度寿终正寝。

1801年，杰斐逊刚刚就任总统即对英国代办说，"他对共和主义的法国也许有些兴趣，但可以肯定的是，当前美国政府不可能存在什么自然而然的倾向，驱使他以英国为代价而对法国表现出一丁点儿的过度偏心。"尽管联邦党人的指责恰好相反，但他的总统任期证明了他所言非虚。1814年，得知拿破仑退位后，

杰斐逊惊喜交加地评论道："现时代的阿提拉[1]已被废黜，这个残害百万生灵的暴君，……这个世界权利和自由的最大压迫者，被囚禁在地中海的一个小岛上了。"

1798年后，无论是杰斐逊还是他的拥护者，都不愿意看到英国的崩溃。这一年，他写道："英国的完全屈服不啻于一场大灾难。"他接着说："但令人高兴的是，这不可能。"他在1803年指出，美国将会"大大遭殃，如果有什么灾难让人类失去了用来抵挡有时是所向披靡之洪流的这样一道防波堤的话"。共和党人希望看到英国会遭到报应，但他们不愿意看到本国的敌人横行天下。和费舍尔·埃姆斯以及其他许多政治反对派人物一样，他们认识到了欧洲均势的优点。

1793年的中立

尽管各政党成员都指责对方试图卷入欧洲战争，支持那个据说对方要去讨好的国家，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和平是我们的利益所在，"杰斐逊写道，"和平拯救了世界，因此这个惟一拥有自由理性政府的国家今天才得以存在。"在告别演说中，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表达了同样的想法："我的最大动机，是力图为我国赢得时间，以安定和完善我国仍还算新的制度，持续不断地取得达到具有力量和韧性之程度的进步，而这对于我国获得自身命运的支配权乃是必需的。"

只要不是在丧失理智的时候，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同意这个观点。即便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对法国的狂热情绪达到顶点时，几乎也没有哪个联邦党人想和法国一起并肩作战。XYZ事件曝

---

[1] 阿提拉（406—453年），433—453年为匈奴王，于450年横扫中欧和法兰西，被称为"上帝之鞭"或"天罚"。——译者

光之后，没有几个联邦党人想与法国开战，虽然很多人认为战争不可避免。1801 年共和党上台执政后，其外交主旨就是寻找替代途径，避免与英国一战。1812 年，共和党参议员和众议员之所以把美国拖入这样一场战争，不过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为减少卷入战争的可能性，美国政府在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即确定了一条当时极具前瞻性的政策路线。1793 年 4 月，华盛顿颁布《中立宣言》，号召全体人民“真诚而又善意地采取并执行一种对各交战国友好的和不偏不倚的做法”。该宣言的出台引起了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之间的争论，他们虽同为内阁成员，但正逐步演变成相互对立的两大党的领袖。汉密尔顿要求搁置甚至废除 1778 年法美政治同盟，其正式理由是缔结同盟的那个法国政府业已不复存在。杰斐逊宁愿回避这个问题，至少要等到法国谋求取得（法国从未提出）美国保证要提供的援助之时，总统也同意采纳他的这个建议。每一方私下地都希望保持中立，以使各自所偏爱的那个欧洲国家能从中获得最大好处。但双方都一致认为，政府应该不偏不倚，美国公民也应避免作出将国家拖入战争的举动。

这样一种立场在今天看来似乎算是最低限度的中立。但在 1793 年，国际法权威却将中立国义务降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例如，他们认为，1775—1778 年法国对美政策并未破坏美国的中立地位，因为法国军队没有介入，而只是提供了政府所支付的物资，允许美国利用法国港口从事商业劫掠活动，如此等等。一个大国也许有能力打击这些行为，就像法国在 1778 年以前的所作所为那样；但新共和国美国就不敢冒这种风险，它清楚地知道，即便是手段完全合法的行为也有可能挑起危险的不满情绪。因此，华盛顿内阁一致同意推行上述政策路线，一位国际法权威

说它开创了“中立习惯法发展史上的新纪元”。[1]

麦迪逊抱怨道，总统篡夺了费城会议未曾授予他的权力：宪法既没有授予总统宣战权，更没有给予他宣布中立的权力。这也使杰斐逊大为困扰。为尊重他的感情，宣言中没有使用“中立”一词。亲法派反对美国应当不偏不倚的提议，他们坚信杰斐逊的那个断言，即“公正的中立到头来将是我们的朋友所不能接受的一剂苦药，而只有朋友能使我们避免战争的灾难”。热情的支持者当然拒绝承认，宣言并不禁止他们做出诸如向英国公使馆窗户扔石头之类的行动。但总的说来，华盛顿的宣言即便在共和党内部也得到了广泛支持。

宣言几乎刚刚出台，中立政策就受到法国公使埃德蒙·热内的考验。1793 年夏，热内在查尔斯顿上岸后经过四周的陆上跋涉后抵达费城。在此期间，他出席了许多公开集会、庆祝活动和宴会，以发动力量支持对法援助。“我的热情，”他当时写道：“在把（美国人民）拖入战争与我们并肩作战之前是不会熄灭的。整个新世界一定是自由的，美国人一定会为了这个崇高目标而支持我们。”在首都，杰斐逊友好地接待了热内，尽管国务卿提醒他注意分寸，如果他不想损害共和事业的话。

热内却不知“小心谨慎”为何物。甚至在抵达费城之前，他就发起组织美国人擅自夺取西班牙的领土。他给美国私掠船签发委任状，骚扰敌国贸易，这些私掠船捕获了 80 艘商船。最臭名昭著的是，他授意将俘获的英国商船“小莎拉”号改名为“小民主”号，将其武装起来，投入到海上从事商业劫掠活动。他告诉杰斐逊说，此事不会重演。这个事件促使杰斐逊向麦迪逊提出警告说，热内“将会葬送共和党的利益，如果他们不抛弃他的话”。最重要的是，这个法国人“喜欢用公开场合的夸夸其谈取代实实

---

[1] 威廉·霍尔：《国际法》（牛津，1924 年，第 8 版），第 707 页。

在在的外交”，[1] 三番五次地号召美国民众抵制中立政策，而那些街头暴徒拥护他的号召。约翰·亚当斯多年后仍然认为，只不过一场黄热病耗尽了民众的精力，“将美国从一场致命的政府革命中拯救出来”。

热内认为美国政府不会与他作对，因而要求国会举行一次特别听证会，以便在他的愿望和美国政府的意见之间作出取舍。这太过分了。总统怒火万丈地说道：“法兰西共和国的公使能公然地、无所顾忌地为我国政府立规立矩吗？他接下来会煽动民众来要挟政府吗？全世界又会怎样看待这个行动，怎样看待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屈从于这个行动？”8 月初，华盛顿和包括杰斐逊在内的内阁一致同意，要求法国召回热内。[2] 热内的失败极其重要，尽管热内的继任者们试图动摇联邦党政府改变既定路线，但也像他那样一无所获。

华盛顿政府决定就《中立宣言》进行补充立法，乃是出于多种原因，其中包括对总统权的怀疑，以及关于为实施这种大体上只是一般政策声明而颁布的详细行政命令的合法性。1794 年《中立法》禁止招募外国军队，宣布诸如热内所拟定的军事计划为非法，禁止在美国领水武装或加强交战国军舰。虽然美国人特别获准从事走私贸易，但他们也被告知，如果某个交战国在公海捕获这些货物，美国政府是不会支持他们的。

甚至那些起初质疑中立法的人，几年后似乎就明白了这种中立的深谋远虑。1800 年，本来是临时性的《中立法》成为永久法律。1817 年，鉴于拉丁美洲殖民地反叛朋友的反对，禁止范围扩大到包括革命战争。1818 年，最后一项立法通过，《中立

① 哈里·安蒙：《热内使命》（纽约，1973 年），第 58 页。

② 事实上，热内并未回到法国，因为他会被新的雅各宾派政府逮捕甚至杀头。他到纽约过着退休生活，结了婚，作为一个乡下绅士了却余生。1804 年，他成为美国公民。

法》体系形成。

同情或贪婪三番五次地导致了违反法律的行为。拉丁美洲的朋友们，19世纪中叶擅自对中美洲进行征服的人，19世纪30年代加拿大芬尼安运动的支持者，19世纪最后1/3时期古巴独立运动的支持者，所有这些人，还有其他人，都违反过这项法律。然而，《中立法》除细则外并未发生变化，1793年和1794年所确定的立场，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战后时期。

最后，其他国家都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即中立不止是远离战争，中立至少在形式上应该是不偏不倚的。1823年，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向议会指出："如果我们想要找到中立法指南的话，我宁愿借鉴美国在华盛顿总统和杰斐逊国务卿时期确立的体系。"美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又一次兼顾了他国的利益。

对中立近乎普遍的支持，乃是相互对立的政治家并不像各自的政敌所指责的那样毫不妥协地支持英国事业或法国事业的最初证明。然而，他们进行了多年激烈的争吵，因为双方都发现不仅难以理解对方而且无法尊重对方，因为双方都十分清楚欧洲交战国的成败会给国内带来影响，因为共和国还处于幼年时期并且缺乏自信心。此外，尽管他们有着远离欧洲战争、支持新的中立的共同愿望，但在这个框架内，他们仍存在着大量的分歧。联邦党推行着对法国比对英国更不友好的政策，反之，共和党亦然，虽然它不是那么始终如一。双方的争吵，对于美国巩固国家、开疆拓土、发展贸易、尤其是在欧洲动荡期间保持平衡的努力，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立的裨益

在那个动荡不已的年代，交战国往往粗暴地对待美国。结果，美国卷入了一场同法国不宣而战的战争，这场斗争激发约瑟

夫·霍普金斯创作了第一首国歌《哥伦比亚万岁》，而更有名的美英战争则促成弗朗西斯·司科特·基写下了对美国勇敢无畏的颂扬之词。[①] 但正如一位杰出的外交史学家很久以前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人也知道，“欧洲的灾难”就是“美国的机会”。[②] 他们利用欧洲战争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好处，消除了对1782年正式赢得的边境的威胁，获取了超出富兰克林所梦想的领土。考验和成就，对独立的巩固均至关重要。

正如杜尔戈所预言，美英贸易在独立战争后不断增加，尽管如此，美国与包括英国殖民地在内的其他地区的贸易，却在18世纪80年代陷于萎缩。无论英国、法国还是西班牙，都不赞成美国人所谓“商业扩张具有教化之功”的信念，[③] 他们继续遵循传统的重商主义路线。不久，路易十六走上了刑场，新的法国统治者开放了殖民地，放松了对跨大西洋贸易的控制，这部分是因为观念的变化，部分是出于战争需要。美国对法国的出口，从1791年的100万美元激增到1807年的1300万美元。1795年，被迫将商船改作战时之用的英国，开始鼓励西印度群岛各殖民总督中止执行对外国船只的法律限制，开放麦迪逊曾说过的“最自然和最珍贵的”商业。

更广泛地说，战争刺激了欧洲的需求。美国商品出口额从1791年的1900万美元上升到1807年的4400万美元，它特别地促进了农业的繁荣。转口贸易的增长更为显著，因为外国商船要

① 《哥伦比亚万岁》歌词由约瑟夫·霍普金斯写于1798年，原曲是菲利普·菲利普谱写的《总统进行曲》，是美国第一首国歌；《星条旗》歌词由弗朗西斯·司科特·基于1814年8月被俘期间填写，原曲是一首流行的英国饮酒歌，后取代《哥伦比亚万岁》成为美国国歌。——译者

② 这是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平克尼条约》（巴尔的摩，1926年）一书的主题，其副标题是《对欧洲灾难和美国机会的研究》。

③ 德鲁·R. 麦科伊：《不可捉摸的共和国》（查佩尔希尔，1980年），第89页。

么被征作他用，要么像法国船只那样被赶出海洋。美国人接管了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加勒比海地区的贸易，他们在本国购买货物，然后再将其运往最终目的地。在1807年前的15年里，转口贸易翻了三番，达6000万美元，这个水平要到1916年才能持平。1805年前，英国政府容许了这种贸易，同意将整个航线的两个部分看做是各自独立的航程而不是一个。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英国人会认为，他们有理由捕获那些在敌国港口间从事运输的中立国船只。根据早先一次英法战争所确立的《1756年战争法规》，英国早就宣称，中立国船只不得从事和平时期不曾对其开放的贸易，而欧洲各大港口与各自殖民地之间的大部分贸易，则不在捕获之列。

战时中立有着如此丰厚的回报，以致美国人甚至对英法1801年停战协议有点懊恼。北方一名牧师对教区的居民说，“所有的人都欢欣鼓舞地听到和平的钟声，所有的人都在回忆上一场战争所带给我国的巨大商业好处。情感和理智在与胜利进行着搏斗。”战争重新开始后，利润随之而来，农民、种植园主、商人乃至整个国家都从中收益。一位最成功的战争利润获得者、马萨诸塞的威廉·格雷，组建了一支拥有36艘商船的船队，1809年估计拥有300万美元的财产。国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1807年以后，由于杰斐逊的《禁运法》和后来的美英战争，美国贸易开始下降，但是，它已奠定了强大的基础。战争结束后，美国出口恢复了增长势头，商业船队又一次在国际商业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一个日益重要的角色。正如其领土帝国一样，贸易扩张主要也是欧洲战争的结果。

联邦党人毫不怀疑商业扩张的价值，而共和党人则致力于农业社会的理想，这样的理想赞成领土扩张，但有时怀疑对外贸易。因此，1785年，常常采取与其智力不相符的简单方法的杰斐逊写道，他希望美国“既不从事贸易也不进行海运，但……却

要在顾及欧洲的情况下不断扩张，直到中国边界。为此，我们要避免战争，我国所有公民都应从事农业生产”。“不过，”他承认道，“这只是一种理论，一个美国公民无需遵循的理论。我国人民对航海和商业有着一种明显的偏好。”概言之，理论必须让位于贪欲。

特别令共和党人头疼的乃是转口贸易，同本国商品出口贸易相比，它导致美国与各交战国发生了太多的纠纷。它的受益者只有商人和船主，亦即杰斐逊眼中的“投机商”；它还“破坏了曾经被杰斐逊称为‘我们这个农业国家’的那些重要的、关于生命和劳动的共和主义信念”。[①] 因此，一些共和党人想放弃转口贸易。罗诺克的约翰·伦道夫，一个比波普·托马斯更真诚的共和党人，说转口贸易是“导致战争的蘑菇和真菌”。但是，利润是如此丰厚，以致不容放弃，共和党的总统们并不愿意为了集中于国内市场而不去采摘这颗食用菌。

贪欲有助于解释杰斐逊所说的“明显的偏好”。但是，杰斐逊在其他场合所表达的那个信念，即只有人民繁荣富裕——但不是那种遭到普遍痛恨的“奢侈”——基于真正的自由与独立、弥足珍贵但又脆弱不稳的共和制度才能生存下来，也能说明问题。为实现繁荣，美国人指望着出口的稳步增长，共和党人则特别指望着农业出口的稳步增长。国家私利与真正的共和制度得到了多么完美的统一啊！

为保护几乎一直受到欧洲国家攻击的战时贸易，联邦党政府和共和党政府都作出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他们要求给予中立贸易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当然，他们这样做，主要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但他们还本着“条约范本”的精神，自认为是在推动着战争

---

① 伯顿·斯皮瓦克：《杰斐逊的英国危机》（弗吉尼亚州查洛托斯维尔，1979 年），第Ⅸ页。

方式的改善。他们的继任者则继续奉行这条路线，直到进入 20 世纪。

问题是复杂的，谁对谁错并非一目了然。谁都认为，只要不运载军用物资、违禁品或逃避封锁，中立国就有权与交战国进行贸易。但究竟什么是违禁品？又怎样界定合法的封锁？中立国旗帜能否保护交战国的物资？正如权威们所一致认为的，如果一个交战国的非法行为使对方有理由做出反应从而采取并未违反国际法的行动，那么这种报复权利又该达到何种限度？尽管美国人在一些不多的问题上是小心谨慎的，但他们时常“为了国家贪欲破坏国际法原则”。[1] 无论是联邦党执政还是共和党掌权，这种做法都导致了纠纷，都打断了受到战争威胁的繁荣，甚至引发了军事冲突。

内战期间，林肯政府千方百计地封锁南方，从而大大改变了上述传统政策的部分内容。不过，同其他大国——沙皇俄国可能是个例外——相比，美国自己在战争期间更多地坚持着广泛的中立贸易权利。美西战争期间，美国并未宣布对古巴、菲律宾或西班牙实施全面封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期间，美国徒劳无益地敦促德国和协约国接受美国的中立观；参战后，它倒是颇有自知之明，没有采取协约国曾对中立国贸易所施加的那些最严厉的限制。

《杰伊条约》

从热内事件到 1815 年拿破仑的最后失败，美国对外政策上的分歧，主宰甚至几乎垄断了政治斗争。联邦党人与共和党人在共和国性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广泛分歧，但在汉密尔顿的计划付

① 斯皮瓦克：《杰斐逊的英国危机》，第 12 页。

诸实施后，联邦党人在国内政策上几乎再也没有采取过主动。共和党人控制局面后，只是取消了联邦党人的几项法律，但提出的立法动议却寥寥无几，外交方面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

在热内呼吁美国人推翻本国政府之际，英国推行了一些政策，从而终于使得美国人在那个夸夸其谈的外交官销声匿迹后把满腔怒火撒向了英国。部分是由于英国人未能预见到《中立宣言》，以为美国会支持法国，所以大肆攻击中立贸易。他们截获以法国或法国所控制的国家为目的地的食品，将其运入英国港口并以强制价格出售；几个月以后，英国开始捕获所有与法国殖民地进行贸易的中立国船只。这两项政策公然违反了国际法的主导原则。到1794年初，美国有好几百艘船只遭到扣押。

与此同时，久拖未决的边界据点和英国策动印第安人的问题，日益严峻起来。加拿大总督多切斯特勋爵对一些印第安酋长发表演说，鼓动他们继续抵抗美国边疆居民向前推进，他还建议英国与印第安人在不久的将来结成同盟向美国开战。他说："就美国人朝着这个方向推进的方式而言，就我所知道的美国人对海洋的行动而言，如果我们今年与他们发生战争，我是不会感到突然的。如果是这样，边界线必须由战士们划定。"但是，让多切斯特大为光火的是，演说内容很快就泄露出去，在美国引起了一场可想而知的轩然大波。大约与此同时，多切斯特下令在临近今天托莱多的莫米河上修筑军事据点，与其他边界据点所不同的是，它严重地侵入了美国领土。不过，这个事件是在赴英使团登上列车之后才传到费城的。[①]

1793年12月国会开会以来，麦迪逊领导的共和党一直在施

① 1794年夏，安东尼·怀恩将军在法伦廷伯斯同印第安人打了一仗后，进军该要塞并要求英军撤离，几乎引起一场可能触发西北地区战争的冲突，进而葬送正取得进展的谈判。但是，无论是怀恩，还是英国司令，都不想打仗。美国在几天之后撤离。

加压力，要求对英国实施贸易报复。英国捕获美国商船以及多切斯特演说的消息，使得为数仍然不少的、未加入党派的国会议员倒向共和党一边。联邦党人认为，贸易战对美国比对英国更不利，他们担心这会升级为军事冲突。他们还认为，共和党想让美国与法国结盟。联邦党的一位领袖牢骚满腹地说："所有支持报复措施的人都讲法语，可我更喜欢美国方言。"当时看来，他和他的政党似乎将屈居下风。3 月，国会通过了一项为期 30 天的针对英国及其殖民地贸易的禁运令。主张实施更多制裁的鼓噪，仍不绝于耳。

4 月中旬，华盛顿总统提名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作为特使前往英国。建议总统采取这项措施的联邦党领袖认为，通过这一途径取得巨大的外交成功的希望并不大。他们的首要目标是政治性的，即避免或至少推迟进一步与英国发生贸易战。共和党人看出这一点，力图在参议院里否决提名，但他们未能成功，投票结果为 18 票对 8 票。

杰伊的训令体现了联邦党的观点，尽管其名义上是杰斐逊的继任者兼好友埃德蒙·伦道夫的手笔。[1] 训令对只是在后来成为两国关系中的重大问题的强制征兵只字未提，但却提出了美国的一系列其他要求，包括撤除据点、对捕获船只作出赔偿以及一项商业条约的款项。但训令又指出，除了两个例外，上述所有要求"只是建议，你可以考虑作出修改"。事实上，这些要求是"下达给一位美国外交官的一系列最不加限制的训令"。[2]

美国只有两个条件：不直接违反法美条约；美国若不能获得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航运权便不签订商业条约。这两项条件是政治

[1] 1793 年杰斐逊辞职时，华盛顿挑选伦道夫而不是汉密尔顿的门徒取而代之，这一做法进一步印证了党派分野乃是慢慢形成的。

[2] 弗兰克·T. 路透：《考验和胜利》（得克萨斯州福特沃思，1983 年），第 186 页。

上所必不可少的，因为公开放弃法美同盟和西印度贸易——当时商业争论的核心问题——可能会导致政府垮台。对于其他问题，联邦党人准备谋求而不是要求得到解决。毫无疑问，他们对英国的根本同情以及对法国的厌恶，影响着上述立场，虽然这一次他们与共和党人一样，对英国的错误行为义愤填膺。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美国还没有实力能够争取到作为帝国商业体系和战争核心的贸易特权。他们主要的、彼此联系的目标，是减轻国内压力，并避免卷入欧洲战争。对他们而言，这似乎是一条谨慎之策；但在其对手看来，这未免显得胆小怕事。

英国政府的立场并无二致。威廉·皮特政府的成员，尤其是他的表亲、外交大臣格伦维尔勋爵，虽然并不准备在美国人所期望的问题上作出让步，但也不愿意在欧洲战争吃紧的情况下树立新敌。正如政府的一位支持者所说，英美谈判开始后，“与美国开战意味最终的和彻底的毁灭，英国不仅会比以往更不安全，英国的贸易不仅要遭到灭顶之灾，甚至国内安定也将大成问题。”为了避免这种结局，一如美国联邦党政府拒绝共和党的肤浅之见那样，皮特和格伦维尔摆脱了那些自私自利集团和极端派的纠缠。

杰伊于6月抵达英国时，皮特及其同僚已着手实现和解了。他们在格伦维尔这个关键人物的领导下，决定撤出据点，命令加拿大的多切斯特勋爵和其他官员在行为上有所节制，驻费城公使乔治·哈蒙德也接到了同样的警告，此人顽固任性，得罪了那些甚至是最坚定的联邦党人。枢密院的新敕令简化了美国船主就没收船只向英国法院提出申诉的程序，而且格伦维尔从一开始就同意对许多捕获物作出赔偿。谈判期间，格伦维尔走得更远：他不顾西印度利益集团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反对，答应开放英属加勒比地区和亚洲殖民地的贸易；他还再次不顾利益集团的反对，同意将美国革命前债务人的债务要求提交仲裁，而不是要求获得一

笔固定的赔偿。

鉴于双方的上述立场，两国达成协议也就不足为怪了。同样不足为怪的是，许多问题被束之高阁，杰伊和格伦维尔得出结论认为，这些问题至关重要，以致不能操之过急。1794 年 11 月签署的条约规定，英国撤除西部据点，开放印度和英属西印度群岛（有条件）的贸易，并就以下三个问题的仲裁作出安排：缅因州东部有争议的边界、美国人对在西印度群岛的被捕获船只的索赔要求、以及付给美国革命前曾给美国人贷款的英国商人的款项。[①] 两位首席谈判代表均认为，这些条款可能有助于扭转走向冲突的趋势。

他们的判断最终证明是正确的，但这也是“一招险棋”。共和党人反对与英国达成任何协议，甚至连政府的盟友也认为《杰伊条约》难以接受。经过“许多曲折和多次毫无结果的谈判”之后，杰伊同意不对中立国权利作任何规定。他提出了训令中未曾触及的强制征兵问题，但只是稍作努力而已。此外，为挽救条约，他认可了禁止一国对另一国船只和货物采取歧视的条款，这个规定剥夺了共和党人最喜欢用来对付英国的一件武器。

多年以前，伟大的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曾评论道：“杰伊先生的条约是一个糟糕的协议，当时很少有人对此提出争议，现在也没有哪个人会站出来对其优点进行辩解。1810 年以来头一次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宁可选择战争，而不愿意根据这些条款来实现和平。”[②] 也许除了与英属印度通商外，杰伊确实没有谋取到更多的东西，美国人所得到的显然是应该得到的：1782 年获得承认的领土解放，英国对其所承认的非法捕获物进行补偿。他

① 头两次仲裁尽管为两国代表的巨大争论所阻，最终还是大功告成，但第三次仲裁未有结果，1802 年，美国为平息争端同意支付一笔巨款。

② 亨利·亚当斯：《艾伯特·加勒廷的一生》（费城，1879 年），第 158 页。

撬开了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大门，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同意禁止美国的某些商品出口，甚至连联邦党人不久也认为这个代价太大了。他在强制征兵和中立国权利问题上一无所获，尽管有必要公正地指出，他在这些方面也没有接受英国的要求。

然而，条约消除了两国关系走向缓和的两大障碍——边境问题和捕获船只问题，从而扭转了走向战争的趋势。一位历史学家写道，条约的不足在于“联邦党人为实现他们认为对美利坚国家的永久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和平而付出的代价”。[①] 此外，条约的成功签订促使皮特内阁做出广泛的政策调整。加拿大的英国官员不再与西部印第安人部落密谋策划，伦敦允许加勒比海各殖民地总督向美国船只开放港口，相对宽松地对待美国的中立贸易，命令海军部放回了许多被狂热的海军军官所强制征兵的美国海员。

除此以外，美国还获得了另一项应该大大归功于《杰伊条约》的成果，它是以牺牲西班牙为代价的。美国革命结束后，马德里认为没有理由让它接受谢尔本在领土上所作的慷慨让步。以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为基地，西班牙对北至俄亥俄河、东至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广大地区提出了要求。由于害怕美国边界的推进，西班牙在1814年关闭了肯塔基和田纳西的出口货物的主要通道密西西比河，并鼓动那里的居民从事分裂活动。西班牙还千方百计地促使西南部印第安人与美国为敌。

1795年，西班牙处境微妙，它正试图从英国倒向法国一边。在面临着与英国开战并担心《杰伊条约》可能会进一步密切英美关系的情况下，西班牙认为，不能冒着英美联合起来对付自己的风险。西班牙的过分担心并不重要。1795年10月，西班牙答应美国特使托马斯·平克尼，宣布放弃对密西西比以西、北纬31°

① 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杰伊条约》（纽黑文，1962年第2版），第373页。即使如此，比米斯还是指责杰伊缩手缩脚。

线亦即今天佛罗里达北部边界以北广大领土的明确权利，而这是它长期以来所坚持的。西班牙还同意，美国西部居民可以向流经西班牙领土的密西西比河南部广大地区出口商品。因此，《平克尼条约》“使美国控制了通往整个密西西比流域宝藏的大门”。[①]

当然，《杰伊条约》的姗姗来迟的好处，在 1794 年还不能轻易地预见到。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美国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杰伊的模拟像一次又一次地被绞死。在联邦党领袖删除了不受欢迎的西部印第安人条款后，参议院不多不少刚好以必需的 2/3 微弱多数批准了条约。在众议院为批准用于设立仲裁机构的区区 9 万美元拨款时，这个条约两次都是只差一票或两票而未获通过，那个投了关键一票的宾夕法尼亚共和党人，因其背叛行为在费城大街上遭到自己妹夫的刺杀。随着时间的流逝，条约的好处日益明显，尤其是 1796 年英军撤离要塞之后，条约变得不那么不受人欢迎了。然而，联邦党人永远不能完全逃脱那些指责，说他们最终在援助英国之心的驱使下背叛了祖国，说他们曾经——用杰斐逊的话来说——“找英国妓女理发”。

法国的挑战

对《杰伊条约》最重要的指责，乃是说美国在谋求避免同一方的矛盾之时又同另一方产生了纠纷。这个条约对于法国无异于晴天霹雳，特别是在脾气急躁、快人快语的詹姆斯·门罗被派往巴黎——为平衡杰伊出使伦敦——后，一直坚持说美国不会、而且鉴于公众舆论也不可能与英国达成妥协，从而助长了法国的不实之想。法国得知条约签订后很是恼怒，在得知条约获得批准后更是惊讶不已，它指责华盛顿政府背叛了共和主义事业。法国开

① 路透：《考验和胜利》，第 217 页。

始大规模地打击美国的贸易，以致法国的捕获物很快就超过了英国先前的所作所为。人们常常为从此开始的贸易禁运而指责《杰伊条约》。

他们只说对了一半。大多数法国人都认为，特别是现在作为共和国的法国，有权期望得到美国的支持，至少是类似于1775—1778年间的韦尔让政策的善意中立。18世纪90年代，国内动荡引发了法国政府的频繁更迭，各个政府的对美策略均不相同，但哪个政府都会对英美的永远不和心满意足。巴黎政府根本不相信一个忘恩负义、毫无原则的政权能够代表美国人民。最后，它们实际上忽视了横跨大西洋向3000英里以外投送兵力的困难，而是认为美国会像荷兰和意大利各邦一样在法国的实力面前俯首称臣。门罗的传记作者哈里·安蒙写道，1795年上台的多个执政共治的督政府，其政策不过是"基于恼怒、无知以及在判断美国贸易重要性上的无能"。[1] 我们也可以大致同样地评判督政府的那些前任，但是，把恼怒转化成除了战争以外的政策的任务，却落到了督政府的身上。

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督政府也希望华盛顿第三次竞选连任。门罗很有把握地告诉他们说，由于杰伊的卑躬屈膝，华盛顿可能会失败。法国人决心让华盛顿的失败成为现实。为扫清行动障碍，督政府废除了1778年条约，同时还断绝了外交关系。1796年8月，它命令驻费城公使皮埃尔·阿德发表声明说，即将到来的大选要在友谊与争吵——可能是战争——之间做出选择。这位公使写道："华盛顿必须下台。"

大国尤其在进行意识形态征服时，常常干涉弱国的内政。但是，堪与法国1796年行动相比的情况，寥寥无几。当时，在远隔重洋、没有发出进攻威胁的情况下，它公然要求一个民族对外

① 哈里·安蒙：《詹姆斯·门罗》（纽约，1971年），第146页。

国的旨意惟命是从。正如共和党人在读到阿德声明时所看到的情形那样，督政府的傲慢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从而使得其政策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1796 年 9 月，就在阿德的鼓噪见诸报端之前，华盛顿总统实际上早有预见，因此抓住时机发表了告别演说。尽管言辞上笼统空泛，甚至带有哲学腔调，尽管华盛顿仍坦言厌恶党派，但是，演说的明确意图，在于影响即将发生的总统选举。在那段最令人难忘的话中，总统宣称说，“我们真正的政策，就是避免永久的同盟。”显而易见，这意味着共和党人所希望维持的 1778 年同盟已经过时了。总统指出：“应当消除对个别国家的由来已久的、根深蒂固的反感和对其他国家的强烈的好感，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为对付外国势力的阴谋诡计，……一个自由的民族应当时刻保持着警惕之心。”总而言之，这显然是在呼吁选举人拒绝共和党，公然蔑视法国。

约翰·亚当斯这位接替华盛顿的联邦党候选人，以三张选举人票的微弱优势获得总统职位。他对这次侥幸获胜耿耿于怀，而他从未对督政府的无心帮忙有所感激，连他那个失败的对手杰斐逊都承认说，论资历亚当斯应该担任这个职务。法国领导人本应懂得，成长中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最危险的挑战对象，但许多人不懂得这一点。1797 年初，就在亚当斯宣誓就职之际，他们开始打击美国的商业。巴黎相信，美国会被迫作出让步，从而扭转《杰伊条约》以来的政策趋势。

尽管两国之间存在着危险不堪的紧张关系，或许正因为这一点，亚当斯总统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谋求通过外交途径找到解决办法。他考虑派遣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迪逊参加一个三人代表团出使法国——这几乎引起联邦党高层陷入瘫痪，但麦迪逊婉言拒绝了。最后，他选择的三个人是弗吉尼亚的联邦党人、未来的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亚当斯的朋友埃尔布里奇·格里，一

个受到普遍怀疑的政治独立派；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那位成功地同西班牙达成协议的谈判代表的哥哥，巴黎先前曾拒绝接受他接替门罗。亚当斯指示他们甚至要拒绝讨论美英条约，而是谋求对此前 12 个月被法国捕获的 300 多艘商船进行赔偿。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历史学家评论道："在法国人看来，美国人得到的多，付出的少。"[①] 美国人付出的东西微不足道，他们要法国重新考虑是否接受美国的那种不同于韦尔让的中立观。

这种可能性对五人执政内阁并没有什么吸引力。理论上，他们，特别是其下属外交部长塔列朗，希望与美国达成和平，但必须根据法国的条件达成和平。他们不同意解决中立国船只劫掠问题，他们更不想让共和党知道，只要《杰伊条约》仍然有效，对美国贸易的打击就不会停止。（塔列朗在这一点不是很坚决，但他并没有强烈要求改变政策。）此外，他们还传话给美国特使说：就像那些处在法国势力范围内的小国一样，如果美国要就侮辱事件进行谈判，就得给钱。一位代理人告诉美国人说："你们必须给钱，给一大笔钱。"据说，平克尼回答道："宁为国防花百万，绝不进贡纳一分。"但事实上，每一位美国代表都在准备行贿，条件是法国在谈判期间停止捕获船只。对于这个互惠建议，督政府并不想考虑。1798 年 4 月，马歇尔和平克尼中断使命，格里则一直呆到 7 月，继续同塔列朗进行谈判，而这个人根本就无意达成协议。这位法国外长认为："目前的半敌半友的处境对我们有益无害。"

亚当斯向国会隐瞒了最初与索贿者进行谈判的报告，但到了 3 月，他警告议员们说，谈判前景不妙。愚蠢的共和党人认为总统隐瞒了好消息。4 月，他们与那些在意图上南辕北辙的联邦党人一起，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亚当斯呈交所有从巴黎发回的报

① 亚历山大·德康德：《准战争》（纽约，1966 年），第 45 页。

告。总统颇为负责地对文件进行了编辑，删除了三个法国代理人奥廷格先生、贝拉梅先生和奥特瓦尔先生的名字，而代之以X、Y、Z，从而暴露了勒索企图。国会投票决定将文件公布于众。

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政治风暴。生平第一次真正得到拥护的亚当斯，对剧院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因为他要在那里接受观众的阵阵掌声。英国公使夫人在一次演出结束后写道："剧场里是一片前所未有的吵闹声，《总统进行曲》（霍普金斯的《哥伦比亚万岁》）反复演奏，人们又唱又跳。楼上有几个可怜的家伙要求演奏《一切都会好起来》（法国国歌），有人就威胁要把他们扔到楼下票价较高的座位上去。"在国会秋季选举中，联邦党几乎只凭这一点，就稳稳地控制住了众议院。

准战争与《莫特枫丹条约》

XYZ事件引发了两年多的不宣而战的有限战争。国会授权捕获法国战舰和商船而不是非武装的商人，停止了对法国及其殖民地的一切贸易。国会还宣布废除1778年条约，理由是法国没有忠实地履行条约。在采取上述报复行动以前，法国对美国商业进行了沉重打击，并一直持续到1800年。总计有830艘船只成为法国战舰和私掠船的牺牲品，这在加勒比海地区尤其突出，尽管在美英海军为两国商船进行护航之后，遭捕船只有所减少。英法还对法属殖民地圣多明各的反叛运动采取了共同政策。美国方面俘获了8艘法国武装船只。可能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会爆发一场全面战争，不管他们是否想要开战。

虽然亚当斯两次起草战争咨文，但他在武装全国方面只采取了谨慎措施，包括提出一项规模不大的海军建设计划，组织而不是征召了一支地面部队。在没有行政压力的情况下，联邦党高层核心分别在1798年7月和12月两次投票反对开战。众议院也两

次以绝对多数否决了未得到行政当局支持的、旨在捕获包括武装船只在内所有法国船的提案。要是真的采取这些措施，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其后果将是法国宣战。像亚当斯一样，几乎整个国家，甚至大多数联邦党人，都只赞成汉密尔顿所大加称许的“缓和的敌对政策”。到 1798 年末汉密尔顿转而采取更好战的立场时，亚当斯评论说：“要么是这个人完全疯了，要么我完全疯了。”他尽可能迅速地但小心翼翼地转向和平。

主要是由于大西洋彼岸的巨大怒火，法国第一次采取了认真态度，因而在 XYZ 事件曝光后几乎立即改变了政策方向。最初的措施是间接的和模棱两可的。大部分内阁成员都想反对这些措施，他们是汉密尔顿的门徒，是亚当斯从华盛顿政府那里继承过来的。总统拒绝了这些人的意见，1793 年初，他任命了一个出使法国的三人代表团，该代表团的真正赴任，取决于巴黎方面作出善待美国外交代表的保证。随后出现了耽搁。亚当斯到马萨诸塞度假，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则以不充分为由拒绝了塔列朗作出的保证。最后到了 10 月，总统回到临时首都特伦顿（政府由于爆发黄热病而被迫迁出费城），推翻了下属的决定，下令代表团启程。实际上，谈判到 1800 年 4 月才开始。

其中一位特使是首席大法官奥利弗·埃尔斯沃思，因为正如杰伊的任命所表明的那样，政府认为法官没有理由只出入法庭。另外两位代表是威廉·R. 戴维和威廉·万斯·默里，前者是北卡罗来那的政治家，后者是一位在欧洲工作时曾经首次接触过亚当斯的外交官。他们得到的指令，是确保法国对捕获船只进行赔偿，结束 1778 年条约，尤其要在法属西印度群岛问题上获得保证。塔列朗指出，一方面试图废除 1778 年条约，另一方面又主要根据捕获行为违反了上述条约为由谋求对损失进行赔偿，是不合逻辑的。总之，他说道，美国人必须在索取赔偿和废除条约之间作出取舍，而不能两者兼得。

美国人因为无从选择，故而于1800年10月在巴黎西郊的一个庄园签订了以该庄园命名的《莫特枫丹条约》。该条约除了通过结束对峙和恢复贸易从而“缓解了全面战争的危险”[①] 之外，并无其他建树。但该条约确认了一段时间以来已经明朗的事实，即法国放弃了控制美国政策的傲慢企图，更为具体的是，它放弃了驱使美国与英国作对的企图。

俟后，在1801年，经过错综复杂的谈判，法国同意废除1778年条约，条件是美国政府必须支付美国船主提出的赔偿要求。这些赔偿最终共计达2000万美元，而这就是美国为取消那个曾为美国赢得独立的联盟而付出的代价。玩世不恭者可能会说，美国哪一届政府永远都不可能为拯救法属西印度群岛而打仗。不管怎么说，2000万美元使得这个问题值得讨论，因为这笔钱比后来购买路易斯安那的费用还要多。

亚当斯真是时运不济。他在下令代表团出使巴黎时十分清楚，联邦党内的激进分子将会惊恐万分。他们的反对越来越激烈，1800年5月，他要求包括皮克林在内的其中两名内阁成员辞职。当国务卿抗议说他舍不得放弃3500美元的年薪时，亚当斯只好将他解职。总统的厄运在于，他因为同意举行谈判而失去了许多联邦党领袖的支持，而由于谈判耗时太长，他又没能争取到其他选票。《莫特枫丹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美国时，选举团成员已经出炉。总统遥遥领先于在众议院丢掉了40个席位的联邦党国会议员候选人，但杰斐逊还是打败了他。选票差额很小——在汉密尔顿背叛投敌的纽约以外的地区，亚当斯得到的选举人票比在1796年还要多——因此，如果早点儿签订条约的话，他至少有可能再次获得总统宝座。

① 德康德：《准战争》，第253页。

、联邦党人的记录

1789年至1801年通常被称为联邦党时代。至少在外交方面，这个说法多多少少属于用词不当：华盛顿的外交政策要到1794年才能贴上党派标签。他的第一届内阁中既有汉密尔顿，又有杰斐逊。不久，俩人对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产生分歧，双方的水火不容几乎随即扩大到外交方面，但总统并未一成不变地对汉密尔顿言听计从，如同他在国内问题上那样。

> 例如在共和国成立初期，经华盛顿同意，杰斐逊试图获得英国的贸易让步，因此扬言美国要采取经济报复。汉密尔顿不同意这项政策，便暗中使坏，如把消息透露给英国代理人乔治·贝克威思，告诉贝克威思说商业报复不过是虚张声势，最后还篡改通过他在贝克威思和杰斐逊之间传递的那些信息。[1]

然而，在建国初期那些最重要的问题上，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意见一致：他们赞成并推动创建了1795年公开提出的、具有美国特色的新的中立方式。在这个方面，尽管两位部长在策略上有着严重分歧，但在政策层面上，还不曾出现什么“联邦党的”对外政策，而只有一项全国性的政策。

1793年底杰斐逊辞职后，联邦党人得势。杰斐逊的继任者埃德蒙·伦道夫，在观点上与杰斐逊如出一辙，在内阁中经常受到压制。在内阁中，华盛顿通过研究讨论解决政策问题，但总统也拒绝那些最极端的联邦党人提出的建议。1795年夏，由于英

[1] 后来，在杰伊出使国外时，汉密尔顿同样也有轻率或不忠之举。他告诉英国公使乔治·哈蒙德说，美国不会与中立国家一直采取共同行动对英国的行为提出抗议，从而至少使美国方面失去一个理论上的威胁手段。

国人和联邦党人策划的一场拙劣阴谋，伦道夫被迫下台。英国截获了一些法国文件，并将其交给一名联邦党内阁成员[1]，这些文件被翻译成或故意翻译成这样一种文字，以致在呈报给总统时，他们促使华盛顿相信，伦道夫正领受法国的佣金。华盛顿要求伦道夫辞职。更重要的是，他正式批准《杰伊条约》，由于在中立国贸易问题上再次同英国产生矛盾，他曾经搁置了对条约的批准。

寻找一个接替伦道夫的人并不容易。在至少有五个人拒不受命的情况下，汉密尔顿写信给华盛顿说："一流的人找不到了，二流的人则要考虑其良好性格和无可指摘的高贵品质。"最终，这个人就是蒂莫西·皮克林，一个意见顽强的北方人和汉密尔顿的追随者。皮克林对华盛顿忠心耿耿，但在亚当斯执政期间，他和内阁里的汉密尔顿的其他门徒常常与总统闹别扭，因为亚当斯并不像他们那样急于同法国争吵。1800 年，亚当斯借机将皮克林一脚踢开。事实上，他是可以早点这样做的。

因此，联邦党时代的标志，并不是政府内部保持着完全一致，不和谐之音处处可闻。但是，两位总统都控制着大局，他们没有采纳极端派的建议，从而创下了应该得到高分的记录，这个得分高于共和党所承认的或一些历史学家所打出的分数。

这个时期，新生的共和国立足未稳，重大的举措都是为了巩固独立地位。英国撤出五大湖以南的军事要塞以及西班牙根据《平克尼条约》放弃对南部的权益后，美国加强了对西部地区的控制。这个时期，美法同盟宣告终结，这也许是一个对那个曾经在美国革命过程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国家的忘恩负义行为，但它更是一种符合国家利益的行为。

最重要的是，联邦党总统们都在危险时刻让美国远离了战

---

[1] 指联邦党极端派人物、陆军部长蒂莫西·皮克林。——译者

争。与英法两国的战争几乎就在眼前。在两种情形下，欧洲各国政府的缓和政策是维持和平的重要因素，但华盛顿和亚当斯却也功绩非凡。事实上，他们始终坚持着远离欧洲战争的决心，这个在1793年公开宣布的决心，对国家的未来前途显然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多年后，亚当斯理直气壮而又充满自豪地写道："我只希望在我的墓碑上铭刻着，'约翰·亚当斯安葬于此，他在1800年履行了同法国媾和的职责'。"

当然，《中立宣言》本身标志着退出美法联系，而联邦党人则推行了一种在今天可称为亲英"倾向"的政策。但无论是华盛顿还是亚当斯，主要都不是受情感所驱动的，虽然两个人都对法国大革命的过激行为深表惋惜。亚当斯尤其痛恨英国人，在与法国的不宣而战的战争期间，这种感情更使他下定决心躲开英国的笼络，但同时又为有限目标而进行合作。大体上说，两位总统作出了简单而又正确的判断，即美国无力开战，特别是向英国开战。在他们看来，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应该对英国的肆意侮辱忍气吞声。亚当斯为此失去了汉密尔顿的追随者的支持，但与此同时，他和他的前任也疏远了杰斐逊派。1800年，亚当斯深深明白，中间路线有时会疏远那个由水火不容的派别所组成的大多数。然而，他和华盛顿都为国家尽到了职责。

第五章 杰斐逊和麦迪逊：充满恐惧和希望的外交

1800年选举打断了联邦党人的执政，迎来了共和党人长达1/4世纪的统治。1801年3月，托马斯·杰斐逊出任总统。1809年，他将总统职位移交给他那个最亲密的搭档，而麦迪逊又在1817年把这个职位传给了詹姆斯·门罗。除最初几年外，在“弗杰尼亚王朝”统治的整个时期，与杰斐逊宣誓就职时所抱的希望完全相反的是，对外政策问题一直居于支配地位。杰斐逊通过获取路易斯安那地区而扩大了国家领土，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在其他方面，他和麦迪逊却屡屡受挫。他们在外交上笨手笨脚，致使国家蒙羞受辱，后来又同英国打了一场战争；若不是碰得好运，这场战争很可能就毁了联邦国家。这俩人离开白宫时，都声名不佳；他们长期享有美名，只不过是由于其更早的成就。

杰斐逊、麦迪逊和世界

两个人最大的失败，在于他们不能理解人们在战争时期的心理。杰斐逊对于美国在欧洲交战国那里受到的待遇感到灰心丧气，对于这些国家没有像他所认为的那样理智地对待他的抱怨和威胁感到怒气冲天，大骂他们愚蠢无知甚至精神失常。他在1808年写道：“我认为欧洲是一个大疯人院。”麦迪逊也没有多少不同之处。他的传记作者写道：“麦迪逊总统要想在外交战略

上获得成功，就必须与那些和他有着同等判断力的人打交道。”[①]他似乎想要宽恕这位领导人的败绩。这正是问题之所在：两个人都没有认识到“判断力”往往是受战争影响的其中一个首要因素，而愚笨迟钝正是他们的一大过错。

不可思议的是，作为总统，杰斐逊既抱有理想主义乃至乌托邦主义的态度，又利用了玩世不恭的手法。无论在私下还是公开场合，他都反复强调共和党的信条——限制政府权力、严格解释宪法、防止寡头政治、保护人权。虽然他有时担心美国人民面临着被追逐金钱之风所腐蚀的危险，但他仍然认为美国几乎是世界上惟一拥有各种美德的地方。

不过，杰斐逊绝不会允许共和党的原则去干涉他所理解的国家利益诉求。他完成了路易斯安那购买案，尽管他认为这样做有违宪法。为了强制推行旨在禁止出口的《禁运法》，他把政府权力扩大到甚至其联邦党前任想都不曾想过的地步。他原则上是一个孤立主义者，但却两次考虑同英国结盟。他虽然反对发展贸易（农产品出口除外），但却鼓励政府充当船主和商人的保护人，甚至那些纯粹从事外国商品买卖的船主和商人也在保护之列。

杰斐逊致力于总统职务的民主化。他曾穿着拖鞋和睡袍接见一位英国公使。在就餐方面，他发明了“随意”制度，也就是说，每当宣布就餐时，客人们可以随便选择位置就座。他改变了华盛顿和亚当斯的政策，拒绝亲临国会。然而，尽管面临着共和党宗派主义分子的抵制和联邦党的日益衰落，杰斐逊还是有效地控制着国会，或者说得准确些，有效地控制着一个足以成事的共和党多数。华盛顿和亚当斯自认为是超脱于政党之上，而他却不一样，他把自己看做是政党领袖。他宁愿私下地发挥影响——他

① 欧文·布兰特：《詹姆斯·麦迪逊总统》（印第安纳波利斯，1956年版），第483页。

这样做非常有效——而不愿公开承担领导职责。令人遗憾的是，在他任职的最后几个月里，尽管国家急需领导，他却无所作为，以致立法机关摇摆不定，毫无方向。

与杰斐逊一样，麦迪逊对于他所设想的国家大政方针了然于胸；在同外国打交道时，他能做到坚定有力，甚至不计后果。但他那些最忠实的支持者并不认为这位总统是一个正常的领导人。在1811—1812年国会期间，他拒绝领导国家的态度，惹怒了那些同他一样认为美英之战不可避免的国会议员。杰斐逊曾经不停地推动国会向前，而麦迪逊通常是明显地无动于衷。从来没有哪一个总统像他这样，将聪明才智、个人自信和公开无所作为集于一身。

杰斐逊和麦迪逊都不是拘泥于空谈理论的和平主义者，虽然俩人都在千方百计地为美国争取和平。杰斐逊自称，他认为战争不过是一个数学问题："当和平的代价大于战争时，基于数钱的原则，我们宁愿选择后者。"实际上，同麦迪逊以及全国老百姓一样，他不仅在荣誉问题上做出了反应，而且就经济问题采取了行动。在忍受了长达7年的侮辱之后，两位共和党领导人——杰斐逊在蒙蒂塞洛过着退休生活而麦迪逊执掌着白宫——才极不情愿地得出了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

杰斐逊在1801年出任总统时，肯定没有预料到这些。这年11月欧洲达成的一项停战协议，暂时搁置了中立权问题；从一开始起，新政府关心的主要问题，是的黎波里人对美国商业的攻击。只是在使用了军事力量，并且为解救被扣押的美国船员支付了6万美元的赎金之后，杰斐逊才得以在1815年解决了这个问

题，至少是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①] 不过，在此之前，他取得了一次更大的胜利，那就是获得了路易斯安那。

路易斯安那购买案

早在杰斐逊成为总统之前，许多美国人和富有远见的西班牙人就意识到，路易斯安那这块由西班牙在美国革命结束之际从法国那里得到的领土，孤立无援，虚弱难保。在这个从新奥尔良一直延伸到加拿大的广阔无垠的三角地带，西班牙定居者寥寥无几，法国居民的忠诚度值得怀疑，而印第安人则令人头痛。马德里无力派兵守卫这块领土，1796 年，只有 1400 人的一个团驻守在这里。真正的问题不是西班牙是否会失去路易斯安那，而是什么时候失去路易斯安那。1803 年，时机到来了，杰斐逊碰到了好运。

1800 年，西班牙意识到路易斯安那难以保全，就秘密地将其还给法国，以此换取了意大利的一个邦国。很快，关于这个协议的传言不胫而走，人们误以为协议还包括佛罗里达的转让。英国外交大臣提醒美国公使说，英国可能会采取行动抢先占领该地区。鲁弗斯·金，一个经杰斐逊提名而继续任职的联邦党人，对此回答道："我只得借用孟德斯鸠的话说，'上帝允许土耳其人和西班牙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对各个贸易大国来说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因为在所有国家当中，让这两个国家拥有庞大而无足轻重的帝国，再合适不过了。'"但是，他接着说："我们决不愿意

① 这只是那个持续不断的问题中的一个小插曲。1787 年邦联政府曾花钱买得摩洛哥不再袭击美国船队的保证，华盛顿和亚当斯向阿尔及利亚、的黎波里和突尼斯支付过贡金。在 1812 年战争结束后的 1816 年，（美国）一支海军中队迫使阿尔及利亚、的黎波里和突尼斯终止了对美国商业的海盗攻击，这一次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问题。

看到（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转让给别人，除非是转让给我们自己。”这就预示了门罗主义所隐含的不得转让原则。美国宣称对这个半球拥有特权，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它愿意，它就可以行使这种权利；其他国家的扩张是不能容许的。

然而，正如金援引孟德斯鸠的话所表明的，美国人当时最关心的还是贸易。根据《平克尼条约》，美国人不仅有权使用密西西比河，而且有权在新奥尔良港免费卸运货物并将其驳运到远洋船只上。当他们得知该地区计划还给法国时，杰斐逊政府所关心的首要问题，就是上述这些权利了。

1802 年临近结束之际，华盛顿方面得到消息说，新奥尔良港的货物存放权已被中止。美国人误认为这是西班牙人在把领土交给法国之前所采取的准备行动，也许他们认为是波拿巴下令这样做的（实际上，西班牙人自己采取了行动，这不仅是由于美国人通过新奥尔良港进行走私，而且还在于西班牙想使美法两国鹬蚌相争）。西部人大声疾呼道，商业的自由通行至关重要；他们还威胁要使用武力，即使得不到政府同意。总统做出了反应，采用了一个明确但却有效的策略，向法国派遣了一名特使，这主要是为了争取时间，让“那些被重商主义的、一般而言是联邦党的利益所挑起来的新奥尔良事件搅得头脑发热的西部人”冷静下来。1803 年，担任特使的詹姆斯·门罗启程前往巴黎。为了筹集费用，门罗只得从他的上司那里借钱，把银器变卖给了国务卿麦迪逊。

可以说，作为交换，国务卿给了他两道训令。这些训令表明，麦迪逊及其上司完完全全一样，是目光短浅和十足的鲁莽之辈。与许多美国人一样，尤其是与其他共和党人一样，杰斐逊和麦迪逊都相信美国社会的未来有赖于扩张，但两个人当时都未曾想到要兼并整个路易斯安那地区，而是认为可以等到现有领土住满居民之后再进行扩张。因此，第一项训令指示门罗和驻巴黎公

使罗伯特·利文斯顿设法仅仅购买新奥尔良和尽可能买到的佛罗里达地区，“法国可以继续保留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整块领土”。这项训令甚至指示门罗和利文斯顿说，他们在必要时可以满足于恢复平克尼原先所做的安排。杰斐逊和麦迪逊真正想做的，只不过是想保持密西西比河出海口的开放，或许包括开放西佛罗里达境内的其他出海口。他们的目的是有限的，而且仅限于商业方面。

不过，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们准备诉诸战争，甚至同英国结盟向法国开战。从1802年初起，作为诱使波拿巴放弃其野心之行动的组成部分，杰斐逊发出警告说，法国占领新奥尔良将会把美国推向英国的怀抱。他在一封旨在引起法国人注意的著名信件中写道：“从那时起，我们就必须同英国及其舰队联为一体。”总统并不想结盟，他只是希望波拿巴做出让步，特别是在欧洲停战局面岌岌可危的形势下。但到了4月，他和内阁却一致认为，如果法国一心想要开战，或“已经制定了迫使美国采取敌对行动的计划”，门罗和利文斯顿就应该着手与英国进行结盟谈判，允许他们甚至不同法国单独媾和。麦迪逊的训令指出，如果法国一心想要关闭密西西比河，“你们的谈判……就得以战争不可避免作为依据。”

接近英国的计划愚不可及，毫无道理，因为英国自身的利益就足以制止法国的野心。实际上，英国正计划进行一场针对新奥尔良的远征行动，新奥尔兰将移交给美国，而美国无需作出补偿。但是，杰斐逊的计划表明，即使连共和党人都准备同英国携手合作，更重要的是，虽然孤立主义可能被视为是一种理想状态，但它还没有成为教条。国务卿麦迪逊曾经写道：“英国的合作即将带来的好处……太明显了，也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视而不见。”每当危险来临或好处唾手可得之时，孤立主义也就寿终正寝了。

事态的发展不仅超出了杰斐逊的预料，而且在过后给他带来

了意外的、甚至未曾追逐过的名声。在1803年的最初几个月，波拿巴放弃了他那个美洲帝国的梦想。这个当时自封的第一执政，一直把圣多明各和路易斯安那联系在一起，在他的帝国计划中，前者用蔗糖带来财富，后者则是一个大粮仓。圣多明各人在波拿巴所说的“有钱的非洲佬”领导下，长期以来一直在反抗着法国的统治。他的军队根本无法取胜，一支增援的远征军又遭遇冰冻而困在荷兰港口。[①] 至于路易斯安那，美国人对中止货物存放权反应激烈，杰斐逊则毫不含糊地暗示要接近英国，这些都向他表明，同华盛顿达成协议会有多么困难。

最大的问题还是欧洲形势。1801年停战协议使得第一执政把目光转向了大西洋彼岸。如果这次停战演变成真正的和平，波拿巴就可以继续向那些他所认为的劣等人——黑人和美国人——提出挑战。对他来说颇为不幸的是，主要是因为他急于统治欧洲，停战宣告结束。1803年3月，在利文斯顿和其他外交官所目睹的一个精心设计的场合下，第一执政向英国大使提出了挑战。人们知道战争就要爆发了。

问题终于迎刃而解。4月，波拿巴下令同美国达成协议：“我放弃路易斯安那。我要割让的不仅仅是新奥尔良，整个殖民地都要毫无保留地让出去。”利文斯顿虽然无权购买，但在门罗抵达巴黎并分享荣誉之前，他还是竭尽全力达成协议。据英国大使报告，“美国是第一个从我们与法国政府的谈判中得到好处的国家，结果是门罗先生发现了分歧，这导致他几乎改变了自己的使命。”1803年5月初，为得到路易斯安那，利文斯顿和门罗同意支付大约1500万美元的现金和贷款。这次兼并使美国的领土

---

① 杰斐逊在1801年上台执政时，倾向于支持法国在圣多明各的行动。他担心，如果黑人取得成功，革命的毒瘤就会传播到美国。麦迪逊则持有截然不同的、更加明智的看法：法国巩固在西半球的权力可能对美国构成危险。

规模扩大了一倍以上，与共和党时代的任何其他事件相比，它使美国走上了通往世界强国的道路。

杰斐逊陷入了良心斗争，但在决定接受这份大礼之前，他很快就战胜了自我。他认为，宪法的任何条款都未曾赋予联邦政府有权“占据外国领土，更不用说将其并入联邦了”。照此推理，这笔交易就是“一次违背宪法的行动”。难道共和党严格解释宪法的原则不会要求他制定一项修正案吗？在麦迪逊的劝说下，他决定不采取行动。他从以下说法中找到了安慰：“如果宪法有什么不良后果的话，我国的良知会纠正它的弊端。”他给他的首席助手写信说：“我认为，关于宪法原则，我们说得越少……越好；在有必要超越这些原则时，我们必须悄悄地去做。”共和党的原则原来不过如此！

国会没有考虑提出一项修正案，在克服了那些认为新领土将会成为共和党禁脔的联邦党人的反对之后，批准了协议。1803年12月20日，在西班牙当局将其控制权移交给法国四个星期之后，美国国旗在新奥尔良上空高高升起。

可以理解的是，西班牙指责美国人“拿偷来的财产作交易”。[①] 第一执政得到了路易斯安那，但并没有信守交易，他违背了不把该地区卖给第三方的誓言。这没有引起美国人的不安。

这也没有阻止美国人谋取更多的领土。路易斯安那与西佛罗里达之间的边界存在着争议，这个问题在西班牙同时占有两个地区时无关紧要，而一旦美国控制了路易斯安那，争端就会伺机而起。杰斐逊和麦迪逊竭力迫使西班牙接受他们那个扩张性的边界概念，甚至企图利用这个争端牟取整个佛罗里达地区。他们试图行贿，并为此筹到了一笔秘密拨款。他们利用威胁恫吓，又一次

① 亚历山大·德康德：《路易斯安那事件》（纽约，1976年版），第199页。

考虑同英国结盟。他们在西佛罗里达的一个很小的地方煽动分裂叛乱，然后将其兼并。在1812年战争期间，他们占领了更多地盘。他们还策划了一个奇怪的计划，想通过半叛乱半侵略的形式进入东佛罗里达，但后来又放弃这个计划。但是，杰斐逊"对佛罗里达的迷恋"，[①] 直到1819年门罗政府买到这块领土时才告终了。

针对美国商业的战争

战争的再度爆发（为美国）赢得了路易斯安那，但杰斐逊和麦迪逊所面临的挑战，却远甚于华盛顿和亚当斯。在一个强权的时代，他们追求着抽象的权利，而且只利用——说得准确些，是误用——经济战的手段。不管是抽象权利还是经济手段，都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到头来，物质损失与精神屈辱交相作用，终于导致了1812年美英战争。

从1805起，英国开始对美国商业实施更加严厉的控制，其程度之深，远甚于战争初期。首先遭到打击的是转口贸易。在这年5月的"埃塞克斯号"案件中，英国法官威廉·格兰特爵士裁定，这艘装运红酒、从巴塞罗那驶往哈瓦那的被截船只，尽管曾在途中停靠过美国港口，但从事的却是西班牙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格兰特裁决说，既然西班牙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在战前并未向美国船只开放，那么它就在《1756年战争法规》的禁止之列。"埃塞克斯号"原则在不加警告的情况下加以运用，导致数十艘从事英国先前曾经容忍的那种贸易的船只先后遭到捕押，结果引起美国舆论一片哗然。

---

① 小诺贝尔·E. 坎宁厄姆：《追求理性》（巴顿鲁依，1987年版），第316页。

更糟糕的还在后头。1806 年，英国外交大臣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宣布对布雷斯特河至易北河之间的整个欧洲北部海岸实行封锁。这种封锁显然不可能以当代国际法所要求的方式加以实施，不可能通过在被宣布封锁的各个港口附近驻扎军队的手段加以实施。美国人提出了强烈抗议。第二年，在 1807 年 11 月的枢密院敕令——这是英国最主要的一项敕令——中，新一届政府禁止所有与法国及其卫星国（西印度洋群岛在 1809 年之前不在禁止之列）之间的贸易，那些经过英国港口并向英王缴纳关税的贸易除外。海军史学家艾尔弗雷德·T. 马汉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的征税"直截了当地、毫不掩饰地恢复起殖民制度"。[①] 11 月敕令虽然有点晦涩难懂，但首相斯宾塞·珀西瓦尔还是颇为准确地概括出了其中的含义。他说："如果你们（指法国）失去了我们的贸易，只要我们有办法，你们就将一无所获。至于你们凭借自身之力从事尽可能多的贸易，或者其他人通过我们同你们开展贸易，如果你们承认的话，你们就得为此（向我们）付出代价。"为了强制执行名目繁多的敕令，皇家海军在大洋上到处搜捕船只，以致几年之内，在那些从美国港口起航的船只中，每 9 艘中就有 2 艘遭到捕获。

拿破仑也如法炮制，尽管其弱小的海上力量意味着他的敕令通常只能针对那些不慎闯入法国港口的船只，或是针对那些他所控制的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船只。通过 1806 和 1807 年的《柏林敕令》和《米兰敕令》（他颁布敕令的这两个城市可以说明拿破仑帝国的范围），他将英国商船和货物从他所控制的港口中排挤了出去，并下令没收那些屈从于英国规定或自动接受皇家海军搜查的中立国船只。虽然英国人和法国人都经常放松对各自法令的实

---

① 艾尔弗雷德·T. 马汉：《海权及其与 1812 年战争的关系》（两卷本，波士顿，1905 年版），第 1 卷，第 178 页。

施，但在理论上，他们却联合起来剥夺了美国与英法两大帝国之间的所有贸易。难怪约翰·昆西·亚当斯有一次抱怨说，这两个相互对立的制度[1]"冲击了我国独立的根基"。

这些制度与后来实施的制度——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实施的制度——相比，只不过在表面上相似。没有哪个交战国试图完全剥夺敌国的抵抗手段，甚或持续不断地企图以饥饿迫其就范。美国的绝大多数出口贸易，甚至转口贸易，都是只能间接用于战争的物资，主要是棉花和蔗糖。这与20世纪的情形不能同日而语，其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和工业国，美国输出的商品确实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在拿破仑时代，交战国对于利润流向的关注，远甚于商品流通。每一方都依据重商主义原则行事，都力图吸干对手的硬通货，从而使其破产。

因此，法国皇帝不遗余力地要把英国商品挤出大陆，但在物价高涨时，他又常常鼓励对英国的销售，比如在英国出现食品短缺时就是如此。英国方面则力图扩大对欧洲的出口，甚至出售军需物资——当然是不重要的物资——供西班牙的拿破仑军队使用。两国都打击中立国贸易，因为这些贸易不是威胁要取代本国贸易，就是为敌国贸易提供了掩护。在1805年发表的、标志着英国（海上封锁）制度出台的《伪装的战争还是中立国旗帜的阴谋》小册子中，英国海军部律师兼法官詹姆斯·斯蒂芬抨击了中立国贸易，说它是"支撑法国野心、延长欧洲苦难的收入渠道"。以此来说明法国的观点，倒也恰如其分。

尽管有数百艘商船为英法双方所捕获，但贸易依然兴旺繁荣，只有在美国人限制本国的贸易时不是这样。海风经常把封锁的军舰吹离停泊点，商人和船主们都变得善于伪装和欺瞒了，欧洲也总会有中立国或违背拿破仑旨意的卫星国向美国人开放港

① 分别指英法两国的海上封锁制度和大陆封锁制度。——译者

口。此外，由于经济政策方面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向敌国强制推销商品，两国都放松了规定，其代价是，针对每一次运输或每一种货物颁发了数以万计的特许状，从而取消了上述规定。（小亚当斯抱怨说，这就使拿破仑的大陆制度“差不多成了以禁运为名目的敲诈勒索”。）这种损人利己的自私行为加剧了美国人的愤怒，但其自动放弃封锁的做法倒也缓解了经济压力。总之，尽管美国商业在交战国那里蒙受了损失，尽管其封锁制度阻挠了美国商业的进一步壮大，但美国贸易仍然能够兴旺发达。但是，两国都声称只有它们有权决定美国可以从事什么样的贸易，从而向美国的国家尊严乃至独立提出了挑战。

强征兵役

虽然英国所捕获的商船只是法国的2/3，但只有英国推行了强征兵役。战争期间，数千美国人被强迫到英国海军服役，虽然没人知道确切的总数（英国人承认超过3000人，但美国人却说超过6000人）。英国海军军官登上美国船只进行搜查，然后把那些他们认定是或自己承认是英国船员的人送去强制服役，时间往往长达数年，甚至直到他们死亡为止。除1806年的极短时期外，伦敦从未考虑过对他们那个被亚当斯斥为“得到授权的海上绑架制度”作出重大调整，因为朝着这个方向的任何步骤，都很有可能导致采取这个步骤的任何政府垮台。

人们可以理解英国面临的压力。皇家海军每年都需要1万名新兵。强征兵役这种传统做法似乎是个解决办法。英国从未宣称有权强制美国人，尽管海军军官们频频出错，而海军部也可能在若干年以后才能加以纠正。美国方面从未否认皇家海军有权强征停泊在英国港口的美国船只上的英国海员。伦敦也不曾宣称有权从美国军舰上带走英国人。1807年6月，对美国军舰“切萨皮

克号”的攻击，却是一次与常规命令背道而驰的行动。然而，英国不能容许数以千计的英国海员投靠外国船只从而逃避对英王的义务——财政部长加勒廷估计，在美国远洋船队的体格强壮的海员中，也许有一半是英国人。美国别出心裁的中立化主张，尤其是公民资格的获得速度，使得问题愈益棘手。像大多数国家那样，英国并不承认，一个人移民到另一国就摆脱了他对本国的责任，这样，有许多船员成了两国所说的本国公民。

联邦党政府在坚决反对公海强征兵役原则的同时，集中精力争取释放那些按照英国规定而被错误地强征兵役的美国公民。杰斐逊和麦迪逊却没有这样做。1807 年，他们确定，缔结一项旨在结束公海强征兵役的条约是任何其他协议的绝对必要条件，因此否决了威廉·平克尼和詹姆斯·门罗通过谈判缔结的一项范围广泛的条约，主要是因为该条约没有涉及强征兵役问题。这一年稍晚，在“切萨皮克号”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共和党领导人拒绝接受英国人准备给予的补偿。他们坚持，除非英国同意全盘放弃强征兵役，否则就不能达成任何协议。难怪连一位态度友善的传记作家都这样评论道：“人们不禁要问，杰斐逊是否十分清楚，外交同内政一样是一门探求可能性的艺术。”[①]

1808 年以后，杰斐逊和麦迪逊根本不提强征兵役问题了。到了 1811 年 11 月，麦迪逊在发表那篇旨在将国家引向战争道路的年度咨文时，列数了英国的种种恶行，但对绑架海员一事只字未提。急于发动战争的《奈尔斯纪事报》满腹牢骚地说，这种（强征兵役的）做法持续得如此长久，“以致人们对此事的自然而然的敏锐感受已经麻木了。……这是多么卑鄙多么拙劣啊！”它还忠告说：“这与我国的主权和独立权利是何等地南辕北辙啊！”

---

① 杜马·马隆：《杰斐逊总统——第二任期》（波士顿，1974 年版），第 403 页。

第一次失败：《门罗—平克尼条约》

1806年初，在杰斐逊的鼓动下，国会开始考虑同英国打一场经济战的可能性。共和党的一小部分人不愿意为了转口贸易这个“战争导火索”打仗。联邦党人则反对出于任何目的的贸易限制，特别是不同意针对英国的任何限制。在共和党主流派中，一部分人主张要全面禁止来自英国的进口，另一部分人——或许是反映了杰斐逊的观点，虽然他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则主张实施更严格的限制。4月，经过三个月的争论之后，国会通过了《禁止进口法》，杰斐逊即予签署。

共和党反对派领袖伦道夫并非不恰当地说，这项法律“是一个牛奶加水的法案，是一碗九个月以后才能喝得上的鸡汤”。该法律列出了禁止从英国进口的商品，但引人注目的是，它又把那些对英国出口商和美国进口商来说最重要的商品排除在外，并且在11月以前暂不实施该法律。[1] 总之，它只是一纸恫吓，而且还是一种极其温和的恫吓。尽管如此，共和党人还是希望它能够促使英国在11月之前改弦易辙，从而使得美国能够摆脱这一禁令可能带来的稍稍不安。

为了达成这样一项协议，杰斐逊和麦迪逊选择了当时的驻伦敦公使詹姆斯·门罗，并派遣前联邦党人威廉·平克尼前去协助。5月，麦迪逊准备好了训令，列出了一个名目繁多的要求清单，提出了许多近乎荒唐可笑的、令英国无法接受的条件。其中一个条件是杰斐逊所青睐的，它要求英国承认墨西哥湾为美国水域，并从该地区撤出皇家海军。只有两项条款是达成协议的绝对

---

① 该法律实施的时间非常短暂。1806年11月开始实施后曾多次中止，直到第二年11月又再度恢复执行。

条件：第一项是在某种程度上开放转口贸易，第二项是结束公海上的强征兵役。麦迪逊写道，“对此次谈判事件来说，某些适当的条件是如此地不可或缺，以致总统将其视为任何规定——以取消那个向英国制造商关闭美国市场的法律——的必要前提。”无论这个要求是多么地合情合理，英国予以满足的可能性却微乎其微。两年后，当上述训令公之于众后，杰斐逊的政敌们指责说，它们表明总统有意造成谈判无果而终。事实上，它们只不过说明共和党领袖错误地理解了现实情况，说明他们过分地相信了“那一碗鸡汤”。

较之英法长期战争中的其他任何一届政府，当时的英国政府更加开明，因此门罗和平克尼才能在很多问题上达成协议。他们重新恢复了《杰伊条约》中的商业条款，这些条款曾使美国航运业大受裨益。他们甚至在转口贸易问题上取得了成果。英国同意对“分段运输”采取容忍态度，条件是在货物经过美国港口时必须征收少许进口税。虽然同美国进行谈判的霍兰勋爵和奥克兰勋爵准备放弃公海强征兵役，但那个所谓的“天才”政府却采取了回避态度。英国谈判代表只得请求门罗和平克尼放弃这个议题。颇令他们惊讶的是，美国人竟然表示同意。作为安抚，他们得到了一份官方换文，霍兰和奥克兰恰如其分地说它是“模糊不清的但却是有着调和精神的”，因为它保证“在强征英国海员问题上遵循最大程度的克制”。在 1806 年最后一天，两国代表签订了他们自 8 月以来就开始谈判的那个条约。

在他的代表事先告知他们放弃强征兵役问题的意图时，杰斐逊业已决定不将条约送交参议院审议。对最后文本仔细审阅之后，他更加坚定了决心。根据条约的其中一项规定，美国不得实施贸易战，而这是杰斐逊在前后长达 10 年的时间内所青睐的外交武器。此外，得知拿破仑颁布《柏林敕令》的消息后，英国人给平克尼和门罗提出一项公开警告说，如果杰斐逊政府不能有效

抵制《柏林敕令》，英国政府可能会以一种对美国商业有害的方式进行报复。结果，1807年4月，在国会休会前的最后一天，杰斐逊对来访的一个参议院代表团说，他不想征求他们的意见，而是宁愿自己承担起否决条约的责任。他在给麦迪逊的一个短笺中写道："我们的最佳路线，就是让谈判友好地打个盹。"

杰斐逊的决定表明了联邦党人与共和党人的外交差距。与杰伊一样，门罗和平克尼没有能够实现许多重要目标。不过，这个条约保住了重要的商业利益，而更重要的是，门罗和平克尼与他们之前的杰伊一样，期望这个条约能够打开进一步和解的大门。然而，杰斐逊毫不犹豫地推翻了他们的所作所为，而联邦党人虽是不太情愿但却毅然决然地接受了《杰伊条约》。这样一来，这位弗杰尼亚人使"错失了重新达成18世纪90年代英美和解的机会，错失了用和平与繁荣来代替商业限制和（最终）战争的机会"。[1] 毫无疑问，杰斐逊和麦迪逊坚持维护美国权利的完整性，代表着国家的雄心壮志，但却没有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战略将其付诸实施。可以肯定的是，所谓"友好地打个盹"，既不可能长久，也不可能真正地安心。

"切萨皮克号"事件

英国驻美洲海军司令乔治·伯克利爵士很快就采取行动打断了睡眠。他一清二楚，美国海军经常招募英国海员，包括皇家海军的那些逃兵。在"切萨皮克号"快速帆船，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所说的"一张吸引逃兵和漂泊不定的英国海员的粘蝇纸"，[2] 船

---

① 唐纳德·R. 希基：《1812年战争》（伊利诺伊州乌尔班纳，1989年版），第16页。

② 安东尼·斯蒂尔：《"切萨皮克号"事件再探》，载《海军陆战队镜刊》第39期（1953年），第263页。

员中约有100名英国人。伯克利命令拦截“切萨皮克号”，并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拦截，以搜查逃兵。这样，1807年6月，当这艘快速帆船刚刚驶离诺福克美国领海时，即被英国战舰“豹号”拦截。在指挥官拒绝召集船员接受检查时，“豹号”向该船发射了3枚舷炮。在“豹号”突如其来的敌对行动逼得其投降后，一队人马登上甲板并带走了4名船员，其中有1人不久之后以开小差的罪名被吊死在哈利法克斯。

“切萨皮克号”事件触发了美国的抗议浪潮，甚至在联邦党地区也是如此。杰斐逊在多年以后写道：“‘切萨皮克号’事件将战争摆在我的面前。我只需打开大门，浩劫就会随之而来。”然而，尽管杰斐逊和全国人民一样义愤填膺，但他开始时的希望，并不是利用这件事把国家推向战争，而是促使英国出于对战争的恐惧做出让步。他在袭击事件发生后所采取的行动，着眼于推迟而不是加速危机。至少，他下令对皇家海军关闭美国港口，断绝其食品和用水供给。他认为，在门罗找到谈判机会之后，有足够的时间来决定是否战争。

当争端的消息传到伦敦时，以斯宾塞·珀西瓦尔为首的强硬派政府已经成立。不过，早在门罗递交抗议书之前，外交大臣乔治·坎宁就告诉他，这次袭击行动没有得到授权，英王陛下政府一如既往，从未宣称有权从另一国海军舰船强征海员。[①] 坎宁表示，那些人将被释放并得到赔偿。在门罗看来，这样做合情合理，整个事件有望在这个基础上得到解决。

杰斐逊和麦迪逊所设的门槛却要高得多。他们试图利用战争威胁，不仅解决“切萨皮克号”事件，而且确保强征兵役的完全废止。国务卿告诉门罗说，就这次袭击而言，“彻底废除从美国

① 为了掩人耳目，海军上将伯克利被免去司令职务，但不久之后，他接受了一个在葡萄牙海域的更高、更有利可图的职务。

舰船强征兵役……是……满意的解决办法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未来的一项安全保证。”完全可以预料的是，坎宁甚至拒绝就此要求进行谈判。杰斐逊和麦迪逊要价太高，结果一无所获。

这一年稍晚，坎宁派遣乔治·H. 罗斯作为特使赴华盛顿就此事进行谈判。杰斐逊和麦迪逊这时却一改初衷，对这位特使说他们不再坚持强征兵役的完全废止。然而，正如坎宁所授意的那样，罗斯却要求总统做出他不想做的让步。整个谈判的目的是拖延而不是解决问题。面对杰斐逊的拒绝，罗斯中止了谈判，并于1808年2月返回英国。3名幸存的船员还在英国人的手中，其中一人在服役期间死亡，另外俩人在1811年两国达成协议后得到了迟到的释放。整个事件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杰斐逊外交的笨拙无能。

贸易禁运

到11月国会开会时，杰斐逊得到了门罗与坎宁谈判破裂的消息，他还听到四处流传、来源确凿的传闻，说珀西瓦尔政府即将颁布新的枢密院敕令。总统断定，战争就要爆发了。但是，本来在7月就可能降临到他头上的战争，直到秋天都没有爆发。正如财政部长加勒廷为降低国会开幕词的调门而进行干预时提出忠告说，公众的怒气已平息下来了。

在拖延了一个月之后，一位共和党参议员私下地向一位朋友保证说，“白宫里的那个人认为事情已经了结了。”但就在四天以后，总统请求国会不要宣战，但要颁布一项禁止美国商品和美国商船离港的禁运令，但沿海贸易不在禁止之列。这项立法建议名义上并不是歧视性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法国的侮辱行动作出的反应——拿破仑刚刚开始执行一年前颁布的《柏林敕令》，但是，由于英美贸易远远大于法美贸易，所以这个建议所针对英国

的一面乃是显而易见的。

《禁运法》匆匆忙忙地通过了，在参议院用了一天时间，在众议院用了三天时间。理智的讨论纯粹是虚有其表，事实是，杰斐逊在咨文中并没有打算就该建议提供任何充足的理由。虽然政府草拟了这项后来通过的法案，但要不是加勒廷向他施加压力的话，他甚至不会去签署这项禁运令。这届共和党政府就是以这种方式，将联邦权力扩大到远远超出了汉密尔顿的设想，虽然它在理论上是反对扩大联邦权的。

杰斐逊的动机是多方面的。在经过了前几个月的失败之后，他在政治上必须有点什么动作。1807 年 12 月，他指出："禁运的主要目标在于使我国商船和海员免受伤害。"实际上，这是他在《禁运法》的整个实施过程中特别强调的一点。不过，正如杰斐逊本人以及共和党人经常所说的那样，这项政策开始付诸实施时还有一个不太突出的目的，那就是让欧洲人感觉到《禁运法》是个战争警告，是在为准备战争而聚集物资，而这正是法案始作俑者的初衷。但威胁并未奏效。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无论伦敦还是巴黎都没有做出让步；反之，无论是总统还是国会，也都没有准备打仗，不管他们是怎样经常地把战争挂在嘴边。

《禁运法》获得通过时，关于它的强制力问题，人们说得相对不多。政府喉舌《国民通讯员报》将这个问题放在一个次要位置："非常幸运的是，禁运在保护我国根本利益的同时，还将带来附带效果，即改变那个将我国商业排挤出海洋的制度，这是所有国家的利益。"随着另外两项理由失去了说服力，政府或国会方面都不想宣布改变目的，"附带的"理由成了一项主要托词。杰斐逊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美国供应这一点，会迫使交

战国调整政策。[①]

预防性和威胁性的禁运鲜有能够持久的。在《禁运法》获得通过时，没有人指望它能够坚持一年以上。杰斐逊三番五次地说，这不过是一项临时措施。但是，一项具有强制力的禁运依赖于长期的坚持不懈，而这就需要广泛的政治支持以及遵守法律的意愿。然而，事实很快表明，两者均不可得。

《禁运法》激起了联邦主义的政治复活，并且以一种恶劣的面目出现，几乎到了暴动甚至叛国的边缘。在1808年国会选举中，联邦党在众议院的席位增加了一倍。与此同时，《禁运法》还助长了极为猖獗的违法行为，以至削弱了共和党政权的基础，或许是削弱了《宪法》的基础。不仅是船主和商人，连各行各业的民众，都不愿意在经济上做出政策所需要的牺牲。

杰斐逊一旦获得行政大权，便不再害怕这种权力了。在他的鼓动下，国会做出反应，通过了一系列越来越严厉的法案，授权总统坚决打击逃避禁令的行为。根据1809年1月的一项法案——这是最严厉的一项法律，他得到了以下授权：动用民兵履行警察职责，下令捕获正运往边境地区的货物，扣押那些试图离港的可疑船只。在内战期间的林肯之前，还没有哪一位总统拥有如此之大的、凌驾于美国公民之上的权力。

尽管如此，违反和逃避禁令的行为仍在持续不断。杰斐逊私自批准对一名被法院释放的犯叛国罪的人进行控诉。财政部长加勒廷虽负有执法责任，但对这项政策颇为不满。他抱怨道："我宁愿面对战争，也不愿在执行法律方面表现出无能为力。"随着时间推移，杰斐逊本人也越来越怀疑，作为共和党政府根基的公

① 1808年3月国会通过了一个补充法案，除其他目的外，它禁止陆海两路的出口贸易。由于这个补充法案主要是针对加拿大贸易，所以它体现了强制动机的越来越大的重要性。此外，这项法律走上了更加反英的方向。

民美德是否已经荡然无存。

欧洲并未做出美国人所期望的那种反应。实际上，拿破仑对于禁止从他的敌国输入商品的政策持一种欢迎态度，但与此同时，他利用这项政策为他捕获美国商人的行为找到了借口，从而充分表明了他对美国人的蔑视。他在1808年4月颁布的《拜恩敕令》毫不留情地规定，鉴于《禁运法》禁止美国商船离港，所有悬挂星条旗的船只必须在实质上被视为敌国商船。虽然英国政府玩世不恭地对它的规章制度做出调整以鼓励美国船主违反禁运法，但伦敦因为物资供应受损而从未认真考虑过要修改那些枢密院敕令，从而积极欢迎那些与其进行竞争的商业船队销声匿迹。

1808年4月美国通过一项法案，授权总统可以根据形势暂缓实施《禁运法》。继门罗之后担任驻英国公使的威廉·平克尼立即同坎宁进行接洽。他们的谈判毫无结果。9月，坎宁以一种轻蔑和傲慢的态度停止了谈判。在英国看来，这位外交大臣写道，"《禁运法》不过被看成是一项无害的国内法规，除了对美国本身以外，它不会对任何国家造成影响。……在美国取消主动的自我限制措施与英王陛下政府放弃报复敌人的权利之间，似乎既不存在相互联系，也不存在必然关系。"

1809年4月，英国驻华盛顿公使大卫·蒙塔古·厄斯金与新的麦迪逊政府达成一项协议，据此，英国将不再对美国船只实施枢密院敕令，作为交换，美国取消对英国的贸易禁运，同时继续对法国实施。麦迪逊认为，他赢得了一次重大胜利，但坎宁却毫不迟疑地推翻了厄斯金的未得到授权的行动。

杰斐逊和麦迪逊自始至终都没有认识到，对英国人来说，无论是否合乎逻辑，没有了美国的物资供应只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没有了美国的商品，甚至没有了西印度群岛的商品，本土岛屿能够维持生存，尽管英伦三岛在《杰伊条约》签订前的为期90天的禁运过程中蒙受了损失，但还是生存了下来。英国可能

更害怕失去美国市场，但《禁运法》并未禁止外国商船从事进口（即从英国进口）。尽管从英国的进口在 1808 年急剧减少——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必须以货币形式而不是商品交换形式来支付，但仍然远远高于 1807 年以前的水平。被精于统计的英国领导人视为生死攸关的贸易平衡问题，依然是大大有利于英国。一位英国人评论道："美国人非常自然地允许我们公开地提供他们所紧缺的商品，但他们却不会给我们提供物资作为回报，只有走私除外。"[①] 作为一种强制手段，《禁运法》从未取得成功。

经济战的失败

到 1808 年底国会开会时，形势业已表明，"强制性的禁运因面临着一个巨大矛盾而漏洞百出，这就是将其付诸公正检验所需的时间与美国人民所能承受的时间之间的矛盾。"[②] 全国各地都备受经济萧条之苦。在有些地区，尤其是在新英格兰，政治不满情绪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共和党人认为有必要取消禁运，但对于今后应该采取何种政策却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无论即将下台的总统还是当选总统，都未能给予他们任何指导。

经过极度的混乱后，在 1809 年 3 月杰斐逊的任期结束之际，国会通过了一项纯粹是装模作样的法律——《禁止通商法》。从理论上讲，该法案禁止与交战国的进出口贸易，但却开放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商业往来。实际上，这项法律只不过是导致了大规模的逃避法律行为，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一艘商船离开美国港口后

---

① 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属实，因为国会授权总统允许商船离港去运输那些在《禁运法》通过以前成交的进口商品。杰斐逊对此不满，但在执行这项授权时却是如此宽大，以至先后有 600 多艘商船合法地开往欧洲。

② 伯顿·斯皮瓦克：《杰斐逊的英国危机》（弗吉尼亚查洛托斯维尔，1979 年版），第 117 页。

会开到哪里去。在实施《禁止通商法》前几个月，先后有79艘从纽约出发的商船名义上是开往亚速尔群岛去寻找市场的，但在这项法律仍然有效期间，这其中的许多船只以及其他怀着类似可疑目的的船只，并未返回美国，它们装载的货物大多销往了欧洲市场。《禁止通商法》缓解但没有消除美国的经济萧条，而且它切断了来自英国的进口。然而，与《禁运法》一样，它也未能迫使坎宁及其同僚改弦易辙。

到1810年5月，共和党人发现，甚至《禁止通商法》都是代价过大以致难以为继了。他们的后退步骤，是一个被称为《第二号梅肯法案》的法律。纳撒尼尔·梅肯是一位资深的共和党议员，作为委员会主席，他勉强地向众议院提交了这个议案。这项法律取消了对商业活动的一切限制，但同时规定，如果某一个交战国不再侵犯其权利的话，美国就停止对另一个交战国的贸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项所有措施中最不得力的法律，却给人一种大获全胜的印象——当然是一种错误的印象。

英法两国开始时对《梅肯法案》嗤之以鼻。后来，拿破仑借机利用该法案挑起美英战争。1810年8月，他授意外交大臣卡多尔公爵告诉美国驻巴黎公使约翰·阿姆斯特朗说，法国在11月1日以后将不再针对美国贸易实施那些敕令，条件是英国也要废除它的那些敕令，或者美国“促使英国尊重其权利”。

《梅肯法案》并未提出这种废除禁运的条件，它只是授权总统只有在某个交战国明确地停止对美国权利的侵犯后才能采取行动。但是，11月2日，在根本不知道前一天的欧洲局势的情况下，麦迪逊总统发表声明说，法国已经停止了捕获行为，因此，如果伦敦没有表现出善意，美国将在90天内停止与英国的贸易。总统当然清楚，他采取行动的授权是有问题的；他还正确地猜测到，拿破仑只不过想在枢密院敕令的存废问题上挑起美英战争，因为他仍在根据他所说的“国内法”继续捕获美国商船。不过，

正如他在给前总统的信中所写道，他“希望这个步骤至少能谋得这样一种有利条件，即我们一次只能进行一场斗争”。这场“斗争”很可能演变为战争，但麦迪逊还不想看到这样的结局。

麦迪逊的大胆行动没有能够从法国和英国那里得到回报。拿破仑继续捕获美国商船，尤其是那些曾在英国港口停靠过的商船，同时，他只允许很小一部分美国商品运往欧洲。[①] 然而，在1811年2月，英国商船和商品被禁止进入美国港口。由于怀疑《梅肯法案》在实践中能否得到遵守，这项禁止通过立法形式得到确认。毫不奇怪，唐宁街认为，美国的做法有失公允，法国撤销禁令是欺人之谈；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公平原则，都不允许取消枢密院敕令。

争端一直持续到1812年6月美国向英国宣战，正是在这时，英国废除了它的那些敕令。抛开《梅肯法案》恢复英美贸易的事实不说，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英国在1810年遭到了萧条的打击。1811年对美贸易的重新断绝，不过是稍稍加重了英国的困难，但1812年冬，政府反对派在议会两院的一系列严重抨击中指出，只有重新打开美国市场才能恢复繁荣。他们不时地发出警告说，政府政策正驱使美国走向战争，它将远远超出华盛顿所施加的限制措施，使贸易荡然无存。最后，政府只得做出让步。这种让步丝毫没有印证杰斐逊和麦迪逊制定其强制政策时所依据的主观判断。经济领域所有那些不利形势——不只是没有了美国的贸易——负有责任。

共和党的这场战役彻底地失败了，这暴露出他们判断失误，没有耐心，错误地理解了国家所能承受的负担。因为《禁运法》

---

① 1811年秋，麦迪逊派遣杰斐逊十分仰慕的博学知识分子乔尔·巴洛前往巴黎处理此事。法国官员对巴洛虚与委蛇长达数月。1812年秋，巴洛向东出发，去会见正率军深入俄罗斯作战的拿破仑。这次会谈未得实现，巴洛于1812年12月在波兰去世，并葬在那里。

失败了，所以毫不奇怪的是，那些次要的法案也就有了同样的厄运。另外，由于每一项法律都坚持着这样一种观念，即战争是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因此这场战役本身造就了一股与其始作俑者背道而驰的推动力。美国被迫从《禁运法》和《禁止通商法》的立场中后退。卡多尔信件的后果是，麦迪逊和整个国家看上去像白痴一样。最终，在枢密院敕令的废止能够提供进一步缓和的理由时，这种自取其辱的劲头却推动了战争的爆发。

"战争鹰派"国会

麦迪逊和国务卿门罗在与 1811 年 5 月抵达华盛顿的英国新任公使奥古斯都·约翰·福斯特谈判时，拼命争取达成协议。根据福斯特说，门罗甚至建议，表面上而不是实质上废止枢密院敕令就能令美国心满意足。他说："他向我保证，如果英国能给予这样一项有条件的、含糊的废止枢密院敕令的保证，像法国在上一年 8 月废除其敕令那样，那么……就足以授权终止实施针对英国贸易的《禁止进口法》。"然而，福斯特不为所动，实际上，他领受的训令不允许他做出妥协。

到 7 月，麦迪逊再也忍不住了。虽然他没有停止与福斯特的谈判，甚至直到近一年后美国宣战之时，他的国务卿都在千方百计地诱使这位年轻的公使做出让步，但麦迪逊已经决定美国要进行备战，或者，有可能的话，通过备战的假象向英国施加压力。他要求新的第 12 届国会在 11 月份召开会议，从而比以往提前一个月。此举显而易见的意图，在于显示危机已经形成，虽然 1807 年以来的断断续续的事实表明，福斯特、那些希望战争的美国人以及那些害怕战争的美国人，都在怀疑冲突是否会真的爆发。

那时，由于各州自行确定国会选举日期，所以，早在 1810

年和1811年的前后几个月的一段时间内，第十二届国会就已选举出来。据说，这些选举彻底改变了国会的性质，尤其是在众议院，新的、年轻的、充满活力的、一心想打仗的“战争鹰派”控制了局面，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当选，是因为举国上下都唾弃那些贪生怕死、犹豫不决的政府官员，他们迫使那些留任的年长议员支持战争运动。

这个说法总的看来是虚幻不真的。共和国成立初期，50%的国会议员进行变换是常见的，这主要是因为议员们并不把立法任职看做是终身职业。本届国会中的新议员的比例，与共和国初期的历届国会大体相当。作为南方的一个普遍现象，“战争鹰派”的一个主要人物约翰·C.卡尔霍恩实际上是通过家族继承的方式接替他那退休的叔父担任议员的。议席的变化几乎不是由对外政策问题所决定的。亨利·克莱是为了填补因退休造成的空缺席位而全票当选的，他不久当选为众议院议长，并利用这个职位去推动立法。那些聚集在华盛顿的人中，真正想要打仗的也许为数不多，尽管许多议员像总统那样准备打仗，如果英国仍然固执己见的话。卡尔霍恩当时29岁，克莱34岁，但许多好战的议员却年长一些。在众议院最终就战争进行表决时，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年龄几乎是一样的。

在1811年11月召开的国会里，联邦党人只居于少数，虽然他们并不像《禁运法》颁布以前那样弱小。还有一个以伦道夫为首的共和党反战小集团。更为强大的，是一个被对手斥之为“稻草人”的集团。这些议员希望通过制造备战假象来恐吓英国，从而迫其就范；一部分人不太情愿地准备打仗，如果恐吓未能奏效的话；另一部分人还没有做出决定，至少在这届国会召开时是这样。所谓的“战争鹰派”，在众议院约占1/3，他们也希望英国会就范，他们一开始起就准备诉诸战争。虽然他们不想看到战争，但他们认为，继续蒙羞受辱会危及共和党甚至危及共和体

制。对他们来说，战争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必要之举，如果外交无法迅速取得成效的话。这些人组织得较好，立场比“稻草人”更坚定，他们有克莱、卡尔霍恩和其他几个强有力的领袖人物。从长期看，这些优势让他们赢得了胜利，但争论却进行得十分激烈。

1812 年战争的来临

如同从杰斐逊到威尔逊的所有总统咨文一样，麦迪逊的开幕词是由一位工作人员向国会宣读的。这篇咨文痛斥了英国的政策，敦促加强战备，但并未建议在当时或将来某个时候发动战争。许多报纸认为，它与 1805 年以来的那些总统咨文没有多大的区别。从 11 月到次年 6 月，总统一直保持着低调。尽管行政部门和国会之间的主要沟通人门罗向全国作出了保证，但许多议员认为总统在骨子里是一个“稻草人”。实际上，如果万一英国做出让步，麦迪逊确实愿意选择和平，但是，现在的情况似乎已经表明，他从一开始就盼望着春季能爆发战争。

国会的冬季会议吵吵闹闹，取得的成就寥寥无几。尽管联邦党方面赞成采取备战措施，期望其对手在高谈阔论后放弃戒备，从而令其处于尴尬境地，但几乎没有通过任何一项有效的措施。名义上建立起一支军队，委任了军官，但招募的兵力屈指可数。“战争鹰派”提出的一项旨在扩充海军的建议，因共和党对海军的偏见而流产。征税法案胎死腹中。3 月，国会极不情愿地通过了一个禁运法，以赶在战争爆发前征集商船，但参议院坚持其期限不能超过 90 天，其直言不讳的意图，是为了留出时间同伦敦

进行新的接触。[①] 故不久之后，国会两院决定暂缓实施，再次留出时间等待欧洲传来消息，但它们在暂缓期问题上有着分歧。当"战争鹰派"人物乔纳森·罗伯茨倡议国会议员在暂缓期内放弃薪水和出差补贴从而省出4万美元用于军事拨款时，整个暂缓方案宣告流产。

可以理解的是，许多美国人并未预料到战争即将到来。同样重要的是，虽然出现过短暂的慌乱，但英国人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真正的危险。福斯特——他因为招待美国各个政治派别的人大吃大喝从而造成了费用的严重透支——通常是相信联邦党人告诉他的一句话：一旦危机来临，共和党人就会变成缩头乌龟。4月，他甚至申请休假6个月，因为他说，事情已经陷入僵局了。他的上司并无任何理由去反驳他的观点。正如驻伦敦的一位美国外交官所写："普遍的看法是我们无意打仗，尽管我们做着一切准备。"另一位外交官也说："我看不出有任何迹象表明人们在害怕战争。"所以，尽管枢密院敕令因为经济原因而遭到猛烈抨击，但通过制造战争恐惧而迫使英国就范的"稻草人"计划却落空了。不过，战争确确实实地步步逼近了。

6月1日，麦迪逊请求国会就战争问题进行"及早审议"。他并未正式提出宣战，他说，这是"一个宪法明智地授予立法机构的重大问题"。但是，他确实提出了一份侮辱清单，以表明"英国对美国进行着战争而美国对英国保持着和平"。麦迪逊提到了强征兵役、英国在西部蓄意挑动印第安人战争、皇家海军进犯美国领海，他特别提到了枢密院敕令：

> 这是一个扫荡性的封锁制度，是为了尽可能地适应（英国政府的）政治观念、商业嫉妒心理或英国舰队的

① 在《禁运法》生效前，很多商船——仅纽约就有140艘之多——设法逃离了港口。

贪婪欲望而制定并付诸实施的……这就是对我国的所有伤害和不敬，对这样一场危机，通过前所未有的忍耐以及调和妥协的努力是无法避免的。

经过17天的、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辩论之后，国会选择了战争。众所周知，会议开得激烈而又喧闹，而且是闭门召开的，因为居于多数地位的共和党不敢将其主张公之于众（但联邦党议员不久就公开发表了他们的发言）。众议院基本上是以党派划线的79对49票赞成宣战。在参议院，联邦党和分裂主义分子险些得逞，他们几乎促成了一项同时向英法两国开战的议案，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荒唐可笑之议，因为它包含着这样一项计划，即等到进行最后一次谈判努力后才采取行动。他们曾提出了一个打一场有限的海上战争的提案，但未能成功。不过，战争法案最终以19对13票获得通过。

1812年6月18日，麦迪逊签署了战争法案。他在帽子上别上一个小花结，到政府各部门去鼓舞工作人员的士气，几天后，他像往常一样前去度他的暑假。门罗把这个决定正式告诉给福斯特，俩人交谈的气氛非常友好，国务卿还招待客人喝了茶。这样，在海军小得可怜、陆军并未征召、财政尚无计划的情况下，美国踏上了战争之路。几乎与此同时，拿破仑发动了最终导致其垮台的入侵俄国的行动。麦迪逊在多年后坦言道，倘若他能够预见到法国的失败，他就不会支持1812年的战争。

1812年战争的起因

克莱等西部人的领导作用，不可信的伦道夫对他们的指责，其他共和党人的坚定但非激进的立场，麦迪逊总统回避公开责任的做法，所有这些加上其他一些因素，都从各个方面对战争决定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历史学家业已指出，西部人受到了征服

加拿大欲望的驱使，他们或者只是想得到新的领土，或者更可能的是，因为西部还没有出现土地短缺的情况，所以边疆人把他们与印第安人之间的麻烦归罪于以加拿大为基地的阴谋。[①]

实际上，加拿大因素之所以在1812年成为谈论的话题，是因为它关系到全国而不是地方。千真万确，来自西部的所有10个议员都投票支持战争，但这个小小的集团几乎是不可能主导局势的。此外，在参议院，6个西部人有3个对战争投了反对票，他们担心战争意味着印第安人甚至发动更猛烈的袭击。在各地的共和党人考虑进攻加拿大时，他们有时是把它作为一种通过消除虎视眈眈的英国军事存在从而加强全国安全而非仅仅西部安全的措施来看待的。换言之，"看似领土扩张主义的行为，实际上源自一种防御心理，而不是源于征服与兼并的野心。"[②] 然而，即使这种想法也比不上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重要，即进攻加拿大是美国能够发动进攻的惟一途径。用门罗的话来说，加拿大并不是"一个战争目标，而是……一种使战争达到令人满意的结局的手段"。正如一位满脑子是战争的议员夸夸其谈的那样，战争的目标是"通过入侵这些省，……这个英国惟一易遭攻击的地区，报复她对我国海上权利所造成的伤害"。

议员们的投票主要取决于党派隶属关系。一些投反对票的人肯定就是分裂主义分子，以致他们几乎没有资格被称为是共和党人了。在党的忠诚分子中，弃权的人屈指可数。战争法案之所以获得了南部和西部的大多数人的明确支持，不过是因为共和党在

---

① 关于加拿大问题的最有影响的论著，是朱利叶斯·W. 普拉特的《1812年的扩张分子》（纽约，1925年版）。这本书也认为，在期望获取加拿大的边疆人和期望获得佛罗里达的南方人之间订有一个相互支持的协定，但绝大多数强调扩张的学者的关注点是西部。

② 雷金纳德·C. 斯图尔特：《美国扩张主义和英属北美》（查佩尔希尔，1988年版），第76页。

这两个地区势力最大。各地的共和党忠诚分子都一致支持战争，在众议院，宾夕法尼亚所投的赞成票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州。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一场政党战争。

至少从1807年以来，共和党人就给人留下了不光彩的形象，在欧洲的挑战面前，他们先是威胁恐吓，继而又后撤退缩。从1811年11月起，他们口口声声地说，他们和全国民众的忍耐已到了极限。克莱质问他的那些同僚说："既然我们已经立下了誓言，明确了立场，那么我们现在是否准备从我们已经采取的措施和立场上退缩，从而蒙羞受辱并丢人现眼呢?"即便是那些"稻草人"，也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尖锐性。倘若他们再一次退却，很可能会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付出代价，也许会使党一蹶不振。

共和党人的动机并非只是党派性质的：他们将本党视为共和原则的维护人，把他们的联邦党政敌看做是共和原则的反对者。倘若再一次失败，共和党政府的事业就会遭到致命的打击，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全世界面前。一位年轻的外交官评论道："如果我们不自重，别人就不会尊重我们。我们永远都不能让我国那种妥协退让和卑躬屈膝的政策使我们颜面扫地，从而留下这种形象或骂名。"

问题的核心，似乎是枢密院敕令及其构成的挑战。虽然强征兵役是美英两国之间最为久远的一个问题，但麦迪逊在国会开幕时所发表的咨文中并没有提及这个问题，只是到了那年春天，当所有的怨愤都累积起来以至促成了战争法案之时，才有人偶然地在国会里提出了这个问题。据说，英国的另一个挑衅，是支持印第安人侵扰边疆定居点；但在那年冬季，这至多只算一个小问题。这并不是因为美国的指控无法证实，而是根本不符合事实：英国无意惹恼美国，在西部挑起事端。在国会辩论中，压倒一切的主题是英国的枢密院敕令。麦迪逊在数年后指出，这是足以宣战的惟一真正问题。

当然，枢密院敕令直接打击了美国的利益，但并非“战争鹰派”和其他人所声称的那么惨重，因为船主和商人们已经学会了如何适应并躲避它们。此外，因为那些事实上由国内因素造成的经济困难，这些敕令还是要遭到——实际上遭到了——指责。然而，尽管贸易从未恢复到1807年的最高水平，但进出口额却远远高于和平时期；1811和1812年，根据枢密院敕令而被截获的船只也不是特别多。而且，总的说来，美国在欧洲战争期间曾经繁荣一时，至少在美国本身没有停止对外贸易之时是如此，无论如何，同世界上最强的海上大国打仗，是不可能给商业带来好处的。概言之，枢密院敕令的经济影响虽然严重而且理应招致怨恨，但既不是毁灭性的，也不构成战争的确凿理由。

在大多数共和党人以及许多国民看来，真正毁灭性的，是对国家荣誉的挑战，对共和政体效率的挑战。用一项国会宣言的话说，枢密院敕令不仅“会侵蚀我国繁荣的基础”，而且“会颠覆我国的独立”。禁运、谈判和抗议，所有这些都未能促使枢密院敕令的废除。英国仍然把美国当做一个无足轻重的、远未摆脱殖民状态的国家来看待。正如一位“战争鹰派”人物早些时候所说，英国似乎想谋求“垄断我国商业，摧毁我国的自由和独立”。因此，人们便有了“英国是恶魔的说法，……这是为1812年6月最终诉诸武力提供理由的关键因素”。[①]

共和党人也许是正确的，无论是这个党还是美国政府，也许都不能经受更多侮辱而存在下去。果真如此，错就错在他们不仅刺激而且容忍了侮辱。他们可能会辩解说，他们曾极力找到一条战争以外的途径，但他们所选择的商业战，在意图上却糟糕得很，非但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反而加剧了挫折和屈辱感。与伦敦

① 罗纳德·L. 哈兹恩布勒尔与罗伯特·L. 艾维：《国会宣布战争》（俄亥俄州肯特，1983年），第126页。

当局同出一辙的是，他们将1812年战争当做了第二次独立战争。

“麦迪逊先生的战争”

战争打得很不顺利。共和党的宗派主义以及联邦党州长的反对立场，使得政府进退维谷。用克莱的话说，麦迪逊被证明是“不能适应战争的风暴”，他从未想方设法去控制或整合战争努力。美国人未能征服加拿大，在英国军队碰到拿破仑的情况下，这本来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1812年，英国在加拿大只有5000军队，杰斐逊估计，征服行动不过是个“纯粹的行军问题”。威廉·赫尔将军在1812年本应从底特律向东出击，但却被一支远远弱于自己的部队打败了。1813年，威廉·亨利·哈里森在一场同样的行动中横扫加拿大（即今天的安大略）的许多地区而取得胜利后，他那支几乎全部由志愿者组成的军队的士兵纷纷解甲回乡，这块领土得而复失。从纽约向北出击显然是最明智的战略，但实施起来却笨手笨脚，毫无成效。这场战争期间所赢得的最重要的一次胜利，并不是对英国军队取得的，而是对克雷克（印第安人）部落取得的。1814年，安德鲁·杰克逊对该部落发动了一场战役，在墨西哥海岸附近地区摧毁了该部落的军事力量。

在海上，美国海军凭借微弱优势取得了几场单舰对抗战的胜利，从而迫使英国海军部下达密令对付这种战斗；私掠船也对英国商人采取行动，从中大肆渔利。但在英国采取认真态度之后，其封锁便制住了美国海军和商船。1814年，一支很小规模的两栖部队攻陷美国首都，其中一个中队在经过弗农山庄华盛顿墓时，礼节性地鸣放了21响礼炮。伦敦的一家报纸评论道：“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所作的惩罚对实现道德和政治正义目标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会为赢得对卑鄙可耻之敌的胜利而感到羞耻。”另

一方面，1814 年在香普兰湖，从加拿大发起的一场指挥不当的反攻遭到失败；不幸的是，1815 年 1 月，在条约业已签订的消息传来之前，一支在新奥尔良附近登陆的 8000 人部队被杰克逊所打败，从而提高了美国的士气。

《根特和约》

停战的努力早在第一枪打响前就已开始，但直到 1814 年 8 月，两国代表才在荷兰的根特就媾和事宜举行谈判。美国的立场似乎是孤注一掷的。国库空空如也，叛乱岌岌迫发，楠塔基特岛业已宣布中立，没人知道是否会有更重要的地区步其后尘。拿破仑的垮台——杰斐逊写道，“这给我国带来了灾难”——使英国军队腾出手来对付美洲，并激起了其向那些在危机时刻向英国背后捅上一刀的人实施报复的欲望。

不过，形势并不像表面上显示的那么凄惨。英国人并不准备为了赢得他们希冀的胜利而付出太大代价——无论在金钱还是在耐力方面，政府对自身面临的困难十分清楚。在 1812 年珀西瓦尔被一个疯子杀害后继任首相的利物浦伯爵内阁，一心想降低赋税；各部大臣力图从某一位大臣所说的“美洲战争的磨盘”中解脱出来，以便集中精力恢复拿破仑之前的欧洲秩序——维也纳会议正就此进行谈判。

此外，随着谈判进程的发展，伦敦对所谓美国会陷于内部崩溃的说法愈益没有信心了。在各部大臣得知麦迪逊总统把那些表明英国所提要求的根特谈判的早期记录公布于众后，这一点尤显得一清二楚。尽管极端主义者还在继续谋划，准备于 12 月在哈特福德举行一次大会，以商讨反战的、反共和党的措施，但麦迪逊却运用计谋，将许多联邦党人聚集到政府麾下。例如，自 18 世纪 90 年代起就为联邦党效劳的一家费城报纸《合众国报》宣

称说，“我们别无选择，要么全力抵抗，要么可耻地投降。”在英国民众的要求下，利物浦政府口气强硬。它想拖延几个月的时间，以消化1814年夏季战役的胜利，但它的真正目的，则是在另一个开战季节到来以前结束英美战争。

漫长的谈判完全反映了老一套程序。起先，美国方面步步退让；后来，随着军事梦想的破灭，英国方面也做出妥协。包括艾伯特·加勒廷、亨利·克莱和约翰·昆西·亚当斯在内的5名美国特使组成一个精明强干的代表团，他们基本上打了一场漂亮的防御战。他们的性格并不相投，或许说得确切些，是亚当斯的性格与其他几个人不合。[①] 他们在策略问题上有分歧，而这种分歧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不过，就连有着争吵嗜好的亚当斯也不得不承认，“在几乎所有重要问题上，我们都是完全一致的。”几乎直到谈判结束之前，都没人想到会取得成功，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在使命结束之时让英国承担责任。

虽然他们所受的训令不怎么有力地指示他们谋求割让加拿大，但美国外交官们从未提出这个要求。在英国代表以攻为守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们甚至否认说，（美国）从未考虑过征服加拿大。他们也没有提出海上权利问题，在欧洲战争业已结束之际，这个问题并无多大实际意义，但在表面上，或许对未来而言，这个问题却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性。他们也从未提及强征兵役问题。国务卿门罗的最初训令在提及强征兵役时指出：“如果英国的侵略行为不加以制止，美国诉诸武力就会徒劳无益。”但美国各位谈判代表都不准备提出这个问题。新的指示在谈判开始之际下达，他们才免于不得不违背他们原来的训令。在得知拿破仑战

① 他曾在日记中抱怨地说道：“他们在吃完饭后坐下来，喝着劣质酒，抽着雪茄烟，这既不符合我的习惯，也不利于我的健康，还消耗着我无法匀出的时间。”

败之后，门罗立即拟定了新指示，他们才得以保持沉默。国务卿指出，在英国推行强征兵役期间，美国一直是抵制的，因而已经足够明确地表明了决心。

英国的退让还需要更多时间。伦敦一开始就提出一个先决条件，即印第安盟友必须作为和约的一方，必须承认其边界。训令还说，最好在加拿大与美国之间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印第安人国家。参加根特谈判的英国代表把缓冲国的建议提升到了绝对条件的地位，以致其上司相信美国人有可能予以接受。当伦敦最终意识到美国宁愿谈判破裂也不愿接受时，英国外交部做出了让步，它传话给加勒廷及其同事说，缓冲国的主张只是一个提请讨论的建议，这当然意味着不必加以讨论了。

英国退让的势头，连同许多部落业已同意抛弃英国的事实，很快促使英国外交部放弃它原先的先决条件。没有哪个部落成为缔约方，美国只是承诺恢复它们在1811年所占有的土地。英国对这些曾经作为盟友的"褐色英雄"所承担的义务，也不过如此！两年后，当美国重新进军而印第安人请求援助时，一位英国官员写道，"如果……美国政府允许印第安人……恢复其以前状态，哪怕只是一个星期或一个月，他们也是忠实地履行了条约。"正如杰克逊在马蹄湾取得的胜利那样，这种安排意味着美国的定居点可以向西推进。

英国在谈判开始之际还在做着征服梦，但到了印第安人问题被一笔勾销时，那支入侵纽约的、如此信誓旦旦地要把联邦一分为二的英国军队，于9月份在香普兰湖取得一场小小的但却是残酷的海战胜利之后，只得掉头撤退。英国谈判代表得到了只能提出小片领土要求的训令。即使是这些侮辱美国人的要求，在当时的军事形势下也是难以实现的。

此时，英国外交部由于担心波拿巴恐怖主义者可能暗算其驻巴黎大使威灵顿公爵，决定将其召回国内。为掩人耳目，这位公

爵被任命为美洲司令。利物浦伯爵解释说，如果他接受该职务，他将“拥有缔和还是继续战争的全权，如果和平不可能实现，就发动新的攻势。”威灵顿答道，他对军事胜利不抱多少希望。他对那种导致外交部认为英国能够夺取领土割让的说法嗤之以鼻。他写道：“我在美国不会给您带来多少好处；我到那里去，不过是为了签订一纸和约，这样的和约，还不如现在就签订。”这个答复为他的顶头上司毫不痛苦地收回领土要求奠定了基础。

11月底，美国人得知了英国的退让立场。英国代表继续要求确认其战前使用密西西比河作为加拿大之出海口的权利，英国人出入于忠诚度并不牢靠的印第安人部落的前景，让美国人，特别是让克莱不寒而栗。不过，这项要求很大程度上是个花招，目的在于从逻辑上使得美国难以坚持其另一项战前权利的确认，即北方人在英属北美沿海的捕鱼权。但这正是美国人——在亚当斯的坚持下——所要努力争取的东西。除他以外，其他人从来没把这事真正放在心上，其中一位同事甚至指责亚当斯想“利用西部的爱国热血换取鲸油，用阿勒格尼山两边的人的头皮换取鳕鱼”。最后，双方一致同意将这两个问题搁置起来。

经过20个星期的谈判，终于在1814年圣诞节前一天签订了和约。条约基本上忽略了所有主要问题，而只是恢复了战前现状。没有几个人能想到，它标志着最后一场英美战争的结束。约翰·昆西·亚当斯说它“是一个无限期的停战协定，而不是什么和平条约，……达成不易，维持也难”。这也反映了他在根特的那些同事的看法。

英国政府欢迎和约，这使它得以集中精力应付欧洲和国内问题。一些支持者甚至认为这场战争已经取胜了，因为美国人的两个目标——加拿大和废止强征兵役——一个都没有实现，而这正是他们发动战争的原因。考文特花园剧院的第一道幕布上画了一个美国的模拟像，它与其他战败国一起趴倒在英国的脚下。

和约签署的消息于1815年2月传到华盛顿，此前不久，刚刚传来杰克逊取胜的捷报和哈特福德会议无果而终的消息。条约迅速得到批准。几件大事幸而同时发生，使那些坚持认为战争没有实现任何重要的国家目标的批评家们哑口无言。正如英国政府的支持者那样，准官方的《国民通讯员报》指出说，在主要问题上保持沉默是一次真正的胜利：美国挡住了英国的要求，一直坚持着战争，直到欧洲和平停止了侮辱行为。一位共和党人写道："和平在最受欢迎的时刻到来了，使我们既兴奋又惊喜；我们单枪匹马经受住了抗击欧洲征服者的斗争；我们迎来了和平，赢得了令人兴奋的、应接不暇的胜利。"很少有哪个国家如此成功地体验过自我健忘症！仅仅几年之后，共和党的另一份报纸《奈尔斯纪事报》甚至大言不惭地说："我们实际上决定了《根特和约》。"

说得中肯些，美国人民确实有权奔走相庆。他们以刚好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向利物浦及其内阁表明折衷办法是不会成功的，从而摆脱了灾难。这样，他们得以从托马斯·杰斐逊所带来的困境中走了出来，而战前岁月的那些苦难，使得战时记录看上去要好于其本来面目。所以，1812年战争重新唤起了萌生于美国革命年代的民族主义，消除了举国上下的那种错误地认为《宪法》是暂时的心理。亨利·亚当斯后来写道："1815年，美国人第一次不再怀疑他们所要走的道路了。"①

---

① 亨利·亚当斯：《合众国历史》（第9卷，纽约，1891年版），第220页。

第六章 门罗主义

同美国参加的大多数战争一样，1812 年战争过后并没有出现平静的局面，相反却迎来了民族主义的高涨，其标志是致力于促进美国的贸易、扩大领土疆域并向那个以往关注甚少的西半球地区扩大影响。这些努力在 1823 年门罗主义那里达到了顶点。这一年，詹姆斯·门罗总统在年度国会咨文中提出了并非大声昭告整个世界的原则，这些原则曾屡屡影响甚至指导过他的前任。他公开阐述了这些原则，从而比他的任何前任都更有胆略地宣告了一项独立的外交政策。

在这个时期开始时的 1815 年发生了一件事，它尽管微不足道，但却表达了新的精神。当时，还是国务卿的门罗指示同英国进行商业协议谈判的代表要坚持"轮流"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当主要国家缔结条约时，每一国的国名必须轮流地写在条约文本的最前面，在那份各国保存的文本的签字页上，每国代表团优先在左边的位置上签字。虽然这一原则在与西班牙缔结的《平克尼条约》中部分得到遵循，在路易斯安那条约中完全得到遵循，但美国缔结的绝大多数条约，包括结束美国革命和 1812 年战争的那些条约，都没有遵循轮流原则——欧洲国家的名字都写在前面。门罗认为这样做有失身份，伦敦谈判的参加者之一约翰·昆西·亚当斯持有相同看法。亚当斯的同事亨利·克莱和艾伯特·加勒廷却无意遵照该训令和亚当斯的观点，但他以拒绝在条约上

签字相要挟而迫使俩人改变主意。两年后，亚当斯出任国务卿后，将“轮流”原则确定为美国谈判代表必须遵守的一项日常要求。他和门罗坚持以此作为承认美国跻身于受人尊重的大国行列的做法，乃是适当之举，因为他们俩人是未来10年美国民族主义政策的主要设计者。

詹姆斯·门罗和约翰·昆西·亚当斯

门罗不仅是新民族主义当之无愧的象征，而且被认为是当之无愧的象征。作为活跃于美国革命时期的最后一位总统（他在1776年特伦顿战役中负过伤），他使美国人想到了那段辉煌的经历。他在早年是一位激进的、足智多谋的共和党党员，在中年时期走向成熟，现在表现得沉稳持重。因为他的平衡作用和充沛精力，他成为麦迪逊政府中惟一在1812年战争后提高了声誉的人。联邦党人由于在战争中的叛变行为而在政治上走向了死亡，因此，共和党候选人门罗轻而易举地在1816年赢得了总统宝座。

自华盛顿以来，还没有哪一位总统敢于冒险到本乡以外的地区去旅游。门罗却敢这么做。1817年，他深入北方各地，足迹远及缅因，西到底特律，每到一地，他都受到了热烈欢迎，连波士顿也不例外。不仅约翰·亚当斯，而且联邦党的忠实元老蒂莫西·皮克林也出席了为总统所举行的盛大宴会。在1820年的连任竞选中，除一张选举人票外，他得到了所有其他选举人票，马萨诸塞的老亚当斯作为选举人也投了他的票。虽然寓言般的“美好感觉时代”犹如昙花一现，但这个时期的争论几乎无一例外是地方小事和个人恩怨。门罗则置身其外，成为国家团结的化身。

但门罗不只是一个象征。虽然一位夸夸其谈的哈佛历史学家曾将他贬为“平庸无能之辈中的一分子，凡是有用的和引人注目

的总统都出自这类人”。[1] 这样说远非公正合理。门罗确实缺乏创造性的想像力。乔治·丹杰菲尔德写道：“他是弗杰尼亚王朝的第三代传人，在才智排名上，他并不落后于那个继任次序。”[2] 不过，到1817年，他已成为一个具有良好判断力的人，而且，也许是因为他已经达到了政治顶峰，他表现得轻松平和，充满自信。与两位前任不同的是，他虽然很少同外国代表直接谈判，但却完全控制着政策大权。他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与内阁成员进行磋商，但他本人作最后决定，然后让国务卿处理谈判事宜。在他那几乎极尽辛辣嘲讽之能事的日记中，连约翰·昆西·亚当斯都对门罗鲜有微辞。

1817年9月，亚当斯接替代理国务卿理查德·拉什执掌国务院。他曾在国外任职8年，先后到过圣彼得堡、根特和伦敦，除了同卓尔不群的专制君主亚历山大一世言谈甚欢以外，这8年时间只是增强了他那忠心不渝的、甚至有些过头的民族主义情结。亚当斯认为，出于物质和道义两方面的原因，华盛顿政府必须为了美国商业打一场进攻性的战争。与其他任何人相比，他不仅更加注重未来，而且力求确立起美国的道义美德，为此，他在很多毫无成效的谈判中，试图诱使英国接受美国的包括强征兵役在内的中立权主张。他还认为，美国应当进行领土扩张，直至占领整个北美。在他看来，这种看法“在物质上、道义上和政治上都是荒谬绝伦的，即欧洲殖民地，包括英国的和西班牙的，可以与一个伟大的、强盛的、开拓进取的和迅速崛起的国家永远毗邻而立”。

最后，亚当斯还认为，美国应当成为北美地区之外“自由灯塔”，成为所有争取自由的积极斗士的榜样。在1821年7月4日

---

① 爱德华·钱宁：《美国历史》（第4卷，纽约，1927年），第314页。
② 乔治·钱宁：《美国民族主义的觉醒》（纽约，1965年），第20页。

的国会演讲中，他提出要革除殖民主义的种种罪恶，主张革新欧洲政治特别是英国政治。他还告诫美国要防止冒险主义：

无论哪里出现或即将出现自由和独立的原则，哪里就会有她的灵魂、她的祝福和她的祈祷。但是她不会到国外去寻找并消灭恶魔。她是一切自由和独立的祝愿者。她只是她自身自由和独立的斗士和捍卫者。

他指出，假如美国想去统治别人的话，“她可能会变成世界的独裁者。她将不再是她自身精神的主人。”

战后民族主义：银行、海军和商业

早在 1817 年门罗出任总统之前，因战争而激发出来的民族主义就已露出了苗头。在向国会提交《根特和约》时发表的咨文中，詹姆斯·麦迪逊提请立法机关考虑制定一整套巩固国家的措施，其中有几项涉及到消除传统的党派观念。最为突出的是，他要求（国会）特许成立一个新的国家银行——该提议在 1816 年获得批准。但此前，在汉米尔顿提出相同建议时，他曾带头反对成立这样一个机构，1811 年，在美国第一银行的特许证到期时，他便让它寿终正寝。但现在，共和党人认为，只有成立这样一个机构，才能在必要时调动起国家资源。

麦迪逊还要求得到远远高于战前水平的拨款，以用于陆上和海上防御。虽然海军特别不被早期共和党人所看好，但麦迪逊还是促成一项计划，该计划虽从未完全付诸实施，却让美国拥有了更多更大的军舰，包括一艘装有 74 门火炮的巨型战舰，这胜过了联邦党人以前的任何提议。美国人相信，一支规模更大的海军不仅能体现国家的重要地位，还能保护美国的商业，而最为迫切的，就是打击“野蛮海盗”的劫掠行为。最后，正如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如果英美之间再次爆发战争，一支现成的海军部队将

成为国家的支柱力量。正如克莱于1816年在国会说道："我们注定要同英国进行无休止的战争，直到——如果两国中有一国不被摧毁的话——我们之间所有的冲突根源不复存在。那些看不到这个事实的人，肯定会对未来的各种预兆视而不见。"甚至连鲁弗斯·金，一位在1796—1803年间作为驻伦敦公使而努力促进美英谅解的联邦党元老，也预言道："在我国掌握无可争议的制海权以前，海上争夺会持续不断。"

在1815年咨文中，麦迪逊总统还改变了共和党的原则，呼吁实行保护性关税政策。1789年关税法虽然促进了美国的船运业，但并不含有任何实质性保护措施以使制造商免遭进口商品的竞争。汉米尔顿也不敢有更多奢望。根据后来的标准，1816年关税法虽然相当温和，但却对许多商品，特别是对英国的纺织品，征收了保护性关税。虽然当务之急是所谓英国向美国市场"倾销"廉价商品，但长远目标则是鼓励本国实现自给自足。战争让制造商们变得爱国了，现在，就连杰斐逊也对他们青睐有加。1816年辩论中最为有趣的事情，莫过于卡尔霍恩为首的南方人发表的民族主义演讲，在过去，在可见的将来，这些人却是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对者。

民族主义还在那场旨在向美国商船开放英属西印度群岛的斗争中显示出了威力。拿破仑战争临近结束之际，英国再一次对外国商船关闭了殖民地港口。在1815年伦敦谈判期间，亚当斯、克莱和加勒廷未能就取消或放宽该项禁令达成安排。结果，从1817年起，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旨在向英国施加压力的法案，最后一项是在1820年通过的，它实际上取消了对英属美洲殖民地的贸易。此举导致那些失去贸易的港口城市怨声四起，并触发了英国可能利用有损于出口商——如南方棉花出口商——的立法来实施报复的可能性。如果这场斗争胜利了，只有船主能得到好处，但就是他们，也不会从那个已不再是十分重要的行业中得到

多少利益。尽管如此，美国还是硬撑到1830年最终达成了协议，英国开放了岛屿，但同时有权给予本国商船所运载的商品以关税特惠。这场持久的斗争是“一次原则比实际利益更重要的争端”，[①] 较之关税本身，它也许更好地说明了美国民族主义的力量。

佛罗里达

门罗政府所获取的惟一领土，在规模上无法与路易斯安那购买相提并论，它是通过更加赤裸裸地显示美国决心和威胁的方式得到的。西班牙割让佛罗里达——即现代意义上的东佛罗里达和西佛罗里达——的条约，还划定了美国与西属墨西哥殖民地之间边界线，这条边界线一直延伸至太平洋，这是通往大陆帝国的重要一步。

杰斐逊和麦迪逊对佛罗里达推行了蚕食政策，许多美国公民想着有朝一日吞并整个半岛地区。不过，在1812年战争以前，人们还没有什么紧迫感，他们主要担心某个比西班牙强大的国家可能会夺取东佛罗里达，从而对美国的扩张构成强有力的挑战。路易斯安那购买案之后，对法国的担心不复存在。后来，麦迪逊对那个英国觊觎佛罗里达的错误报告有所警觉。在他的请求下，国会于1811年1月通过一项秘密决议说：“美国虽然没有表现出严重不安，……但不能坐视该地区的任何部分转入任何外国之手。”为此，行政当局还得到了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的授权。

在一定意义上，这个决议是门罗主义的先声，尤其是其中否认欧洲国家有权在西半球建立殖民地。但是，门罗主义宣布了一些普遍原则，而1811年决议只是针对某一个特定地区而言的。

---

① 哈里·安蒙：《詹姆斯·门罗》（纽约，1971年），第519页。

尽管如此，两者都源于同一个精神，不转让原则及时得到了推广。1870年，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明确地将它同门罗主义联系起来。

欧洲根本没有对东佛罗里达构成什么威胁，1812年战争后，门罗政府决定出场争夺这块领土。由于在拿破仑战争和拉美殖民战争中被拖得精疲力竭，西班牙准备抽身而出。作为交换，西班牙想为还没有起来造反的墨西哥争取一个有利的边界，它所设想的合适边界是密西西比河，这个愚蠢透顶的设想一旦付诸实施，就等于是推翻了路易斯安那购买。所以，长期的谈判毫无结果，也就不足为怪了。国务卿亚当斯对西班牙谈判代表路易斯·奥尼斯抱怨说，“您的意志堪与帕斯卡之类的耶稣会教士相媲美。”

1818年春，奥尼斯前往宾夕法尼亚休假。毫无疑问，他和亚当斯一样，都被谈判拖得精疲力竭。但是，由于安德鲁·杰克逊将军的缘故，他的休假没能持续多久。1817年12月，政府指示杰克逊清剿森米诺尔印第安人部落——甚至在他进入佛罗里达地区采取行动时，这个部落还在袭击边境地区。杰克逊在接受任命之前，还在敦促门罗抓住机会征服佛罗里达：“我们可以在不连累政府的情况下达成目标。可以通过任何渠道向我指明……美国期望占领佛罗里达，我就在60天内完成任务。”这位田纳西人后来公开说，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政府否认这个说法——这在某程度上更有可能，但华盛顿确实没有答复他的信件，并警告他不要鲁莽行事。门罗和陆军部长卡尔霍恩对后来发生的事情想必不会感到意外：这位急不可耐的将军率领3000人进入西班牙领土，在将印第安人驱逐出去后，继续向前推进并夺取了圣马科斯和彭萨科拉。1818年4月，他还处死了两名被他抓获的英国人罗伯特·安布里斯特和亚历山大·阿巴斯诺特，前者是一个有钱

的士兵，后者则是一位同印第安人做生意的商人。[①]

奥尼斯匆匆忙忙赶回华盛顿，深更半夜叫醒了国务卿亚当斯，要求举行会谈。第二天，他坚持要求归还两地，“对这种无法无天的冒犯行动做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同时对那位将军予以法律惩处。”门罗内阁的大多数成员都准备满足这些要求，卡尔霍恩对其下属的所作所为特别恼火，但亚当斯据理力争，说杰克逊之所以采取行动，是因为西班牙无力维持佛罗里达的秩序。急于对马德里保持压力的总统，接受了这个主张。

门罗让亚当斯传话给奥尼斯说，下一届国会很有可能会就兼并佛罗里达进行表决，并坚持把格兰德河作为西部边界。稍后，国务卿又起草了一份冗长的声明——为了不使其工作有所延误，他没有宣布他母亲去世的消息——以便让美国公使转交给西班牙。[②] 这份很快就公布于众的文件，语气生硬，强词夺理，盛气凌人。亚当斯开篇就通知马德里说：“总统既不会采取惩罚措施，也不会斥责杰克逊将军，因为该行动完全是受最为纯洁的爱国主义所驱使的。”不过，他的主旨，在于警告西班牙必须控制印第安人，要么“就把该省割给美国，因为她不过在名义上占领着该地区，但事实上，它是一块无主之地，随时会被美国的任何敌人——无论是文明的敌人还是野蛮的敌人——所占领，除了给他们带来烦恼之外，它没有任何其他的实际价值。”这番威胁也许是不必要之举，因为杰克逊的入侵惊醒了马德里，促使其指示奥尼斯达成协议。不管怎么说，1819 年 1 月开始了真正的谈判。

双方谈判代表均认为佛罗里达的割让乃是大势所趋，他们千方百计地在划定美墨边界问题上获得最大优势。因此，正如乔治·丹杰菲尔德所说：“他们就像某个光线昏暗的场上的两名摔

① 杰克逊后来说，他为没有另外绞死西班牙总督而感到懊悔。

② 声明打印稿有 29 页。

跤手，……在梅利什地图上不停地斗争着”，这种地图尽管不够精确，但却是当时的标准。[1] 亚当斯的处境尤其艰难，直到最后，他还坚持将墨西哥一边的河岸而不是河流中心线作为两国边界，但双方最终在2月份达成一致。美国得到佛罗里达，作为交换，向西班牙公民支付500万美元的补偿金，而不是支付款；横跨大陆的边界线，东起萨拜因河，即今天的得克萨斯东部边界线，向西沿着北纬42°线，亦即今天的奥勒冈南部边界线，蜿蜒曲折一直延伸直到太平洋。

约翰·昆西·亚当斯并不知道奥尼斯有权割让更多领土，因此认为这是他在国务卿任上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他在日记中写道，将边界一直划到太平洋一事，“造就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代”。的确，建立一个横跨大陆的共和国，是一种全新的、雄心勃勃的思想，他决定抛弃门罗原先提出的、相对靠近密西西比河而由北向南划定一条边界线的想法，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务卿放弃了今天的得克萨斯地区，但如果他施加更大压力的话，奥尼斯是可能做出让步的。为此，亚当斯后来遭到了极不公正的批评，因为是门罗及其内阁拒绝了他的建议并做出了决定。但在1819年，就连从来未对西班牙人慷慨大方的杰克逊都认为，这一次达成了一笔划算的交易。在亚当斯和奥尼斯签字画押两天后，参议院一致批准了条约。

事情远未就此了结。西班牙推迟了批准过程，其要价是谋求美国承诺不支持——当然包括不承认——拉美的反叛殖民地。美国还反对将大量的新土地赠给贵族，而西班牙坚持要求美国承认这一点。人们一度认为，美国人似乎会通过武力手段夺得领土。最后，西班牙做出让步，双方重新签署了条约——亚当斯确定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日期，即1821年的华盛顿诞辰纪念日——

① 乔治·丹杰菲尔德：《美好感觉的时代》（纽约，1952年），第151页。

参议院俟后予以批准。

拉美革命

门罗的传记作者写道："门罗总统在任期内，其全力关注的外交问题，是由西班牙的那个摇摇欲坠的美洲帝国所引起的。他所做的几乎所有重大决定，不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就是与其引起的各种问题密切相关。"[1] 这个"问题"的其中一个方面——实际上是一次机会，就是佛罗里达事件；另一方面则是拉美的历次革命。这些始于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起义运动，自然而然引起了美国的热切关注，用杰斐逊的话说，它们被看做是"人类奋力反抗、摆脱压迫者束缚的又一典范"。拿破仑垮台后，西班牙腾出手来从事反革命战争，在这场战争似乎就要得逞时，美国许多民众感到震惊了。殖民主义在拉美的复辟——紧接着法国民主遭到扼杀之后——将是对美国人世界观的一次沉重打击，是对美国人自 1775 年所开创的事业的一次沉重打击。

尽管美国人同情反殖民主义事业，但几乎没有哪个人主张美国应该向拉丁美洲人民提供军事支援（为数不多的志愿者或冒险家确实加入了起义军，有许多海员认为有利可图而纷纷投入到反叛国家的旗帜之下）。孤立主义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至不容任何干涉。美国更愿意充当"山巅上的灯塔"，为山下那些苦苦斗争的人提供指南。

此外，没有多少美国人相信，南美反叛者能够真正地跟随灯塔，至少现在还不能。美国认为，"那个地区的人昏昏欲睡，因（西班牙统治下的）传统而无精打采，被热带气候搞得软弱无力，因此对自身的富饶自然资源视而不见，而天主教信仰又导致他们

---

[1] 安蒙：《詹姆斯·门罗》，第 409—410 页。

在思想上逆来顺受。”人种混杂使得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在放荡不羁的种族标准上，在对污染白种人血液的社会后果漠不关心的问题上，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都要受到指责。”① 总之，他们是劣等种族，他们的前途毫无希望。因此，许多——如果不是绝大多数——美国评论家既“同情拉美人的事业……又怀疑他们是否有能力善待独立，如果他们赢得独立的话”。②

在政界，这种观点俯拾皆是。1816 年，一向尖酸刻薄的共和党老派人物约翰·伦道夫预言说，拉丁美洲正滑向“面目可憎的专制主义”。他指出：“在西班牙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起自由的——人们倒不妨试着用松树枝搭建一座 74 层的楼房。”第二年，当时最有思想的杂志《北美评论》警告说，反殖民主义起义的胜利，“并不能证明人们有能力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评论》接着指出，拉美人“缺少那种道德品性，而这是稳定而又自由的政策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必不可少的前提”。约翰·昆西·亚当斯提出同样的理由，为其推迟对新国家的承认——至少在佛罗里达问题解决之前——进行辩解。1821 年，他对主张立即承认的急先锋亨利·克莱说：“就他们正在争取独立而言，我衷心祝愿他们的事业；但我还没有看到——现在也看不出——这种前景，即他们会建立起自由的或开明的政府制度。”连克莱也对这个基本说法表示赞同，但他希望，美国的南部邻国终会取得进步，但就目前而言，他认为那些地方“充斥着专制和奴役，到处都是宗教裁判所和迷信活动”。③

然而，美国人期望西班牙军队失败，这不仅是出于良好的现

① 迈克尔·H. 韩德：《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外政策》（纽黑文，1987 年），第 59 页。

② 阿瑟·普雷斯顿·威特克：《美国与拉美的独立》（巴尔的摩，1941 年），第 187 页。

③ 克莱也曾于 1821 年对墨西哥有过同样的描述。

实考虑，而且是因为他们憎恶殖民主义。1812 年战争结束后，对拉美的贸易急剧增长，尽管事实上大部分贸易流向了仍在西班牙严密控制之下的古巴。尤其是在新奥尔良和巴尔的摩这两个联系最多的港口，人们希望（贸易）进一步增加，如果西班牙不去努力恢复其垄断制度的话。乐观派梦想着建立一个“美洲体系”，一个由华盛顿领导的国家集团，进行切实合作，摆脱欧洲的影响，即使其小成员按照美国的标准还不是合格的共和国。亚当斯对这种想法极为反感：“至于美洲体系，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北美和南美之间并没有任何共同利益或共同原则。”但从一开始起，他和门罗就已打算在时机成熟时承认拉美各国。

华盛顿几次——1810 年第一次——派遣特别使团前去考察拉美实况，敦促反叛者建立共和政府。“海员和贸易代表”——偶尔也有领事——得到了任命，到那些反叛者所控制的港口任职。1815 年 9 月发表的一项中立宣言，承认了反叛者的交战权，从而明显地偏向了他们一方。但总的看来，美国仍是小心谨慎的，在佛罗里达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它担心会惹恼西班牙。私掠船船主们无法无天，其中许多船主是美国人，他们用那些在美国港口武装起来的船只进行运输。美国对此大为光火，1817 年，派军队摧毁了他们的一个据点阿梅利亚岛，该岛位于佛罗里达和美国边界附近。

虽然门罗内阁早在 1817 年就讨论了全面承认一个或几个反叛政府的问题，虽然面临着来自国会内外的巨大的承认压力，但总统不为所动。1820 年，他在给老搭档艾伯特·加勒廷的信中说：“就这些殖民地而言，我们的目标是在道义上支持它们，将美国的力量投向它们一边，但又要避免深陷其中而成为冲突的一方。……我对此感到满意，即如果我们参战的话，我们给他们带来的伤害会比好处多，因为我们可能会把整个欧洲引到他们那

里，更不用说我们可能还会伤及到我们自身。”这个小心谨慎的方针是门罗的一生在这个阶段的典型表现，它得到了国务卿的衷心拥护。

最后，随着佛罗里达转入美国手中，随着南美大陆的斗争浪潮决定性地朝着不利于西班牙的方向发展，门罗和亚当斯做出决定：承认拉美那些最稳固政权的时机到了。他们意在一石多鸟：树立美国影响并削弱欧洲势力，促进贸易，鼓励共和制度的发展——尽管期望不高。1822 年 3 月，门罗请求国会拨专款——国会很热心地给了钱，以便在阿根廷、智利、大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等五个新国家设立外交机构。1823 年 1 月，他提名了派驻这些国家的公使。提名者中间包括拟派往墨西哥的安德鲁·杰克逊，但这位将军显然要比门罗和亚当斯更了解自己的脾气，因此婉言拒绝了这项外交提名。甚至早在这几个提名人得到批准并赴任之前，行政当局就在 1822 年 6 月正式接受了大哥伦比亚代办曼努埃尔·托雷斯。此后不久，美国进一步承认了墨西哥。[①]

虽然拉美革命政权业已相互承认，但还没有哪个其他国家如此行事。美国的承认尽管姗姗来迟，却并非没有风险。西班牙虽然失败了，但却拒不放弃帝国梦想。人们还在担心，结成“神圣同盟”的欧洲大陆国家是否会向西班牙提供军事援助。果真如此，美国又当何去何从？面对西半球帝国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回潮”，它是甘愿接受呢，还是敢于挑战呢？到 1823 年之时，这个问题变得迫在眉睫了，至少看起来是如此。美国政府的回答，表现为 12 月 2 日门罗向国会提出的年度咨文。

① 墨西哥早期的反抗运动屡遭镇压，1821 年终于取得成功。君主制度——实际上有着帝国的形式——的事实并非让门罗和亚当斯退缩。君主制度不到一年就被推翻了。1824 年，美国承认了巴西帝国。美国还把正式承认扩大到所有拉美国家，只是黑人国家海地直到 1862 年才得到承认。

门罗主义：反殖民化

然而，在这篇咨文中，门罗在阐述其国际关系思想时，并没有局限于拉美问题。门罗主义——人们在多年后才使用这个词——还在另外两个方面表明了立场。综合起来看，这些声明确立起一种政策模式，它既反映了当时的民族主义，也指明了未来的方针路线，尽管在付诸实施上有时有所延迟。总的看来，这些声明还相当于一份外交独立的宣言书。

1823 年，争论的焦点之一涉及太平洋沿岸的领土问题。1819 年与西班牙的条约划定了远西地区美国领土的南部边界，但在北方，美国还面临着英俄两国的竞争。1811 年，美国人在哥伦比亚河入海口附近建立了一个小哨所阿斯托里亚，除此以外，他们的势力只限于游弋于海岸的商船、捕鱼以及对印第安人的贸易。英国人和俄国人的活动要多得多，前者的范围横跨了整个加拿大，而后者则从阿拉斯加向南推进。1821 年，主要是由于对美国海员的活动的不满，宣称拥有北纬 51°以北太平洋沿岸的俄国，命令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船只远离其海岸。在这个距离国家中心区域 3000 英里之遥、远在今天美加边界以北的地区，美国挡住了俄国的挑战，从而表明了美国的野心已经扩大到了何等地步！

早在 1819 年，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就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宣布，全世界都必须“了解这样一种思想，即我国的适当领土疆域是北美大陆”。1821 年，在就落基山以西领土进行漫长而又激烈的谈判时，他对英国公使斯特拉福德·坎宁说：“我们确实认为，英国政府业已得出结论认为，在北美大陆领土问题找我们的岔子，既不是它的政策，也无利益可得。”1823 年 7 月，针对俄国的敕令，他向沙皇特使图尔男爵指出，“对俄国在本大陆建立任何（新）领地的权利，我们要坚持抵制。”几个月后，经

亚当斯建议，门罗决定在国会咨文中反映出这种情绪。咨文向世界宣布，“美洲大陆由于其确立并保持的自由和独立的情势，从今以后不再是任何新的欧洲殖民的对象。”

门罗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非殖民原则，就是这样形成并宣布的。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草率鲁莽，在逻辑上，这是因为它是基于美国自己所拒绝承认的一个说法——印第安人部落业已建立起值得尊重的“自由而又独立的”政府；在政治上，是因为它向那些远比美国强大的国家提出了挑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是自私自利的，因为它所反对的，只是欧洲国家的扩张权利。正如一家英国报纸后来评论道：“直截了当地说，美国佬的意图是，美国希望把特权垄断在自己手中，从而在美洲大陆……各地……建立起殖民地。”

不管这个宣言是多么地目空一切，它并未将反帝国主义或民族利己主义推至不合理的地步。通过使用“从今以后”这个词，门罗清楚地表明，就目前而言，美国无意挑战欧洲现存的殖民地。比如较之1776年或1812年，确实没有多少人谈及要夺取加拿大。无论如何，即使在那些尚未殖民化的地区，门罗和亚当斯也不得不采取妥协调和的立场。1818年，他们就已经同意沿着北纬49°线将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边界延伸至落基山脉。在门罗主义提出后开始、1824年结束的谈判中，美国承认俄国拥有北纬54°40′以北的太平洋沿岸地区。不过，1823年宣言所表达的充满自信的民族主义，却引人注目。

“大调情”

1822年和1823年，四处传闻说，以俄法两国为首的欧洲保守王朝企图向拉丁美洲的西班牙提供援助，此前，两国业已干涉了西班牙事务，恢复了反动国王斐迪南七世的统治。这些传闻引

起的担心在今天看来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欧洲国家从未想采取任何干涉行动，而且肯定不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1] 一些美国外交官在从欧洲发回的报告中也作了如此猜测，另一些人并不相信，但报纸上却是流言四起。除约翰·昆西·亚当斯以外，所有美国领导人都确实产生了恐惧心理。早已明确反对神圣同盟之所作所为的英国，似乎一样地忐忑不安。

1823 年 3 月，在卡斯尔雷勋爵自杀身亡后接任外交大臣一职的乔治·坎宁，把不久前给英国驻巴黎大使下达的训令公布于众。坎宁在给查尔斯·斯图尔特爵士的信中写道，虽然英国给予正式承认的问题有待决定，但“事态的发展似乎实质性地决定了拉丁美洲业已脱离了母国”。因为同利物浦政府中的那些同僚相比，坎宁是远远超前了，所以他必须谨慎行事。斯图尔特信件既没有警告西班牙必须停止镇压拉美各国反叛运动的行动，也没有威胁要阻止欧洲国家对其提供援助。尽管如此，这封信使坎宁站到了造反者一边，从而受到了美国的热烈欢迎。英国驻华盛顿代表报告说：“您在欧洲大国政治中所采取的路线产生了影响，在美国，英国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了。”他还在一封私人信件中以略带惊讶的口吻说道：“就连亚当斯也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

8 月，在上述报告的鼓舞下，坎宁同美国驻伦敦公使理查德·拉什进行了接触。他建议双方发表一项联合宣言，核心是把斯图尔特信件国际化并加以引伸。坎宁提议双方一致同意宣布：“我们本身毫无阴谋。我们认为西班牙恢复殖民地的努力毫无希

---

① 有几个欧洲政治家，特别是法国外交大臣，不经意地谈论着所谓的“波旁王朝计划”。根据该计划，一支规模不大的海军和陆军部队将开进拉美各国，通过威胁和谈判，建立起由波旁家族成员而不是斐迪南及其王室所统治的王国。一位地位不亚于威灵顿公爵的人认为，该计划实施起来易如反掌。虽然与大规模入侵南美大陆相比，这个计划并不是那么不切合实际，但即使在欧洲大臣中间，支持也是十分有限的。

望。……我们本身并无占领任何殖民地的企图，（但）我们也不能态度冷漠地看着其中任何部分转入任何别的国家手中。”拉什不愿意承担起接受坎宁建议的责任，不过，假如这位外交大臣愿意正式承认某个或者更多拉美国家的话，他还是会接受这个建议的。然而，他还是把这个建议报给了华盛顿，并在此后几个星期里就此事同坎宁交换了意见。这就开始了坎宁所说的“大调情”，即建议美英联合，一方面阻止欧洲阴谋家的诡计，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美英关系。

10月，就在亚当斯从马萨诸塞州探望他的父亲返回之前，拉什的报告抵达华盛顿。门罗总统向两位长辈杰斐逊和麦迪逊征求意见。他并没有明确同意接受坎宁的提议，但却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即“我们最好是全面而又彻底地响应那个提议”。他对坎宁邀请美国加入世界大国俱乐部、使美国享有维护拉美各国独立的机会持欢迎态度。前任总统对此表示赞同，不过，杰斐逊不无道理地指出，拟议中的宣言所包含的自动放弃原则会阻止美国夺取古巴。

不干涉原则和孤立主义

11月初，门罗从弗杰尼亚的度假地返回华盛顿。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他与4位内阁成员围绕本届政府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了讨论，亚当斯和陆军部长卡尔霍恩支配了这些讨论。由于他们只有拉什的信件、其他驻欧洲的美国外交官发回的一些报告以及几份剪报可供参考，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犹如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瞎摸乱碰。由这样一个不了解情况的小团体做出如此重要的决定，实属罕见。

内阁会议开始后，门罗显然倾向于接受坎宁的提议。亚当斯表示反对。他并不认为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威胁，也不相信这种进攻——如果实施的话——能够取得多大成效。他还指出，如果反

叛者十分软弱以致需要援助的话，也不能“把我们的人员和财富装在一艘……连耗子都已经弃之而去的船上”。不管怎么说，以一个小伙伴的身份——全世界都会这么认为——同英国联盟，是有失尊严的：“向俄国和法国公开表明我们的原则，要比充当英国军舰后面的一只小艇更光明磊落，更体面尊严。”与此对应的是，卡尔霍恩强烈地认为，美国不应当失去一个把拉丁美洲从反革命的进攻中拯救出来的机会。虽然总统迟迟未做最后决定，但他似乎赞同陆军部长的意见。

正在此时，拉什又报告说，坎宁已不那么热心了。门罗和亚当斯由此得出正确判断，认为这是英国相信威胁已经消失的表现。亚当斯的看法、欧洲的信息或许还有对美英结盟的政治后果的担心，终于促使总统决定拒绝接受坎宁的建议。[①] 美国将独自采取行动。

在进行上述讨论之时，亚当斯还对沙皇驻华盛顿特使图尔男爵就俄国政策所发表的一项声明做出了反应。国务卿称这份说帖是“对遭受失败的革命事业的一次胜利，它有着千方百计要扑灭革命的顽固之心”，因此毫无疑问构成了意识形态挑战；人们还可以把它看成是干涉即将发生的又一明证。亚当斯虽然不相信会发生干涉，但他从中看到了机会，即表明美国反对干涉的立场，同时又不给人留下跟着坎宁亦步亦趋的印象。因此，他起草了一份措辞激烈的、得到门罗批准的、送交图尔的照会，其中，他为共和制度进行了辩护，并警告说，美国“绝不能坐视西班牙以外

① 然而，总统咨文发表后不久，又收到了关于法国有意向拉美派遣一支小规模军队的新报告。根据门罗的指示，亚当斯给拉什写信说，组织远征的这段时间很快就会过去，“但如果必要的话，仍可被英美两国加以利用，以进一步协调行动，抵制那个计划，如果该计划确实存在的话。”此时此景，亚当斯究竟作如何想——更不用说门罗了——人们不得而知。因此，尽管门罗政府此时决定单独行动，但“美英两国的未来关系……却仍未明确界定”。〔厄内斯特·R. 梅：《门罗主义的形成》（马萨诸塞州剑桥，1975 年），第 228 页。〕

的任何欧洲国家强行进行干涉，……从而恢复西班牙对美洲业已解放的各殖民的统治”。[1]

在亚当斯看来，这样做就够了，即美国公开表明了立场。但门罗决定向欧洲提出一项公开警告。总统吸收了亚当斯的观点，采用了他的话。他在年度咨文中宣布：“我们不能坐视任何欧洲国家进行任何旨在压迫拉美国家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控制其命运的干涉，我们只能认为这是对美国不友好的态度的表现。”这就宣告了门罗主义的不干涉原则。

在亚当斯看到拟议中的门罗咨文的草稿时，他总的说来是对他所读到的文字表示满意的，但其中一段话让他感到不安。门罗原打算谴责法国对西班牙进行干涉并恢复斐迪南七世的王位，与此同时赞扬希腊争取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独立斗争（希腊的正义事业在美国家喻户晓，艾伯特·加勒廷甚至建议把海军军舰借给希腊人使用）。亚当斯表示反对，认为这不仅会冒着卷入欧洲政治的风险，而且那个旨在促使欧洲不介入拉美事务的要求的效力，会因为美国介入跨大西洋事务而理所当然地遭到削弱。结果，在以温和口吻确认“支持大西洋彼岸同胞争取自由和幸福事业的最诚挚的感情”之后，咨文进一步指出，“在欧洲国家的历次战争中，在涉及这些国家的事务上，我国从未介入过，现在这样做也不符合我国的政策。”因此，咨文再次阐述了孤立主义的主题，并将其同门罗主义联系在一起。

门罗主义

1823年12月2日，门罗发表了长达51段的咨文，总的说

① 这份照会还包含了关于不转让原则的陈述，这个原则虽然接近不干涉，但却是门罗咨文所没有的。

来，他不是死气沉沉地总结了前一年的事态——在建国初期的总统中，他也许最无文采——就是提出了一系列国内政策建议。但其中一段宣告了非殖民化原则，另一部分则用一段文字分别阐述了不干涉和孤立。

这两段话在当时触怒了欧洲的国务家们，以致在后来几十年中，欧洲各国拒不承认门罗主义有什么合法性，认为它不过是道出了美国的野心。19世纪50年代，一位英国外交大臣还不屑一顾地说道："门罗主义……只能被看做是那个地位显赫的提出者的声明，它并不是规定欧洲国家行为的国际准则。"

门罗的那些欧洲同代人深知，眼前不会发生对拉美的干涉，因此对他发出的无缘无故的警告心存反感。坎宁尤其如此。在拉什拒绝对他的"调情"做出反应之时，他迅速调转了方向。11月，巴黎批准了英国外交大臣同法国驻伦敦大使波利纳克亲王举行会谈的备忘录。在这份文件中，大使向坎宁保证，法国并无干涉拉美的任何计划。10天后，在对上述备忘录毫不知情但对拉什早先的关于形势日益明朗的报告而心存慰藉的情况下，门罗向国会提交了咨文。坎宁对门罗抢先一步发表声明的做法感到恼火，尤其是因为他担心此举可能削弱英国在拉美的影响。结果，他在1824年3月公开了那个备忘录，稍后不久，他又说服他那些不太情愿的同僚们赞成英国承认其中三个新独立的国家。在后来的几年里，他颇为成功地促使拉丁美洲人相信，在1823年，是英国而不是美国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欧洲保守派对美国人的那种"胜利感"——一种高傲虚幻的共和主义论调——持有一种非常消极的态度。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亲王在一篇著名的文字中写道：

> 我们目睹其诞生和发展的合众国，突然离开了那个对其野心来说过于狭小的地区，并以一种新的反叛行为让欧洲目瞪口呆，较之前者，这种行为愈发地毫无道

> 理，十足地厚颜无耻，同样地危险凶恶。他们已经宣称要建立……一个又一个圣坛。……他们放任自己发动这些毫无道理的进攻，在发生革命的任何地方摇旗呐喊，……给那些作乱犯上之徒提供了新的力量，壮大了每一个阴谋家的胆量。

美国人的反应截然不同。国会未能正式支持总统所倡议的原则。1824年，哥伦比亚建议在不干涉原则的基础上与美国结盟，但遭到拒绝；第二年，巴西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同样遭到拒绝。1826年，行政当局建议派遣代表团参加巴拿马美洲国家会议，引起国会的激烈争论，以致最后在约翰·伦道夫与亨利·克莱之间进行了一场决斗，所幸没有造成流血。虽然提名的特使最终获得了任命，但由于担心建立政治联系会引火烧身，出使任务的成行一再拖延，以致当那个惟一的代表真的抵达巴拿马时，会议已经结束。[①] 但在1823年，举国上下对门罗所提出的原则，还是做出了积极的反应。英国代办的报告说："显然，那种直截了当而又雄心勃勃的语调，引起了所有人的共鸣，它同人们所表达出来的……情绪完全一致，其反响之大，全国上下到处可见。"

在此后的一代人时间里，门罗主义的各项主张几乎没有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②] 在1848年欧洲爆发民族主义与共和主义革命以前，人们甚至天真地认为，没有必要告诫美国人民卷入跨大西洋事务带来的危险，正如其希腊革命时期的所作所为

---

① 种族主义因素也起了作用。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反对美国与会，因为这次会议上有"五个将黑人与白人同等对待的国家，它不仅写进了宪法，而且体现在现实生活之中……这些国家的军队中甚至有……黑人将军，国会中还有混血人议员！"

② 第一部美国外交史，西奥多·莱曼的《美国外交》（波士顿，1828年），并未提及门罗咨文。直到1848年，威廉·H.西沃德在约翰·昆西·亚当斯的一本传记中还认为可以忽略这个问题。

那样（美国在 1848 年的反应，口头上是热烈支持，但实际上绝不采取任何行动）。无论是与英国就俄勒冈前途进行的谈判，还是与俄国就阿拉斯加南端以北纬 54°40′为界进行的协商，非殖民化原则都未起到任何作用。英国在 1833 年占领福克兰群岛，在 19 世纪 30 年代从中美洲的伯利兹殖民地向外扩张，都没有引起多大关注，当然就不会遭到华盛顿的反对。

可以说，不干涉原则在其形成之前完全是多余的，至少就其作为欧洲国家的一次重大行动而言是如此。坎宁曾对此做出过保证，虽然他可能是多此一举。多年以后，在 19 世纪 50 年代，美英两国就中美洲影响展开争夺之时，特别是在 60 年代，当法国的拿破仑三世企图在墨西哥建立卫星帝国之时，形势表明，似乎确实没有必要回到 1823 年宣言上去。欧洲的干涉乃是源于商业方面的不满——如 1838 年法国在墨西哥和阿根廷的所作所为，而这些干涉不值得大惊小怪。

不干涉主义的宣布也没有为美国带来门罗等人所期望的政治和经济好处。除了在 1889 年前坚持君主制度的巴西以外，所有拉美国家都在名义上建立起共和制政府，尽管如此，除了极个别的短命政权，权力都把持在军事领导人和寡头集团手中。如果说美国希望造就一个共和主义的西半球的话，那么它只是在名义上获得了成功。独立战争期间一度繁荣的贸易，此后便趋于萎缩，从而印证了亚当斯原先的警告，即“他们不需要我们的任何产品，我们能够从他们那里购得的商品也寥寥无几”。美国工业在内战后得到发展之前，英国的商品和信贷在南部大陆居于支配地位。一位历史学家最近指出：“到 19 世纪 20 年代末期，在美国与拉美关系的诸多领域，弥漫着一种悲观失望情绪。对北美人来说，贸易、体制以及英国在拉美的支配地位令人失望；对拉美人来说，北美人目空一切、高关税以及扩张主义或漠不关心的态

度，粉碎了他们原先抱有的较高希望。”[1] 直到19世纪临近结束之际，美国才开始在南美国家中发挥主要作用，但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却常常引起拉美人的怨恨。

从某种意义讲，门罗总统的咨文只是相当漫长道路上的一个路标。长期以来，独身于世界政治之外一直是美国的一个理想，非殖民化和不干涉主义显然有着更早的历史渊源。实际上，门罗认为他对当前的危险做出了反应，而不是提出了又大又新的原则。当时，他强调这些原则乃是出于防御目的——指出了其他大国所不能做的以及美国所不愿做的，但在后来，它们却成为美国扩张和保卫西半球的工具。1823年提出的这些原则，尽管迂腐而又消极，但却确定了一个同国民特性非常一致的对外政策大框架。虽然在付诸实施方面有所推迟，但门罗主义“永远不会……失去原先那种无畏的、促使美国谋求世界政治领导地位的特性，这种特性在1823年确实是过早地形成了。”[2]

门罗宣言确实是始于1776年的那个漫长探索历程中的一个顶点。美国已经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政府，巩固并扩大了领土范围，经历了同两个大国就中立权问题的争论而幸存下来。如今，它比以前更加明确而又大胆地在重大问题上表明了自身立场，这在历史似乎还是第一次。门罗总统的“政策声明是一项外交独立的宣言书”。最后，美国“抵达了距离1776年如此遥远的地方，终于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性。”[3]

---

① 佩吉·K. 利斯：《大西洋帝国》（巴尔的摩，1983年），第221页。

② 丹杰菲尔德：《美好感觉的时代》，第308页。

③ 安蒙：《门罗总统》，第491—492页。

第七章 天定命运

领土扩张的思想是随着美国的诞生而形成的。根据特许状，绝大多数英属美洲殖民地都得到了远至太平洋的领土。在《邦联条例》中，新国家明确为加拿大预留了一席之地。1801 年，杰斐逊展望了“遥远的未来，到那时，我国会迅速扩张到……覆盖整个北美大陆，如果不是南美大陆的话，人们将使用同一种语言，受治于相同的体制和类似的法律”。

杰斐逊写下这段话的时候，美国拥有 83.8 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这个面积相当于英王国——它已从中独立出来——的 8 倍。购买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之后，国家的领土疆域扩大了 1 倍以上，但规模最大的领土扩张，至少在地理意义上，发生在 1845 至 1848 年间。得克萨斯的兼并、俄勒冈边界的划定和墨西哥战争的征服地，所有这些都是在詹姆斯·K. 波尔克政府任内完成的，它们使美国的陆地面积增加到了 300 万平方英里。后来在 1867 年，阿拉斯加的购买又使美国的北美大陆版图扩大到今天的 350 万平方英里。巴西、加拿大和中国的面积与此大体相当，惟有俄国拥有更大规模的领土，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后，其面积仍是美国的两倍之大。

大陆主义的含义

美国扩张的历程，突出的是实力的作用，而不是像许多人常常认为的那样，是美德或道义原则的作用。只有 1853 年从墨西哥购买的弹丸之地加兹登以及阿拉斯加的获得，是通过自由谈判的方式加以转手的，但就连这一点也值得争论。波拿巴出卖路易斯安那的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在出卖窃取来的财产——是受到了美国威胁的影响。西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的获得，则是在外国领土上的美国定居者揭竿而起、建立起自己的政府并寻求美国庇护的情况下实现的。在获取佛罗里达其余地区和确认对俄勒冈地区的控制权上，武力威胁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占领敌国首都为顶点的入侵墨西哥行动，则导致了向加利福尼亚和西南地区的大举扩张。

不仅西班牙人和俄勒冈赫德逊湾公司的加拿大雇员，甚至墨西哥人，都感受到了美国实力的冲击，看出了美国实力的影响。美国占领佛罗里达时，居住在该地区的西班牙人不到 2000 人；1846 年获得俄勒冈时，赫德逊湾公司的雇员只有区区数十人；美国入侵加利福尼亚时，那里的墨西哥人也只有 1.1 万人。更多的是印第安人，他们更担惊受怕，心中怨恨更大，得到的待遇更粗暴，遭到的排挤更野蛮。例如，在 1846 年，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约有 10 万，到 1860 年只剩下 1/3。

在美国政府的政治理论中，印第安人部落的地位乃是奇特的。由于他们未被看作是主权实体，因此国务院没有受理美国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由陆军部负责，但在 1871 年以前，他们是被当作“民族”来对待的，他们进行宣战、媾和、谈判缔结条约，主要是为了白人的利益而割让土地。大致由杰斐逊发明的“预先占有”概念，“承认印第安民族对其所拥有领土的合法权

利，同时也承认入侵者购买领土的合法权利，从而免于担心这些领土会卖给某个敌对……国家。”[①] 购买条约往往是通过运用武力、恫吓和欺骗手段来达成的。即便如此，购买方通常还是不能履行他们承担的那部分义务。

根据《韦伯斯特大词典》的定义，“帝国主义”是指“获取新的领土或附属地，……或……将（本国统治权）扩大到其他种族”。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尽管它们通常都会给土著居民带来不幸后果。大多数帝国主义，包括1898年美国的帝国主义，都涉及到由某个外来少数民族控制人口众多的“其他种族”的居住地。美国人在北美大陆“获取新领土”的过程中，极力排挤或消灭而不是剥削印第安人，尽管奇卡诺印第安人遭到严重歧视，但由于美国定居者的涌入，他们很快就沦为一个很小的少数民族，从此之后，在可供开发的新领土的劳动力资源中，他们再也未能占据支配地位。

此外，尽管一位美国历史的主要批评者不无讽刺地提到了美国思想和言论中的“自由与扩张之间的传统平衡关系”，[②] 但这种联系却是虚伪不真的。1787年的《西北法令》——这也许是国会在《邦联条例》时期所完成的惟一重要立法——确立了这样一项原则，即合众国拥有的所有领土最终都应“根据在所有方面与最初各州完全平等的原则”获得州的地位。在1898年开始建立海外帝国之前，美国并未打算将新领土置于附属地位——本国居民的定居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最终，所有领土都变成了州。[③] 所有这些并不是要为美国的行为进行辩解，而是为了把它

① 威尔克姆·E. 沃什伯恩：《红种人的土地、白种人的法律》（纽约，1971年），第56页。

② 威廉·艾普尔曼·威廉斯：《现代美利坚帝国探源》（纽约，1969年），第87页。

③ 阿拉斯加虽然最终也成为一个州，但仍是个例外。

同另一种不同的帝国主义区别开来。

在美国早期历史上，扩张对杰斐逊和其他许多人而言有着一种极为特殊的含义。正如他在1801年的一封信所表明——“受治于相同的体制和类似的法律”，他期望美国的制度向外扩展，但并不希冀他的继任者成为北美帝国的总统。如果议员们花费大量时间，乘着马车或骑着马在选区和首都之间奔波忙碌的话，代议制政府又如何能够运转呢？他和那些持有相同主张的人设想，应该建立一个由相互独立的共和国组成的体系，其人民来自美国，高举美国榜样，接受美国阳光的沐浴。1825年，扩张主义的主要鼓吹者、来自密苏里州的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宣称：

> 共和国的西部边界应该划定（在落基山的山顶），传说中的护界神塑像应树立在最高峰，永远都不要拆除。……在把新兴强国的种子撒在太平洋沿岸之时，新政府应该独立于原先的帝国，如同儿童在成年以后从父母那里独立出来那样。

门罗有着同样的想法，在1824年年度咨文中，他曾打算阐述相互独立的共和国的原则。其内阁成员特别是亚当斯和卡尔霍恩反对此举，从而说明了旧观念正不断失去说服力。

到19世纪40年代，这种思想观念遭到抛弃。这并不是说，美国人——至少是大多数美国人——都主张通过不加区别的征服方式去扩大自由的领地。因为所有人都希望新领土能够成为州，至少在他们所认为的理想意义上成为州——如果确实已有人居住的话——既拥有类似于美国的制度，又谋求加入美国。当时的主流观点是，“任何草率加入自由圣殿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任

何强行加入的行为，都是自相矛盾的、不可思议的和大逆不道的。”[①] 当然，华盛顿常常艰难地推动着这个过程，但美国人民不想建立一个基于武力的中央集权帝国。

另一个发挥作用的因素是种族主义，它也许以一种自相矛盾的方式限制了领土野心的膨胀。当时的人都认为，墨西哥人是低人一等的混血种族，夹杂了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和黑人的血液。既然如此，他们就该为北美人让路。但是，将这个种族——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位众议员认为，他们“野蛮而又粗鲁，……顽固而又狡诈……，缺乏高贵情操”——的大量人口纳入美国疆界之内，我们会面临着两种同样令人头痛的选择：要么是他们像其他公民一样参与政治进程从而使该进程堕落变质，要么是美国自己变成一个统治着殖民地的帝国从而抛弃它的基本原则。

许多美国人根本不想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因此不大情愿充分利用在墨西哥战争中取得的军事胜利。约翰·C. 卡尔霍恩指出：“墨西哥人中有一半以上是印第安人，另一半则主要是各个混血部落。我反对同这些人组成联邦！阁下，我国政府是一个白人政府。”最后，美国夺取了墨西哥的一半领土，（领土上的居民）只占该国的极小一部分。一家民主党报纸欣喜万分地指出，美国已经设法获得了“我们所能得到的宝贵领土，同时又没有接受那里的居民”。

无论是杰斐逊所说的形式，还是后来的那些类型，扩张主义大体上都是农民的扩张行动——如同内战前的绝大多数广泛的政治运动那样，尽管在 19 世纪 40 年代还得到了杰克逊阵营中的城市势力的支持，其中甚至还产生了一些领导人物。有时，如在 1803 年，农民支持领土扩张，是为了确保通往外国市场的通道。

① 弗雷德里克·默克：《美国历史上的天定命运与使命》（纽约，1963 年），第 25 页。

但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希望为他们自己及其同路人获取新土地。无论得克萨斯、俄勒冈还是加利福尼亚，都没有提供什么市场，也未能为较早地区的农产品出口提供港口。

商业界——他们的代言人通常是联邦党和后来的辉格党——倾向于反对领土扩张。商人们认为，得克萨斯毫无吸引力可言。太平洋沿岸的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也许另当别论，一些辉格党人对普吉特海峡、旧金山湾和圣迭戈等地区有兴趣。早在1804年杰斐逊总统派遣刘易斯和克拉克寻找通往太平洋的道路之前，美国人就梦想着开辟一条富裕的、通往远东地区的航线，人们认为这必然是一条进行高价商品贸易的航线，因为诸如农产品之类的大宗货物的运输，在当时似乎是不可能的。对这种贸易来说，港口至关重要。

与英国人和墨西哥人进行谈判时，詹姆斯·K. 波尔克总统力图占有尽可能多的港口。然而，波尔克毕竟是一个杰克逊派民主党人，与大多数狂热的扩张分子一样，他的主要兴趣在于为美国定居者开辟新的领地。他之所以重视港口，至少部分地是为了争取得到那些寻求商业机会的人的支持。无论他怀着何种目的，获取太平洋沿岸港口的机会，不仅有助于说明辉格党人相对来说不怎么反对夺取加利福尼亚，而且能够解释为什么部分辉格党人支持夺取俄勒冈的叫嚣，正如这还能说明他们为什么不愿意继续争夺北纬49°线以北的地区。不管怎么说，作为务实的政客，辉格党领导人深知，包括众多支持者在内的选民，都有着“天定命运论”所表达的扩张主义热情。

天定命运

在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安德鲁·杰克逊两届政府任内，相对说来，由于三心二意，从墨西哥购买得克萨斯的努力无果而

终。他们还关注过俄勒冈地区。不过，在《跨大陆条约》签订后的 20 年里，领土扩张既不是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也没有引起情绪风波。后来，在 1845—1848 年间，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领土扩张浪潮终于形成，兼并了得克萨斯，通过美墨战争赢得了大片征服地，明确了对此前遭到英国反对的西北地区的主权。

这些成就并没有满足扩张分子的胃口。一些美国人还在谈论着整个墨西哥，谈论着尤卡坦、古巴和尼加拉瓜，谈论着夏威夷和冲绳，甚至谈论着远至巴西的一个西半球帝国——这是大海洋学家、鼓吹奴隶制的帝国主义者马修·莫里所津津乐道的计划。这些计划统统夭折，事实上，其支持者寥寥无几，部分原因在于，许多计划都想着控制"其他种族"，对此，美国人并无思想准备，只有南方奴隶制除外。尽管如此，煽风点火的行为仍持续不断，部分原因是许多人相信——正如来自印第安纳州的一位国会议员在 1847 年所指出的："如果我们停止扩张，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是一个团结向上的民族了。"

19 世纪 40 年代，甚至比这更早，形成了历史学家所说的"第二个政党制度"。民主党人满口都是杰克逊式的语言，他们基本上是杰斐逊的共和党后代；其对立面是辉格党人，即联邦主义的不太明显的继承人。在政界，扩张主义主要是民主党人的一场运动，其计划是通过民主党在国会的表决加以推动的。辉格党人认为，扩张既是需要之举，也是势在必行。他们指出，在美国扩大边界之前，现存的制度（和领土）应当加以巩固；他们还认为，现在的扩张会危及联邦内部奴隶制利益和非奴隶利益之间的微妙平衡。1845 年，辉格党的喉舌《北美评论》宣称，该党的立场是，"就纯粹获取领土而言，他们不同意打破目前存在于各州之间的和谐关系。"1847 年，一位辉格党国会议员向扩张分子提出警告说："你们正草率而又盲目地步入极其危险的境地。你们又点燃了沉寂已久的火山。"

许多辉格党人，特别是那些地位不保的国会议员，认为必须在这些问题上三缄其口，他们有时迫不得已地随波逐流，有时又强调指出，他们只是反对扩张模式而不是扩张原则。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在19世纪40年代的大背景下，反对扩张在政治上是危险的。1845年，著名的战略家瑟洛·韦德告诫其辉格党同仁说："我们绝不能采取一种同全国作对的立场。"毫无疑问，全国上下弥漫着一股领土扩张情绪。连哲学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都认为，"业已征服北美大陆许多地区的强大……民族，一定要征服得克萨斯、墨西哥和俄勒冈。"虽然他对许多扩张分子的手段痛心不已，但他还是承认，"长远地看，（扩张的）具体情形和手段无足轻重。"

19世纪40年代是一个"自由的激荡"时期，[①] 它拥护宗教复兴，发起对奴隶制、酗酒和其他恶行的讨伐运动。扩张主义是这个激荡运动的一部分，它是一场通过将外国领土纳入美国体系从而推动进步的征服运动。用爱默生的话说，"在世界历史的每个时期，都有一个领导国家，它具有更为仁慈的胸襟，其品行出众的公民愿意充当普遍正义的、全人类的利益的代表。……这样的国家，除美国之外，舍我其谁？……这样的领袖，除年轻的美国人之外，舍我其谁？"

如果说"自由灯塔"的思想——老一代人的主导思想——从未被抛弃的话，它肯定已让位于"天定命运论"。1845年，纽约的杰克逊派人物、《民主评论》杂志主编约翰·L. 奥沙利文首次使用了这个词，它所包含的几层含义，有时是自相矛盾的，或至少是毫无联系的。但总的看来，正如奥沙利文所指出的，它们表明，"我们的天定命运是，为了我们每年都在大幅增加的千百万

① 艾丽斯·费尔特·泰勒：《自由的激荡》（明尼阿波利斯，1944年），第548页。

人口的自由发展，向上帝指派给我们的这个大陆进行扩展。”护界神再也不应矗立在落基山顶了！美国必须向邻近领土进行扩张，而不仅仅是影响它们。这样做，会“使美国远离欧洲的影响，……促进更大的经济自由，并……维护民主制度”。[①]

今天，人们难以尊重天定命运论，特别是难以尊重用19世纪40年代的那种自以为是的语言说出来的“天定命运论”。然而，这些理论曾得到人们的坚决信奉；为了克服地方主义的自私自利倾向——导致南方人和北方人彼此怀疑对方的扩张，也只能如此。奥沙利文和其他扩张分子都认为，只要看一下地图，人们就会发现，上帝在设计北美大陆时就已考虑到了美国。较为温和的、后来证明是更有先见之明的人士认为，格兰德河的存在表明，上帝为美国安排了合适的边界，至少就南部边界而言是这样。无论其边界在何处，只要是富有才智和德行的美国农民所拥有的领土，他们就能加以最有效的利用，将其从印第安人、狩猎者和贫雇农的荒废和剥削状态中拯救出来。用托马斯·哈特·本顿的话说，他们会“遵从造物主的意愿”利用这些领土。

最重要的是，无论是通过清除天主教——正如一无所知派试图在共和国内部所做的那样——还是通过消灭专制的、腐朽的、殖民的或纯粹是君主制的政府，美国人将通过扩张“增加自由的领地”——借用一个显而易见是由前总统杰克逊所提出的说法。因为新领土将导致农业的急剧发展，所以，在许多杰克逊派人物看来，工业和城市秩序的崛起对真正的自由所构成的威胁，将会有所减弱。结果，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美国领导人越来越多地从领土扩张这个角度来认可自由与国家地位的大力增强之间

① 托马斯·R. 希塔拉：《天定命运论》（伊萨卡，1985年），第8页。

的关系。”[1] 1845年，詹姆斯·K. 波尔克在其就职演说中总结这个主题时指出：“外部国家似乎没有理解我国政府的真正特性。拓展疆界就是将和平（与自由）的统治权扩大到其他领土和其他民众。”

思想本身并不能促成扩张主义。原始的土地、矿产资源和商业通道，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物质利益，吸引了扩张分子。此外，扩张似乎是确保国家未来前途的必要前提。即使路易斯安那购买案所得的辽阔土地仍未开垦，但西进运动所带来的持续压力似乎促成了扩张，要么是为了保证未来前途，要么是为了把那些移居到国外去寻找处女地的人重新拉回联邦。1820—1840年，美国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而这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奥沙利文之流问道，如果不扩张，美国作为欧洲受压迫人民的避难所还能维持多久？可以肯定，这些强大的扩张动因本身几乎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天定命运论“使得民族主义者能够寻求扩张而又没有背叛其最初理想的感觉。……道德思想是自私自利的同伴，而扩张主义则是两者亲密结合的产物”。[2]

得克萨斯

得克萨斯是首当其冲的扩张对象。自1821年墨西哥摆脱西班牙统治开始，美国人受到鼓励纷纷进入其北部省份。根据1825年的一项法律，新迁入者只需交纳两百元的法律费，就可获得多达4400英亩的土地。到1830年，居住在得克萨斯的移民达到3万人，远远超过了当地的墨西哥本国人口。墨西哥政府担

① 迈克尔·H. 韩德：《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外政策》（纽黑文，1987年），第30页。

② 艾伯特·K. 温伯格：《天定命运论》（1935年，芝加哥，1963年重印），第12页。

心失去控制，转而严厉限制移民，无论是前来定居的人还是其中一部分人带来的奴隶（大约 1/4 的人拥有奴隶，其他许多人则希望拥有奴隶）。这项措施以及其他旨在促使美国人处于从属地位的行为，导致了适得其反但却是可以预料的后果：激起了革命。

1832 年曾发生过一次未遂暴动，1835 年爆发了一场更严重的暴动。墨西哥总统安东尼·洛佩斯·德·圣安纳亲自率军去北方平息暴动，他在出发前对一名英国领事说，如果美国或美国公民帮助叛乱者的话，他就“继续率军向华盛顿进发，把墨西哥国旗插在国会山上”。杰克逊总统认为，这场暴动“鲁莽唐突，很不成熟”，虽然他确实对得克萨斯人抱着基本同情的态度，但他还是极为有效地实施了中立法。1836 年 4 月，萨姆·休斯顿——他是“老核桃树”的门徒，曾在雷切尔·杰克逊的葬礼上抬过灵柩，在担任田纳西州长时奇迹般地移居到得克萨斯——率领一支得克萨斯军队在圣哈辛托击败了墨西哥人。圣安纳成为阶下囚，长猎刀和大炮在他面前炫耀，他只得同意签订条约，承认得克萨斯独立，虽然他和墨西哥全体国民不久便推翻了条约，其理由并非毫无道理，即该条约是在威胁之下签订的。然而，得克萨斯独立已是既成事实。“拉丁人允许高卢人进人帝国的古老错误，又一次重演。”[①]

作为一个摇摇欲坠的共和国，得克萨斯支撑了 10 年时间。其间，它的首都换了 10 处，绝大多数是村庄。在其中一个村庄里，英美两国公使与另外 4 个人共处一室。其未来前途有点风雨飘摇，墨西哥不愿承认其独立，经常谈论着收复问题；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美国也避而不谈兼并之事。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得克萨斯过于羸弱，以致不能独自支撑多久。

---

① 弗雷德里克·默克：《奴隶制与得克萨斯的兼并》（纽约，1972 年），第 180 页。

在决定得克萨斯未来命运时，休斯顿这位首要人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至今仍让历史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他常常混迹于印第安人之间，后者给他取的两个名字“乌鸦”和“大醉鬼”，就说明了分析的难度。1844年，美国兼并势力的一大得力干将罗伯特·J. 沃克在评价休斯顿时指出：“他头脑清醒时主张兼并，但喝醉或喝酒时却强烈反对此举。”不过，休斯顿——他后来坦言说“曾向英国暗送秋波”——以及其他担任过总统职务的次要人物，至少承认他们曾考虑过通过投靠英国而永远保持独立地位。伦敦虽然有时对此感觉高兴，但总是十分地小心谨慎，未作任何实际承诺。

得克萨斯人的策略也许是认真的，但有的时候，这样的策略不过是为了阻止美国的兼并而进行的恫吓。例如有一次，在华盛顿处境不利时，前牙科医生、得克萨斯最后一任总统安森·琼斯说：“我只得再吓唬他们一次，要给他们用上一两剂英国甘菊[①]。”显而易见，该地区的全体居民一直希望重新成为（英国的）忠实信徒，但不管他们抱有何种希望，只要美国做好了准备，政治家们是不可能阻止兼并的。

在这个地区，兼并问题一度沉寂了几年时间，这主要是因为有识之士认为，如果提及这个问题，该地区就可能在奴隶制问题上陷入危机。后来，在1843年，政治独立派人物、在威廉·亨利·哈里森去世后继承（总统）职务的约翰·泰勒总统，开始与得克萨斯进行谈判，其主要目标，在于制造一个能够让他连任的问题。1844年4月，特别为此而被任命为国务卿的约翰·C. 卡尔霍恩，缔结了兼并条约。

辉格党的亨利·克莱和民主党的马丁·范布伦这两名首要人物立即表示反对，至少在墨西哥做出妥协承认得克萨斯的独立以

① 甘菊，一种植物，其花和叶晒干后可制药。——译者

前是如此。两人强调指出——用克莱的话说："兼并就等于向墨西哥开战。"他们还明确表示，他们不希望一个地方性问题把国家弄得四分五裂。然而，卡尔霍恩表现出"他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绝不妥协态度"，[①] 信誓旦旦说要把这个地方性问题搞清楚。在一封致英国公使——同时公之于众——的信中，他辩解说，奴隶制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事物；他还宣称，兼并得克萨斯是为了挫败英国的废奴阴谋。他决心让北方承担其义务，支持这种"独一无二的制度"。

卡尔霍恩大大失算了。要是他保持沉默，或只是限于谴责英国在得克萨斯的阴谋，那么正在兴起的扩张精神会轻而易举地推动参议院通过他的那个条约。然而，他却要求参议院和全国人民承认许多扩张分子不想正视的一个问题，即兼并意味着合并一块已在推行奴隶制的领土，更糟糕的是，兼并意味着将奴隶制扩大到得克萨斯传统边界以外的广大地区——如果远至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的西南地区也"兼并进来"的话。[②]

几个月后，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这位扩张思想至少追溯到20年前的密苏里人——说道，"他赞成兼并，但决不因为"卡尔霍恩所提出的"……黑鬼理由"。作为回敬，卡尔霍恩的追随者之一罗伯特·图姆斯声称，他根本"不在乎俄勒冈"，

① 默克：《奴隶制与得克萨斯的兼并》，第60页。

② 为消除这些担忧，绝不妥协的扩张分子、来自密西西比州的沃克，提出了一个虽不是诡辩式的但却是高深玄奥的观点。他预言道，兼并得克萨斯会吸引旧南方的奴隶，而这样做，最终会因为人口减少而导致奴隶制的灭亡。他辩称，另外一种不可想像的选择，是进行一场以奴隶解放和种族冲突为高潮的斗争，即使连许多获得解放的人肯定要投靠的北方也不能幸免。因此，北方和南方在兼并得克萨斯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究竟有多少北方的扩张分子认可这种逻辑，我们不得而知，但其中一位便是奥沙利文，另一位则是来自伊利诺州的参议员布里斯，后者预言，"不动声色地、坚持不懈地实施上帝所确定的正义行动，所有黑色人种……都将找到避难所，他们在那里会实现他们自己能够理解的自由。"

而这是许多扩张分子所梦寐以求的。他还说："（在兼并得克萨斯以后），我不想要俄勒冈或其他任何地区的一寸土地，特别是那些没有黑鬼的地方。"1844 年 6 月，那些与本顿的观点一致的民主党人，同几乎所有辉格党人联合起来，以 16 对 35 票否决了卡尔霍恩的条约。

范布伦为反对兼并付出了代价，从拥护奴隶制的南方人手中失去了民主党的（总统）提名。主要是由于参议员沃克的不懈努力和前总统杰克逊的支持，来自田纳西州的忠实党徒詹姆斯·K. 波尔克从一大批角逐者中脱颖而出。该党竞选纲领——同样是沃克的杰作——大肆鼓吹扩张主义，提出要"重新兼并得克萨斯"——这是针对传闻中约翰·昆西·亚当斯在 1819 年放弃了这块领土而言的，并主张"重新占领俄勒冈"——这同样是针对传闻中亚当斯在 1818 年同英国签订条约时放弃了美国的权利而言的。沃克和民主党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力图在全国范围内挑起天定命运情绪，同时平息北方人对优先关注得克萨斯和奴隶主利益的不安。

竞选期间，波尔克及其发言人反复不断地强调民主党的坚定扩张立场，尽管它对俄勒冈的热情比不上得克萨斯。波尔克的竞选对手、辉格党人亨利·克莱则摇摆不定，这表明，克莱已敏锐地感觉到，反对扩张乃是失策之举。最后，波尔克以 170 对 105 张选举人票获胜，虽然选民票非常接近，正如通常那样，结局并不取决于某一个问题。

然而，即将卸任的泰勒总统对国会说，人民业已表达了意见。他要求议员们绕开 2/3 规则，用联合决议的形式批准那个被否决的条约的内容，从而将两个国家统一起来——如果得克萨斯接受的话。反对兼并的人士和那些关心自身特权的议员们又吵又闹。在此情况下，人们遵循了最先由沃克提出的方针，同时提出了联合决议方案和本顿建议——就得克萨斯问题同墨西哥进一步

展开谈判。至于在两种做法之间如何选择，则由总统决断。已在华盛顿的当选总统波尔克，决定支持联合决议方案；他还多方努力，如利用新政府中的官职作为许诺，“以无可指责的手段，为得到得克萨斯而施加了最后一分影响。”① 他还放出话说，他打算采纳本顿的计划，从而获得了足够多的投票，确保了“双头怪”决议得以在1845年3月顺利通过。一位记者报道说，沃克似乎是“最高兴的人，好像卫理会复兴了”。虽然没有人指望泰勒在卸任前的短短几天里会采取行动，但他还是没有理睬墨西哥方案，而是向得克萨斯提出了兼并建议。

波尔克没有收回这个建议。实际上，为确保得克萨斯的同意，他许诺要支持它对格兰德河以南和以西的所有领土的要求，这个要求包括了远至圣菲的大片领土，虽然得克萨斯作为墨西哥的一个省，其领土从未到达距格兰德河一百多英里之遥的努埃塞斯河。② 波尔克支持这种要求的态度，表明他“急于实现兼并，不仅越早越好，而且要摆出进攻墨西哥的最大架式”。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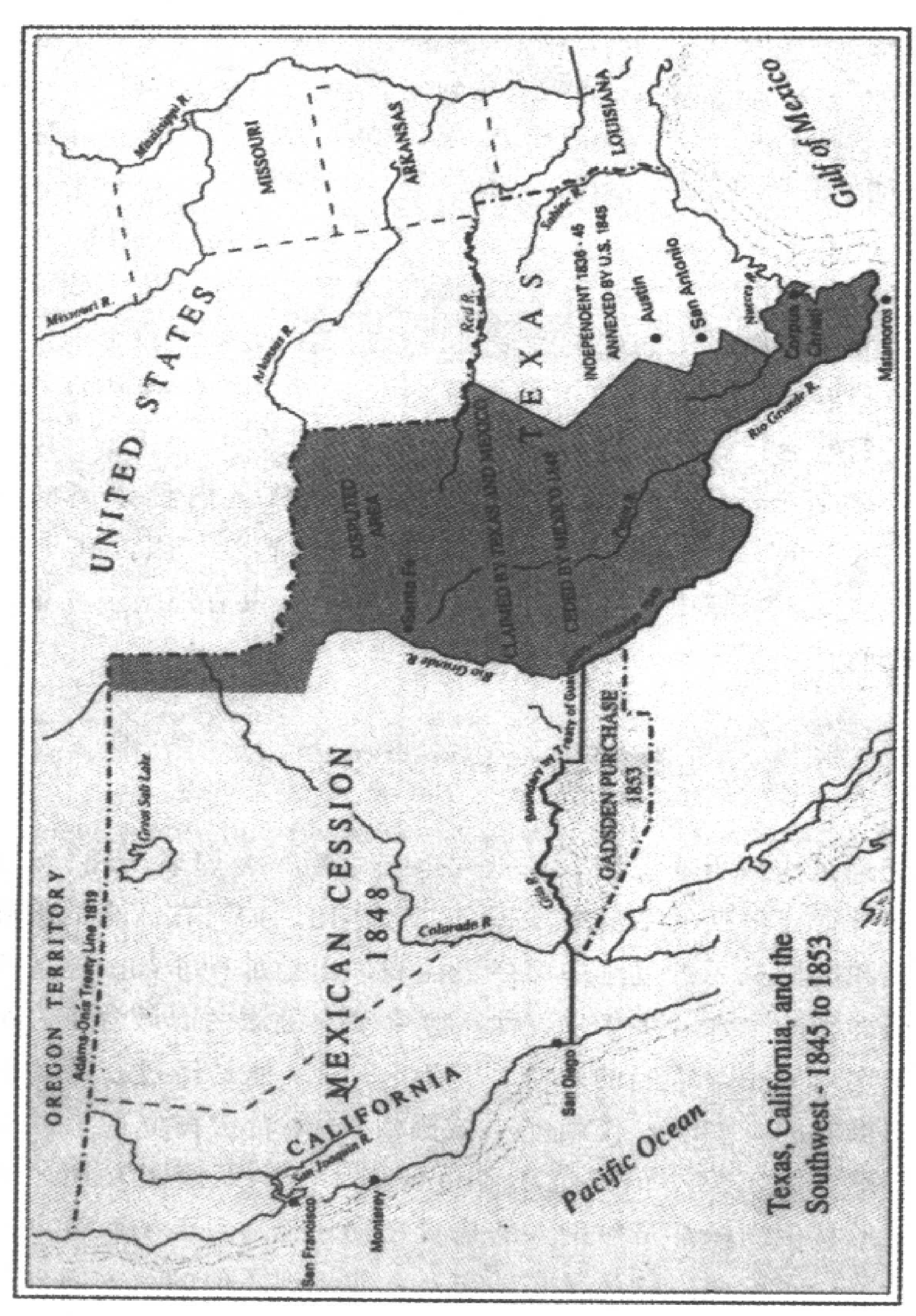
就在这时，英国终于说服墨西哥承认得克萨斯独立，条件是得克萨斯承诺不加入其他任何国家，而它的一些领导人想走这条道路。但在1845年夏，一个特别的、经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几乎一致决定接受美国的建议。这一年临近结束之际，双方达成了协议。

---

① 查尔斯·塞勒斯：《大陆主义者詹姆斯·K.波尔克》（普林斯顿，1966年），第208页。

② 海军准将罗伯特·F.斯托克顿接受波尔克的命令开赴得克萨斯海岸，他派遣一名代表去见安森·琼斯总统，敦促他向格兰德河进军。琼斯多年后回忆说，他当时回答道：“好了，各位，海军准将代表美国，希望我为他们制造一场战争。他们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实际上，仅仅过了几天，琼斯就同墨西哥达成停火协议。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或否定斯托克顿的建议得到了华盛顿的授权，但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这位海军军官越权了。

③ 塞勒斯：《詹姆斯·K.波尔克》，第224页。



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西南地区，1845—1853

在美国，特别是在北方，谴责之声不绝于耳。即使各大国已经承认了得克萨斯的独立，而这或许意味着它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但人们还是指责——这个指责还是有点道理的——说，美国

正在挑起同墨西哥的战争。然而，真正的问题，却存在于更深的层次上。早在1843年，回到华盛顿担任众议院议员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曾联合12名同僚发表声明说，兼并“就是拆散联邦”，他们呼吁各自由州不要屈从于这个计划。北方人中主张废除奴隶制的寥寥无几，大多数人不喜欢黑人，但是，出于绝对的道义和政治理由，许多人反对扩大奴隶制度，确切地说，他们反对扩大美国国旗之下的奴隶制地盘。难道美国要变成一个被奴隶主权力和奴隶主利益所统治的国家吗？在南方扩张主义势力面前，在四处流行的“天定命运论”面前，他们妥协退让了。那些为得克萨斯——他们认为这是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更崇高的事业——战斗的北方人将会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因为在1846年英美俄勒冈争端中，南方人和波尔克总统并没有用坚定立场来回报他们。

詹姆斯·K. 波尔克

无论是作为当选总统，还是在上任之后，詹姆斯·K. 波尔克在兼并得克萨斯的结局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如同在后来的俄勒冈谈判和美墨关系的过程中那样，他表现出他那种非凡的但却不是感情冲动的个性。多年来，他一直是杰克逊派的忠诚分子，虽然他是迄今为止最年轻的总统，只有49岁。他是经过奋斗才到达权力巅峰的，如今，作为“小核桃树”，他希望树立起一呼百应的权威。波尔克不信任也不尊重任何人——无论盟友还是敌人；他的日记满纸都是对别人的指责之词。他对自己的政策方向一清二楚，无论在内政还是在外交上，他实现了他的绝大部分目标。

波尔克也有重大失误，这在得克萨斯事件中已有所表现。他本人虽是个奴隶主，但对奴隶制问题却缺乏深刻感受，因此不能

理解其他人对这个问题的感受。墨西哥战争期间，国会就是否在从墨西哥手中夺取的领土上禁止奴隶制的问题进行过长达数日的辩论，从而推迟了军事拨款，波尔克抱怨道："他们不是按爱国标准行事，而是纠缠于抽象的奴隶制问题。"他的其他缺陷包括"狭窄的党派观念、不坦率、热衷于诡秘和躲躲藏藏"。[①] 一位当代人指出，他因此得到了"他自以为是精明但实际上是装腔作势和表里不一的奸诈狡猾"的名声。本顿之流在得克萨斯辩论中就吃了他的苦头，而那些一心要夺取俄勒冈的人不久也会对此怨气冲天。

在执政的最初几个月里，波尔克以赞许的眼光注视着得克萨斯的兼并进程，并让国务卿詹姆斯·布坎南着手进行俄勒冈谈判。1845 年 12 月，在第一个年度咨文中，他重申了门罗在 1823 年确立的各项原则，但却明显地歪曲了这些原则。他之所以重提门罗，部分地只是想借此谴责英法两国在得克萨斯所玩弄的旨在阻止美国兼并该地区的阴谋诡计。[②] 他在同本顿谈话时指出，最重要的是，他意在重申"门罗先生反对外国殖民化的原则"；他接着说，"我这样做，乃是考虑到加利福尼亚和美丽的旧金山湾……"他对这个墨西哥省份的垂涎之心，促使他认真对待那些显示英国野心的表面的、不真实的迹象。[③]

在这个咨文中，波尔克再次强调欧洲政治与美洲政治的相互

---

① 约翰·H. 施罗德：《波尔克先生的战争》（麦迪逊，1973 年），第 4 页。

② 在 1842 年国情咨文中，泰勒总统在心中想着得克萨斯，在声明美国不干涉欧洲政治之后，他写道："我们也许能够指望，欧洲各国政府同样不会干涉与美洲大陆各国有关的事务。"事实上，较之先前门罗和不久后波尔克所使用的语言，这番言论算是温和的了。

③ 1842 年 10 月，作为对所谓加利福尼亚已经被割让给英国这个传闻的反应，海军准将托马斯·盖茨比·琼斯对蒙特里实施了为期两天的占领，当得知报道有误时，他尴尬万分地撤军了事。对这个未经授权的行为，他没有受到什么真正的惩处。

隔绝。他宣布："只有本大陆的人民才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他言之凿凿地说，如果其中的任何部分"组建了独立国家"，并谋求加入美国联邦，"这将是一个有待于他们和我们自己决定的问题，无需任何外国介入。我们决不同意欧洲列强从中干涉，阻挠这样的联合。"他不仅引用而且以一种更强烈的措辞重申了门罗的非殖民化原则："我们要向世界明确宣布，我们的既定政策是，不经我们同意，欧洲不得在北美大陆的任何地方建立殖民地或领地。"

波尔克咨文揭开了一个新时期，其间，"门罗宣言的防御思想被加以引申，从而与进攻主题联系起来。"[1] 比以前更加明确的是，他警告欧洲各国不要染指美国所觊觎的地区，对他的言下之意，拉美人既心领神会，又满怀怨气。波尔克宣言"复活了1823年的咨文，……开创了在外交文件中频频引用的风气，逐渐使其成为一个得到广泛接受的教条。"[2] 与此同时，波尔克开始了这样一个进程，美国不仅提出要保卫西半球，而且还声称有权统治西半球。

"波尔克先生的战争"的爆发

波尔克向国会提交咨文时，局势业已表明，"进攻主题"的实施将以墨西哥为代价。事实上，总统警告说，战争可能是必要的。波尔克刚刚宣誓就职，墨西哥公使就提出保障要求，宣称他的国家将会用"它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维护它对得克萨斯的权利。不久，他的美国同行离开了墨西哥城。两国关系全面破裂，

① 弗雷德里克·默克：《门罗主义与美国扩张主义》（纽约，1966年），第Ⅷ页。

② 德克斯特·珀金斯：《远离干涉》（波士顿，1948年），第87页。

冲突在所难免。

波尔克显然想夺得加利福尼亚。墨西哥在该省的统治极为虚弱，无论是墨西哥定居者还是那些已经渗透到北部的美国人，都蠢蠢欲动，他们经常向墨西哥当局发出挑战。有时，总统希望这种局势会促使墨西哥将该省一卖了之，特别是购买提议是辅以武力威胁之时；有时，他又希望爆发一场得克萨斯式的革命。海军部长爱德华·班克罗夫特向驻在这个地区的海军指挥官送去一份大有助益的、译成西班牙文的得克萨斯宪法，以便散发给对它感兴趣的居民。国务卿布坎南指示美国驻蒙特里领事托马斯·O.拉金说："如果（那里的）人民希望把他们的命运同我们连在一起，他们就会被当作同胞兄弟对待。"[①] 1845 年夏，约翰·查尔斯·弗雷蒙特上尉率领的一支小规模远征军被派往西部，名义上是勘探交通线路；这年底，弗雷蒙特抵达加利福尼亚。

因此，明显的、可能的事实是，波尔克想对墨西哥发动一场战争，它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征服战。这表现为他支持得克萨斯以格兰朗德河作为边界的荒谬要求，这远远超出了这个墨西哥省份的原先界线。就墨西哥人而言，兼并已构成一个足够严重的挑衅了，而波尔克支持对格兰德河的要求，实际上是葬送了和平解决的机会。这三种途径中究竟哪一个在总统的脑子里占据主要地位，人们不得而知。或许他是想利用在当时看来是最有希望的任何途径，从而尽最大可能将加利福尼亚收归星条旗麾下。

尽管墨西哥国内爆发了反美浪潮，一个温和派政府还是在 1844 年底取代圣安纳上台执政。波尔克接到消息说，如果他派一名非正式代表前往墨西哥城，也许能找到一条解决两国分歧的

① 布坎南还说了一句话："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从而不给墨西哥留下抱怨的任何正当理由。"但毫无疑问的是，他把界定何为"正当理由"的权利留给了他自己。

途径。为执行这项任务，他挑选了强硬的、来自路易斯安那的扩张分子约翰·斯莱德尔。斯莱德尔所受的训令，充斥了极端蔑视墨西哥的语言；这位特使认为，他的主要使命就是“把谈判失败的一切责任和罪名推到墨西哥政府身上”。斯莱德尔得到这样的授权，即如果何塞·J. 赫雷拉政府拒绝卖出加利福尼亚，就将这个问题推到以后解决，也许革命能解决这个问题。他被告知，如果墨西哥同意将格兰德河边界从埃尔帕索向西延伸，他就可以放弃美国公民向墨西哥提出的两百万美元和累计利息的债务要求。但对该地以东，他既不能妥协，也不得提出补偿建议。墨西哥要么让步屈服，承认得克萨斯独立，把该省传统边界以外的领土割让出去，要么就面临严重后果。

赫雷拉不敢正式接见斯莱德尔，但即使这样也没能救得了他。1845 年底，他的政府被一个不怎么妥协让步的政府所取代。斯莱德尔再次提出接见要求，但仍遭到拒绝。他给国内写信说：“请相信，我们永远不可能同他们友好相处，直到我们教训他们一顿为止。”

墨西哥采取的路线似乎愚不可及，因为波尔克至少摆出了一副通情达理的姿态。不过，事情并不像表面看来的那么简单。赫雷拉政府曾表示接受一个非正式的特使，波尔克却要求墨西哥接受斯莱德尔作为全权公使，这就等于承认，导致两国关系破裂的兼并问题业已解决。如果墨西哥人拒绝接受他的特使，总统似乎就可以像斯莱德尔那样认为，可以把（谈判）破裂的责任甚至战争的责任推到他们身上。解决格兰德河边界线的提议，虽然强词夺理，但纯属虚张声势，目的是日后对美国人民有个交代。如果确实如此的话，整个事件就高度表现了典型的波尔克行事方式。

墨西哥政府至少可以接受格兰德河边界线从而暂时地避免战争，但在墨西哥城，没有哪个政权敢于接受这个奇耻大辱。赫雷拉的继任者马里亚诺·帕雷德斯肯定不想如此。墨西哥人大大低

估了美国的军事实力，绝大多数认为他们能够挫败当时只有7000人的美国陆军的入侵。他们还抱着愚蠢透顶的幻想，等待某个或更多欧洲国家来援助他们，或认为英美两国会在俄勒冈问题上打上一仗。[①]

在墨西哥拒绝同斯莱德尔举行谈判之后，波尔克开始加大压力。他命令一支海军中队开赴维拉克鲁斯，指示美国驻得克萨斯军队司令扎卡里·泰勒将军从科珀斯克里斯蒂——位于争端领土北端的努埃塞斯河边——向格兰德河进发。虽然波尔克告诫这位将军不要引发冲突，但又指示他把墨西哥人越过格兰德河的任何举动看做是战争行为。显然，这支军队的进发是一种威胁行为，而且可能是一种有意的挑衅行为。美国军队未受阻挡抵达格兰德河入海口，但在1846年4月，河对岸的墨西哥指挥官要求他们撤退。泰勒拒绝了，随后，在墨西哥人拒不让他使用河流时，他便封锁了入海口。4月25日，一支墨西哥军队越过该河，袭击了美军巡逻队。

5月9日，即斯莱德尔回到首都的第二天，在泰勒的消息到达以前，波尔克决定请求国会宣战。他提出的理由是，墨西哥政府不仅拒绝接受斯莱德尔，而且未能在美国债务问题上履行义务。实际上，他策划了一场侵略战争。

波尔克及其内阁做出开战决定后不过几小时，泰勒的报告就到了华盛顿。总统及其助手为他们的好运弹冠相庆——墨西哥为美国开战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理由。尽管波尔克不无遗憾地说，“迫不得已的形势让我不得不以我的方式放弃了休息日”，但他立即在5月10号星期日那天着手准备国会咨文。第二次，他即向国会提出。这篇咨文“概括了波尔克自就职以来对墨西哥推行的

① 大多数美国人还认为，胜利将易如反掌。波尔克劝告他的兄弟不要从意大利赶回来参军入伍，因为战争在他回来之前就会结束。

全部政策，预测了还不可能证实的情况，表达了打败敌人的坚定决心，摆出了一副迫不得已的姿态，提出了用来安抚国内温和派与主和派的动听理由。自然，波尔克对加利福尼亚只字未提。”

换句话说，“不管怎么说，那些不知实情的人可能会想，墨西哥人随时能够完全满足他的要求，要么是支付数百万美元的债务，要么是割让边境地区的数平方英里的不毛之地。”[①] 在总结了美国的种种不满之后，咨文继而指出：“早在从边境传来最新消息以前，我们就已忍无可忍了。”不过，总统并未表明出他最后准备提出宣战请求。“现在，在接二连三的威胁之后，墨西哥已……侵入了我国领土，让美国人在美国土地上洒下了鲜血。……战争已成事实，尽管我们百般努力想要避免，墨西哥还是发动了战争。”这就是总统支持对格兰德河的要求并下令泰勒进军的后果。

作为现实的政治问题，国会几乎不可能——它一向如此——拒绝总统提出的宣战请求。然而，由于心存疑惑，只是到了就军事拨款法案进行辩论的最后阶段，民主党领袖才建议在开头加上一句话说：“由于墨西哥共和国的行为，战争状态业已存在。”国会议员们并未轻易接受这个说法，众议院的1/3议员和20名参议员反对做出修改。但最后，大多数人不得不接受这项法案，因为拒绝向已在战斗的军队提供补给几乎是不现实的。即使如此，少数议员仍表示反对，另有约40人弃权，其中包括像卡尔霍恩这样的得克萨斯强硬派。他在一封写给儿子的信中抱怨道：“从来没有一个重大措施像这样得到采纳，如此仓猝鲁莽，如此缺乏深谋远虑，用如此令人讨厌的方式强行通过。”显然，更多的麻烦还在后头。

① 戴维·M.普莱彻：《兼并外交》（哥伦比亚，1973年），第386页。

征服与纷争

正如许多议员预料的那样，整个国家都刮起了爱国主义热潮，也许只有新英格兰例外。人们在许多城市举行集会，而军队接受不了所有那些志愿入伍的人。在田纳西州，有 3 万人想参军，但由于华盛顿实行限额制度，只有 3000 人得到征召。但到了年底，随着战前的阴谋诡计和通过征服进行扩张这些真相为人们所了解，举国上下一片反对之声，其中以北方最为强烈。在 1846 年选举中，民主党失去了众议院多数党地位。国会在 12 月开会时，辉格党猛烈抨击总统。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托马斯·科温宣称，他同情那些发出“我们将用血淋淋的双手迎接你们，把你们送进安静的坟墓”誓言的墨西哥人。

毫无疑问，许多反对言论不过是出于党派之争，辉格党力图搞垮波尔克。很大一部分人之所以反战，则是出于一种真诚的、由于担心战争会导致奴隶制度进一步扩大而更加根深蒂固的信念。许多北方民主党人愿意兼并得克萨斯，因为奴隶制在这里已是既定事实，但他们不想看到奴隶制扩大到并未实行这种制度的地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那些州的公民不愿意同奴隶主和奴隶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早在 1846 年 8 月，其中一个名叫戴维·威尔莫特的宾夕法尼亚民主党人就开始推动在那些可能从墨西哥夺来的新领土禁止奴隶制度，他希望解决这个威胁国家生存的重大问题，将国家重新统一起来。他、志同道合的民主党人和辉格党人在众议院通过了“威尔莫特但书”，但一名阻挠议事的议员从中作梗，致使参议院在休会前未能采取行动。不过，这个问题并未就此了结。事实上，众议院又两次通过了这个但书，但在参议院又遭到封杀。

如果波尔克没有拒绝说清他的战争目标的话，他是能够避免

触犯众怒的。战争爆发后不久，布坎南建议总统放弃所有的领土野心，也就是说，放弃对得克萨斯边界以外的过分要求。波尔克不屑一顾地予以拒绝，他声称，“虽然我们不是为了（领土）征服才打仗的”，但墨西哥必须为它的侵略付出代价，至少要割让加利福尼亚。其后，总统及其内阁成员讨论了各种各样的领土方案，但从未达成一致。[①] 在公众和国会面前，总统只是谈到要“对过去做出补偿，对未来做出保障”，至多，他谈到了必须“为这场战争做出赔偿，因为这是一场（墨西哥）因其长期以来犯下的错误和造成的伤害而迫使我们所打的战争”。直到很晚的时候，在1847年12月的年度咨文中，波尔克才宣布，美国必须坚持格兰德河边界线、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这些要求。即使此时，他仍保留着更多的要求，而且他肯定想得到更多的扩张条件。

如果波尔克一开始就宣布加利福尼亚是他的（并非不过分的领土）野心的上限的话，就不会有很多反对声音。对许多人来说，“困境在于，他们既想获得墨西哥的领土和资源，又要把大量的非白色人种排斥在联邦之外，而在这两者之间并不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平衡。”[②] 同墨西哥所有北方省一样，加利福尼亚人口稀少。有人会说，一旦美国定居者占据了优势，夺取该地区只不过是略微加快了那个肯定会发生的得克萨斯式的进程。超过这个限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美国要么是不得不作为一个帝国统治墨西哥，要么是被迫接受千百万绝对低人一等的人进入（美国的）

① 1846年夏，美国陆军在加利福尼亚招募了一个团人伍，这些士兵服役期满后将就地复员。这个表明政府野心的举动，至少暂时有助于推动针对征服性战争的反战运动，但是，反对夺取加利福尼亚的声音，从未像反对夺取墨西哥的其他领土那么强烈。1846年8月，在征服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之后，美国指挥官发表了兼并这些地区的声明，他们还组建了新的地方政府（1847年，新墨西哥人起来反对美国大兵的残暴统治和烧杀劫掠）。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声明似乎遭到了忽视，或被看作是纯粹的军事措施。

② 希塔拉：《天命注定》，第158页。

政治进程。

战争后期，当一部分政客开始谈论占领墨西哥所有领土之时，那些担心上述前景的人愈来愈坐卧不安。实际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夺取墨西哥全境的强大运动。这场运动的兴起，特别是其声势集中在东北地区——它在打算要征服的地区没有多少物质利益，只不过说明了“天定命运论”的扩张威力。一家波士顿报纸声称：

> “征服”将向一个历来由武力充当最高仲裁的地区带去和平……在那个条件业已成熟的地区确立起法治秩序，……这必将是被征服者的巨大福音。对于一个准备通过确保以最高的人性原则取代朝不保夕的生命和财产秩序进而改造世界的民族来说……这是一项值得从事的事业。

对于这个不可捉摸的人，我们所能知道的情况表明，波尔克从未屈服于那种夺取墨西哥全境的叫嚣，尽管他确实梦想兼并比他实际获得的更大领土。他既没有领导也未怂恿这场运动。他未能阻止夺取墨西哥全境的蛊惑，或者换句话说，他未能强调他那压倒一切的对加利福尼亚的关注，从而加剧了战争所带来的动荡和猜疑。

美墨和谈

战争爆发后不久，加利福尼亚北部的美国定居者掀起了暴动。已经到达当地的弗雷蒙特按兵不动，以免承担责任；稍后，他提供了支持，并在事实上发挥着统率作用。加利福尼亚北部很快就平息了。随后，他的战友、侦察员基特·卡尔森采取行动，剥下了3个当地土著人的头皮，这位年轻上尉及其部队向南进军。他们与斯蒂芬·卡尼将军率领的一支部队会师，这支部队是

从陆路经圣非开来的。到 1847 年初，整个省落入美国手中。

加利福尼亚被征服后，总统想谋求和平了。早在 1846 年秋，他就同当时流亡于古巴的圣安纳进行了秘密接触。在同圣安纳的一名代表接触时，总统及其内阁天真地以为，如果给予适当的报酬，圣安纳就会按照他们的条件媾和。流亡者得到一笔钱，并被允许通过美国的封锁线返回故乡，不久，他重新上台执政。

1847 年 4 月，为了同圣安纳政府打交道，波尔克派遣尼古拉·P. 特里斯特作为代表，前去同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的军队会合，这支部队刚刚在维拉克鲁斯登陆，准备进军墨西哥城。总统原打算派遣国务卿布坎南，但这样做似乎过于冒险。特里斯特当过杰克逊的私人秘书和驻哈瓦那领事，1847 年成为国务院的首席秘书。显然，他之所以被选中，只不过是因为他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俯首听命的代言人。他得到的指示是，至少要为美国取得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和图斯特佩克地峡的通行权，为此，可以支付不超过 3000 万美元的费用。

特里斯特和斯科特两次同圣安纳达成停火协议，但只是被这个足智多谋的人用来加强其军事地位。在墨西哥人着手认真讨论条件时，他们又不愿意割让除得克萨斯传统边界和加利福尼亚一小片地区以外的更多领土，换言之，他们要求美国撤出大片被征服的领土。波尔克对圣安纳的阴谋诡计感到愤怒，对特里斯特关于墨西哥的小气吝啬的提议的汇报极为气恼，命令他的这位代表于 11 月回国。几个星期以前，斯科特占领了墨西哥首都，但和平似乎仍不可得。

特里斯特接到波尔克的命令时，圣安纳已被推翻，其继任者曼努埃尔·德·拉·佩纳—佩纳为避免国家灭亡，置全体国民的尊严于不顾，要求特里斯特重开谈判。特里斯特决定不理睬召回命令——这是一个严重的犯上行为。如果不能与佩纳—佩纳达成协议，就意味着圣安纳有可能再度掌权，就意味着对墨西哥许多

地区实行更长时间的占领，甚至意味着夺取墨西哥全境的计划死灰复燃。所有这些，特里斯特都不想看到。1848 年 2 月 2 日，他签订了《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墨西哥接受了格兰德河边界线，并割让了加利福尼亚和西南地区，这占其国土面积的 1/3。美国向墨西哥支付 1500 万美元，并承担该政府对（美国）公民的债务。

波尔克虽然对特里斯特的"无耻行为"极为恼火，但同时进退两难。这个条约在所有重要方面都与他原先得到的训令一致。强求索取更多东西，将会使战争成为一场如此明目张胆的征服战争，以致必将使反对派的声音更加猛烈，他们不久前在众议院赢得了一次投票，声称这场战争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所发动的一场毫无必要的、违反宪法的战争"。如果拒绝将这个条约提交给参议院，将会把这个问题带入总统大选，从而有利于辉格党。因此，尽管布坎南以及此时担任财政部长的罗伯特·J. 沃克想压住条约，但波尔克还是极不情愿地将它送交参议院。

参议院恰逢约翰·昆西·亚当斯的葬礼，因此拖延了一天后才开始审议。一些辉格党参议员主张放弃格兰德河以外的所有领土，一些民主党人则要求得到更多的墨西哥领土，他们和总统一样，没有看到为此而继续进行战争的风险。[①] 有一点他们是一致赞同的，即向墨西哥支付一笔金钱。对民主党来说，这是"美国慷慨大度的一个证据"；而在辉格党看来，这是"为政府对墨西哥所做的错事而支付的良心钱"。[②] 对条约来说万幸的是，两个反对派阵营都担心——出发点完全相反——如果拒绝了特里斯特协议，随之而来的条约可能更糟糕。3 月，参议院以 38 对 14 票

---

① 在参议院，15 名辉格党议员支持那个放弃所有领土要求的修正案，11 名民主党议员则赞成杰斐逊·戴维斯提出的、要求夺取更多领土的修正案。当然，他们加在一起超过了参议院的 1/3 人数。

② 默克：《门罗主义与美国的扩张主义》，第 192 页。

予以批准，这分别等于辉格党顽固派和民主党顽固派的人数。

一位编辑兴高采烈地说道："我国是宽宏大量的，没有坚持夺取墨西哥全境，这是多么令人崇敬的美德啊！"卡尔霍恩更确切地称条约是一次"幸运的解脱"。他的观点得到广泛认同。6月4日，波尔克在参加华盛顿纪念碑开工典礼后得到消息说，墨西哥也批准了《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战争正式宣告结束。

美国军人死亡1.3万人，其中约7/8死于疾病。但是，美国仅仅花费1500万美元就得到了无比珍贵的领土，即使这笔费用也不算大，尽管它导致了1847年的联邦赤字，这是内战以前最严重的赤字。不过，这些征服地、为获取这些地区所采用的手段以及如何使用这些地区的问题，却使国家陷入分裂，引发了一连串以进攻萨姆特堡为顶点的事件。

奴隶制度是否能够自行确立于新领土，是个大有争议的问题。西南地区和加利福尼亚的条件不适合推行种植园制度，虽然当时许多置身于天定命运浪潮的南方人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个别空想家认为奴隶可以用来开采金银矿，但人们很难相信，矿业奴隶劳工制度能够在大量的非奴隶农业人口中苟延残喘下去。卡尔霍恩和其他有远见的南方人确实不希望或期待奴隶制能够在得克萨斯以外的地区得到推行。前驻墨西哥公使沃迪·汤姆森说，在新领土的"任何地方如果能建成蓄奴州的话，他就同意被绞死，如果他死了，就把他的尸骨挖出来当作肥料"。正如这部分人士看到的那样，扩张实际上会进一步巩固美国非奴隶制地区的日益增强的支配地位。

卡尔霍恩和那些赞同其观点的人，当然反对"夺取墨西哥全境"的言论。但是，作为务实的政治家，他们认识到了"天定命运论"的力量，觉得必须接受对加利福尼亚和西南地区的攫取。"为维护国家（并为此维护南方）的内部团结，卡尔霍恩认可了帝国主义的掠夺行为，他清楚，这种行为对他的（南方）地区带

来了危险。”[①] 不过，他和所有南方人都坚持，无论成功的前景如何，新领土都必须向奴隶制度开放。

问题并不在于实际情况会怎样，而是在于人们的忧虑和原则。南方人，无论他们是否与卡尔霍恩一样富有远见，都希望有权将他们的制度推向美国任何地区，都坚持奴隶制度必须得到联邦政府的保护，都担心非奴隶州的势力会压倒他们。北方人虽然并不坚持在蓄奴地区废除奴隶制度，但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拒绝全国都支持这种制度的进一步扩大。围绕“波尔克先生的战争”所夺取的领土，斗争拉开了序幕。

那位固执己见且缺乏想像力的田纳西人[②]，却没有预料到这一点。1848 年 6 月，他在国会得意洋洋地大讲特讲他的成就，声称这些成就将会“给美国、商业界和整个人类带来巨大利益”。他的话可能是千真万确的。正如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在历数波尔克的种种过错之后所指出的：“尽管如此，今天要找到一个试图否定波尔克总统的外交、波尔克总统的战争和波尔克总统的那个桀骜不驯的国务院首席秘书通过谈判达成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的美国公民，几乎是不可能的。”[③] 1849 年，波尔克离开白宫，信守了他在大选前所作的不谋求第二个任期的诺言。不到 3 个月，他便离开人世，此时，国家面临的全面危险远未明朗。

---

① 小厄内斯特·麦克弗森·兰德尔：《勉为其难的帝国主义者》（巴顿鲁依，1980 年），第 175 页。

② 指总统波尔克。——译者

③ 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 5 版，纽约，1955 年），第 244 页。特里斯特最终从格兰特政府那里得到了 13647 美元的回报，并被任命为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的邮政局长。

最后的扩张浪潮

从此往后，扩张主义的历史发生变化，基本上成了一种令人失望的研究。诚然，富兰克林·皮尔斯在1853年就职演说中宣布，这届政府将“不会被扩张恶果的微弱征兆所支配”，但其成就远不及预期设想。为获得一条理想的、通往太平洋的铁路线，这届政府通过其代表詹姆斯·加兹登的安排，从墨西哥手中购得一小块领土（卖主是最后一次掌权的圣安纳）。其他计划，如对古巴——自杰斐逊时代以来的一个目标，或对墨西哥，或对中美洲部分地区，无论是在皮尔斯任内，还是在他的继任者詹姆斯·布坎南任内，统统以失败告终。[1] 他们的目标是那些人口密集的地区，对这些民族，美国人不愿意以真正的帝国主义者身份进行统治，或让他们参加共和国圣殿的仪式。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奴隶制问题上纠缠争吵。一些人表示支持，希望将这种“独特制度”扩大到除古巴以外的并不实行奴隶制的地方；但如此一来，那些不愿意看到这一结果的人，反对的声音更加强烈。除南方人以外，支持这些计划的人寥寥无几。

内战结束后的1867年，国务卿威廉·H. 西沃德从俄罗斯那里购得阿拉斯加，完成了大陆扩张进程。俄罗斯谈判代表指出，“这是一个要么我们主动出卖……要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占领的问题。”这笔交易在国会遇到了麻烦，为促使它获得通过，大量游说和行贿成为必要手段。仍在为扩张主义事业奔走呼号的沃克，是其中一个游说者，他为此获得了两万三千美元的报酬，但却被扒手偷掉许多。如果西沃德继续前进，他会获得更多领

① 在1858、1859、1860年国情咨文中，布坎南都支持购买古巴的计划，但因为不切实际，几乎没有打动任何人，也就没有得到支持。

土，但是，他那些关于维尔京群岛和圣多明戈的计划统统失败了。“天定命运论”戛然而止。

扩张使美国从大西洋拓展到密西西比河，继而到落基山脉，最后到太平洋。它是贪婪欲望的产物，是不讲道德的领导人的产物，是美国和那些阻挡其前进道路的国家之间实力悬殊的产物。它还是基于一系列信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即共和主义不仅是一种优越的政府形式，更是一种绝对必要的制度，如果美国把大量的外国人口纳入其中，这种制度就是难以坚持的，如果不是不能坚持的话。这个信念使得雄心勃勃的帝国梦想在地理上没有扩大到北美以外。19 世纪末以前，除阿拉斯加以外，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扩张主义的目标，是传播共和主义，扩大美国农业的空间，加强整个国家的地位，而不是统治他人，或把不同民族纳入联邦。

第八章 英国、加拿大与美国

1825 年后，美国人毅然决然地与欧洲分道扬镳。机会和问题都在他们自己的那半个地球上。1835 年，阿历克西·托克维尔在谈到他的巨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的一处遗漏时解释道："准确地讲，这个合众国……在外国没有利益可言。"半个世纪之后，另一位外国学者詹姆·布赖斯在《美利坚联邦》一书中也写道："美国人在外交事务中学会并坚持了一项原则：外交越少越好。"

乍一看，布赖斯的评论似乎言过其实。毕竟，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与欧洲争执不已，特别是与他所代表的英国争执不已。不过，从世界政治看，他的观点是正确的。除了极个别的例外，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纷争，只是集中在一些眼前利益上，集中在邻近地区的领土和势力上，或集中在内战这场民族考验时期所产生的问题上。

追逐商业

上述结论的最持久的例外，在于对外贸易和商业领域。1812 年后，美国商船失去了在欧洲战争期间所享有的中立优势，尽管在先前岁月里它们不时遭到劫掠，但还是有着优势。不过，在短暂的萧条之后，它又迅速发展起来，美国人为此感到骄傲。这种

增长反映了国际贸易的大发展——美国从中明显地分得了好处——而不是美国船主拥有强大的竞争力。例如，他们在适应蒸汽动力方面要比对手慢多了，特别是比英国慢。1860年，美国只有4%的商船是以蒸汽作为动力的。尽管直到内战爆发时进出美国港口的货物差不多有2/3是由美国船运输的，但这个比例在多年里却呈下降之势。1861年后，南部邦联巡洋舰构成的威胁以及由此造成的保险费的上涨，促使许多商船到国外注册。一些商船转而悬挂英国国旗，并越过封锁线与南部邦联进行贸易。1864年，进入美国港口的外国商船吨位首次超过了本国商船。这个变化是永久性的，国家成长时期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此消失。

尽管在萧条和物价跌落时期受到抑制，尽管转口贸易实际上已经消失——它在1812年前推动了繁荣，但贸易依然兴旺。早在1816年，美国销往国外的产品量便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到1835年时，战前最高水平又翻了一番。1860年，美国出口的国内产品达到3.16亿美元，其中约有一半销往英国，另外1/4输往欧洲其他各国。在很长时间里，棉花约占总量的60%。美国的进口实际上还要多些。国内经济发展是如此迅猛，以致——相对地说——外国商业从未像在1812年以前那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这种增长仍是非同寻常的，它在百分比上超过了英国的增长。远甚于1812年战争之前的是，美国已成为国际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说来，个体生产者、商人和船主，而不是政府，对商业扩张功不可没。美国人继续看重国际贸易，既是出于经济考虑，也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一些危言耸听者甚至说，如果美国不积极进取，英国便会建立一种“非正式的帝国”制度，通过包括特惠贸易协议在内的商业纽带把整个世界同伦敦连在一起。但是，这种警告几乎没能促使政府采取进攻行动，“美国对英帝国及其建立起自己的非正式帝国的企图的攻击，在内战以前大体上是失

败的。”[1]

这并不是说政府毫无作为。虽然只有四五十艘舰船，而且大都破旧不堪，但美国海军仍然奔波于世界各地，保护并促进着贸易，通常只是显示一下国旗，但有时也会动用武力。例如，仅在1832年，海军不仅对爪哇当局采取了行动，还在福克兰群岛对阿根廷采取了行动。1815年，海军成立了地中海中队，到1835年时，常备力量游弋在加勒比海、巴西沿海、太平洋沿岸和远东地区。美国外交官的一大主要关切，向来就是促进贸易。在《根特和约》签订后的45年中，他们以平均每年一项的速度缔结商业协定。此外，驻外领事和其他外交官也通过不怎么正式的途径帮助本国商人和船主，如搜集有用的信息，有时还向外国政府施加影响。

然而，商业考虑极少会成为真正的政策问题。美国的报复威胁，迫使大多数国家放弃有利于其本国船只的歧视做法，只有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贸易不在此列。甚至在后一个领域，美国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最明显的是1830年关于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协定。尽管美国的愿望未能全部实现，由于并非所有针对美国商船的限制都已取消，美国还是把英国从那个由来已久的殖民垄断领域驱逐出去。

在安德鲁·杰克逊执政时期，由于法国不愿支付损失赔偿——其中许多要追溯到拿破仑战争时期，从而触发了一场战争恐慌。杰克逊总统甚至一度要求国会授权捕获法国船只。1836年，法国人最终向美国商人和船主支付了大约500万美元。[2]

19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开始对东方有了持续不断的、尽

---

① 金利·J. 布劳尔：《美国与英国的帝国扩张（1815—1860）》，载《外交史》1988年第12期，第34页。

② 根据这个协议，博马舍的后人得到27万美元。他们称，大陆会议没有支付博马舍自己掏腰包所购买的物资。

管还是不大的兴趣。1784 年，第一艘美国商船到达广东。在此后数年里，尽管官方的支持少而又少，美国人还是开展了小规模的贸易，主要是用中国的茶叶来换取白银以及在土耳其购买的鸦片。19 世纪 40 年代初，当英国迫使中国放宽限制贸易的壁垒时，美国人起而效尤：通过 1844 年《望厦条约》，美国特使凯莱布·顾盛为他的同胞获得了同样的商业特权和治外法权（免受中国法庭审判的权利）；通过精明地运用说服和威胁，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在 1853 年打破了日本的锁国局面，至少从理论上为美国贸易带来了新的机会。

这两个成就都没有产生多少立竿见影的好处。这两个使团都是具有商业头脑的辉格党政府派出的。在内战前的大部分时期里掌权的民主党人并未步其后尘，或特别看重这种活动。1853 年，富兰克林·皮尔斯的年度咨文便反映了这种漠然态度，它只是用两句话提到了佩里的成功。中国事件和日本事件的重大意义，只是后来才为人们所认识，因为这不过是半个世纪后更深地卷入东方事务的第一步。即便如此，较之在世界其他地区，这两次行动都更为重要。

维也纳会议后的欧洲

美国何以能如此长久地避免介入其活动范围以外的地区呢？历史学家 C. 范·伍德沃德将此称为“免费安全”[①] 的时代，其间，英国皇家海军控制着海洋，因此美国没有必要用武力来保护或支持门罗主义。换言之，英国已经成为“美国孤立主义的不自觉的保护者。鉴于英国的帝国利益，保卫公海并防止美洲大陆免

① C. 范·伍德沃德，《重新解释的时代》，载《美国历史评论》第 66 卷（1960 年第 1 期），第 3 页。

遭欧洲干涉一直是该国的利益所在。”[①] 但这绝不意味着欧洲大陆列强也需要皇家海军的无声约束。正如伍德沃德所指出，欧洲大陆国家想跨过 3000 英里的海洋向北美投送力量，如果不是不可能，也会是异常困难。

对美国来说，同样幸运的是欧洲政治的现状。1815 年《维也纳和约》宣告战争时代的终结，这场战争是如此广泛以至于越出了欧洲范围。在本世纪其余时间里，欧洲没有发生像美国内战这样持续时间如此长久、影响国际贸易如此深刻的战争。美国能够独善其身。19 世纪 50 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只是在英国驻华盛顿公使试图在美国招募军队之时，才招来了麻烦。1870 年普法战争结束得如此迅速，以致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只是美国人有机会为拿破仑三世的垮台而额手相庆，他们既讨厌他的帝国主义野心，也不喜欢他在美国内战期间对南部邦联的同情立场。

但与此同时，外交形势也如一锅即将烧开的水，因此欧洲外交家们不愿意同美国发生麻烦，以致在更靠近家门口的地区进退两难。如在内战期间，鉴于拿破仑三世的勃勃野心和关于波兰问题的争执，英国领导人就受制于“为加强英国在欧洲的外交地位而保持平静的英美关系的需要”。[②] 在阿波马托克斯战役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的形势使得美国人可以专注于本国事务。

欧洲——除英国以外——在西半球的勃勃野心也没有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甚至没有出现重大威胁的迹象。1823 年后有那么几年，西班牙仍在软弱无力地挑战拉美的独立，但没有哪个欧洲大陆国家是在认真严肃地干涉西半球的事务。至少在 19 世纪 60 年代拿破仑三世——英国和西班牙一开始也加入了行动——

---

① 劳伦斯・S. 卡普兰：《拒绝结盟》（俄亥俄州肯特，1987 年），第 XVII 页。

② 布赖恩・詹金斯：《英国与捍卫联邦的战争》（第 2 卷，蒙特利尔，1980 年），第 398 页。

对墨西哥下手之前是如此。这两个因素，即欧洲没有大规模战争和欧洲对美洲野心的切实消除，使得美国人比在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能够决定其自身的外交政策的步伐和地理中心。

英国的情形

美国经常与之发生争端的一个欧洲大国乃是大不列颠，这个国家似乎给美国带来了“免费安全”。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加拿大是美国的近邻。此外，英国对中美洲的野心及其在美国内战期间发挥的作用——其突出作用纯粹是由于它的工业和海军实力——也是重要因素。时常，英国是爱尔兰裔美国人、民族主义的编辑和世界共和主义的拥护者口诛笔伐的对象。就连那些保守的英国人的美国后代，无论男女，都是满腹狐疑，常常喜欢拿这个岛屿王国与欧洲大陆作比较。像美国其他人一样，他们“继承了一种对英国压迫的由来已久的敌意，促成了如此众多的美国爱国自豪的标志，从《独立宣言》到星条旗等”。[①] 火种虽已埋下，但在1815年后，这个不断发光的火种却未酿成大火的事实，是对英美两国的国务活动家，尤其是对历届英国政府国务活动家的一种褒奖。

1816年，约翰·亚当斯预言说：“英国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朋友，直到我们成为它的主人为止。”他完全错了。当然，许多英国人讨厌美国，他们嘲笑美国文化的自命不凡。1820年，悉尼·史密斯牧师在《爱丁堡评论》上撰文写道，美国“在科学、艺术、文学领域，甚至在国务活动家之类的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绝对是一无所成”。（可以想像，美国人对此苛刻评论会作

① 库欣·斯特劳特：《美国人对旧世界的印象》（纽约，1963年），第134页。

何种愤怒反应!）在 1837 年（金融）恐慌中，8 个州和佛罗里达地区拖欠外国人持有的债券达数百万美元，英国人怒不可遏。仍持强硬立场的史密斯宣称，美国人“再也无权同诚实人一起就餐了，正如麻风病患者不能与正常人同桌吃饭那样”。1861 年，一家保守派报纸质问道，如果林肯成功地重新统一了国家，“谁能怀疑那个民主国家不会比以前更傲慢、更好斗、更直接、更粗俗呢?”

所幸的是，其他情绪以及超越于情绪的因素创造了和平。在英国，那些希望扩大公民权的人常常交口称赞美国的成就，尽管同时也见证了充分民主的危险；他们努力发展英美友好关系。在围绕 1867 年改革法案——它使选民人数增加一倍——的辩论中，支持者们频频援引美国北方的成功，以此作为建立在广泛基础上的政府享有优势的明证。随着美国进入麦金莱和洛克菲勒时代，自由派与共和党人更少有同情心了，但在 19 世纪中期，他们的作用依然重要。

最重要地是，借用两个时髦用语，这是“小英国”和“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时代。与美国和平相处尤为珍贵，因为英国比其他任何时候——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除外——都更依赖美国的供应。从美国的进口大体相当于帝国内部的进口。粮食需求量特别大，这是在 1846 年废除《谷物法》——征收进口税——的一个主要原因。美国南方提供了纺织业所需的大约 3/4 棉花，而纺织业是英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此外，美国吸纳的出口商品超过其他任何国家。英国在美国的投资愈益增大，尽管 1837 年金融恐慌带来了问题，特别是欠债问题。到 19 世纪 50 年代，英国人持有的美国政府证券超过了欧洲其他各国的总和。1857 年，美国有 7 条铁路的证券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总额高达 8000 万英镑，这反映出英国投资者的卷入程度。英国首相利物浦勋爵在《根特和约》签订后当即宣称，任何人“想要英国

繁荣，都必须让美国繁荣”。

尽管这并不表明保守党领导人比其对手更专注于经济发展，尽管后座议员们一贯反美，但每当同美国达成重要妥协之时，执政的几乎都是保守派。利物浦勋爵内阁的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在1812年战争后对英国政策做出了一次重大调整。罗伯特·皮尔爵士政府的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在那些解决19世纪40年代数次危险争端的协议方面所起的作用，比两国其他任何人的贡献都要大。这些人在风格和思想上都是保守的，虽然他们的部分政府同僚只是勉为其难地跟着亦步亦趋，但黩武主义情绪——其代表几乎就是19世纪中叶的自由党人帕麦斯顿勋爵——却不如其政治对手执政时那么盛行。

历届英国政府都认识到，加拿大实际上充当着和平的“人质”。历届内阁都试图构筑一个陆上防御工事系统，在大湖区根据《1817年条约》实现非军事化后，这一点尤其重要了；不过，它们的努力又是半心半意的。1861年的调查表明，两处重要堡垒已经转用为监狱，另外一个则被用作精神病院。[①] 英国的兵力在内战期间虽达到了1.76万人，但在加拿大的部队通常不到5000人。英国已经“明显地和有意识地把北美大陆的控制权让给了美国”。[②] 每当同华盛顿发生争端时，伦敦都会保持克制，它深知，一旦爆发战争，第一个后果将是丢掉加拿大，除非麦迪逊重新担任总司令。

对英国人以及加拿大人来说，幸运的是，即使在“天定命运论”甚嚣尘上之时，美国也不曾有过征服加拿大的想法。他们确

① 美国方面则在香普兰湖的北侧修筑了大批工事，但不幸的是，由于勘测失误，“布朗德堡垒”位于人们所认为的加拿大领土上。1842年，英国同意接受这个弯曲线为纽约北部边界，这样，美国保住了这个堡垒。

② 肯尼思·伯恩：《英国与北美均势》（伯克利和洛杉矶，1967年），第302页。

实希望，或至少有许多人希望，加拿大将会摆脱帝国主义的桎梏。一些人得意洋洋地认为，一个自由的加拿大会谋求同邻国合并。1837年，在加拿大爆发了一场很不成功的叛乱时，美国人对叛乱者寄予同情，这些叛乱者常常是从边界南边的基地出发采取行动的，他们还招募美国人加入其行列；但是，华盛顿方面小心翼翼地避免卷入其中。19世纪40年代末，以蒙特利尔的商人为主的一个小集团力图发起一场兼并运动，但他们的努力铩羽而归，其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从大湖区以南所得到的支持太少了。

美国人还期望在经济上与加拿大融为一体，建立起一种非正式的、不完全的联盟，其中，美国将发挥主要作用。1854年缔结的一项互惠条约，就是这种期望的一个重要的、正式的证明。除此以外，没有哪个联邦政府官员——只有极少数的公民——准备如此行事。

卡斯尔雷时期

1812年战争之后，主要是由于外交大臣卡斯尔雷的努力，新局面立即形成。像他的内阁同僚——事实上是全体国民——那样，卡斯尔雷对于国内问题和欧洲态势的优虑，远远超过了对英美关系的担心。但是，与几乎所有前任不同的是，他是根据英美关系的本来面貌而不是将其作为更为重大之关切的枝节问题来进行严肃思考的。杰出的外交史学家查尔斯·韦伯斯特爵士评论道，卡斯尔雷是“第一个认识到英美友好关系是一笔重要资产、使用……既非居高临下又不威胁恐吓的言辞对她说话的英国政治家”。[①] 这位外交大臣认为——正如他写给一位派往华盛顿履行

① C. K. 韦伯斯特主编：《英国与拉丁美洲的独立》（第1卷，伦敦，1938年），第42页。

使命的公使的信所说："没有哪两个国家的友好关系像这样对彼此更有实际价值，或者说，其敌对关系如此不可避免，如此迫在眉睫，以致对双方造成最严重的伤害。"

战后最有名的一项条约为大湖地区的海军建设划上了句号。许多英国人和加拿大人争辩说，由于美国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大量地面部队投入战斗，所以英国要千方百计地谋求水上优势。卡斯尔雷反对这个说法。1817 年，他的代表查尔斯·巴戈特与临时执掌国务院的理查德·拉什签署了一项条约，结束了 1812 年战争的一项遗产——军备竞赛，将海军力量限制在确保税收法畅通所需的水平上。

《拉什—巴戈特条约》并没有确立起一条不设防的边界，在某种意义上，对它的褒扬乃是言过其实。除继续构筑陆地工事之外，双方还时不时歪曲甚至违反条约。例如，1843 年，美国在伊利湖部署了一艘巨型军舰，英国的反应是斥资建造了 3 艘大型船只，它们能轻而易举地转用于军事目的。此外，如同大多数军控协议那样，该条约也只是反映而不是导致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尽管如此，这个条约——在一场激烈战争结束仅仅两年就达成——表现出了有关人士特别是卡斯尔雷的良好愿望，它确实是一劳永逸地改变了边界地区的军事环境。

至少同样重要的是，次年又达成了一项不那么有名的条约。1818 年，当时的驻法公使艾伯特·加勒廷前往伦敦，同已在那里的理查德·拉什会合，展开一场广泛的谈判。谈判代表们未能解决几个重要问题——卡斯尔雷将谈判事宜交给下属，他本人则去参加一个欧洲会议。但他们一致同意延长规定英美贸易的 1815 年商业条约，并解决——尽管只是临时解决——了《根特和约》未能解决的渔业问题。最重要的是，他们划定了英美两国的领土边界，该线从伍兹湖始沿着北纬 49°线直至"石头山"，长达 800 英里；双方同意"向两国公民和臣民自由开放"落基山以

西的领土，期限10年。1827年，这项条款被无限期延长，从而把俄勒冈问题的最终解决交给拉什恰如其分地所指出的“时间……这位最佳谈判代表”。在约翰·昆西·亚当斯担任门罗总统的国务卿时，他曾就该问题与英国驻华盛顿公使进行过数次怏怏不快的交涉。但总体而言，到19世纪40年代之时，关于该边远地区的争端已趋于化解。

在美国夺取佛罗里达的过程中，卡斯尔雷再次表现出了他的智慧。在杰克逊实施入侵行动期间，这位将军处死了两名英国臣民，英国新闻界爆发出一片反美浪潮。卡斯尔雷后来称，“这就是议会情绪，举国上下都是这种情绪，以致……战争的爆发可能只要动一下手指头就行了。”这即便是夸大其辞，但他拒绝利用此事却避免了一次危险的冲突。在佛罗里达的割让协议达成后，他对拉什说，虽然英国宁愿看到那里有一个虚弱不堪的国家，但伦敦认识到这根本不可能，因而欢迎和平解决，并希望条约得到批准。在西班牙人久拖不决时，卡斯尔雷告诫说，他们的愚蠢之举可能导致美国通过武力占领佛罗里达。

卡斯尔雷在解决或平息争端方面的成就引人注目，特别是考虑到1812年战争的痛苦遗产和约翰·昆西·亚当斯执掌国务院的事实。1822年卡斯尔雷割喉自尽后，乔治·坎宁继任其职。许多美国人预料会有麻烦，他们对坎宁曾是那个颁布1807年《枢密院敕令》的内阁中的专横跋扈的外交大臣记忆犹新。但他们没有遇到麻烦，“大调情”——坎宁如此描述他对拉什的接近——表明，他也变了。这次讨好卖乖未能如愿之后，在门罗主义的口气和原则使得英国分道扬镳之后，友好关系冷了下来。

在某种意义上，友好状态乃是脆弱不堪的，因为双方从未停止过彼此猜疑，尤其是美国人，他们之所以拒绝坎宁的1823年建议，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害怕坎宁会出卖他们。“缺少的关键因素……是相互信任”，但同样重要的，是美国人的一种信念，即

“英国拒不承认美国如同欧洲国家那样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国家”。[1] 至少就伦敦政府而言，这是一个不合常理的信念。尽管如此，同过去相比，成就依然显著，而且颇具影响。在他的第一个国会年度咨文中，杰克逊阐述道：“同英国，……我们可以指望数年和平的、体面的和高尚的竞争。两国形势中的每一件事都要加以考虑，……以使两国民众确信，双方的政策都是要维持最友好的关系。”伦敦《泰晤士报》的编辑们不无惊讶地评论道：“自从华盛顿时代以来，从未见过哪篇咨文像这样包含着如此之多的宝贵信息和如此之少的挑衅言辞。”

阿什伯顿勋爵和韦伯斯特国务卿

19 世纪 30 年代末爆发的一次新危机，与其说是长久猜疑的结果，毋宁说是那种在墨西哥战争中达到顶点的新的咄咄逼人情绪的产物。例如，相争不下的伐木工之间的争吵逐步升级为争夺缅因最北部几乎无人居住的地区的“阿鲁斯图克战争”，该州与新布伦瑞克在边界上存在着争议（荷兰国王曾提出一条折衷线建议，尽管杰克逊总统予以接受，但在 1836 年遭到参议院拒绝）。幸运的是，虽然国会为此拨出 1000 万美元并授权总统招募 5 万名志愿兵，但争吵仍维持在口水战而不是流血冲突的层次上，虽然没人敢担保这种局面永不发生变化。1840 年底，在上纽约地区，一个名叫亚历山大·麦克劳德的加拿大人因谋杀罪而被逮捕，据说此人曾参与一场袭击行动，越过尼亚加拉河攻打 1837 年叛乱的支持者。当时担任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勋爵通知英国驻

① 霍华德·琼斯：《走向韦伯斯特—阿什伯顿条约》（查佩尔希尔，1977 年），第 XI — XII，XIII 页。

华盛顿公使说，“处死麦克劳德将导致战争”。[①]

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英国新一届政府与泰勒政府在1842年举行了谈判。托利党内阁提名在美国拥有大量投资的巴林银行大家族的后裔阿什伯顿勋爵为谈判代表。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阿什伯顿——他有一个美国妻子——自始至终都在努力促进英美关系；他甚至支持割让加拿大，他的理由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冲突的屡屡发生。他当时写道：“最重要的似乎是必须达成某种协议，我并不看重……准确的条款。”在华盛顿，阿什伯顿与丹尼尔·韦伯斯特进行谈判，在威廉·亨利·哈里森总统去世后不久，其他内阁成员纷纷辞职，惟独韦伯斯特继续担任国务卿，目的就是寻求与英国达成和解。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两人在1842年8月达成协议。麦克劳德事件早已随着他的无罪开释而平息，阿什伯顿则对其涉嫌参加的越境行为做了有条件的道歉。除了华盛顿的酷暑差一点儿让阿什伯顿热得晕过去以外，谈判代表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同缅因和马萨诸塞——后者在1821年前据有缅因，因此仍在那里拥有地产权——的代表打交道。实际上，谈判变成了三方之间的讨价还价，因而成为“历史上最混乱的谈判之一”。[②] 最后，两州得到安抚，联邦提供财政补偿，这是一个最不同寻常的手段。韦伯斯特接受了对英国稍稍有利的缅因北部边界。另一段有争议的边界，在苏必利尔湖和伍兹湖之间，该段是以这样的方式划定的：

---

① 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力图促成麦克劳德的释放，但他无法左右纽约法院；州长威廉·H. 西沃德拒绝干预，尽管他非常隐蔽地对亲信说，如果陪审团认定麦克劳德有罪，他就赦免他。所幸的是，1841年11月，麦克劳德被判无罪。这一事件的记录者说，他的无罪释放“为英美两国消除其他分歧开辟了道路”。〔肯尼思·R. 史蒂芬斯：《边界外交》（阿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1989年），第158页。〕

② 威尔伯·德弗罗·琼斯：《英国外交中的美国问题》（佐治亚州雅典，1974年），第20页。

美国人得到梅萨比地区，尽管阿什伯顿至多只是略知那里蕴藏着大量的铁矿资源。阿什伯顿未能达成他的其中一个目标，即允许皇家海军搜查那些可疑的、悬挂美国国旗的贩奴船，相反，两国建立起一个大而无当的、毫无效率的海上联合中队。同时，由于伦敦方面的训令过于苛刻，他和韦伯斯特未能解决俄勒冈问题。

两国政府的反对派都攻击《韦伯斯特--阿什伯顿条约》是个投降条约。首先是美国政府，然后是英国政府，相继拿出了原始地图，后者的地图更有说服力，目的是证明该条约没有修改1782年《巴黎和约》的谈判代表所拟定的边界。不过，只有9位参议员反对批准条约。总之，全国似乎都认为这个条约合情合理，因而予以接受。然而，这场首先起因于枝节问题的暴风雨，却预示了未来更多的麻烦。

俄勒冈

在谈判缔结那个确定了西至落基山脉的美加边界的《1818年条约》的过程中，美国谈判代表理查德·拉什和艾伯特·加勒廷曾谋求把北纬40°线延伸至太平洋，即延伸至所谓的俄勒冈地区，但未能如愿。后来的谈判代表同样是运气不佳。19世纪40年代以前，这个问题似乎并不特别紧迫：该地区偏于一隅，交通困难，几乎还没有什么定居点。后来，大陆移民开始了，到1844年，俄勒冈已经有数千美国人了。人们相信，铁路很快就会把西北地区及其海港与美国其他地区联接起来，这也使得华盛顿的政治交涉成为可能。韦伯斯特和阿什伯顿却未能解决俄勒冈问题——哪怕是确实想千方百计地解决，“使得解决这个……问题逐渐偏离了……其谈判所取得的成就的势头，并进入了……扩

张主义政治的时代，导致了波尔克政府的战争危机。”[①]

美国对北至北纬 54°40′线有着模糊不清的权利，这是 1824 年确定的它与阿拉斯加的主人俄国两者之间的分界线。但是，美国外交官却经常向英国提议以北纬 49°线来瓜分俄勒冈。英国的领土要求只是向南延伸到哥伦比亚河。真正争议的地区位于哥伦比亚河与北纬 49°线之间，包括普吉特海峡上的重要港口和温哥华岛南端。最后，美国获得了几乎全部有争议的领土，在很大程度上，这不仅是因为那里的毛皮生意日趋萧条（海狸皮帽确实不流行了），而且还在于英国领导人认为这场争夺得不偿失。但在终局之前，波尔克总统却玩弄了一场完全不诚实的、危险的、在外交上毫无必要的游戏。

1844 年，范布伦由于反对兼并得克萨斯而失去了民主党提名。为平息范布伦的北方支持者的怒火，并使得全国上下支持扩张要求，那个操纵了波尔克成功获得提名的罗伯特·J. 沃克，推动民主党大会通过纲领宣称，“我们对整个俄勒冈地区的权利是明确的、毫无问题的。”竞选期间，尤其是在北方各州，民主党的演说家们将“重新占领俄勒冈和重新兼并得克萨斯”相提并论。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被恰如其分地称为“粗人比尔”·艾伦宣称：“要么 54°40′线，要么战争！”波尔克以极其微弱的优势赢得这场围绕着许多问题进行争夺的选举后，其胜利被理解为（选民）对扩张主义的授权。伦敦《泰晤士报》警告说，他的当选（除了他领导的党支持降低关税以外）代表着“美利坚合众国内一切最坏的事物对一切最好的事物取得了胜利”，如维持南方利益和奴隶利益、逃避债务、兼并得克萨斯等。在《泰晤士报》看来，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这就是俄勒冈。

---

① 弗雷德里克·默克：《俄勒冈问题》（马萨诸塞州剑桥，1967 年），第 215 页。

在波尔克就任总统之后，他在俄勒冈问题上采取了一条居心叵测的复杂政策。退隐在家的安德鲁·杰克逊敦促“小核桃树”要“痛斥那些胆小的建议……妥协退让不是办法。”波尔克并不如他的前辈那样坚硬倔强，尽管他奉行一条公开威胁和好战姿态兼而有之的政策，从而鼓舞着来自俄亥俄州的扩张主义参议员“粗人比尔”·艾伦之类的“无知政治煽动家”，使他们认为他与他们立场一致。他的传记作者评论说：“波尔克恐吓政策的问题在于，它不仅对待英国不坦诚，而且对待本国同胞一样不坦诚。无论在道德立场还是在现实层面上，……这都造成了严重的……问题。”[1]

波尔克总统的过分言辞激起卡尔霍恩指示一位在职参议员辞职，从而让他本人重返参议院，其主要目的在于组织起一个主和派集团。在其他人特别是来自密苏里州的本顿的帮助下，他很快就得手了。英国人很快就知道了反对派的强大力量，如果总统奉行一条默然无声的强硬政策，他极有可能使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支持他，从而掌握有利的外交地位。此外，就英国而言，波尔克的公开威胁还因为他私下里不断暴露出来的那些软弱迹象而有所削弱。他能够取得胜利，纯属于特别走运。

在就职演说中，尽管在俄勒冈问题上慷慨陈词，从而使他看上去是个坚持“54°40′”的人，但波尔克并没有公开赞成竞选纲领所提出的“俄勒冈全部领土”的要求。此后不久，他非常秘密地要求卡尔霍恩这个对俄勒冈毫无兴趣的南方人以全权代表的身份访问伦敦，这个要求虽然遭到卡尔霍恩的拒绝，但却表明了波尔克的真实心态。之后，他指示国务卿詹姆斯·布坎南向英国公使理查德·帕克南提出一个按49°线解决问题的提议。他声称受

---

[1] 查尔斯·塞勒斯：《大陆主义者詹姆斯·K. 波尔克》（普林斯顿，1966年），第359页。

到以往各届政府的束缚，换言之，从杰斐逊到范布伦，没有哪个总统认真想过要坚持 54°40′，但这个提议极大地削弱了他的恫吓政策。在帕克南公使愚蠢地拒绝哪怕将这个提议呈交给伦敦政府之时，波尔克又回到 54°40′线的立场，开始发出战争恫吓，或者至少是挥舞剑鞘。帕克南这个百分之百地十分软弱且矛盾百出的人，对此吃惊不已。针对波尔克所谓的将把“俄勒冈问题交给上帝和全国人民去解决”的言论，帕克南回答说，在 49°线以北，上帝是不大可能指望得上的。

12 月，波尔克重申了门罗的非殖民化原则。他还请求国会废除与英国的关于俄勒冈问题的临时协议，将美国法律扩大到该地区；他还建议加强军备，尽管其财政预算主张削减军事开支。战争似乎正在逼近，其势头甚至比墨西哥战争还要紧迫。不过，正如波尔克所了解，参议院控制在以卡尔霍恩和本顿为首的辉格党人以及民主党反对派手中。他们冲破艾伦之流的反对，得以在废除《1818 年条约》的决议中附加了一个温和的序言，要求举行谈判，并且将决议的最后通过时间推迟到 1846 年 4 月。

此后，波尔克一直向英国政府传话说，伦敦方面的几乎任何建议都要提交给参议院，换言之，“他……打算要利用参议院‘建议和同意’这个条款作为台阶，收回极端要求而接受妥协。”[①] 在波尔克当选以前就在寻求解决办法的外交大臣阿伯丁不失时机地提出，把 49°线延长至乔治海峡，再往前沿着河流延伸到大海，温哥华岛归英国所有。此前，波尔克多次称这个详细方案是不可接受的，不过，为了推卸责任，他要求参议院拿出意见，同时虚伪地宣称他的立场一如从前。部分由于白宫的游说，参议院经表决接受了英国的提议。接着，政府拟定了条约，参议院在 6 月予以批准。在 14 位反对者中，有“粗人比尔”·艾伦，

① 塞勒斯：《大陆主义者詹姆斯·K. 波尔克》，第 359 页。

为抗议总统的背信弃义，他辞去了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一职。

这样，美国得以解脱出来从而集中精力对付刚刚爆发的墨西哥战争。《纽约先驱报》评论说："我们现在可以从从容容地教训墨西哥了。"美国获得了几乎全部有争议的领土，亦即今天华盛顿州的西半部，包括其重要港口，但不是"俄勒冈全部领土"。这绝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胜利，但波尔克却没有多大的功劳。到1845年底，阿伯丁已经促使他的顶头上司罗伯特·皮尔爵士接受了他的立场。其他内阁成员看到似乎并无政治风险，也跟了上来。在很大程度上，阿伯丁的成功是因为英国担心1844年大选期间喧嚣一时的民族主义，担心僵局只会加强这种情绪。波尔克的杂耍表演未能骗过阿伯丁，而且只是偶尔地改变了其他人的态度。

这位总统的最大手腕，在于迷惑了那些对他信任有加并且坚持54°40′的人。至于恫吓、阴谋、谈判，所有这些手段，他都用得不老练。最后，"在谈判终于开始时，波尔克总算结束了一场主要是由自己制造的战争危机，获得了那些他本来可以通过更加老练的外交手段而能够取得的条款。"①

英国与美国内战

在后来的岁月里，美国的扩张主义浪潮和那个生性好战的帕麦斯顿勋爵在大部分时间内执掌英国外交部的事实，导致了在中美洲问题上的持续不断的争吵。不过，双方实际上都认识到，他们的利益过于微弱，以致不值得铤而走险。1850年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掩盖了在该地区的其他问题和争端，该条约规定，一旦建成一条跨洋运河，任何一方都不得设防，或实施排他

① 戴维·M. 普莱彻：《兼并外交》（哥伦比亚，1973年），第592页。

性控制。到 1861 年，主要是因为帕麦斯顿意识到了危险，喧闹一时的争端才趋于平息。无论如何，双方都被美国内战中出现的新问题弄得不知所措。

亚伯拉罕·林肯在 1860 年 11 月当选后不久，南部诸州开始脱离联邦。1861 年 2 月，它们成立美国南部邦联同盟，武装冲突旋即爆发。6 月，在内战的第一场激战中，南部邦联在华盛顿远郊布尔溪取得大胜。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 1865 年春，成为到此时为止的美国历史上的最残酷的冲突，其代价远远超过了从滑铁卢到 1914 年间的任何一场欧洲战争。当然，北方最终打败了南部邦联，但有那么几年，这个结局却是大有疑问的。如果欧洲各国——在许多可能的方式中采用任何一种——帮助南方的话，结果很可能就迥然不同，正如被打败的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后来所说的那样。他的南方政府千方百计地争取（外国）干涉，而林肯政府同样地百般努力，而且更加成功地阻止了干涉。

对华盛顿和里士满来说，英国的政策比其他任何列强的政策都重要得多。拿破仑三世讨厌北方，他还害怕别人批评他在减缓法国纺织业的困境方面无其作为，法国纺织业因为失去了从美国南部进口的棉花而陷于瘫痪。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玩弄各种各样的、让南部邦联受益的阴谋诡计；但当联邦取得 1863 年葛底斯堡大捷后，他又收起了号角。这种新倾向的反映，便是其政府采取措施阻止交付南部邦联订购的 6 艘军舰；最后只交付了 1 艘，而且是在李投降 30 天之后才抵达北美的。不过，在发生这种转变以前，这位对美国实力怀有一种谨慎敬重之情的皇帝，在英国不予合作的情况下，是不愿意采取行动的。况且，在他和伦敦之间，从来没有谁相信过谁。美国驻英公使的儿子心安理得地评论道，欧洲政治处在一种“十分有趣的纠缠状态”。

大多数英国政治家和编辑都欢迎林肯的当选。后来对林肯进行最猛烈批评的伦敦《泰晤士报》甚至写道：“我们高兴地认为，

奴隶制的扩张及其鼓吹者对自由制度的盛气凌人的态势，最终得到了抑制和平息。”大选过了几个星期后，在南卡罗来纳率先宣布脱离联邦之时，《泰晤士报》评论道，该州“如果有权脱离……美利坚合众国的话，兰开夏同样有权脱离英国”。到1861年6月，美国公使的儿子亨利·亚当斯写道：“英国人确实站在我们一边。”[1]

当林肯强调要维护联邦而不是废除奴隶制时，许多英国人有了别的想法。对他们来说，“两个地区之间的斗争似乎毫无原则或道德目标可言。”[2] 1861年10月，外交大臣约翰·拉塞尔勋爵在一次演讲中对听众说，南北双方不是在为奴隶制打仗，而是“像旧世界的许多国家曾经做过的那样进行着争夺，一方是为了帝国，另一方是为了权势。”此外，较之华盛顿推行的保护主义，南方的低关税政策更能迎合英国人的胃口。1861年11月《莫里尔关税法》“打碎了那些认为内战是一场反对奴隶制斗争的人的说法。对许多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人来说，蓄奴制度和保护主义两者之间在道德上并无多大区别”。[3] 林肯在1862年转而推行解放奴隶政策，一开始并未能改变局面。许多人断定，因为它只适用于敌方领土上的奴隶，所以其主要目的在于鼓动南方的“奴隶起义”。同时，许多英国人还这样想：一个分裂而不是统一大陆共和国对英国利益构成的威胁是否会更小呢？

面对着要求扩大英国特权的呼声，保守派只能对一个共和制

---

① 这绝不意味着他本人尊敬林肯，在去世以前，他一直被看成是一个无知的政客。一家伦敦杂志评论道：“如果处在英国的制度下，他或者他的任何内阁成员都不可能在大自然给予他们的那种平凡境况中出人头地。”

② 弗兰克·J. 默利：《英国与南部邦联海军》（布鲁明顿，1970年），第21页。

③ 诺曼·B. 费里斯：《孤注一掷的外交》（诺克斯维尔，1976年），第182页。

国家的剧痛以及明显的、日益临近的分裂抱着欢迎态度。一位贵族欣喜万分地评论说："我看到了美国民主的考验和失败。"此外，至少有一部分贵族把南方人当做是他们的同路人。1862年，南方的一个主要支持者约翰·A. 罗巴克在下议院说："北方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朋友，南方倒是我们结交的对象。他们是英国人，而不是欧洲的弃民。"一位美国记者在总结这些言论时指出："我们的民主不为他们的贵族所喜欢；我们的工业产品同他们的工业产品相互竞争；我们的商业在许多领域危及着他们的商业。我们正十分危险地逼近他们的某些最好的殖民地。"实际上，英国的舆论远非铁板一块，北方仍然拥有许多朋友。尽管如此，这个总结还是相当准确地抓住了不少颇有影响的英国人的心态，甚至可能是整个统治阶级的心态。[①]

但如同在法国那样，影响英国政策的主要因素是这样一种信念，即联邦的恢复是不可能的。到1861年春，特别是在布尔溪战役之后，"'分裂的灾难'已……被认为是在所难免了"。[②] 许多人认为，因为英国将不得不与南部邦联同处于一个世界，所以不与它交往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如果能帮助北方承认不可避免的结局进而结束战争，那将是一件真正的好事，同时也对英国贸易大有裨益。甚至连理查德·科布登这个一心支持北方事业的激进派有时也流露出这种看法。1862年，财政大臣威廉·E. 格拉斯通在公开场合不无惋惜地说，北方的民众"还没有喝下这杯苦

① 关于英国劳工阶级特别是兰开夏工人的同情态度，历史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存有争论。北方联邦的封锁切断了棉花后，许多纺织厂被迫减产甚至关闭，大量工人因此饱受失业之苦。部分人认为，工人的共和精神使得他们继续支持北方的事业，而另一些人反对这种说法。无论事实如何，他们的政治影响乃是微不足道的。

② 马丁·克劳福德：《19世纪中叶的英美危机》（佐治亚州雅典，1987年），第92页。

酒，……但全世界所有其他人都看出他们必须把这杯苦酒喝下去。”格拉斯通演讲虽然激起了美国的愤怒——这种态度被看成是亲南部邦联的，但他只不过是说出那些最了解情况的英国人的观点。

无论其看法如何，大多数英国人，甚至同情南方的大多数人，都不想把他们的想法强给北方从而招来麻烦。其中，加拿大过于虚弱，联邦军队只要从中抽调出一小股力量，就足以对其实施占领。英国纺织业吸纳了（国内）1/6 劳动力，提供了 1/3 的英国出口商品；南部邦联希望英国为确保纺织工业的原料供应而被迫采取行动，但他们的愿望落了空。为了向伦敦施加压力，南部邦联在 1861 年停止棉花出口，但这种策略既没有达到目的，也没有赢得任何盟友。由于（英国的）原料储备规模较大，到 1862 年底才感受到切断棉花供应所造成的重大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一些供给渠道相继开辟，联邦军队所收复的地区也开始供应棉花，短缺问题得到缓解（新奥尔良和其他港口早在 1862 年 5 月就已重新开放）。不过，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在大批工厂倒闭之时，在 2/3 工人失业之时，要求采取行动的呼声也没有强大到足以迫使政府采取行动。此外，除了纺织业，英国经济仍是繁荣有加，这不仅得益于美国竞争力的减弱，而且得益于美国更大的购买力，如武器、军舰和其他商品。

不管怎么说，北方人特别是国务卿威廉·H. 西沃德一清二楚地表明，干涉意味着战争。西沃德以反英立场和黩武主义而声名远扬，这是他在纽约从政时树立起来的。在英国一位内阁成员看来，他是“美国特性的最暴烈、最傲慢一面的典型代表”。在得知西沃德的任命消息后，英国驻华盛顿公使预言说，西沃德“将不会不情愿地通过制造给外国出难题的方式来煽动公众情绪”。这个说法不幸言中。在一份呈给林肯、日期碰巧为愚人节的备忘录中，西沃德建议挑起同西班牙和法国的事端，或挑起同

英国和俄国的事端，以期南方会放弃分裂行动，并在星条旗下共同作战。所幸的是，林肯搁置了这个计划，在后来的几个月里，他不止一次地降低了国务卿公函的调子。随着时间推移，西沃德变得平和多了。实际上，他原先的好斗精神主要是这样一种行为，即“经过周密盘算用来算计英国的，后者正担心其过于虚弱的北美帝国的安全，正全身投入欧洲的均势”。[①] 无论是出于何种考虑，特别是由于他没有刻意去掩藏他的本来看法，他就使得英国人相信，对美国进行真刀实枪的干涉过于有害，以致不能冒险。

英国政府的首要人物是首相帕麦斯顿、外交大臣约翰·拉塞尔勋爵和（财政大臣）格拉斯通。美国人怀疑自由党领导人同情南部邦联，尽管格拉斯通和不再好斗劲儿十足的“帕姆”[②] 强烈地反对奴隶制。格拉斯通甚至想，如果可能就把加拿大让给美国，以此换取这场徒劳无效的统一战争得以收场。拉塞尔是一位圈内人所说的“和事佬”。像帕麦斯顿和其他许多英国人一样，他认为“美国人都是恶棍，鲁莽、粗野、狡诈、贪婪、胆小，根本听不进别人的合理建议和友好劝说”。[③] 在私下里以及偶尔在公开场合，拉塞尔和其他大臣也怀有这种情绪。不过，大体上看，他们都是实用主义者：“问题在于，他们要避免麻烦，不冒险，平衡眼前的中立国利益与长远的……利益，在美国佬的恐吓面前保住脸面，但又要防止‘偏心的’干涉，以致造成英国的内部分裂。”[④]

在整个内战期间，美国驻伦敦公使一直是查尔斯·弗朗西

① 詹金斯：《英国与捍卫联邦的战争》（第 2 卷），第 2 页。
② 即帕麦斯顿。——译者
③ 费里斯：《孤注一掷的外交》，第 198 页。
④ D. P. 克鲁克：《北方、南方与列强》（纽约，1974 年），第 375 页。

斯·亚当斯，他是其家族中第三个担任该职位的人。[1] 亚当斯因为儿子的婚礼而有所推迟，在他抵达伦敦时，英国内阁刚刚于1861年5月承认了南部邦联的交战权，同时也就确立了英国臣民的与战争有关的适当行为的准则。新任公使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西沃德也是如此，他坚持认为——这时，内战已打了一段时间——反叛者不过是“一个心怀不满的国内派别”。实际上，除非英国想把南部邦联当做海盗，否则它别无选择；1837年，美国也是同样对待加拿大叛乱的。正如（英国）外交大臣对亚当斯所说，人们“几乎不可避免地说这是一场两方之间的战争，除非他失去了起码的正义感。”他还指出，英国不能“阻止……按照现代文明的战争规则来对待这场战争的努力。这就是女王宣言的所有含义。”

此外，承认交战权根本不是建立全面关系，英国驻美公使莱昂斯勋爵曾经徒劳地力劝其上司奉行这条路线，法国和俄国驻美公使同样也敦促过他们的上司。当南方外交人员到达伦敦时，拉塞尔只是同这些被他在信函中称作“所谓的邦联同盟”的代表举行了几次做做样子的非正式谈判，除此以外，他拒绝采取进一步行动。唐宁街也不允许南部邦联的商业劫掠者在英国出售其抢劫品。它容忍了（北方）对南部邦联的封锁，而这种做法通常是不符合国际法，特别是美国人以前曾对这些法律做出过自己的解释。杰斐逊·戴维斯在回忆录中抱怨说，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几乎是一声不吭地听任美国肆意妄为，去破坏其贸易。”北方人却不这么看，从南部邦联获得交战权那一刻起，他们就对英国人的歹毒用心深信不疑。

---

[1] 与约翰·昆西·亚当斯不同的是，查尔斯·弗朗西斯从未在父亲手下见习过外交。不过，他两岁时就被父亲带到俄国，此后一直呆在欧洲，直到约翰·昆西·亚当斯进入门罗内阁任职。

林肯政府通过行动背离了美国的传统，有人还会说，它背离了美国的长远利益。曾几何时，美国主张限制交战权。墨西哥战争期间，它小心翼翼地遵守——或至少是接近于遵守——它为其他国家所确立的规则。一位同情南方的历史学家写道："为取得对南部邦联的大有疑问的优势，（林肯）公然置美国所有的先例、美国所有的永久利益和海上中立权利原则于不顾。……国际法回到了枢密院敕令和米兰敕令盛行的那个时代。老亚伯[1]为了蝇头小利出卖了美国与生俱来的权利。"[2]

林肯是在1861年4月宣布对南方实行封锁的，即南部邦联进攻萨姆特堡6天之后。当时，美国海军只有三艘蒸汽动力军舰可用来拦截3500英里长的海岸线上的近两百处港口的商业。虽然增援力量不断加入，可用的军舰数量到1861年底也达到了150艘，但直到战争结束，封锁一直是漏洞百出的。主要港口都得到切实有效的封锁，欧洲几乎没有重型装备运抵南方，只有少量棉花得以出口，但是，成百上千的小船偷偷越过封锁线，逃过了联邦军队的巡逻。其中许多船是英国的，正如拉塞尔所承认，"如果能够赚钱的话，（他的同胞）甚至会冒着船帆被烧掉的风险往地狱运送物资。"

按照杰斐逊或麦迪逊的标准，联邦的行动并不是有效的封锁，因而是非法的，就像福克斯的1806年封锁。不过，林肯政府为此辩解说，"有效"不一定就是无懈可击。虽然帕麦斯顿开始想挑战封锁，虽然拉塞尔对华盛顿在各种情况下所采取的封锁方式提出过不下数百次抗议，但英国政府从未否认过联邦的努力。挑战封锁很有可能会导致战争。此外，从长远看，鼓励采取

---

[1] 指林肯。——译者

[2] 弗兰克·劳伦斯·奥斯利：《棉花王外交》（芝加哥，1931年），第290—291页。

宽松的法律标准，符合英国的利益。《泰晤士报》指出，不管怎么说，“到目前为止，封锁是我们所拥有的最有力的进攻武器。毫无疑问，我们不应过早地弄钝它的刀刃，或损害它的锋芒。”帕麦斯顿表示完全赞成。他说，英国的“长远利益更可能通过默认而不是反对联邦所规定的交战权来加以促进”。

北方不仅抛弃了美国在封锁问题上的传统看法，而且采用甚至发展了它在 50 年前曾加以反对的连续航行原则。联邦军舰在通往南方的第一段航程上拦截船只和货物，最著名的例子是在 1863 年捕获了“斯普林博克号”，该船行驶在从英国开往拿骚的途中，至少就其货物而言，其目的地是南部邦联。美国还将连续航行原则扩大到陆上运输，甚至连英国以前也未曾有过此举。1863 年，英国船“彼得霍夫号”在加勒比海被抓获，这里距离格兰德河上的墨西哥港马塔莫罗斯港这个目的地尚有数百英里，因为其货物打算在上岸后通过陆路运往得克萨斯。《泰晤士报》提出忠告说：“除非采取强硬立场，否则我们就必须蒙受无休无止的屈辱和损失。”较之《泰晤士报》，帕麦斯顿内阁的立场更加前后一贯，他们相信，先例也许在将来会大有助益。[①]

内战期间的三次危机

北方与大不列颠发生过三次重大对抗，其中，第一次是在 1861 年底。11 月，查尔斯·威尔克斯上校指挥的一艘美国军舰在古巴海域拦截了英国邮船“特伦特”号。威尔克斯扣押了詹姆斯·M. 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这两人溜出北方的封锁线，前

① “斯普林博克号”和“彼得霍夫号”案件最终提到了最高法院。它在 1867 年下达了判决书，“一清二楚地表明美国政府正在抛弃与中立权有关的各项规则，它曾为此于 1812 年发动战争，并且从那时以来一直维护着这些规则。”（斯图尔特·L. 伯纳特：《大西洋上的争端》，伯克利，1970 年，第 97 页。）

往英国担任南部邦联的代表。他们如此大肆渲染他们的出访，以致有人怀疑“南方可能策划了整个……事件，从而试图有意挑起北方和英国之间的战争”。[1] 西沃德的一位信使写道，在这两个人的家眷抵达伦敦后，“这两位被俘叛徒的女眷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们是自愿被俘的。”

举国上下到处都是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国会敦促林肯授予威尔克斯金质勋章。英国公众则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强烈反应，他们认为这无异于绑架，而政治压力及其自身的愤怒决定了英国内阁要求释放两名俘虏。正如皇室律师所坚持认为，也正如威尔克斯本人的下属曾经警告过的，从“特伦特”号上掳走这两个人——同强征海员一样——是非法的，尽管这艘船需要开往美国接受审判。帕麦斯顿料到或害怕林肯会拒绝释放南部邦联的使者，因此考虑派出英吉利海峡舰队越过大西洋，内阁还下令增援加拿大。[2]

双方的常识压过了公众舆论，避免了战争。英国政府没有通过最后通牒的方式提出正式挑战，尽管其抗议是如此强烈，以致女王的丈夫出面干预降低调门。拉塞尔留给西沃德时间以处理抗议，同时又指示英国驻华盛顿公使莱昂斯勋爵向国务卿表明，不利的答复会导致两国关系的破裂。

西沃德首先使自己本人相信，后来还让总统相信，英国的理由是不可驳回的：威尔克斯违反了中立国的海上自由权利。在一份主要是针对本国同胞、不久公开发表的照会中，西沃德指出，通过否认威尔克斯的行动，美国所要“保护和维持的，不只是英国的利益，而且是美国传统的、高尚的和珍贵的事业。……我们

① 林恩·M. 凯斯和沃伦·F. 斯宾塞：《美国与法国——内战时期的外交》(费城，1970年)，第591页。

② 第一支部队抵达时，圣劳伦斯河已经结冰。西沃德慷慨地允许英国军队进入缅因州并从陆上向前开进。

……对英国所做的，其实正是我们一贯坚持所有国家应对我们所做的。”英国人得出结论认为，这是“对莱昂斯的要求的一个满意的答复，如果说是无理的话。”[①]

梅森和斯莱德尔获释并前往欧洲，但他们在那里几乎一无所获。支持英国的拿破仑三世，对美国妥协让步表示遗憾，他对英国大使说：“英国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机会去打击美国的傲慢无礼了，或在新大陆确立她的影响了。”危机至此结束。在某种意义上，它提醒英国注意加拿大的虚弱，它还表明西沃德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充满敌意，“‘特伦特’号事件犹如一场暴风雨洗涤了空气”。[②] 然而，大多数美国人只记得英国曾经要求释放反叛代表。

另一场危险的对抗发生在1862年，这一次是由伦敦方面主动挑起的。英国领导人考虑进行调停，邀请交战双方举行和平谈判；如果林肯和西沃德拒绝调停，就承认南部邦联，以此惩罚北方。拿破仑三世支持该计划，因为这有望恢复棉花交易，有望削弱美国的实力，否则，这种力量会不利于他的墨西哥冒险行动。帕麦斯顿和拉塞尔一致认为，“向美国政府提出调停的时机业已到来，其意图是承认南部邦联的独立。”在这关键时刻，拿破仑却因为一场内阁危机而转移了视线。稍后，乔治·麦克莱伦将军又在安提塔姆附近打退了李将军对北方的入侵，这个消息削弱了英国人关于北方不可能取胜的信念，首相搁置了这项计划。

在那次著名的、宣称杰斐逊·戴维斯业已建立国家并呼吁美国“吞下这杯苦酒”的演讲中，格拉斯通又重提此议。这位大臣的演讲发表后，惊慌失措的人可能与情绪大振的人一样多。他本

---

① 伯恩：《英国与北美均势》，第219页。

② 伊弗雷姆·道格拉斯·亚当斯：《英国与美国内战》（第1卷，纽约，1935年），第242页。

人也承认说，“公众的反应……表明，人们此时还普遍不愿意承认南方。”然而，它对那些偏听偏信的人产生了影响。拉塞尔重新得到了支持。他写道，英国的责任似乎在于要求美国交战双方“同意放下武器，以便冷静地权衡，究竟是要和平的好处，还是要暂时的利益，从而继续流血打仗，拖延如此不幸的一场战争。”拿破仑则在一旁怂恿英国人。

西沃德得知这个危险动向后，指示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发出警告说，调停之议不仅会招致怨恨，还将被视为宣战。帕麦斯顿只得退让，他写道：“我们只能继续充当旁观者，等待战争出现一个更有决定性的转机。”内阁表示赞同。11 月中旬，该计划被正式束之高阁，名义上的理由是时机不成熟，尽管如此，因为南方军队再也未能取得重大胜利，后来也就没人再把它翻出来。这个举动从来就不是亲南方的——对格拉斯通来说尤为如此，而是为了让北方接受事实。然而，它的付诸实施必将带来一场规模难以估计的冲突。

在内战时期的最后一次重大对抗中，如同在“特伦特”号事件和调停危机中一样，帕麦斯顿政府也没有像美国人所认为的那样充满敌意。依据国际和国内法，英国公司可以向交战双方出售武器。南北双方都利用了这一点，这也极大地符合英国工业的利益。舰船却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难题。1819 年《对外募兵法》——大量援引了美国法律——允许为交战双方建造舰船，但条件是这些舰船不得武装。英国造船厂建造或装备了“阿拉巴马号”和其他舰船，尽管是用于战争目的，但却是在离开英国港口后作为南部邦联的商业劫掠船时才被武装起来的。英国法院极为狭义地解释了这项法律，因此，当亚当斯的抱怨切中要害时，拉塞尔及其同僚甚至不能随手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当他们就要采取行动时，他们又遇到厄运：女王的辩护律师在精神崩溃时把重要文件带到精神病院去了。这样，1862 年 7 月，“就在白厅

的英国官员签署扣留命令之前那一刻”，[①]“阿拉巴马”号逃离了利物浦港。在两年后被北方军舰击沉之前，它俘获或摧毁了58艘舰船。另一艘“佛罗里达”号劫掠船捕获了38艘船只。

1863年，在所谓的“莱尔德公羊”[②]快要建成时，问题愈发紧迫了。显而易见，这两艘船都是军舰，其设计目标显然是为了撞坏那些执行封锁任务的木质军舰，即使它们在离开英国港口时没有武装，而且南部邦联的船员已在利物浦港等候了。亚当斯不断向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最后还写信给拉塞尔说，“在我看来，向大臣阁下指出这就是战争已是多此一举了。”这确实是多此一举，因为拉塞尔已决定要阻止“公羊”离港。南部邦联是否拥有（这些船），他认为还没有找到法院能够接受的证据，10月，他和他的同僚只得援引旧法律，允许政府购买这些据说是国防所需的船只，尽管海军部实际上认为它们一钱不值。这个决定所结束的危机，最终证明是最后的一场。1863年秋季以后，这场战争——用亨利·亚当斯的话说——成为“一个令人讨厌而又无足轻重的小事”，它不再是英国认真关心的大事了。

无论是美国民众，还是那些——不大可以原谅的——其职责就是去理解英国政策的人，都没有称赞帕麦斯顿政府在美国内战时期的所作所为。他们特别憎恨中立宣言，憎恨“特伦特”号事件期间的英国政策，其时，他们“在威胁面前妥协退让，但讨厌别人如此对待他们，他们还把这个威胁看成是英国人居心叵测的明证”。[③]他们断定，伦敦的主要关切并不是尽量地减少当时的和以后的麻烦，而是受到亲南部邦联的情感所驱使。这个错误结论多年来一直是影响英美关系的一个重大因素。两国民众都没有

---

① 默利：《英国与南部邦联海军》，第92页。

② 即装有撞角的军舰。——译者

③ 亚当斯：《英国与美国内战》（第1卷），第237页。

认识到，在避免了内战期间的较大麻烦之后，两国关系已经走上了巨大的和好道路，这将是1895年后国际政治中最重大的发展态势之一。

1865年4月9日，李将军投降。17日，林肯及其内阁决定解除封锁，尽管南方还有持续不断的零星抵抗。这天晚上，他到一家剧院看戏，在那里一名刺客射中了他。此后数日，成千上万封唁函和慰问信飞往华盛顿。国务院后来出版了一本700页的集子，汇集了40多个国家发来的信函和评论。其中的一封信，是维多利亚女王写给玛丽·林肯的，它是在英国内阁建议下，由一位“遗孀”写给另一位“遗孀”的。

第九章 共和制帝国

1866年，一家英国杂志《观察家》不无嫉妒地指出："不再有人怀疑美国是一个一流强国了。这样一个国家，冒犯它会很危险，进攻它几乎不可能。"从直接意义上讲，这个评论反映了联邦通过内战胜利而巩固了国家地位。从更大的角度看，它反映了诞生90年以来共和国实力的急剧增长，这个时期比约翰·昆西·亚当斯这代人的一生稍长。

内战结束时，全国人口超过了3500万，英法两国则稍为逊色。美国的工业总产量虽然还大大落后于英国，但大体上与法国相当，并超过了其他国家。美国的农业产量居世界首位。领土面积从1783年不到100万平方英里扩大到超过300万平方英里。战争结果证明了共和制政府的生命力。

美国的成功在很多方面归功于它在对外关系上取得的成就，其中一些是争取到的，一些则不是。德国"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似乎说过，上帝好像在他心中为酒鬼、白痴和美国人留下了特殊的位置。年轻的共和国似乎确实交上了好运，也许最明显的，不仅表现在它成功摆脱了杰斐逊和麦迪逊的过错所带来的后果，而且表现为诸如谢尔本和阿伯丁在危机时刻对英国政策施加了值得庆幸的影响这些事实。

但是，玩世不恭者可能会说，好运总是降临在那些拥有优势的人的头上。用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那句人们熟知的格言

说，“欧洲的灾难”常常是美国的“机会”。[1] 美国革命的成功——在欧洲人看来不过是殊死的权力争夺中的一个小插曲——以及路易斯安那的和平获取，也许都是最好的例证。当然，欧洲的灾难可能也会扩散，如1812年，但即使在那时，美国人也得以幸免，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英国把全部资源用在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上。而且，比米斯所谓的“灾难”并不完全包括那些帮助过美国人的欧洲因素。精力分散就够了。岌岌迫发、近在咫尺的冲突——更不要说战争——使得各国首都特别是伦敦惟恐再与美国发生争端。欧洲因素成为美国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其促成方式虽各不相同，但却是持续不断的。

无论上帝偏爱与否，美国人还是幸运的，他们常常是推开了那些半开半掩的大门，或至少是锁得不牢的大门。因此，他们无需动员大规模的征服军来从事扩张，也不需要保持常备军来保卫帝国。他们为发起墨西哥战争所动员的部队，在规模上不过是15年后北方在内战中所动用部队的1/16。19世纪40年代以前，和平时期的武装力量从未超过两万人，内战开始后也不到3万。无论是佛罗里达的西班牙人、墨西哥人还是印第安人，都过于羸弱，以致无法对破门而入者关上大门；也用不着一个像拿破仑那样的军事天才去领会这样一个问题，即路易斯安那在1803年是无法防御的。

但最重要的是，美国人的成功归之于他们的魄力和雄心。有时，他们的手段粗暴残酷；有时，他们的领导人犯错失算；有些领导人，特别是《根特和约》以前的那些领导人，像其他民众一样对共和制实验的前景忧心忡忡。然而，他们都表现出本国同胞的那种共和民族主义，或至少是受到共和民族主义的促动。年轻

[1] 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平克尼条约》（巴尔的摩，1926年版），第Ⅲ页。

的美国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具有吸引力，奴隶制度、排外主义、利己主义、自命不凡等，都玷污了国家名誉。欧洲保守派当然不这么看，他们对门罗主义所作的反应，他们对内战所持的态度，如此等等，都说明了问题。1863年，在共和制度经受考验之时，维多利亚时代中叶文坛上的一位主要人物约翰·拉斯金对美国做出以下评判："贪图和迷信财富；庸俗地追求大而全，不尊崇高尚典雅；永无休止地、自以为是地追求一时的虚荣。"抛开拉斯金的恶意诋毁不说，经济个人主义、人民主权观念、优越于其他民族的信念等秉性，造就了国家的现实面目，赋予政策以永不停息的活力。

近来，曾被历史学家用作解释路标的"美国例外论"和"美国共识论"，遭到猛烈抨击。"例外论"强调美国独一无二的观念，强调美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与其他国家相提并论。与此并非不相关联的"共识论"则坚持，相对于其他民族而言，美国人民在政府和政策的基本原则上有着普遍的、近乎完全一致的意见。如今，许多人认为，这两个概念反映了美国人在取得杰出成就的年代里的沾沾自喜的保守主义。声称美国一直处于共识之下，是指内战等一系列事件所表现出来的国家统一的虚假现象；而强调美国的独特性，则是要坚持美国的优越感。

然而，对外交史学家来说，"共识论"和"例外论"这两个概念仍大有用处，如果适当地、小心谨慎地加以运用的话。美国早期历史上联邦党与共和党之间的斗争以及几十年后民主党与辉格党之间在扩张策略和时机问题上观点截然相反，是美国外交史的核心问题。这些分歧并不能模糊决策者和人民——当他们转而关注对外政策时——在国家目标上的共识。全体美国人都要求并期待美国的领土和商业扩张，都想置身于欧洲政治之外，都信仰他们自己所界定的共和制度，都认为美国是照亮世界的"自由灯塔"。在这个层次上，确实存在共识。

第九章　共和制帝国

所有国家都是各不相同的，但只有美国——当然是指 19 世纪的美国——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为真正的“例外”。这样说，并不是断言美国在道德或其他方面高人一等，而是强调美国与众不同的信仰、与众不同的机遇及其对自身世界地位的与众不同的看法。对于美国独特性和美国优越性是一回事这个说法，我们可以把它归结到共和制帝国的开创人和建设者身上；但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信念——或许是他们的傲慢——有助于推动国家的政策。1785 年，蒂莫西·德怀特——继续创作他那开始于耶鲁学院的热情洋溢的民族主义诗歌——在预言未来时指出：

帝国最后最辉煌的权杖将在这里竖起，

和平、公理和自由要向宇宙致意。

他的同胞对此坚信不移；正是由于这个信念，到 1865 年时，他们终于建立起一个共和制帝国。

参考文献短论

What historians write and teach is a hopefully constructive synthesis of creative thought, labor in the primary sources, and absorption of and reaction to the work of others. The following comments direct interested readers to a selection of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that has shaped *The Creation of a Republican Empire*. For a comprehensive list of writings on American diplomacy, though limited to works published before 1981, see Richard Dean Burns, ed., *Guide to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700* (Santa Barbara, Calif., 1983).

1. The Canvas and the Prism

John Quincy Adams's career is traced in Samuel Flagg Bemis's magisterial biography *John Quincy Adam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1949) and *John Quincy Adams and the Union* (New York, 1956), based very largely on Adams's papers, which Bemis was the first to use. Bemis, whose own physical and intellectual affinity with Adams was often noted, treats his subject sympatheticall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views of foreign affairs before independence, emphasizing their imperialist but antimercantilist nature, Max Savelle,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Diplomacy* (New York, 1967), is the key work.

Although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ians, like those laboring in other fields, often stress particular themes – economic forces, expansionism, and so forth – few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paint the whole "canvas." Dexter Perkins, *The American Approach to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Mass., 1952), though a reflection of its times, is a useful exception. Consequently, even more than most chapters in this book, this one rests upon a wide range of writings, many not specifically directed to problems of diplomatic history.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forces have drawn the attention of a number of scholars. An impressive recent work is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1987). Akira Iriye has stressed "Culture and Pow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ntercultural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3 (1979): 115–128, and episodes are examined in Morrell Heald and Lawrence S. Kaplan, *Culture and Diplomacy* (Westport, Conn., 1977). Other useful studies include Merle Curti, *The Roots of American Loyalty* (New York, 1946); David M. Potter, *People of Plenty* (Chicago, 1954); Yehoshua Arieli, *Individu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American Ideology* (Cambridge, Mass., 1964); Ernest Lee Tuveson, *Redeemer Nation* (Chicago, 1968); and Cushing Strout, *The American Image of the Old World* (New York, 1963). For the most part, as these references suggest, one draws insights and evidence from historical studies of diplomacy in which culture and ideology are not central themes or from studies of culture and ideology that pay little attention to foreign relations.

On the theme of republicanism, see the references for Chapter 4.

For the views of the two great foreign commentators on America, see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first published in 1835 and 1840, and James Bryce,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published in 1888. Both have since appeared in many editions.

2. The Birth of American Diplomacy

Foreign relations during the Revolution are surveyed in Samuel Flagg Bemis, *The Diplomac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35; rev. ed., Bloomington, Ind., 1957), and a new study, Jonathan R. Dull,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Haven, 1985). Dull avoids the extreme nationalism of Bemis's work, and he also stresses that the war in America was only a part – a relatively small one, he maintains – of a larger conflict between European states. This latter point is also made abundantly clear in Orville T. Murphy, *Charles Gravier, Comte de Vergennes* (Albany, 1982). Still, Bemis's book remains a classic. The first chapters of Lawrence S. Kaplan, *Colonies into Nation* (New York, 1972), are also useful here, and Kaplan has edited a fine selection of essays on

Revolutionary diplomacy,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A Candid World"* (Kent, Ohio, 1977).

In *To the Farewell Address* (Princeton, 1961), Felix Gilbert argues that American diplomacy, with its emphasis on trade and internationalism, broke sharply with contemporary European practices. James H. Hutson,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Early American Diplomacy," *Diplomatic History* 1 (1977): 1–19, takes Gilbert vigorously to task, and Hutson's highly critical biographical work, *John Adams 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Lexington, Ky., 1980), among other things repeats this argument. Hutson tends to ignore the qualifications in Gilbert's work, but his basic argument is not unjustified.

Jonathan R. Dull, *The French Navy and American Independence* (Princeton, 1975), is by far the best treatment of the calculations that led France to enter the war in 1778. William C. Stinchcombe,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French Alliance* (Syracuse, 1969), similarly stands alone in its discussion, from an American vantage point, of how the alliance actually worked.

The most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of the war-ending negotiations at Paris is Richard B. Morris, *The Peacemakers* (New York, 1965), based on extraordinarily broad research. Morris's treatment is not unmarked by xenophobia, however, and more dispassionate accounts of aspects of the negotiations may be found in Ronald Hoffman and Peter J. Albert, eds., *Peace and the Peacemakers* (Charlottesville, Va., 1986). On Franklin, see Gerald Stourzh, *Benjamin Frankli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hicago, 1954). Vincent T. Harlow, *The Founding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vol. 1 (London, 1952), traces the policy of Britain, especially of Lord Shelburne, during the negotiations; at present a necessary reliance, it deserves to be replaced. H. M. Scott,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xford, 1990), although saying remarkably little about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provides a fine picture of Britain's European diplomacy and offers insights into Shelburne.

Kossuth's visit is well described in Donald S. Spencer, *Louis Kossuth and Young America* (Columbia, Mo., 1977).

3. The Constitution

Frederick W. Marks III, *Independence on Trial* (Baton Rouge, 1973), recounts the diplomatic problems of the 1780s and the work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st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former in the campaign for a new government. In *Aftermath of Revolution* (Dallas, 1969), Charles R. Ritcheson describes in detail American problems with Britain, and in *Struggle for the American Mediterranean* (Athens, Ga., 1976), Lester D. Langley examines the piracy problem.

Recent disputes have stimulated study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intentions regarding the control of foreign policy. See, for example, Walter LaFeber, "The Constitution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4 (1987–8): 693–717; Leonard W. Levy, *Original Intent and the Framers' Constitution* (New York, 1988); and Charles A. Lofgren, *Government from Reflection and Choice* (New York, 1986).

The treaty-making power is considered in Arthur Bestor, "Respective Roles of Senate and President in the Making and Abrogation of Treaties – the Original Intent of the Framers Historically Reviewed," *Washington Law Review* 55 (1979): 4–135, and Jack N. Rakove, "Solving a Constitutional Puzzle: The Treatymaking Clause as a Case Study,"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n.s., 1 (1984): 233–81. W. Stull Holt, *Treaties Defeated by the Senate* (Baltimore, 1933), is a broader consideration of that body's role than the title suggests.

David Gray Adler, "The President's War-Making Power," in Thomas E. Cronin, ed., *Inventing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Lawrence, Kan., 1989), 119–53, argues that the Founding Fathers' intentions have been subverted, a claim also made in Francis D. Wormuth and Edwin Firmage, *To Chain the Dogs of War* (Dallas, 1986). Broader treatments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use of presidential authority include Abraham D. Sofaer, *War, Foreign Affairs and Constitutional Power: The Origins* (Cambridge, Mass., 1976), and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Imperial Presidency* (Boston, 1973).

4. Federalist Diplomacy

Literature on the theme of republicanism is vast and disputative. A useful introduction, though now somewhat dated, is Robert E. Shalhope, "Toward a Republican Synthesis,"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3 ser., 29 (1972): 49–80. Two especially useful works are Drew R. McCoy, *The Elusive Republic* (Chapel Hill, 1980), and Lance Banning, *The Jeffersonian Persuasion* (Ithaca, 1978). Patrice Higonnet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merican and French republicanism in *Sister Republics* (Cambridge, Mass., 1988). See also David Brion Davis, "American Equality and Foreign Revolutions,"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6 (1988–9): 729–52.

Frank T. Reuter, *Trials and Triumphs* (Fort Worth, Tex., 1983), describes developments during the Washington administrations. Harry Ammon recounts one of the "trials" in *The Genet Mission* (New York, 1973), and Albert H. Bowman organizes a discussion of diplomacy in these years around his theme, *The Struggle for Neutrality* (Knoxville, 1974).

Samuel Flagg Bemis, *Jay's Treaty*, 2d ed. (New Haven, 1962), first published in 1923 and long standard, now shares place with Jerald A. Combs, *The Jay Treaty* (Berkeley, 1970). See also the closing chapters of Ritcheson, *Aftermath of Revolution* (Dallas, 1969). Bradford Perkins, *The First Rapprochement* (Philadelphia, 1955), picks up the story of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at 1795 and carries it beyond the end of the Federalist era, to 1805.

Alexander DeConde's *Entangling Alliance* (Durham, N.C., 1958) and *The Quasi-War* (New York, 1966) are the indispensable works on relations with France. Samuel Flagg Bemis, *Pinckney's Treaty* (Baltimore, 1926), is the standard authority.

Julian P. Boyd, *Number 7* (Princeton, 1964), explores Hamilton's "treachery."

5. Jefferson and Madison

Jefferson's presidency is traced in great detail in two volumes of Dumas Malone's very sympathetic biography, *Jefferson the President, First Term* (Boston, 1970) and *Jefferson the President, Second Term* (Bos-

ton, 1974). More analytic treatments include Robert M. Johnstone, *Jefferson and the Presidency* (Ithaca, 1978); Burton Spivak, *Jefferson's English Crisis* (Charlottesville, Va., 1979); and Lawrence S. Kaplan, *Entangling Alliances with None* (Kent, Ohio, 1987), the last-named also including essays on other subjects. Irving Brant, *James Madison, Secretary of State* (Indianapolis, 1953) and *James Madison, the President* (Indianapolis, 1956), volumes similar to Malone's, are even more annalistic and pietistic.

Alexander DeConde, *This Affair of Louisiana* (New York, 1976), is now the standard treatment, but for a vigorous defense of Jefferson, see Robert W. Tucker and David C. Hendrickson, *Empire of Liberty* (New York, 1990). For later developments in Franco-American relations, see Clifford L. Egan, *Neither Peace Nor War* (Baton Rouge, 1983), a work that fills a long-apparent void.

Bradford Perkins, *Prologue to War* (Berkeley, 1961), very critical of the Republican leaders, examines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from 1805 to 1812. Among other things, Perkins challenges the argument that expansionism fueled the drive for war, a thesis most forcefully expressed in Julius W. Pratt, *Expansionists of 1812* (New York, 1925). Also critical of Pratt's argument are J. C. A. Stagg, *Mr. Madison's War* (Princeton, 1983), and Reginald C. Stuart, *United States Expansionism and British North America* (Chapel Hill, 1988).

Roger H. Brown, *The Republic in Peril* (New York, 1964), and Steven Watts, *The Republic Reborn* (Baltimore, 1987), link the coming of the war to the republican theme. The war Congress is perhaps best treated in Ronald L. Hatzenbuehler and Robert L. Ivie, *Congress Declares War* (Kent, Ohio, 1983).

The war and its management are discussed in Stagg, *Mr. Madison's War*, mentioned previously, and Donald R. Hickey, *The War of 1812* (Urbana, Ill., 1989). Bradford Perkins, *Castlereagh and Adams* (Berkeley, 1964), contains the only extended modern treatment of the negotiations at Ghent.

6. To the Monroe Doctrine

Harry Ammon, *James Monroe* (New York, 1971), is a highly readable, sensitive biography. For his chief lieutenant, the principal

guide is Bemis, *John Quincy Adam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entioned previously.

Although there has been substantial recent scholarship on aspects of the problems with which they deal, Philip C. Brooks, *Diplomacy and the Borderlands* (Berkeley, 1939) (on the Adams-Onís Treaty), Charles C. Griff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isruption of the Spanish Empire* (New York, 1937), and Arthur Preston Whitak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Latin America* (Baltimore, 1941), continue to be the best introductions to their respective subjects. However, new insights are presented in John A. Johnson, *A Hemisphere Apart* (Baltimore, 1990).

Dexter Perkins, *The Monroe Doctrine, 1823–1826* (Cambridge, Mass., 1927), likewise remains the first reliance, although many more general works explore the genesis of the message of 1823. Ernest R. May, *The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Cambridge, Mass., 1975), opens up new lines of thought, st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domestic political calculations. For an unspoken corollary to the doctrine, see John A. Logan, *No Transfer: An American Security Principle* (New Haven, 1961).

7. Manifest Destiny

The most recent treatment of its subject is Paul H. Bergeron, *The Presidency of James K. Polk* (Lawrence, Kan., 1987), generally quite sympathetic. Charles Sellers, *James K. Polk: Continentalist* (Princeton, 1966), is an able, thorough work, but Sellers's treatment does not extend beyond the summer of 1846. The president's revival of the Monroe Doctrine is explored in Frederick Merk, *The Monroe Doctrine and American Expansionism* (New York, 1966).

The expansionism of the 1840s is most comprehensively treated in David M. Pletcher, *The Diplomacy of Annexation* (Columbia, Mo., 1973), a fine work. The ideology of the movement is the subject of sarcastic treatment in Albert K. Weinberg, *Manifest Destiny* (1935; repr., Chicago, 1963), and more thoughtful consideration in Thomas R. Hietala, *Manifest Design* (Ithaca, 1985), a work that also examines political developments. Very hostile to Manifest Destiny is Frederick Merk, *Manifest Destiny and Mission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1963). Frederick Merk, *Slavery and the Annexation of Texas* (New York, 1972), and Reginald Horsman, *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Cambridge, Mass., 1981),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slavery issue.

Norman Graebner, *Empire on the Pacific* (New York, 1955), argues that ports, more than territory, were the objectives of at least some Americans. Shomer S. Zwelling, *Expansion and Imperialism* (Chicago, 1970), is an explicit challenge to that idea, stronger on logic than evidence.

John H. Schroeder, *Mr. Polk's War* (Madison, 1973), is a fine, brisk treatment. Also helpful is Robert W. Johannsen, *To the Halls of the Montezumas* (New York, 1985).

The opposition of Calhoun and his allies to large-scale territorial expansion is the subject of Ernest McPherson Lander, Jr., *Reluctant Imperialists* (Baton Rouge, 1980). Southern aggressiveness in the 1850s is explored in Robert E. May, *The Southern Dream of a Caribbean Empire* (Baton Rouge, 1973), and Charles H. Brown, *Agents of Manifest Destiny* (Chapel Hill, 1980).

Howard I. Kushner, *Conflict on the Northwest Coast* (Westport, Conn., 1975), and Nikolai N. Bolkhovitinov, *Russian-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Sale of Alaska* (in Russian; Moscow, 1990), describe the last American continental expansion.

8. Brita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limits of governmental support for overseas commerce are made clear in recent studies: Kinley J. Brauer, "Economics and the Diplomacy of American Expansion," in William H. Becker and Samuel F. Wells, eds., *Economics and World Power* (New York, 1984), 55–118; Kinley J. Brau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ish Imperial Expansion, 1815–1860," *Diplomatic History* 12 (1988): 19–37; John H. Schroeder, *Shaping a Maritime Empire* (Westport, Conn., 1985); and, on China, Michael H. Hunt,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New York, 1983). The West Indian settlement and the quarrel over claims against France are recounted in John M. Belohlavek, *"Let the Eagle Soar"* (Lincoln, Neb., 1985).

Fo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during the years from the Treaty of

Ghent to 1825, see Bradford Perkins, *Castlereagh and Adams* (Berkeley, 1964).

England's military weakness is the theme of Kenneth Bourne, *Britai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North America* (Berkeley, 1967), and also made evident in Reginald C. Stuart, *United States Expansionism and British North America* (Chapel Hill, 1988), which however emphasizes the feebleness of American territorial ambition. Also useful is Donald F. Warner, *The Idea of Continental Union* (Lexington, Ky., 1960).

Howard Jones, *To the Webster-Ashburton Treaty* (Chapel Hill, 1977), describes that important settlement, and Wilbur Devereux Jones, *The American Problem in British Diplomacy* (Athens, Ga., 1974), begins with the negotiations of 1842 and carries the story forward to 1861. Martin Crawford, *The Anglo-American Crisis of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Athens, Ga., 1987), uses the *Times* of London as a vehicle to explore British attitudes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Frederick Merk, *The Oregon Question* (Cambridge, Mass., 1967), brings together a lifetime of work on the subject. But see, also, the books by Bergeron, Graebner, Pletcher, and Sellers mentioned earlier.

Civil War diplomacy has attracted a great deal of scholarly attention. D. P. Crook, *The North, the South, and the Powers* (New York, 1974), is a fine overview of the subjec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Civil War Diplomacy* (Philadelphia, 1970), Lynn M. Case and Warren F. Spencer seek to show, on the basis of massive research, that the French role was critical.

Most historians, however, continue to follow along the path blazed by Ephraim Douglass Adams, *Great Britain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2 vols. (New York, 1925), making Britain by far the more important factor. Adams's is one of those remarkable works that have stood the test of time, not impervious to attack but essentially above it. Brian Jenkins, *Britain and the War for the Union*, 2 vols. (Montreal, 1974–80), for example, is self-consciously revisionist, but Jenkins's most convincing arguments do not seriously undermine Adams's predominance. Adams's basic conclusions are underscored in three capable works: Gordon H. Warren, *Fountain of*

Discontent (Boston, 1981), on the *Trent* affair; Stuart L. Bernath, *Squall Across the Atlantic* (Berkeley, 1970), concerning maritime problems; and Frank J. Merli, *Great Britain and the Confederate Navy* (Bloomington, Ind., 1970), a work much broader than its title.

Glyndon G. Van Deusen, *William Henry Seward* (New York, 1967), is authoritative. Norman B. Ferris, *Desperate Diplomacy* (Knoxville, 1976), is an intriguing account of Seward's apparent eccentricities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the Civil War. Frank Lawrence Owsley, *King Cotton Diplomacy* (Chicago, 1931), states the Southern position.

第二卷

美国人对机会的寻求

1865-19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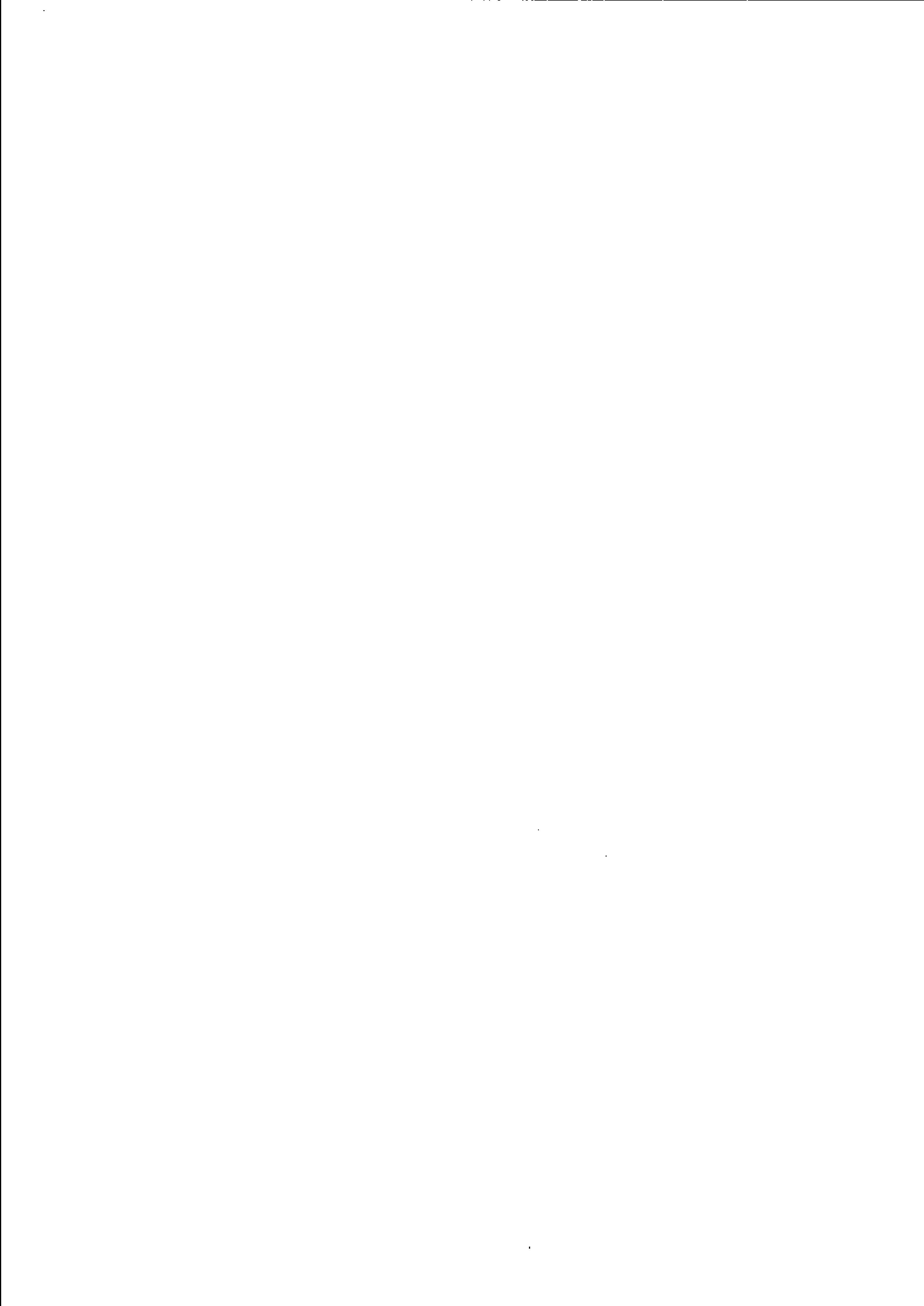
Volume II

The American Search for Opportunity

Walter LaFeber

【美】沃尔特·拉夫伯／著

石 斌　刘飞涛／译



内容提要

从美国内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段时间，有两大事件使全球历史发生了转变：美国崛起为一个世界强国（实际上还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19—20世纪，在墨西哥、中国、俄国、古巴、菲律宾、夏威夷、巴拿马、尼加拉瓜等地区相继爆发了革命。《美国人对机会的寻求》一书追溯了1865—1913年间的美国对外政策，通过说明美国——人们通常认为这个时期它是一个反对革命并致力于“寻求秩序”的国家——实际上是一种帮助引发这些革命的决定性力量，从而将这两大历史性事件联系起来。

沃尔特·拉夫伯认为，工业化推动了中央集权化：内战后的美国仍然是由许多彼此孤立的地方性社区构成的一个幅员辽阔、难以有效控制的国家，但此时联邦政府和一种新的公司资本主义已有能力侵蚀这些地区，并将它们整合为一个以铁路为纽带的日益工业化的国家。美国经济增长的飞快步伐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拉夫伯教授所描述的这种移民流入，其数量如此巨大，以至于美国出现了第一个排斥移民的法令。1882年，美国通过立法，在未来10年内禁止所有中国移民劳工——无论熟练工还是非熟练工——进入美国。

国内事务中的种族主义——19世纪80年代美国数以百计的私刑事件和猖獗一时的反亚洲人风潮便是明证——也影响了对外政策。种族歧视在对待菲律宾人和美国土著人的问题上尤其突

出。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美国军队通过摧毁印第安人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反抗，巩固了白人的权力。创建帝国的事业在国内所取得的成功，导致了 90 年代后期在加勒比海地区并横跨太平洋建立岛屿属地、创建新型商业帝国的企图。

在亚洲和其他地区争夺市场，是这个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动因。引发美西战争的 1898 年古巴危机，为美国吞并菲律宾，控制亚洲最具战略意义的地区之一提供了机会。

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使之有必要发展自己的海军力量以保护本国的商业。反过来，这样一支海军又需要在海外获得供煤基地和停靠地点。

这些岁月便是所谓“美国世纪”的开端。该世纪的源头及其两大产物（美国的权势和海外的革命），以及美国的行政官员们为了抑制革命、恢复秩序以便进一步为美国创造机会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帝王总统制”，书中皆有剖析。本书还附一篇颇有价值的参考文献短论，对有关这个时期美国对外关系的大量历史文献作了评论。

此书献给马克斯·米勒，以纪念这位慈爱的父亲，杰出的教师，博洽的学者，立场坚定的政治活动家，饱受折磨的道奇人队球迷和从不动摇的朋友。

前　言

本书对1865—1913年美国对外政策的叙述分两个部分。前六章描述美国人[1]如何建立起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机器，以及这部机器如何与这个时代的种族主义和传教冲动一道，塑造了1865—1896年间的美国及其外交政策；后四章旨在说明这种新的美国体制如何帮助触发了一系列的革命，而这些革命又如何反过来在塑造20世纪国际事务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在国内，这种体制在1873年之后导致了1/4个世纪的经济萧条、罢工、骚乱和激进主义。在国外，这一体制帮助导致了加勒比、中美洲、墨西哥、夏威夷、菲律宾和中国的革命。

因此本书的论点是：通常被认为热衷于反对革命的美国人，在全世界寻找经济和传教机会的同时，却充当了革命的催化剂。由于他们为了机会宁愿牺牲秩序，于是便支持与此种帝国主义[2]

① "美国"（America）和"美国人"（Americans）在文中有时用来指合众国（United States）或合众国的人。本书为了用词上的变化而使用这些词语，在此向南北方的邻国表示歉意。

② "帝国主义"一词的使用一如字典的定义：一国将其统治或权威延伸至外国并在某些情况下获取殖民地或附属国的一种政策。更详细而且相当有用的定义见约翰·加拉赫和罗纳德·鲁宾逊：《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载《经济史评论》，丛刊第2辑，第7卷第1期（1953年），第5—6页，其开头是："帝国主义或许可以定义为将新的地区纳入不断扩展的经济这一过程中的某种充分的政治功能。"

相伴而生的一种新的总统制。实际上，总统在对外事务方面的主要职能，是运用宪法所赋予的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必要时用武力来恢复秩序，以便能够重新获取机会。

资本主义可能有可怕的毁灭性，当受到国家权势的驱使时尤其如此，这并不是什么新情况。1776 年亚当·斯密就警告说，不要建立“一个庞大帝国……惟一的目的是造成一个顾客之国，使他们只能向我国各生产者的店铺购买我国所能供给的各种物品。”①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关于 19 世纪晚期帝国主义的传统分析，在解释此种新型资本主义与国外的革命之间的关联方面，很少提供什么东西。这些论者的主要兴趣，在于揭示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根源以及资本主义如何改变了国内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了解到英国的政策正在改变印度，但他们认为摧毁印度的旧秩序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对印度也有好处。当恩格斯目睹 1894 年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征服时，他预见到的不是一场中国革命，而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它能够“为推翻欧美的资本主义提供动力。”②

1898 年以后对我们更有启发的一位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政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研究》（三卷本，伦敦，1822），第二卷，第 517—518 页。

② 恩格斯致左尔格，1894 年 11 月 10 日，见卡尔·马克思和弗雷德里希·恩格斯：《1848—1895 年致美国人的书信选辑》（纽约，1953 年），第 266 页；乔吉·拉雷恩：《发展理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依附》（剑桥，1989），第 57 页；其他分析家的相关论述还包括：约瑟夫·A. 熊彼得：《帝国主义与社会阶级》（纽约，1951），尤其是第 12—19、83—86 页；V. I. 列宁：《帝国主义论》（纽约，1939），尤其是第 88—125 页；以及 J. A. 霍布森：《帝国主义研究》（伦敦，1902），第 74—76 页，霍布森在第 11 页还顺带指出，帝国主义“对弱势或低等民族的自由和生存的侵害，也促使他们相应地产生了一种极其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因此，“对于那些具有太多的异质性，因而难以被同化，并且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因而无法被永久征服的民族来说，帝国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个人为的刺激因素。”

策制定者。查尔斯·A. 科南特是一位经济学家（他了解这场新的工业革命的各个门类和它对对外出口的需求），也是一名政府官员（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在国外投资的机会，他曾就金汇兑本位制问题同菲律宾和中国进行谈判）。卡尔·帕里尼与马丁·斯克拉那些影响巨大的论著，使科南特的观点的重要性重新受到注意。[①] 在 1896—1900 年间，科南特清楚地看到（并且公开讨论）了这种新型的美国产业制度与新型的美利坚帝国之间的关系。出于同样的兴趣，他在 1908 年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摩擦在经济中的影响》，大肆嘲笑那些仍然天真地以为"自由贸易"和"东方的'门户开放'"能够奏效的人。保护主义和"相互竞争的民族"打破了这种幻想。科南特警告说，即使是在"发达的文明社会"，经济交流也"不是人类惟一的欲望"，更不要说那些"商业发展微弱，教会、国家或古老习俗规定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对现代美国人所理解的竞争几乎一无所知"的社会。结果常常发生极为剧烈的摩擦："诚如巴杰特在谈到资本转移的条件时所言，'除非你有一个强大的政府能够巧妙地根据人们商业活动的走向去维持和平，否则你不可能取得成功'。"[②]

摩擦日益严重，尤其是在 19 世纪 90 年代后期，因为帝国主义此时不仅是欧洲政策的特征，而且随着日本和美国加入海外扩

① 卡尔·P. 帕里尼和马丁·J. 斯克拉：《关于市场的新思维（1896—1904）》，《经济史杂志》，第 43 卷（1983 年 9 月），第 559—578 页；卡尔·P. 帕里尼：《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见劳埃德·加德纳编：《重新解释历史——献给威廉·A. 威廉斯的外交史论文》（俄勒冈州科瓦利斯，1986），第 67—74 页；马丁·J. 斯克拉：《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美国》（纽约，1992），第 212—215 页，这是有关进步主义时代的一项特别重要的分析。

② 查尔斯·A. 科南特：《摩擦在经济中的影响》，《科学》，第 27 卷（1908 年 1 月 7 日），第 99—104 页。

张的行列，已成为全球性的特点。[1] 科南特所说的“文明”社会与工业化程度不高的社会之间的冲突所产生的危险，现在由于几个帝国主义强国之间的冲突而越发严重。这些冲突有时在工业化程度不高的社会中导致民族主义的产生，并最终引发革命。[2] 由于此类“摩擦”不断增多，美国人于是求助于一种新的总统体制来恢复秩序，获取新的机会。

于是出现一种离心—向心效应：美国人在国外寻求机会的同时，在国内却使权力集中化，目的是使他们在国外的追求得到庇护。[3]

在写作此书的许多年里，幸蒙太多的嘉惠，因此我的感谢不得不有所选择，挂一漏万。罗伯特·贝斯纳与罗伯特·汉尼甘是极受尊敬的研究1865—1913时期的学者，他们对整个手稿的评论使本书大为增色，所以我要特别感激这两位朋友。马丁·斯克拉、乔尔·西尔比、迈克尔·卡门、理查德·波伦伯格、蒂姆·博斯泰曼、谢尔曼·科克兰、沙南·史密斯、伊万·斯图尔特、埃里克·埃德南和戴维·兰巴特不仅给予我珍贵的友谊，还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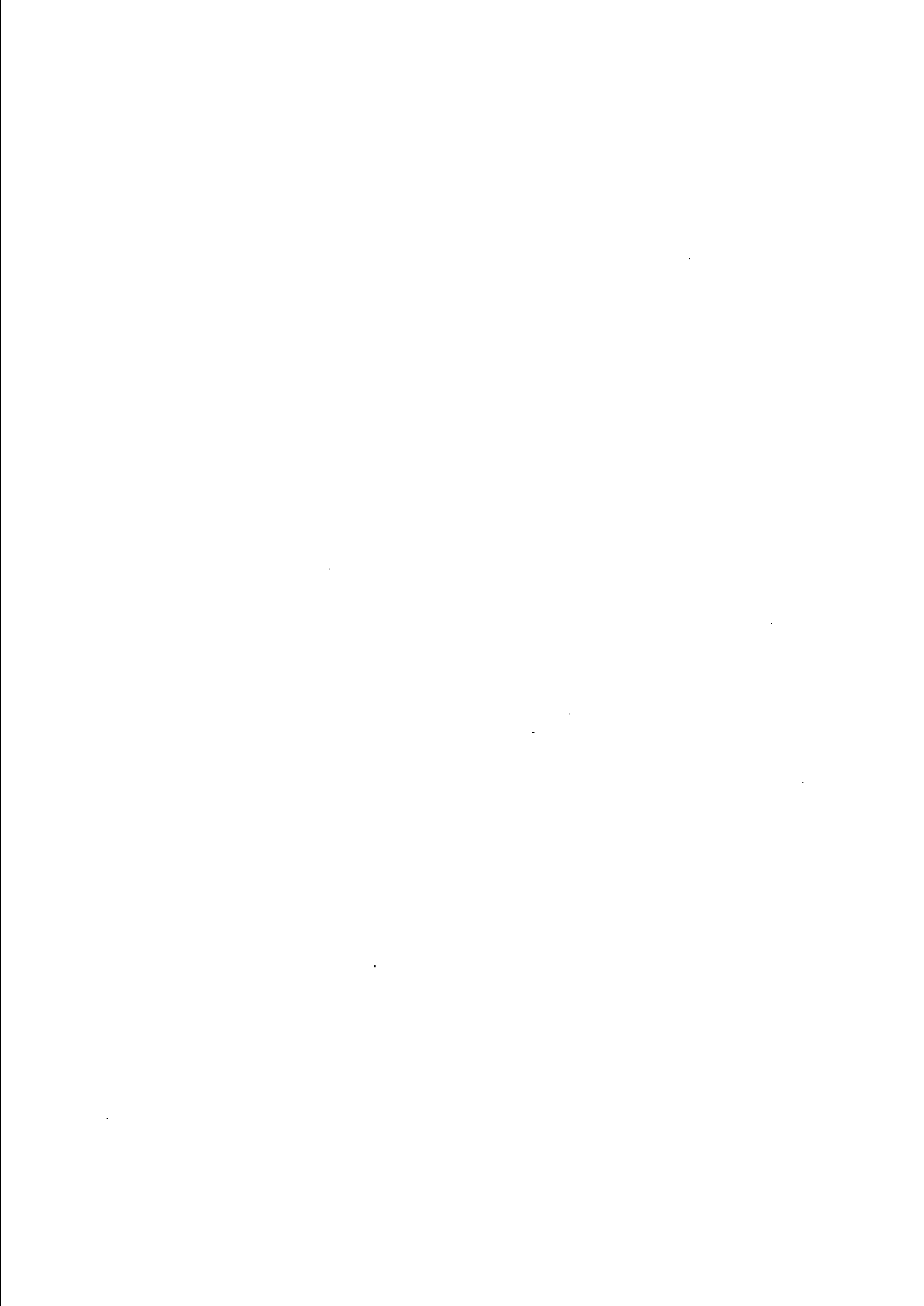
---

① 海因茨·戈尔维策：《帝国主义时代的欧洲（1880—1914）》（纽约，1969），第34—35页。

② 霍布森很了解帝国主义如何摧毁“国际主义”并日益成为一种“是民族主义的一个人为的刺激因素”（《帝国主义研究》，第10—12页）。有人也许会对“人为”（artificial）这一形容词有异议。在一篇被广泛引用的文章中，以赛亚·伯林认为，尽管19世纪的民族主义具有巨大的力量，“却没有一位有影响的19世纪思想家”预见到它的发展。霍布森在几个世纪之间建立起联系，于1902年写了《帝国主义研究》一书。该书一开头他就在其中一节指出帝国主义如何对民族主义产生刺激作用，而研究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人往往都忽略或低估了这种作用。

③ 对1787年以后出现的这种“离心—向心”效应的追溯，见沃尔特·拉夫伯：《宪法与美国对外政策——一种解释》，载戴维·塞伦编：《宪法与美国生活》（纽约州伊萨卡，1988），第35—37页。

了材料和批评意见。利赞・罗戈沃伊、莱斯利・希尔杰曼和史蒂文・津伯是对我帮助特别大的研究助手。弗雷德・哈林顿、汤姆・麦考密克、劳埃德・加德纳和已故的威廉・阿普曼・威廉斯过去 30 多年来围绕本书的论点和其他更重要的问题都给了我很多教诲。孔华润和弗兰克・史密斯是对我很有帮助也极有耐心的编辑，我特别要感谢孔华润和南希・塔克所提供的建议，尤其是要感谢他们对我的友情和鼓励。与往常一样，是桑德拉、斯科特和玛丽・凯・拉夫伯以及苏珊娜和汤姆・卡尔使我所做的这一切变得有意义，并且能够成为现实。



第一章 起点与战略

内战为美国对外政策创造了一个新世纪的开端，但这种未来要经过另一代人的努力才可能成为现实。由于60万美国人的死亡，一个与过去迥然不同的国家缓慢地、但步履稳健地出现了。它以中央集权取代了杰克逊时代的地方分权；以威廉·麦金莱和西奥多·罗斯福式的总统制取代了詹姆斯·布坎南和拉瑟福德·B. 海斯式的总统制；以安德鲁·卡内基—J. P. 摩根式的资产达10亿美元的美国钢铁公司取代了杰斐逊以商业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理想模式；并以19世纪90年代后期参议员马克·汉纳为首的共和党人所主张的公司资本主义，取代了40年代詹姆斯·K. 波尔克领导的民主党人所主张的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尤为重要的是，以国内的上述四大转变为基础，这个国家构筑了新的外交政策，以1899—1900年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取代了1823年的门罗主义。也就是说，美国人已经完成了海上领土扩张，如今他们对自己在西半球大部分地区的优势地位信心十足，因此开始在亚非部分地区推行帝国主义政策。

当然，这些历史性的变迁并非完全始于19世纪60年代。例如，远在西奥多·罗斯福出生之前，杰斐逊和波尔克就已向世人表明，总统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潜在权力。为中国市场提供产品能够使深受萧条困扰的美国人获得就业机会这一信念，也可以追溯到18世纪80年代，而不是19世纪90年代中期。甚至内战导

致了美国的工业化这一人们曾经深信不疑的观念，也遭到反驳。1840—1860年，美国制成品的年增长率是7.8%，而1870—1900年仅为6%。1860—1870年，美国制造业所增加的价值每年仅提高2.3%，这一增长率是19世纪最低的。一些经济学家在解释这一令人吃惊的低增长率时认为，美国工业化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回溯到内战之前，他们还指出，内战这场冲突本身并非第一场现代战争，而是前工业化时代最后几次重大冲突之一。[①]

毫无疑问，这是为什么后来美国人颂扬这场由步兵和骑兵——他们为了捍卫自己所熟悉的某块土地而展开短兵相接的搏斗——所进行的斗争的一个原因。正如林肯在葛底斯堡的回顾中曾公开宣布，并于一个世纪之后在埃德蒙·威尔逊[②]的《爱国碧血》一书中得到展现的那样，一种自我牺牲的意识——（就像威尔逊所指出的）它部分源于加尔文教徒的现实主义精神——给美国人过去所持的那种已然十分强烈的使命感增添了新内容。很少听说有哪个参加内战的士兵曾表示他们在安提塔姆战役中愿意冒着几乎必死无疑的危险奋力前进，仅仅是因为他们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当美国士兵和传教士在信念的驱使下，分别于19世纪60年代奔赴战场或于90年代前往中国传教时，美国人信奉加尔文主义和传道使命的历史已不是几十年，而是两个世纪了。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按照艾尔伯特·K.韦恩伯格的观点，那就是，1776年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所享有的自然权利具有普世性，然而到了19世纪90年代他们却认为这些权利是民族性

---

① 斯图尔特·布鲁奇：《企业——一个自由民族的动态经济》（马萨诸塞州剑桥，1990年），第255—256页。

② 埃德蒙·威尔逊（1895—1972），美国文学评论家、小说家、诗人及编辑。著有关于象征主义文学流派的著名评论集《阿克瑟尔的城堡》和《三重思想家》、《创伤与弓剑》等。——译者

的，而且即使在那时这也主要限于男性和某些白种人。内战正式结束了美国黑人的奴隶身份，但解放宣言并未同时承诺要将过去的奴隶提升到平等的地位。因此，在1900年，传教使命与种族主义作为美国帝国主义的特征，其目标和侧重点与内战以前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扎根在美国历史的深处。[1]

一、新政府，新财富

19世纪60年代的特点并不仅仅在于这种历史性的使命感达到高潮，并且出现了一种不同类型的种族主义——它既非奴役亦非平等，内战与一系列重建法令还将美国变成一个民族国家。使用的措辞已不再是60年代以前通行的“the United States are”，而是“the United States is”[2]。美国的统一与德国、日本、意大利甚至（由于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俄罗斯演变为现代民族国家（这可以成为走向帝国的起点）同时发生。工业化或（在某些早期阶段）实现工业化的欲望，在这些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3]

在美国，工业化在19世纪60年代初满足了供养一支庞大军队的需要。那些有能力筹集资本并建立蜘蛛网般的分配系统的人，能够在诸如肉类加工和石油生产等商业领域创造过去难以想象的巨大财富。内战孕育起来的许多产业帮助塑造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对外关系。1865年，菲利普·阿默已经从他的肉类加工企业获得了200万美元的收入。到了1907年，阿默

---

① 埃德蒙·威尔逊：《爱国碧血》（纽约，1962年），特别是第61页。

② 即前者将“合众国”视为复数，后者则当作单数（即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译者

③ 加里·威尔斯在其所著的《林肯在葛底斯堡——重新塑造了美国的言词》（纽约，1992年）一书中特别强调这种从“are”到“is”的措辞变化。

公司的国外销售经理管理着分别负责南美、亚洲、非洲、欧洲、英国、德国和法国市场的众多独立部门。第一个美国油田发现于1859。到1865年时，这项仅有六年历史的产业已经成为美国的第六大出口业。1870年，约翰·D. 洛克菲勒与另外几个合伙人将他们的炼油业（当时的规模已是世界第一）命名为美孚石油公司。到1883—1885年间，美孚石油公司的主要产品煤油有70%运往欧洲，另有21. 6%运往亚洲——洛克菲勒正在那里建立自己的类似于外交使团的组织，因为他们准备与俄国石油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较量。[①]

上述产业及其他部门还创造了资本。资本不仅不断膨胀（尤其是在联邦政府的协助下——战争期间政府发行了比税收还多几十亿美元的证券），而且日益集中。纽约的一份报纸指出，19世纪40年代，拥有一百万财产的公民不超过20人，而60年代仅纽约就有数百人，有的甚至宣称有2000万美元。这种新生的金融资本主义也得益于战争爆发后外国投资的逃逸。国家因此同时增加和集中了资本来源，这是后来与欧洲的卡特尔和欧洲政府资助的遍布非工业化世界的企业展开竞争所必不可少的。1866年的《纽约商业与金融纪事报》指出，资本流动“比从前规模更大”。小公司无力竞争，因此“被兼并……这是这个时代的潮流之一，而且可能对我们未来工商企业的发展产生不小的影响。”[②]

财富的增长与集中并非源于自由放任原则。南方在1861年

---

① 巴巴拉·J. 菲尔兹：《美国历史中的意识形态与种族问题》，见J. 摩根·库瑟和詹姆斯·M. 麦克弗森编：《宗教、种族与重建——献给C. 范恩·伍德沃德的论文》（纽约，1982年），第162—164页；小艾尔弗雷德·D. 钱德勒：《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动力》（马萨诸塞州剑桥，1990年），第86—87、92—93、167—168页。

② 托马斯·C. 科克南和威廉·米勒：《企业时代》（纽约，1942年），第116页。

脱离联邦，使许多反对政府有计划地扶持商业部门的国会议员突然离任。（他们有正当的理由表示反对。由于北方人口的不断增长使该地区的势力在国会获得了主导权，南方人认识到政府将着重扶持铁路部门和新兴制造业，而这两者相对而言都是蓄奴地区所缺乏的。）用历史学家查尔斯·塞勒的话说，“只有在内战的战场上，利用雇用劳动的进步，资产阶级才最终战胜了与之抗衡的农民、工人和不合时宜的［南方］种植园主。”于是，1832 年以后实行的低关税率，在 1861 年莫里尔法[①]通过后被改变，接下来的五年里，应征关税的进口商品平均从价税率飙升了 250%。这样的关税，再加上军队的无限需求，为企业家建立一个丰富的国内市场开辟了最便捷的道路。这种新的高关税政策，在这个时代于 1913 年结束之前，一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国会并不满足于仅仅建立一个新的受关税保护的市场，它还采取了更多的直接措施来统一市场并使之制度化。根据 1862 年和 1864 年通过的法案，资金、大量土地以及丰富的木材和矿产资源的使用权被免费提供给那些愿意铺设铁路运输线的公司。到了 1869 年，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已经出现。一位企业家就其对外交事务的影响明确指出：“康涅狄格、罗德岛和马萨诸塞的钻孔机和金属薄板以及美国的其他产品可能在 30 天〔而不是几个月〕内运抵中国；作为交换，中国的茶叶和丰富的丝绸则被运回新奥尔良和查尔斯顿……再有 30 天就可以运到费城、纽约和波士顿。”内战前的杰克逊式民主为共和党人的中央集权所取代，使国家在国外的发展

---

① 通过时间应为 1862 年。由国会议员贾斯廷·史密斯·莫里尔于 1857 年首次提出，故名。——译者

机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①]

国会于1862年通过一项宅地法，向任何愿意耕作土地五年或六个月内每英亩支付1.25美元的人提供160英亩空闲土地，这项措施创造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生财机会。支付现金的规定，为有钱的投机商获取西部土地财富敞开了大门，他们纷纷攫取上等土地，然后出售以获取利润。1864年，国会为了解决劳动力日益短缺的问题，通过了契约劳工法，允许商业代理人赴欧洲招募合同制工人。到了1865年，移民数量较之1864年增加了一倍。从1864年到1868年该法律终止这段时间，许多移民被用于解决罢工问题。工会在战争初年大量出现。[②] 如果不用移民来瓦解罢工，则常常利用黑人，由此导致的冲突（尤其是美国黑人与爱尔兰人之间的冲突）往往酿成流血事件。这种种族主义与仇外情绪，塑造了下一代人、包括那些制定美国对外政策的人的意识形态。同样重要的是，劳资双方的冲突预示了后来的对抗，这种冲突在1873年后的经济萧条时期变得更加尖锐，促使美国官员去寻找有助于结束动乱的对外政策。

内战后的美国仍然是由许多彼此孤立的地方性社区构成的一个幅员辽阔、难以有效控制的国家，但此时联邦政府已经显示出它的力量，能够侵蚀这些地区，将它们整合为一个边界触及全球、日益工业化并以铁路为纽带的世界。例如，1863年国会开始采取行动，试图使银行制度系统化，紧接着在1865年通过一

---

① 查尔斯·塞勒：《市场革命》（纽约，1991年），第6页脚注；戴维·普莱彻：《经济增长与外交调整》，见威廉·H. 贝克与小塞缪尔·F. 威尔斯主编：《经济与世界强国》（纽约，1984年），第132—134；引自查尔斯·A. 比尔德与玛丽·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二卷本，纽约，1927年），第2卷，第128—129页；关于内战时期中央集权制及金融资本主义的形成，见理查德·弗兰克林·本塞尔：《扬基式利维坦——美国中央政府权威的起源（1859—1877）》（纽约，1990年）。

② 科克南和米勒：《企业时代》，第107—110页。

项法律，征收州立银行钞票发行税，并建立华盛顿控制之下的更为统一的国家货币。行政部门权力的增长，较之立法部门有过之而无不及。先是以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紧急情况为由，继而利用宪法关于总统是国家军队总司令的条款，亚伯拉罕·林肯甚至没有与国会商议便招募了一支军队，用来反对南方的分裂行为。林肯的确曾在1861年中期最终请国会对其行为进行评判，但是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国会始终未能制止其特权的增长。按照E. S. 科文的经典表述，林肯的成功导致两个后果：其一，未来的总统可以不必过分在意国会或各州的反对，直接采取措施应付在他们看来造成了实际或潜在暴力，并且——根据他们的判断——危害了国家利益的形势；其二，用科文的话说，后来的总统可以更普遍地“在总统权力的各个领域”利用“林肯的做法，似乎这些做法能够支持总统自主权（换言之，即总统独裁权）的论点”。其中最突出的是在外交事务领域，尤其当总司令的权威可以作为解释行动的基本依据的时候。总统在国内事务与对外事务领域的权限并不容易区分。[①]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对外扩张主义时期，总统的权力并非牢不可破。林肯对国会的控制程度非同寻常，说明行政部门能够广泛地扩张权力。不过，战争结束和林肯死后不久，最高法院立即采取措施限制这些权力，其理由是，宪法约束条款的效力“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是相同的”，即使是在非常时期暂时中止这些限制条款，也可能“直接导致无政府状态或专制统治”。林肯的继任者安德鲁·约翰逊试图阻止国会的重建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必要时动用军队保障前南部邦联内美国黑人的权

① 爱德华·S. 科文：《总统权力的扩大》，《年鉴》，第218卷（1941年11月），第122—131页；“岛屿共同体”是罗伯特·威布的《寻求秩序（1877—1920）》（纽约，1967年）一书的一个重要主题。

利（因此也是为了维护共和党人的权力）。这场冲突在 1868 年达到高潮，当时国会以一票之差险些解除约翰逊的总统职务。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国会通常保持着对行政部门的支配地位。然而，林肯那种用权方式不可能被永远取缔。制度化的集权，惟一的条件是对外事务上升到国家议事日程的优先位置，再度出现由外交事务所引发的危机，而这类事情，大多数总统认为只有他们能够处理得最好。[①]

二、西华德与帝国的重建

林肯与约翰逊的国务卿是来自纽约的威廉·亨利·西华德。作为一名前辉格党领导人，西华德曾经强烈反对杰克逊和波尔克这样的民主党强势总统。不过，立场的转变在美国政治中并不罕见，当他所属的新组建的共和党控制白宫以后，他又成为行政部门权力的一名喋喋不休的捍卫者。这位纽约人确实在不停地鼓吹，必须将辽阔的大陆体系的力量集中起来，并对这种体系进行合理化改造，以便能够与其他强国展开竞争。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一套创建帝国的战略，这一战略在其有生之年不可能实现，但可以在未来的两代人手里成为现实。美国社会后来采用的是市场竞争，而且纳入了意识形态因素，于是西华德成为美国前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之间的重要纽带。

西华德认为，在帝国的整合过程中，联邦政府必须起带头作用，采用的办法包括：制定更高的关税以保护国内市场，从而建立一些能够稳步发展并最终能够向国外输出产品的新型工业；建

① 特别重要的是埃里克·麦克基特里克的文章，见威廉·N. 钱伯斯与沃尔特·迪安·伯恩汉姆：《美国政党制度》（第二版，纽约，1975 年），第 139 页；小阿瑟·施莱辛格：《帝王总统》（波士顿，1973 年），第 69—70 页。

立更为集中统一的银行体系；通过一项土地法，迅速满足内地的需要；还有就是1864年的契约劳工法以及1868年西华德与中国签署的条约——目的是通过移民为西部土地提供居住者，为美国提供必不可少的劳动力。西华德显然是读了英帝国早期理论家弗兰西斯·培根的著作后才改变了自己对移民问题的看法。最重要的是，西华德对新型技术和交通手段使国家连为一体并充满效率的魔力深信不疑。作为纽约州州长，他成功推动了该州铁路系统基础设施的建设。19世纪50年代，作为参议员，他帮助通过了一项关于国家铁路、运河、公路、航运的联邦改进计划的立法。正如他在1853年所宣称的："开辟一条公路，经过你的家乡，直抵旧金山"，使整个大陆遍布农场与企业，因为，"向国外销售产品与纺织品最多的国家，应该成为、也必将成为地球上的强国。"[①]

与此相关，西华德还提供了另一幅图景：星条旗在加拿大和墨西哥上空飘扬。不过，他对领土扩张的狂热在1861年前就已冷却下来，因为此时他意识到这可能会导致奴隶制和南方权力的扩展。到50年代初，他的热情已经从领土扩张转向商业扩张，从西半球（这是南方希望推广其"独特制度"的地方）转向亚洲。他言不由衷地声称，门罗主义业已实现。现在是为控制亚洲市场做准备的时候了——这一呼吁立即被他的一位朋友贴上"西华德主义"的标签。常识认为，国旗插到哪儿，贸易就通向哪

① 威廉·亨利·西华德：《威廉·H. 西华德文集》（乔治·E. 贝克主编五卷本，波士顿，1953—1983），第5卷第5页，第3卷第109、616、618页；厄内斯特·N. 保利诺：《美利坚帝国的基础——威廉·亨利·西华德与美国对外政策》（伊萨卡，1973年），第5—6、35—36页。对西华德的一种不同看法在罗伯特·L. 贝斯纳的《从旧外交到新外交（1865—1900）》（第2版，伊利诺伊州阿林顿海茨，1986年）一书中有很好的论述；小查尔斯·S. 坎普贝尔：《美国对外关系的转变（1865—1900）》（纽约，1976年），第23—24页。

儿。西华德却认为，未必如此。“政治优势的获得在商业优势确立之后。”他认为，墨西哥和加拿大最终将和平地加入联邦，没有征服所导致的仇恨。不仅如此，他甚至担心诸如墨西哥那样的“混杂的种族”可能还没有能力自己管理自己。西华德大声疾呼，“海上帝国”而非陆上帝国，“才是惟一真正的帝国”，而且，亚洲而不是西半球，才是未来的“战利品”，才是“这个世界之伟大未来的主要竞技舞台”。[①]

美国人日益增强的这一信念——即他们正在运用新技术对其大陆进行合理化改造以使他们能够征服这一“战利品”——被恰如其分地称为“大陆主义”，它为人们洞察从19世纪4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整个时代提供了入口。[②] 1864—1865年间，西华德的理论面临一次关键性的考验。法国的拿破仑三世利用美国的内战危机，派遣军队和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大公前去征服墨西哥和本尼托·胡亚雷斯的自由派政府。拿破仑很快发出威胁，要建立一个法兰西帝国，阻止美国的扩张并制衡英国在该半球的势力。西华德四面受敌，压力越来越大，不得不做出回应。1864年5月5日，他建议人们保持耐心：“今后5年、10年、20年，墨西哥将像现在的蒙大拿和爱达荷那样，自觉自愿、高高兴兴地成为美国的移民。”第二天，他告诉美国驻马德里公使，美国无意进一步“征服”，因为它已经拥有“大量领土，〔美国人〕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一切”。西华德的言论表明，美国将近三百年的陆上领土扩张已接近尾声。内战结束以后，美国将军队集结到墨西哥边境，但已排不上用场。墨西哥人处死了马克西米

① 保利诺：《美利坚帝国的基础》，第27、28—30页；西华德：《文集》，第3卷第618页，第5卷第246页；弗雷德里克·H. 斯图茨：《威廉·亨利·西华德——扩张主义者》（硕士论文，康乃尔大学，1937年），第26、53页。

② 查尔斯·维维尔：《美国的大陆主义——一种扩张主义观念（1845—1910）》《美国历史评论》，第65卷，第2期（1960年），第323—325页。

利安，粉碎了拿破仑的梦想。[1]

现在的问题是，西华德关于技术和商业扩张在本国的下一历史阶段将取代领土征服的预言是否正确。当复原后的墨西哥政府对美国投资者表示欢迎时，其中一个答案似乎已经出现。未来隐约可见：用西华德简单明了的话说，反动的欧洲殖民主义者将被“更看重美元，不那么看重领地”的美国人所取代。当西华德了解到埃及人在开罗召开了一次立法会议时，另一个答案出现了。西华德得出结论说，会议表明，“民治政府将沿着蒸汽机的轨迹和电报的足迹而出现”，这甚至“很快会在非洲出现”[2]。然而，在1866—1868年，又出现了另一种答案，这段时间国务卿着手推行一项惊人的计划，即建立他自己的通往亚洲的“公路”，其途径是在加勒比海地区获得海军基地和巴拿马运河的有关权利，在夏威夷取得一个立足点，并向亚洲施加军事压力。

然而，西华德的宏伟计划，因在通往亚洲的“公路”上与路障迎头相撞而遭到破产。他差点被1865年枪杀林肯的那名凶手的一位同伙杀害。在身体慢慢复原期间，他密切关注着新上任的总统与国会共和党人在重建政策上的冲突。出生于贫穷白人家庭的约翰逊对解放美国黑人并无多少同情心，他希望南部迅速回到联邦。国会领导人决意要惩罚南方，保护过去的奴隶。西华德不仅站在约翰逊一边，而且不停地敦促他迅速采取行动重新吸纳前南部邦联。国务卿的动机颇为复杂。他对前南部邦联领导人怀有

① 弗雷德里克·班克罗夫特：《威廉·H．西华德的一生》（二卷本，纽约，1900年），第2卷第429页；理查德·范·奥尔斯泰恩：《门罗主义》，见亚历山大·德康德主编：《美国对外政策百科全书》（三卷本，纽约，1978年），第2卷，第590—591页。

② 给查尔斯·黑尔的回信草稿，1867年1月5日，威廉·H．西华德文件，纽约州罗切斯特，罗切斯特大学；托马斯·斯孔奥尔：《美元与领地》（班坦鲁，1978年），第252—254、282页。

敬意，其中许多人在战前还是他在辉格党内的同僚，此外，他认为这些人是南方各州政府中比较可靠，也愿意合作的核心人物。此时 65 岁的西华德还可能将这些人视为有可能在 1868 年将他捧上总统宝座的某个新政党的成员。可以肯定的是，他相信美国黑人无力管理自己，更遑论管理白人，他还认为（正如他对南方人所言），或许可以在种植园里用某种非自愿的学徒制来代替奴隶制。1866 年 4 月，西华德对他的一些自由派朋友说，"北方与黑人[①]〔原文如此〕毫无瓜葛"，"我对他们的关心并不比对霍屯督人多……他们并不属于我们这个种族……北方必须放弃干涉南方事务的念头。"[②] 这封信，加上其他事情，说明了西华德和许多美国人何以不希望继续进行可能给联邦增加更多非白种人（一些美国人将其进一步限定为非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领土扩张。

在怒气冲冲的激进派共和党人看来，西华德是约翰逊政策背后的恶魔。国务卿在 1866 年底承认，在其漫长的、充满斗争的政坛生涯中，他从未受到过如此恶毒的攻击。[③] 那年秋季的选举使激进派共和党人充分掌握了国会的控制权，于是他们推翻了约翰逊的否决，通过了自己的计划。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不仅威胁说要孤立总统，还声称要弹劾他。西华德的对外政策计划也陷入困境，不过，这并不仅仅是因为面临一场政治大决战的威胁。

正如颇有影响力的《纽约论坛报》编辑霍勒斯·格里利（西华德的强劲对手，"去西部吧，年轻人，去西部"这一著名口号

---

① 西华德在这里提到黑人时使用的是带有贬义的 negroes 一词，故作者引用时加上"原文如此"。——译者

② 西华德：《文集》，第 5 卷，第 519—521 页；福恩·布罗迪：《撒迪厄斯·史蒂文斯》（纽约，1959 年），第 285 页；埃里克·方莱特：《重建——美国未竟的革命（1863—1877）》（纽约，1988 年），第 190、219 页。

③ 西华德：《文集》，第 5 卷第 8 页。

的提出者）所指出的，一些美国人不想再要任何更多的领土，哪怕是用作商业基地的不冻港。“本国已拥有至少足够下个世纪之用的丰富领土资源”，格里利这样写道。另一方面，这位编辑补充说，为了“最终组成一个伟大、自由的国家”，加拿大总是受欢迎的。格里利的这种观点进一步突出了影响美国政策的种族观念。其他一些人，例如强有力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他们之所以反对获取夏威夷这样的地区，则恰恰是因为当地人会因此失去自己的独立，或许还会失去对自己的保护。《纽约晚邮报》也反对扩张，因为兼并阿纳斯加这样的大陆外地区，可能会导致用“某种殖民政策”取代我们的“现行体制”，并且时间“刚好在英国对殖民地感到厌倦，认为已无利可图之时”。此外，还有其他人警告说，美国由于内战的原因，财政上已债台高筑，没有能力再买更多的领土。[1] 当西华德开始着手谋取通往帝国之路的垫脚石时，国内政治气氛之冷淡，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三、西华德与帝国的历程

在这种不利条件下，国务卿与俄国于1867年签署了一项用720万美元购买阿拉斯加的条约，然后说服萨姆纳和其他激进派共和党人，让他们帮助自己推动参议院批准这项条约。这项交易酝酿已久。至少早在19世纪30年代，俄国人就意识到，阿拉斯加的贸易甚至食品供应的控制权，已经落入无处不在、数十年来一直在开发该地区的英格兰商人之手。而且，该地区无法防御英

① 坎普贝尔：《美国对外关系的转变》，第16页；唐纳德·M. 多泽：《约翰逊政府时期的反扩张主义》，《太平洋历史评论》，第12卷（1943年9月），第253—275页。

国从相邻的加拿大发动的进攻，也无法防止美国人故伎重演——像1845年那样，通过定居与占领最终将德克萨斯并入联邦。正如一位见多识广、颇有影响的俄国官员（I. A. 谢斯塔科夫）所警告的，欧洲人也许会对“门罗主义或天定命运的信条”嗤之以鼻，但在北美“这项原则却越来越深的渗入人们的血脉……最近一代人在吮吸母亲的乳汁，呼吸空气的同时，也在接受这一原则的熏陶。”沙皇尼古拉一世身边的官员都希望结束对阿拉斯加的这种摇摇欲坠的控制，集中力量开发俄国亚洲部分中具有丰富潜在资源的阿穆尔河地区。到了50年代中期，沙皇已有意出售，但出现了一些障碍，尤其是内战的爆发。在内战冲突中，美国人将俄国视为联邦的有力支持者，与沙皇本身的对手英国的立场很不相同，而林肯与英国在1861—1863年间曾经历了一系列的危机。当西华德于1867年3月30日深夜在自己家里与俄国公使爱德华·德·斯陶克尔签订条约，并准备与参议院较量一番的时候，国内的政治气氛已经由于俄国在内战期间对联邦的支持而有所缓和。

与参议院的较量颇为激烈，但很快获胜。一开始西华德就占了上风，他强调了俄国的友谊，并运用大量信息竭力向参议院描述阿拉斯加的财富和战略地位。西华德所掌握的信息主要得益于美国在全球发挥其技术影响的野心。在战争期间，西华德就曾与佩里·M. 科林斯和希拉姆·西布利（西部联合公司总裁）密切合作，建立一条横贯美国，跨越阿拉斯加、白令海峡和西伯利亚的电报线。科林斯大陆电报公司企图控制全球通讯。西华德赞道，电报线将“把美国在经济、政治、道德、哲学、宗教等公共和私人领域的观念和原则推广到全世界”。然而，赛勒斯·菲尔德成功铺设大西洋海底电缆，打破了科林斯的计划。不过，过去与俄国进行的谈判为阿拉斯加问题的谈判铺平了道路，也为证明“西华德的冰箱”（这一比喻不久便广为人知）可能蕴含着财富提

供了大量资料。对于阿拉斯加的当地居民，美国人很少关心。一些俄国政府官员对爱斯基摩人和阿留申人很感兴趣，但美国官员似乎更多地将阿拉斯加视为自己大陆的“边疆”——将其看作一种潜在的权力，而非土著人的家园。[①]

为了支持该条约，萨姆纳在参议院发表了长达三小时的演说。他强调了阿拉斯加的财富，而不仅仅是俄国人的友谊。萨姆纳、西华德以及许多报纸还着重指出，从战略上讲，购买阿拉斯加还意味着，即便不进一步蚕食加拿大，目前夹在美国的两个部分之间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也将不可避免地被并入美国。（英国驻华盛顿公使向国内报告说，这项条约是美俄联手挑战英国权势的一个信号，可能还意味着英国将失去整个加拿大。）1867 年 4 月 9 日，参议院以 37 比 2 的表决结果批准了条约。[②]

不过，国会在 1868 年以前一直拒绝批准必要的拨款。掌握国会控制权的激进派共和党人，这段时间最关注的是重建问题和弹劾斗争，而不是西华德的宏伟计划。在对外政策方面，约翰逊总统只是国务卿任独奏的乐队中的第二小提琴手，但第二小提琴手至少能够使音乐陷入混乱。在提出弹劾约翰逊的动议后，国会终于以 113 票对 43 票（44 名议员没有投票）通过了该条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纳撒尼尔·班克斯（马萨诸塞州共和党

---

① 权威的论述见 N·N. 波尔科维蒂诺夫：《克里米亚战争与出售俄属美洲地区计划的提出（1853—1861）》，《太平洋历史评论》，第 59 卷（1990 年 2 月），第 15—49 页；西华德致卡修斯·克莱，1863 年 7 月 13 日，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国务院指令—俄国部分—档案分类—59，（以下简称国家档案、档案分类）；西华德致克莱，1867 年 3 月 28 日，出处同上；查尔斯·维维尔：《科林斯大陆电报公司与美国的大陆主义》，《太平洋历史评论》，第 28 卷（1959 年 8 月），第 237—257 页。

② 尼科莱·波尔科维蒂诺夫：《出售阿拉斯加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国际事务》（莫斯科），第 8 卷（1988 年 8 月），第 116—126 页；坎普贝尔：《美国对外关系的转变》，第 20 页。

人）领导了支持条约的力量。作为非激进派共和党人，班克斯倾向于赞同西华德的主张，即应尽快使南部回到联邦，并加快扩张进程。班克斯十分关注本州的商业，对于迅速发展中的美国西部拥有第一手知识，且与西华德交情颇深。因此，他认为，阿留申群岛这一“美洲与亚洲之间的吊桥”，能够使美国在太平洋地区获得新的权势，它将成为“各国命运与人类进步的控制器”。另一位议员补充道，购买阿拉斯加等于“把英国雄狮关进笼里”，使“俄罗斯和美国成为世界两大强国”这一天早日到来。为了确保条约获得通过，沙皇的公使显然给国会一些重要成员送了钱，尽管最近学术界对这种报酬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很有争议。毫无疑问，六个月前西华德在锡特卡升起星条旗对于实现他的目的很有帮助。一位国会议员叫嚷道，“胆敢拔掉旗子的人，手一定会发抖”。[①]

阿拉斯加被认为是美国向亚洲扩张的关键步骤。西华德的儿子弗雷德里克·W. 西华德曾在父亲身边一道工作过，据他后来回忆，有人认为购买阿拉斯加将使美国获得“一个在太平洋国家从事商业与海上活动的立足点”。确切地讲，国务卿眼中的帝国是没有边界的。1867 年 5 月参议院批准条约后，他曾赋诗一首：

吾国利害咸同，
幸蒙天助神祐，
方今不复踌躇，
欲使天下臣服。
域外千秋帝业，
恢宏无有尽头，

---

① 弗雷德·哈维·哈林顿：《战斗的政治家——N. P. 班克斯少将》（费城，1948 年），第 170－185 页；保罗·霍尔波：《被玷污的扩张——关于阿拉斯加的流言（1867－1871）》（诺克斯维尔，1983 年），第 105－109 页；坎普贝尔：《美国对外政策的转变》，第 21－23 页。

犹如浩瀚大海，

恣肆日夜奔流。[1]

这有可能。但不会发生在西华德的有生之年。从1867年到1868年，他一直试图利用在阿拉斯加问题上所取得的胜利，进而构筑一套系统的扩张主义政策。要么是由于国会对这种代价高昂的领土扩张的厌恶和抵制，要么是因为遭到其所选目标当地居民的反对，他的计划一再受挫。

他把目标集中在加勒比地区。内战期间，美国海军发现有必要在加勒比地区建立一个可靠的基地。而且，以西班牙为首的欧洲人，利用美国的内战危机，企图重新控制圣多明各。权势正在上升的普鲁士于1864年打败丹麦之后，普鲁士人或者奥地利人将夺取丹麦的西印度群岛（维尔京群岛）的传闻并始流行。此外，西半球南北关系的气氛似乎正在升温。南部邦联的失败，意味着议会中那些为了支持奴隶制而阻挠议事进程的活动彻底停止。黑奴的解放最终还使美国与整个拉丁美洲（其中除了古巴和巴西，其余都是非奴隶制国家）结成了联盟。这种气氛在1866年有所冷却，因为此时西班牙对智利和秘鲁构成了威胁，而西华德却视若无睹，并未祭出门罗主义的旗帜。他感兴趣的是更具体的东西：加勒比地区的基地和中美洲地峡能够为美国商业与战略优势所提供的通道。[2]

1867年7月，西华德与丹麦签订一项条约，规定如果当地居民经过公民投票表示赞同，即以750万美元买下维尔京群岛。公民表决顺利通过，但由于参议院不同意花这笔钱（整个阿拉斯

① 弗里德里克·W．西华德：《回忆录》（纽约，1916年），第360页；西华德致菲利浦·汤珀特，1867年5月10日，西华德文件。

② 关于西班牙，在1895年9月13日理查德·奥尔尼致乔治·F．霍尔的信中，有一段很长的重要分析，见理查德·奥尔尼文集，华盛顿特区，国会图书馆。

加的费用也不过720万美元)，加上维尔京群岛遭到一场飓风袭击，反对者更是认为他们的意见非常明智，条约遂告流产。西华德只好让步，但他警告欧洲国家："欧洲强国之间转让西印度群岛的任何殖民地，都不能漠视美国的存在。"这一声明再度强化了1811年由詹姆斯·麦迪逊总统率先提出的"不转让"原则。(美国最终于1917年获得了维尔京群岛。) 1866年，西华德还试图通过已在圣多明各拥有势力的美国冒险家成就一笔交易，以数百万美元作为报酬，获取萨马纳湾的土地。他不断设宴款待共和党激进派领袖撒迪厄斯·史蒂文斯，直到国会给他提供谈判经费。这项行动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史蒂文斯对约翰逊的重建措施十分反感，并曾经称西华德为总统的"头号小丑"。但条约最后还是失败了，因为在圣多明各的某些人想要更多的钱，另有一些人则担心割让土地会引起民众反抗。在华盛顿，西华德与其共和党内的宿敌又发生了龃龉。海军部长基迪恩·韦尔斯反对在加勒比海地区获取海军基地，因为西华德"几乎已成了领土扩张问题上的偏执狂，他希望靠这种嗜好成为总统候选人"。①

在加勒比海受阻之后，西华德又与一帮纽约商人合作，争取获得他们垂涎已久的巴拿马运河建筑权。1867年中期，与尼加拉瓜签署的第一项条约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因为条约所提供的权利是非独占性的，因此与1850年同英国签订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并不抵触(该条约规定任何运河均应由两国联合开发)。但是，1869年1月，西华德派遣极具外交才干，来自马萨诸塞州商界的顾盛负责签署了一项条约，使美国(或者某个私人公司，比如西华德的某个纽约朋友的公司)获得一条20英里宽、经过

① 查尔斯·C. 坦西尔：《美国与圣多明各(1787—1873)》(巴尔的摩，1938年)，第226--277页；W. 斯塔尔·霍尔特：《被参议院挫败的条约》(巴尔的摩，1933)，第104--106页。

哥伦比亚巴拿马省的运河建筑权，并且完全在美国的控制下修建。这首次表明美国企图独占而不仅仅是分享所有运河的控制权。参议院拒绝接受这项交易，部分原因仍是1850年对英国的承诺。不过，14年以后，经过谈判又签署了另一项排他性的条约，这次是与尼加拉瓜。此后再过20年，美国实际上单独控制了一条连结两大洋的运河。①

在1867—1868年这段扩张行动的高潮期间，西华德也曾试图插足夏威夷。以萨姆纳为首的马萨诸塞利益集团与西华德携手合作，试图通过签订一项商业互惠条约，将夏威夷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西华德给美国谈判代表的指示是，互惠条约固然不错，但如果夏威夷人有兴趣，尽快兼并则更好。国务卿已于1863年将美国外交代表的级别提升到公使级（也即最高外交级别）。对于该条约的意义，爱德华·麦库克公使的解释与其上司如出一辙："一旦美国横贯大陆的太平洋铁路工程告竣，亚洲的贸易直达我们的太平洋港口，我们就需要将这些岛屿作为太平洋海军的集结基地和商船的会集地。而这项条约正是要为这种秘而不宣的兼并过程铺平道路。"参议院的权势人物贾斯廷·莫里利尔（缅因州共和党人）对此不以为然。莫里利尔曾经是反对购买阿拉斯加的两名参议员之一（另一位是其来自缅因州的参议院同事），他狂热主张实行高关税，决不希望他的关税壁垒受到任何破坏。其他议员则不无道理地担心，如果赋予总统就贸易互惠条款进行谈判的权力，国会将失去自己的部分权力。莫里利尔这一派成功地挫败了该条约，但1875年的另一项条约签署后，西华德终于梦想成真，其结果正如麦库克公使所预言的那样。与此同时，一名美国海军军官根据华盛顿的指示，占领了夏威夷以西1200英

① 西华德：《文集》，第5卷，第33—34页；迈克尔·L.康尼弗：《巴拿马与美国》（佐治亚州雅典，1992年），第43页。

里处无人居住的布鲁克斯岛。由于未花一分钱，国会自然赞同此举。1903年，重新命名的中途岛成为美国海军的永久基地，它后来在20世纪的历史上发挥了突出作用。[1]

西华德的亚洲计划十分宏大，但他的权力永远跟不上他的梦想。这一鸿沟促使他就美国的亚洲政策提出两项新原则。在未来8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原则一直影响着美国的政策。研究美亚关系的杰出历史学家泰勒·丹涅特在1922年写道，实际上，“自1869年以来，美国的远东政策绝对没有增添过任何新的原则”。1844年的中美条约已经奠定了亚洲政策的基础，该条约为美国人提供了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保证。这种政策一直得以维持，所采取办法是效法英法提出的要求，实行某种“拾荒者”外交，向中国索取与欧洲人均等的贸易权利。不过，在19世纪60年代，由于内战的需要，美国在该地区的海上力量最后削减到仅仅一艘船。由于不愿退出亚洲，尽管正在进行挽救联邦命运的战争，西华德提出的政策仍然是维护美国的均等机会，为此必须遵循合作原则（而不是充当独来独往的拾荒者）以及必要时使用武力的原则。这两项原则由前马萨诸塞议员、美国公使蒲安臣付诸实践。蒲安臣既希望中国尊重外国的权利，同时也决心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当然，这是美国能够在整个中国从事贸易活动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由于蒲安臣的敏锐，中国人后来让他在西方各国首都充当自己的代表。1868年，西华德与他经过谈判签署了蒲安臣条约，允许中国劳工进入美国。[2]

合作与使用武力的原则很快得到运用。1864年，仍然不愿

---

① 西尔威斯特·K. 史蒂文斯：《美国在夏威夷的扩张（1842—1898）》（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1945年），第95 107页。

② 泰勒·丹涅特：《西华德的远东政策》，《美国历史评论》，第28卷（1922年10月），第45—64页；西华德致蒲安臣，1862年3月6日，指令—中国部分—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分类59。

向西方开放的日本，明目张胆地焚烧了美国公使馆（尽管这场大火的真正起因仍有争议），并向所有外国船只关闭了下关海峡。西华德对任何拒绝对外贸易的国家都有一种本能的反应。他认为这是一种不正常和不道德的行为。日本反对人们皈依或信奉基督教，这使西华德尤其恼火。1862 年，美国驻日公使 R·H. 普鲁因在给西华德的信中揭示了美国人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在日本的所有西方外交官“都是这一文明前哨的哨兵，在这里，就像面对我们的印第安部落一样……弩箭〔偷袭〕常常在晴朗的天空下不期而至”。在美国的远西地区，土著人只能理解武力。因此，美国军舰“怀俄明号”与英国、法国和荷兰的军舰一道，用大炮轰开了海峡的通道，接着于 1866 年将贸易条约强加给日本。内战结束后，西华德又向亚洲海域增派三艘战船。1866 年一艘美国商船的乘客和船员被朝鲜人杀害之后，他又想动用武力，但法国拒绝合作。就像 1853 年海军上将马修·佩里打开日本的大门一样，他还派自己的侄子乔治·F. 西华德去开启朝鲜的大门。这位年轻人没有取得成功，他还拒绝用武力打开这个通常被认为是离群索居的王国，尽管国务卿建议他这样做。[①]

西华德不仅提出了新的原则，而且揭示了数十年来美国在中国（以及其他地区）的政策所面临的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他于 1868 年 9 月 8 日向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发出指令，必须迫使中国尽快在贸易、铁路建设、电报业等方面“做出所有……让步”；另一方面，这些要求又不能逼得太紧，以免危及“现政府的稳定或中国的内部和平与安宁”。[②]

美国人对贸易与权势的追求，使其对秩序的追求先是受到损

① 西华德致蒲安臣，1866 年 4 月 9 日，指令—中国部分—国家档案馆—档案分类 59；保利诺：《美利坚帝国的基础》，第 171—174 页。

② 西华德致 J. R. 布朗，1868 年 9 月 8 日，指令—中国部分—国家档案馆—档案分类 59。

害，接着又在两代人手里被彻底葬送。无论是西华德还是任何其他官员，都无法找到既能从弱国那里获得广泛的让步，又不至于最终损害该国秩序（如果不是损害主权的话）的两全之策。1893年以后的若干年里，美国人在加勒比海、太平洋以及亚洲地区将西华德的许多梦想变成现实的同时，也面临着他在1868年9月所描述的两难困境。实际上，他的困境已成为此后美国人必须面对的一个陷阱。在外交政策上，由于机会均等与秩序这二者无法得兼，美国人只好选择前者，而将后者置于险境。

1869年初，行将卸任的西华德只好满足于取得阿拉斯加和一些遥远的岛屿。国会于1867年11月做出决定，表示可以批准购买阿拉斯加所需的拨款，但“根据国家目前的财政状况，不宜再购买任何领土”。约翰逊总统在1868年年度咨文中就此所做的反应是：“从国家政策的全局来看，似乎要求我们允许以和平、合法的方式尽快获取几个邻近的大陆和海岛区域，并使之成为联邦的组成部分”。这句话无疑是西华德写的。1869年8月，已经离任的西华德在俄勒冈的塞勒姆市宣称，主动吸纳邻近岛屿并使之成为“新的州”，这样的扩张主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保障美国的“公民自由与宗教自由的关键”。他的密友、大名鼎鼎的驻英公使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在颂扬这位前国务卿时，恰如其分地总结道：

他在自己的头脑中所确立的关于民治政体的观念，属于最具扩张性的那种类型。他将其应用于我们的体制，并立刻发现其扩展的手段几乎是无限的……他所追求的变化，仅仅是更有效、更大范围的扩张，在这一点上他是个保守派。[1]

---

① 西华德：《文集》，第5卷，第572页；坎普贝尔：《美国对外关系的转变》，第17页；查尔斯·弗兰西斯·亚当斯：《关于威廉·西华德·亚当斯的生活、性格与贡献的演说——1873年4月18日发表于奥尔巴尼》，奥尔巴尼，1873年。

一点不假。但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于，“更大范围的”扩张是否会最终摧毁秩序与稳定，而不是具有什么保守性质？更直接的问题是，美国人能够以多快的速度缔造权势，以实现西华德的梦想，并验证这个更大的问题？当西华德于1869年离开国务院时，美国人已在这一旅程的途中。

第二章 国内外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20 世纪初美国全球势力的基础是其经济实力。从 19 世纪 90 年代以降，这个国家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世界市场上最强大、最具竞争力的国家。早在对美国军事、政治或文化权势的挑战真正产生忧虑之前，恐惧不安的欧洲人就已告诫人们要警惕“美国的侵袭”（即美国产品及其多国公司的全面冲击）。此外，事实证明，这种侵袭之所以极为严重，不仅是因为其规模巨大，而且是因为它受到美国内部日益增长的危机的推动，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危机的根源恰恰在于美国经济上的成功。这种深刻的危机与混乱状况，标志着美国资本主义和美利坚帝国都出现了一个转折点。西华德以及这位纽约人的追随者们的帝国蓝图，主要不是通过决定“重大政策”的官员、官僚政治进程、公众舆论或者灰心丧气的进步主义改革家而得以实现的。这些蓝图变为现实，靠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那些缔造者，例如安德鲁·卡内基、约翰·D. 洛克菲勒、赛勒斯·麦考密克、J. P. 摩根和 E. H. 哈里曼，正是这些人重新设计了生产体系。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 18 世纪晚期的英国，依靠的能源是煤，并且在许多方面仍然依赖陈旧的工艺体系。第二次工业革命来源于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和托马斯·爱迪生这样的发明家所创造的新技术。电力无疑使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直到内战之前不久的几年里，美国的生产者还只有三种增加产量的方

式：增加劳动者人数（由于劳动力短缺这比较困难）；在各个地区的生产基地之间重新分配生产内容（由于距离遥远、通讯手段原始这也比较困难）；或者通过发现更多的水利、木材、牲畜、煤炭或风力资源以提供更大的动力。19 世纪末出现的发动机则开始体现了利用石油和天然气的可能性。[①]

不过，美国取得经济领导地位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技术。这还需要有投资，也就是说，要求企业家有能力利用美国人高得惊人的储蓄率——19 世纪 50 年代是国民产值的 10%—12%，这已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在 1865—1914 年又剧增至 18%—20%，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美国的经济地位还有赖于对传统外国投资来源的利用。这方面的数量在 19 世纪 80 年代末高达 30 亿美元；1870—1895 年间，光是英国人在美国的净投资就达 15 亿美元。正如艾尔弗雷德·D. 钱德勒所言，美国的技术变成了美国的权势，因为国民决心通过这些投资取得生产规模和生产范围上的成本优势，建立一个高效、理想的市场体系，并且造就一批支领薪俸、能够保证体系正常运转的职业经理。用钱德勒的话说，“正是这些投资，而不是技术创新，使工业结构发生转型，并对国家经济的绩效产生了作用。正是这些投资创造了一种新的制度”——“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现代工业企业”。[②]

国内公司以及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崭露头角的多国公司，成为人们特别青睐的组织形式。它们不仅能够最有效地吸纳和运用所需的投资，还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和市场份额，而这又造

---

① T. 杰克逊·利尔斯：《斯文扫地——反现代主义与美国文化的转型（1880—1920）》（纽约，1981 年），第 8—9 页；E·J. 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纽约，1987 年），第 2 章。

② 小艾尔弗雷德·D. 钱德勒：《规模与范围》（马萨诸塞州剑桥，1990 年），第 62—63 页；斯图尔特·布鲁奇：《企业》（马萨诸塞剑桥，1990 年），第 311—313 页。

就了未来的投资。成功而孤独的发明家很快成为过去的一种形象。爱迪生在19世纪70年代建立的实验室，于1901年变成了通用电气公司，因为公司在获取资本、政治协助和国内（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外）市场占有率方面，其成就要远为巨大，而且不可限量。与此同时，美国的大学还设立了各种教授工程和商务课程的学院，以满足这种新型公司的需要。不仅如此，像詹姆斯·G．布莱恩和威廉·麦金莱这样的人所领导的政党很快就适应了这一形势。那些无法顺应时势的党派，要么销声匿迹（例如平民党人和劳动骑士团），要么失去国家领导权（例如民主党）。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作为国内利益之海外体现的外交政策，在这种新型公司的铁律面前，会是一个例外。①

变化的速度似乎越来越快，以至于亨利·亚当斯（他也许是这个时代美国最杰出的思想家）在研究科学、数学和生产力的基础上提出一套理论，他指出，这种变化不仅比18世纪“离群索居”的波士顿所发生的变化更快，并且来势迅猛，使社会政治体制根本无法跟上它的步伐。1860年的美国尚无钢铁生产，石油产量也很有限。40年后，美国人已建立起一个钢铁和石油生产的全球帝国。1871年，两条铁路在亚拉巴马一个地处大路交会处的社区（该地被堂而皇之地命名为伯明翰）会合。此后不到30年，该城市的工厂仅需6个月就出口30万吨优质钢，并且能够在曾经为英国所控制的市场上展开有效的竞争。这个时代始于1860年，此时美国已建成3万英里的铁路（其里程数占全世界铁路的一半），当这个时代终结时，美国不仅有长达25.9万英里的铁路，而且还出现了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伊迪斯·沃顿引用

① 米拉·威尔金斯：《多国公司的兴起》（马萨诸塞州剑桥，1981年），第68—69页；卡洛尔·M．珀塞尔：《美国的技术》（马萨诸塞州剑桥，1981年），第3—5页。

威尔伯·莱特的名言说："我能够设想，飞机可能会在战争中派上某种用场，但绝不会具有任何商业用途或者作为日常交通工具。"①

一、南方：从殖民地到帝国

1865年的美国本来是由彼此孤立的、地方性的社区占主导地位，但是到了190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将许多社区连为一体。在美国官员们创建新型帝国的过程中，这些社区也逐步（往往并非心甘情愿地）变成国际市场的一部分。战败后的南方首先被卷入这场革命之中。C. 范恩·伍德沃德曾经提出，在1865—1877年的重建时期，可以认为，前南部邦联的11个成员，"与许许多多的拉美共和国一样，都在革命的阵痛中挣扎，高高在上的北方巨人是南部各州的殖民总督和军事保护者，每个州都与［联合］果品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保持着某种联系。"事实证明，总督时代相对而言并不长，因为南方人明白，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右边的路通往东部，左边的路走向西部……保守派和主张向右转的人于1877年获胜。"这一正确选择获得了丰厚回报。1880—1900年，仅资本投资就由2.5亿美元上升到10亿美元；工人总数翻了一番；平均利润达22%。②

内战以前，尽管还算不上是一些南方人所声称的棉花"大王"，南方已凭借其棉花出口使该地区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但这还只是一个开端。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工业革命诞生时期，南方已经开始出现自己的棉纺厂联合体。1870—1891年，

① 伊迪斯·沃顿：《历史一瞥》（纽约，1934），第319页。

② C. 范恩·伍德沃德：《未竟的事业》，载《纽约书评》，1988年5月12日，第22页；C. 范恩·伍德沃德：《新南方的由来》（巴坦卢，1975年）。

棉花产量从 430 万包上升到 900 万包，增长了一倍多。如此高的产量迫使价格下跌，从 1871 年的每磅 18 美分，下降到 1900 年的 7 美分。北方资本大量流入，加上棉花价格低廉，使得工人（许多是被迫到城镇棉纺厂谋生的破产佃农）每天仅挣 12 美分。这种竞争力使厂主能够开发亚洲市场，或者从新英格兰厂家那里夺走原有的市场。一位波士顿人承认："如今南方厂家出口的棉织品比整个新英格兰还多。"1873 年后的经济萧条加快了出口的浪潮，而这正好发生在（实际上也正是因为）资本充裕的厂家产量更高、迫使价格下跌并使经济衰退加剧之时。1875—1880 年，美国棉织品出口比 1871—1875 年增加了三倍。有一项估计认为，美国的棉织品工业要生存下去的话，其全部产品的 20%必须出口。1887—1897 年，由于国内市场仍在萧条的重负下苦苦挣扎，对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增长了 120%。这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南部纺织业在国会的代表反对 1882 年关于十年内禁止中国移民进入美国的法案（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可能以停止进口作为报复），但未能成功。来自密西西比的国会议员赫尔南多·D. 莫尼在 1876 年提出，既然"帝国的进军方向是西边"，既然"每个喜欢从事亚洲贸易的人都发财致富了"，那么，美国必须拥有夏威夷，将其作为通往亚洲市场的一个小站。[①]

莫尼只是纸上谈兵，詹姆斯·布坎南·杜克（人称"巴克"）则身体力行。穷愁潦倒的杜克看中了弗吉尼亚的无名小卒詹姆斯·A. 邦萨克发明的一项烟草制造技术。他利用这项发明，辅之以自己的想像力和资本，于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垄断烟草业，就像洛克菲勒垄断炼油业一样。到了 1912 年，杜克在中国

① 帕特里克·赫登：《独立与帝国》（伊利诺斯州德科尔布，1982 年），第 8—14、第 25　28、43—46、55—58、60、66、89—106；帕克·T. 穆恩：《帝国主义与世界政治》（纽约，1938 年），第 533 页。

这个似乎无限广阔的烟草市场上已有很大影响力，以至于中国政府和日本竞争对手都与他打起了经济战。对纺织业主和杜克的美国烟草公司而言，开发中国市场既非幻想，也非夸夸其谈，这即便不是为了生存，也是其事业发达所必需的。[①]

南方的生产者越来越依赖拉美和亚洲消费者，以至于《查塔努加商人报》对建立太多完全依靠出口贸易的工厂表示担忧。一点不奇怪，像亚拉巴马参议员约翰·T. 摩根这样的南方人会带头争取修建巴拿马运河（对此莫比尔、新奥尔良和其他区域性港口会占有地理优势）。南方人在1860年前本来对联邦政府插手此事很反感，但是到了1860年，为了在全球市场上求生存，他们却要求华盛顿提供一条运河、一个商船队、更好的外交协助以及其他必要的便利措施。主要为南方商界说话的《查塔努加商人报》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它鼓吹道，拉美"贸易根据自然法是属于我们的"。但该报接着又觉得最好还是搬出上帝的法则，于是又补充说，"而且政府方面如果推行明智、自由的政策将使这一点得到保证"。[②]

实际上，南部自力更生的能力很有限。1880年的人均收入比1860年更少。1990年的人均收入仅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它自己无法积累足够的资本以跟上北方的步伐。该地区的劳动力很丰富，但极为贫困。因此，该地区具有双重依赖性：依靠北方以获得必要的竞争资本；依靠拉美和亚洲市场以获得生存。[③]

---

① 谢尔曼·科克兰：《对中国的商业渗透与帝国主义》，见费正清与欧内斯特·R. 梅编：《从历史的观点看美国在中国的贸易》（马萨诸塞州剑桥，1985年），尤其是第204—208页；威廉·黑塞尔廷：《南方史（1607—1936）》（纽约，1938年），第399—411页。

② 布鲁奇：《企业》，第272—273页；赫登：《独立与帝国》，第60—62页。

③ 爱德华·C. 柯克兰：《工业进入成熟期》（纽约，1961年），第278-279；布鲁奇：《企业》，第382页。

二、国际性的奴婢

这个时代的历史可以用三组数字来说明。其中一组数字显示，1860年，美国进口总值达3.54亿美元，出口为3.16亿美元，因此产生商品贸易逆差。到1897年，进口翻了一番，达7.65亿美元，而出口则增加了两倍多，达10.3亿美元。1874年后，除了1875、1888和1893年，出口一直超过进口，直到1971年以后经济开始下滑时为止。长达300年的贸易不平衡在19世纪70年代被扭转过来，美国从此迈向世界经济霸权。第二组数字表明，1868年美国的世界贸易份额为6%，而1913年为11%。这一增长几乎完全来自工业产品，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有人认为美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一位英国人写道，美国人的入侵“接连不断，500个企业同时出击，既无喧嚣，也无虚饰……美国人所向披靡”。第三组数字显示，在1880年，全部出口产品的84.3%是农产品，而到1900年，农产品已只占整个出口的2/3。同样，300年之后，美国正逐步由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国家。[①]

农民并非默默地走向衰落。1870—1900年间，美国人定居的土地（4.3亿英亩）超过过去300年的总和（4.07亿英亩）。机械化造就了生产主要农作物的巨型农场，例如，红河谷地区的小麦生产设备可应付数千英亩土地的生产。1870—1910年间，国家人口的倍增为生产者提供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然而，农民却损失惨重。到19世纪90年代，红河谷的巨型农场实际上已

① 布鲁奇：《企业》，第296—300、383页；詹姆斯·D. 理查森：《总统咨文与文件汇编（1789—1897）》，10卷本（华盛顿，1900年），第9卷，第739页。

经消失，大平原各州成千上万农民离开家园，农场租赁及丧失抵押赎回权的比例达到历史性的高度。尽管有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仍有20%的农产品必须寻找外国市场，高度机械化和资本化的生产者能够很好地利用国外市场，但即使是这部分生产者，也发现自己面临俄国小麦和拉美小麦与肉类生产者的激烈竞争，他们还发现，像德法这样的帝国，也决心通过为本国生产者提供补贴或者发展其殖民地的农业生产，尽量自给自足。在经济崩溃最为严重的1893年，一向反应敏捷的《查塔努加商人报》曾指出，南方人的棉花产量比过去多了，但俄国人、拉美人和埃及人同样如此。尤其是棉花和小麦的价格，并不是由纽约或芝加哥决定的，而是由伦敦金融市场决定的。美国的小麦和棉花生产者要求华盛顿帮助开拓拉美市场，部分原因便是想摆脱伦敦的控制。美国政府没有多少作为。不过，政府于19世纪90年代在农业部设立了一个局，作为国外市场信息的交流机构。[①]

这当然是不够的。而且，过去曾经屡屡奏效的一条出路也逐渐被堵塞：1890年，人口调查局正式宣布，经过四百年的开发之后，边疆已到尽头，这使观察家们意识到，过去极易获得的优良土地已无处可寻。有些人甚至很早就已得出这一结论。例如，拥有众多读者的《北美评论》在1886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指出美国的人口激增、农场租赁的兴起等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与古罗马的衰落（这是该时期人们喜欢议论的话题）的某些相似性，并且哀叹道："压力已经出现。事实上，美国的公有土地已经利用殆尽。"小说家哈罗德·弗雷德里克说得更清楚："农民的妻子一个个精神崩溃，在压力下相继死去或被送入疯人院；农民中不断有人在自己的谷仓里上吊自杀，或者在蝗虫般的抵押债务压力下仓

① 布鲁奇：《企业》，第296、300、383页；《查塔努加商人报》，1893年11月1日，第39页。

皇向西出逃。”杰弗逊理想中的农业家庭似乎正在变成某种国际性的奴婢。[①]

三、多国公司与经济萧条

19 世纪 80 年代，美国的多国公司开始取代农场主的地位，在国家对外经济政策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辛格缝纫机、伊斯门柯达胶片、麦考密克收割机、纽约人寿保险公司（90 年代在 56 个国家开展业务）以及美孚石油公司，在国际上都是家喻户晓的品牌。到了 1914 年，在俄国，最大的商业联合企业是辛格缝纫机和国际收割机。[②]

有三大国内事件，使 19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这一趋势，汇入了 1895 年后令欧洲人极为恐惧的美国大举入侵的洪流。第一件事，是 1890 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它禁止旨在限制贸易的企业协议。该法案的一些发起者希望通过此举来恢复国内竞争。这反而促使竞争对手们通过企业合并来避免竞争。1897—1904 年间，不仅发生了本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企业兼并运动，而且这些新组建的巨型企业还争先恐后地走向海外。第二个事件，是 19 世纪 90 年代金本位的倡导者们经过激烈争论成功地取消了银本位制。一些美国人曾希望英国和法国带头进行国际努力，就实行更有利于通货膨胀的金银复本位制（也即铸造更多的银币）达成一项协议。这些努力失败了。当 1893 年后的经济凋敝威胁到美

---

① 托马斯·P. 吉尔：《美国的地主所有制》，《北美评论》第 142 卷（1886 年 1 月），第 60 页；拉扎·齐夫：《19 世纪 90 年代的美国》（纽约，1966 年），第 210 页。

② 威尔金斯：《多国公司的兴起》，第 68 71；布鲁奇：《企业》，第 386 页；托马斯·C. 欧文：《在俄罗斯帝国的公司的人口生态（1700--1914）》，《斯拉夫评论》第 50 卷（1991 年冬季号），第 823—824 页。

国的对外出口和对外投资时，主张金本位的所谓“金甲虫”们开始采取行动。民主党总统格罗弗·克里夫兰修改了1890年谢尔曼购银法。接着，继1896年大选击败主张自由铸造银币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之后，共和党总统威廉·麦金莱于1900年通过金本位法，给银本位的倡导者敲响了最后的丧钟。在国外投资的公司现在确信，国内的货币政策问题已有定论，于是可以放心大胆地与其他实行金本位的国家（尤其是英国）打交道了。[①]

因此，“金甲虫”们不能认同经济危机可以通过调整货币供应措施来解决的观点。他们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过剩，通过发现新的海外市场，美国的生产者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并维持自己的繁荣。在政府当中，很少有人打算运用联邦的权力来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尤其是征收所得税的想法在1895年被最高法院否决之后。人们逐渐就生产过剩是危机的原因形成共识，这促使美国人到国外去寻找买主。但在国外要有竞争力，就必须毫不留情地削减成本。周而复始的循环似乎已经闭合了。[②]

于是出现了对多国公司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三个因素：长达25年的萧条本身。这次危机并未使产量减少。情况正好相反。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部门，产量均扶摇直上，直至产品供大于求，使经济体系面临窒息的危险。价格持续下跌。假设1873年的价格指数为100的话，1890和1896年则分别骤降至78和71。这样的衰退意味着只有那些效率最高的生产者能够生存下来，而反过来，这也意味着那些拥有购买新技术的必要资金的生产者能够以最低的成本进行生产，从而经得起经济风暴的考验。在1873年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工业化世界都面临着经济

① 威尔金斯：《多国公司的兴起》，第73页；沃尔特·拉夫伯：《新帝国》（伊萨卡，1963），第154—159页。

② 戴维·A. 韦尔斯提供了一项重要解释，见托马斯·麦考密克：《中国市场》（芝加哥，1967年），第27—32页。

风暴的威胁。欧洲的困难同样来源于产量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导致价格下跌，工人失业，而且金融丑闻时有发生（就像在美国那样），给这个时期的经济史平添了几分意趣。仅19世纪80年代，法国的钢产量就增加了一倍，英国增加了两倍，德国和美国增加了四倍。1873－1886年，世界棉花供应量激增50%。1890—1901年，仅美国生产的棉花，就比整个世界的消费量还要多出300万捆。随着棉花和小麦价格的下降，破产的农民就成了棉纺厂和其他厂家的廉价劳动力——假如他们还找得到工作的话。[①]

在这25年的繁荣表象背后，隐藏的是25年的萧条，美国正是利用这场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走向世界经济权势的巅峰。很快就必须付出的代价，是秩序遭到破坏，实际上，所面临的威胁是阶级因素驱动下爆发的革命，而此前在美国很少有人了解这一点。18世纪70年代，诞生了美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该组织的建立受到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影响，这说明容易受国际事件影响的不仅仅是棉花的价格。1877年，第一次总罢工威胁到全国。这场罢工因铁路问题而引发，在罢工运动席卷西弗吉尼亚并向中西部地区蔓延的过程中，有一百名罢工者被杀害。沃尔特·昆廷·格雷沙姆是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法官，他曾采取措施想结束罢工。格雷沙姆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们的革命先辈们……关于民治政府的观念走得太远了”，“民主如今成了法律、秩序和社会本身的敌人，这样的民主应该取消。我希望格兰特做总统。”（1893年格雷沙姆成为格罗弗·克里夫兰总统的国务卿）还有其他许多人也希望格兰特这位马背上的英雄能够获得第三个总统任期，并且能够结束目前这种——用一位支持者的话

① 沃尔特·纽根特：《9世纪末的边疆与帝国》，《西部历史季刊》第20卷（1989年11月），第394页；布鲁奇：《企业》，第320、337—338页。

说——“共产主义以及通货膨胀”。危机才刚刚开始。1886年的秣市骚乱、1892年的霍姆斯特德罢工，以及1894年克里夫兰动用联邦军队镇压芝加哥大罢工，不过是这场旷日持久的萧条中所爆发的最显眼的几次动乱。①

为了满足国际市场上的竞争需要，却在国内市场上引起了流血冲突。70年代中期的几次罢工之后，一些人所作的反应是尽快建立军械库，将其作为防御堡垒和地方民兵训练场地，以保证城市中产阶级不受愤怒的工人和移民的攻击。正如克里夫兰的一位法官在1893年所言，这些新建的地方军械库“在发生民众暴乱时是固若金汤的堡垒……藏身处和避难所”。② 其他一些人，例如卡内基和洛克菲勒，他们在使美国成为世界主要强国的同时，也使这样的军械库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

四、卡内基的“剩余法则”、“成功的民主”以及海军

安德鲁·卡内基后来承认，他在创建美国第一个现代贝西默式炼钢厂时，利用1873－1875年的经济萧条乘机低价采购，节约了25％的成本。到19世纪80年代，钢铁市场和新建铁路已利用殆尽。但卡内基再度利用80年代的经济颓势进行扩张。他从机械和建筑行业、尤为重要的是从正在建造装甲战舰的美国和外国海军那里找到了新的市场。钢铁生产者还在俄国找到了市场，那里正在修建横跨西伯利亚的漫长铁路线，并且在建设国家海

---

① 罗伯特·V. 布鲁斯：《1877年——动乱年代》（印第安纳波利斯，1959年），第310 317页。

② 格列高里·布什：《遏制镀金时代的暴民》，《美国历史回顾》第19卷（1991年3月），第48—53页（原注）。该刊物英文原名为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译为《美国历史回顾》，是为了避免与另一刊物《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相混淆。——译者

军。1880 年，美国的钢铁产量达到 110 万吨，1890 年为 430 万吨，10 年以后达到 1010 万吨。[①]

卡内基后来还承认，1870 年的关税法首次为钢铁生产者提供了保护伞，这是他涉足钢铁行业的主要原因。生产商给那些提倡贸易保护主义的政客们提供了丰厚的报酬，这不难理解，因为据一些观察家估计，联邦政府的协助，使钢铁企业家每年获得 700—2500 万美元的额外利润。不过，到了 1890 年，钢铁工业的效率已经非常之高，使得关税开始下降。人们的关注点逐渐转移。就像卡内基在 1895 年所说的那样，他现在希望关税更低一些，以便美国能够从那些因此相应地降低美国产品进口税率的国家那里获得更廉价的原料。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步入 20 世纪。[②]

除了发现利用经济危机和关税壁垒赚钱的奥秘，卡内基还有一项重要贡献。他发现，通过对相关生产部门进行垂直、系统的组合，从而自己控制从明尼苏达的铁矿石、宾夕法尼亚的煤炭到匹兹堡的炼钢炉这一系列的生产过程，他便能获得极大的竞争力。这样的组合与新技术需要大量资金和其他管理费用，这些成本要获得补偿，最好的办法就是持续不断地满负荷运转，或者用卡内基的话说："拼命运转"。他的"剩余法则"要求其工厂"拼命运转"，哪怕当前没有找到太多的市场。这样一来，卡内基就以越来越低的成本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然后在市场上以比其他竞争者更低的价格出售。人们宁愿承受暂时的损失，关闭那些成本太高的炼钢炉。因此，1888—1898 年间，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是钢铁业。1888 年出口总值为 1770 万美元，10 年后达到 4000 万美元。1898 年这种高达 230％的急剧增长，还使美国在这类商

---

① 安德鲁·卡内基：《安德鲁·卡内基杂文集》（伯顿·J. 亨德里克编，纽约州加登市，1933 年），第 2 卷，第 31 页；布鲁奇：《企业》，第 329 页。

② 安德鲁·卡内基：《安德鲁·卡内基杂文集》，第 1 卷，第 306 页。

品上获得3000万美元的贸易顺差。1897年底，经济学家爱德华·阿特金森指出，“本年度极不寻常的一件事情，是人们已经认识到，钢铁生产的主要控制权已从大西洋的另一边转移到这个国家。”阿特金森还得出结论认为，支付较高的工资并以最低的价格控制着钢铁市场的国家，只要它决心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它就“可以控制整个世界的贸易”。[1]

当沙皇政府于1892年开始修建跨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铁路时，美国的钢铁生产者看到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市场。到了90年代中期，钢铁产品已取代棉花，成为美国对俄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由于美国人出价低于其他厂家，美国的钢轨、鲍德温机车、桥梁、车厢得以进入西伯利亚。跨西伯利亚铁路的倡导者谢尔盖·维特伯爵深知这一切对于外交的意义。经过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友好关系之后，尤其是因为双方都在中国争夺优势地位，美俄关系已开始冷却。卡内基在19世纪70年代初的首创精神，帮助塑造了直至90年代末的国际力量对比状况。[2]

1886年，卡内基发表了《成功的民主》一书。该书认为，他的“剩余法则”作为资本主义的若干原则之一，无论对于民主政治还是对于俄国的铁路建设，都将大有益处。美国的民主导致了新型工业革命的发生，而这反过来又为巩固个人自由提供了必要的手段。资本主义既创造利润，也带来民主；也可以说，因为有了利润，所以才有民主。那些正在为如何保持日益膨胀的英帝国的民主制度而冥思苦想的英国思想家们，接受了卡内基的这一思想。他们不想重蹈罗马因为建立帝国而失去自由的历史覆辙。80年代的英帝国联邦运动认为，美国的联邦制提供了一个范例。

---

① 《世界》，1897年12月12日；柯克兰：《工业进入成熟期》，第8—11、172—173页。

② 乔治·S. 奎因：《美国与俄国的物质进步（1881—1906）》（纽约，1976年），第122、224—225页。

有人断言，“大英帝国治下的美国”能够使自由与帝国[1]协调一致。或者，正如一位信奉此说的人所宣称的，“〔美国人〕已经做过的事情，我们也能做。在民主制度的培育方面，美国人比我们提前了整整一代人。”[2] 卡内基对此表示赞同，尽管出生于苏格兰，他仍然谴责英帝国，同时警告美国人不要步英帝国的后尘。美国的民主似乎与美国的钢铁一样有诱惑力。当然，卡内基会争辩说，这不过是同一个制度的两个侧面。

卡内基做得很得体，也很成功。他是众多钢铁生产者之一，但他的产量通常占全国的 1/4。到了 90 年代，他的企业每年获利 4000 万美元。他手下的工人日子却不那么好过。他们的工作地点处于地球上最热的一些地区，24 小时才换一次班。如此恶劣的工作条件，使劳工运动的组织者能够在匹兹堡郊外的霍姆斯特德钢铁厂建立起美国劳工联合会中力量最强大的工会。1892 年，工会成员要求获得与不断提高的产量相称的工资。[3]

卡内基过去总是与工会合作，但现在他自己呆在苏格兰，而让其合伙人亨利·克莱·弗里克去全权处理。弗里克削减工资，迫使工人罢工，修建三英里长的围墙将工人挡在厂房之外，收买“工贼”，还雇了 300 名平克顿全国侦探事务所的侦探来保护那些破坏罢工的人。1892 年年中，终于爆发了流血冲突。9 名平克顿侦探和 7 名工人死亡。州长也派民兵去保护非工会成员。[4] 罢工最后被瓦解，霍姆斯特德又开始遵循“拼命运转”的法则。“成

---

① 原文斜体（libertas et imperium）。——译者

② 安德鲁·卡内基：《成功的民主》（纽约，1886 年）；雷蒙德·F. 贝茨，《宽广无边：美国西部对 19 世纪欧洲扩张思想的影响》，《西部历史季刊》第 10 卷（1979 年 4 月），第 154 页。

③ A. C. 比尔致克兰普，1892 年 1 月 8 日，本杰明·特雷西文件集，华盛顿国会图书馆。

④ 内尔·欧文·佩恩特：《善恶大决战——1877—1919 的美国》（纽约，1987 年），第 110—114 页。

功的民主”看来并不那么成功。

到了1892年，为了“满负荷运转”，卡内基还牺牲了他的另一个信念。1881年美国的海军是一支相当可怜的舰队，其五艘主要军舰已服役25年，破旧不堪。自1865年以来，英国的工厂就建造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军舰的甲板厚度达12英寸。第二年，即1882年，国会拨款建造四艘现代军舰，而且，无需人们太多的提醒，国会优先考虑的是本国的钢铁生产商。（幽默作家“杜利先生”、即芬利·彼得·邓恩后来指出，出任海军部长的首要条件是为选民争得一笔政治拨款，而无需见识过海水。）卡内基有些拿不定主意。他有和平主义倾向，他在《成功的民主》一书中吹嘘道，美国的强大实力并不是靠军事力量。“感谢上帝！美国的海军几乎等于零。”当华盛顿请他投标争取建造军舰的合同时，他向其夫人表示不想做这件事情；他的夫人则表示对他的决定感到骄傲。海军部门和他的钢铁合伙人向他进一步施压后，他最后决定只生产甲板，不制造枪炮。（他与其合伙人都认识到，“生产甲板会给我们带来数百万利润”。）到了1890年，卡内基不仅将最初给竞争者的合同夺了过来，而且建立了专门的工厂，以生产世界上质量最好的甲板。他还在海军部安插自己的代理人，为他提供建设计划方面的内部信息，以便他的报价能够低于竞争对手。在90年代，卡内基与伯利恒炼铁厂停止竞标，干脆瓜分了生产合同。卡内基现在每生产一吨甲板花175美元，然后以每吨450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政府。90年代中期，由于有人指责他剥削自己入籍的国家（而且卖一些次品给本国），卡内基一气之下拒绝投标竞争生产合同——至少在取得合适的价格

之前是这样。[1]

他很快就在国外找到了市场。1891 年，他通过国务卿詹姆斯·G. 布莱恩，从英国人手中夺走了俄国海军的甲板生产合同。1898 年，他开始与朋友们分享俄国以及其他海外钢板市场。美国海军部门得知他以每吨 249 美元的价格（大约美国人所付价格的一半）卖给俄国人，当然不会高兴。这位钢铁生产商毫无悔意。随着列强都在开始建设强大的舰队，准备打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中的商机相当诱人（特别是在 1893—1896 年经济危机期间），卡内基这时也想制造枪炮了。他的合伙人却不同意，因为可能获得的利润似乎还不够高。其他一些人则开发了新一代高性能武器，包括来复枪、机关枪等，这使得战争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这一切则是因为有了新的钢铁生产技术才成为可能。[2]

1898—1899 年，卡内基曾出钱资助反对麦金莱总统兼并菲律宾的活动。卡内基摆出一种在他看来与世纪末[3]的美国身份相称的姿态。为了发泄对华盛顿的愤怒，这位钢铁巨头表示自己愿意出资 2000 万美元买下菲律宾群岛，以便能够让它独立，使美国避免类似英帝国那样的耻辱。但卡内基其实根本不反对扩张。他也曾赞成攫取夏威夷。他在 1898 年写道："我并不是一个害怕扩张，提倡'小国寡民'的美国人……只要这片新的领土能够始终属于美国人，并且在美国人（而不是国外民族）失信于国家的时候能够及时地予以限制，以便他们能够安分守己。"[4] 对此西

---

① 卡内基：《成功的民主》，第 6 页；约瑟夫·F. 沃尔：《安德鲁·卡内基》（纽约，1970 年），第 645—654；丹尼尔·R. 黑德里克：《帝国的工具——19 世纪的技术与欧洲帝国主义》（纽约，1981 年），第 175 页。

② 卡内基致布莱恩，1891 年 5 月 9 日，安德鲁·卡内基文件集，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施瓦布致卡内基，1898 年 3 月 7 日，同上；沃尔：《安德鲁·卡内基》，第 652—654。

③ 原文为法语（fin de siècle）。——译者

④ 沃尔：《安德鲁·卡内基》，第 694—695 页。

华德一定会表示赞同，尤其是其中的种族观点，就像他同样会为美国建立新型舰队并占领俄国工业市场拍手称快一样。毕竟，西华德与麦金莱一样，很清楚拥有几处位置优越的海军基地对于确保美国工厂与欧亚买主之间的通道安全的必要性。

五、洛克菲勒的30年战争

到了1902年，美国的钢铁产量已超过英国与德国的总和。不仅如此，美国的通用钢生产也比英国或德国更为集中化。1901年，卡内基将自己的公司卖给了J. P. 摩根为首的一个联合企业（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股票交易上的欺骗行为，摩根将美国的钢铁企业合而为一，建立了全球首家资产达10亿美元的公司）。只有约翰·D. 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与之实力接近。洛克菲勒所发展的产业，先是给钢铁世界带来了光明，继而又为机器的运转、包括卡内基帮助建立的现代海军提供了燃料。洛克菲勒没有向银行家出售股份，而是自己充当银行家，这样他就能够拥有竞争资源，特别是与俄国石油竞争的资源，因为，在卡内基向俄国人销售产品的同时，洛克菲勒正与俄国在金融上的有力支持者、巴黎的罗特希尔德公司进行一场德国作家所说的“30年战争”。

美孚石油公司在1870年已是全球最大的炼油企业，其雄厚的实力，既得益于美国石油产量的不断增长（1866年为100万桶，1896年为2000万桶），也靠的是约翰·D. 洛克菲勒残酷无情的经营方式——这种方式有助于削减成本，使生产合理化并赶跑竞争者。19世纪90年代，美孚石油公司仍占本国炼油量的80%。不过，其产品在这个时期已开始发生变化。随着电气化在欧洲和美国的逐步普及，该公司的主要产品煤油在亚洲、尤其是中国找到了销路。但与此同时，驱动军舰、工厂里的机器以及汽车的新型发动机也需要石油与汽油。发动机的功率增长之快，令

人瞭目。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最大的发动机为35马力，而在七年后的巴黎博览会上，最大的引擎有1000马力。[①]

从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美孚石油公司的主要产品——煤油，有3/4需要销往海外市场。洛克菲勒用输油管将油田与大西洋海岸连接起来，然后将炼油业集中在新泽西州的贝永市。产品在那里装船，先是运往欧洲（主要是德国和英国，直到19世纪80年代），继而越来越多地运往亚洲。石油产品的出口值在美国的出口中排第十位。威廉·赫伯特·利比在1878年以后是美孚石油公司在国外的头号代理人，他吹嘘说，石油"一路披荆斩棘，踏遍文明与不文明国家的一个个旮旯角落，其足迹之广泛，超过商业史上任何以某种单一原料为基础的其他产品"。到90年代，精炼油已进入许许多多城镇与乡村，不仅销往欧洲、非洲部分地区、日本和中国，还销往暹罗、苏门答腊岛、婆罗洲，以及拉美和加拿大的所有地区。[②]

不过，19世纪80年代，高加索地区开始生产石油，到1891年为止，俄国喷油井的石油产量约占世界总量的38%。瑞典的诺贝尔公司率先建立了俄国的煤油生产，接着实力雄厚的罗特希尔德公司也进入俄国。法俄集团与美孚石油公司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夺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洛克菲勒建立了自己的销售公司（而不是依靠国外的独立采购商），牢牢控制着遍布加拿大、英国、西印度群岛、德国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的销售点。为了尽快将产品运出贝永市，还建立了一支庞大的油船队。在美国，找到了新的、更廉价的原油，提炼成本也更低。到90年代中期，美孚石油失去了奥匈帝国、西班牙、土耳其的市场，当然，也失去了俄

① 阿伦·内文斯：《约翰·D. 洛克菲勒》（纽约，1959年），第197—203页。

② R. W. 海迪与M. E. 海迪：《开创大企业（1882—1911）》（纽约，1955年），第122—124页。

国市场，但在其他地区却控制了更多的市场。[①]

在西太平洋地区，1884—1894年间，美国运往香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石油增加了两倍，对日本的发货量也上升了50%。这场竞争并不容易，但美孚石油公司在亚洲的业务总是能够赢利，尽管罗特希尔德公司和荷兰皇家公司的强大实力正在向东印度群岛扩展。美国人甚至通过市场协调进行俄国煤油的买卖活动，并且能够从中获利。利比曾花了若干年的时间开拓中国内地市场，与当地的植物油和花生油生产商竞争。他得到了美国驻华领事和其他外交人员的协助，他们根据国务院的指示负责为石油销售扫除障碍，特别是设法取消当地的一些限制性法令或规章。美孚石油公司的做法，意味着它将利用其世界范围的公司代理商网络来发掘新的市场。其中尤其重要的是英国、法国和阿根廷市场。到了1914年，亨利·福特已在阿根廷建立一个T型汽车装配厂。美孚石油公司也利用其在华盛顿的政治关系网来帮它保护这些现有的和潜在的市场。到1900年时，洛克菲勒在为全世界的内燃机和中国的煤油灯提供燃料的过程中，不仅能够使本国的外交部门为其所用，也可以借助于自己的私人外交机构。[②]

六、混乱与达尔文主义

1897年末，纽约颇有影响的《商业杂志》对最近10年作了回顾，指出了本国海外贸易的巨大增长，并列举了导致这一增长

---

① 沃辛顿·C. 福特：《萧条时期的商业与工业》，《银行家杂志与统计记录》第50卷（1895年3月），第481页；R. W. 海迪与M. E. 海迪：《开创大企业（1882—1911）》，第130—131、236—237页。

② 《布雷兹特里茨》（Bradstreet's），1893年2月24日，第116页；R. W. 海迪与M. E. 海迪：《开创大企业（1882—1911）》，第137、153、267—268页；布鲁奇：《企业》，第385页。

的三大原因：1893 年后国内市场的崩溃；成本的急剧下降，尤其是原料价格的下降以及通过批量生产而不是增加劳动力的办法降低成本；以及各生产部门竞争力的迅速上升。《商业杂志》在 1895 年就曾鼓吹道，新的工业革命使美国成为"'国外'的一部分"。人们不可能再"认为我们能够把自己孤立于商业世界的其他部分之外"。[①] 美国人在国内同样不可能相互隔绝。许多公司在利用铁路使新技术产品侵入国内各个城镇的同时，也对全球各地的城镇进行商业入侵。

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但这种世界秩序实际上十分可怕、混乱不堪、过度浪费并极具毁灭性。洛西恩·比尔爵士，一位英国钢铁生产商，看到匹兹堡的炼钢炉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其"不顾一切的运转速度"使高炉内部结构每三年就被毁坏一次；工人们同样被拼命役使，耗尽心力，很少有人活过 40 岁。[②] 这样一来，生意兴隆的钢铁工业所造成的破坏，与南方和大平原地区成千上万的农民所遭受的毁灭（在 80—90 年代，土地被侵蚀，市场不复存在，银行不断取消他们的抵押赎回权），非常相似。

这种塑造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美国的资本主义，对利润与市场份额的兴趣远远胜过对秩序的关心。事实证明，正如霍姆斯特德的流血冲突所示，"剩余法则"以及以最低成本"拼命运转"，对于弗里克和卡内基的重要性要远胜于对维持秩序和使劳工安分守己的意义。欲在 1873 年后挥之不去的经济萧条的阴云下面生存下来，欲在这个卡内基与英国钢铁业各显神通，洛克菲勒与俄国石油企业短兵相接，南部纺织业主与新英格兰制造商打

① 《商业杂志》，1895 年 12 月 11 日，第 6 页；同前，1895 年 1 月 22 日，第 4 页。

② 沃尔：《卡内基》，第 638—640 页。

得不可开交的残酷竞争的国际市场上生存下来，需要的不是秩序，而是廉价的劳务、低息的资本以及能够拼命驱使员工的管理人员。美国在这三个方面都能提供丰富的资源，因此，它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同时也经受了20年的劳工暴动和大规模的混乱。

如此理解这一代人的优先选择，有助于解释塑造了这个时代的思想特征的两个神话，但不能解释实际的政治、经济与外交状况：自由放任主义和达尔文主义。自由放任的神话，在任何地方（即便是卡内基的苏格兰城堡）都不如南方突出。关于这个时代，C. 范恩·伍德沃德这样写道："自由放任几乎成了南方人爱国主义的试金石。"鉴于南方人对华盛顿强制推行的重建措施心怀不满，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北方人的看法中也有同样的观念，这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1880年，一群商人和教育工作者组织了政治教育协会，目的是反对"政府越来越严重的扩大其权力范围的倾向"。[1] 对这种情绪，卡内基与洛克菲勒无疑会表示赞同。然而，实际情况更复杂。规模最大、资本化程度最高的企业家能够建立自己可靠的资本来源，组织自己的外交使团，以寻找市场，扫除政治障碍，甚至能够雇请自己的防爆力量。不过，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即使是卡内基也不得不设法利用关税政策。美孚石油公司同样如此。在1894年和1897年的关税立法中，国会增加了一些条款，决定对那些歧视美国石油出口的国家采取报复措施。[2]

此前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谢尔曼购银法以及州际商业委员会的相关法律，都有一些精心设置的条文漏洞。这三项立法都是

---

① 伍德沃德：《新南方的由来》，第65—66页；爱德华·C. 柯克兰：《商业社会的梦想与思想（1860—1900）》（伊萨卡，1956年），第132—133页。

② R. W. 海迪与M. E. 海迪：《开创大企业（1882—1911）》，第235页。

政府官员在认真倾听企业代表的意见后制定的。这种利益集团政治的初始形式表明，即便是最有实力的企业，也不得不与政府打交道。

它们通常直接要求政府介入企业的活动，而不是置身事外。较小的企业不仅需要、而且往往主动要求政府进行全面的干涉。全国制造商协会（NAM）成立于1894—1895年间，目的是促进美国的出口，特别是对拉美的出口。它成为代表数百家小企业（它们抱成一团，目的是联手向华盛顿施压）利益的一个主要院外游说集团。不过，即使是那些企业巨头，也需要政府直接干预，美孚石油公司利用美国领事为其打探俄国石油生产信息即是一证。而且，无论小企业还是大企业，都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政府解决金融问题，修建一条巴拿马运河，提升外交级别，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要求动用舰队或兼并边远地区的基地，以便保护它们的商业利益。当有人指责全国制造商协会过分依附于政府时，该组织的回答是，政府毕竟是“人民的公仆”。[①]

要推行一项有效的外交政策需要权力的集中。19世纪晚期的一个明显的悖论是，随着美国社会变得更加无序，联邦政府却变得更加有序和集权化。这种悖论只是一种表象。1873年以后，随着混乱状况的蔓延，企业领导人呼吁（尤其是要求行政部门）采取更有力的行动，逮捕国内的闹事者，并且通过协助企业寻找国外市场来帮助消除动乱的根源。企业与外交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也使得美国政府体制内部的力量平衡开始发生变化。年轻的亨利·亚当斯在考察1870年的美国时就已准确地预见到这些变化：“在美国还只是众多国家中的一名年轻

---

① 艾伯特·K. 斯泰哲沃尔特：《全国制造商协会——组织与政策（1895—1914）》（博士论文，密歇根大学，1953年），第24、32—37、41—42、51—53页。

成员的最初 50 年里，甚至在铁路和电报把美国的社会、经济力量聚集起来使之成为一个过去几代人无法想象的大国之前，某种松散的、各负其责的政府职能分工与该阶段的国家发展状况是适应的……如今，所有迹象都表明一个结论：这种体制已经不合时宜了。”①

思想意识形态也力图跟上变化的步伐。1865 年到 1900 年这个时期，是其他 35 年所无法超越的思想躁动不安的时期，它的一端以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为标志，另一端以詹姆斯和弗洛伊德的作品为代表。美国的“天定命运”仍然是一个响亮的口号，不过如今鼓吹它的是《钢铁时代》这种关心出口贸易的杂志，而不是 19 世纪 40 年代要求吞并整个墨西哥的“青年美国派”扩张主义者。即使是尤利塞斯·S. 格兰特总统，恐怕也曾令法国官员们目瞪口呆，1870 年他在恭贺法国人建立第三共和国时也不忘加上一句：“对于在法国这种伟大的、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传播美国的政治思想，我们不可能毫无兴趣。”② 其他一些人，包括某些平民党人和社会党人以及马克·吐温、西奥多·德莱塞这样的人，对美国的这类思想则未必那么有信心。

不过，有一套观念对许多美国人颇有吸引力。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达尔文的理论在社会经济领域并不十分确切的应用。赫伯特·斯宾塞在其祖国英国帮助普及了这种不无偏差的达尔文主义。从 19 世纪 80 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社会与思想精英的频繁旅行和美英家庭之间的联姻，为斯宾塞等人的思想提供了一个传播网络。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关于社会经济的进化观，对

---

① 亨利·亚当斯：《对话》，《北美评论》，第 41 卷（1870 年 7 月），第 60—62 页。

② 《钢铁时代》，1888 年 8 月 25 日，第 6 页；戈登·伍德：《美国人与革命者》，《纽约书评》，1990 年 9 月 27 日，第 35 页。

美国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地区。美国人在经济方面的成就毕竟比生活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更大，用“适者生存”之类的理论来解释这种成功，似乎可以为大自然对美国人的庇护和某种上天注定的必然性提供佐证。

卡内基是许许多多信奉达尔文主义的人当中的一个。达尔文主义增强了他对进步的信念，使他进一步肯定，他所主张的资本主义秩序是对过去的一种顺乎自然的改良。达尔文主义主张依靠演化而不是诉诸革命，因此对私有财产也是一种巧妙的维护。威斯康星大学的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其雄辩有力、影响巨大的《美国边疆的作用》一文（该文是在1893年经济低迷时期举行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提出的）中，对美国长达400年的成功经历作了解释，认为“〔在边疆地区的〕原始条件下所取得的这种进步，本身就蕴含着进化论者所需要的主题”。达尔文与斯宾塞的学说在美国最著名的传播者是约翰·菲斯克。他在全国各地四处巡游，以一流的口才鼓吹他写的那套三流的历史。在《天定命运》（1885）之类的文章中，他把美国在海外商业上的成功与美国意识形态的传播并进而与和平、特别是欧洲和平的获得直接联系起来：“工业文明对军事文明的胜利将最终彻底实现。”演化式的进步——对菲斯克来说，这与美国的经济优势是一回事——需要这样一场胜利。[①]

然而，一旦历史学家试图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当作一种分析工具使用时，分歧就出现了。艾尔弗雷德·萨耶尔·马汉上校是这个时期美国最著名的海军战略家和历史学家，与菲斯克一样，他也采用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言辞。他反复思考的是美国强大的经

① 罗伯特·麦克洛斯基：《企业时代的美国保守主义》（马萨诸塞州剑桥，1951年），第159—160页；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美国历史上的边疆》（纽约，1947年）；约翰·菲斯克：《从普遍历史的立场看美国的政治观念》（纽约，1885年），第148—151页。

济实力在海外的意义。但他得出的结论恰好相反：经济扩张导致冲突，冲突导致战争（而且，毫不奇怪，按照马汉的说法，因此也就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其他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比如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等人，他们的思想比菲斯克或马汉要严谨一些。他们不喜欢任何“天定命运”之类的鼓噪，因为这会导致战争，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实行领土兼并，维持庞大的海军并且出现一个权力过大的政府，所有这些都是他们所痛恨的。即使是那些喜欢自命为社会达尔文派的人，也常常背离这种没有定形的信仰。例如，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就太过相信自由意志与个人的首创精神，以至于不愿等待或者未必相信演化。当他们两个、菲斯克以及马汉、乔赛亚·斯特朗等人求助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时候，往往是为了掩饰其所倡导的种族主义。这些达尔文主义的推广者尤其得到了一些社会精英的附和，由于血缘和传统的关系，这些社会精英本来就对英国情有独钟，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未来已由上天注定之类的观点，他们是很乐于接受的。至于他们对其他种族或族群是否抱有这样的期望，则几乎无案可稽。菲斯克甚至公开宣称自己是阿尔弗烈德大王的直系后裔。[1]

种族主义以及对进步的信念，在美国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同样根深蒂固。社会达尔文主义给那些不科学、非历史的情绪罩上了一层科学与现代性的光环，那些自称信奉这套行之有效的理论解说的人之所以认为它有用，完全是因为它（通过臆想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统治地位解释为进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某些特定历史阶段）可以将秩序强加于混乱不堪的种族主义之上。1865—1912 年间的时代领袖们需要某种理论依据

① A. T. 马汉：《美国放眼世界》，见《美国的海权利益——现在与未来》（波士顿，1897 年），第 18 页；约翰·海安：《他乡异客》（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1955 年），第 32—33 页。

来为他们所造成的混乱辩解，而这样一个观点——即他们正在使社会进入一个新的、更好的阶段——看来便是他们能够找到的一种较好的解释。[1] 菲斯克在一次公开演说的最后，便宣称美国意识形态的胜利将不可避免，“世界处处是快乐的家园，人们尽情享受永久的和平与安宁”。[2] 这是他提出的关于历史终结论的一个流行版本。不幸的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未来更多地与其历史根源有关，与菲斯克的梦想相距甚远。

① 这个看法出自罗伯特·汉尼甘未发表的论文：《美国对外政策中的种族、社会性别与社会阶级——从 1898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91），版权为作者所有。

② 菲斯克：《美国的政治观念》，第 151—152 页。

第三章 竞逐帝国

美国的人口结构犹如一个马赛克大拼盘，其成分之复杂与美国外交政策所要应付的这个世界的结构颇为相似。在内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间，这种大拼盘的特征非常显著，移民的数量亦十分庞大，因此在19世纪80年代终于出现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在本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旨在排斥移民（这次主要是针对中国人）的立法。排斥移民的做法不仅是因为经济衰退的影响，也与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情绪有关。种族主义不仅排斥某些亚洲人，还导致80—90年代出现许多对亚洲人和美国黑人滥用私刑的行为。在西部，种族主义还与该地区混乱、悲惨的经济状况一道，促使美国军队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印第安人的战争。随着这些战争的结束，通过暴力巩固非印第安人对这个大陆的统治终于取得成功。[1] 但好斗的劳工与愤怒的农民在1890年以后仍将对国内秩序构成威胁。大陆统治地位的巩固，军事力量的训练，对外来移民的矛盾心理，以及最为突出的种族主义，所有这些，不仅是19世纪最后几十年的特征，也是影响和塑造当时和新世纪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些核心要素。

① 内尔·欧文·佩恩特：《善恶大决战——1877—1919的美国》（纽约，1987年），第162页。

一、"把你们那些……挤作一团、渴望呼吸自由的芸芸众生送来"

由于在内战中获胜，联邦的支持者们此时认为，移民将是对美国未来的一种肯定。"欧洲将敞开大门，就像被征服的城市那样"，《芝加哥论坛报》在战争结束时这样写道。"因为仰慕我们的荣耀，钦羡我们完美无缺的和平，欧洲的人民将争先恐后来投奔我们"。最近一个时期的扩张主义也将得到肯定。与此同时，欧洲的人口将大量外流，"流向落基山脉，而且，我们庞大的人口还将继续扩展，跨过太平洋……30年后，我们现有的3000万人口将增至三倍"。[①]

的确，1870—1910年，有近2000万外国人来到美国。其中欧洲人占绝大多数（值得注意的是《芝加哥论坛报》并未说亚洲或者非洲"将敞开大门"），特别是东欧人、德国人、爱尔兰人和英国人。加拿大人（尤其在1880—1883年间）和中国人（1873—1882年间）也大量涌入。移民的流动并非是单向的。1898—1914年间，约有100万美国人离开大平原各州，来到生产小麦的加拿大西部，目的是逃避美国的农业价格和激进的农民政治运动所引起的社会崩溃（许多移民都这样认为）。这类移民是西部经济萧条地区人民大量外流这一浪潮的组成部分。仅19世纪80年代就有500万欧洲人来到美国，90万人移民加拿大，50万人去了巴西。此时限制措施很少，旅行费用较低。这些因素，加上经济状况紊乱，使得美国的社会局面开始发生变化。[②]

蜂拥而至的移民最初似乎再度印证了未来美利坚帝国的天定

① 约翰·海安：《他乡异客》（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1955年），第14页。

② 加布里埃尔·科尔科：《美国现代史上的主要潮流》（纽约，1976年），第28—29页；沃尔特·纽根特：《19世纪末的边疆与帝国》，《西部历史季刊》第20卷（1989年11月），第396页。

命运。“我们是现代世界的罗马人”，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宣称，“是最具同化能力的民族”。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教义的扩张主义者们，也很乐意再次倾听赫伯特·斯宾塞的断言：“生物学上的真理”可以保证美国人是一个伟大的种族，因为他们对移民具有吸引力。对此大西洋两岸的一些怀疑论者却没有这么大的把握。1898 年中期，安德鲁·卡内基强烈要求威廉·麦金莱总统阅读一下英国《旁观者》杂志上的一篇社论。

> 世界的未来〔这是社论的开头〕将主要取决于美国人的政治特性。到 1950 年他们可能有两亿人，并且已经同化，就像他们将同化目前的一大批移民那样，这些移民的出现如今使欧洲大陆人怀疑（除非经过一场重大的海上战争）美国人是否还是英国人，他们的目标……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最为重大的事情。如果受到足够的鼓动，他们将征服任何一个单一的民族，也许只有斯拉夫人可以例外。

问题在于，如何从 1898 年顺利走到 1950 年而不至遇到“困难”，这也包括各个“属地”。[①] 该杂志估计，同化移民看来相当困难，多民族的属地可能太多了。

至于“斯拉夫人”，甚至也大批离开沙皇帝国前往美国，尤其是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因其本人于 1881 年遇刺而中断，一场可怕的反弹（包括大屠杀）随即开始在俄罗斯蔓延之后。1880—1914 年，有 300 多万俄国人来到美国。其中大多数人、特别是犹太人和罗马天主教徒，属于民族或宗教上的少数群体。其中之一是门诺派教徒、极为能干的农民。在把乌克兰变成俄国谷物的主要产地之后，他们被迫离开，因为沙皇在 1871 年硬要他们参

① 海安：《他乡异客》，第 19 23 页；卡内基致麦金莱，1898 年 7 月 27 日，乔治·科特柳文件集，华盛顿国会图书馆。

加军队。有将近两万名门诺派和平主义教徒在美国的大平原地区定居，他们在那里播下了从原先的祖国带来的种子，开始种植冬播小麦，这使该地区、特别是堪萨斯迅速繁荣起来。①

在19世纪80年代末，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能看到移民的这一积极面。目前已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出生于国外，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来自英国或苏格兰以外的国家。于是一些人成立了美国保护协会，目的是鼓吹这样一个观点：已经到了（如果为时未晚的话）限制移民的时候了，因为美国人在人种上已经无法再改良了。而且，人们越来越担心，这些新移民可能不像过去占主流的新教徒移民那样容易被同化，此外还担心他们信奉与欧洲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相类似的公社主义思想。美国劳工联合会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成立的时候，吸收了许多移民，但该组织和其他工会组织逐渐得出一个不无道理的结论，如果更多这样的移民涌进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就不可能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工作条件。美国那些成就非凡的新兴产业与这些组织的看法是一致的，尽管原因并不相同。正如1886年的一份国会报告得出的结论，边疆地区"值得农民安家立业"的最后一英亩土地将很快被"占用"。而且，在经济萧条引起的罢工和骚乱期间，要保证现有的移民能够充分就业并遵纪守法已颇为不易，就更不要说既不懂刑法、更不知卡内基的"剩余法则"为何物的数百万新来者了。《钢铁时代》认为自己是那些发展迅速的产业部门的代言人，它的一篇专栏文章写道，欧洲的"收养所与平民院……正在向大西洋流域倾泻其呕吐的秽物；〔纽约港入口处的〕桑迪胡克岛正在

① 罗伯特·V. 丹尼尔斯：《俄国——对抗的根源》（马萨诸塞州剑桥，1985年），第1—2章；亨利·格拉弗：《美国——辉煌的共和国》（波士顿，1985年），第437页。

变成全球的污水桶”。[1]

诸如此类的反移民情绪，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正在变成孤立主义者。相反，狂热的扩张主义者认为，由种族上更为同一的、信奉新教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构成的美国，最有利于在全球实现自己的天定命运。乔赛亚·斯特朗的《我们的祖国》（1885）一书，是本土主义观念与海外经济文化扩张主义的混合物，结果成为一本畅销书，也是后世的美国人经常引用的对象。詹姆斯·布莱恩是80年代的共和党领袖和狂热的扩张主义者，他不遗余力地反对继续接受“廉价的劳力”，特别是亚洲移民，尽管他计划通过某种泛美运动来确立美国在整个西半球的经济统治地位。不到15年的时间，西华德的反本土主义信念（本国的发展以及奋斗目标，要求所有的人、包括亚洲人都能自由进入美国），很快就成为过去，而不是属于现在或未来。[2]

这个时代以《芝加哥论坛报》宣称“敞开大门”为开端。到了1886年，这个时代开始接近尾声，大门也开始关闭，因为在这一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赠送自由女神像的各种仪式上，演讲人一次也未曾提及埃玛·拉扎勒斯写于1883年的诗句：“把你们那些疲惫不堪，穷愁潦倒，挤作一团，渴望呼吸自由的芸芸众生送来。”相反，却大谈美国自由普及整个世界的辉煌与荣耀。[3]

---

① 莫雷尔·希尔德：《企业界对欧洲移民的态度（1880—1900）》，《经济史杂志》第13卷（1953年夏），第291—304页；《国会纪录》，第49届国会第一次会议（1886年7月31日），第7830—7831页。

② 詹姆斯·G. 布莱恩：《政治争论——立法、外交与民众（1856—1886）》（康涅狄格州诺威奇，1887年），第216—235页。

③ 海安：《他乡异客》，第14、63页。

二、“品格超群、聪明伶俐……的人有权统治他人”

以自由女神像的赠与为开端，美国进入了有史以来和平时期最为暴虐的10年。这种暴虐主要是种族主义引起的，而且集中发生在黑人身上。1896年，在最高法院的许可下，黑人被完全隔离起来。但隔离并不能拯救这个时期数以千计遭受私刑虐待的人。在90年代，美国白人平均每两天半就要对一名美国黑人动用私刑。1892年，私刑多达162例，创下历史纪录。（也有62名白人被暴徒处以私刑。）大约800万黑人被有计划地剥夺了选举和担任公职的权利。乔治·怀特（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人）于1901年离任，他是这个时期最后一位担任国会议员的南部美国黑人，直到安德鲁·杨（乔治亚州民主党人）于1967年当选。杰出的废奴主义者与新闻工作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曾经因其在黑人中的突出成就而受到四位共和党总统的表彰，但他在1891年担任美国驻海地公使时，却因为没有对美国在这个加勒比海黑人国家的帝国主义冒险活动表现出足够的热情，而被本杰明·哈里森总统撤职。在围绕1890年后美国世纪的出现而展开的争论中，实际上根本听不到黑人的声音。①

在19世纪60年代情况却并不是这样，当时的激进派共和党人在南方既试图维护共和党的权力，也尽量设法保证美国黑人的权利。重建的结束以及南方保守的“拯救者”在70年代末重新上台，标志着一个转折。对美国黑人权利的家长式管理在80年代一度风行，但正如亨利·M. 菲尔德牧师在对整个南方作了长

---

① 霍华德·斯米德：《神秘的19世纪80年代》，《华盛顿邮报》1987年11月1日；艾伯特·T. 沃尔威勒编：《本杰明·哈里森与詹姆斯·G. 布莱恩书信集（1882—1893）》（费城，1940年），第81页。

途考察之后所言，在一个普遍笃信自由放任式个人主义的社会，家长制注定要灭亡。当经济萧条、种族主义和白人的政治高压使这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走向种族隔离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的不公正。1880年的人口普查似乎表明，南部黑人的数量比白人增长更快。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说法，如果高出生率是决定哪个种族能够生存下来的关键，那么白人的命运便岌岌可危了。于是他们开始要求进一步实行种族隔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们还要求将黑人送往海外殖民地——这是早先的美国人（从詹姆斯·麦迪逊直至亚伯拉罕·林肯时期）曾认真提出过的一个解决种族问题的办法。由于这些殖民主义者往往是着眼于中美洲和西非，这对美国的对外关系可能产生深刻的影响。不过，1890年和1891年的人口普查又得出结论，就其与白人的比例而言，黑人的数量不是在增长，而是在下降。曾经主持1900年人口普查工作的沃尔特·F. 威尔科克斯得出的结论是：美国黑人将蹈袭印第安人的命运，因为这些“下层人”身上的“疾病、恶习以及彻底的沮丧情绪”，决定了他们在美国的人数还会继续减少。[1] 这种将种族优越论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和令人生疑的统计数据之上的观点，同样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夏威夷、菲律宾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政策产生了影响。

直到1891年11名意大利移民在新奥尔良遭受私刑，并引起意大利政府的强烈抗议之后，国会才提出立法，禁止对外侨动用私刑。除了北方的部分共和党人，很少有人关心美国黑人的命运。种族问题并不限于南方，当然，也不限于私刑问题。就在私

---

① 乔治·弗雷德里克森：《白人心目中的黑人形象（1817－1914）》（纽约，1971年），第208—210、238—240、245—246、251—252、263—264、323—324页。

刑于1905年减少到80例左右的同时，纽约、北卡罗来纳、伊利诺斯州的斯普林菲尔德（林肯的家乡）以及亚特兰大（所谓“新南方”的中心）却相继发生了种族骚乱。在这个背景下，“白人的负担”这一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观念，开始具有白人家长制的特殊内涵，这种家长制如果遭到抵制或者不能奏效，很容易导致使用武力。西奥多·罗斯福此时认为自己是一位仁慈的帝国主义者。就像他在国内问题上欣赏布克·T. 华盛顿和爱德加·加德纳·墨菲的妥协主义种族计划一样，他也倾向于认为，只要假以时日并加以引导，加勒比人和菲律宾人（至少那些在他看来更为优秀的中产阶级或城市居民）也能够逐步迈向文明。如果这种进步不能实现、尤其是以较快的速度实现以适应罗斯福过分急躁的脾性，那么他会赞成使用武力。[1]

种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韧特性是非常突出的。“新南方”的一位主要代言人、亚特兰大的亨利·格雷迪宣称，白人的无上权威，不过表明“品格超群、聪明伶俐、有财有势的人有权统治他人”。这个定义巧妙地把许多贫穷的白人与黑人一道划入了被统治者而不是统治者的行列。[2] 格雷迪的说法还预示了美国人今后用来为其新的对外政策作辩护的某些观点，就像用类似的言辞来解释1860年之前他们消灭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乃是天定命运一样。在对外政策的一些关键地区，“新南方”听起来与旧美国颇为相似。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包装以及南方（以及北方）的工业化进程，并不能掩盖其背后的种族主义传统（以及格雷迪所提示的阶级歧视）。

与美国黑人和印第安人一样，中国移民在种族主义的图景中也被赋予一个特写镜头。在1868年条约允许中国人不受限制自

---

① 同上，第273—275、309页。

② 同上，第203页。

由进入美国之前，在美国的中国人已有约6.3万人，其中5万人集中在加利福尼亚。鞭打、甚至用石头砸死中国人的事件已经时有所闻。当成千上万更多的中国人来美国工作，特别是在铁路建筑业干活时，恰逢突如其来的经济萧条，铁路建设的步伐因此放慢。面对暴力行为和反华情绪的逐步加剧，格兰特政府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但国会在1879年建议采取措施减少中国移民。拉瑟福德·B.海斯总统否决了议案，因为这有悖于1868年条约。1880年签署的一项中美条约允许削减、但并未禁止移民。国会在1882年排华法案中规定，10年内禁止任何中国移民劳工（无论熟练工还是非熟练工）进入美国。1885年，在怀俄明州有28名中国矿工被杀害。加利福尼亚的政客们则刻意利用人们的反东方人情绪来捞取选票。在1888年的斯科特法案中，国会不仅一致同意停止接纳任何中国劳工，而且决定拒绝所有临时离美前往亚洲探亲的移民再度入境。中国公使连续几次来函，强烈抗议该法案破坏了早先签署的条约，但美国国务院却拒绝答复。1892年的吉尔里法案最终决定无限期地禁止中国劳工移民美国。其中的反讽意味非常明显：美国人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要求在中国获得权益，并且得到了这些权利；中国人要求在美国获得某些权益，却遭到拒绝。区别就在于：美国人不仅有自己的一套种族观念和政治信条，而且有炮舰作为后盾来强行推行这套东西。[1]

一些美国人确实对移民政策上的这一历史性倒退和凭借武力优势来推行这种政策的做法提出了抗议。南方纺织厂所在地区的人就对1882年法案和进一步扩大限期的1892年法案表示反对。正如参议员约翰·T.摩根（亚拉巴马州民主党人）所言："如

① 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第2版，纽约，1980年），第35—38页；切斯特·L.巴罗斯：《威廉·M.伊瓦茨》（查佩尔希尔，1941），第380—381页；艾丽斯·泰勒：《詹姆斯·G.布莱恩的对外政策》（明尼阿波利斯，1927年），第10章。

果迫使中国人产生与我们断绝商业关系的想法，将是很不明智的。”不过，他和那些南方厂主一样，此后仍不得不指望通过外交与武力（而不是靠彼此在利益上的协商一致）来保证中国对美国开放市场。马克·吐温的一大批追随者都知道，他不仅谴责对待美国黑人的方式（吐温的夫人说过，如果他能够“认为每个人在被证明为白人之前都属于有色人种”，他的日子会更好过一些），也为加利福尼亚华人的权利辩护。19世纪90年代，美国通过不断征服非白人民族，正在逐步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吐温越来越孤立，也越来越痛苦。马克·吐温的那部亦悲亦喜、苦乐参半的经典小说《哈克贝利·费恩》描述了1882年以后的时代风貌。书中的哈克决定“抢在别人之前拼命奔向那块土地”，他找到了自由，摆脱了文明的桎梏。80年代末，怀俄明州的中国人被残杀，芝加哥警察在1886年秣市骚乱中镇压劳工抗议者等事件发生后，吐温出版了《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佬》一书。书中那位美国发明家——吐温私下说他是一个傻瓜，尽管他在技术方面是一位天才——发现已经不再有开放的“领土”，最后他凭借自己的巧妙部署一举消灭了2.5万名敌人。吐温似乎想告诉人们，第二次工业革命对于它所造成的混乱与对抗，所能提供的恢复秩序的手段是很有限的。[①]

三、“讲英语的民族在……荒芜之地的扩展”

1865—1890年间，美国的军事技术先是造成了秩序的混乱，然后又将毁灭强加给西部的大部分地区。这种毁灭与1899—

① 帕特里克·J. 赫登：《独立与帝国》（伊里诺斯州德科尔布，1982年），第57—58页；马克·吐温：《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佬》（1889年，纽约1960年重印），第302页；R. E. 斯皮尔勒等编：《美国文学史》（纽约，1948年），第932页。

1902年间菲律宾和古巴独立运动所造成的毁灭之间也许并无本质上的联系。或许这种联系只在于其中带有一点反讽意味，或许还在于那些人们很少觉察到的历史原因。不管人们怎样界定这种联系，总之，美国军队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通过摧毁印第安人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抵抗，巩固了白人在整个国家的权力，而且，90年代后期，美国白人以这个大陆帝国为基础，开始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建立新型商业帝国和岛屿属地。一个帝国取得明显的成功几乎立即导致建立另一个帝国的企图。

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华德、格里利、布莱恩以及内战后的其他领导人宣称他们不再需要更多的领土，无疑是在骗人。从60年代直到80年代，为了占领密苏里—阿肯色边界以西印第安人认为属于他们的领土，这些领导人派军队一连打了许多仗。难以对付的墨西哥人和加拿大人摆脱了1865年后美国陆上扩张的“天定命运”，美国土著人则未能幸免。1850年，约有36万土著人生活在密西西比河一带，内战前夕那里的美国白人约有140万。30年后，后者的人数剧增至6倍，达到850万（一些印第安人承认，他们一直不知道当地有这么多的白人）。20世纪最初10年，全美国的印第安人总数不过26万5千人。[①]

帕特丽夏·纳尔逊·利梅里克认为，在这个背景下，“边疆”一词是一个“以盎格鲁人为中心的概念”。这种“特纳学派的历史”导致美国西部那些“复杂的事物被扭曲并变得单调乏味”，“将少数民族……推向价值的边缘”。可以进一步认为，研究1865年后的西部问题，如果不把它与90年代以后的外交政策联系起来考虑——反过来也是一样——同样会使这个时期被扭曲并

① 美国商务部：《美国历史统计数据》（华盛顿，1961年），第9页；佩恩特：《善恶大决战》，第163页；罗伯特·M．阿特利：《印第安人的美国西部边疆（1846—1890）》（阿尔伯克基，1984年），第1、4页。

变得单调乏味。它们之间有许多联系。例如，从法律条文上讲，早期美国的条约文件将印第安人界定为民族，但是到了1835年他们又被视为受华盛顿“管辖和控制”的“臣民”，1898年，最高法院又采取了最后一步，宣布国会可以通过批准新的立法来推翻那些旧条约，这实际上等于给国会开了一张空白支票，可以随时制定法律以便统治这些新的殖民地。正如新教传教士企图“教化”印第安人，使之放弃本土宗教改信基督教一样，传教士们也企图“教化”夏威夷土著人甚至菲律宾土著人（其中许多是罗马天主教徒）。美国官员发现，通过1887道威斯个人所有权法，他们能够迫使印第安人将共有财产所有制改为个人所有制，从而使白人能够从那些处境困难或已经破产的印第安人手中买到数千英亩土地，这就是说，在夏威夷、菲律宾和加勒比海地区推行的土地政策，不仅使美国白人及其政治盟友获得了土地，而且为他们的统治提供了有效手段。内战后的这代人懂得，财产的重新分配或者不分配，都能够创造权力。例如，在瓜分印第安人的土地以满足白人殖民者利益的同时，美国官员拒绝重新分配种植园的土地，从而使南方自由民和自耕农更加自给自足的希望破灭。20世纪[①]后期美国人对重新分配土地（无论是在南部、菲律宾、古巴还是在中美洲）本身所蕴含的巨大权力的高度敏感，是一段有待探究的历史。[②]

特别重要的是，在美国白人看来，1860年后对印第安人的最后几场战争铲除了一个内部敌人。与此同时，华盛顿还使规模不大的美国军队成为世界上最有经验和效率的军队之一。技术在

---

① 原文如此，疑为“19世纪”。——译者

② 帕特丽夏·纳尔逊·利梅里克：《评估小组》，《西部历史季刊》第20卷（1989年8月），第317页。沃尔特·L. 威廉斯：《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和兼并菲律宾问题上的争论……》，《美国历史杂志》第66卷（1980年3月），第810—831页。

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凭借铁路和现代步枪，神枪手或仅仅以杀生为乐的冒险家们有条不紊地射杀了游牧平原上的印第安人所依赖的牛群。[①]

就在国家百年庆典期间，在走向大陆帝国的旅程中出现了一次令人吃惊的曲折。为了防止印第安人骚扰铁路建设者，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将军那支由 260 人组成的第七骑兵队曾经驻扎在平原北部地区。1876 年 6 月 25 日，卡斯特和他的人马在蒙大拿南部的小大角山被 2000 名苏族和夏延族武士围困并歼灭。印第安人使用了 41 种不同类型的火器，包括 16 弹连发步枪。白人原以为这些部落已经接受"文明"秩序，这样一来对这个种族的看法又回到了从前。《芝加哥论坛报》的大字标题写道："可怕！美国印第安人以其恶魔般的残暴而声名大振。"军队要么杀戮，要么迫使印第安人进入保留地，或者允许颇受欢迎的"西大荒演出"利用（如打败卡斯特的胜利者之一"狂马"[②] 之类的）印第安人。这个时期的每一场重大战争，都是因为印第安人不愿被强行赶入受到严密控制的保留地而进行的反抗所引起的。

1886 年，阿帕切族首领杰罗尼姆被迫投降。第二年，印第安人仍控制着 1.87 亿英亩土地。接着道威斯法出台，1889 年，印第安人位于现在的俄克拉荷马州的 300 万英亩土地被开发。到了 1900 年，印第安人控制的土地总面积已只有 780 万英亩。最后一次大屠杀发生在本杰明·哈里森总统撕毁国家条约，向殖民者开放南达科他苏族人土地之前十年。这些饱受疾病和饥饿之苦、濒临毁灭的部落，曾经求助于某些人神灵交的神秘宗教，其

---

① 威廉·T. 哈根：《美国历史上的印第安人》（华盛顿，1971），第 15—17 页。

② 狂马（Crazy Horse，1849？—1877），苏族印第安人奥格拉拉部落首领，曾参加小大角战役（卡斯特在该战役中阵亡）。1877 年被美军打死。——译者

中包括一种宣称能够摆脱白人控制，获得自由的“鬼舞道门”。1890年1月，一支美国军队包围了翁第德尼定居区，当武器偶然走火时，军队立即向营地疯狂射击。146名苏族男人、妇女和儿童被杀害。[①]

卡斯特失败以后，西部的美军曾由纳尔逊·A. 迈尔斯上校率领。1890年，他命令军队前去应付“鬼神舞”事件，造成一场惨剧。迈尔斯的部队对付印第安人最为成功，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趾高气扬的美国军队正是在这批人的率领下与西班牙人对抗。在美国历史上，一支规模较大的美国军队被全部歼灭，曾经发生过三次，而每次对手都是苏族人。但美国军队也因此积累了经验。19世纪80年代末，这2.5万士兵和2000名军官，被英军总司令沃尔斯利勋爵称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人。经过与印第安人数十年激烈对抗的磨练，这支军队纪律严明、训练有素。[②]

这些战争所引起的流血和混乱，说明80年代东部有关西部的宣传——比如有的出版物称之为“世界的花园”——完全是虚假的。对于因气候恶劣、物价过低而被迫背井离乡的二分之一的堪萨斯人来说，它显然不是什么花园。乔治·克鲁克将军是一位与印第安人周旋的斗士，他曾试图描述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是19世纪后期使西部深受其害的流血、动荡与混乱局面。他宣称，“我们在印第安人那里遇到的所有麻烦，十之八九根源在于白人

---

① 罗伯特·M. 阿特利：《鹿皮骑士》（俄克拉荷马州诺曼，1988年），第111—114、171—192页；罗伯特·特伦纳特：《平民党人的形象与美国的印第安人——百年回眸》，《新墨西哥评论》第51卷（1976年7月），第215—229页；《华盛顿邮报》，1986年12月29日。

② 阿特利：《印第安人的美国西部边疆（1846—1890）》，第186页；斯坦利·维斯特尔：《征途》（纽约，1948年），第xi页。

的贪婪——换言之，即追求万能的金钱”。[1]

重新统一后的西部在90年代以后成为扩张主义的一个战场。最著名的西部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认为，向“边远岛屿和邻近国家”扩展“美国的影响力”，“满足这种需要的一个据点”“在阿勒格尼山以西”。对1898年战争的强烈支持，来自平民党激进主义盛行和要求自由铸造银币的西部地区。历史学家指出，在那里，作为上述运动之表现形式的对抗行为，很容易被转化为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的活动。实际上，早在1881年，已经有人将封闭的西部所流行的政治不满情绪与海外扩张的要求联系起来。当时，外交纷争的调解人和贸易专家约翰·卡森公开写道：“我们正在利用本大陆的全部土地。我们的眼光必须转向国外，否则人们很快就会注意到内部的不满。”[2]

没有谁能够比西奥多·罗斯福更好地说明西部与90年代后的扩张主义之间的这种联系了。他的多卷本历史著作《西部的获得》（1889—1896）阐述了美国在陆地上的天定命运，并率先提出了他与其他一些人用来为海外征服作辩解的一些观点。“印第安人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土地所有权……这片辽阔的大陆不可能只是供这些卑鄙肮脏的野蛮人追逐猎物的一块禁地……开发利用这片土地的人当然有权把那些无所作为的人撵出去，不然这个世界就会停滞不前。”1902年，伊莱休·鲁特（他也许是国内最著名的公司律师，后来担任罗斯福的国务卿）就美国何以有权统治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人民作了辩解。他认为，独立宣言只适用

---

① 亨利·纳什·史密斯：《处女地》（纽约，1959年），第215—216页；威尔伯·R. 雅各布斯：《土族美国人历史——它如何说明我们的过去》，《美国历史评论》第80卷（1975年6月），第289页。

②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西部问题》，《大西洋月刊》第88卷（1896年9月），第289页；爱德华·杨格：《约翰·A. 卡森》（爱荷华城，1955年），第295页。

于"高度文明、自治的民族"，对野蛮人或半开化的民族并不适用。他接着说，"无需征得成千上万印第安人（我们的父辈发现他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的同意"，"我们实际上已经在对他们行使主权。"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那些愚昧无知、容易受骗的菲律宾人"。[1]

反对这种观点的人，就像非洲人、中国人和土著美国人一样，属于少数派。曾经带头反对兼并菲律宾的参议员乔治·F.霍尔（马萨诸塞州共和党人）在回忆录中写道：

> 印第安人问题主要并不在于如何教导印第安人更文明地对待盎格鲁—撒克逊人，而在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如何更文明地对待印第安人。中国人问题并不在于怎样把中国人赶出加利福尼亚，而在于如何使对华人的政策不再受国会的控制。同样，对白人的教育工作完成以后，黑人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不过，罗斯福最后是这样说的：

> 讲英语的民族过去300年里在世界荒芜之地的扩展，不仅是世界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大特征，而且，就其意义和影响而言，较之其他所有事件，也是最为深远的。[2]

罗斯福把印第安人过去的土地视为荒芜之地，凭借这个有趣的观点，他用一句话就集中表达了他这一代人关于种族问题、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命运以及扩张主义的美妙与仁慈的观点。1898年以后，美国企图跨越太平洋以获取最遥远的西部这个战利品，罗斯福的《西部的获得》一书，便是这种扩张的开场白。

---

① 威廉斯：《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政策》，第816页；鲁特：《美国对菲律宾的政策》，1902年9月24日。（我要感谢罗伯特·汉尼甘就此文所提供的帮助。）

② 罗伯特·L.贝斯纳：《反对帝国的12个人》（纽约，1968），第160页；西奥多·罗斯福：《西部的获得》（三卷本，纽约，1897年），第1卷，第1页。

第四章“美国将单独控制美洲大陆”

美国与拉美关系中的1865—1912年这个时期，始于国务卿西华德放弃对墨西哥的领土扩张，同时国会拒绝在加勒比—中美洲地区获取立足点（尽管受到单独控制一条巴拿马运河这个数百年梦想的诱惑）。这个时代结束的标志，是美国独自拥有运河并在运河周围设置了防御工事；凭借一个基地网，在政治、经济上控制了加勒比地区；美国海军还占领了尼加拉瓜并准备入侵墨西哥。要理解1823年反对外国干涉拉美事务的门罗主义，如何变成了1912年为美国单独干涉该地区事务作辩护的门罗主义，这些年显然是关键。

同样清楚的是，鉴于80年代以后美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突出地位，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外交政策主要并不是为了寻求秩序与稳定，而是优先强调获得经济机会和战略立足点，以便在此基础上获取更多的机会。这些政策甚至在90年代初就导致了混乱和冲突，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迫使美国当局发展必要的海军力量，以便为其推行新的门罗主义提供支撑。

一、与英国和加拿大的和解

直到19世纪最后10年，英国仍然是西半球的另一个主要强国。英国与加拿大的关系（甚至包括1867年加拿大获得自治领

地位实现自治以后)，加上其无可争议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使之成为美国扩张主义的两大障碍之一。事实证明，另一个主要障碍是拉美国家本身的民族主义。

华盛顿与伦敦的关系在内战期间已经陷入危机。英国不仅承认南部邦联的交战国地位，还允许本国的造船厂为南方建造船只(尤其是建造“亚拉巴马号”)，从而给联邦海军造成严重损害。到了1869年，当尤利塞斯·S. 格兰特总统和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开始调整外交政策时，“亚拉巴马号”索赔案又给英美关系带来了新的危机。格兰特对英国极不信任，这尤其是因为对英国曾站在南方一边记忆犹新。他宣称，如果哪位美国将军不能在30天内征服加拿大，那么就该很不光彩地被解职。菲什在心底没有总统那么大的自信，但其内战前的辉格党同僚西华德和约翰·昆西·亚当斯也是其外交政策上的良师，他们一致认为，美国完全可以乐观地期待这样一个美好未来：加拿大、古巴、墨西哥，或许还有其他一些地区，将会自觉自愿地加入联邦，用亚当斯的名言来说，就像“熟透的苹果”掉到自己的膝盖上一样。不过，影响颇大的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更加直截了当，他在1869—1870年间提出，英国应该立即把加拿大交给美国，以此作为它在内战期间所犯错误的一种补偿。[①]

在其堪称经典的自传《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中，作者回忆道，萨姆纳提出这样的要求，使人“严重怀疑他是否心智健全”。大约40年前，亚当斯的实际反应却并非如此。在1870年的一篇引起广泛注意的文章中，亚当斯只是在策略上有不同看法。亚当斯写道，由于英国的利益主要在亚洲，且由于“它在美洲的属地乃是虚弱的根源”，因此他得出结论，只有通过和解，而不是对抗，才能最快地使加拿大与美国连为一体。亚当斯的文章反映了

① 阿伦·内文斯：《汉密尔顿·菲什》(纽约，1936年)，第216—220页。

1869—1870间美国扩张主义情绪的高涨。南方人强烈要求对古巴和圣多明各采取行动，不少北方人也是如此。在萨姆纳和一些激进派共和党人的领导下，1854年与加拿大签署的互惠贸易条约被成功废除，他们的理论依据是，一旦贸易受到危害，加拿大人便会主动要求与美国合并。与往常一样，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纳撒尼尔·班克斯（马萨诸塞州共和党人）的思路更为开阔。他提出了一项联合决议案，其中宣称，一个独立的加拿大本身就是对门罗主义的"暗中侵害"。1866—1870年间爱尔兰芬尼亚兄弟会对加拿大的多次袭击，进一步鼓励了这种反英情绪。约翰逊总统和格兰特总统都曾试图通过强制实施美国中立法来阻止这类活动，这就使一些政客获得一个绝好的机会来支持芬尼亚运动，争取爱尔兰人选票，并拉拢其他许多不喜欢英国的人。[①]

1869—1870年间，一个向北方扩张的新机会突然出现。当加拿大试图控制里德河地区（位于今天的马尼托巴）时，那里发生了起义。由路易斯·里尔领导的这场所谓的"起义"，得到了格兰特、菲什以及明尼苏达、密歇根等州的美国参议员的积极支持。银行家、投机商兼铁路巨头杰伊·库克为起义提供资金，目的是希望美国能够兼并该地区，从而消除加拿大人建立大陆铁路系统、与他的北太平洋铁路竞争的可能性。与往常一样，西部的催化剂、即土地投机商，鼓励了起义。但是，兼并运动最终归于失败，因为里德河地区的许多罗马天主教徒并不赞成与南方新教徒地区合并的想法。菲什也拒绝了暗中贿赂叛乱领袖以帮助克服这种宗教情绪的建议。加拿大当局派遣了军队，接着又不无耐心地答应给予更多的自治，并许诺修建铁路。1870年底，格兰特

① 亨利·亚当斯：《亨利·亚当斯的教育》（波士顿，1930年），第274页；亨利·亚当斯：《对话》，《北美评论》第40卷（1869年7月），第639—640页；弗雷德·哈维·哈林顿：《好斗的政治家——N. P. 班克斯少将》（费城，1848年），第177—181页。

指示非什不要再考虑通过与英国人谈判来达到兼并加拿大的目的。这个决定标志着一个关键性的转折。随着这个问题的消除，“亚拉巴马号”索赔案也得以妥善解决。[①]

根据1871年的华盛顿条约，英国为“亚拉巴马号”所造成的损害赔偿1550万美元。此外还通过仲裁程序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边界纠纷（温哥华南部的圣胡安群岛成为美国领土），并使美国以550万美元作为回报获得在加拿大海岸附近的捕鱼特权。建立一个美加大陆联邦的想法从未消失过。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两个国家都曾深受经济危机之害，使双方都不得不向对方寻求救助。在80年代，有140万加拿大人——主要来自西部——前往美国寻找工作。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大约同样数量灰心丧气的美国人向北迁移。80年代后期，美加之间在白令海海豹猎捕权问题上产生了尖锐分歧，有人因此建议使用武力，最后英国海军出面干涉，说服美国收回了自己的要求。[②] 迟至1911年，美国国会领导人才又重新接受半个世纪前的观念，即一项贸易互惠条约最终必然迫使加拿大进入他们所设计的政治、经济轨道。同样，（正如海豹猎捕权争端和委内瑞拉边界危机所示）华盛顿条约并未结束美英之间的对抗。但萨姆纳、班克斯及其扩张主义同道们却并未因此安静下来。由于个性和人事方面的原因，萨姆纳甚至与格兰特愤然决裂，格兰特则反过来力图解除这位参议员所担任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一职。由于与英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已经消除，而且也不存在强行兼并新近获得独立但仍旧四分五裂的加拿大的可能性，扩张主义者于是又把目光转向

---

① D. W. 沃纳：《大陆联邦的观念》（肯塔基州：莱克星顿，1960年），第110—127页；威廉·S. 麦菲莱：《格兰特传》（纽约，1981年），第347—348页。

② 罗伯特·克雷格·布朗：《加拿大的国策（1883—1900）》（普林斯顿，1964年），第125—133页。

南方。

二、种族与革命

并非人人都对眼前的事实感到满意。扩张主义的机会似乎很多，但是种族与革命这两大问题，虽然未能减缓美国所设计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兼并北方的步伐，却使格兰特兼并南方的计划搁浅。

1865 年以前，南部种植园主和古巴的克里奥尔人蔗糖巨商始终希望古巴并入美国，认为这样可以使两个国家的奴隶制度都得以维持。然而，随着南方奴隶制的终结，古巴的制度也开始被削弱，尽管直到 1886 年西班牙才将其最后取缔。1868 年，向西班牙宣战的古巴起义者解放了奴隶，并摧毁了克里奥尔人的甘蔗地。种族问题与革命问题一经结合，便形成某种一触即发、极易燃烧的混合物。一些克里奥尔人指望通过美国的兼并来逃避这场灾难。1868—1869 年间，总部设在曼哈顿南部的一个古巴政治集团募集了一百多万美元，用来推动兼并活动。如果古巴即将发生一场革命，两个国家的保守派都会设法操纵，并从中渔利。而如果古巴准备摆脱西班牙的控制，那么格兰特总统和陆军部长约翰・B. 罗林斯便是希望兼并古巴岛的那一大批人的领袖。[1]

国务卿菲什的立场则更为复杂。1855 年访问古巴后，他的结论是，美国在政治上应与古巴保持一定距离。他所考虑的问题远不限于奴隶制问题："我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古巴摆脱其现有的 45 万人口的控制——他们被称作白人，但实际上却是由肤色深浅不等的许多种族构成的一个混合体，并且拥有该岛全部

① 朱尔斯・R. 本杰明：《美国与古巴革命的起源》（普林斯顿，1990 年），第 179—182 页。

土地的所有权。"1869年，国会敦促格兰特承认古巴的交战国地位，而后者也很愿意这样做。菲什阻止了这项行动，他的理由是，这样做会减轻这场冲突给西班牙造成的财产损失，而且，相对于那些种族成分十分复杂的革命者而言，西班牙更容易让人接受。在某种程度上，国务卿仅仅是靠以辞职相要挟才阻止了格兰特及其在国会的盟友。菲什本来也是赞同美国控制古巴的，在这方面他与西华德和亚当斯并无多少差别。不过，他更倾向于帮助古巴以某种代价赢得独立，取消奴隶制度，然后运用美国的金融手段来保护财产利益，控制新政府，并确保其他更具威胁性的大国（比如英国）不会取代迅速衰落的西班牙的地位。菲什希望控制古巴，但不希望美国对该岛承担日常性的义务。历史学家威廉·S. 麦菲莱指出："菲什不希望由那些他甚至与之一起用餐都会感到不舒服的地主所统治的地区成为美国的一部分。而且他不单是对古巴持这种态度，对密西西比地区的〔美国黑人〕也是如此。"菲什得到了一些国会议员的支持，这些议员在种族问题上与之观点一致，而且也反对兼并，因为这可能使美国的甜菜糖生产者受到威胁。1869年底，格兰特公开宣布他不打算承认起义者的交战地位（尽管他今后可能会承认），他还宣布，欧洲殖民者应该承认眼前的事实，让殖民地获得自由。[①]

革命风暴仍在继续蔓延，尽管以共和制取代西班牙君主政体的希望在1873年初有所增长。这种希望只是昙花一现。1868年后的整个起义期间，那些为了寻找刺激、荣耀或机会竭力煽动叛乱的美国冒险家们为起义者提供了武器和人员。1873年11月，西班牙捕获了"弗吉纳斯号"、美国冒险家的一艘船，并迅速处死了53名美国雇佣兵。华盛顿立即出现了战争喧嚣，但格兰特

① 本杰明：《美国与古巴革命的起源》，第17—18页；麦菲莱：《格兰特传》，第297 298页；在此我要感谢詹姆斯·查平为我提供了内阁会议文件。

和菲什都不主张开战。国务卿的政策仍旧一以贯之。他在给马德里的信中说，他并不想立即兼并古巴，只是希望古巴的“地位能够提高，成为一个由自由民构成的、独立的共和国”。菲什显然想过，要获得这种地位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大多数报纸和政治领导人似乎都支持他的立场。突如其来的经济恐慌，新生的西班牙共和国将着手进行自由主义改革这种（未能实现的）希望，“弗吉纳斯号”那次令人郁闷的使命，以及美国这次仅仅因为无法面对更多的种族问题而不愿走向战争，无不说明美国需要自我克制。英国不希望美国控制古巴，它在关键时刻帮助制定了一项和平解决办法。西班牙作了道歉并支付了赔款。危机过去了，但革命并未就此结束。革命一直持续到 1878 年，起义力量在这一年宣告瓦解，部分原因是其内部的阶级、种族和地域方面的分歧和差异。[①]

不过，和平是脆弱的。80 年代，随着古巴奴隶制的正式结束，美国在该岛的利益又迅速上升。许多美国人出钱买下了受到战争摧残的种植园。一些西班牙人和古巴人则试图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以便得到保护。1885 年，国务卿托马斯·F. 贝阿德警告对古巴颇感兴趣的德国：古巴的“形势”“主要是美国人应该关心的问题”。1890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互惠法案，决定向古巴蔗糖提供贸易优惠，为再度设法瓦解西班牙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打下了基础。[②] 1868 年以后，华盛顿官员很少在乎古巴的秩序问

---

① 理查德·H. 布拉德福：《“弗吉纳斯号”事件》（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80 年），尤其见第 129—139 页；内文斯：《汉密尔顿·菲什》，第 615—637、673 页。

② 本杰明：《美国与古巴革命的起源》，第 14 页；查尔斯·C. 坦西尔：《托马斯·F. 贝阿德的对外政策（1885—1897）》（纽约，1940 年）；弗朗西斯科·洛佩兹·塞格雷拉：《古巴——依附性资本主义与欠发达》（哈瓦那，1972 年），第 189—200 页。

题，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使西班牙在承担统治责任的同时，继续向美国投资者开放市场。一点也不奇怪，到了 1895 年，美国官员又面临一场古巴革命。

此外，种族问题既是促使格兰特去进行另一项冒险的刺激因素，也是最终使之归于失败的原因。自 1865 年以来，圣多明各一直是西华德未能争取到手的目标。纽约的银行家和各种投资者（其中一些人与这个加勒比国家的腐败与独裁统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在那里发现了许多十分有利可图的土地、森林和矿山。1869 年，这些美国人说服格兰特总统让其私人秘书奥维尔·巴布科克前去协商一项兼并条约和一项允许美国租借萨马纳湾优良港口的协定。为了确保华盛顿对其统治地位的支持，比尤纳文图拉·贝兹总统愉快地签署了协议，并因此获得 15 万美元。美国还许诺为该政府提供更多资金。格兰特把兼并条约提交给参议院，一方面是希望美国黑人愿意迁往这块新土地，另一方面也是想帮他那些朋友获得一个宝贵的海军基地。在与参议员萨姆纳进行私下会谈之后，总统断定这位马萨诸塞州共和党人将支持这项协议。菲什本来对此毫无热情，但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也许是因为他认为参议院不会批准条约，而且有关的争论还可以转移人们对更容易引起争议的古巴问题的注意力。令格兰特感到很丢脸的是，萨姆纳最后却表示反对该条约，参议院的表决结果则为 28 比 28，离 2/3 多数的要求还差一大截。格兰特始终没有原谅萨姆纳，但总统本人也始终未能摆脱因为支持他那帮腐败堕落的朋友而给自己带来的不良声誉。反对条约的人警告说，兼并、甚至租借，都会使业已困扰美国的种族问题更加复杂化。当人们得知格兰特那些忙碌的代理人也曾与圣多明各的邻国海地黑人共和国就谈判事宜进行接洽时，这类警告来得尤为急迫。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海勒姆·雷维尔斯这样的美国黑人领袖，也曾为这项条约出过力，因为他们希望通过兼并能够使穷困潦倒的圣多

明各人的政治经济处境得到改善。[①]

格兰特的失败引起了许多反响。玛丽亚·蔡尔德（她以其内战前的儿童文学作品和直言不讳地批评奴隶制扩张而知名）抨击了总统的做法，将其喻为“与我们从可怜的墨西哥人手中夺取德克萨斯如出一辙的孪生兄弟。如果我们继续用欺骗手段或武力手段攫取邻国的土地，这个国家将会迅速衰落……直至毁灭。”其他一些人也反对格兰特，但与蔡尔德不同，他们是害怕同“制度和道德准则”与我们皆不相同的“带有印第安和非洲血统的拉美民族”打交道。就在这场争论期间，海地和圣多明各一度发生交火。在没有与国会协商的情况下，格兰特命令美国海军前去保护贝兹总统。高度警觉的参议院指责总统的命令是对国会宣战权的“篡夺”。格兰特被迫退却，国会的特权因此得到尊重，从此开了一个先例，即总统有义务向国会做出解释，30年以后，这种惯例才被威廉·麦金莱和西奥多·罗斯福所破坏。格兰特对圣多明各的行动所引起的非议，甚至导致共和党发生分裂，1872年，出现了一个以霍勒斯·格里利为首的共和党自由派反对势力。尽管如此，格兰特和菲什还是取得了一项历史性的成就：总统在1870年5月宣布，如果美国不能得到圣多明各，其他任何国家也不能拥有它。在重申门罗主义的同时，格兰特还按照菲什所写的讲稿补充说，“同样重要的一条原则是，从今往后，本大陆的任何领土都不得被视为可以向某个欧洲大国转让的对象。”他首

① 麦菲莱：《格兰特传》，第337—353页；埃里克·方莱特：《重建——美国未竟的革命（1863—1877）》（纽约，1988年），第337—353页；内文斯：《汉密尔顿·菲什》，第250—262页；查尔斯·卡兰·坦西尔：《美国与圣多明各》（巴尔的摩，1938年），尤其是第362—407页。

次把这项绝对的“不转让”原则添加到门罗主义的神圣原则之中。[①] 这一警告的矛头所向，主要是那些欧洲帝国主义者，他们对气息奄奄的西班牙帝国早已虎视眈眈。

三、使墨西哥充溢着“崇美精神”

1860 年，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总额为 700 万美元。到了 1890 年，这个数字翻了四番，1900 年，又上升到 6400 万美元。这样的结果，并未得益于 1883 年由当时已经退休的总统尤利塞斯·格兰特谈判签署的互惠条约。在国会，这项条约已经被一个由共和党人中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和民主党内主张低关税政策的人结成的联盟推翻了，尽管他们看上去比较谨慎，只是在格兰特去世后才于 1887 年对该条约施以最后一击。条约的失败显然并未给联系两国经济的贸易纽带造成多大影响。[②]

对墨西哥的投资甚至出现了更显著的增长。19 世纪 70 年代初，对美国在 1848 年夺走其 1/3 的领土仍然余怒未消，且刚刚在 60 年代将法国入侵者驱逐出境的墨西哥人，反对美国投资者在其境内修建铁路或者购买土地。到了 1910 年（此时墨西哥革命已是一触即发），美国人已拥有该国 43%的财产，比墨西哥人掌握的还多。1880 年以来的投资浪潮与革命的爆发有着直接的关联。

法国人于 1866 年退出之后，西华德就预料到会出现一个美

① 爱德华·P. 克拉波尔：《莉迪亚·玛丽亚·蔡尔德》，见爱德华·P. 克拉波尔主编：《妇女与美国对外政策》（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1987 年），第 1—18 页；德克斯特·珀金斯：《门罗主义（1867—1907）》（巴尔的摩，1937 年），第 16、26 页。

② J·弗雷德·里皮：《美国与墨西哥》修订本（纽约，1931 年），第 319 页；麦菲莱：《格兰特传》，第 484—492 页。

国资本和人口大量涌向墨西哥的浪潮。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墨西哥的政治动荡及其对美国影响力的恐惧。稳定局面终于出现，1876年，波菲里奥·迪亚斯通过政变夺取了权力，开始其长达35年的统治。菲什及其后任、拉瑟福德·海斯总统任内（1877—1881）的国务卿威廉·艾弗尔特最初都拒绝承认迪亚斯政权，因为他看来无法偿付墨西哥的金融债务，也无法阻止匪徒对美国边界地区的袭击。1878年，艾弗尔特终于承认了迪亚斯政权，而迪亚斯则在1880年消灭了他的反对势力。艾弗尔特随时准备实现西华德的预言。艾弗尔特毕业于一所专门培养社会精英的学校，而且很有政治和法律头脑。1860年，他曾经带头努力，想把西华德捧上总统宝座，作为安德鲁·约翰逊的司法部长，他一直与西华德这位纽约老朋友关系密切。艾弗尔特深信，“本国的巨大资源需要有个出路”，他强调，“我们应该进入成熟的庄稼地并且开始收割”。在纽约市代尔莫尼克饭店和其他地方的豪华宴会上，他还强调，有必要改进美国的领事制度，以便把投资者和贸易商引向这些收割地。他知道、并且曾公开表示，除了其他帮助，“美国主流商业社会”还需要有驻外领事定期向他们提供有关国外劳务状况、工资和商业习俗方面的报告。1878年，艾弗尔特指示驻各国领事发布这样的定期报告。[①]

与此同时，迪亚斯也派自己的代理人来招揽投资者。他们在这方面极为成功。艾弗尔特在国务院的继任者詹姆斯·G. 布莱恩（1881年接任）也效法西华德，继续推动合作，他向墨西哥保证，美国不再需要土地，只希望能够自由出入，不受任何限制，以便北美人（他们拥有“大量资本积累，”但“他们自己广袤的

---

① 爱德华·克拉波尔：《美国人的美洲》（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1973年），第55—57页；切斯特·巴罗斯：《威廉·M. 艾弗尔特》（查珀尔希尔，1941年），第351—362、375—378页。

资源仍不能为国民充分发挥其经久、旺盛的活力提供足够的空间”）能够开发墨西哥“极少得到开发的资源”。布莱恩强调，如此一来墨西哥就能够“进一步发展为一个秩序井然、繁荣富足的国家”。和平与稳定不仅符合投资者和贸易商的利益，也符合墨西哥的利益。1883 年，《芝加哥论坛报》将墨西哥称为“我们这个生产过剩的文明世界进行市场扩张的一个几乎完全未被利用的去处。”①

美国的铁路营造商便是开拓者之一。60 年代他们就试图铺设铁轨，使之与自己的大陆铁路系统连接起来，但该计划因为人们当时的反美情绪而受挫。不过，1880--1883 年间，美国投资者，其中包括格兰特和杰伊·古尔德，在五个铁路系统中获得 2500 英里的铁轨铺设权。格兰特和古尔德的计划由于前总统于 1884 年破产，同时古尔德对此也失去兴趣而宣告失败。作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和圣菲铁路建设的带头人，这些主要营造商确实已经开始在墨西哥建立一个交通体系。美国人的入侵很快就接踵而至。后一代欧洲人惊呼，美国人的大量商业活动仿佛一夜之间突然在墨西哥出现：农用工具、武器、缝纫机、人寿保险、家具，甚至还有两家北美人办的报纸。特别重要的是，由于墨西哥拥有丰富的矿藏，这个领域的投资急剧增加。80 年代末，出现了第一家小规模的石油公司。到 1888 年为止，矿业投资达 3000 万美元〔包括参议员亨利·特勒（科罗拉多州共和党人）为首的一个集团的投资〕。两年以后，所罗门·古根海姆开始从事利润极高的含银铅冶炼业务。②

---

① 布莱恩的话引自詹姆斯·莫顿·卡拉汉：《美国对墨西哥的政策》（纽约，1932 年），第 494—497 页；米尔顿·普莱瑟：《向外看》（博士论文，罗切斯特，1954 年），第 63—64 页。

② 里皮：《美国与墨西哥》，第 312 页；卡拉汉：《美国对墨西哥的政策》，第 475 507、516--517 页。

早在 1885 年，内战时期的老将军乔治・B. 麦克莱伦就宣称，由于对墨西哥的投资不断增长，有必要重建美国的陆军，以便保护投资者的利益。1888 年，国务卿托马斯・F. 贝阿德（1885—1889 年在任）写道："我国人口和资金大量流入墨西哥，必定会……使这些地区充溢着崇美精神，从而控制他们的政治行为"，但在他们"合格"之前，"我们不需要他们"。1895 年，由于对迪亚斯政权非常满意，墨西哥城的美国人提出请愿书，要求迪亚斯连任总统，继续其独裁统治。美国代办本打算签字批准，但由于精明老练、明察秋毫的第二助理国务卿阿尔维・A. 阿迪表示不允许以这种方式卷入他国政治，这才作罢。同一年，也即经济萧条最低谷期间，《布雷兹特里茨》报道说，"这个冬天在墨西哥寻找土地的美国人足足比去年冬天多了两倍。"历史学家戴维・普莱彻通过考察美国驻马塔莫罗斯（该市靠近格兰德河的入海口）领事沃纳・佩林・萨坦的生平，充分揭示了美国最初的外交行动与这一投资浪潮之间的关系。萨坦遵循艾弗尔特的指示，向华盛顿和商业界提供了大量十分有用的报告，把投资者引向了墨西哥各地。

> 当萨坦于 1878 年到达马塔莫罗斯时，笨重的货物通常用渡船运过河口……，然后用骡拉货车慢慢运往内地。当他于 1893 年离开新拉雷多时，通过圣路易斯〔密苏里〕与墨西哥城之间的铁路，墨西哥沿河城市的经济优势地位正逐渐被未来的工业中心蒙特里所取代。①

普莱彻所强调的经济（以及社会）变迁异常重要。就在萨坦

① 戴维・M. 普莱彻：《沃纳・P. 萨坦领事与迪亚斯统治初期的美墨边境贸易》，《西南历史季刊》第 79 卷（1976 年 4 月），第 373—399 页；普莱瑟：《向外看》，第 61 页。

离任的同时，由于庄园和矿业大企业的发展而被迫离开土地的墨西哥农民，举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抗议活动。墨西哥革命已经迈出了最初的步伐。

在墨西哥南部边境地区，投资浪潮并未停息。在哥斯达黎加很有发展前景的香蕉与咖啡种植地区，美国投资者与当地占主导地位的英国投资者迎头相撞。美国投资者的领军人物是迈纳·基思，他于1871年离开布鲁克林，前去帮助自己的叔父铺设连接内地与大西洋沿岸的铁路。尽管有五千名劳工因为疾病或事故死亡，基思仍然取得了成功。他沿着铁路线向大西洋港口地区出口香蕉，钱赚得很快。他还娶了一位前哥斯达黎加总统的女儿为妻。1883年，他从英国人手中接过了经营特权，并获得80万英亩土地，相当于哥斯达黎加领土的7%。基思所掌握的财产成为联合果品公司的基础。联合果品公司及其子公司很快就控制了矿山、牧场、橡胶种植园、铁路、港口等产业，在某些关键时期还控制了一些国家的政府，特别是在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与墨西哥相似，中美洲即便尚未进入革命时期，也正在步入一个动荡不安的战争时期。国务卿布莱恩和贝阿德在80年代就已采用直接威胁的方式（例如贝阿德就曾派出由艾尔弗雷德·萨耶尔·马汉率领的一艘军舰），来保护受到中美洲人之间的战争和该地区的反美情绪威胁的美国财产。[①]

作为第三者的欧洲人，也影响了该地区事态的发展。长期以来，英国人在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一直是一股重要力量。80年代，德国人在哥斯达黎加的咖啡出口业方面仅次于英国，而且正在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逐渐占据主导地

① 《编者前言》，见马克·埃代尔曼与乔安妮·凯南主编：《哥斯达黎加读本》（纽约，1989年），第55页；托马斯·P. 麦卡恩：《一家美国公司》（纽约，1976年），第15—30页。

位。德国利益的扩张非常迅速，以至于在70年代柏林就曾向尼加拉瓜派出一支六艘军舰组成的舰队，目的是保护德国投资者并索取一笔赔款。80年代初，德国驻该地区的公使就对他周围的政治趋势作了推断，并指责美国对该地区抱有帝国图谋。这种说法是有预谋的。奥托·冯·俾斯麦这位以其政策一手造就现代德国的"铁血宰相"，从80年代起开始在中美洲寻求海军基地和殖民地。美国的反应是坚决反对，俾斯麦只好退缩。但退缩仅仅是一种策略。90年代，德国的经济与战略利益再度膨胀，尤其是在大西洋沿岸一线，德国人在这些地区建立了交通网络，目的是为其对世界市场日益增长的出口提供便利。以布莱恩为首的华盛顿官员在80年代积极推动泛美运动，便是针对美国工业化经济所需要的市场和原料以及美国在拉美地区的领导地位受到挑战所做出的反应。[①]

四、争取一条运河

1870年，按照菲什的要求，所有美国驻拉美领事和公使都必须就美国在西半球的贸易状况提交详细报告。这是首次试图对贸易问题进行系统分析，最后一组报告强调了欧洲竞争者的各种优势。除了其他一些结论，报告还指出，必须在巴拿马地峡拥有一条运河，这将有助于动摇英国在拉美太平洋沿岸地区的贸易统治地位。[②] 西华德曾试图签署一项条约，使美国获得一条自己单独控制的通道，但未能如愿。在此后的20年里，以艾弗尔特和

① 托马斯·斯孔奥尔：《美国对中美洲的政策（1860—1911）》（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1991年），第4—9、43—45、61、79—93、105—151、168—170页。

② 戴维·M. 普莱彻：《19世纪70年代初的美洲国家间贸易——国务院的一项调查》，《美洲》第33卷（1977年4月），第607页。

布莱恩为首的华盛顿官员创下了纪录和先例，最终废除了1850年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签署了海约翰—庞斯富特条约，使北美人获得一条运河的控制权。

艾弗尔特在60年代曾与西华德一道竭力怂恿投资者为运河工程投资。作为国务卿，他在1878年还警告欧洲人不要为了索取债务而干涉中美洲——这为1904年对门罗主义的引申、即导致美国充当西半球警察的“罗斯福推论”创下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先例。不过，当曾经负责营造苏伊士运河的费迪南·德·雷赛于1879年宣布他的法国公司将建造一条巴拿马运河时，美国的运河计划便陷入危机。艾弗尔特和海斯发出了警告，用总统的话说，“美国应该控制这条交通要道。”海斯还指出，不仅是门罗主义，“我们的繁荣与安全”也要求“我们必须信奉如下座右铭：要么有一条美国人的运河，要么根本没有运河。”1880年，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他向尼加拉瓜和巴拿马海岸派出了两艘军舰。[①]

布莱恩接着在1881年采取了一个主要步骤，他告诉英国人，1850年条约必须按照美国的具体要求加以修改。他争辩说，特别是由于美国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发展，美国如今在这个地区拥有最大的利益，这些利益的“范围是帝国般的”，美国日益增长的出口贸易需要便利的交通线。布莱恩还告知英国政府，“英国如果与美国作对，永远都是错的。”这样的论调，加上他在竞选中为了争取爱尔兰人的选票，老是出言不逊，屡屡冒犯英国人，最终使他在英国首相府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就算没有这些竞选言辞，布莱恩也能够预料到结果。他在国务院的继承人弗雷德里克·T. 弗里林海森干脆不理睬1850年协议，于1884年径直与

---

① 拉瑟福德·海斯：《日记与书信》（查尔斯·理查德·威廉斯主编，五卷本，俄亥俄州哥伦布，1924年），第3卷，第583—589页。

尼加拉瓜签署了赋予美国运河独占权的弗里林海森—扎瓦拉条约。参议院的表决结果是 32 比 23，未能达到批准所必须的 2/3 多数。不过，多数人赞成，加上高度一致的党派立场（共和党人强烈支持该条约），说明 1850 年所作的承诺，寿命已屈指可数。正如 1882 年安德鲁·卡内基在给布莱恩的信中所言："你完全正确。美国将控制这个大陆的任何事务、所有事务。这已成定论……不会有任何共同安排，不会与实行君主制、具有战争倾向的欧洲有任何纠缠不清的同盟关系。美国将单独控制美洲大陆。"[①]

由于热带疾病的困扰，加上缺乏充分的技术条件来降低成本、完成巴拿马运河工程，德·雷赛在 80 年代宣告破产。美国官员从未停止施加压力。几任总统以及亚拉巴马州参议员约翰·T. 摩根率领的国会都在不断提出警告，正如本杰明·哈里森总统在 1891 年所言："巴拿马运河如今已是直接关涉美国商业发展与进步的最为重要的东西。"不仅如此，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美国海军在 1846—1903 年间对巴拿马的干涉至少有七次。1886 年，美国军舰镇压了一场革命，从而为美国商品持续不断地顺利通过巴拿马地峡提供了保障。[②] 17 年后，美国帮助引发了一场起义，并利用革命所导致的混乱局势来获取土地，开凿运河。

五、与革命互为因果

除了哥伦比亚的巴拿马省，拉美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动荡。智

---

① 艾丽斯·泰勒：《詹姆斯·G. 布莱恩的对外政策》（明尼阿波利斯，1927 年），第 32—45 页；卡内基致布莱恩，1882 年 1 月 14 日，詹姆斯·G. 布莱恩文件集，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戴维·普莱彻：《困难的岁月》（密苏里州哥伦比亚，1962 年），第 1 4 页。

② 普莱彻：《困难的岁月》，第 105 页；詹姆斯·D. 理查森：《总统咨文与文件汇编（1789—1897）》，10 卷本（华盛顿，1900 年），第 9 卷，第 188—189 页。

利与秘鲁之间于 1879 年爆发并一直持续到 1883 年的所谓太平洋战争，使美国当局感到特别忧虑。战争的起因是双方由来已久的对抗、对太平洋沿海口岸的竞争和鸟粪场的争夺。不过，在布莱恩看来，更值得关注的是英国在智利的贸易优势和它对智利的有力支持。最重要的是，他和弗里林海森都希望尽可能使欧洲列强置身事外。布莱恩在 1881 年断定，要达到这一目的，确立美国在西半球的商业统治地位，必须阻止战争，以免欧洲人从中渔利。[①] 他认为，和平是美国商业活动的先决条件，至少在美国自身拥有足够实力来制约或者利用战争局势之前是如此。

因此，布莱恩向拉美国家发出邀请，要求在华盛顿举行一次历史性的会议，讨论有关问题。1881 年詹姆斯·加菲尔德总统去世以后，布莱恩离开了国务院，会议因此没有开成。但其他人，包括贝阿德和国会两党中的一些议员以及卡内基等商界巨头，对这样的会议仍有兴趣。就在布莱恩于 1889 年重返国务院之前，贝阿德又发出了新的邀请。第一次泛美会议实际上是西半球国家间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尽管布莱恩的预期目标并未完全实现。19 世纪 20 年代，亨利·克莱曾用“睦邻”一词来形容对待美洲的正确方式，而据布莱恩的一位朋友所知，在拉美政策上，“他〔布莱恩〕把亨利·克莱视为与这一主题有关的若干思想的创始人”。在 1889—1890 年举行的美洲国家会议上，睦邻政策取得了成效：会议达成一项帮助解决纷争的仲裁协定；提出一项建议，即修建一条连接南北美洲的铁路；建立了美洲共和国商务局（也即后来人们所说的泛美联盟）。会议否决了建立一种通用银币的想法。南美代表认为，鉴于美国的关税政策及其与欧洲经济的

① 亨利·奥康纳：《布莱恩任国务卿的九个月》（1888 年），亨利·奥康纳文件集，圣母大学，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詹姆斯·G. 布莱恩：《政治争论——立法、外交与公众（1856—1886）》（康涅狄格州诺威奇，1887 年），第 411—419、425—426 页。

传统联系，在西半球建立一个共同市场是不可能的。[1]

尤其重要的是，经过这场关税联合问题上的斗争之后，布莱恩决意要使1861年后的高关税制度顺应90年代的经济现实。这个现实就是：美国制造的工业产品大量过剩，而南方便是天然的市场。以英国人和德国人为首的欧洲人正在抢夺这些市场。由于美国经济对拉美原料的依赖，结果出现贸易逆差（作为支付代价，还出现资金外流）。布莱恩并非坐井观天的井底之蛙。作为一名精明老到、手腕泼辣的幕后策划大师和政治演说家，这位“来自缅因州的缀羽骑士”与西华德一样，有自己的一整套世界观。（在研究问题时，他甚至常常一边转动地球仪，一边思索世界的未来，并以此为乐。）年仅18岁，布莱恩就在西部军事学院讲授维吉尔、西塞罗和数学。他在国会任职17年，其中7年是强有力的众议院议长。作为188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深知工业革命的意义。而且，1888年他在角逐候选人提名时似乎也曾遥遥领先，由于布莱恩身体欠佳，加上越来越多的对头为内战英雄本杰明·哈里森助阵，结果哈里森获得提名并当选总统。他们彼此都不信任对方，不过哈里森很敬重布莱恩的能力和远见。在邀请这位“缀羽骑士”出任国务卿时，当选总统写道：“我对改善我们与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的关系特别感兴趣。”1886年，布莱恩也简要概括了自己在这方面的看法：

> 我们所需要的，是我们的南方邻国的市场。我们希望得到目前落入英国、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手中的那笔每年四亿美元的收入。如果这些市场得到保障，我们的制造业将产生新的活力，西部农民的产品便有了销

[1] 阿希尔·维亚拉特：《美国与泛美主义》，《两个世界评论》第51卷（1909年），第420—422页；克劳福德致巴克，1893年2月2日，沃顿·巴克文件集，华盛顿国会图书馆。

路，罢工的理由和诱因以及与之相伴相生的各种弊端将通通消失。[①]

经济互惠问题已成为他们两个人共同关注的焦点。

布莱恩对自由放任的幻想颇不耐烦。他知道，贸易的流通并非仅仅因为"在生产成本上能够做到与另一国同样低"，而是靠"条约所确立的特殊贸易关系"。实力的决定因素是政治策略（包括关税政策和内战时期那些使工业化进程得以加速发展的重商主义法令），而不是某种臆想的、开放的市场。一位记者评论说，"布莱恩有一种大胆的想法：水可以往高处流。与此同理，也可以设法改变贸易潮流的自然流向。"80年代初，美国与拉美国家缔结了六项带有互惠条款的条约。关于是否恢复1854年与加拿大的互惠协定的争论也在进行当中。但1890年的麦金莱税则（其中含有布莱恩—哈里森所主张的互惠条款）却有所不同。[②]

麦金莱税则率先提出了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美国贸易政策所坚持的一项核心原则：如果其他国家降低美国商品（尤其是工业产品和主要农产品）的进口税，总统也有权降低外国商品（尤其是原料）的进口税。该法案是一件精心设计的钝器：食糖、糖蜜、咖啡、茶叶、皮革等五种主要商品将被允许免税，但如果生产此类产品的国家不愿做出相应的回报，即允许美国商品享受优惠税率，哈里森就可以对那些不愿顺从的国家的上述五种出口商品课以重税。在1890年华盛顿那个炎热的夏天，身体欠佳的布莱恩在巴港呼吸海风，哈里森则着手完成了主要的政治工作——

① 布莱恩的话引自克拉波尔：《美国人的美洲》，第166—167页；汤姆·E. 泰里尔：《关税、政治与美国对外政策（1874—1901）》（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1973年），第42—49页；奥托·朱·斯托尔伯格—沃尼盖罗德：《俾斯麦时代的德美关系》（宾夕法尼亚州里丁，1937年），第169—170页。

② 阿瑟·华莱士·邓恩：《从哈里森到哈丁》（纽约，1922年），第45页。

推动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共和党人主导的国会通过这项法案。[①]

经济史家曾断言，这项立法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因为仅同11个国家签署了条约，而且，主张全面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民主党人在1894年废除了其中的互惠条款。不过，这是一种目光短浅的判断。正如布莱恩和哈里森所期望的，这些条约在美国与所有五个中美洲国家之间，美国与巴西之间，美国与西班牙和英国的美洲殖民地之间创造了许多新的、重要的贸易机会（还有什么比这更有利于使古巴、波多黎各、牙买加等殖民地疏远其宗主国呢）。尤其重要的是，哈里森把条约当作胁迫德国人的大棒。1879年，德国人为了保护本国农民的利益，开始禁止美国猪肉进口，理由是猪肉有旋毛虫病。接着柏林还向其他欧洲国家施压，要求它们仿效自己的做法。大约12亿磅美国猪肉的出口突然受到威胁。华盛顿的抗议基本上不被理睬，直到1891年哈里森威胁说要对德国数量巨大的甜菜糖出口征收禁止性关税，柏林的态度才有所缓和。哈里森改进了美国猪肉出口的检验措施，同时，按照哈里森的要求，德国降低了除猪肉以外的美国商品的进口税。当哥伦比亚、海地和委内瑞拉拒绝合作时，哈里森同样对其出口采取了惩罚措施。[②]

布莱恩已经开始谈论和平与秩序的必要性。哈里森正在完善布莱恩的睦邻政策，采取的办法是，向不愿合作的国家发出经济战的威胁或者运用经济战来夺取那些梦寐以求的目标。在布莱恩和哈里森眼里，加拿大就是其中一个最大的目标。他们希望兼并加拿大，但必须在加拿大主动提出加入联邦之后才能兼并。贸易互惠似乎是一种万无一失的政策：如果加拿大签署这样一项贸易

---

① 霍默·E.索科洛夫斯基与阿伦·B.斯贝特：《本杰明·哈里森总统执政时期》（堪萨斯州劳伦斯，1987年），第113—120页。

② 同上，第131 135页；詹姆斯·L.劳林与H.帕克·威利斯：《经济互惠》（纽约，1903年），第212—215页、第7章。

条约，它就会逐步与美国联为一体。如果它不愿签署，许多依赖美国市场的加拿大人（布莱恩和哈里森与这些人保持着密切联系）就会要求按华盛顿的条件缔结一项条约，或者干脆要求合并。加拿大最重要的财政专家亚历山大·高尔特爵士声称，1890年的美国关税法，目的是想迫使加拿大割断与英国的“殖民地关系”，他进而宣称，这是“一项敌对措施，是一场商业战。”高尔特是对的。布莱恩甚至劝哈里森不要再考虑与加拿大缔结互惠条约，因为不可能搞出一个让美国满意的条约。他还补充说，加拿大以后会“发现自己困难重重，最终会……寻求加入联邦”。但布莱恩错了。1892年，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加拿大的保守派战胜了自由派大陆主义者，转而加强与英国的联系。美国官员在这场斗争中失败了。[①]

不过，在夏威夷、最后还有古巴问题上的斗争，他们获得了显著的成功。哈里森与西班牙签署了一项允许古巴蔗糖进入美国的互惠条约，这项成果迅速给两个地方带来致命影响。其中一个是卡内基所说的古巴。卡内基对古巴面临的混乱局面颇为得意，他指出，古巴岛的“各个阶层”都陷入了一场向美国出售产品的“喧嚣”之中，这位钢铁大王还断言，古巴“将给西班牙造成严重的麻烦和威胁”。事实上，1894年的关税政策中止互惠条款，取消对古巴蔗糖进入美国市场的优惠政策之后，古巴岛迅速出现革命形势。1893年夏威夷的起义恰恰是因为1890年的立法使古巴蔗糖在美国市场取代了夏威夷的产品。在美国水兵的协助下，

① E·法勒致J. W. 福斯特，1892年4月14日，本杰明·哈里森文件集，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泰勒：《詹姆斯·G. 布莱恩的对外政策》，第347页；A. T. 沃尔威勒：《本杰明·哈里森与詹姆斯·G. 布莱恩书信集（1882—1889）》（费城，1940年），第193—194页。

白人种植园主废黜了夏威夷君主，要求并入美国并进入大陆市场。[1] 美国人对混乱局势的寻求和利用取得了丰厚的回报。

与布莱恩1881年的断言正好相反，美国在西半球（以及夏威夷）的政策，其首要原则并非和平与稳定，而是制定和创造相关的政策与制度，使美国能够拥有新的市场、经济优势以及——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古巴、夏威夷和加拿大。革命未必是件坏事；秩序未必就更可取。

六、智利、海地以及海军的必要性

在批准麦金莱税则的同一年，国会还决定拨款建造首批三艘现代战舰。加勒比海、太平洋甚至非洲地区日益增长的需要和职业军队的要求，使这些战舰最终被投入使用。1891年智利发生的一场危机进一步证明，有必要建立一支新型舰队，也需要有基地作为燃料补给站和休息地点。

80年代初，智利与美国之间出现了敌意。在与秘鲁进行的所谓太平洋战争期间，智利企图占领有争议的领土，而试图充当调停者的美国则偏向于秘鲁。1886年，智利的何塞·曼纽尔·巴尔马塞达政府进一步向华盛顿靠拢，与占主导地位的英国势力拉开距离，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两国贸易关系得到改善，美国投资者进入了智利的硝石业和航运业。1891年反对巴尔马塞达的起义爆发后，布莱恩支持智利政府，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公使帕特里克·埃根认为这次起义有亲英色彩。埃根是"布莱恩的爱尔兰人"当中的一个，他懂得美国政治，但并不懂拉美外交，总以为英国的阴谋昭然若揭，尽管有时候根本不存在什么阴谋。1891

① 索科洛夫斯基与斯贝特：《本杰明·哈里森总统执政时期》，第121页；布莱恩致哈里森，1891年1月，哈里森文件集。

年5—6月，美国试图扣押从加利福尼亚往智利运送武器的叛军船只“伊塔塔号”，但结果适得其反，因为巴尔马塞达政权被推翻，同时美国的法庭裁定该船并未违反国际法。令哈里森极为反感的是，美国必须赔偿因扣押该船所造成的损失。智利的反美情绪不断蔓延，直至1891年10月圣地亚哥一个酒吧间发生一场斗殴，使美国水手2人丧生，17名受重伤。随着哈里森的要求越来越严厉，而且智利新政权对民众的反美情绪也越来越敏感，出现了战争的危险。布莱恩最后使哈里森缓和了立场。当总统下令海军做好行动准备时，他也意识到美国的舰队不如智利的强大。所幸的是，智利在1892年作了道歉，危机也就过去了。[①]

由于上述危机和美国贸易的迅速发展，要求建立新型海军和船舶基地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已经引起了哈里森和布莱恩的注意。在就职演说中，总统就指出，美国的利益已不再“完全限于美国”，美国在国外的利益和公民也应得到保护。“我们的海军需要有合适的加煤基地、码头和海港特权。”1891年，他对一位朋友说，欧洲和非洲的基地没有必要，但“在西印度群岛、太平洋岛屿和南美拥有这样的基地非常重要”。[②]

海地出现了一次机会。那里发生一场革命，使国家分裂为两派：亲美的北方派和欧洲利益集团支持的南方派。海波利特为首的北方集团最后获胜。根据哈里森的指示，美国公使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要求新政府允许华盛顿租借莫勒圣尼古拉的良港，以示对美国的谢意。与此同时，美国控制的克莱德轮船公司要求

① 乔伊斯·S. 戈尔德伯格：《“巴尔的摩号”事件》(内布拉斯加州林肯，1986年)，第1—19、43-48页；克拉波尔：《美国人的美洲》，第180—183页；调查局给斯莱的报告，1891年10月19日，国家档案—海军档案—档案分类45，第9区，第16盒，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② 理查森：《总统咨文与文件汇编（1789—1897)》，第9卷，第10页；哈里森致里德，1891年10月21日，哈里森文件集。

海地向其提供最佳航线和 48 万美元的补贴。道格拉斯报告说，海地人拒绝租借领土，也不愿答应克莱德公司的要求。布莱恩派海军少将班克罗夫特·盖拉迪前去施压。这位海军少将抱怨说，道格拉斯对海地的担忧过于敏感，需要一位“能干、有魄力、敢做敢为的白人”去与海地会谈。1891 年，道格拉斯被召回。但即使是盖拉迪这样一位咄咄逼人的白人，也无法使海地改变立场。[1]

与他们之前的西华德一样，哈里森和布莱恩也未能在加勒比海取得他们想要的基地。不过，他们的确通过了一项互惠法案和一项建造战舰的措施，这些都有助于 1897 年以后帝国的建立。1898 年后行政部门所拥有的那种权力（通过彻底削弱国会从 1865 年到 90 年代一直享有的对外政策主导地位，使宪法所规定的制衡原则发生转变），在他们这里也已初露端倪。哈里森有权就互惠条约问题进行谈判就是一个迹象。智利危机表明，行政部门无需与国会充分协商，就能够利用某个事件把国家引向战争。此外，在 19 世纪 80 年代，总统领导下的现代情报系统开始运行，此时出现了军事情报部[2]，海军还向情报局[3]指派了四名官员，负责监视全球事务。1889 年，国会在驻外机构中设立了陆海军武官制度。与此同时，最高法院在关于尼格尔一案（这个案子与对外事务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裁决中宣布，总统的权力并不限于实现国会的愿望，还应包括履行“从宪法本身、我们的国际关系以及立宪政体的性质所隐含的所有保障措施中所派生出来

① 雷福德·W. 洛根：《美国与海地的外交关系（1776—1891）》（查佩尔希尔，1941 年），第 427—457；索科洛夫斯基与斯贝特：《本杰明·哈里森总统执政时期》，第 126—128 页。

② 原文为 Military Information Division。——译者

③ 原文为 The Office of Intelligence。——译者

的各种权利、义务和责任”。[1] 1890年的这一表述预示了1898年后总统所拥有的那种近乎无限的权力，正如1865—1893年间美国在墨西哥、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的政策预示并帮助引发了1898年后的动荡甚至革命一样。

---

① 小莱曼·B. 柯克帕特里克：《情报与反情报》，见亚历山大·德康德主编：《美国对外政策百科全书》（三卷本，纽约，1978年），第2卷，第418—419页；沃尔特·拉夫伯指出了其中的含义，见拉夫伯：《前进中的雄狮》，《宪法杂志》3（1991年春—夏），第14—23页。

第五章 横越大洋

几乎在成为一个独立民族之初，美国人就没把海洋视为抵御欧洲的腐败和军事入侵的屏障，而是当作通往欧亚市场和西非殖民地的交通要道。在18世纪80年代，与一个世纪以后一样，国内经济萧条的严峻形势和海外利润（以及殖民地）的诱惑，使商人纷纷前往国外。到19世纪30年代，在几届美国总统及其政府的协助下，包括白人和黑人两个种族在内的殖民地开拓者们，已经在利比里亚为获得自由的美国黑人奴隶建立了一个殖民地。10年以后，同样部分受1837—1841年经济萧条的驱使，美国官员与中国签署了第一项条约。在接下来的50年代，美国人派马修·佩里前去打开日本的门户，以便满足美国的利益——包括世俗利益和宗教利益。1865年以后，美国迅速成为争夺中国满清王朝遗产的六个大国之一，而且，尽管获胜的把握不大，它一度甚至参与了抢掠非洲财富的殖民主义大角逐。

一、非洲、卡森与美国黑人

1870年，《纽约先驱报》派亨利·M. 斯坦利去非洲腹地寻找据信已经失踪的传教士戴维·利文斯顿，非洲一下子引起了美国人（以及世界各地许多人）的注意。斯坦利的所谓问候语，“您就是利文斯顿博士吧?”一时家喻户晓。但当时人们更感兴趣

的，是斯坦利在刚果发现的丰富矿物资源。1878 年，罗伯特·舒费尔特，美国最重要的探险家之一，曾沿着西非海岸一路航行，并进入其中几条河流。舒费尔特深信，该地区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目标”，因此他恢复了与利比里亚的联系，在非洲大陆东边的马达加斯加（该岛收益颇丰的贸易一度为美国商人所控制）获得一个加煤站的使用权，并与非洲的一些首领签署了贸易条约。在给国内的报告中，舒费尔特对国务卿威廉·艾弗尔特说，美国应该在非洲沿海地带建立领事机构（这个想法很合艾弗尔特的心意），特别重要的是，既然“我们必须记住，原有市场的商品已经供应过剩”，就必须“抓紧时机”去分享“旧大陆惟一未被占领的市场……人口众多的非洲的处女地”。[1]

19 世纪 70 年代末以前，由于被重建问题和劳工动乱分散了注意力，美国官员对非洲事务一直没有多大兴趣。1874 年，美国驻土耳其公使乔治·H. 波克竭力怂恿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吞并曼德角——它控制着位于苏伊士运河与印度洋之间的红海的战略入口。如果菲什采取了这一步骤的话，1945 年以后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地位将非常突出。但菲什却回答说，要购买该地区，除非先买下另一个更重要的地方：“月亮背面某个可以建立天文台的场所”。对于舒费尔特的非洲之旅则不大可能这样挖苦。纽约的一个商业团体主动找上门来，就建立一条泛非铁路的可能性请求华盛顿官员的协助。在 1883 年的年度咨文中，切斯特·A. 阿瑟总统宣称，美国应该就开发刚果进行经济合作，但应避免政治上的牵连。1884 年，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威廉·P. 蒂斯代尔作为特别代理商，开始把美国商品输入刚果，并在那里寻找商业

① 罗伯特·L. 贝斯纳：《从旧外交到新外交》（第 2 版，伊里诺斯州阿林顿海茨，1986 年），第 64 页；戴维·普莱切：《困难的岁月》（密苏里州哥伦比亚，1962 年），第 7 章。

机会。在参议院，约翰·T. 摩根（亚拉巴马州民主党人）领导了一场斗争，要求确保美国人能够自由进入刚果并使进入刚果盆地的美国人得到保护。1884 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非洲国际协会在刚果开始了历史上最反动、最残酷的一个殖民统治时期。摩根企图让美国支持利奥波德。在这位亚拉巴马参议员看来，非洲不仅是萧条的南方纺织企业的一个巨型出口市场，而且是他那个地区获得自由的美国黑人的一个出路。摩根希望利用刚果来解决国内的种族问题，同时通过与被放逐的美国黑人达成妥协来缓解国内的经济动荡。[①]

美国驻奥地利—匈牙利公使约翰·卡森对摩根和阿瑟的支持至为关键。对于欧洲列强为了控制一些潜在的殖民地而展开的斗争，卡森有深刻的认识。仅以 90 年代初为例，英国进行了阿富汗战争，占领了埃及和苏丹，并在非洲整个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建立了若干保护国。法国夺取了塔希提岛并将统治范围扩展到东南亚部分地区。德国占领了多哥和西南非洲，并进而向桑给巴尔、坦噶尼喀和萨摩亚群岛扩张。列强的扩张正在进入高潮——1870—1900 年间它们一共控制了 1000 万平方英里土地（约占世界土地总面积的 1/5）和 1.5 亿人口。

卡森是利用自己身处旧大陆的有利地位使国内公众了解欧洲事务的许多颇有影响的美国人之一。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读者众多的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和伊迪斯·沃顿开创了具有国际视野的小说题材。甚至以讲述加利福尼亚边疆故事而知名的布雷特·哈特，也于 1878 年去了欧洲，成为美国公使，并定居伦敦，再

① 罗伯特·L. 贝斯纳：《谁丢失了曼德海峡?》《华盛顿邮报》，“观点”栏，1979 年 3 月 4 日；约瑟夫·A. 弗赖：《约翰·泰勒·摩根的南方扩张主义》，《外交史》第 9 卷（1985 年秋），第 329 -346；奥托·朱·斯托尔伯格—沃尼盖罗德：《俾斯麦时代的德美关系》（宾夕法尼亚州里丁，1937 年），第 204 页。

也没有回到美国。借助文学所建立的这种联系，还因为大西洋两岸的通婚以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罗斯福、洛奇、亚当斯、海约翰便是其中最有名的几位）前往欧洲游历而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讲述旅行见闻的书籍，特别是詹姆斯和马克·吐温的著作，非常受欢迎。这个时代的特色，是美国人与欧洲人之间越来越频繁地交流彼此的观点与偏好，许多人充当了这种交流的媒介，在60年代曾进行过广泛国际商务旅行的卡森便是其中之一。[①]

不过，卡森能够把自己的观点转化为政策。这位公使深信，不管愿不愿意，美国已经陷入一场争夺世界市场的严酷斗争，因此他试图通过与罗马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缔结条约，使巴尔干和东欧向美国商品开放市场。随后他又盯上了刚果的财富。卡森完全同意《纽约先驱报》所提出的口号："让刚果向世界开放贸易市场。这便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这位公使相信，这个目的可以通过支持利奥波德国王提出的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要求来达到。国际会议有助于保证比利时在这个富饶地区的利益，但卡森也希望此举能够来保证刚果在平等的基础上向所有投资者和贸易上开放。卡森和参议员摩根找到了一位有力的支持者，亨利·桑福德上校。他曾是林肯的一位外交官，现在是佛罗里达的房地产投机商，在比利时过着优裕的生活。桑福德竭力怂恿国务院支持他的密友利奥波德：我们将在"辽阔"的刚果"为我们的一些制造业目前所面临的生产过剩的威胁寻找解决办法"。[②]

1884年，奥托·冯·俾斯麦首相试图通过召开柏林会议来停止在刚果问题上愈演愈烈的竞争。阿瑟和弗里德里克·弗里林海森一改美国过去从不参加欧洲会议的政策惯例，派卡森代表华

---

① 米尔顿·普莱瑟：《向外看》，（博士论文，罗切斯特，1954年），第10章。

② 普莱切：《困难的岁月》，第17章；普莱瑟：《向外看》，第115页。

盛顿与会。美国的立场是，不顾法国和葡萄牙的反对，支持利奥波德的要求，最重要的是通过谈判，使这位比利时国王对美国的承诺变成一项可靠的门户开放政策，以保证美国在刚果的利益（卡森还想在刚果海岸获得一个海军基地，但弗里林海森认为这可能走得太远，尽管他也曾命令一位海军指挥官设法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作为“商业休假地”）。美国的立场（与利奥波德给撒切、卡森和摩根的谢礼完全一致）被写进了条约。卡森对此很得意。参议院则不然。尽管摩根为此作了辩护，但参议院仍然很不满，在它看来，这是一个纠缠不清的同盟关系。共和党总统提名人詹姆斯·G. 布莱恩批评道，即将下台的共和党政府签署的这项条约抹煞了新旧大陆之间的区别，他还宣称，这样做的结果是使门罗主义的基本设想遭到破坏。1885 年，新上台的民主党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取消了该条约。[1]

但是，刚果问题作为一个政治、甚至宗教问题，并未就此了结。利奥波德的许诺及门户开放原则也根本没有给西非带来任何秩序和希望。1890 年，乔治·华盛顿·威廉斯在其《公开信》中首次揭露了比利时人的暴行。作为一位编辑、牧师和已获任命的美国驻海地公使（尽管他始终没有赴任），威廉斯是第一位当选为俄亥俄州议会成员的美国黑人，也是第一位具有渊博学识的黑人历史学家。威廉斯的《公开信》使欧洲人颜面尽失，使美国人大受启迪，它以大量确凿的证据对利奥波德提出了许多指控，诸如以不正当手段攫取刚果人的土地，“烧毁他们的城镇，窃取他们的财产，奴役他们的妇女和儿童”，但诸如使他们接受教育或从经济上改善其生活水平之类的善举，却一无所见。威廉斯此番轰动一时的口诛笔伐甚至使一向麻木不仁的本杰明·哈里森总

---

① 爱德华·杨格：《约翰·A. 卡森》（艾奥瓦市，1955 年），第 280－287 页；普莱切：《困难的岁月》，第 17 章。

统也不得不站出来公开反对利奥波德的强盗行径。不幸的是，威廉斯于1891年去世。美国人的关注点又从利奥波德的暴行转回到刚果这个市场本身。[①]

其他一些美国黑人也介入了刚果问题，不过方式大不相同。传教出版物因为给这个所谓的黑暗大陆带去了光明而一直备受好评。对有利可图的帝国主义行为嗅觉极为灵敏的《纽约先驱报》吹嘘道，在非洲，传教士与商人携手并肩，一道摧毁了伊斯兰教的信仰。有一位传教士采取的是另一种策略。威廉·亨利·谢泼德毕业于亚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市的斯蒂尔曼学院——南部长老会为培养黑人传教士而建立的学院。谢泼德来自弗吉尼亚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能够轻松自如地与白人一道工作，1890年他与塞缪尔·拉普斯莱一道前去刚果传教。为了建立一个活跃的传道区，谢泼德负责与非洲领导人合作，拉普斯莱则与白人官员合作。谢泼德后来对非洲人的习俗了如指掌，在这方面极为敏锐。他回到美国，招募更多的传教士（包括黑人传教士）去非洲工作。到了1899年，这些传教士开始向美国教会组织讲述比利时人在刚果的做法：在这里，“大量”“我们周围的人”被强迫为政府劳动。他们还披露，利奥波德利用扎波一扎普族人对他的恐惧心理，让他们去帮自己收税，而扎波一扎普族人则利用与利奥波德的这层关系来掩护他们劫掠奴隶的行为。这些情况使美国国内一片哗然，终于迫使国务院向利奥波德提出抗议。1909年，比利时人以诽谤罪将谢泼德告上法庭。经过一场举世关注的审判，谢泼德被宣布无罪。随着美国白人与刚果之间贸易的发展，非洲

---

① 约翰·胡普·弗兰克林：《乔治·华盛顿·威廉斯传》（芝加哥，1985年），前言第15--24页，正文第234—241页。

人与美国黑人之间的联系也得到加强，尽管其中的原因大不相同。[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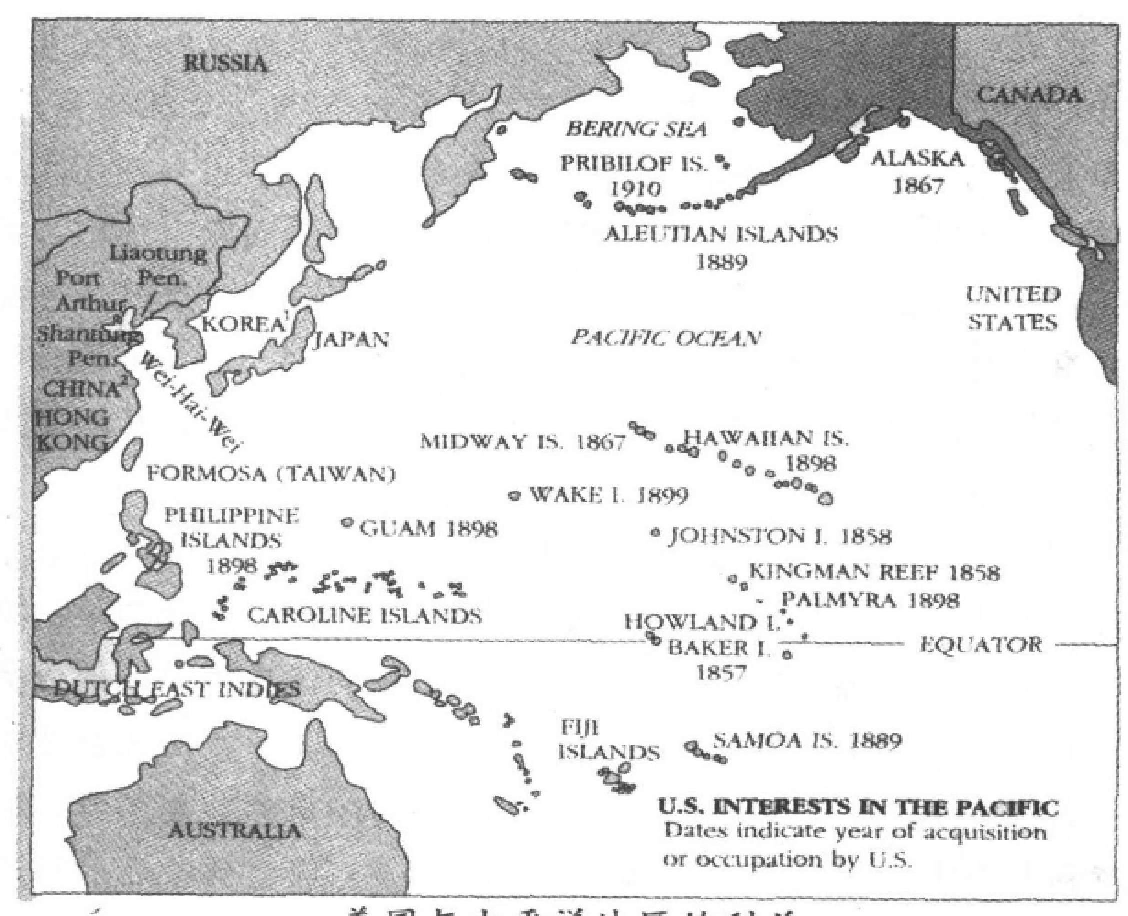
二、跨越太平洋：萨摩亚群岛

与在西非一样，美国最初对萨摩亚群岛的一些重要的权利要求，也是由那些野心勃勃的海军军官提出来的。而且，与在非洲一样，美国对该地区也产生了同样的期望：作为一个战略基地，萨摩亚群岛将有助于缓解美国商品过剩的困境。不过，在南太平洋地区，很少有传教士或政论家像威廉斯在刚果问题上那样，能够凭自己的良知说话。三个帝国主义强国围绕萨摩亚展开激烈角逐，毫不掩饰他们的意图。美国政府也没有像在 1884 年柏林会议之后那样正式宣布退让，相反，美国一直坚持竞争，甚至差点与欧洲人开战。

1872 年，海军中校理查德·W. 米德代表美国与萨摩亚土著首领签署了第一项条约。美国的公司和土地投机商此前早已来到这里，但米德感兴趣的主要是帕果一帕果的优良港口，他以美国向对方提供保护为条件，获得该港的租借权。萨摩亚人自然也担心英国和德国的意图，因此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美国参议院同意利用该港口，但拒绝承担保护国的责任。经过修改后的条约规定，美国获得帕果一帕果港的条件，仅仅是为对方提供斡旋帮助。事实证明这更容易被接受。实际上，美国、英国和德国领事在 1879 年达成了一项三方协议。这项协议，国务卿艾弗尔特可以放心地交给参议院定夺。这项安排一直延续了 8 年，尽管美国

① 沃尔特·L. 威廉斯：《威廉·亨利·谢泼德——在刚果的美国黑人传教士（1890—1910）》，见西尔维亚·M. 亚各布斯主编：《美国黑人与非洲的传教运动》（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1982 年），第 135—149 页。

与德国之间的要求越来越矛盾。1885 年，国务卿托马斯・F. 贝阿德警告柏林，他“不允许任何一个大国获得贸易上的特殊优惠”，此外，多少有些矛盾的是，他还要求维护萨摩亚人的独立。1886 年，英国决定暗中支持德国的要求，以此报答俾斯麦对伦敦在埃及问题上的立场的支持。① 美国越来越深地卷入了华盛顿和杰弗逊曾经告诫过的欧洲人的纠纷。



美国与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不过，这一代美国官员却认为有必要站出来与欧洲人斗争。由于英国在萨摩亚问题上被德国牵着鼻子走，1887 年三大国在华盛顿举行了会晤，试图就各自的帝国主义要求达成一项解决办法。贝阿德竭力反对德国的计划，即谋求事实上的控制，理由是

① 查尔斯・C. 坦西尔：《托马斯・F. 贝阿德的对外政策（1885—1897）》（纽约，1940 年），第 30—41。

萨摩亚的港口可以把美国通往亚洲的铁路网络连接起来，是整个交通系统中的关键环节，一旦巴拿马运河建成，就更是如此。也许部分原因是华盛顿的夏天气温高达华氏100多度，但更多地是因为对抗愈演愈烈，会议一无所获。1888年，德国开始更加露骨地攫取权力。萨摩亚人俘获了一些德国军人（并且杀了几个），但俾斯麦的控制进一步加强。美国的舆论一时沸腾起来，站在舆论前沿的是诸如旧金山商会这样的商业组织，它们忧心忡忡地警告说，如果萨摩亚落入德国人之手，接下来还会轮到夏威夷。华盛顿已经准备派出一艘军舰。对美国何以如此在意这些"偏僻遥远、无足轻重的岛屿"，铁血宰相俾斯麦表示大惑不解。在给贝阿德的一份备忘录中，第二助理国务卿阿尔维·A. 阿迪概括了一个正在崛起的太平洋帝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

> 对德国人来说这些岛屿也许偏僻遥远、无足轻重，但对我们来说却非常接近而且相当重要，因为，如果它们被一个海上强国所控制，将对我们的太平洋侧翼构成威胁，实际上，除了夏威夷，还会对整个南美太平洋沿岸构成威胁。萨摩亚与珍珠港地位相当，因此俾斯麦想得到它。[1]

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历史学家常常错误地认为他是一位反扩张主义者）很快理解了阿迪的想法并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咨文，毫不含糊地要求维护美国的权利。国会随即开始考虑军事拨款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要求在柏林举行一次会议。会议还未来得及召开，三国的军舰（各自的士兵一直在阿皮亚港紧张地盯着对方）就遭到一场强烈飓风的袭击。总共13艘军舰，只有一

---

[1] 同上，第81、100—101页；《第二次萨摩亚会议草约》，1887年7月2日，约翰·巴塞特·穆尔文件，第162盒，国会图书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艘英国军舰逃到安全水域，得以生还。战争边缘的压力和大自然的警示都恰到好处，遂使三国得以在柏林达成一项共管协议。美国的主要要求得到满足，帕果一帕果港被置于其保护之下。危机就此平息下来，直到1898年战争之后，列强围绕中国的竞争才再次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萨摩亚。1899年，英国由于专注于与布尔人的战争，退出了竞争。美国和德国两家瓜分了萨摩亚群岛，美国得到帕果一帕果。美属萨摩亚群岛的获得，是美国出于贸易和战略方面的原因，置动荡、国内冲突、战争危机以及卷入欧洲殖民主义纷争的危险于不顾，明确采取坚定立场的结果。助理国务卿约翰·巴塞特·摩尔后来对这段经历作了恰如其分的评述："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事件"比美国在萨摩亚的政策"更有助于使我们理解获取菲律宾的重要性"。[①]

三、在夏威夷引发革命

1819年以后来到夏威夷的美国传教士，发现这里实行的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国王为封建领主。传教士们设法使夏威夷的统治者改信了基督教，并充当这些统治者的翻译和顾问，到了1849年，传教士所拥有的势力甚至足以摧毁传统的土地所有制和以家族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通过颁布传教士们所促成的法律，这里出现了自耕农和雇佣劳动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很多购买土地的机会。到了50年代，16位公理会传教士平均每人掌握了493英亩的土地所有权。到1892年为止，夏威夷已有2/3的土地为美国人和欧洲人所控制。美国领事称这些传教士为当地"社会的吸血鬼"，过着"领主般的"生活，并"把这些自然之子搅得心绪不宁"。西华德在1867年未能用一项互惠条约

① "自传"，穆尔文件，第207盒，第3个文件夹，第2个封袋。

把美国对夏威夷的控制权固定下来。尽管如此，美国领事在1871年报告说，夏威夷街头最流行的歌曲是《行军穿过佐治亚》和《约翰·布朗的遗体》。夏威夷人正在迅速失去对夏威夷的控制权。1876年，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终于推动参议院批准了一项互惠条约。菲什不光强调此举在经济上的好处，他还警告说，如果美国不加紧控制该群岛，英国和加拿大将会捷足先登。[①] 这项条约产生了惊人的效果。

1876—1885年，糖的年产量和年产值分别从2600万磅和130万美元激增到1.71亿磅和840万美元。1876年以后的四年里，种植园数量增加了两倍。整个糖业资产的2/3为美国人所有。夏威夷的糖产品非常迅速地进入美国市场，以至于美国的甜菜糖生产者及东海岸的加工商与贸易保护主义者抱成一团，在1883年试图阻止该条约的续订，结果以失败告终。与往常一样，詹姆斯·G. 布莱恩对帝国的前进方向以及反对派的努力何以注定会失败早有充分的阐述。国务卿在1881年指出，1876年条约使夏威夷"实际上成为美国关税同盟中的一个地处加州边远地区的成员"。布莱恩还指出，目前已不宜再逃避责任，必须在土著统治者闹出麻烦之前兼并夏威夷。这样美国的资本和"聪明能干的劳动者"就能够以"纯粹美国式的殖民形式"开发夏威夷。布莱恩认为，非洲、印度洋或丹麦人的西印度群岛的基地对美国毫无用处，但有三个地方必须弄到手：夏威夷、古巴和波多黎各。获取后两者的时机"对一代人来说"可能还不成熟，但夏威夷

① 加里·Y. 大木广：《甘蔗之火：夏威夷的反日运动（1865—1945）》（费城，1991年），第5—7页；坦西尔：《托马斯·F. 贝阿德的对外政策（1885—1897）》，第361页；小威廉·A. 拉斯：《夏威夷革命（1893—1894）》（宾夕法尼亚州塞林斯格罗弗，1959年），第6—7、30—32页。

“在难以预料的任何时刻都可能成为需要当机立断的问题”。[1]

1886年围绕续约问题的斗争开始后，通常并不以主张“金戈主义”外交政策知名的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和国务卿托马斯·贝阿德，这回却与财大气粗的国内制糖业利益集团进行了一场斗争，并在这场双方都使出浑身解数的较量中获胜。克利夫兰还给条约增添了一项新内容，使之价值陡增：获得了独家使用珍珠港的权利。珍珠港是瓦胡岛岸边的一个（如许多观察家所言）有待开发但防护条件极好的避风港。在英国和加拿大官员的推动下，夏威夷人曾反对续约，因为这将使他们丧失主权。但迫于外国农场主及其政治盟友的压力，夏威夷国王只好让出珍珠港并同意接受一个新条约。克利夫兰深知夏威夷问题上的利害关系：“我们控制着太平洋最重要的海岸，在太平洋贸易中拥有显而易见的切身利益，这使得夏威夷群岛无论从哪方面看对我们都至关重要。”贝阿德还加上一条常见的理由，如果美国放弃这些岛屿，其他大国将很乐于过来把它们夺走。[2]

1887年，农场主们开始发难。在这场他们称之为“革命”的运动中，他们要求虚弱的国王卡拉卡瓦批准一项新宪法，把实际控制权交给已经具备足够财产条件的白人。贝阿德决定提供帮助。他让美国公使全权负责，全力协助白人农场主，这意味着必要时还可以让美国军队登陆。1887年没有必要使用军队，但在两年后爆发的另一场“革命”中，军队派上了用场。1890年，以1887年兼并活动的主谋洛林·A. 瑟斯顿为首的兼并主义者失

---

① 艾丽斯·泰勒：《詹姆斯·G. 布莱恩的对外政策》（明尼阿波利斯，1927年），第200页；布莱恩致哈里森，1891年8月10日，见艾伯特·T. 沃尔威勒编：《本杰明·哈里森与詹姆斯·G. 布莱恩书信集（1882—1893）》（费城，1940年），第173—174页。

② 坦西尔：《托马斯·F. 贝阿德的对外政策（1885—1897）》，第373—374页。

去了对政府的控制，于是他们又秘密策划第二次“革命”。与此同时，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计划和英国的利益问题也越发突显出来。1890年，英国驻美公使朱利安·庞斯富特曾向国务卿布莱恩建议，由英美两国共同保证夏威夷的独立。庞斯富特后来回忆说，“布莱恩先生斩钉截铁地表示，美国决不会干这种事情。”①

美国很快就使出重锤。1890年的麦金莱税则不仅把粗糖列为免税品，最终还通过一项条约使古巴食糖获得入口优惠权，但为了收买国内食糖生产者，决定为他们提供每磅二美分的补贴。夏威夷的经济顿时陷入困境。哈里森、布莱恩和麦金莱对这种结果也许早有预料，他们显然是有备而来，立即宣称新的关税政策对1887年条约或者租借珍珠港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反美集团在1891年发起攻势，把吕留奥卡拉尼女王扶持上台。美国公使约翰·史蒂文斯提醒布莱恩，这位女王具有“极强的主权观念”。史蒂文斯还屡次向华盛顿报告，称英国人和加拿大人已经准备发动进攻，以至于哈里森在其私人信件中也开始提到他对这种威胁的担忧。与此同时，受美国关税政策打击最大的小农场主也在准备夺取权力。一位美国海军军官向华盛顿报告说，如果突然爆发造反运动，“那不过是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与那些弱小民族之间的一场传统的斗争”。不过，为了防止这种判断出现失误，美国军队一直集结在夏威夷附近。②

1890年的关税政策在夏威夷引发了一场政治战。白人农场

① 庞斯富特致索尔兹伯里，1890年1月10日，索尔兹伯里勋爵文件，英国牛津；谈话备忘录，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国务院——英国部分 档案分类——59（以下简称国家档案、档案分类）。

② 西尔威斯特·K. 史蒂文斯：《美国在夏威夷的扩张，1842—1898》（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1945年），第187—203页；费利克斯·麦克利海军中校致特雷西，1890年8月29日，国家档案馆，档案分类45，第9档案区，第14盒。

主与夏威夷女王各显神通，展开权力角逐，女王逐渐占据上风，并于 1893 年 1 月颁布一部新宪法，赋予她自己比过去大得多的权力。她做得太过火，结果弄巧成拙。她曾试图在法定权力方面做出一些退让，但已经太迟了。在布莱恩的鼓励下，兼并主义者已经做好动手的准备。1893 年 1 月 16 日，美国水兵开始登陆，以保护美国人的财产。兼并主义者没有遇到太多抵抗便夺取了政权。哈里森总统在即将卸任的最后几天里，把一项兼并条约提交给参议院。此事顿时在全国引起一场争论。《评论纵览》① 认为夏威夷对美国至关重要，因为"它处于太平洋贸易的核心位置"，并把夏威夷群岛与中国市场的意义直接联系起来。但反对者却认为——用独立的《波士顿先驱报》的话说——"从贸易方面讲，我们不可能通过兼并得到任何我们目前并不拥有的东西；从政治方面看，这将给联邦带来种族分歧和生活状况差异方面的新问题，使目前已有的问题更加严重。"新上台的民主党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及其国务卿沃尔特·昆廷·格雷沙姆赞同反对派的意见。克利夫兰撤消了兼并条约。格雷沙姆尤其担心在海外推行殖民主义政策时过度引申宪法权力会产生不良后果。不过，他仍然煞费苦心地要让其他大国明白，夏威夷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块禁地。与《波士顿先驱报》的观点一样，格雷沙姆也认为美国可以享有这些利益，但不必在政治上承担责任。② 在麦金莱重返华盛顿政坛之前，美国又经历了 4 年的经济紊乱时期。麦金莱出任总统后，兼并了菲律宾，从而走完了曾经因为他的 1890 年关税法而大大加速的这一扩张进程的最后一步。

---

① 原文为 Reviews of Reviews。——译者

② 霍默·E. 索科洛夫斯基与阿伦·B. 斯贝特：《本杰明·哈里森总统执政时期》（堪萨斯州劳伦斯，1987 年），第 200—206 页；《舆论》，1893 年 2 月 4 日，第 415—417；同上，1893 年 2 月 18 日，第 464　465 页。

四、亚洲：商品、上帝与炮舰

1865年以后，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因素，一直是美国人对机会（包括世俗与宗教两个方面）的选择，而不是对秩序与稳定的追求。19世纪70年代以后夏威夷的一系列动乱便是一例。不过，美国人的这种选择在亚洲表现得最为明显，意义也最为深远。在一些受1873年后经济危机驱策的商人和外交官的推动下，亚洲本来就脆弱的力量均势演变为一系列的战争。传教士们则因为自己的信仰在国内面临科学与世俗主义的挑战，决心通过改变他人的信仰来证明自身及其宗教信仰的价值，而在他们看来，亚洲便是最大的传播福音派教义的市场。因此，他们也是本来就步履蹒跚的朝鲜和满清王朝越发动荡不安的因素之一。

西华德曾经把美国的亚洲政策建立在两条原则之上：使用武力以及与其他大国合作。在对华政策上，这些原则在此后3/4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发生动摇。但在对日政策上，不出10年工夫就遭到破坏。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这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华盛顿未来的远东政策），美国官员抛开其欧洲同伴，单独向日本提供帮助，后者自1868年开始政治转型并取得惊人成就，它决心仿造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实现本国的现代化。70年代中期的美国驻日公使约翰·A. 宾厄姆对日本要求关税自治表示同情，他还意识到，美日合作可以削弱英国在日本市场的强大地位。这便是美国政策转变的开端。1876年，日本与朝鲜直接签署了一项条约，这进一步证实了宾厄姆的判断，即日本正在崛起。这项条约首次改变了朝鲜与中国的纳贡关系，预示着该地区的权力关系将出现显著的重新调整，而日本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在1878年的一项条约中，美国允许东京享有很大程度的关税自主权，这引起了欧洲人的不满。

英国本来可以破坏这种让步，但美国（又一次不顾英国的反对）在 80 年代已经表示有意取消治外法权。华盛顿的态度表明，美国在亚洲看好的是日本的未来，而不是中国或朝鲜的前途。[1]

接着美国又以日本为样板如法炮制，使朝鲜向西方的利益开放。一些美国人，特别是来自加州的美国人，从 70 年代开始就一直要求打开朝鲜的大门。承认朝鲜与中国分离的日韩条约，为美国的政策提供了便利。国务卿詹姆斯·G. 布莱恩与海军少将罗伯特·舒费尔特最先采取主动。较之布莱恩对拉美事务的介入程度，他对亚洲的兴趣显然处于第二位，但他却在 1881 年 11 月指示舒费尔特与朝鲜签订一项条约，因为朝鲜的港口“非常靠近日本和中国”，因此应该设法使其“对我们的贸易开放并为我们的海军舰只提供方便”。舒费尔特根本无须敦促。他曾与中国人进行广泛合作，帮助改造他们的海军，他完全明白机会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其意义绝不亚于对亚洲的文明教化。正如他对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市的听众所言：

> 与亚洲出现的任何光明的事物一样，甚至如同太阳在东方升起，如同帝国之星注定西行，中国必须从美国海岸寻求一种新的文明，一种更为强劲的自我更新能力。这是事物的自然规律，人类进步的真实历程，人类不可抗拒的潮流。
>
> 有一种文明将来自加利福尼亚，它虽然较为简陋、粗俗，却不乏仁慈的怜悯；它或许会拳打脚踢，诅咒发誓，但也会与人握手言欢，必要时甚至会对那些梳辫子的朋友施以援手……

---

① W·G. 比斯利：《现代日本的兴起》（伦敦，1990 年），第 142—144 页；佩森·特里特：《美国与日本的外交关系》（两卷本，斯坦福，1932 年），第 2 卷，第 2、7、48—55 页。

> 太平洋是美国的海洋新娘，中国、日本、朝鲜以及如同项链悬挂四周的无数岛屿便是陪伴新娘的女傧相。加利福尼亚是婚床与新房，东方所有的财富都将作为新婚的贺礼滚滚而来。作为美国人，让我们……凭借自己身的力量，确保任何商业对手或敌国的旗舰都无法安然无恙地跨越太平洋波涛汹涌的辽阔海面。[①]

1882年舒费尔特与朝鲜缔结的条约使美国人获得在港口城市的居住权，能够参与制定海关税率，享有治外法权，并且有权禁止鸦片贸易。该条约进一步削弱了一直把朝鲜视为纳贡国的中华帝国的影响力。布莱恩、贝阿德和其他美国官员认为，美国可以利用上述弱点来获取好处。80年代末，贝阿德开始向美国驻朝主要外交官霍勒斯·阿伦亲授机宜，告诉他如果纽约市的银行家不能提供帮助，他可以在加利福尼亚的哪些地方找到贷款。阿伦也无需太多的鼓励。作为一名虔诚的长老会教友，阿伦是首批进入朝鲜的新教传教士之一，而这个国家曾经强烈反对基督教。（无论是向朝鲜人灌输基督教教义，还是力图排斥罗马天主教，他都没有取得多少成绩。）到了80年代中期，阿伦已不那么在乎拯救人的灵魂，他更关心的是如何为美国人——当然也包括他自己——赚钱，以及搜集朝鲜的珍贵艺术品。他与亲日的改良派政党密切合作，该党希望朝鲜与中国完全脱钩并实现现代化，尤其是希望通过与阿伦及其朋友之间的妥协来达到这个目的。类似的变化早在1884年的一场血腥的反日战争中就已显露出来。阿伦不会放过任何机会。1889—1890年间，他与布莱恩和副总统利瓦伊·P. 莫顿在华尔街的莫顿－布利斯公司合作，在朝鲜获取

① F·C. 德雷克：《海上帝国——海军少将罗伯特·纳尔逊·舒费尔特传》（火奴鲁鲁，1948年），第5章，尤其见第116页；泰勒：《詹姆斯·G. 布莱恩的对外政策》，第10章，尤其见第269页。

财产，所获的权益包括也许是亚洲储量最丰富的金矿。阿伦挖的是中国（以及朝鲜）的墙脚，并且有意为日本人提供方便。1884年战争爆发时，日本并未做好战争准备。10年以后他们做好了充分准备，亚洲的力量均势也因此被改变。[1]

尽管美国帮助朝鲜与中国脱离关系，并在1882年背弃1880年中美条约，禁止中国劳工进入美国，但美国人同时也在设法发展与中国的经济、政治联系。在西华德一蒲安臣条约中，华盛顿曾保证奉行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整个80年代，美国官员一直表示他们希望保护现状；他们不想要中国的领土，也不希望其他大国得到任何领土。但这里仍然有一个常见的矛盾现象。舒费尔特在朝鲜所完成的使命已经打破了现状，而且，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约翰·拉塞尔·杨）在80年代曾宣布，他的首要职责是维护美国在中国的权利。[2]

1885年，田贝（查尔斯·登比）出任驻华公使，美国对中国的权利要求和卷入程度都开始迅速发展。田贝是一位铁路企业家，与其他铁路建筑商，尤其是来自国务卿贝阿德的家乡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的詹姆斯·哈里森·威尔逊关系密切。威尔逊希望把中国和朝鲜连成一个统一的巨型市场，并使之成为美国商品的天下。贝阿德向一位纽约商人保证说，田贝知道自己可以为美国公司提供帮助，雄心勃勃的威尔逊也随时准备“把整个中国这个大瓷器[3]稀里哗啦地装进本国的碗橱里”。这种保证大受欢迎，特别是受到南部纺织业利益集团和钢铁行业杂志的欢迎，它们呼吁立即全面投入竞争中国市场的斗争。费城的一家联合企业与

① 弗雷德·哈维·哈林顿：《上帝、财神与日本人》（麦迪逊，1944年），第1—17、52—53、134—145页。

② 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第2版，纽约，1980年），第34—35页；普莱瑟：《向外看》，第7章。

③ 此处原文为“all china”，大概是双关语。——译者

70—80 年代领导中国发展运动的李鸿章密切合作，打算建立一家银行以便为铁路建设提供资金，但这项计划因为中国国内政治方面的原因而告失败。[1]

美国传教士全力以赴的决心，至少堪与企业界所煽动起来的这种对中国市场的热情比肩。19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 20 年代这个时期，是传教事业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在近东（其中土耳其和北非受传教士的影响最深）和远东地区。1890 年在中国举行的一次新教徒会议，宣布在未来五年内中国还需要 1000 名福音传教士。尽管 1894 年发生了中日战争，局势相当混乱，最后还是来了 1100 人，其中绝大多数为美国人。

这场宗教入侵的原因很多。在美国国内，教会受到新兴的达尔文学说的挑战。神职人员的社会地位遭到工业化转型过程中的世俗需求（以及利润）的不断侵蚀。诸如德怀特·L. 穆迪这样的原教旨主义领袖，为了对抗达尔文主义的挑战，竭力重申古老宗教的原则以及信徒应该通过给教会发展更多信徒来证明自身的价值这一律令。因此，扩张对于宗教而言同样是一种需要，正如扩张对卡内基的钢铁厂而言是一种需要一样，或者用一位传教士的话说："基督教是一种需要分享，无法独占的宗教"。其他一些人则试图通过吸收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变种，来应付达尔文主义本身。这一路的领袖也许是乔赛亚·斯特朗，一位公理会牧师。其《我们的国家》一书仅在 80 年代就销售了 17.5 万册，并被翻译成欧亚若干种语言。他的讲道差不多与他的书一样受欢迎。斯特朗所宣讲的内容简直就是一首盎格鲁一撒克逊扩张主义的赞歌。它通过简要勾勒达尔文主义通常所说的几个发展阶段，来证明这样一个结论：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帝国一直不断西移，从波

---

① 坦西尔：《托马斯·F. 贝阿德的对外政策（1885—1897）》，第 422—431 页；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纽约，1922 年），第 579—580。

斯到希腊，最后到达其顶峰，即“我们伟大的西部，就此止步，因为已到西方的尽头，再往前去就是东方了”。斯特朗一直遵循这一逻辑，1902年，他领导了一场国际性的福音运动。到1913年时，他已经开始撰写一部四卷本著作，书名是《我们的世界》。不过，早在20年前，另一位公理会牧师就已经宣讲过斯特朗在一篇题为《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与世界的救赎》的文章中所论证的这种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世界影响力。[①]

这种热情极富感染力，很容易在妇女俱乐部中找到市场。妇女俱乐部在1870年以后大量涌现，并且成为国内外传教活动的极其重要的发起者。传教热情对高等院校的影响尤其大。学生志愿者国外传道会成为1887年以后迅速发展的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运动的一部分，而且很快在全美几乎所有高校建立了分会。学生志愿者传道会派往国外的传教士有将近6000人。耶鲁大学在这场运动中表现得最为狂热。最起劲地鼓吹拯救中国的著名人物，有三位即出自耶鲁，他们是：毕得经（霍勒斯·F.皮特金）（在义和团起义期间被中国人砍头）、舍伍德·埃迪和路思义（亨利·温特斯·卢斯）（即《时代》、《幸福》[②]和《生活》创办者[③]的父亲）。三个人都曾在中国实践学生志愿者传道会的格言：“让全世界在我们这一代基督教化。”尽管50年代之前在中国受到禁止，之后又面临中国当局的强烈反对，到1898年为止，基督教传教士已经渗入包括满洲在内的中国的每一个省。此外，在朝鲜的传教士还在霍勒斯·阿伦的领导下，竭力想使使朝鲜与中国脱离关系，以便可以不再受中国反基督教政

① 乔赛亚·斯特朗：《我们的国家》（纽约，1885年），第29页。
② Fortune，现通译《财富》。——译者
③ 即亨利·鲁宾逊·卢斯。——译者

策的影响。[①]

这些传教士对朝鲜问题的看法表明，他们在政治上也并非外行。他们非常了解，美国一方面公开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自主权，另一方面又公开或暗中要求中国做出让步，为美国公民提供充分的权利和保护，其中的矛盾越来越明显。1890 年，有一位传教士在指出，"天意的各种征兆无不指向西方"，"中国现在已准备接受福音"，尽管"它变得足够强大、有能力决定条约的内容以后未必还会这样……目前是最好的机会。"这是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一位公理会领导人认为，传教士们"正在为帝国奠定基础，我们正在塑造众多人口和许多大国的未来"。这种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建立在繁荣的基础上。用《公理会教友》的话说，"商业跟着传教士的脚步前进。"[②] 关于这种观念，没有哪位传教士比何德兰（何德兰·艾萨克·泰勒）讲得更清楚了。何德兰于 1893 年开始传教。他在 1912 年的一本回忆录中讲到：

> 如果有人问我，为美国钢铁联合企业、美孚石油、鲍德温机车厂……或者辛格缝纫机厂，或者十数个大型商业企业中的任何一个做宣传的最好办法是什么？我会告诉他们，赞助一两个或者十几个国外传教活动中心，一所教育机构，一家医院，一个诊所，或者 100 个本地传道士或教师。得到你们帮助的每一个人都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成为你们的产品推销员，而他们所代表的国

---

① 费正清："前言"，以及克利夫顿·J. 菲利普斯：《学生志愿者运动及其在中国传教活动中的作用（1886－1920）》，均见费正清主编：《在中国和美国的传教事业》（马萨诸塞州剑桥，1974 年），第 1—19、91 109 页；保罗·瓦格：《传教士》，见亚历山大·德康德主编：《美国对外政策百科全书》（三卷本，纽约，1978 年），第 2 卷，第 567—571 页。

② 《舆论》，1890 年 2 月 8 日，第 432 页；小拉尔夫·迪尤尔·博尔德：《从期刊杂志看扩张主义情绪在美国的发展（1885—1895）》，（博士论文，匹兹堡大学，1953 年），第 92—99 页。

内那些势力强大的教会将成为你们的广告代理人。[1]

并非人人赞同此说。《民族》周刊的编辑E·L. 戈德金指出，当一位传教士被某个国家驱逐出境，“他给人造成的印象就好像是某只猛兽抢走了他口中的猎物”。戈德金无疑指的是1893—1894年美国派军舰到中国和近东以保证美国的传教活动和其他利益免受战争影响这件事情。他还讥讽道，传教士希望美国军队“刺刀出鞘，严阵以待，而他自己却在鼓吹什么人世间的和平与善意”。戈德金的说法并不夸张。1891年，长江上的一艘美国炮舰的指挥官向国内报告说，“传教事业已经取得惊人进展。……传教士的人数不断增加，随之而来的金钱看来取之不尽。”不过，他也指出，这个地区之所以如此平静，原因“完全在于……炮舰的出现”。[2]

纽约的一份商业报纸在1894年宣称：“我们，而不是其他任何大国，将控制太平洋地区的贸易——与中国和日本的贸易。”但美国人也在用炮舰来确保西方对自己的支持，以此表明中国的门户开放对美国非常重要，即使是中国人自己也不能将大门关闭。随着朝鲜逐渐摆脱控制，中国自身变得更难统治，列强开始抱成一团，日本也摆好了出手的架势，美国的所有政策设想都成为值得考虑的重要议题。的确，按照费正清的观点，一旦中国政权崩溃，享有特权并得到保护的传教士将对某些追随他们的中国人拥有极大的影响力，“通过这种相互作用，新教传教士开始对

① 何德兰：《传教活动的某些副产品》（辛辛那提，1921年），第33—34页。

② 戈德金的话引自博尔德：《从期刊杂志看扩张主义情绪在美国的发展（1885—1895）》，第106—109页；海军中校巴伯致贝尔纳普，1891年12月1日，国家档案馆，海军档案，档案分类45，第10档案区，第8盒，12月份的文件夹。

中国的革命进程起到促进作用。”[1]

华盛顿不会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为传教士所提供的机会，为美国获取特权所提供的机会，成为优先考虑的问题，超过了秩序的重要性，因而也超过了中国自治权利的重要性——随着中国变得更加不稳定，其自治也更难实现。日本人也没有给美国增添更多的希望。1893 年，美国的亚洲舰队指挥官向华盛顿报告说，“日本有可能使夏威夷问题更加复杂化”，而且在亚洲它也“非常渴望扩充自己的地盘”。他援引一位日本海军军官的话说，“我们的目的是使日本成为太平洋上的英国。”据这位美国指挥官说，一位前日本外交大臣曾经宣称，修建巴拿马运河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将鼓励“日本人向中美洲、甚至墨西哥移民”。[2]

美国和日本自 1868 年以来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程。如今每一方都希望将自己的秩序强加于亚洲大部分地区。然而事与愿违，这两个国家对机会的寻求，结果都帮助引发了 20 世纪的一场大革命。

---

① 费正清：《前言》，以及克利夫顿·J. 菲利普斯：《学生志愿者运动及其在中国传教活动中的作用（1886—1920）》，均见费正清主编：《在中国和美国的传教事业》，第 10、371—373 页。

② 贝尔纳普致赫伯特，国家档案馆，海军档案，档案分类 45，第 10 档案区，第 9 盒，1893 年 1—6 月份的文件夹。

第六章 1893—1896：混乱与危机

1898 年美西战争期间及战后上台的这一代美国人，成功地使美国争取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努力达到了高潮。这种成功当然并非朝夕之间获得的，但是 1873—1897 年的萧条，特别是 1893—1897 年的经济危机（它使美国从长期的通货紧缩状态跌进了全面的经济危机）的确起到了某种催化剂的作用。1898 年的美利坚帝国是 1897 年以前美国国内动荡局势的产物。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次危机是由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和管理进步直接引发的，卡内基的"拼命运转"政策就是这种进步的例证，其目的在于竞争，实际上也就是控制市场份额。到 19 世纪 90 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无疑是 1865—1914 年的美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态——已经开始孕育出一种新型的、范围超越美洲大陆的对外政策，西华德和布莱恩就是这一政策最突出的代言人。文化（如传教运动所示）、观念（如社会达尔文主义所示）、政治（共和党的不断演进及其对互惠贸易的全新认识便是例证）以及外交都不得不适应于这场工业变革。

一、美利坚人的罗马帝国

到 1893 年的时候，美国的社会弊病已暴露无遗，甚至连 1877 年的大罢工和 1886 年的秣市骚乱都相形失色。1892 年，制

造业和运输部门的失业率估计为4%，次年增加一倍达到了9.6%，而1894年则几乎再次增加一倍，达到了16.7%。1898年全年的失业率仍旧维持在12%—14%之间，然后到1899才最终下降到了7.7%。[①] 这些不过是一些干巴巴的数字，更具真切感的是下列事实：16万烟煤工人大罢工；导致大北铁路陷于瘫痪的罢工；考克西和霍根率领失业"大军"以华盛顿为目标的大规模东进运动；美国劳工联合会（AFL）几乎完全落入社会主义左翼的控制之下；克利夫兰总统动用联邦军队镇压芝加哥普尔曼列车工人罢工，一位历史学家称这"简直是恐怖统治"；《民族》周刊则声称加利福尼亚"已经落人了奥克兰、圣克莱门托和洛杉矶的暴民之手，而奉命执法的国民军也扔下武器，站到了暴民一边。"所有这一切（且不止这些）都发生在1894年。任何有头脑的观察家，如果对危机中所隐含的阶级斗争还心存疑问的话，那么到1895年，当极端保守的最高法院否定所得税立法的时候，当克利夫兰政府为了拯救濒于破产的政府财政不得不求助于J. P. 摩根，致使政府公债大量流入美英两国富裕的投资商之手的时候，一切疑问便顿然烟消云散。正如1894年年中一位商人在写给其好友——美国总统的信中所言，"最近我一直在为你担忧，看似远在天边的危机，如今却落到了我们的头上。"[②]

克利夫兰政府的司法部长（后任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把美国的危机置于一个更大的范畴、亦即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中来加以认识。他对布朗大学的听众说，导致危机的原因并非是"暂时的、偶然的和表面的，也不是孤立的"，而是"根深蒂固且由来已久"。奥尔尼接着说到，"整个文明世界的工人都处

① 保罗·H. 道格拉斯：《美国真正的报应（1890－1926）》（波士顿，1930年），第440页。

② 《民族》，1894年7月12日，第20页；A. B. 法夸尔致克利夫兰，1894年6月1日，格罗弗·克利夫兰文件，华盛顿国会图书馆。

于骚动之中”。这些劳工认为他们“正在准备进行一场旨在解放劳工的革命，正如路德宗教改革对于信仰自由的解放以及［1776年美国革命］对于政治自由的解放一样”。劳联领袖塞缪尔·冈珀斯在其回忆录中更为简明地描述了这一问题：“萧条时期通常被称为所谓生产过量的时期，而对我所了解的人民来说，则是道道地地的消费不足时期，是一个艰难时期。”①

对于“艰难时期”的深层历史含义，没有哪位政府官员比克利夫兰政府的首任国务卿沃尔特·昆廷·格雷沙姆更加焦虑不安了，他于1893年3月走马上任，直至两年后突然过世。格雷沙姆曾经是处理过1877年大罢工问题的法官。与奥尔尼（以及其他许多人）相似，格雷沙姆同样认为这个问题并非暂时性的，也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而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种长期危机。危机的后患以及19世纪80年代已经积重难返的社会和政治弊端，最终促使格雷沙姆脱离共和党而加入了民主党。尽管他在1882—1884年间已经升任切斯特·阿瑟总统的邮政部长和财政部长，但他仍然拂袖而去。在与平民党交往一段时间以后，他开始把这场危机同第二次工业革命联系起来。他于1892年写道，“劳工问题”产生于“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一种环境”。节省劳动力的机器使资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势。如何对劳资双方的共同产品进行合理分配，而谁又将决定这一分配——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将会产生“严重后果”。据格雷沙姆夫人的回忆，格雷沙姆和英国大使朱利安·庞斯福特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释，他们探讨了“那个时代头号的……劳资问题”。“作为一名专利法官，节约劳力的机器使他完全相信世界的生产量将会获得增长，而生产力的增长已经超过了世界的消费能力。各国〔如何〕保持本国人民的就业、

① 1894年6月20日的剪报，理查德·B．奥尔尼文件，国会图书馆；塞缪尔·冈珀斯：《七十年……》（两卷本，伦敦，1925年），第2卷，第3页。

富足和幸福是将要面临的重大问题。”1893 年，国务卿格雷沙姆对一位美国领事说，废止 1890 年的谢尔曼购银法将会有所裨益，因为这可能有助于恢复人们对美国货币的信心，但是经济问题的根源要远为深刻。格雷沙姆根本就不相信什么美国例外论。“本国社会面临的危险同欧洲面临的威胁一模一样……正直的劳工不会无动于衷地看着他们的家人挨饿”，1894 年 5 月 2 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不过，进一步放开原材料的买卖可能对美国会有所帮助，因为“这将降低制成品的成本，使我国人民有能力在海外市场与英国展开竞争”。5 天后，格雷沙姆在给“一位心腹密友”的私人信件中写道：“目前的局势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高关税法规造成的……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印第安那、伊利诺伊及其以西的一些地区所发生的事情，完全可以视为革命的征兆”。接下来他又加上一个不合逻辑的推论，“那些困难将会过去，同你一样，我也认为它们是黎明前的黑暗”。但是就在 9 天之后，他似乎又开始怀疑黎明什么时候或者说是否会真的到来。他对赫赫有名的国际法学家约翰·巴塞特·穆尔说，目前的“景况”似乎“预示着革命的到来”。格雷沙姆引用了一位密友、前参议员的评估：“美国很可能会爆发革命，一位伟大的领袖将会随之诞生，而后美国将会争取成为帝国”。[①]

颇有影响的《银行家杂志》并不想触及日趋严峻的阶级问题，或者说不愿像格雷沙姆那样直面这一问题。相反，该杂志认为“在商业和经济问题上”美国已经地方化。美国人已变得过度

---

① 格雷沙姆致莫里斯·罗斯，1892 年 8 月 1 日，沃尔特·昆廷·格雷沙姆文件，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格雷沙姆致韦恩·麦克维，1894 年 5 月 7 日；书信册，出处同前；格雷沙姆致戴尔法官，1894 年 5 月 2 日，书信册，出处同前；玛蒂尔达·格雷沙姆：《沃尔特·昆廷·格雷沙姆的一生（1832—1895）》（两卷本，芝加哥，1919 年），第 2 卷，第 802—803 页；日记，备忘录，1894 年，约翰·巴塞特·穆尔文件，华盛顿国会图书馆。

多元化：他们“几乎不愿承认美国已经发展得过于庞大，很难仅凭共同的福利契约就把我们广袤的帝国完整地连为一体”。但是“正是这一原因促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要么进一步加强地方自治，要么强化中央集权，只有这样才能“使帝国的大多数地区政令畅通，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英国同其半殖民地之间所遵循的原则”。作为一种有用的宪政理论，詹姆斯·麦迪逊所写的《联邦党人第10篇》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麦迪逊认为不良的“派系斗争”可以通过政府“权限的扩大”加以控制，这一信念最终暴露了它的局限。在这块广泛殖民的大陆上，政府的权限已经过于庞大。《银行家杂志》显然无意中诠释了麦迪逊的伟大理论，并且提出了——当然也是无意中的——支持1829—1830年麦迪逊所持观点的论据，即由他协助建立的宪政体制也许不出一个世纪就不得不从根本上进行重新评价了。此后，《银行家杂志》又密切关注克利夫兰总统派军镇压普尔曼列车工人罢工一事。以加强中央权威为导向的地方主义论突然又变成了惧怕中央集权的阶级论。克利夫兰使用武力镇压地方暴动的行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因为如果政府落入“公司联盟或是新的平民党手中”，这种由某个阶级控制的政府将会沿用克利夫兰的先例，动用军队来反对它的敌人。阶级冲突似乎已经迫在眉睫。[1]

二、牺牲农民、避免殖民开拓的政策含意

工业变革使人们不得不从根本上质疑自1787年就已存在的政治秩序。（在1861—1865年间，只有南部地区对这种秩序真正提出过质疑。）然而，这种质疑的影响虽然广泛，却并不深刻。

---

① 《银行家杂志》第48卷（1894年2月），第563—565页；同前，第49卷（1894年8月），第85—86页。

在 1893 年以后的二三十年里，宪政体制和财产关系的变更微乎其微。不过，美国社会的其他方面确实发生了变化。美国人似乎在通过不停地运动或是痴迷于那些让人不停运动的活动来逃避危机。职业棒球赛、重量级拳击赛、篮球（发明于 1891 年）以及自行车运动成为 19 世纪 90 年代人们热衷的项目。1896 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雅典恢复，喜欢东跑西颠的美国人赢得了 14 枚金牌，在 4 年后的巴黎运动会上又赢得了 20 枚金牌。1893 年，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那篇论述“边疆的意义”的著名论文，分析了空间在过去 400 年的历史上对美国的特性及其政治制度的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在论文的结语中指出，既然 1890 年的人口调查已经正式表明边疆已然关闭，那么美国的特性和政治制度将会面临怎样的威胁便值得探讨。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为设计一种新的建筑样式使用了开放空间的概念；马克·吐温、布鲁克斯·亚当斯、汉姆林·加兰以及威廉·迪安·霍威尔斯的作品（加上 1892 年沃尔特·惠特曼死后人们对于他的重新认识）则探讨了边疆空间的意义，特别是边疆关闭的未来含意。[1]

当边疆空间、特别是想像中存在的边疆似乎即将消失的时候，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冲击不期而至。正如马克·吐温在《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佬》一书中栩栩如生的描绘，技术已使人类的足迹无所不至。克利夫兰总统在 1893 年的国情咨文中以较少预言意味的话语谈到了边疆消失的意义。同样，温斯洛·霍默凭借他在 19 世纪 90 年代以海洋为素材的杰出作品改变了欣赏者的眼光。这些画并不是欧洲印象主义的色调柔和的海上风景，也不是哈德逊河画派以及后来叱咤美国画坛的艺术家们具有西部风貌的作品。与他们不同的是，既然想像中的旧边疆已经

① 约翰·海安：《19 世纪 90 年代美国文化转向》，见约翰·韦斯主编：《现代意识的起源》（底特律，1965 年），第 25—48 页。

消失，霍默便把人们的眼光引向了美国崭新的边疆，那就是残酷无情而又变幻莫测的海洋。如果说美国人试图逃避自身已失去拓展空间的土地上日益累积的政治和经济危机，那么霍默似乎是在警告美国人，即使通过开拓最伟大的边疆（指大海）来逃避危机，也存在着即便不是更大也会是同样大小的危险。[①]

大多数美国人，即那些靠农场为生的人，对于西部殖民的危险已是屡见不鲜。到19世纪90年代为止，他们已经受过种种打击，比如农产品价格下跌、严酷的冬季、信贷匮乏、运输成本昂贵以及大规模的资不抵债等等。城乡许许多多的债务人转而把白银当作救命良药。主张自由铸造银币的人与冷酷无情的债权人以及华盛顿的官员们迎头相撞。历史学家们一直认为，本杰明·哈里森和格罗弗·克利夫兰两位总统代表着长老会的风格，主张诚实、勤奋和不欠债，反对贴现和信贷。在1890年的妥协案中，哈里森挫败了大规模铸造银币的企图，接下来克利夫兰则在1893年直截了当地摈弃了该项法案。经济信念对于他们的道德规范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克利夫兰政府的财政部长约翰·G. 卡莱尔在其年度报告中铿锵有力地声称，过量输入白银将会破坏美国货币在国际市场的信誉，从而使之面临灭顶之灾。到1892年的时候，美国在世界最大贸易国的名单上已经处在仅次于英国的位置。卡莱尔告诫说，“黄金是惟一的国际货币，所有的贸易平衡都是由黄金进行的。”美国的农场主无法就此据理力争，因为一个多世纪以来，谷物、棉花、烟草以及其他粮食作物的生产者

---

① 詹姆斯·D. 理查森：《总统咨文与文件汇编（1789—1897）》（10卷本，华盛顿，1900年），第9卷，第454页；迈克尔·布伦森：《荷马史诗》，《纽约时报》，1991年3月31日。

一直依据海外市场确定产品的价格。[①]

出入上流社会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为克利夫兰—卡莱尔的论调提供了智力支持。其中出类拔萃而又八面玲珑的人物要数戴维·艾姆斯·威尔斯，此人是一名共和党人，19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以税收专员的身份提出的一篇报告而一跃成为低关税倡导者的主要代言人。其他比如《民族》周刊的E. L. 戈德金等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评论家以及亨利·沃特尔森等大报社的编辑都加入了他的行列。1893年8月，当经济似乎即将滑向深渊的时候，威尔斯宣称由于美国制造商的生产超出了“现有的市场需求”，而且美国的保护性关税还“切断了美国与海外市场的联系”，所以应当是大幅度削减关税的时候了。[②] 1890年，共和党政府通过的互惠贸易法开始下调关税，但是调整的幅度不够。1894年，克利夫兰如愿以偿地撤销了这一法案，并试图以威尔逊—戈曼的低关税法案取而代之，以便允许更加低廉的原材料进口。1894年的政策并没有满足威尔斯、克利夫兰以及其他低关税信徒的愿望，但是作为原则性的法案已经确定，而且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美国经济的未来日益依存于海外市场；扩大银币的铸造将会彻底毁掉而不是助长美元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因此必须降低关税，输入更加廉价的原材料，增加美国产品的竞争力，藉此占领市场。

对于1893—1896年的争论，亨利·亚当斯的手记有完整的概括。1893年，随着金本位制获得通过：

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制度得到采纳，要运行这一制

---

① 罗伯特·凯利：《大西洋彼岸的信念》（纽约，1969年），第316—317页；詹姆斯·A. 巴恩斯：《约翰·G. 卡莱尔》（纽约，1931年），第299—302页。

② 《纽约世界报》，1893年8月8日，威尔斯的文章，托马斯·F. 贝阿德文件，华盛顿国会图书馆。

> 度就必须依靠资本并采取资本的运营方式；让那些与城市临时工人存在古怪联盟的南部和西部农民操控如此复杂和高度集成的机制，简直是荒谬绝伦的事情，正如1800年和1828年所进行的尝试，尽管当时的条件要简单得多，但仍以失败告终。[①]

在西欧，1873年以后经济萧条以及日趋激烈的工业竞争，使各国纷纷转向保护主义政策。此外，在俾斯麦掌控下的德国，大地主和大工业家结成的联盟正在成为欧洲大陆工业资本大本营的政治基石。该联盟的保护主义政策与其支持俾斯麦加速寻求成为真正地区性帝国的政策相得益彰。[②] 在工业生产方面赶上并已超越德国的美国，在关税和农业政策方面采取了与德国完全相反的道路。1890年以后，美国人并没有进一步走向保护主义，恰恰相反，由于高关税所产生的稳定的利益像腾壶一样粘在国会议员身上，在采取了大量修修补补的措施之后，美国人才慢慢地铲除了这些藤壶，转向了可以进口廉价食品和原材料的低关税政策。至于农民，则成了1870年以后工业革命所缔造并奉若神明的圣坛之上的祭品。与俾斯麦领导的德国不同，平民党玛丽·伊丽莎白·利斯在其著名的公告中告知美国农民要“减少玉米的种植以便扩大销售”。但是，无论是她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告诉他们如何在减少玉米的种植的同时，扩大它在世界市场的销售，并且驾驭银行家—工业家不断扩大的权势。

1895年，一位经济学家向英国皇家统计协会通报说，至少从1879—1881年起就已经大势已定了。在纽约，《布雷兹特里

---

① 亨利·亚当斯：《亨利·亚当斯的教育》（波士顿，1930年），第344页。

② 汉斯—乌尔里希·韦莱尔：《工业增长与德国早期帝国主义》，见罗杰·欧文与鲍勃·萨特克利夫主编：《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纽约，1972年），第80页。

特》开辟了两个整版的专栏供R. F. 克劳福德对此进行分析。自19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大量肥沃处女地”的开垦使得美国农民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种植较多的小麦。此后，农民一直遭受世界市场价格萧条的打击，但是更糟的情况还在后头。一旦俄罗斯的跨西伯利亚铁路竣工并开垦出大量肥沃耕地以后，俄罗斯的小麦将会把美国的谷物赶出世界市场。其他观察家还同时指出，印度和阿根廷也正在成为粮食出口大国。到1894—1895年间，经济分析人士逐步达成了一致：美国主要农产品的价格下跌似乎已经不可避免，所以上上之策乃是对此善加利用，即维持农产品的低价以便降低劳动力和制成品的成本，从而使美国的工业品在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商品的同时，也成为质量最佳的产品。美国的贸易数字似乎表明牺牲农民的做法已初见成效。1895年9月的《商业杂志》指出，“1895财政年度令人瞩目的特点之一是，工业制成品所占的庞大比重”。农产品在占据了三个世纪的主导地位以后，工业品开始取而代之，逐步成为美国首要的出口产品。[①]

《巴尔的摩太阳报》详细分析了其中的内在联系：

> 在我们曾经认为几乎由我们独家控制的市场上，来自其他国家的棉花、小麦、石油和畜产品正在同我们的产品展开竞争。时不我待，我们的制造商必须帮助扩大我们的出口总量，通过减少国内市场对本国产品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的消费者能够享受到外国产品竞争的好处，这样削减关税的效应必定会迫使美国制造商为自己的产品寻找国外市场。[②]

① 《布雷兹特里茨》，1895年4月27日，第259页；《舆论》，1895年9月5日，第315页。

② 《巴尔的摩太阳报》，1895年5月27日，贝阿德文件。

1893年，克利夫兰总统通过国情咨文结束了这场争论。他明确宣布劳工的真正利益不在于从高关税制造的“狭小市场”中获取帮助，而应是能够获取廉价原材料的低关税政策和能够带来充分就业的空前庞大的市场。[①] 格雷沙姆道破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含义：美国既不需要也不希望把夏威夷作为正式的殖民地；这种正式的、兼并主义的帝国政策对美国的宪法构成威胁，而且，美国的未来取决于开放的市场，而不应寄托在欧洲帝国主义分子身上，因为他们试图建立正式、封闭的帝国以逃避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严酷现实。一旦农民被放到恰当的位置，工业生产“加足了马力”，关税也不再是妨碍能干的美国人进入世界市场的藩篱，那么美国所有的政策也就浑然一体了。

19世纪90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转变的历史意义开始凸显。在商界领袖要求以“拓展贸易、与外国人做生意”为宗旨对领事机构进行改革的强大压力之下，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与克利夫兰密切合作，加强了对外交机构的审核。美国的外交机构终于做好了进入20世纪的准备。成立于1895年的全国制造商协会（NAM）不仅在这次变革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还要求政府建造一支庞大的商业船队、开凿地峡运河并与拉丁美洲市场建立牢固的联系。全国制造商协会提出的这些要求以及其他许多美国人的要求与英国人的意图迎头相撞。全国制造商协会的一位创始人在阐明了这一观点以后还谈了其他几点看法：“英国人每天来到这里用二等公爵或三等伯爵来换取我们美国上等的姑娘，而且还能赚上几百万美元。次日，他们全班人马又会搭乘英国的客轮返回利物浦。我们甚至连那些伯爵、姑娘或者金钱返

① 理查森：《总统咨文与文件汇编》，第9卷，第459页。

同利物浦的运费都赚不到一点”。[1]

不过，美国人的反击即将展开。19世纪90年代，外国人在美国的投资开始由美国本国的资本取代，而且美国资本还首次在海外拉开了同英国以及欧洲其他投资商竞争的序幕。1890年，伦敦巴林兄弟公司的破产是一个转折，这家公司在整个19世纪向美国注入了大量的资金。19世纪的经济萧条促使外商抽回资本或是转向了能够使人一夜暴富的澳大利亚矿业以及阿根廷的粮食种植。但是，由于储蓄率高得令人难以置信，而工业又在“加足马力”生产，美国人的资本开始富足起来。据估计，美国人的海外投资在不景气的90年代一跃增加了2.5亿美元。1898年，时任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的约瑟夫·C. 亨德里克斯简明扼要地描述了这一变化：“盎格鲁—撒克逊人扩大市场的欲望在我们身上膨胀起来。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世界的粮仓，而如今我们又渴望成为世界工厂，然后我们还要做世界的结算中心。”[2]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经济萧条的恐惧以及牺牲农民利益的政策到头来却缔造了一个第二号的世界帝国。1870年以后的工业革命造成了1873年以后的社会和政治混乱，使建立扩张性和开放性的海外帝国成为必要。这种新兴的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要求社会的稳定和有序，而是要求通过获取海外机会来逃避国内社会的混乱。

---

① J. 波特致奥尔尼，1895年9月30日，《奥尔尼文件集》；艾伯特·K. 斯泰哲沃尔特：《全国制造商协会——组织与政策（1895—1914）》（博士论文，密歇根大学，1953年），第71—72页。

② 查尔斯·霍夫曼：《90年代的萧条》，《经济史杂志》第16卷（1956年6月），第156—157页；托马斯·麦考密克：《中国市场》（芝加哥，1967年），第35页。

三、世界博览会：一支世界级海军的展示

1893年，事实已经变清楚起来：到海外寻求机会可能会进一步增加而不是减少混乱。此外，同其他危机一样，巴拿马、萨摩亚、智利以及夏威夷的事态都生动地说明，每一个事件都有美国海军的干预，美国需要海上力量来维护其利益。

1893年规模巨大的哥伦布展览会，即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是研究美国新兴工业势力同年轻的海军如何联姻的一个极好的个案。工业博览会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新型电动机器的展示，令亨利·亚当斯的内心感到震撼，因为它公然违背了被他视为19世纪之基石的物理和历史法则。科学（以及社会）的震撼力来自于那些似乎用铅装饰过的展品以及新古典建筑风格的展览大厅。这似乎意味着，这些科学和工业展品虽然未知但必定会带来的混乱，需要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所暗示的那种保险措施和控制能力。然而真正的控制力来自占地30英亩并成为最受欢迎展区之一的展览：美国海军展出的“伟大的白色舰队”，包括3年前已经获准建造的美国第一批战舰的全真模型，大小与真的一模一样。[①]

舰队模型之所以成为世界博览会设备展区的焦点，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它代表着国家的成就和荣誉，从这一意义上它也象征着美国爱国团体（比如美国革命女儿会、美国海军团和1812成立的美国女儿会）近年来的惊人发展。正如一位观察家所称，这些团体代表着“一股爱国主义的伟大潮流”，在1880

---

① 罗伯特·W.赖代尔：《一场全世界的博览会》（芝加哥，1984年），尤其是第40—48页；詹姆斯·马斯顿·芬奇：《美国建筑》（纽约，1973年），第207—212页。

年以后的岁月里，当美国人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不确定性中寻求历史庇护的时候，他们纷纷卷入了这一洪流。以伟大的白色舰队的威武形象和技术突破为先导的、不断壮大的美国海军完美地体现了这种爱国主义——1897 年海军乐队指挥约翰·菲利浦·苏泽在执笔撰写新的民族进行曲“星条旗永远飘扬”时所准确把握的一种爱国主义。其次，舰队展区成为展览的重头戏，也是因为它是大型工业博览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于美国的重大经济利益位居世界前列，且遍布世界，所以它们也成了造成动荡和混乱的诱因，因为，当经济的发展与政治和社会传统相冲突时（以及外国入侵与民族主义冲突时），发生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这样，海军就不得不出面干预，而且必须是有备而来并占据绝对优势。

新型舰队的建设甚至比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式的工业复合体的发展还要迅速。19 世纪 80 年代，英国海军拥有 367 艘现代战舰，而美国的军舰总计 90 艘，其中 48 艘能够发射一枚火炮，38 艘为木制军舰。内战时期的舰队已经近乎解体，但其人员编制还保存完好，至少从数量上是这样的：几乎每一名士兵就有一名军官领导。然而，这支装备不足且头重脚轻（军官过多）的舰队似乎始终不渝地执行着捍卫美国广泛的海外利益的使命，从海军上将罗伯特·舒菲尔特的历史性航行，到 1893 年失败的夏威夷革命。1889 年，美国在萨摩亚与德国几乎发生战争，使美国举国上下都特别关注一个令人难受的统计数字——美国海军世界排名第 20 位，甚至赶不上土耳其、中国和奥匈帝国。海军官员早就在游说国会，宣扬经济利益与军事势力存在着内在的必然性。他们得到了钢铁生产商和轮船制造商的襄助。这些制造商通过政府的造舰拨款实现了缓解经济萧条困扰的愿望，从而这些年成为——用本杰明·富兰克林·库林的话说——“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形成时期”。因此，1882 年美国首批四艘现代化战舰的

合同便承包给了轮船制造商约翰·罗奇。还没有等到军工复合体的后续阶段到来，罗奇已经严重亏损，生产陷于停顿，同时也难以达到海军所要求的不断变化的标准。1885年罗奇破产，两年后因压力过大而死。此后，伯利恒钢铁公司和安德鲁·卡内基开始涉足这一领域，开始更加系统化地发展军工联合企业，并且开始盈利。①

从另一个层面上讲，有两个人从战略上和政治上为新型海军的创建提供了基本依据。第一位是本杰明·哈里森政府的海军部长本杰明·特雷西。作为一名坚定的帝国主义分子、成功的纽约律师和精明能干的政治家，特雷西凭借其1889和1890年的年度报告，成功地为美国首批三艘现代化战舰申请到了拨款。特雷西把萨摩亚危机的教训与海军学院（新建于罗德岛州的纽波特）的一股新兴的激进思潮罗织在一起。他还利用了1875年以来共和党首次控制国会参众两院的有利条件，主要依靠共和党的党派立场推动国会批准了一系列的海军政策。②

另一位是同一时期出现的海军上校艾尔弗雷德·萨耶尔·马汉。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马汉还是一位民主党人和反帝国主义者，而且是一位已届中年的海军军官。他在阅读古罗马著作的过程中突然发现了他和自己那帮已是末路穷途的军官团的同事们寻觅已久的证据，按照他对历史的解读，也就是找到了证据，能够证实是海权而不是陆权决定了罗马帝国发展史上的盛衰转折。马汉在海军学院完成其理论以后，于1890年出版了他的

① 肯尼斯·J.哈根：《美国的炮舰外交与旧式海军（1877—1889）》（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1973年），第188页；本杰明·弗兰克林·库林：《灰色钢铁与蓝色海洋造就的海军——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形成时期（1881—1917）》（康涅狄格州汉登，1979年）。

② 肯尼斯·J.哈根：《本民族的海军——美国海权的形成》（纽约，1991年），第194—197页。

权威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当时适逢萨摩亚危机爆发以及特雷西1890年年度报告发表之际。马汉把那个时代的问题，即美国工农业生产的扩大，同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的必要性直接联系起来，认为这支舰队应当有能力保护美国的对外贸易，在战时则能够摧毁敌人的对外贸易，并且应当能够在决战中歼灭敌人的舰队。这种舰队需要加煤基地和用作休整的临时停靠港口。因此，马汉要求吞并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海军基地。1893年克利夫兰拒绝占领夏威夷以后，马汉摇身一变成为一名共和党人。马汉的著作使他很快成为西奥多·罗斯福这位年轻的强势人物的密友。罗斯福渴望一支强大的海军，他在《大西洋月刊》上对1890年出版的这本书发表了一篇颇具鼓动性的书评（他断言，“我们最为迫切的需要就是一支战斗舰队”）。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马汉不仅在华盛顿，而且在伦敦和东京也成了受人尊崇的名人。他在1894年的一封家书中自豪地写道：“《伦敦时报》一再称我是哥白尼，哥白尼提出了太阳中心说……而我则指出了海权是其他一切事态围绕它发展的中心，而不是相反。”①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马汉和包括罗斯福以及国会强势议员在内的其他一些人一致断言，用马汉的话说就是，美国不断扩大的生产能力要么通过他所深恶痛绝的“社会主义”政策把剩余产品在国内加以消费，要么跨越新“边疆”、即海洋，去寻找市场。②不过，进军海外市场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而这些冲突可能升级为战争。在马汉看来，在一个日趋封闭的世界里，这种战争是工

---

① 罗伯特·西格二世和多丽丝·D. 马圭尔主编：《艾尔弗雷德·萨耶尔·马汉书信与文件集》（三卷本，安纳波利斯，1975年），第2卷，第342、361页；《大西洋月刊》第66卷（1890年10月），第567页。

② 艾尔弗雷德·萨耶尔·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波士顿，1890年），第35、39页。

业取得成功自然而然且不可避免的后果。竞争不是带来秩序，而是导致不稳定和冲突的发生，因此舰队是必不可少的。舰队的作用与其说是用来强行维持秩序，还不如说是创造并保护迫切需要的商业机会。必须强调的是，在寻求市场的行动中，无论马汉还是他的海军同仁，都不是在为某种特定的经济利益而进行游说。事实上，他们瞧不起很多商人，认为他们自私、狭隘，对海军不得不为他们承担的风险麻木不仁。由于同样的原因，马汉以及其他军官甚至更加讨厌传教士。但是，在这些海军军官看来，他们是在为国家的利益效忠。马汉认为，服务于扩张主义的经济政策才是他们的中心目的，这是维护现行制度并防止进行任何社会主义制度尝试的一个先决条件。

马汉很清楚他对历史的解读还有另外一些含意。他鼓吹新兴的美国必须实行新型的总统制，总统可以迅速果断地在海外采取行动，而不应固守陈旧的政治信条，受制于一部 18 世纪的宪法。马汉为 20 世纪的总统制提供了基本的依据，这种总统制的形成得益于外交危机并且摆脱了国会的制衡，最初的代表是麦金莱和西奥多·罗斯福。马汉还从理论上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并不真正需要商船运输队（美国的商船队自 1860 年达到历史高峰以后就迅速消失了）。任何人都可以运输货物；美国的资金应当投入到效率更高的生产领域，或是用于建造海军舰队以保护其商业利益。总之，马汉强调开发海外市场的必要性，因而也强调发展海军的必要性。马汉在 1895 年还指出，由海军舰队的整体移防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正当我们希望开始调遣的时候，中美洲或者南美洲、海地或者其他地方便发生了骚乱，结果就要有一两艘军

舰前去应付。”[1]

四、中日战争

19世纪90年代，诸如此类的“骚乱”层出不穷。1894—1895年，在亚洲这个令马汉、25年前也曾令西华德心驰神往的重要地区，爆发了一场远不只是骚乱的战争。1895年初的亚洲同样也引起了克利夫兰总统和美国商界领袖的勃勃兴致。直到1894年，英国势力的存在和中国并不那么可靠的自卫能力，一直维持着亚洲地区的脆弱均势。事实上，在1876—1882年朝鲜开放国门期间，这一均势已经先后遭到了日本和美国的破坏。随着日本工业和军事实力的发展，朝鲜逐步摆脱了中国人的直接控制。与此同时，由于俄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伯爵高瞻远瞩，在他的领导下俄国把西伯利亚铁路铺设到了满洲里以及日本视为对其安全直接构成威胁的地区，因而亚洲的另一个难题也开始失控。外来商品和传教士的大量涌入对东亚失去稳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美国驻华公使田贝所述，此两者密切相关：“凭着一种神圣的热忱，传教士们奔走四方，而对外商贸活动也步其后尘，随之兴起。”[2]

1894年4月，日本抓住朝鲜的一次排外事件向中国宣战，脆弱的均势开始倾覆。日本人的速战速胜令世界为之震惊，欧洲列强于是试图通过调停冲突来阻挠东京实现其图谋。他们也曾请求格雷沙姆一起行动，但遭到拒绝。格雷沙姆并没有违背西华德制定的与欧洲合作的政策。事实上，美国军舰与欧洲舰队共同保

---

① 艾尔弗雷德·萨耶尔·马汉：《美国的海权利益——现在与未来》（波士顿，1897年），第71—72页；马汉致瑟斯菲尔德，1895年11月21日，艾尔弗雷德·萨耶尔·马汉文件，华盛顿国会图书馆。

② 麦考密克：《中国市场》，第67—68页。

护着中国的开放港口，格雷沙姆还把美国海军派往朝鲜保护那里的侨民及其财产。但是，正如格雷沙姆事前对日本人提出的警告，要他们不要试图获得完胜，否则欧洲人将会干预，“要求做出不利于日本未来安全和福祉的安排”。最后，格雷沙姆单方面提出美国将防止出现这种局面，以向日方表达善意。在战后的和谈中，日本几乎得到了它所要求的全部东西：中国对日巨额赔款；朝鲜独立；福摩萨（台湾）割让给日本；以及中国在贸易领域给与其他外国人新的、广泛的贸易特权。至为重要的是，日本人获得了富有战略意义的辽东半岛的特权，控制了通往满洲的门户，因而突然间处在了阻挡俄国前进的要冲，藉此日本可以利用亚洲可能最为富庶的市场。接着日本人又于1895年底通过煽动军事政变使亲日政权控制了朝鲜。美国驻汉城的首席外交官霍勒斯·阿伦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且试图让俄国的势力进入朝鲜以制衡日本。国务院对他进行了训斥并否定了他的政策。①

的确，在整个1894—1895年间，格雷沙姆和奥尔尼都先后毫无保留地支持日本。1895年6月8日，华盛顿在给驻华外交官发出的照会中，以与四年后著名的门户开放照会极为相似的措词，要求在朝鲜和中国实行机会均等和贸易自由的政策。日本被视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认为它反对俄国、德国以及法国试图以封锁的方式分割中国部分地区专供本国开发的做法，甚至直到日本行将吞并整个朝鲜的时候，美国也没有表示任何不悦。欧洲列强则不然。正如格雷沙姆所预料的，它们在1894—1895年逼迫东京官员放弃了对朝鲜的权利要求，特别是放弃了通往满洲的门户辽东半岛，此举令日本举国震惊。维特制定的方

① 同上，第49—50页；庞斯福特致金伯利，1894年8月10日，机密文件，外交部5/2234，公共档案局，英格兰克佑区；弗雷德·哈维·哈林顿：《上帝、财神与日本人》（麦迪逊，1944年），第15章。

针是：使沙皇尼古拉二世确信，只有等到西伯利亚铁路开通，也就是大约20世纪初期的时候，俄国军队才有可能主宰中国的未来。维特认为，在此之前圣彼得堡不会允许其他任何列强，尤其是日本，在中国获得滩头阵地。在法国和德国的协助下，维特迫使日本放弃了在和谈中从中国攫取的大量权益。华盛顿和伦敦方面对日本均爱莫能助。日本人做出了让步，他们开始拼命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军事能力，以便为与俄国不可避免的摊牌做好准备。[①]

美国人密切关注着围绕四分五裂的中国所产生的日益尖锐的冲突，并奉行一种双轨路线。一方面，他们对日本人表现出同情和羡慕之感，正如1895年底《费城通讯》的报道，“美国人不能不希望他们获得成功。日本的确是东方的太阳，不是已薄西山的夕阳，而是冉冉升起的朝阳，昭示着它的未来。”另一方面，美国的政策又是在掠夺中国的竞赛中，通过条约规定的港口或是通往内地的口岸尽可能地攫取美国的经济利益。其目标不是稳定而是利润。田贝强调，追逐特许权的美国猎人能够找到好的猎物，因为中国需要用钱支付战争赔偿。当外国政府帮助它们的企业与软弱可欺的中国官员做交易的时候，美国公使再也按捺不住了。他要求华盛顿当局允许他照方抓药。在1895—1896年间，国务卿奥尔尼首开先河，他指示田贝帮助美国商人找到接近中国官方要员的门路，尽管美国公使的目的并不是讨美国人的欢心。日趋激烈的竞争迫使美国人不得不放弃自由放任主义的又一个信条。[②]

---

① 邓致格雷沙姆，1895年5月2日，急件—日本 国家档案馆—档案分类45；W. G. 比斯利：《现代日本的兴起》（伦敦，1990年），第147页。

② 艾尔弗雷德·瓦格茨：《世界政治中的德国与美国》（德文版，两卷本，纽约，1935年），第2卷，第960—961页；《费城通讯》，1895年12月12日，第6页；麦考密克：《中国市场》，第79—82页。

但是，新政策还远远不够。中国外交领导人李鸿章访问美国时美国为给他捧场而举行的盛大宴会，其效用也是如此。奥尔尼和田贝支持美华开发公司获取有利可图的京汉铁路特许权的企图。该公司组建于1895年，成员包括一些势力强大、靠巧取豪夺发家的“强盗资本家”，比如花旗银行行长兼洛克菲勒财团顾问詹姆斯·斯蒂尔曼、库恩—洛布公司的雅各布·H. 席夫，以及E. H. 哈里曼和卡内基等。然而由于英国人的暗中反对，再加上中国人的请愿活动，尤其是该公司的资金不足等原因，这项努力终告失败。与此同时，俄国人于1896年签署了《李鸿章—罗拔诺夫条约》，获准控制中国东部铁路作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端。中国人不惜一切地试图制衡俄日两国。然而在美国人看来，俄国才是1894—1895年战争真正有威胁的胜利者。美国公使馆秘书田夏礼（小查尔斯·登比）写道：“这场战争对于（中国）向西方商业和文明开放如此巨大的领域所起的作用，超过了500年以来的外贸往来和100年以来的传教活动”。1895年以后，克莱姆轮船制造公司、联邦钢铁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以及其他寻求特许权的美国企业试图进入这一“巨大的领域”，但是与俄国人的成就相比就显得微乎其微了。事实上，美国人当时找到了一个并非神话而是实实在在的日本市场。美国轮船制造商获得了大量日本新型军舰的建造合同，日本还成倍地扩大了从美国的棉花进口。同样，日本的工业制成品在美国的销路也出乎意料的好。随着中国的衰弱，列强之间也在进行新一轮的政治经济组合，这对美国进入下一个世纪的外交政策构成了影响。[1]

---

① 登比致奥尔尼，1896年5月25日，奥尔尼文件；小查尔斯·登比（田夏礼）：“美国在亚洲的机会”，《北美评论》第66卷（1898年1月），第32—39页。

五、美洲主义原则和英国的绥靖政策

西半球同样出现了类似的联盟重组，但是相对简单。英国在新大陆众多事务中的优势迅速地让位于美国的霸权。这一新的转折可以得到准确的认定：因为1894--1896年的一系列对抗，每一次都以英国的让步告终。

第一次对抗发生在里约热内卢港口。依据1890年的关税法，美国与巴西于1891年签订了一个至为重要的互惠条约，从而进一步密切了美巴关系。早在1889年就已废除君主制的巴西共和国开始视美国为样板以后，两国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然而，1893年巴西海军士兵发动了反对共和国的叛乱，并得到了英国利益集团精心策划的秘密援助，因为它们认为这是阻止美国进一步扩大影响的一次机会。叛军宣布，他们将通过封锁贸易、中断里约热内卢的关税征收来摧垮政府。由于美国舰队司令表示愿意尊重叛军的封锁行为，他立即被格雷沙姆解职，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新的舰队司令，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这位后来者具有早年在亚洲海域服役的经历，懂得什么是炮舰外交。

格雷沙姆之所以采取这一步骤，既是因为美国特殊利益集团（包括洛克菲勒美孚石油出口办事处，它已直接给格雷沙姆去信）要求保护他们在巴西不断扩大的市场，同时也是出于国务卿本人的一种信念，即英国是在挑战门罗主义和美国在西半球保护友邦利益的权利。英国大使朱利安·庞斯福特非常仰慕格雷沙姆（特别是与布莱恩明目张胆的反英活动相比较而言），格雷沙姆对他也是礼尚往来。但是相互之间的崇拜之情并没有妨碍国务卿命令美国军舰护送美国商人进入里约港海关，而且授权必要时可以用武。1894年1月底，当叛军阻挠护航行动的时候，美国舰队司令下令向叛军的船头上方开了一炮。叛军随之后退，暴乱得以平

息，里约港重新恢复了商品的自由出入。心存感激的巴西政府专门树立了门罗总统的一尊雕像，以纪念如今已经声名远扬的门罗主义，此外还下令在7月4日举行庆祝仪式，并且为美国公使馆人员献上了一支优美的小夜曲。[①]

第二次对抗发生在尼加拉瓜境内濒临大西洋的一块飞地——莫斯基多印第安人居留地。操英语的印第安人和黑人被马那瓜政府以语言、历史和难以穿越的丛林远远地隔离开来，自1860年以来成为英国的一块保护领地。由于莫斯基多即将成为通往尼加拉瓜地峡运河的门户，所以英国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外，英国投资商还得益于这一地区的自然资源，尤其是该地区的红木森林。然而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几百个美国人在此投资累计已达到200万美元，与美国本土的贸易额达到400万美元。据美国公使估计，19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人至少控制了居留地90%的财富。1894年，何塞·桑托斯·塞拉亚将军新成立的尼加拉瓜政权准备把其管辖权扩展到居留地——布鲁非尔兹地区。当时英国人威胁要以武力保护其领地，格雷沙姆于是召见了庞斯福特，正告他尼加拉瓜有权控制自己的国家，并建议英国人撤军。伦敦政府果然照办，结果却导致以美国人为首的外国投资商要求让英国军队保护他们不受塞拉亚政权的统治。当塞拉亚开始逮捕英国公民的时候，他们的担忧变成了现实。伦敦发出威胁，准备以武力保护其公民。在自身的门罗主义观念和美国投资商的要求的驱使下，格雷沙姆再次向美国人和英国人保证，他将保护

---

① 约奥·潘迪亚·卡洛盖拉斯：《巴西史》（珀西·阿尔文·马丁翻译并编辑，查佩尔希尔，1939年），第292页；格雷沙姆与庞斯福特的谈话备忘录，1895年2月5日，英国照会，第123卷，国家档案馆 国务院一档案分类59；威廉·洛克菲勒致格雷沙姆，1894年1月4日，第4档案区，第23盒，1月1—8日的文件夹，海军档案，国家档案馆，档案分类45；约瑟夫·史密斯：《冲突的幻觉》（匹兹堡，1979年），第163—184页。

他们所有人的利益。这样，在西半球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地区，国务卿用美国的保护取代了英国的保护。[①]

第三次危机几乎走到了爆发战争的境地。以事后的眼光来看，危险在当时是被过度夸大了，但是它却成为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外交关系的转折性事态之一，标志着美国的强权得到了英国的承认，这在西华德时代还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事件的起因发端于半个世纪以前，当时伦敦宣布对英属圭亚那和委内瑞拉之间有争议的领土拥有控制权。直到 19 世纪 90 年代该问题基本上处于蛰伏状态，当时大不列颠方面似乎认为它已控制了这一地区，但是委内瑞拉却把这一问题捅到了克利夫兰当局面前——尤其是雇用了一位名叫威廉·L. 斯克鲁格斯的院外说客，此人卓有成效地宣传了委内瑞拉方面的观点。除了其他一些问题，斯克鲁格斯还指出，这一地区包括奥里诺科河在内，而这条水上通道可以控制进入南美大市场的商业。对于英国人在西半球的野心以及欧洲帝国主义分子瓜分其他南部大陆的企图，美国人至今仍然高度敏感。参议员亨利·卡博特·洛奇，罗斯福和马汉的一位密友，描述了委内瑞拉人提出领土要求的历史背景："这些列强已经占领了太平洋的岛屿，瓜分掉了非洲。大不列颠难以在东方拓展殖民地了……如今，她把目光转向了南美"。[②]

英国人似乎泰然自若，原因可能是格雷沙姆在 1895 年 4 月 12 日的一封密信（此信最近才被发现）里向伦敦方面保证了"美国人民的纯真友谊"以及美国舰队在加勒比地区并非出于对英国利益的敌意。这封信很可能是在暗示莫斯基多居留地问题上

① 戴维·希利：《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霸权努力（1898—1917）》（麦迪逊，1988 年），第 32—34 页；国务卿与朱利安·庞斯福特爵士的会谈，1894 年 7 月 26 日，英国照会，第 124 卷，国家档案馆，档案分类 59。

② 希利：《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霸权努力（1898—1917）》，第 33—34 页。

的冲突，但是白厅完全可以从这封低三下四的信中诠释出更多的意思来为自己开脱。[1] 然而，写过这封信不久，格雷沙姆就去世了，奥尔尼接替了他的位置。同年7月，他发出了一封完全不同的信函。除了要求门罗主义得到尊重以及英国把争端提交仲裁之外，奥尔尼还特意奉告伦敦方面："如今美国实际上已是这块大陆的最高主宰，它的命令就是大陆臣民的法律，美国的干预以这些大陆臣民为限"。对于为什么使用了上一代人未曾听说过的这种表述方式，奥尔尼进行了解释：美国"无穷的资源"，"连同与外界隔绝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时局的主宰，事实上对于任何、所有列强来说，它都是坚不可摧的。"

为了处理更为紧迫的外交事务，疑惑不解、心神不宁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迟迟没有答复。然而当他真正做出回复的时候，他完全否定了奥尔尼的论据，包括对于神圣不可侵犯的门罗主义的援引。克利夫兰总统于12月公开宣布，美国将自行展开边界勘察并将结果付诸实施。索尔兹伯里终于认识到他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门罗主义的重要性以及奥里诺科河对于美国人的重大意义。此外，他还面临着与德国和非洲问题有关的一系列严重危机。当美国人已经急于求战的时候，英国人还在莫名其妙地观望。西奥多·罗斯福在给洛奇的信中写道："我真希望我国人民的情绪不会有任何消退。我不在乎我们的沿海城市会不会遭到炮轰；我们将把加拿大拿下。"索尔兹伯里于是把这一问题提交仲裁。委内瑞拉的要求大部分得到了支持，特别是它对奥里诺科河

① 我非常感谢迈克尔·休厄尔和沃伦·金博尔为我提供这条参照，它出自：格雷沙姆致罗斯伯里勋爵，1895年4月12日，塞西尔—斯普林·赖斯文件，1/57，丘吉尔学院档案中心，剑桥。

河口的要求——尽管美国人从来就无暇过问委内瑞拉人的意见。[①]

这些事件影响深远。美国一而再再而三地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抗，而且三战皆赢。美国外交家不是狭隘地而是宏观地看待这些问题，这在 1873 年以后一系列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在巴西，问题的根本在于维持人们对于美国商品和美国意识形态的态度业已发生的重大转变；在尼加拉瓜，那是谁将控制大量资源和具有全球意义的战略要点的问题；委内瑞拉的问题有两层含义——即由谁来解释门罗主义以及由谁来控制这块大陆的重要水上商路。精明的英国人明白，他们必须与新大陆这个新兴的工业国达成和解。

英国工业力量的相对衰落，加上来自德国日益激烈的竞争，使约瑟夫·张伯伦（英国前殖民大臣）在谈及此事时说，“疲惫不堪的巨人正蹒跚而行，头上顶着这颗决定其命运的过于庞大的宝珠”。一位历史学家总结说，英国人试图通过“安抚”美国来摆脱困境，以便能够避免与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兄弟姐妹发生战争。这样，伦敦方面就能够更好地准备其他地方的战争。一个潜在的敌人就这样变成了患难之交。只有拉丁美洲人似乎感到若有所失。智利驻华盛顿的公使评论说，如果华盛顿能够从索尔兹伯里手里得分，那么“美国将会成功地建立一个包括整个拉美在内的保护领地”。拉美各地的社论讨论了“来自巨人令人窒息的压力”，因为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试图“单独建立一个纵贯南北两极的殖民政府”。1895 年末，约翰·巴塞特·穆尔私下里做过更为适度和准确的评价：“自从两年前的〔经济〕恐慌开始，美国

① 希利：《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霸权努力》，第 32—35 页；西奥多·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埃尔廷·E. 莫里森等编，8 卷本，马萨诸塞州剑桥，1951—1954 年），第 1 卷，第 500—501 页。

一个相当好战的党派就已经成长壮大，该党认为一场战争对于这个国家将会是一件好事。”[1]

六、转折之年：1896

1896 年的总统大选反映了 1873 年以来的各种变化，但并不是因为“主战派”决定了这次选举的结果。美国的总统选举政治几乎向来如此，即选举结果取决于内政而不是外交。1896 年选举的意义在于长期的经济萧条，尤其是 1893—1896 年的经济危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 10 年来的外交也起了同等程度的决定作用）。为对付那场危机而达成新的政治共识的共和党及其代言人麦金莱的上台，决定了美国此后 16 年的外交政策。

1893 年美国经济崩溃之后，民主党的灾难便接踵而至。在 1894 年的国会选举中，经济危机爆发时仍旧控制行政部门和国会的民主党丢掉了 113 个众院席位。选举前他们在国会占据 61%的席位，而选举后只占 29%。在长期以来民主党势力一直非常强大的新英格兰州，民主党事实上已被扫地出门，因为他们原有的 8 名众议员已减至 1 名（“甜心—菲茨”，即菲茨杰拉德，约翰·F. 肯尼迪的祖父）。民主党候选人的挑选产生了经济危机未曾给民主党带来的影响。直到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许多种族群体仍旧十分钟爱民主党，因为其理念是有限的政府和自由放任。然而，1896 年民主党的总统提名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

[1] 保罗·肯尼迪：《战略与外交（1870 -1945）》（伦敦，1983 年），第 23—24 页；弗雷德里克·B. 派克：《智利与美国（1880- 1962）》（印第安纳州诺特丹，1963 年），第 137 页；理查德·范·奥尔斯泰恩：《门罗主义》，见亚历山大·德康德主编：《美国对外政策百科全书》（三卷本，纽约，1978 年），第 2 卷第 593 页；查尔斯·C. 坦西尔：《托马斯·F. 贝阿德的对外政策（1885 - 1897）》（纽约，1940 年），第 714—715 页。

却是一位中西部的虔敬派教徒，笃信社会进步和新教徒的使命。他的对手威廉·麦金莱一面淡化共和党虔敬派的传统，一面发起了一场范围广泛的竞选运动，即他先是作为众议员后又作为州长在种族多元化的俄亥俄政坛上所学会运作的那种竞选运动。结果，他在1894年以前还投民主党选票的移民和城市群体中大获全胜。[①]

外交政策在竞选中仅起次要的作用。民主党的竞选纲领对于门罗主义顶礼膜拜，并对一年前再次爆发的古巴革命表示“同情”。共和党人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海外事务。他们要求由美国“控制”（没有直接说占领）夏威夷；占领尼加拉瓜运河以及丹麦属下的西印度海军基地；坚持门罗主义以及“欧洲列强最终从西半球撤军”的原则得到落实；要求西班牙从古巴撤出，或是利用“美国的影响力帮助恢复和平并赋予这个岛国独立地位”。平民党的领袖赞同布莱恩的观点，持坚定支持古巴的立场，其原因部分在于这种立场在好战情绪日益升温的西部很受欢迎，部分在于他们希望能够借此吸引那些对平民党热衷于银价制而心怀不满的人。麦金莱则强调保护主义的关税政策和互惠互利。英国人一直讨厌麦金莱，直到他们发现为金银复本位制奔走呐喊的布赖恩确实更加糟糕（“黄金单一本位制是英国的一项政策”，民主党的政纲是这样宣扬的）。最终，麦金莱不仅进行了一场资金充沛、组织完善的竞选运动，受到了中西部和东北部各州城市人口集中地区的欢迎，而且他还非常幸运，因为这时美国的贸易顺差已从1895年最后四个月的4600万美元猛增至1896年同一时期的9600万美元。贸易顺差，再加上欧洲人放慢了出售美国债券的

① 乔尔·西尔比与塞缪尔·麦克斯文尼主编：《投票者、政党与选举》（肯塔基州列克星敦，1972年），第186—190页；另一种观点参见：阿伦·J.利奇特曼：《19世纪美国政治联盟的重组与投票行为的“种族文化”特征》，《社会史杂志》，第16卷第3期（1983年），第55—82页。

速度，以及世界黄金产量的突然增加，使贵金属大量流入美国，导致物价回升，经济发展的乌云散去，银价制的呼声顿时黯然失色。[①]

麦金莱以271张选举人票对176票赢得了大选的胜利，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给美国的集团政治深深地打上了1894年选举结果的印记。在人口众多、生活富裕的北方，共和党占据了优势地位，民主党则在非常贫穷的南方牢牢控制着权力，结果是，不仅共和党在此后仅有8年例外的36年里一直稳居优势，而且由此而来的一党控制一州的局面也挫伤了选民投票的积极性。美国精英集团——麦金莱率领下的银行家、工业家以及大型商业农场主——由是与激进主义绝缘。在这种坚实的、不断扩大的政治共识的基础上，外交政策是可以制定和实施的，不会有骤然转折的危险，1893克利夫兰拒绝哈里森兼并夏威夷的政策就是一个例证。这种结局事实上是任何一位总统都梦寐以求的事情。大选过后，马汉显然以宽慰的心情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这是这个时代"最为重大的事件"，而且"我并没有把内战排除在外"。布赖恩"错误的，甚至具有革命性质的"竞选纲领已经遭到了摈弃。[②]马汉和麦金莱准备使美国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混乱之中一跃而成为新世纪的海外帝国。

---

① 《1896年民主党全国大会官方纪录》（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896年），第192页；《第11届共和党大会官方纪录》（圣路易斯，1896年），第84页；欧内斯特·R. 梅：《帝国般的民主国家》（纽约，1961年），第75页；关于新一轮黄金进口所产生的效果，参见：柯蒂斯致小查尔斯·W. 达布尼，1896年10月14日，见W. E. 柯蒂斯文件，华盛顿国会图书馆。

② 沃尔特·迪安·伯恩汉姆：《转型中的美国政治世界》，见伯恩汉姆：《当前美国中的危机》（纽约，1982年）；马汉致阿什，1896年11月7日，艾尔弗雷德·萨耶尔·马汉文件，杜克大学，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

第七章 1898年的帝国与动荡

19世纪90年代，仅仅通过操纵海关税目美国就激发了两场革命，从而加速了第三场（菲律宾）革命的到来。由1890年海关税率催生的第一次革命发生于1893年的夏威夷，最终导致了1898年美国对夏威夷的兼并。第二次是由1894年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中的蔗糖条款引起，导致了古巴动荡的爆发。在1894—1896年间，古巴向美国这一头号顾客的出口下降了50%。结果先是引发了起义，接着又爆发了战争，然后在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便诞生了一个新的美利坚帝国，而且——作为这一系列事态的内在部分——美国新的行政机构也随之诞生，它的演变恰恰就是试图使优先考虑商业机会、国内政治以及战略力量然后再考虑秩序问题的外交政策保持些许的效能和稳定。

一、古巴："双重革命"的严重危险

自从1868—1878年起义爆发，加上美国资本与岛上富有的甘蔗种植园的日益结合——他们在美国找到了巨大的市场——古巴的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也就是说变得高度脆弱化了。富裕的克里奥耳种植园主和投资于糖厂和矿山的日益增多的美国北部投资商，发现他们的利益与美国的市场完全一致。仅1892年，美国投资商就注入了120万美元的资金。1894年的关

税法案使制糖业和雪茄制造业面临瘫痪的危险，失业扩大，革命于是再度爆发。起义由何塞·马蒂领导，此人后来成为古巴历史上最受爱戴的重要人物。他 1853 年生于西班牙驻古巴的一位军官家庭，在第一次起义期间，年仅 17 岁的他就因危害政府安全而被逮捕。马蒂先是被放逐西班牙，后来又到了纽约，在 1881—1895 年间主要从事记者职业。通过对美国人的细致观察，他于 1889 年断言古巴共和国正在“财阀化和帝国主义化”。1895 年，当古巴的甘蔗收割工人、雪茄生产工人以及其他劳工举行罢工的时候，马蒂成了能够弥合阶级分野，团结古巴民族主义力量的领袖人物。同年 4 月他返回古巴领导革命，宣称“古巴必须摆脱西班牙和美国的控制”。1895 年 5 月 19 日，他遭西班牙军队伏击身亡。[①]

马蒂的殉难、经济的衰败以及西班牙殖民管理的总体失误，助长了革命的蔓延。1896 年 12 月安东尼奥·马塞奥将军被诱杀以后，起义变得更加猛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的美国舆论，包括国会都要求西班牙满足起义者的要求。古巴人分为众多派别，但有两派尤为重要。一派由克里奥尔人和美国投资商组成，据国务院的估计，他们当时在古巴拥有 5000 万美元的资产。正如美国最富有的种植园主之一埃德温·阿特金斯在 1896 年对国务卿奥尔尼所言，他们最初要求的是“自治”，或者说是本国治理，但是随着起义的蔓延和起义者要求的激进化，阿特金斯和其他种植园主开始考虑由美国直接占领。第二个派别由大量的古巴人组成，他们信奉马蒂的名言：“一旦美国进入古巴，谁又会把他赶出去呢?”这部分起义者希望古巴获得彻底的独立。影响

① 弗朗西斯科·洛佩兹·塞格雷拉：《古巴——依附性资本主义与欠发达(1510—1959)》(哈瓦那，1972 年)，第 199—204 页；朱尔斯·R. 本杰明：《美国与古巴革命的起源》(普林斯顿，1990 年)，第 22—26、32—33 页；雷蒙德·卡尔：《一位革命英雄》，《纽约书评》，1988 年 7 月 21 日，第 26 页。

小得多的第三派由保皇派组成，他们拥护殖民统治，甚至连西班牙帝国枷锁下的自治主张都不支持。他们的顽固立场以及革命派日渐增强的势力，给马德里、华盛顿以及忧心忡忡的各欧洲首府（包括梵蒂冈，对于由美国接管天主教控制的岛屿没有丝毫热情）留下了非常有限的运作空间。[①]

马蒂点燃起义的烈火不久，美国迅即出现了支持“古巴解放”的运动。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集会上为之募捐。已有十年历史的美国劳联决意支持古巴起义，但谨慎地表示反对兼并古巴，以防由此带来廉价劳动和商品的冲击。亲古巴的情绪像巨浪一样席卷了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声援活动在纽约上层人士的联盟俱乐部中也出人意料地发展起来。纽约政界的权势人物，包括奥古斯特·贝尔蒙特以及律师麦库克等人，不仅提供了言论上的支持而且通过古巴政治团体募集了数百万美元并购买用于革命事业的债券。1897—1898 年，随着战争的威胁和美国可能的兼并日益临近，麦库克和华尔街银行家塞缪尔·M. 詹尼甚至提出从财政拮据的马德里手里购买古巴的独立地位。西班牙的荣誉最终战胜了它对金钱的需求，否则这笔投资有可能已经产生了大量的效益，因为这笔交易是以古巴海关的留置权来保障的。[②]

克利夫兰总统希望西班牙给与古巴自治地位；希望通过这种方法能够安抚古巴人并继续让西班牙人承担保护美国财产的义务。1895 年，美国和西班牙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896 年古巴

---

① 罗伯特·L. 贝斯纳：《从旧外交到新外交《1865—1900》》，第 116 页；欧内斯特·梅：《帝国般的民主国家》（纽约，1961 年），第 80—81 页；阿特金斯的观点，见洛奇致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1897 年 1 月 22 日，洛奇书信册，亨利·卡博特·洛奇文件，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② A. G. 范西塔特致高夫子爵，1895 年 9 月 23 日，外交部 5/263，公共档案局，英格兰克佑区；朱尔斯·R. 本杰明：《美国与古巴革命的起源》，第 44—45 页。

起义扩大以后，阶级分歧加剧，西班牙于是调来 15 万人的部队，以瓦莱里亚诺·魏勒将军（“屠夫”）惨无人道的集中营政策实施报复，但事实证明这种政策并没有像冒犯美国人的感情那么有效。1893 年曾经拒绝占领夏威夷的克利夫兰总统不愿制定任何将把这个种族多元、阶级分裂的岛屿纳入联邦的计划。然而到 1896 年，就连他也失去了耐心。在他最后一次年度咨文的一份草稿中，他准备向西班牙人提出限期，让他们平息动乱，否则——他暗示——美国将不得不越俎代庖。在最后的定稿中，他又回到了笼笼统统的立场，但是他对美国投资、愈益高涨的愤怒情绪以及起义给纽约金融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关切，正驱使他走向一种更加积极的政策。1896 年 7 月 13 日，总统在致奥尔尼的信中说：“我正在对古巴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但像以往一样我还是看不出我们卷入的理由在什么地方。”[1]

然而，当美国官员意识到危险的时候，危险已不仅仅是西班牙的野蛮政策能否结束冲突的问题了，而是西班牙可能会把它的位子丢给在自治派和兼并派发生分裂时乘机联合起来的革命派。1897 年美国领事菲茨休·李警告国务院：“那里可能发生一场革命中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外国人将不得不指望本国政府为他们提供保护和维持和平。”[2] 当时，北美人本来可能就要面对他们在 20 世纪的第一场革命了。然而他们却支持了威廉·麦金莱这位 20 世纪的第一位总统的政策。

---

① 克利夫兰致奥尔尼，1896 年 7 月 13 日，理查德奥尔尼文件，华盛顿国会图书馆；H. 韦恩·摩根：《美国的帝国之路》（纽约，1965 年），第 6-7 页。

② 李致戴，1897 年 11 月 27 日，领事文件，古巴，国家档案馆—国务院—档案分类 59。

二、麦金莱：第一位现代总统

麦金莱，1843年生于俄亥俄州的奈尔斯小城，内战时期的英雄人物，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1876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890年升迁至众议院领导的最高阶层，最终因为不公正的选区划分而与原来所在选区脱离。他及时地参加了州长竞选，并于1891至1895年间两次获得成功，尽管当时他还不得不处理发生于经济危机期间的大规模的劳工骚乱。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他不仅经受住了俄亥俄州的政治考验，赢得资方的支持，而且成为劳联领袖塞缪尔·冈珀斯所信赖的朋友，同时在处理关税政策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所提出的政治—经济要求方面也成为公认的主要专家。作为使用电影摄像机录制就职典礼的第一位总统，麦金莱对于经济长期萧条的危险以及政府在结束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所必须发挥的作用一清二楚。他宣称："自信心的恢复和商业的复兴……主要有赖于国会采取迅速、有力和明智的行动，而不是其他任何与这种局势相关的具体部门"。麦金莱直言不讳地对威斯康星州州长罗伯特·拉福莱特说，他"最大的雄心"就是让美国取得世界市场的霸权地位。①

为了实现他的雄心壮志，总统要求国会通过了两项专门措施。第一是修订后的1890年麦金莱关税法获得通过。麦金莱本希望关税法能够不加修改地完整通过，1895年他曾对一位朋友讲："我相信实用主义的互惠政策"，也就是那种"在为我们的剩余产品寻求世界市场的同时，不应损害美国人的工资收入或者是

① 汤姆·E.泰里尔：《关税、政治与美国对外政策（1874—1901）》（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1973年），第207页；玛格丽特·利奇：《麦金莱时代》（纽约，1959年），第142页。

把美国的市场出让给国内本来可以制造的外国商品”。在 1895 年的全国制造商协会大会上，当他讲出意思大同小异的一句话后，听众顿时为之欢呼雀跃。1897 年被麦金莱总统任命为驻英大使的海约翰一语道出了 1898 年初总统对全国制造商协会进行的另一场报告的主旨：“古往今来，世界上最伟大的命运是属于我们美国人的”。1897 年的《丁利关税法》并没有让麦金莱得到他想得到的一切，但是它毕竟修订并推进了互惠互利的原则。约翰·卡森通过谈判签署了 11 个类似的条约，但是直到 1901 年麦金莱去世，参议院都没有对其中任何一项条约进行表决。

总统要求的第二项立法是金本位法案，它将一劳永逸地封杀实行金银复本位制的任何要求。麦金莱曾经是金银复本主义者，早年甚至希望铸造更多的银币。到 19 世纪 90 年代，他变成了坚定不移的金本位倡导者。1897 年底，美国人半心半意地向英国人提出召开讨论复本位制的会议，但是遭到了英方的拒绝。对此，麦金莱很可能早有所料。不仅伦敦实力强大的银行反对该项建议，而且海约翰从伦敦发回的报告还说，“所有的美国银行企业一致联名反对”；流通领域对于更多货币的需求因更多黄金的发掘正在得到解决，而且持续上升的美国出口贸易数据显示，1893 年美国的贸易逆差是 1870 万美元，1897 年则为 2860 万美元的顺差，而 1898 年的顺差又增加了一倍。1897 年，美国的出口额超过了 10 亿美元的大关。到 1900 年，麦金莱得到了他渴望已久的金本位法，该法宣布把金元作为惟一的标准货币，其他所有形式的货币均与黄金维持平价。财政部长莱曼·盖奇解释说，金本位制“使我们能够在商业事务中使用我们强大的商业对手所使用的同一尺度”。盖奇认为，如此“巨大的经济价值”，“如果确有必要的话，是值得以巨大的代价来维持的，”。关税政策与金本位制，再加上新式美国海军和密切的官一商关系，造就了一个如同历史学家艾米莉·罗森堡所说的“推销员政府”，推动和保

护着美国的海外商业。[1]

1873年以后的经济萧条让美国人做出了巨大牺牲，但是麦金莱并未受到任何指责。恰恰相反，正如亨利·亚当斯所言，他体现出“一种可以称为麦金莱主义的直觉：既然联合、合并与托拉斯体制在国内已经成为现实，那么在国外同样也可以实现。”亚当斯对于他从拉斐特广场和白宫对过的家中所能看到的几乎所有人物都不屑一顾，但他却称麦金莱是“一位卓越的人事经理，他找到了几位擅长操纵局势的人帮他，海约翰就是其中的一位。”[2]

权力逐步集中到了总统的手中。这种变化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性的大事，它发生在1898年后的外交政策转折之前，但又受到了外交政策的巨大影响。正如沃尔特·迪安·伯恩汉姆对1896年体制的描述，他说“一种相当民主的政体”转变成了“基础非常广泛的寡头政治”。麦金莱巧妙地对这套体制加以利用。首先，他成立了新的内阁，其中较少任用具有独立政治基础的人，所起用的行政官员更多的是那些靠对他的效忠来获得政治权力的人。新的总统制——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进程中的新美国——所需要的内阁，不仅必须由政治代表组成，而且在这个因通讯和交通技术而日益变小的世界上，还需要一些具有管理各类复杂组织的经验的人。因此，麦金莱任命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约翰·谢尔曼担任国务卿，但其目的却是要在参议院腾出

---

① 麦金莱致柯蒂斯，1895年12月2日，麦金莱书信册，威廉·麦金莱文件，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肯顿·J. 克莱默：《核实原始资料》，《历史学家》第48卷（1985年11月）第82—87页；海致麦金莱，1897年10月11日，威廉·麦金莱文件；盖奇致伯迪克，1897年8月20日，书信册，莱曼·盖奇文件，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商业杂志》，1897年10月1日，第4页；艾米莉·罗森堡：《传播美国梦》（纽约，1982年），第49页。

② 亨利·亚当斯：《亨利·亚当斯的教育》（波士顿，1930年），第373—374、423页。

空缺以便安置总统竞选运动的主持人马克·汉纳。而事实上的国务卿则是麦金莱在俄亥俄州的一位不甚有名的老友威廉·R. 戴，在他之后担任国务卿的还有海约翰（1898—1905）、伊莱休·鲁特（1905—1909）以及菲兰德·C. 诺克斯。所有这些人在“公司美国”的运作方面都具有丰富经验，而且他们本身都没有强大的政治基础，而是完全依从于总统的意志。由于向心一离心的双重效应，随着美国外交扩及全球，制定外交政策的权威便集中到了总统办公室手中。

总统和国会的关系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在 1897 年至 1904 年间，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稳步上升；在这一阶段的后期，共和党以 53 对 29 席（有 8 位第三党代表）的优势控制了参议院，以 198 对 151 席（8 个独立人士）的优势控制了众议院。作为外交政策的支点所在，参议院在一帮由内部人士组成的十分严密的集团控制下像俱乐部一样运作，这帮人在内政方面拥有庞大的权力，但在外交领域通常听命于总统。这些派系与内战后形成的利益集团有密切的关系。1902 年，政治分析家莫伊塞·奥斯特洛高尔斯基认为，“这些利益集团赞助和支持政治组织以便为其所用，他们随心所欲地操纵它们，就像驾驶自己的火车”。如果以这种观点衡量华盛顿的决策，也不过是稍微有些夸张。总统的角色，比如麦金莱和罗斯福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提供一种包罗万象的外交政策，使尽量多的这类利益集团从中受益。作为对这一体制了如指掌的人，总统的目的是制定政策帮助那些功能性的集团，这些集团反过来也能极大地增进国家利益的——即使这意味着有时需要在国会进行激烈的争吵才能使总统的计划得到通过。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参议员乔治·F. 霍尔回忆说，在 19 世

纪80年代，参议员访问白宫无非是提些建议。[1] 而到1898年，他们拜访麦金莱同样也是为了得到建议。然后，他们便返回参议院，在那里依靠党派忠诚、总统的庇护以及运转顺畅的核心会议机制为白宫进行投票表决。这些事做起来并非总是轻而易举。1898年4月，总统发起并赢得了一场极为棘手而又富有历史意义的斗争，当时他把国家带进了与西班牙的战争。不过，他还是不得不首先避开亚洲的危机。

三、1897—1898年的亚洲危机："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

正是对于美国新的全球力量和海外利益大小的估量使麦金莱总统在1897—1898年几乎被拖进了亚洲的一场对抗，尽管当时美国举国关注的是古巴和国内问题。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不是军事上的。19世纪90年代末期，大不列颠驻守亚洲的战舰比麦金莱所有舰队的一流战舰还要多。美国的利益在于经济和传教方面，这些利益必须由西华德在大国政治合作方面的创新以及必要时共同使用武力的政策加以保护。在华盛顿当局的协助下，要求传教权的教士们最终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批准，允许他们到中国内地部分地区传教，而不再仅仅限于沿海。同时，美国向中国的棉花出口从1895年的170万美元猛增至1896年的400万美元，1897年又增至740万美元。[2]

① 乔尔·西尔比与塞缪尔·麦克斯文尼主编：《投票者、政党与选举》（肯塔基州列克星敦，1972年），第224页；罗伯特·A. 戴厄蒙德主编：《国会的起源于发展》（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76年），第224页；J. D. 森德奎斯特：《国会的衰落与复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81年），第28页。

② 小查尔斯·S. 坎普贝尔：《特殊商业利益与门户开放》（纽黑文，1951年），第19—20页；托马斯·麦考密克：《中国市场》（芝加哥，1967年），第130—132页。

1896—1897年，神话中的中国市场显然最终变成了现实，但是突然间受到了威胁。欧洲列强在俄国的带领下已经开始削减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从中国获取的利益。德国以其两位传教士被杀为由，迫使中国割让具有战略意义的山东部分土地，打开了进入满洲这一潜在巨大市场的门户。德国获得了修筑铁路和开矿的权利。俄国人也在圈占满洲的部分土地作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麦金莱有两条比较宽阔的道路可以选择。一条道路是采取1844年以来的门户开放的传统政策，这是一条与英国、可能还有日本合作的道路，藉此可以反对任何形式的封锁或者是强制推行的优先通行和特惠关税制度。另一条道路由纽约律师约翰·J.麦库克以及铁路经办商詹姆斯·哈里逊·威尔逊提出。由于同匹兹堡官员过往甚密，麦库克和威尔逊希望与俄国合作，把美国轮船航线（以及美国横贯大陆的铁路系统）同西伯利亚大铁路连接起来，作为环球运输系统的起点。正如威尔逊向西奥多·罗斯福做出的解释，"美国在中俄两国具有十分广泛的利益，但是这些利益是相互依存的……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俄国人同世界上其他所有人一样，也明白这一道理。"为使美国的政策转向俄国，麦库克和威尔逊试图在麦金莱政府中占居要职，但遭到总统的拒绝。他已经任命了太多的来自东北部地区的人，而且他私下里——正确的——担心麦库克与古巴军政权的关系过于密切，不适于把外交问题托付于他。[①]

由于麦库克和威尔逊未能进入政府，所以麦金莱主要听取比如海军助理部长西奥多·罗斯福和驻圣·詹姆士宫廷大使海约翰等人的建议，前者警告俄国对美国的亚洲利益的威胁日甚一日，后者则强调在维护门户开放政策方面与英国人合作的必要性，尽

① 威尔逊致麦库克，1897年12月5日，书信册，詹姆斯·哈里逊·威尔逊文件，华盛顿国会图书馆。

管俄国、德国和法国殖民主义者意图关闭门户。观察家们开始认为，世界的均势岌岌可危。要知道，维特在推行其铁路计划时声称，西伯利亚大铁路及其支线不仅可以开发俄国辽阔的东部地区，而且还会改变世界贸易的方向，取代伦敦控制的苏伊士运河作为通往中国的关键路线，并主宰中国——如果说不是环太平洋地区——的事务。德国由于自身的帝国主义考虑，支持俄国在亚洲的蚕食政策而树立起来的先例。

1898年初，随着对抗的加剧，英国同麦金莱进行接触，以便寻求由英美日三国联合做出反应。海约翰强烈地建议采取合作政策。1898年1月31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兴冲冲地打电报给国务院汇报说，德俄两国将不得不善罢甘休，“瓜分中国将会破坏我们的市场，太平洋注定环抱着一个比大西洋更加巨大的商业市场”，而且在总体上还未殖民化的亚洲，“我们注定能够找到最佳的客户”。1898年3月，《纽约论坛报》刊登了麦金莱在东北部地区的一篇讲稿，其中公开宣布：“斯拉夫—鞑靼—哥萨克的统治意味着暴政、愚昧和反抗。日本人的统治意味着自由、开明和进步。在两种原则之间针锋相对的竞争中，如果后者失败，人类将会遭受巨大的灾难。”①

然而问题在于，总统在家门口还有一场危机必须处理，然后才能腾出手来应付美国在亚洲的利益这个大问题。正如1898年3月中旬威廉·R. 戴向英国人做出的解释，美国支持英国（以及日本）的政策，但是古巴危机使美国不可能立即展开合作。当柏林和圣彼得堡的官员并非心甘情愿地保证保持中国港口对世界商业开放以后，这种拖延政策就变得更加可以让人接受了。麦金

①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纽约，1964年），第54页；麦考密克：《中国市场》，第141—142页；《纽约论坛报》，1898年3月18日，第6页。

莱并不清楚这些保证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正如他的私人秘书所述，“他看上去忧心忡忡，气色不好，眼光里透露着一种遥远而又深邃的表情”。[1]

四、古巴：革命与战争

麦金莱完全有理由表示担忧。尽管他个人忧心忡忡，但他还是准备带领这个国家走向战争。他别无选择。美国内战后的制度需要战争——无论在国内、在加勒比还是在亚洲都是如此。在就职演说中，麦金莱先是评述了微妙的局势，然后宣称“我们不想进行任何征服战争；我们必须抵制侵占领土的诱惑。”美国内战之后，随着美国的利益由大陆领土转向商业，这已经成为美国治国之策的共同主题。不过，麦金莱的意图也正在于此。他的头号问题是恢复美国的经济，外交政策——无论是扩张主义的还是孤立主义的——都必须符合这一目标。因此，1897 年麦金莱一直在推动西班牙通过给予古巴自治地位并停止“屠夫”魏勒的集中营政策来结束起义。11 月，马德里召回了魏勒并草拟了一份自治计划。但是，叛军拒绝接受该项计划，麦金莱感到非常失望。

走向战争的转折发生在 1898 年的 1—2 月份。1 月 12 日，西班牙军官捣毁了一家攻击魏勒的报社。哈瓦那爆发了街头骚乱。马德里方面矢口否认这次攻击并承诺平息动乱，但是这时麦金莱显然已经开始认为西班牙已无法维持秩序。他派遣“缅因号”军舰前往哈瓦那港口，表面上是一次善意的访问，实际上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公民和财产。2 月底，康奈尔大学工程学教授 E. A.

[1] 庞斯福特致索尔兹伯里，1898 年 3 月 17 日，外交部 5/2361，公共档案局；科特柳日记，1898 年 3 月 20 日，第 52 匣，乔治·科特柳文件，华盛顿国会图书馆。

富尔特斯的一封长信进一步强化了总统的这一看法。富尔特斯写道，“西班牙正站在即将剧烈喷发的火山口上，只需走错一步，从与法国接壤的边境一直到地中海就会骤然陷入一场悲惨的革命。”熟悉伊比利亚半岛的富尔斯特强调，西班牙在欧洲是孤立的，“一场对外战争将会倾覆西班牙政府，结束当前的危机”，但是他同时暗示，这只是一种短暂的解决方式。麦金莱曾要求把那封信整理得“简单明了”以便用作参考，他所读懂的意思仅仅是西班牙腐败堕落，正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不能指望它在古巴进行真正的改革。2月初，佐证这一看法的令人震惊的证据出现了。当时，古巴政治集团获取了西班牙驻美公使杜普·德洛姆的一封私人信件，这很可能是麦库克的一手策划。德洛姆对总统本人加以攻击，但是这封信特别披露了一个事实——显然西班牙承诺的改革仅仅是为了装点门面和满足外交的需要。西班牙打算把问题拖下去。德洛姆立即被免去了公使之职，但是在那封耸人听闻的信件公开一周之后，一次巨大的爆炸使“缅茵号”战舰葬身哈瓦那港底，导致266名美国人死亡。麦金莱立即做出反应，下令成立了调查委员会。3月底，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指出，爆炸发生在船体的外部——也就是说不是发动机机房——但是委员会拒绝把责任直接归咎于西班牙人。（大约8年之后，美国的另一项调查认为，爆炸是由军舰内部的事故引起的。）①

军舰的沉没掀起了1898年战争的呼声（“不要忘记‘缅茵号’事件”），但是这并没有主导麦金莱的外交。为约瑟夫·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日报》撰写稿件的一帮人，在一些街头报刊上发出的战争叫嚣并没有推动总统和这个国家走向战争。麦金莱从来不看耸人听闻的报纸；不管怎

① E. A. 富尔特斯，1898年2月28日，科特柳文件；《华盛顿邮报》，1983年7月21日，A23。

样，新闻界自 1895 年以来一直在呼吁开战，但没有取得效果。2—3 月份，经过一番仔细的运筹，总统的政策开始变动，最终把整个国家引入了战争，而此举完全是总统的自主决断。

第一个步骤是进行军事准备。3 月 9 日，他请求拨款 5000 万美元供陆军和海军备战之用。直到 3 月底，他仍在担心“我们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但是他的军事顾问非常清楚，西班牙并不是一个十分强大的敌人。海军助理部长罗斯福同意这种看法。当沿海城市的政治领袖要求提供保护时，罗斯福派遣了一些内战时期破烂不堪的战舰担当港口的守卫。与此同时，他和他的上司约翰·D. 朗格则让美国舰队为歼灭古巴和菲律宾的西班牙军事力量这些重要的任务做好准备。长期以来，美国海军一直就把菲律宾作为作战目标，以防与西班牙的战争爆发，对此，在乘马车绕华盛顿兜风的时候罗斯福已向麦金莱作了通报。1898 年 1 月 14 日，罗斯福给朗格写了一封长达 9 页的信，概述了战争的准备情况。一个月后，当时朗格碰巧外出，罗斯福便拟定了发给太平洋舰队司令乔治·杜威的命令，要求一旦战争爆发要做好进攻马尼拉的准备，同时命令其他部队进入戒备状态。第二天，备感吃惊的朗格和麦金莱删除了罗斯福手稿的大部分内容，但仍旧签发了给杜威的命令。4 月份，备战准备仍在继续进行，杜威已经做好了准备，打算占领亚洲地区的一个最重要的战略要点。麦金莱还让美国逐步做好了同时应付古巴和中国两个地区的危机的准备。①

第二个步骤，是向一有风吹草动便惊慌失措的商业团体保证，战争带来的损失和动荡将不会使正在逐步恢复的经济重返 1893—1896 年间的危机。商业团体一如既往地在战争的价值问

① 利奇：《麦金莱时代》，第 176 页；罗斯福致杜威，1898 年 2 月 25 日，密码文件，No. 1，1888—1898，海军档案，国家档案馆，档案分类 45。

题上发生了分裂。来自中西部的声音长久以来一直支持“古巴的自由”，正如西部扩张主义分子的所作所为一样，如今他们还希望在亚洲扮演更加活跃的角色。尽管随着时间从2月进入3月，麦金莱及其政策精心呵护和安抚的商业团体由于统一了认识而团结起来，他们一致认为战争不会危害经济的恢复，而且事实上战争可以终止古巴局势的继续恶化；可以保护美国在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投资；甚至还可能在钢铁、纺织和食品加工业方面刺激利润的显著增加，但是在东北部的货币中心，和平主义仍然占据优势。在古巴，以阿特金斯为首的美国投资商希望不要再吵来吵去，而是要求迅速地把古巴并入美国。1898年3月25日，麦金莱收到纽约一位政治顾问兼记者身份的W. C. 雷克发来的一封电报称：“这里的大公司如今都认为我们将会发动战争。相信所有人都会欢迎战争，视战争为久拖不决后的一种彻底解脱。”商业报刊都在宣扬，战争的机遇已经“刺激了钢铁贸易”，“有助于铁路的修筑”，而且能够“决定性地扩大运输业的发展”。《纽约论坛报》势力强大的出版商怀特洛·里德，在进行了一次乡村旅行之后，于3月8日向麦金莱保证说，“文化程度较高的阶层”不大在意“耸人听闻”的报道，但是无论麦金莱带领他们走向哪里，他们都乐意追随，即使这意味着战争。如果商界主要的声音准备开战，一些关键的新教团体当然会热烈支持。一旦信奉天主教的古巴和菲律宾变得唾手可得，美国的黩武主义精神便倾泻而出，作为一名对宗教领袖非常看重的虔诚的天主教徒，麦金莱及其政治密友马克·汉纳为此感到十分诧异。正如一家天主教报纸的描述，“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每一位天主教牧师都将是一

位征兵官。”[1]

至4月份，当《银行家杂志》向其读者信誓旦旦地表示战争虽然迫在眉睫，但经费可以轻松筹措的时候，麦金莱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最后通牒。对于这些最后通牒，西班牙政府如果全盘接受，则无异于政治自杀。4月15日，马德里方面同意就“缅茵号”沉没的原因进行仲裁以后，西班牙开始接受美国向古巴提供的救灾援助，废除了集中营制度，甚至批准了一项停火协议，但是拒绝了麦金莱最主要的要求：允许美国调停冲突，而且此事不可进一步拖延——也就是说，在5月雨季到来之前，必须接受美国总统的干预。雨季来临以后，直到12月份天气转晴以前，进一步的外交行动将失去必要。随着麦金莱逐步收紧绳扣，西班牙摄政女王开始不顾一切地试图逃避战争。3月，女王政府试图与美国达成一项交易：给予古巴更多的自治权以换取麦金莱宣布古巴秘密政治团体的活动为非法。美国断然拒绝了这一请求。此后，女王又向其姨妈——大不列颠的维多利亚女王求救。4月的第一周，在德国和法国（两国银行家手中握有大量的西班牙债券）的带领下，欧洲列强讨论了出面调停和避免战争的可能。但由于英国政府拒绝合作，致使这一努力无果而终。绥靖政策重新占据了上风。4月6日，当海约翰兴高采烈地向华盛顿通报此事的时候，英国人业已宣布他们“将完全遵循总统的意愿。”接下来，麦金莱又委婉地拒绝了欧洲列强的建议。与此同时，忧心如焚的梵蒂冈当局也试图帮助西班牙获得一个在古巴结束敌对行动的机会。教皇传话给麦金莱说，若能达成停火协议，“将可以避免战争的风险。”美国驻西班牙公使支持梵蒂冈的倡议，但遭到

[1] 雷克致杨，1898年3月25日，麦金莱文件；雷德致麦金莱，1898年3月8日，来源同前；《商人》，1898年3月1日，第58页；朱利叶斯·W. 普拉特：《1898年的扩张主义者》（巴尔的摩，1936年），第282—283页。

麦金莱拒绝，他认为仅仅签订一纸停火协议是远远不够的。总统要求由美国对古巴进行全面的干预，从而提高了谈判的价码，令西班牙难以接受，同时也从根本上损坏了梵蒂冈建议的基础。①

麦金莱还需要赢得另一场斗争。4 月 11 日，他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措辞谨慎的咨文，意在发动战争。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国会不仅讨论了要不要宣战（宣战的情绪是压倒性的）的问题，而且讨论了要不要承认古巴革命政府的问题。古巴政治集团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债券将取决于这种承认，但是麦金莱的行动自由以及古巴革命政权对岛上克里奥尔—美国人财产利益所可能构成的威胁同样取决于这一问题。正如总统对一位朋友所言，叛军“要比西班牙人更难对付”。经过一番残酷的政治斗争，麦金莱先后迫使众、参两院屈从于他的要求，即不给予古巴革命政权任何形式的承认，而他本人则获得了最为广泛的行动自由。作为交换，他接受了“特勒决议”，即“除了在该地区行使恢复和平的使命，美国放弃对古巴行使主权、司法权和管制权的任何意向或打算。”科罗拉多州共和党人亨利·特勒的目的，既是为了采取一种反帝国主义的道义立场，也是为了保护本州甜菜糖生产商免受古巴廉价蔗糖的竞争。与往常一样，美国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一向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麦金莱无意占领这个种族成分多元的岛屿，所以没有遭到任何反对。4 月 29 日，他签署了宣战声明。②

这是总统权力的一次突出体现。4 月 2 日，当议会斗争正在进行的时候，《纽约邮报》报道了麦金莱在精心备战的同时，如

① 海致谢尔曼，1898 年 4 月 6 日，英国，急件，国务院，国家档案馆，档案分类 59；法国外长致法国大使，1898 年 4 月 7 日，麦金莱文件。

② 本杰明：《美国与古巴革命》，第 50- 51 页；日记，1898 年 3 月 19 日，奥斯卡·施特劳斯文件，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约翰·L. 奥夫纳：《一场不必要的战争》（查佩尔希尔，1992 年），第 189 页，该书对于理解《特勒修正案》非常关键。

何控制充斥好战情绪的国会的来龙去脉。《邮报》把他比作"能够利用美味引诱猎物的诱猎者"，"能像拿枪的猎人那样把同样多的毛皮带回家……毫无疑问，在某些情况之下，他会收获得更多，因为他比猎人对猎物的习性更为熟悉。"①

最后，麦金莱试图通过战争主宰加勒比和南太平洋地区。他对秩序的关注严格地说只是第二位的。事实上，如果说他寻求稳定，那么多半也是指国内的稳定，为此他需要战争并进一步承担囊括上述两个地区的军事义务。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美国在古巴的财产，结束连绵不断、扰乱民心的起义，并同英国人和日本人联手在分崩离析的中国维护门户开放的政策。如果他真的有意追求秩序，他完全有其他的途径可以选择——显然，可以让西班牙如同19世纪70年代那样扑灭起义，或者是承认古巴革命政府并允许它治理自己的国家。这两条道路他都没有选择。正是由于1898年初麦金莱的外交抉择，美国先是走向战争，然后出于保护美国利益的目的对古巴承担了一系列的干预责任，接着又陷入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对亚洲事务的干预，导致了更多的战争，与日本和俄国发生了冲突，并加速了中国革命的爆发。美国心甘情愿地承担这些义务，从没考虑过从古巴或亚洲撤军，不是抱着战争和革命某种程度上可以带来秩序这种单纯的信念而接受它们，而是坚信，如果对它们善加利用，就可以给美国制造更多的权势和机遇。为了这种权势和机遇，秩序的混乱是必须支付的一个小小代价。

五、光辉的战争，光辉的岛屿

那场"光辉的小规模战争"——正如海约翰对美国与西班牙

① 引自《费城通讯》，1898年4月2日，第6页。

之间三个月冲突的称呼——与其他所有民族在缔造帝国时所付出的辛劳相比，不过是举手之劳。目光敏锐的观察家早就料到情况定会如此。早在2月份的时候，詹姆斯·哈里逊·威尔逊就写信给麦库克说，“我几乎不能相信会出现任何重大的战争”，“时髦的西班牙人就像法国的角斗士一样，只需要一声枪响来满足他的虚荣”。从4月底开始，商务活动激增。为了尽可能快地支付战争开支并避免负债，麦金莱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允许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品征税，包括一次电话一美分的“临时”税，后几经修改，事实上直到近一个世纪之后仍是美国政府的一棵摇钱树。美国人纷纷报名参军。几所男子学校（引人注目的是拉斐特学院）志愿组建了一支部队。令罗斯福声名大噪的“莽骑兵”象征着这种新兴的民族主义。罗斯福的主要助手伦纳德·伍德5月份写信给麦金莱说：“我们的战士代表着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超级新潮的纽约人，北方人、南方人、西部人、东部人，农场工人、牛仔、矿工、各行各业的人以及印第安地区的混血种人；事实上，几乎代表了各种各样的美国男人。他们正情同手足，并肩战斗。”[①] 这场战争愈合了内战在种族和地理上留下的伤痕，以及镀金时代阶级斗争的创伤。

麦金莱及其顾问认为，这场战争将在海上一决高低。美国在这方面的优势是压倒性的。总统可以下令四艘新型战舰投入战斗，而西班牙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相提并论，甚至比不上美国的二流战舰和几艘装甲巡洋舰。另一方面，陆军则准备不足，原因主要是陆军部长R. A. 阿尔杰及其所属部门反应迟钝、腐朽无能，没能把适用于北方战役的服装和装备及时更换成适于古巴仲夏季节的装备。5月1日，罗斯福经过仔细考虑任命的太平洋

① 威尔逊致麦库克，1898年2月2日，书信册，威尔逊文件；伍德致麦金莱，1898年5月22日，第56匣，科特柳文件。

舰队司令乔治·杜威海军上将，根据罗斯福的命令，在马尼拉湾彻底歼灭了西班牙舰队。西班牙大约有400人伤亡，而美国仅有1人轻伤。5月26日，美国军队奉命离开佛罗里达州的集结营地，前去攻占古巴。三个星期过后，6000名军人才乘临时拼凑的船只摆渡完毕。实力衰败的西班牙舰队已经穿越了大西洋，然后躲进了圣地亚哥港口寻求防护。美国军队，包括一些美国黑人部队，占领了圣地亚哥周围的高地。西班牙舰队试图逃跑，随后即被美国海军歼灭。7月17日，西班牙驻圣地亚哥的陆军投降。一个星期以后，纳尔逊·A. 迈尔斯将军率领的部队一怒之下仅用少量的火力便占领了波多黎各，其间美军3人阵亡。西班牙私下里秘密地向英国和其他欧洲列强求援，尤其希望能够坚守菲律宾，直到马德里当局能够同华盛顿方面达成一项有利的协议。索尔兹伯里勋爵扼杀了这一计划，他代表英国断然拒绝了任何干预请求。西班牙由此完全落入了麦金莱的股掌之中。7月22日和谈开始，8月22日签署了停战协定，战争宣告结束。大约2000名美国人死于疾病，5倍于战死沙场的人数。[1]

麦金莱完全控制着美国的行动计划。通过与白宫相连的3条电报线路和25条电话线，他可以在20分钟之内与在古巴的美国指挥官取得联系，并跟踪他办公室隔壁作战室（即人们所说的地图室）里实际上是每时每刻所反映的军事形势的变化。他还利用这种新式的通讯工具对战争新闻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从马尼拉传来的好消息就公诸于众，但是腐败、指挥失误以及佛罗里达和古巴军营疾病肆虐的情况则没有完全披露。麦金莱把白宫变成了国家新闻中心，他操纵着手中掌握的通讯权，把他认为适于发布

---

① 索尔兹伯里致沃尔夫，1898年6月13日，外交部FO 72/2067，公共档案局；弗兰克·弗里戴尔：《美西战争中的意见分歧》，见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弗雷德里克·默克和弗兰克·弗里戴尔：《三次美国对外战争中的意见分歧》（马萨诸塞州剑桥，1970年）。

的消息公之于众。[1]

总统还试图利用战争和战时的权力来获取他和共和党即使不是从西华德时代也是从哈里森时代就已经开始孜孜以求的扩张成果。1898 年 5 月，他请求国会通过一项兼并夏威夷的联合决议。这并非麦金莱的第一次尝试。他曾试图于 1897 年通过更为传统的（并且合乎宪法原则的）途径，争取参议院 2/3 的投票批准一项占领条约。他的论据坚强有力。一方面，夏威夷处于白人种植园主的主宰之下，他们把这个群岛作为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边疆的延伸：1890 年他们向大陆输送了 2.24 亿磅糖；1896 年为 3.52 亿磅；而 1898 年的装运量又将激增至 5 亿磅。夏威夷糖业生产的总资本达到 3680 万美元；其中 2170 万美元由美国人控制，他们同时主宰着夏威夷群岛的贸易。另一方面，夏威夷的日本人已经增长到 24000 人，也就是说占到了夏威夷总人口的近 1/4，而且还在继续快速增长。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当大量日本人初到夏威夷的时候，夏威夷国王把他们作为可以制衡白人的新生力量而予以热烈欢迎。然而，这些新移民不但没有成为一股制衡力量，反倒变成了俯首听命的劳工。不过到 1890 年的时候，夏威夷人只占岛屿人口的 45%，华人和白人占 33%，而白人仅占 21%。1897 年当麦金莱准备兼并夏威夷的时候，日本政府表示强烈反对。当时的局势异常紧张，总统只得派遣一艘新式战舰“俄勒冈号”前往火奴鲁鲁，并密令海军，如果日本试图动武，就占领该群岛。然而尽管存在着这种经济联系并面临着日本人的威胁，反对派仍旧拖延这项占领条约的表决。他们的理由是，要保护这块土地，将需要一支更加强大、耗资更加巨大的海军，那将是走向殖民主义的第一步，也是对宪法的一种彻底破坏（他们认为宪法是不能轻易跨越辽阔的海洋，加之于多种族的人口

① 贝斯纳：《从旧外交到新外交（1865—1900）》，第 88、138—139 页。

的。)；而且他们还认为，无论怎么说，美国事实上已经控制了夏威夷。加利福尼亚反移民团体、甜菜糖业集团以及担心廉价亚洲工人涌入的劳工组织的反对尤为强烈。国会对兼并条约未加表决便宣告休会。[①]

1898年，当麦金莱再次把兼并夏威夷的建议提交国会的时候，形势发生了变化。总统要求把夏威夷作为通往马尼拉和上海途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军事基地。(反对派在徒费口舌地争论，途经阿留申群岛而不是夏威夷群岛的路线才是通往中国港口最近的路线。)此外，德俄两国在中国的行动令日本难以稳住脚跟，如今随着日本亲美政权的上台，日本收回了反对兼并行动的立场，向华盛顿表达了合作意愿。最初带领白人定居夏威夷的传教士们也要求兼并夏威夷，使之成为“全球福音传播事业的活动基地”。在众议院，反扩张主义者坚定的代言人托马斯·B. 里德(缅茵州民主党人)主持了长达三周的辩论，直至麦金莱威胁说要动用战争权占领夏威夷，这才善罢甘休。经过四天的争论，占领决议最终以209对91票获得通过。在参议院秘密举行的自由辩论会上，亨利·卡伯特·洛奇警告说，除了日本还有其他大国正期待着占领这个群岛。毫无疑问，他心目中所指的是德国。反对派们则提出警告，兼并夏威夷将会开辟“另外一条征服之路”，接下来“将会指向菲律宾，再下来则是亚洲地区，何处会是征服之旅的尽头呢?”不过，麦金莱没有给反对派更多的活动空间。他私下里简明扼要地陈述了他的观点：“我们那么需要夏威夷，甚至大大超过了加利福尼亚。天命显然如此。”参议院的表决刚

① 加里·大木广：《甘蔗之火——夏威夷的反日运动(1865—1945)》(费城，1991年)，第25、42、57页；国务院致休厄尔，1897年7月10日，第9文件区，第30盒，7月1—15日的文件夹，海军档案、国家档案馆，档案分类45；《舆论》，1897年6月24日，第771—773页。

好达到2/3的多数，因此决议获得通过。[1]

1898年7月31日，麦金莱的确在做下一步占领菲律宾的准备，或者说至少是准备占领其中具有战略价值的部分。这时，他似乎还不清楚，是按他本人以及马汉等顾问所希望的那样仅仅占领马尼拉港口，还是为了夺取马尼拉而不得不占领整个菲律宾。有一点是清楚的，他决心兼并他的军队所征服的一切地区，这种想法在他对总体局势进行仔细的分析之后才有所改变。他并不想得到西班牙在太平洋和加勒比地区的所有帝国领地，对此他并不怀疑，战争结束后的事态表明，他想要的只是马尼拉、古巴和波多黎各。

六、统治加勒比帝国

自约翰·昆西·亚当斯时代开始，古巴就一直是美国扩张主义分子的一个主要目标。这只"苹果"——正如亚当斯对它的称呼——如今已经坠落。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领导人倒不想占有它了。古巴复杂的种族构成、高度成熟的独立运动以及兼并给华盛顿本身带来的宪政问题，使得合并古巴的设想失去了吸引力。此外，它与美国相距仅90英里，这似乎使得兼并并无必要。对古巴可以更为间接和廉价地实施控制。麦金莱无疑想控制古巴。正如马汉在1897年的一篇论文中所作的解释，古巴港口间较短的内陆连线、漫长的海岸线以及众多的港口使得对其实施封锁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战略上的原因以及美国在利润丰厚

---

① "秘密立法会议上的争论，第55届国会第2次会议"，1898年5月31日，副本，美国参议院档案，华盛顿，第21—22、52—53、145—146、150—151页；普拉特：《1898年的扩张主义》，第323—325页；日记，1898年6月8日，第52匣，科特柳文件；路易斯·L. 古尔德：《美西战争与麦金莱总统》（堪萨斯州劳伦斯，1982年），第64—65页。

的制糖和矿业方面近 5000 万美元的投资，使得控制古巴成为必要。[①]

问题是如何在美国的控制和古巴自治之间寻求一个平衡。麦金莱新任命的驻古巴司令伦纳德·伍德将军在给总统的信中写道："我们正在对付一个 100 年来一直持续衰落的种族，我们必须向他们灌输全新的生活。"古巴军队似乎也不适合行使统治权。"通常你还看不到古巴的军营就可以用鼻子闻出它在什么地方。"一位深表厌恶的美国军官在 1898 年年中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古巴人"非常差强人意"。他们衣着邋邋遢遢，为了活口而到美国军人食堂行窃，这些古巴人因为被视为另类而蒙羞受辱。不过他们仍拥有武器以及自马蒂遗传至今的独立信念，1899 年 2 月以后菲律宾人反对美国新主人的起义，给他们树立了（在美国人看来）可怕的榜样。危险如此巨大，以至于古巴人被禁止参加胜利游行。伍德倡议通过直接占领解决这种困境，然后就可以扶植一个"稳定的政府"。谈到稳定，他说他的意思是指"利息 6%的债券"。另一位踏上古巴岛的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詹姆斯·哈里逊·威尔逊认为，应当采取一种更为巧妙的办法：建立间接的政治经济联系，如同在夏威夷一样，它将慢慢地把古巴拉进合众国的怀抱。[②]

伊莱休·鲁特此时不得不做出抉择，因为麦金莱劝诱他放弃在纽约法律界和企业界的显赫地位，取代倒霉的阿尔杰出任陆军部长。没有谁比鲁特更有资格担当此任了。鲁特是一位天才的管理者，良好的人际关系使他成为 20 世纪美国权势集团的元老，

---

① 艾尔弗雷德·萨耶尔·马汉：《美国的海权利益——现在与未来》（波士顿，1897 年），第 286—313 页。

② 戴维·希利：《美国在古巴的活动（1898—1902）》（麦迪逊，1963 年），第 34—36 页；约瑟夫·T. 迪克曼少将致其兄弟的信，1898 年 8 月 10 日，约瑟夫·T. 迪克曼文件，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



19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利益

他迅速地掌握了国防部的控制权并对其进行了清理整顿。1903年，通过创建总参谋部他彻底改组了陆军，而且首次开展了长期的战略规划，其中包括一个跨军种的规划小组。不过，鲁特对于如何统治新的占领地也特别关注，他和麦金莱所承担的这项工作属于国会极少过问的一种行政权力。到 1899 年底，通过收买个别军官并向他们的领导人承诺建立一个高度自治的政府，鲁特瓦解了古巴争取独立的力量。鲁特选择了威尔逊的路线：通过经济联系同时也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措施进行间接统治，这些政治措施包括：美国在关塔那摩建立的海军基地；刺激外国投资的公共卫生政策；防止欧洲债权人立足古巴的债务限制以及——具有特殊意义的——美国以干预方式保护古巴共和国政府的权利。[①]

① H. 韦恩·摩根：《作为一位政治领袖的威廉·麦金莱》，《政治评论》第 28 卷（1966 年 10 月），第 429 页。

这些规定写进了由参议员奥维尔·普拉特（康涅狄格州共和党人）起草的美古条约。由此这些内容成了众所周知（同时也是一种严重误解）的《普拉特修正案》，尽管这实际上是鲁特和威尔逊的思想。鲁特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迫使古巴制宪会议把《普拉特修正案》写进了 1900 年的施政文件。鲁特的任务并不轻松。他试图通过实施选举权的财产限制和文化水平限制，让亲美代表进入大会。然而，民族主义分子取得了胜利。当他们拒绝《普拉特修正案》后，伍德和鲁特便直接告诉古巴人，新的共和国除了接受别无选择；鲁特说，毕竟美国已经有权直接依据门罗主义对古巴进行管束。他现在不过是想把美国的这项权威写进由国际法所认可的条约（和宪法）。古巴制宪会议最终以 16 票赞成、11 票反对、4 票弃权宣告投降。关键的领袖人物埃斯特拉达·帕尔玛做出了让步，他希望此后不久美国可以直接实施兼并。当鲁特承诺签订一个确保进入美国市场的互惠条约之后，其他人也同样转变了立场。最初，鲁特和新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并不能平抑甜菜糖生产商对这一条约的反对。不过，能够进入古巴地界的美国炼糖企业于 1903 年买断了甜菜糖生产商的产权。美国的工业家和农场主同样支持该项条约，因为他们在古巴市场上享受特惠待遇。美国在表面上给予古巴人自治的同时，显然已经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把古巴人牢牢地纳入了美国的体制之内。正如 1900 年伍德私下里写给罗斯福的信中所言，“当然，在《普拉特修正案》控制之下的古巴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自治空间”。①

波多黎各给鲁特带来了一段轻松的时光，尽管不祥的征兆已初显端倪。在 1897—1898 年间，西班牙给予岛上居民大量的自

① 理查德·H. 科林：《西奥多·罗斯福的加勒比海政策》（巴坦卢，1990 年），第 526—527 页；希利：《美国在古巴的活动》，第 132、143、153—154、166—167、175、178、204—205、214—215 页。

治权利，波多黎各甚至向马德里的议会派出了代表。（因与印第安人作战而声名远扬的）美国军事总督纳尔逊·A. 迈尔斯将军承诺让波多黎各人享受美国政府的“恩惠”，所以波多黎各人并没有反对美国的入侵。但是，他们很快就认识到那些所谓的恩典并不包括他们想要的东西：或者是能够进入美国市场的自治统治，或者是获得合众国内完全的州立地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为解放古巴而发动了帝国主义战争，但最终却占领了波多黎各，并剥夺了其人民在西班牙统治时期所享有的诸多权利。兼并行动是由麦金莱寻求海军战略基地的动机驱使的，他在波多黎各终于如愿以偿。华盛顿的统治很快就使波多黎各人民指责迈尔斯及其顾问是“沙皇和撒旦”。

表明波多黎各人处境的一个重要证据，是 1900 年的《福莱克法》（以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有“火警警报器”之称的乔·福莱克的名字命名），它使波多黎各成了一块国会可以颐指气使的“未加吞并的领土”。管辖权掌握在由美国总统任命的总督手里。岛上居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保证（这是美国攫取该岛时梵蒂冈保持沉默的原因之一），但是他们往后并没有获得美国公民或者是州立地位的希望。在华盛顿，国会经过激烈斗争仅以 172 对 161 的微弱多数通过了这项政策。反对派强烈指责这种使麦金莱得以给波多黎各岛套上了统治枷锁的新殖民主义政策。此外，波多黎各蔗糖进入美国市场的特惠关税以及波多黎各岛对美国大陆经济的有效融入也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政治控制。在 1901—1910 年一系列里程碑式的判例中，即在著名的海岛系列案中，最高法院大都裁定像波多黎各这种地方的人民不能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因为这些地方是通过被征服得来的。他们只能享有某些“基本的权利”，因为他们生活在受国会权力支配的“未加合并的领土”之上。（1917 年，波多黎各人最终获得了美国公民的地位，但在征服近一个世纪之后，他们获得的仅仅是自治区而

不是州立或者是独立的地位；同时，海岛系列案裁定的结果继续支配着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地，比如关岛。）正如“普莱西诉弗格森”一案，最高法院把非裔美国人裁定为二等公民，在海岛系列案中又把波多黎各人裁定为被征服的劣等人。1898 年的帝国标志着美国第一次兼并一块重要的领土而又无意给予其州和公民的地位。[①]

同样，对机会的追求是美国外交的动机。一方面，这种追求的目标在于全面控制海军战略基地。另一方面，正如《福莱克法》所示，它又是对不受当地因素限制的投资机会的追求。按照英国历史学家雷蒙德·卡尔的描述，1901 年美国对波多黎各的商品免征关税以后，蔗糖公司“获准在波多黎各扩大业务活动，不管付出什么样的社会和人道代价”。卡尔指出，其长远后果是“20 世纪 30 年代岛上爆发的经济灾难”，而华盛顿政治经济政策的直接后果则是混乱无序的选举（按照卡尔的描述，1900 年的投票中出现了“暴民统治”），以及 1909 年宪政危机的彻底爆发——当时，该民族的领袖路易斯·穆诺兹·里韦拉师承 1776 年的优良传统，向美国的殖民财政控制发起了挑战。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认为，这次挑战证明，“我们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扩大他们政治权利的步伐已经走得有些过快了”。总统和国会于是进一步剥夺了波多黎各人的权利。种族主义再一次成为帝国主义的补充：“自由是一种习惯”，美国的一位观察家在 1900 年无视规则的选举结束后宣称，“热带地区的民族”存在着学习的障碍。[②]

---

① 朱利叶斯·H. 普拉特：《美国人的实验》（纽约，1959 年），第 68、187—188 页；路易斯·亨金：《对外事务与宪法》（纽约州米尼奥拉，1975 年），第 268 页；雷蒙德·卡尔：《波多黎各——一项殖民试验》（纽约，1984 年），第 20—46 页。

② 卡尔：《波多黎各》，第 37、44—51 页。

七、加勒比帝国的意义

由于帝国的缘故，海岛系列案改写了美国的宪政史。同时，蒙帝国之惠，麦金莱使总统的权力发生了转变，也就是说，他和鲁特把行政权力强化到了自内战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事实表明，这次强化的结果将会更加久远，因为半个世纪以来外交首次在国家日程上占据了持久而重要的地位，而在通讯和军事行动更加迅速的新时代里，外交是由总统控制的。

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是美国官员在做出决策时如何运用这一权力。在每一项重大决策过程中，他们的动机并不总是出于稳定的考虑。他们通过《普拉特修正案》、贸易政策、《福莱克法》以及法律判例来获取控制权和商业机会。如果他们的首要目标是稳定，那么他们就会把古巴和波多黎各作为合众国的组成部分。然而，种族、经济和宪政问题阻碍着海岛与大陆的融合，不管怎样，美国的决策者总是认为通过更加间接的控制并制造古巴自治的假象，他们能够做到万无一失。（有时也会有人坦率地指出其中的种族原因。约翰·T. 迪克曼少将[①]曾经讲过，当古巴人指控美国人意图兼并他们的时候，"我告诉他们你们山姆大叔的黑鬼已经太多了，你就会看到他们一副无地自容的样子。"）[②]

维持秩序的责任本来也是可以完全交给古巴人和波多黎各人的。不过，不把这一责任委托给他们的原因仍然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经济、战略和种族方面所造成的影响。作为这种机会主义政策的直接后果，古巴人把不平衡的经济发展作为发泄挫折感的对

---

① 原注第 26 条为"约瑟夫·T. 迪克曼少将"，此处及第 8 章原注第 17 条则为"约翰·T. 迪克曼少将"，疑为作者的笔误。—— 译者

② 迪克曼致其兄弟的信，1899 年 5 月 24 日，迪克曼文件。

象，以挑起内战来表达他们对无权控制自身政治事务的不满，在此后的 35 年里，他们甚至试图发动革命。早在 1906 年，美国就以军事力量做出了回应，结果使经济失调进一步加剧，以至于古巴人指控是美国人而不是他们在妨碍这个国家问题的解决。出于控制权和商业机会的考虑，美国在古巴和波多黎各均不是秩序和稳定的动因，而是抗议和骚乱的焦点。然而，在随后两代人的时间里，华盛顿仍然拒绝重新审议其政策，只是试图在新型总统的带领之下，虽不情愿却接连不断地运用武力来保护美国的经济和战略机会。[①]

① 劳埃德·加德纳：《从解放到遏制》，见威廉·A. 威廉斯编：《从殖民地到帝国》（纽约，1972 年），第 220 页。

第八章 太平洋帝国与动荡

1898年战争刚刚结束不久，《纽约太阳报》就写道："现在我们都是金戈主义者，而头号的金戈主义者就是威廉·麦金莱阁下。""金戈"（jingo）一词来源于1878年英国杂耍剧院一首关于当时渴望与俄国开战的英国"好战分子"的歌曲。这一词汇也起源于日本女皇金戈，她在公元4世纪以前的某个时期，在民族主义、战争以及声嘶力竭的扩张主义叫嚣中曾经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①] 到19世纪90年代末期，该词已经妇孺皆知。不过，考虑到这种系谱关系，麦金莱根本就不是什么"金戈主义者"。他不屑于抢占西班牙帝国的领地，而是一步步地慢慢接近古巴、波多黎各，尤其是菲律宾，而且他对保持政治一致的必要性具有政治家超凡的敏感性。他的目标并不是建立一个殖民帝国，而是占有少量的土地用以实现征服世界市场的目标，同时占领为确保征服的实现所必需的战略要点。然而，为了实现这种征服，麦金莱甘愿容忍混乱，承受动荡，甚至菲律宾的全面暴动，或者是甘冒卷入亚洲大陆战争的风险。

---

① 《得梅因纪录》（Des Moines Register），1985年4月17日，9A；小保罗·F. 博勒：《总统轶事》（纽约，1981年），第191—193页。

一、为求得机会而打破秩序：占领菲律宾

1898年5月4日，甚至在正式接到海军上将乔治·杜威征服马尼拉的消息之前，总统就已经下令5000人的部队登船前去占领菲律宾，“并根据今后下达的命令执行类似的任务”。这些部队很快就与埃米利奥·阿奎纳多的军队遭遇。阿奎纳多曾在1896—1897年领导了反对西班牙的菲律宾独立战争。经过一个短暂的间歇之后，1898年3月（美军到来前的六个星期）战火再次爆发，而且十分激烈，以至于美国领事向华盛顿报告说，“起义来势凶猛”，尽管西班牙手段“残忍”，但叛军还是快要攻克马尼拉了。阿奎纳多在1898年才28岁，他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妻子有一半的华人血统。他才华横溢，冷酷无情，具有领导才能和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1898年5月底，海军上将杜威报告说，阿奎纳多的军队能够执行重大的军事任务。然而不到一个月，随着麦金莱夺取吕宋和马尼拉的决心进一步加强，美国驻菲律宾的官员奉命不要理会阿奎纳多的任何“政治主张”。这时，阿奎纳多的部队已经扩大到了3.7万人。待到仲夏季节，菲律宾人已经看出，尽管战争已结束，但美国人并没有离开的打算，局势因此进一步紧张起来。麦金莱走进了一个陷阱。他下令杜威不要与阿奎纳多进行任何交易，而义军似乎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的交易。到7月份，阿奎纳多的军队实际上已经控制了最具战略意义的吕宋岛（几乎与纽约州一样大小），只有马尼拉仍由美军占领；叛军开始把他们的统治权威向其他岛屿扩展；并彻底击

败了西班牙的主力部队。[①]

但麦金莱仍然决定占领菲律宾所有的地盘，直到他能够准确地判断出哪些战利品确为美国的利益所需。权衡的标准是亚洲的贸易。1898年6月，代理国务卿威廉·R. 戴和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起草了几份备忘录（此前他们彼此交换过意见）。戴认为，近期工业生产的剩余，要求“扩大国外的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在那里，欧洲的殖民行动已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1898年6月6日洛奇写给戴的备忘录似乎主要是借用了洛奇的密友布鲁克斯·亚当斯的思想。亚当斯提出的一种历史理论认为，世界的权力是随着金融中心的转移而转移的。他认为，世界金融中心正在不断西移，如果美国能够控制亚洲这个世界上最大、最廉价的市场，就有可能从英国手里夺过世界经济的主导权。洛奇警告说，如果欧洲列强瓜分了中国，而“我们又没能在东方的大型港口站住脚，也没有自己的领地”，那么灾难的降临就不再遥远了。“我们必须拥有新的市场，如果我们不想让工资下降和大规模的工业动荡（这种迹象已不难发现）发生在我们头上的话。仅仅依靠产品价格在国外市场进行竞争的理论已不再有实用价值。”如今，“一支海军、位于东方的加煤站和港口……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是最基本的条件。”洛奇强烈要求，美国至少应当控制吕宋岛。[②]

---

① 美国参议院第62号文件：《美国与西班牙的一项和平条约》，第55届国会第3次会议，（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899年），第320—321、329页；朗格致杜威，1898年5月26日，乔治·科特柳文件，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杜威致朗格，1898年7月4日，来源同前；路易斯·L. 古尔德：《美西战争与麦金莱总统》（堪萨斯州劳伦斯，1982年），第63、67页。

② 威廉·C. 怀尔德纳：《亨利·卡博特·洛奇与美国对外政策的探寻》（伯克利，1980年），第93—98页；托马斯·麦考密克：《中国市场》（芝加哥，1967年），第114、164—165页；我非常感谢理查德·沃金教授为我提供有关洛奇的文件。

显然，麦金莱的思想也是沿着相同的路线前进，其他许多人也是这样，包括1898年奉召回国出任国务卿的海约翰。为了确保自己的行动自由，同时也为了能在政治上打一个可以开历史先河的漂亮仗，麦金莱任命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和平委员会。该委员会不仅由扩张主义分子占多数，而且还包括几名关键性的参议员，往后他们将不得不对自己亲自炮制的方案进行投票。参议员库什曼·戴维斯（明尼苏达州共和党人）和威廉·弗赖（缅茵州共和党人）是帝国主义分子；参议员乔治·格雷（特拉华州民主党人）是一位公然的反扩张主义者（但就麦金莱的了解，此人是善变的）。委员会主席戴虽然不是公认的帝国主义分子，但是他的确渴望得到马尼拉，尽管他并不觊觎菲律宾的其他地方。不过最重要的是，作为总统在俄亥俄州的老朋友，无论总统什么样的吩咐，他都惟命是从；委员会的第五号人物、影响极大的共和党报纸《纽约论坛报》的主人怀特劳·里德与他同属一丘之貉。1898年10月28日，麦金莱终于下令让他们对菲律宾全境提出要求；作为回报，对于西班牙近来在菲律宾的贡献美国将给予2000万美元的补偿。

麦金莱做出这一重大决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已经下定决心，要让马尼拉成为美国保护其亚洲利益的战略港口。通过与菲律宾问题专家以及具有战地经历的军事顾问们交谈，总统断定，要使马尼拉不受其他大国（如德国）的攻击就必须占领整个吕宋岛，而吕宋岛的防御又要求控制1700个菲律宾岛屿的其他部分。此外，阿奎纳多的军队显然是不可信任的。10月13日，杜威在电报中说，“当地人似乎没有什么统治能力”。美国领事在整个夏季的报告中所陈述的观点与杜威的看法则有出入。另外，美国领事还送来了许许多多菲律宾富人请求美国实施兼并的信件。9月初一封这样的急件断言，“如果我们（美国人）撤军，无政府统治就会出现”。早在8月份，麦金莱就已下令“不要同叛军进行

任何形式的联合占领”，只能由美军单独控制。同时，他还密切关注着对菲律宾垂涎欲滴的欧洲列强以及日本人，后者曾谨慎地试探国务院能否“为了商业和平”而让日本扮演一个合作角色。麦金莱不希望任何政策会使他的劲敌占到便宜。同年秋季，麦金莱在美国中部地区进行了一次政治巡回演说。表面上，一边为参加 1898 年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造势，一边是在探听民意。实际上，他已经做出了占领菲律宾的决定。他的演讲稿并不是为征求意见而写，而是为了煽动舆论，以便承担“由于战争的缘故而落到我们肩头的责任”，正如他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那样。返回华盛顿后，麦金莱在报告中声称，人民一致认为美国在亚洲负有使命。①

由于总统得出了这一重要结论，有一个事态就变得特别重要了：仅凭手头的证据，麦金莱很难证明美国之所以不得不占领吕宋岛，是出于恢复秩序的目的。阿奎纳多显然已经在实现这一目标。1898 年 7 月中旬，与阿奎纳多交往甚密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向华盛顿报告说：

> （阿奎纳多）组建了一个由他本人充任独裁者的政府，如果他想对当地居民保持控制，这是必须的一步，从政府建立之日直到目前为止，他在这方面一直非常成功，他高高在上，俨然是政府首脑的样子。

这位外交官强调指出，菲律宾人“已经继承了西班牙政府的统治，控制着除马尼拉以外的吕宋岛；与各省首领建立了完整的电报联络系统……成立了一个显然受到岛上菲律宾人欢迎的革命政府”。比如，在马尼拉南部的重要省份巴坦加斯，阿奎纳多的

① 罗伯特·C. 海尔德布兰德：《权力与人民（1869—1921）》（博士论文，艾奥瓦大学，1977 年），第 138—139 页；美国参议院第 62 号文件：《美国与西班牙的一项和平条约》，第 333—335 页。

政令从6月就已经开始生效（而且，在菲律宾上层阶级的支持下，阿奎纳多的政令还将持续发挥影响，直到1900年初美国军队入侵并摧毁该政权为止）[①]。

麦金莱并不是为了恢复秩序而不得不占领吕宋岛，正如他在向一个天主教观光团解释其决定时所言，他并不是非要"改良和教化（菲律宾人）不可，蒙上帝之恩，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菲律宾人作为基督教牧师和政府的子民已有300年的历史了。麦金莱在对天主教徒的另一次讲话中表露了他的主要理由："我们不能把他们交给法国或德国——我们在东方的商业对手——那可不是一桩好买卖，它有损我们的信誉。"事实上，以英法为首的欧洲列强一直在鼓动麦金莱总统兼并菲律宾群岛，这样它们的帝国主义同伙，尤其是德国人就不会在菲律宾的诱惑之下欲罢不能了。当时麦金莱正联合英国人反对那些对摇摇欲坠的满洲王朝进行巧取豪夺的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这种背景之下，占领菲律宾似乎是有意义的，但作为恢复秩序、传播基督教精神或者美国式民主的一项政策，占领菲律宾的决定毫无意义可言。[②]

2月6日，阿奎纳多的部队与美军交火，吕宋岛爆发了反对麦金莱政策的革命。至今仍然难以确定哪一方首先开火，但是毫无疑问的是，美军正奉总统之命向菲律宾人据守的港口城市进军，目的是夺取菲律宾政府的权力。直到双方交火的时候，一些熟悉内幕的观察家仍在怀疑参议院会不会批准和平条约。安德鲁·卡内基就是这些观察家中的一员，他鄙视英国帝国主义分

---

① 引自《马克·吐温论帝国主义》，《大西洋》第269卷（1992年10月），第59—60页；同时参见美国参议院第62号文件：《美国与西班牙的一项和平条约》，第337页；格伦·安东尼·梅：《再现历史》（菲律宾奎松城，1987年），第115—116页。

② 拉扎·齐夫：《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纽约，1966年），第221页；霍勒斯·波特致麦金莱，1898年9月6日，第57匣，科特柳文件。

子；一想到美国正准备步英国人的后尘他就痛恨不已，以至于给他在白宫的朋友写出了极具侮辱性的信件（有一封信这样写道："私下里我是你的朋友，但在正式场合我是你刻骨的仇敌。"）这位钢铁大王提出以2000万美元购买这些岛屿，这样他便可以恢复它们的独立地位。其他评论家也警告说，这种殖民主义政策将会破坏美国的宪法。然而，其中大多数的评论家希望开发亚洲贸易，使菲律宾采取某种形式的中立，以便可以用作（用反帝国主义者爱德华·阿特金森的话说）"商业保护区"。[①]

作为在议会帮助麦金莱通过和平条约的政党领袖，洛奇尖锐地指出，条约的反对者拒绝讨论根本性的问题——"我们的贸易、工业以及劳工能否获取巨大的物质利益，有赖于这一问题的妥善解决。"相反，他们把反对的理由基于合不合乎宪法"这样高尚和利他主义的立场"。洛奇愿意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与他们争论，但是令他遗憾的是，由于反对派拒绝讨论最根本的政策问题，他没有机会谈论"在涉及菲律宾岛屿问题上美国的商业利益，或者是在涉及更大的中国市场问题上，为了我们劳工的利益我们必须占有我们的份额"。其他支持者也都畅所欲言。代表南卡罗来纳纺织厂发言的参议员约翰·L. 麦克劳林说，"对菲律宾至少几个地方的控制是我们在东方商贸利益的惟一保障"。南部的一位纺织业主认为，宪法争论与占领菲律宾问题毫不相干："自从我们本身不再是殖民地以来，我们在这个国家就一直拥有殖民地。"洛奇和印第安那州年轻的共和党参议员艾伯特·J. 贝弗里奇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一个历史教训：正如他们现在打算对付菲律宾人的办法一样，美国人过去曾经长期这样对付印第安人。这种政策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之处。他们兴致勃勃地指出，民主

① 卡内基致麦金莱，1898年11月28日，第57匣，科特柳文件；《反帝国主义者》第1卷（日期不详），第45—46页。

党的创始人托马斯·杰斐逊不仅统治过印第安人，而且1803年他从法国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后未经当地居民的同意就对整个路易斯安那进行了统治。[①]

不过，如果说兼并主义者在经济与宪法之争中占据了上风，那么双方在具有爆炸性的种族问题上则是平分秋色。尽管非裔美国人（包括参加过1898年战争的一些人）在美国遭受毒打、火刑或者其他方式的迫害，但是麦金莱以及其他官员都无动于衷。少数反帝国主义者，比如能言善辩的波士顿律师穆菲尔德·斯托利，对美国在菲律宾的政策进行了谴责，并开始认识到国内的非洲后裔如果说不是更严重的话，也是正在遭受同样的待遇；条约的反对派从此开始维护非裔美国人的权利。伊莱休·鲁特宣称，美国没有给予非裔美国人选举权的政策说明，美国也不能把这一权力交给菲律宾人。斯托利闻听十分震惊。不过，多数的反帝国主义者所关心的是菲律宾人的待遇，而不是非裔美国人的待遇。在他们看来，种族问题在美国300年的历史上极其具有破坏性，他们不愿把菲律宾人牵扯进来，使悲剧雪上加霜。来自反对派美国劳联的一种有趣的观点认为，“贸易联盟只有在工业化和文明开化的国家间才是可能的”。由于菲律宾还不具备这种资格，所以美国人不得不劳民伤财地建立一支海军以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第二种不同寻常且意义重大的观点出现在1898年6月，当时反帝联盟已经在波士顿成立。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半数以上由妇女组成。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妇女组织对外交一直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在妇女选举权组织的领导下，从19世纪70年代以后她们改变了关注的焦点。对于那些同样未经本民族同意便要遭受他

① 国会记录，第55届国会第3次会议，1899年1月24日，第96页；沃尔特·L. 威廉斯：《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政策以及菲律宾兼并问题上的争论》，《美国历史杂志》第66卷（1980年3月），第818--820页；帕特里克·赫登：《独立与帝国》（伊利诺斯州德科尔布，1982年），第135—137页。

人统治的菲律宾人，许多妇女公开表示认同。（妇女团体在1898—1905年日益增多的外交讨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帝国主义分子却认为，如果美国政府能够不给非裔美国人、印第安人（以及妇女）选举权而又能让他们安守本分地待在家里，那么对菲律宾人，政府同样也可以这样做。[①]

争论如火如荼地进行，1898年2月10日与西班牙签订并于1899年1月4日提交参议院的和平条约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直到2月4日晚上，反对派一直认为他们正逐步占据上风，这时麦金莱接到消息说，起义军已向马尼拉的美军发动了进攻。当时，他肯定不会感到有什么意外。早在1898年10月，他的总领事R. 怀尔德曼就提醒过他，虽然没有任何恰当的理由可与阿奎纳多开战，但是“我们正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进（把菲律宾人撇在一边），在我看来，我们将滑向一场不幸的战争，一场既无必要又将是灾难性的战争”。然而麦金莱仍然坚持他的路线，于是战争爆发。2月4日，他一收到电报就说：“这些人（菲律宾人）多么愚蠢啊，因为这意味着条约将获得批准”。2月6日，凭借党派分野，该条约恰好以57票对27票的2/3多数通过，在赞成票中共和党40票，民主党10票，平民党2票，金银复本位者4票，独立人士1票。战争的爆发、麦金莱对任命权和总统权威的利用以及共和党在参议院的绝对多数席位对条约的通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在最后关头转变立场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表面上看他转变立场的理由（令人费解的理由）是，必须首先结束战争，他才能就条约和1900年大选中的帝国主义问题向麦金莱发动政治战。布赖恩并不能决定性的改变参议

① 小威廉·B. 希克森：《穆菲尔德·斯托利与争取平等的斗争》，《美国历史杂志》第55卷（1968年11月），第533—554页；《美国联邦党人》第6卷（1899年4月），第38页；朱迪斯·帕帕克里斯托：《美国妇女与对外政策（1898—1905）》，《外交史》第14卷（1990年秋），第498—505页。

院的投票。洛奇、马克·汉纳以及权势庞大的罗德岛参议员纳尔逊·奥尔德里奇能够而且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麦肯内里决议案》的通过是麦金莱和共和党领袖扔给反对派的一块安抚面包，用以保护他们的政治侧翼，因为该决议案承诺，在没有明确指明的"一定时间"过后，菲律宾将获得独立。[①]

卡内基懊恼万分，他不承认这场战争像麦金莱所说的那样把菲律宾"托付给了我们"。卡内基批评说，"这是总统本人的潘多拉盒子"，一切完全是他个人所为。应当说1898年6月底《费城通讯》所做的预测性评估更加准确。题为《不可避免的扩张》的一篇社论认为，占领菲律宾这一跳板的"首要"原因并不是战争，而是仅仅5年之内便从1.5亿美元猛增至3亿美元的制成品出口。"美国放眼海外而不是国内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它们并非由西班牙战争引起，同样也不会因为战争的结束而发生变化。它们带来了新的义务，而美国必须加以承担。"[②] 为此，麦金莱试图进行他所说的"善意同化"。结果他却得到了一场长达3年的战争。

二、帝国战争之二

美国为保护它在亚洲的利益，全面卷入了帝国征服之战，并非仅仅限于菲律宾群岛。兼并夏威夷同样由这场战争引起。美、德两国在萨摩亚的冲突死灰复燃，原因也在于此。德国在整个危机期间的亲西班牙立场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杜威的军舰与德国

---

① 怀尔德纳：《亨利·卡博特·洛奇与美国对外政策的探寻》，第116—117页；"R. 怀尔德曼秘信摘录……注明日期为10月15日"，第57匣，科特柳文件；日记，1899年2月4日，第52匣，同前。

② 约瑟夫·F. 沃尔：《安德鲁·卡内基》（纽约，1970年），第707页；《费城通讯》，1898年6月29日，第6页。

一支小型舰队在马尼拉几乎发生冲突一事同样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①]

不过，美国的力量集中在菲律宾和亚洲大陆两个目标之上。阿奎纳多的军队拒绝服从美国以后，麦金莱毫不迟疑地扩大了美国在菲律宾的驻军，直至美军数量一度超过3万人，而在3年的战争中美军共计达到12万人。尽管麦金莱在所有国会咨文和致天主教领袖的公文中都大谈其理想，但是如同伍德罗·威尔逊、大小罗斯福以及其他步其后尘入主白宫的总统一样，他使用了美国凭借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起来的新型军事力量，且坚决果断，毫不迟疑，全力以赴。[②] 近2000美军死于这场战争，比1898年战争中牺牲的人数多出1500人，但是麦金莱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过撤军问题，或是与阿奎纳多达成妥协，或是让这位菲律宾的领袖恢复对其人民的控制权，也就是美国领事认为阿奎纳多在1898年大部分时间里所显示的那种权力。同时，至少有20万人死于这场战争。

1899年年中，麦金莱宣布他的目标有四个方面："首先是和平，其次是由一个遵从法律和秩序的政府公平执政，第三是彻底保障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第四是悬挂星条旗的正式占领。"然而随着战争的升级，双方战斗的残酷性进一步加剧，伤亡人数随之增加。总统意识到他在亚洲正在进行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而就在这时，人们已经开始讨论1900年的大选事宜。麦金莱拥有一支优秀的武装部队，其军官都是在1865—1890年间追击印第安人的战斗中因立功而被提拔上来的。在1898—1902年战争中

① 艾尔弗雷德·瓦格茨：《世界政治中的德国与美国》（德文版，两卷本，纽约，1935年），第1卷，第780—797页；有关德国的背景，特别是对"社会帝国主义"观点的清晰表述，见古斯塔夫·施密特：《欧洲帝国主义》（德文版，慕尼黑，1989年），第73—81页。

② D. 卡梅伦·瓦特：《接替约翰牛》（剑桥，1984年），第188页。

服役的30位将军中，有26位，或者说有87%的人曾经与印第安人打过交道。在其余4位将军中又有3位来自西部。此外，菲律宾的上层精英似乎也站在美国一边。1900年5月，埃尔威尔·奥蒂斯将军在发回国内的电报中说："菲律宾的精英阶层对于尽快恢复岛上的和平表示充满信心。"那些"菲律宾精英"大多居住在上层阶级集中的马尼拉周边地区，对以阶级仇恨为基础的阿奎纳多政权充满了恐惧，他们较早前就曾就"菲律宾人的看法"向麦金莱提供过糟糕的建议，致使总统错误地估计了整个1898年的局势。[1]

总统先是下令增兵，然后又亲自对有关军事行动的新闻进行审查，以图重新控制局面。他对记者获取新闻的途径以及当局发布的新闻内容所进行的细致入微的审查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后，当驻菲律宾的记者报怨新闻发布之前检查官就已篡改了新闻含义的时候，麦金莱巧妙地炮制出一纸声明，把责任全部推到了奥蒂斯将军身上。新闻检查的利害当然非同小可。在1890—1909年的美国，日报的流通总量扩大了3倍。美国人识文断字，对待新闻郑重其事，特别是碰巧与他们观点一致且党派色彩极浓的新闻杂志的报道。麦金莱精心创建了白宫的第一个新闻机构，由其负责向广大媒体提供新闻。为了栽培记者，麦金莱不惜花费时间，国务卿海约翰的做法也是如出一辙，他是每周定期与记者会面的第一位美国国务卿。[2]

麦金莱也试图制造一些正面的个人记录以赢得公众的支持，

---

① 看来显然出自麦金莱之手的短笺，时间大约在1899年8月2日，第58匣，科特柳文件；威廉斯：《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和兼并菲律宾问题上的争论》，《美国历史杂志》第66卷（1980年3月），第828页；奥蒂斯致副官长，1900年5月4日，威廉·麦金莱文件，华盛顿国会图书馆。

② 海尔德布兰德：《权力与人民》，第161—166；奥蒂斯致副官长，1899年4月19日，第58匣，科特柳文件。

1898年1月（就在参议院对和约表决前夕）他任命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调查菲律宾危机。委员会由康奈尔大学校董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率领，此人是众所周知的反扩张主义者，但麦金莱私下里知道（因为舒尔曼给总统写过一封信），此人坚信夺占中国的贸易市场“无疑是当前我们首要的外交问题”。总统依然十分严密地监视着舒尔曼委员会的工作，但他根本无须多虑。令许多人感到诧异的是，该委员会强烈要求继续占领菲律宾，直到——按照舒尔曼的说法——菲律宾人能够行使和承担“主权独立的权利和义务为止”。正如1900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所言，毕竟，“就我的判断，继续占领菲律宾的作用一直在于改善我们在东方的贸易机会”——尽管无论在菲律宾还是在波多黎各，舒尔曼紧接着补充说，“惟一的目标”“必须是当地人的福祉”。国务卿海约翰赞同舒尔曼的观点：“看到那些误入歧途而又不屈不挠的菲律宾人受到那么严厉的惩罚真是令人心碎，但是惩罚还是必须继续下去，直到他们认识到什么才是他们需要的和平。届时，你就会为他们最终建立一个有序而仁慈的政府打下基础。”①

1901年3月，美国军官发现了阿奎纳多在山区的藏身之地，遂利用当地武装对他跟踪，当这些部队快要饿跨的时候，阿奎纳多却给他们送来了食物，美国特种分队趁机消灭了菲律宾卫队，逮捕了他们的领袖。1901年，战斗渐行渐止。同年，美国进驻规模庞大的苏比克湾海军基地，此后除了1942—1944几年的时间，直到1991年该基地仍然控制在美国人手中。然而战斗并未结束，特别是1902—1910年间，美国军队继续在其他岛屿作战，与棉兰老岛摩洛人的战斗一直持续到1935年。在1901年的对抗

① 舒尔曼致麦金莱，1898年12月10日，第58匣，科特柳文件；舒尔曼致怀特，1900年3月12日，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文件，康奈尔大学，纽约州，伊萨卡；海约翰致舒尔曼，1899年6月19日，同前。

结束以后，华盛顿官员开始让接受美国训练的菲律宾警察部队设法平息叛乱，但他们没有成功。1909 年，人们想当然地认为革命已经结束很久了，美国陆军一位高级军官在家书中这样写道："我们已经建立了文官政府，尽管可以这么说，但是所有人在一切场合手里都会拿着武器，甚至在海里洗澡时也不例外……文官政府是安抚国内情绪的一个闹剧，离开了军事力量它一分钟也维持不下去。"[①]

造成流血和动乱持续不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美国不但拒不撤军，反而在 1901 年由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领导的一个专门委员会主持，建立了一个由美国人控制的政府。1905 年以后，行政权开始由总统任命的总督控制，仅有来自菲律宾上层阶级的人士被纳入政府。1906 年，首批地方领袖获准参加政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共同组建了一个主张菲律宾立即独立的政党。这些地方领袖同样受到更加激进的游击队的反对，他们为反对美国人的控制正在数千外围岛屿进行战斗。在经济方面，华盛顿强制推行类似于在西班牙统治之下建立的财产不平等分配的土地和关税政策。大量的良田落到了美国人手里。1909 年，美国糖业托拉斯购买了 8 万英亩土地，而塔夫脱本人此前已经投资了一块前景看好的土地。总之，美国在 1901 年已经为这场胜利作庆祝。1906 年，《芝加哥美国人》甚至把美国人的消遣方式与国家政策扯到了一起，宣称棒球所体现的个人主义精神是"美国士兵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并且〕能够脱离军官独立进行战斗的原因

---

① 拉塞尔·罗思：《暗淡的荣光——美国在菲律宾进行的"印第安人战争"（1899—1935）》，（马萨诸塞州西汉诺威，1981 年）；约翰·T. 迪克曼少将致其兄弟的信，1909 年 6 月 11 日，约翰·T. 迪克曼文件，圣母大学，印第安纳州。

之一”。[1] 但是，战争仍在激烈地进行。

即使受过棒球训练或是经过印第安战火洗礼的美国军队也难以把秩序强加于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或者可以说，美军根本无法重建秩序，如果美国某些外交信函的内容是可信的话。1898年，根据美国总领事的报告，菲律宾人正在建立他们自己的秩序。麦金莱的兴趣并不在此。对舒尔曼所说的“我们时代最为重要的问题”，他找到了答案，即在亚洲寻求商业机会。至于阿奎纳多，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一直在经营他的种植园，二战期间他曾联合日本侵略者反对美国太平洋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是亚瑟·麦克阿瑟之子，而亚瑟·麦克阿瑟是1901年阿奎纳多的征服者。

三、门户开放之战

1898年初，在与西班牙开战的准备阶段，麦金莱总是把加勒比危机与亚洲政治舞台相提并论。正如革命使古巴面临威胁，欧洲帝国主义同样使中国岌岌可危。美国的商业团体试图使亚洲自始至终成为这个国家讨论的焦点。1898年1月，据纽约《商业广告报》报道，仅仅在一年之内，美国对中国的棉布出口就扩大了两倍多，达到了700万美元。“就每一个文明国家都会尽力购买我们市场上供应的商品而言，东方的中国不过刚刚成为我们

---

① 约翰·A. 兰金：《对菲律宾历史的重新思考》，《美国历史评论》第87卷（1982年6月），第621—624；尤弗洛尼奥·M. 阿利普：《菲律宾政府》（马尼拉，1939年），第79—87页；雷纳多·康斯坦蒂诺：《菲律宾史》（纽约，1975年），第34、251－299、319页；最佳的全面论述见格伦·安东尼·梅：《菲律宾的社会工程》（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1980年）；乔治·威尔：《行动中的人》（纽约，1990年），第240页。我非常感谢莱斯丽·西尔吉曼有关菲律宾的论文。

一位新的顾客。”因此，非常有必要“保持自由进入中国市场的权利……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以武力做后盾的欧洲列强肆无忌惮地窃取中国领土的时候……我们不能心甘情愿地被排除在这块领土上的贸易活动之外”。其他观察家也指出，对中国的煤油出口已经达到了450万美元，这一市场似乎毫无止境，面粉、铁以及钢的出口也是如此。亚拉巴马州的科尔多瓦棉纺厂是内战以后美国工业发展的一个标志，该厂利用波士顿的资本建造了2.5万枚纱锭，它在1897年的产品全部销售到了中国市场。①

1898年夏末，海约翰从伦敦回国的时候，就麦金莱的了解，他对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所面临的威胁一清二楚。而且他还亲身体会到，由于帝国主义竞争，整个欧洲似乎即将爆炸。由于代价高昂的喀土木战争、南非战争以及1898年英法两国军队在上尼罗河遭遇而发生的法绍达危机，大英帝国在非洲正被逐步削弱。亚洲日趋激烈的对抗成为全球竞争的组成部分。英国由于在海外受到德、法、俄军国主义的围攻，而且在市场上又败给了德国和美国，所以英国不仅对美国奉行绥靖政策，而且令麦金莱和海约翰感到憎恶的是，它对俄国人也奉行同样的政策。1898年4月，这两个欧洲国家一致同意在中国为铁路垄断而划分势力范围。俄国人似乎要关闭他们在满洲的港口。门户开放政策面临险境。新上任的国务卿决心通过英美联合，促使中国门户重新开放。

海约翰同罗斯福的密友布鲁克斯·亚当斯在1898年8月号《论坛》杂志上撰文综述了争论中的重大利害问题。在《西班牙战争与世界均势》一文中，亚当斯利用贸易数字和资金流动统计数字证明了1898年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的到来，从此，自1815年

① 纽约《商业广告报》，1898年1月26日，第6页；《查塔努加商人报》，1897年12月15日，第59页。

以来的世界金融中心将从伦敦和巴黎转移，要么向东移至柏林和圣彼得堡，要么向西移至纽约。这个重大的问题最终将取决于由哪一方控制亚洲市场。“海洋民族和非海洋民族”将会展开竞争。亚当斯要求英国人和美国人结盟对抗“非海洋的”俄国人和德国人；否则，美国将无力消化剩余产品，由此带来“令（美国人）窒息而亡的风险”。另一方面，如果结盟成功，那么

> 人类社会很可能将由两个伟大民族结成的联盟绝对主宰，其右翼基于不列颠群岛，左翼俯临中国中部省区，中心邻近太平洋，印度洋将像内湖一样被环抱其内，恰如罗马帝国胸怀地中海一样。[1]

海约翰无需怎么怂恿便能接受这种论调。作为昔日亚伯拉罕·林肯的私人秘书、外交家、深受欢迎的诗人和小说家以及钢铁公司的董事，对于这个社会需要什么、禁忌什么，海约翰了然于胸。他笃信世界市场的运行机理。此外他还认为，如果允许市场发挥作用的话，那么通过市场机制的运行，美国大量涌现的天然的政治经济精英集团——他本人就是其中的一员——将会控制主宰世界事务的支点。问题是，沙皇和德皇特别想关闭亚洲的部分市场，而且英国人，或许还有日本人，出于一种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目前也加入了拓展殖民地的竞赛，它们竞相在分崩离析的中国把大片大片的战略区域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海约翰虽然信奉市场机制，但他也不会如此天真，以至于相信自由市场或自由放任的方式主导着世界事务。如今，为获取巨大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而展开竞争的工业金融联合体，通常需要强大的中央政府作为后盾和向导。德国似乎尤其咄咄逼人，它在加勒比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取代英国成为美国利益的主要威胁。从马汉到曾于1897

---

① 布鲁克斯·亚当斯：《西班牙战争与世界均势》，《论坛》第25卷（1898年8月），第641—651页。

年出任美国驻柏林大使的亲德分子安德鲁·迪克森·怀特等各色权威人士都提出警告：借用怀特的话说，到1898年战争时期，“德国人对我们的感情总体上发生了逆转，而且该帝国的部分地区对我们怀有严重的敌意”。冲突迫在眉睫。1897年，《北美评论》的一位杂文作家写道，当美国人全神贯注地解决美洲大陆问题的时候，德国人的态度可能是友好的，但是随着“门罗主义的强化，大规模海军的建立”以及在全球枢纽地区美德两国利益冲突的发展，美德关系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①]

不过，最为重要的是海约翰与其他美国官员对于俄国走向的警惕。一旦与美国人非正式结盟，美国的舆论就被圣彼得堡政府置于脑后，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以后，为平息国内的不满，俄国政府撤销了亚历山大二世的各项改革；反犹主义政策愈演愈烈，其中包括逮捕生于俄国而作为美国公司代理人重返俄国的犹太人。尤其是辛格缝纫机厂和麦考密克收割机厂的代理人员遭到逮捕，由于两家工厂均在华盛顿拥有政治影响，致使美国官员威胁说要废除1832年的商业和航运条约，除非俄国改弦更张。与此同时，斯拉夫人横跨俄罗斯进入西伯利亚的历史性迁移（从1880—1900年迁移人口达400万之多）、大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及其给美国钢铁和机车制造商带来的大量合同，又为两国修复破损的关系提供了机会。可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却把这条铁路当做从满洲捞取权力的一个抓斗，从而使这一机会面临被毁的威胁。1899年中期袭击俄国并持续近6年之久的经济萧条似乎使俄国的这一政策显得更有必要。

在此背景之下，沙皇呼吁召开第一次海牙会议，讨论军备限

① 安德鲁·迪克森·怀特：《安德鲁·迪克森·怀特自传》（两卷本，伦敦，1905年），第2卷，第144—148页；普尔特尼·比格洛：《德国新闻界与美国》，《北美评论》第164页（1897年1月），第12—23页；玛里琳·B. 扬：《帝国辞藻》（马萨诸塞州剑桥，1968年），第15页。

制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问题。美国出席了这次会议，但是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马汉，成功地领导了一场斗争，使美国拒绝了任何强制性的仲裁。马汉认为，美国的重大利益最好由实力决定，不应把它们交到外籍法官的手中，由他们任意摆布。同样是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国分析人士和官员们在1899—1900年间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已经成为威胁亚洲市场正常运行的最大危险，所以美国、而不是扩张过度的英国应当承担消除这一危险的责任。1898年底，一位学术评论家写道，这场伟大的斗争是“斯拉夫民族与撒克逊民族”之间的斗争，美国人和英国人必须团结起来“对抗俄国马其顿人的进攻”。布鲁克斯的兄弟、海约翰的密友亨利·亚当斯是少数引人注目的反对者之一。“如果俄国现在垮掉”，1900年他给国务卿写信说，“虽然我不敢绝对肯定，但是形形色色的野兽可能都会挣脱链锁和牢笼”。[1]

海约翰和麦金莱接受了布鲁克斯的分析而没有听信亨利的警告。中国市场必须以明确的协定予以挽救，否则门户开放原则——海约翰把它定义为“一个没有特惠的商品交易地”——又可能会被彻底破坏。日趋扩大的贸易，尤其是制成品贸易（占美国对华出口的90%）让人有理由相信，尽管对华贸易仅占美国商贸总额的1%，但是美国对华出口从1896年的700万美元上升到1897年的1200万美元，再升至1899年的1400万美元，这种趋势预示着未来的巨大利润。只有少数人不赞成这种看法，比如前财政部统计局局长沃辛顿·C. 福特。他认为中国非常贫穷，永远都不会成为美国的一个巨大市场。他还暗示说，但愿上帝能够阻止中国走向发达和工业化，因为拥有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可以凭

---

① 施密特：《欧洲帝国主义》，第44—50页；H. W. 鲍尔斯：《这场战争是天定命运的一个迹象》，《年鉴》第12卷（1898年9月），第186—192页；亨利·亚当斯：《亨利·亚当斯书信集》两卷本，沃辛顿·C. 福特（波士顿，1930—1938年），第2卷，第289—290页。

借低价位而与西方任何地区展开竞争。海约翰不敢贸然认定福特就是正确的。国内的政治经济需求以及对英国自身维护门户开放政策的能力日甚一日的怀疑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1899 年，海约翰发出了第一批门户开放照会，要求列强在它们所获得的租借地内不要破坏各国的既得利益，在确定港口和铁路税费的时候不得歧视其他国家，中国的海关税率适用于任何新的势力范围。除华盛顿以外，海约翰的倡议没有受到任何国家的欢迎，甚至连英国人也不买账，虽然他们一直希望能与美国直接结盟反对其他欧洲列强。然而，当伦敦认识到这是它能够得到的最好结果时，它终于追随了美国的立场，接着日本人也表示接受，最后德国人、俄国人还有法国人也只得同意，尽管非常勉强。[①]

海约翰的请求（即每一方都公开宣布愿意抵制违规行为）能否真正挽救门户开放原则并没有得到验证。海约翰来不及坐享其成，义和团风暴便向中国首都北京席卷而来，风暴所到之处，基督徒纷纷被杀，财产亦被破坏殆尽。1898—1900 年的义和团起义，是自 18 世纪以来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一系列起义中的一次。最大规模的起义是太平军和捻军起义，它们已经开始剥蚀清王朝的思想和军事根基。接下来，清王朝又在抗法战争、尤其是对日战争中连遭惨败。但是，1897—1898 年间德国占领山东，俄国进入满洲，法国在与印度支那接壤的中国南疆提出了新的要求，为补偿德国占领山东的损失英国又占据了山东半岛的威海卫港口，这一系列事件才是义和团运动的导火线。就在美国严重卷入这场帝国争夺战的时候，中国的民族主义因应局势的发展而迅速高涨起来。义和团招募农民人坛并对日益高涨的排外情绪加以利用，他们以基督教传教士及其相对而言人数并不太多的中国信

---

① 美国商务部人口调查局：《美国历史统计数据》（华盛顿，1961 年），第 550 页；戴维·希利：《美国的扩张主义》（麦迪逊，1970 年），第 166 页。

徒作为攻击的目标。红灯照领导下的妇女成为义和团的重要成员。1900年，北京的团民不仅杀害信徒，而且还杀害了法国和比利时的工程师以及美国一些重要的传教人员。当西方列强试图增派部队保护他们的公使馆的时候，义和团成功地阻止了他们。1900年6月，德国公使被害以后，皇太后站到了义和团一边，亲自向外国人宣战。随着恐怖的蔓延，驻北京的外国人被包围了起来。随后，来自日本、法国、英国、俄国以及美国大约两万人的军队抵达北京，解除了包围。麦金莱利用新建的马尼拉基地，派出5000人的部队参加了战斗。[1]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把外国军队赶出迅速衰败的中国。亨利·亚当斯取笑海约翰说："还不到6个月，你所打开的门户的合页就已经脱落了"，"你能拼凑出一扇什么样的门呢？"7月3日，海约翰试图给他的门户开放政策重新装上合页，于是第二次发出了门户开放的照会。他要求列强直截了当地宣布支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直到1900年8—9月份的危机爆发，列强才最终发出了这样的声明。那次危机使麦金莱认为沙皇将在北京保留驻军，直至软弱的皇太后在满洲、或许还有中国的其他地方给予俄国渴望得到的一切。特别重要的是，俄国人一路蚕食，其势力已扩展到牛庄，海约翰私下里称此举是"明目张胆的抢劫"。面对激烈的竞选连任运动，由于对手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利用麦金莱在菲律宾和中国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大做文章，1900年9月总统一度甚至真的在考虑，要么撤出中国，要么则加入对中国港口和领土的争夺。无论哪一条道路，门户开放的原则都将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陆军部长伊莱休·鲁特认为，美军撤退

---

[1] 乔纳森·斯彭斯：《探索近代中国》（纽约，1990年），第139—140、230—235页；麦克尔·亨特：《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纽约，1983年），第185—188页。

将可以使美国人避免成为“列强侵略阴谋之暗流表面飘荡的一块浮木”，使“我们远离那些在我们本国人民中间可能给我们的政策抹黑的纠纷”——这对身处大选之中的麦金莱来说，是一个铿锵有力的论点。[①]

然而，在马汉以及中国问题上的头号外交权威威廉·C. 罗克希尔[②]的支持下，海约翰又使麦金莱重新回到了原来的立场。面对自己、西华德以及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对华外交的失败，在新罕布什尔州身卧病榻的国务卿执笔写道，他认为门户开放政策需要美军驻留中国，直至外部列强放弃他们的要求。在一份美国官员所撰写的最具现实主义精神的照会中，海约翰写道：

> 进退两难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希望在尽可能早的时刻撤军。我们不想给人造成被迫或因害怕而撤离的印象，而且在最后的安排上我们不能丧失恰当的影响。如果我们让德国和英国留在北京，而与无疑已经与中国谈判完毕的俄国一起撤军，那么我们不仅会看起来好像是吃了败仗，而且还要承担真的被排斥在外的风险。……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可以信赖的，因为我们的政策是避免大肆掠夺和保持门户开放。……我们的立场具有内在的弱点：我们本身不想洗劫中国，而我们的公众舆论又不允许我们使用军队进行干预，以防止其他列强掠夺中国。此外，我们没有陆军。纸上空谈“我们优越的道义立场赋予了我们向世界发号施令的权

---

① 阿迪致麦金莱，1900年8月25日，第59匣，科特柳文件；鲁特致麦金莱，1900年9月11日，麦金莱文件；亚当斯：《亨利·亚当斯书信集》，第2卷，第290页。

② 作者在论及中美关系时，正文中多次提到“中国问题专家”威廉·C. 罗克希尔，在第九章第4节原注第25条中则提到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威廉·W. 罗克希尔（柔克义），疑为同一人。——译者

威"，无异于痴人说梦。

海约翰希望与英国人结成某种形式的联盟或许"能够使我们的构想取得成功"，但是他也知道这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海约翰这项始终如一的政策得到了棉纺织龙头企业的公开支持。《亚特兰大宪法报》宣称，"棉花就是国王，因此我们必须留在北京亲眼看到它得到正式加冕"。1901 年，列强在保证忠于门户开放原则的同时，最终撤离了北京。但是，他们同时从中国榨取了 3.33 亿美元作为对义和团所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的赔偿。罗克希尔发起并倡导了一场减少赔偿的运动。他知道巨额赔偿可能进一步削弱中国，并可能成为列强进一步索取的把柄。尽管这一尝试没有成功，但是西奥多·罗斯福于 1907 年做出承诺，对美国的赔款将被返还中国，用于委派中国学生前往美国留学。（西奥多·罗斯福的决定并不是出于慈善之心。他试图实现特定的目标：平息中国民族主义因美国排华法案而煽动起来的反美情绪；试图打破日本对中国青年留学生的钳制；向中国年轻一代传播美国的优良品德和经济学说。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宣称："一个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中国人回国以后，往往非常推崇美国以及美国的商品。"）[①]

大名鼎鼎的幽默作家芬利·彼得·邓恩借"杜利先生"之口宣称，"中国真正需要的是一部自己的排外法案"，它很可能会比门户开放政策的效果更好。列强正式保证恪守的门户开放原则使外国在中国市场上愈演愈烈的财富争夺合法化，进而导致以军事干预和殖民驻军的方式来确保参赛者能够更好地进行竞争，对门户开放原则笃信不疑的麦金莱和海约翰甚至也向中国提出了有关

① 海约翰致阿迪，1900 年 9 月 14 日，麦金莱文件；《舆论》，1900 年 9 月 6 日，第 292 页；麦考密克，《中国市场》，第 161—175 页；戴尔伯特·麦基：《庚子赔款减免问题》，《美国对外关系历史学家协会通讯》第 23 卷（1992 年 3 月），第 1—19 页。

三沙湾的权利要求——这一要求被中国人反过来以门户开放原则为由加以拒绝。这类干预，特别是基督徒日益增多、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新教传教士的大量到来，推动了义和团这类反清组织的滋生。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动荡以及帝国主义竞争，麦金莱明确拒绝了鲁特的撤军建议，采纳了海约翰的观点，即美国必须为维护在中国的机会而付出代价，完全不必计较可能给美国外交或者中国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压力。

此外，为了获取门户开放政策创造的机会，在缔造20世纪新型的总统权威方面，麦金莱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为了打击获得中国政府支持的义和团，他未经咨询国会就向中国派遣了5000人的部队，更谈不上由国会授权宣战了。尽管中国政府正式向美国宣战，但是总统和国会对此仍旧不屑一顾。过去总统曾经这样动用过武装部队，用以打击威胁美国利益以及美国公民的非政府组织。不过这一次是用于打击有组织的政府，但是却没有遵守宪法关于宣战权的规定。1898年战争结束以后，英国的《旁观者》杂志（正如麦金莱的私人秘书乔治·科特柳及时注意到的那样）认为，内战和1898年战争已经表明，总统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当选君主了，只不过有任期上的限制和财政上的制约，但反正已经接近无拘无束了……变化无常的人民一旦沸腾起来总是迫切地需要一位领袖，于是他们便得到了自己的领袖”。在中国危机期间，这位当选君主的权力进一步得到扩大。[1]

一个政治原理看来正逐步成型：美国扩张的地区愈广，世界上的那些地区就会变得愈加混乱，革命也会愈加频繁，这有利于促进美国的利益，所以也就需要一个权力更大的总司令。海外的扩张和动荡等于国内的权力集中。这为西奥多·罗斯福、伍德

① 《旁观者》，1898年7月30日，第56匣，科特柳文件；小阿瑟·施莱辛格：《帝王总统制》（波士顿，1973年），第80—90页。

罗·威尔逊以及后来的总统树立了先例。

但在当时，麦金莱显然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冒险的游戏。他是为了获得整个中国市场而冒险，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些孤立的殖民飞地。他还把自己的政治生命拴在了这样一条路线之上，即继续寻求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孜孜以求的机会，美国人认为，通过门户开放政策，这样的机会是可以得到的。

四、1900 年：对帝国的认可

1899 年 9 月一个星期天的晚上，麦金莱在同朋友追忆往昔的时候说道：

> 我们做过的最棒的事情之一就是坚持占领菲律宾群岛，而不仅仅是一个加煤站或者一个岛屿，因为如果我们选择后者，那么我们将沦为世界的笑柄。所以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我们变成了一个世界大国……我觉得，与我宣誓就职的时候相比，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①]

观察家们一般都认为，14 个月后的大选将会决定美国人是否愿意承担这种大国的义务。1900 年 5 月，总统认为帝国主义问题将成为（按照舒尔曼对总统本意的解释）“选举运动中压倒一切的核心问题”。麦金莱最大的对手是民主党的提名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此人不仅得到他传统的金银复本位同盟军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波士顿、芝加哥、印第安那波利斯以及其他大城市（它们多半位于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反帝国主义的金融、政治集团的支持。安德鲁·卡内基以数百万美元资助反帝国主义组织向麦金莱发动进攻。不过，这倒是一桩咄咄怪事。卡内基讨厌

---

① 日记，1899 年 9 月 17 日，科特柳文件。

布赖恩的阶级偏好和对自由银币铸造的热忱。这位提名人断然拒绝了钢铁制造商把外交作为竞选惟一主题的请求。卡内基甚至试图花钱组织一个第三党，但他没有成功。1900 年，布赖恩的提名演说给卡内基带来了希望。这次演说的确把帝国主义列入了议题，民主党的竞选纲领也对英帝国主义（特别是在南非）进行了抨击。但竞选运动展开以后，布赖恩却一味谈论银币和托拉斯的问题。众议院前发言人托马斯·B. 里德（缅茵州共和党人）嘲笑"布赖恩宁愿犯错，也不愿当总统"。1896 年以来的黄金流入以及《金本位制法案》已经使有关银币的争论尘埃落定。托拉斯问题是对阶级分歧加以利用的一种徒劳的尝试，其矛头直指共和党政府自 1897 年以后允许建立的数量日益扩大的股份制托拉斯。不过，即使在帝国主义问题上，布赖恩领导下的民主党人由于保证为菲律宾人建立一个更好的政府而不是承诺立即给予他们独立地位，而且还发誓捍卫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所以同样模糊了选民的选择范围。此外，布赖恩最终还是支持了 1899 年的和平条约。①

民主党试图取悦劳工和中低阶层以获取他们的投票，但是却发出了模糊的信号。一方面，美国劳工并不赞同作为英国和西欧政治标志的工人帝国主义。美国劳工因为种族、宗教的归属不同而四分五裂，除了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以外，他们难以团结一致地支持任何重大的政治问题。劳工组织还反对兼并古巴和夏威夷，因为那里的廉价劳工会因此而获得进入大陆的通道。另一方面，尤其是城市劳工都是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支付工资，

---

① 舒尔曼致麦金莱，1900 年 6 月 1 日，舒尔曼文件；布赖恩致卡内基，1898 年 12 月 30 日，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文件，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罗伯特·L. 贝斯纳：《反对帝国的 12 个人》（1968 年，纽约 1985 年重印），第 121—122、204 页。

他们不愿让每周的薪酬因为布赖恩的廉价银币而缩水。[①]

麦金莱利用了布赖恩追随者的这些矛盾，在争论中变换了所用的术语，把帝国主义说成是一种值得尊敬的美国传统。他在1900年年底推行的外交政策首次迫使布赖恩放弃了帝国主义议题，接着他便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投票中大获全胜。总统最具戏剧性的举动，是任命嗓门最高的帝国主义分子纽约州州长西奥多·罗斯福作为他的副总统提名人。罗斯福展开了鼓动人心的全国巡回演说，以至于把嗓子都喊哑了。他甚至来到了布赖恩的家乡内布拉斯加，在4天之内发表了40场演说。演讲的内容千篇一律：布赖恩的政治鼻祖杰斐逊就是首批最伟大的帝国主义分子之一；美国是按照美国人的传统和当地人的利益对菲律宾进行统治的，这也许不是“当地居民目前想要的东西”；武力是必要的，因为“蛮族人……只向权力意志屈服”；如果说白人“从道义上应当放弃菲律宾，那么我们应当同样从道义上把亚利桑那州让给阿帕切人”——这又是把19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扩张与19世纪90年代的扩张相提并论的一种说法。至于被吹捧上天的宪法原则，罗斯福写道：“布赖恩一面大谈在菲律宾的统治要经‘被统治者的同意’，另一方面又在（民主党控制的）北卡罗来纳州和亚拉巴马州大谈不给予菲律宾人上述权利的种种好处，因此不能不认为布赖恩是虚伪的。”[②]

与此同时，麦金莱还大胆地动用武力保护美国人不受义和团和俄国帝国主义分子的侵害，不过，选民们从来都没有意识到对

---

① 菲利普·塔夫脱：《冈珀斯时期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纽约，1957年），第291—292页。比较研究见伯纳德·塞梅尔：《帝国主义与社会改革——英国的社会—帝国主义思想（1895—1914）》（马萨诸塞州剑桥，1960年）。

② 西奥多·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八卷本，埃尔廷·E. 莫里森等编（马萨诸塞州剑桥，1951—1954年），第2卷，第1385、1404—1405页；威廉斯：《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政策》，第825—826页。

于这次危机他是多么左右为难。他和他的选举经纪人马克·汉纳一次又一次明确地把帝国主义与“美国传统上独具特色的历史根基”联在一起，直到他们的远东政策看起来更像是美国400年历史的延续，而不是任何有背于美国传统的离经叛道。麦金莱把阶级论之矛戳向了布赖恩的阶级论之盾：那些热爱“公法、稳定的货币以及工业繁荣”的人正在“联合起来共同反对那些在这个幸福国度的人民中间……煽动阶级仇根的人”，为此“我感到非常高兴”。按照麦金莱的说法，与欧洲国家不同的是，美利坚帝国是建立在共识、道义和传统基础之上的。无论如何，美国对外族的统治只是实现美国商业和文化使命的一个附属产物。在1870—1900年间，英国掠夺了47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德国掠夺了100万平方英里，而美国仅仅占领了必需的12.5万平方英里。由于麦金莱模糊了帝国主义问题并保护了北京的美国人，所以卡内基宣布易帜，开始公开反对布赖恩以及民主党铸造银币和征收所得税的要求。讨厌麦金莱政策的其他共和党人对布赖恩更是不屑一顾，他们深知——正如一家报纸在谈及前总统本杰明·哈里森时所言——“沉默是金”。在当时的大选历史上，麦金莱赢得了选民最大的支持，他比1896年还多得21张选举人票(292：155)。即使在内布拉斯加，他和罗斯福也同样赢得了胜利。[①]

1900年大选并非由帝国主义问题一统天下，因为到10月份的时候，布赖恩已经断定他在这一问题上必输无疑，于是他开始对此轻描淡写，并转而强调托拉斯问题。汉纳和麦金莱为此十分高兴。他们知道，在经济繁荣的黄金时期没有人会关心托拉斯问

① 麦金莱致威廉·L.斯特朗，1900年11月1日，第59匣，科特柳文件；戴维·格林：《政治意识的塑造》(伊萨卡，1987年)，第2章；贝斯纳：《12个反对帝国的人》，第186—187页。

题。布赖恩把他的竞选运动搞得乌七八糟，除了令人心灰意冷的银币问题，许多人根本搞不懂他的信条到底是什么。“杜利先生”建议民主党人发布这样一则广告：“诚聘优秀、积极、精力充沛之民主党人一名……要求必须支持坚挺的货币，但不要过于坚挺，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但不得主张放弃我们的既得利益，反对托拉斯但须支持有组织的资本。”①

麦金莱的立场毫不含糊。1901 年 5 月，在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演讲拟定的讲稿中，他要求“掌握科技知识”、教育程度较高的人驾驭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因为“工业已经成为一门科学”。而且，由于美国人已经“超越了排外和孤立的时期，掌握多门语言成为开辟市场的一项基本素质……与以往相比，华而不实的学生越来越没有市场了”。4 个月后，他对参加布法罗泛美博览会的人们讲到，这个国家“令人震惊的财富”决定了“孤立已不再可能，也不再受到欢迎”。他热情地呼吁实行更加广泛的互惠贸易政策，以防美国的剩余产品使这一制度窒息。在讲演的最后，他呼吁组建一支现代化的商业船队、敷设太平洋电缆并开挖地峡运河。②

次日，麦金莱遇刺身亡。此前，汉纳和共和党党魁们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把西奥多·罗斯福从纽约州州长的位置推上了并无实权的副总统之位，目的是终止他在纽约州的改革活动。这位莽骑兵、调门最高的美帝国主义的捍卫者就这样当上了总统。

---

① 芬利·彼得·邓恩：《杜利先生的主张》（纽约，1901 年），第 96 页。

② 1901 年 5 月的演说草稿，第 60 页，科特柳文件；R. 哈尔·威廉斯：《做抉择的年代》（纽约，1978 年），第 157 页；汤姆·E. 泰里尔：《关税、政治与美国对外政策（1874—1901）》（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1973 年），第 206 页。

第九章 西奥多·罗斯福：革命的保守派

有关西奥多·罗斯福的优秀学术著作一向认为，保守主义、道德主义和国际政治方面强烈的均势意识，是理解这位深得人心、极具影响的总统的几把钥匙。1958年3月，也就是冷战处于巅峰的时候，《时代》杂志以一篇封面故事祝贺他的百岁寿辰。《时代》杂志称赞他运用“一种新型的力量——威慑”在“世界秩序中……推进美国自身的利益”。一位传记作家指出，“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构成了他基本的政治观点”。另一位传记作家则认为，“他笃信变革，不过只是渐进变革，是既有体制内的变革。”第三种观点认为，罗斯福的外交特点不是气势汹汹、毫不迟疑地动用武力，而是审慎的均势计算。第四种观点从文化的角度认为，“罗斯福喜欢以文明作为政治导向，表明他是美国国际主义兴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而他刚刚过时的“文明观”又使他成为“最后一位传统的美国政治家”。艾尔弗雷德·L. P. 丹尼斯是研究罗斯福治国方略的首批分析家之一，且至今仍旧是最优秀的分析家之一，他认为，“表面上易于冲动的脾性……在某

种程度上掩盖了其政治风范中的保守主义的基本品质。”①

如果这些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就会产生两个问题：为什么西奥多·罗斯福的保守主义外交一次又一次地导致动荡、均势失衡甚至是革命；为什么在外交事务中如此激进地解释和运用总统的权力，以至于也许其伟大的保守主义偶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许都会感到坐卧不安？一些人的观点是，当时的时代背景驱使他走向了极端的保守主义，如果的确如此，那么那种时代背景也是必须细致周到地加以培育的。要知道，现代美国外交史上最大的一个反讽就是，在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变成了一个世界大国——也就是说，三四个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因而也就被设想为一个维持现状、维护有利的均势格局的国家——而与此同时，世界上一些重要的地区纷纷爆发革命。罗斯福和美国当然不是导致革命爆发的原因，但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巴拿马、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1911—1913年间的墨西哥——美国的作用是显著的，在几宗案例中甚至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几乎在所有的案例中，罗斯福的政策总是进一步恶化而不是改善一触即发的局势。

在国内，罗斯福认同的那些进步党人或许是要优先恢复秩序并建立他们狭隘定义的“文明”，但在国外，这些却不是他们的优先目标。在任何场合，进步主义外交的首要目标都是创造机会（比如在巴拿马和日俄战争中），或是维持和扩大机会（比如在多

---

① 小约翰·米尔顿·库珀：《武士与牧师》（马萨诸塞州剑桥，1983年），第33页；约翰·莫顿·布卢姆：《共和党人罗斯福》（马萨诸塞州剑桥，1954年），第5—6页；霍华德·K.比尔：《西奥多·罗斯福与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历程》（巴尔的摩，1956年）；弗兰克·宁科维奇：《西奥多·罗斯福——作为意识形态的文明》，《外交史》第10卷（1986年夏），第223、245页；艾尔弗雷德·L.P.丹尼斯：《美国外交中的冒险行为（1896—1906）》（纽约，1928年），第6页。

米尼加共和国、古巴以及墨西哥)。与国内一些进步党人不同，他们首要的动机不是渴求更加民主的稳定，而是寻求市场、预期需要的战略前哨，以及他们在历史上自然形成并与海外帝国主义相互杂糅、互为补充的种族主义。当这种诉求导致动乱发生以后，与其前任总统威廉·麦金莱以及后任总统霍华德·塔夫脱、伍德罗·威尔逊一样，麦金莱就动用武力尽力修复动乱所造成的破坏，或者尽力确保——如果美国的利益已经居于优势地位（比如在古巴）——这种优势地位，确保现状维持不变。作为武装力量的总司令，总统能够要求拥有巨大的权威，这些要求（正如威尔逊在1908年的一系列演讲中指出的一样）造就了一种新型总统制，它与19世纪作为行政首脑的总统角色关系不大，更不同于18世纪的宪法对这一职位的构想。尽管罗斯福没有这样的打算，但是由于他对美国历史的理解以及他目光短浅的民族主义，保守的罗斯福参与缔造了一个革命频仍、战火纷飞的世界，但是他并没有缔造出一个均势体系，借以维持健康的、循序渐进的国际体制。

一、纽约与华盛顿的较量

亨利·亚当斯——罗斯福亲密的朋友，甚至可以说是一位对罗斯福洞察入微的观察者——认识到了罗斯福政治艺术的种种内在矛盾，事实上，在亚当斯对1865年后美国逐步崛起为世界大国的传记描述中，正是那些内在的矛盾形成了一个历史高潮。亚当斯这样记叙了罗斯福出任总统的时代背景：

> 华盛顿总是那么有趣，不过，与1800年的时候一样，它在1900年的主要兴趣还是它与纽约的距离。纽约的运行已经变成了行星式的运动——失去了控制——而华盛顿1900年的任务还同1800年一样，仍旧是对它

施加控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华盛顿取得的成功却为它在下一个世纪的成功带来了不祥的预兆。[1]

在1897—1904年间，纽约进一步摆脱了华盛顿的控制。在1904年以前的10年间，每年平均有301家公司被吞并。然而在1898—1902年间，企业吞并的数目达到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记录：仅1899年就有1028家公司消失。1897年，并入大公司的企业资本值达到了10亿美元；1903年为70亿美元。在这样一个吞并盛行的时代，公司开始采取新的形式。J. P. 摩根以安德鲁·卡内基的钢铁厂为基础而创建的美国钢铁公司吸纳了其他138家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前身为麦考密克公司）控制了85%的收割机市场；全国9/10的罐头由美国罐装食品公司出售；美国糖业集团（规模最大的托拉斯之一）控制着美国全部的食糖市场。19世纪80年代，数十家铁路公司被摩根、约翰·D. 洛克菲勒、E. H. 哈里曼以及其他少数几个人合并为6家巨大的运输网络。这些人并非都是铁路（或钢铁）企业家，他们是资本家，利用他们作为投资银行家的权力重组了这个国家的公司体制，使它的效率更高、垄断程度更强，同时个人也获得了巨额利润。到1904年，78家股份公司控制了它们各自行业50%的生产。新公司不断出现，其他一些公司则纷纷倒闭，即使一些最富有的投资商在压力之下也纷纷压缩投资，但是美国人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生产和资本如此集中。[2]

可以找到的许多原因。闯过1873年以后那场经济危机的人（以卡内基和洛克菲勒为首）发明了——按照卡内基的说法——

---

① 亨利·亚当斯：《亨利·亚当斯的教育》（波士顿，1930年），第436页。

② 罗恩·彻瑙：《摩根家族》（纽约，1990年），第81—86页；斯图尔特·布鲁奇：《企业》（纽约，1990年），第341页；乔治·E. 毛里：《西奥多·罗斯福时代（1900—1912）》（纽约，1962年），第7—8页。

"满负荷运转"所必需的经营方式，不过由此带来的大量产品却能以一定的利润售出。许多企业联合起来以避免进一步遭受打击，同时在最大程度上垄断市场。不过至关重要的是，兼并运动是由新技术推动的（从蒸汽动力到电力、从铁到合金钢、从电报到电话、从简单机械到发动机和内燃机的变化），而新技术则需要大量的资本进行开发，同时还需要一个有利可图的巨大销售市场。正如那些获得巨大成功的企业，它们的经验已经证明，市场必须是国际性的。这种认识也导致了其他形式的合作项目，比如美国钢铁公司试图与欧洲以及美国的竞争对手共同瓜分世界的钢轨市场。1897 年以后，对美国社会的经济基础重组完毕以后，垄断资本开始利用它们所获的利润到海外投资，不过其中半数仍然是在加勒比和南美地区。[①]

在兼并运动达到高潮的时期，罗斯福出任美国总统。与罗斯福的言辞往往相反，他的政策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表明他已经认识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变化对于国内政治的深远意义。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他作为反托拉斯者的声望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实际行动，尤其是与塔夫脱担任总统时期相比；他在 4 年之内提出的反托拉斯诉讼是罗斯福白宫 7 年任职内的大致两倍。在任职的前 6 年，罗斯福在这方面一直小心翼翼，他一方面在加勒比问题、亚洲均势以及扩大总统权威方面继续沿用麦金莱的既定政策，另一方面对于麦金莱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非常显著的例子是，急需出台的新关税政策——他则避而不谈。1895 年，他在给其密友亨利·卡伯特·洛奇的信中写道："感谢上帝我不是一名自由贸易主义者。不顾死活地沉湎于自由贸易原则似乎不

---

①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历史的观点看资本主义危机》，《社会革命》第 6 卷（1976 年 10—12 月），第 84—85 页。

可避免地导致道德品质的堕落”。[1]

1899年，时任纽约州州长的罗斯福认为，“在劳资关系模式上……我们有成堆的问题需要解决”，“再往后的50年中更多地关注这一问题比任何扩张问题”都更有必要。接下来又说，他坚信这一点，“尽管我是一名扩张主义者”。[2] 罗斯福类似于美国的托利党人，他试图运用政府手段，尤其是关税手段以及白宫这个“头号讲坛”，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以确保政治和平，弥合日益扩大的阶级分歧，并把这些目标与对外政策结合起来。汉娜·阿伦特著名的格言是“所有以一贯之的帝国主义政策在其源头都能看到资本与暴民的结合”，这话过分夸大其词，并不怎么适于罗斯福的政策。但是，作为这个国家统治阶级自我剖白的一员，他知道外交政策能够提供维持政治稳定所必需的面包和竞技舞台。

罗斯福的好友布鲁克斯·亚当斯（罗斯福经常邀请他到白宫逗留）向他直截了当地解释了内政与外交的能动关系。1901年，亚当斯提出，只有美国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商业战不可避免的亚洲和拉丁美洲市场能够捍卫美国的利益以后，美国才能够坚持高关税政策。1903年7月17日，亚当斯在给总统的信中写道：“总之，要让这个国家生存下去就必须以合理的税率保持西行的道路畅通无阻，并控制位于亚洲的终端市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垮掉。”（另一方面，亚当斯又叫嚷：“我们必须实行新政……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否则我们就会摇摆不定。”）对于后一点，罗斯福感同身受；他在第二天回信说：“我们必须保证通往东方的商路畅通。为了确保我们的终端市场，我们必须尽力防止亚洲市场对我们关闭。为了保证通往这些终端市

---

① 罗恩·彻瑙：《摩根家族》，第130—131页；西奥多·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八卷本，埃尔廷·E. 莫里森等编，马萨诸塞州剑桥，1951－1954年），第1卷，第504页。

② 罗斯福：《书信集》，第2卷，第1053页。

场的道路畅通，我们必须保证通道的管理主要从我们国家的利益出发，也就是从这个国家的商业利益出发。”

罗斯福对“利益”的定义非常有趣。不过，他不愿通过斗争的方式降低关税借以疏通共和党的血脉。因此，他只好听取布鲁克斯的建议，推动立法工作，目的是使铁路的管理更加集中化和更有效率（在这方面他成功地制订了法律），以便为一系列的军事冲突做好准备。几乎在麦金莱遇刺的同一时刻，他对明尼苏达州的听众讲到，“有一则家喻户晓的格言这样说，‘话说得客气些，手里再提着大棒，事情一定好办得多’”。“如果美国愿意说话客气点，而且建立并维持一支训练有素且效能完备的海军，那么门罗主义原则就可以大行其道。”或者用他较早以前的一个说法，“如果没有武力作为后盾，外交是毫无用处的；外交家是军人的仆人而不是主人。”不过，他倾向于对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发动战争。“文明”国家间的战争将会“越来越少”。但是，“从长远看，文明人将会发现，只有征服野蛮的邻居，他才能够维持和平”。美国人的这种托利主义就此断定，国内的和平与海外的商业扩张是相互关联的，而商业扩张与向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尤其是亚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正日益成为商业和战略上的目标——发动战争的必要性同样是相互关联的。[①]

在同古巴岛上的西班牙人开战的过程中，罗斯福阅读了埃德蒙·戴莫林的著作《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的优越性》。这位莽骑

---

① B. 亚当斯致罗斯福，1903年7月17日，罗斯福致亚当斯，1903年7月18日，均见罗斯福文件，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马萨诸塞州，剑桥；劳埃德·加德纳：《从解放到遏制》，见威廉·A. 威廉斯主编：《从殖民地到帝国》（纽约，1972年），第223页；J. 巴特利特：《常见引用语》（波士顿，1980年），第687页；西奥多·罗斯福：《华盛顿被人遗忘的箴言》，《美国海军学院学报》第23卷第3期（1897年），第458页；戴维·希利：《美国的扩张主义》（麦迪逊，1970年），第151—153页。

兵在科学上信仰达尔文理论，但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他不大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1899—1900 年，当他注意到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数量以后，这种怀疑可能进一步扩大了。他似乎从两个渊源得出了自己激进的观点。首先是拉马克学说，该理论强调缓慢的环境变迁能够改善人种，而社会达尔文主义通常强调自由放任主义和突变。像罗斯福这样的托利党人所需要的是缓慢变化，而且他还相信个人的意志以及道德修养的强大作用（毕竟他把自己从一个体弱多病、娇生惯养的男孩培养成了一名强健的莽骑兵）。第二个渊源是他对美国历史的理解，特别是对西部历史的理解，那些材料都是他从一部多卷本的著作中摘编而来。正如一位论者所言，这些历史故事具有“明显的白人至上主义色彩”。他自视为“头脑正常、思维健全”的人，认为美洲大陆具有伟大的天定命运，不会仅仅是蛮人狩猎的场地：“我不会如此极端地认为百分之百的印第安人都是劣等人，但是我相信 9/10 的印第安人的确如此，当然我也不想继续追究第 10 个人的具体情况。”因此，他的帝国主义思想更多地来源于它的传统价值观，而不是达尔文的任何理论范畴——是出于美国的历史，而不是出于科学。与特纳一样，罗斯福也阅读了白人在美洲大陆的殖民历史，特纳关于所谓西部边疆的著作也曾激励过西奥多·罗斯福，而且罗斯福还同他建立了书信联系。[①]

因此，罗斯福把英国视为天然的盟友。共同的民族命运最终消除了两个国家在美洲新大陆的种种分歧，使它们依据门户开放原则结成了联盟，在亚洲共同反对俄国和德国。英国人在与南非布尔人的战争中屡屡失利的消息传来后，罗斯福和国务卿海约翰

① 托马斯·G. 戴尔《西奥多·罗斯福与种族观念》（巴坦卢，1980 年）；戴维·伯顿：《西奥多·罗斯福》（费城，1969 年）；罗斯福：《书信集》，第 1 卷，第 363 页。

感到非常震惊。这场灾难只能向罗斯福证明，“英国在走下坡路”而美国人正在盎格鲁一撒克逊伙伴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他和海约翰希望他们对英国苦战南非的诚挚支持能够促使伦敦在南非对美国商品奉行门户开放政策，可是待到和平恢复以后，南非的门户却严严实实地关闭了。不过，在阿拉斯加和加拿大之间那块有争议的领土上，英国的态度要合作得多，那一地区由于 1896 年发现金矿而变得更有价值。西奥多·罗斯福派军队去强行攫取权利，一个由美、英各三名“法律专家”组成的仲裁小组随后成立。罗斯福总统任命的并非什么法学家，而是观点与他一致的政客。出于英美关系的和谐而不是公平方面的考虑，英国首席法官投票支持了美方。令加拿大人怒不可遏而又无地自容的是，他们的领土要求成了伦敦新绥靖主义政策的牺牲品。

由于英国人的态度非常合作，俄国人遂成了罗斯福的心腹大患，因为他们的制度已经腐朽，而他们的政策目标却是要控制欧亚大陆。罗斯福的矛头同时指向了德国人，他希望他们“在与英语民族没有冲突的地方能够交上好运”。这种冲突似乎正在亚洲形成。在海上，德皇的造舰计划对两大英语民族构成了挑战；在加勒比，美国的作战计划设想了与德国可能爆发的战争。就柏林方面来说，它实际是正把西半球从其轻重缓急的战略次序中下调。就像过去对外交事务的评论那样，亨利·亚当斯的看法较为中肯：

> 看到我们民族感情的突然变化，我无比惊奇（1903年在给密友伊丽莎白·卡梅伦的信中写道）。直到 1898年为止英国一直是我们最讨厌的国家。如今我们很少或根本就不关注英国了。我们似乎把它看成了我们的财产。但是我们对待德国的态度却荒唐可笑，认为像德国这样没有海岸线、没有殖民地、没有煤矿的蕞尔小国会进攻我们，这种观点在我看来荒谬绝伦，无庸多虑，但

是（参议员洛奇）卡伯特、西奥多·罗斯福以及参议院……却对此念念不忘，而且我们正花费大量的美元以防此患。[①]

一如既往，罗斯福认真听取了布鲁克斯的建议，仍然无视亨利·亚当斯的意见。布鲁克斯认为，为了挽救这个民族，东方的“终端市场”必须保持开放，俄德两国的势力必须被击退，不文明的国家必须走向文明，同时——最为重要的是——要在美国维持阶级和平和经济增长。如此艰巨的任务，要求对公众和国会予以开导，让它们理解自己必须承担的新义务，但在罗斯福看来，这两项任务很难完成，因为上述两股力量目光狭隘、愚昧无知。他还进一步声称，宪法错误地把外交政策的责任赋予了国会。进步主义的核心主题就是教育、管理和真正地控制公众，使他们能像进步运动领袖所期望的那样理解在政府领导下整顿和改良社会的真正意义。为此，罗斯福以前所未有的、甚至麦金莱也无法比拟的姿态利用和讨好新闻界。罗斯福试图控制新闻，而且即使在和平时期他也知道如何不择手段地实现这一目标。他是美国政治史上第一个利用现代新闻媒体来为其政治生涯服务的重要人物。1902 年，白宫（这个词汇在罗斯福担任总统期间开始广为使用）进行翻修的时候，他向新闻界保证，要在白宫大楼内为他们提供一个房间。他试图操纵记者，以至于一些记者拒绝与他进行谈话，除非有位朋友在场做见证。他的一些直言不讳的观点以及绘声绘色的言谈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向公众公开的。伊迪斯·沃顿认为，新闻界这样守口如瓶，说明了“他是多么地受到爱戴和尊

---

① 比尔：《罗斯福》，第 450 页；托马斯·J. 诺尔：《美国人、布尔人与美国人》（俄亥俄州肯特，1978 年），第 5－20、135 页；艾尔弗雷德·瓦格茨：《世界政治中的德国与美国》（德文版，两卷本，纽约，1935），第 1 卷，第 618—621 页；亨利·亚当斯：《亨利·亚当斯书信集（1892—1919）》（沃辛顿·C. 福特主编，波士顿，1938 年），第 401—402 页。

敬”。（然而，她在一次大型的午餐会上听到罗斯福说：“如果我们能够复活古罗马的优良习俗就好了。我知道，如果把〔某某〕参议员宰了的话，我立刻就浑身舒坦了”，即使是这位精于世故的小说家听罢也大为震惊。）新闻界自身的审查或许也是出于一种恐惧。罗斯福曾经试图曲解一项法律以便能够按照联邦诽谤罪条例把一位喜欢挑剌的出版商关进监狱，从而封其口舌，但他未能成功。在国内加强控制对于在海外实施控制似乎非常必要。[①]

二、巴拿马革命

罗斯福当然渴望控制加勒比—中美洲走廊，特别是未来的地峡运河。1899 年后期，英国人在南非连遭败绩以后，国务卿迫使英国人于 1900 年 2 月签订了《海约翰—庞斯福特条约》。该条约终于废除了 1850 年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并授权美国独家开凿和管理——但不得设防——一条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运河。令海约翰大为吃惊的是，参议院拒绝批准该条约，理由是美国必须对运河拥有防护权。时任纽约州州长的罗斯福，推波助澜地发起了一场针对共和党这一大作的批评运动，而亨利·卡伯特·洛奇领导参议院反对这一条约，则是出于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且他还认为英国不堪一击。不过最为重要的是，洛奇和其他参与 1900 年选举运动的人不想被指控为对英国人心慈手软。遭受沉痛打击的国务卿于是提出了辞呈，但麦金莱不仅拒绝接受，反而命令海约翰进一步争取运河的防卫权。第二个《海约翰—庞斯福特条约》包含了这种权利，因而于 1901 年 11 月在参议

① 库珀：《武士与牧师》，第 27—29 页；乔治·朱厄金斯：《白宫新闻》（芝加哥，1981 年）；伊迪斯·沃顿：《历史一瞥》（纽约，1934 年），第 314 页。

院顺利获得通过。[1]

罗斯福上台时，已经深知开凿运河的必要性，这尤其是因为他的好友艾尔弗雷德·萨耶尔·马汉一直在向他灌输运河走廊的商业和战略价值。现在的问题是把运河的位置设在尼加拉瓜还是巴拿马。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考察团一直推荐前者，因为其费用低而工程技术问题又相对较少，而后者的部分权力控制在一家法国公司手中，19世纪80年代德·雷赛修造运河的计划失败以后遂由这家公司接手。这家公司是由两个非常狡猾、有权有势的大人物控制的，他们是菲利普·比诺一瓦里亚和华尔街律师威廉·克伦威尔。1902年，此二人协助扭转了美国一贯坚持的政策，并游说参议院通过了《斯普纳修正案》（以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参议员约翰·斯普纳的名字命名），授权总统向法国公司支付400万美元从哥伦比亚购买运河控制权——哥伦比亚认为巴拿马为其所辖一省。随后，海约翰通过谈判与哥伦比亚签订了《海约翰—埃尔兰条约》，由美国向哥伦比亚支付1000万美元，同时要为6英里宽的运河区支付25万美元。

条约传回了尚在内战中的波哥大，那时当权政府对现代化、美国佬应有的才能以及连通两大洋的价值等问题均持怀疑态度。最后，哥伦比亚以价格过低为由拒绝了美国的要求。罗斯福一时勃然大怒。约翰·T. 摩根（亚拉巴马州民主党人）在修筑尼加拉瓜通道工程上拥有巨大的私人利益，由于他权势巨大，罗斯福难以重返参议院要求追加拨款。与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过从甚密的比诺一瓦里亚和克伦威尔于是于1903年11月在巴拿马策划了反对哥伦比亚政府的起义，他们知道美国的军舰将会光临现场。巴拿马人根本不需要煽动，由于被茂密的森林分隔，他们自19

① 威廉·C. 怀尔德纳：《亨利·卡博特·洛奇与美国对外政策的探寻》（伯克利，1980年），第148页；《华盛顿邮报》，1990年6月10日，F6。

世纪中叶以来就在不断举行起义，反抗哥伦比亚的控制。由于1846年美国一哥伦比亚条约规定由美国保证地峡通道的安全，所以美国军舰常常居中调停叛乱。1901年，当美国海军前去制止一场暴动的时候，反哥伦比亚的武装早在那场暴动之前就已经做好了立即入侵巴拿马城的准备，美国、而不是哥伦比亚显然已经成为地峡问题的决定性力量。一位历史学家的计算结果显示，在1850—1903年间，美国军队占领巴拿马的时间总计达到200天。1903年底，罗斯福利用美国的轮船和海员阻止了哥伦比亚对叛乱的镇压。他显然违反了1846年的条约，因为该条约承认哥伦比亚在这一地区拥有主权。这倒无关紧要。海约翰迅速与比诺一瓦里亚（而不是巴拿马人）进行谈判，签订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条约，美国获得了宽十英里的"名义主权"（这是海约翰后来对它的称谓），使这个新生的国家由此一分为二。巴拿马为此获得了1000万美元和每年25万美元的补偿。罗斯福为这次军事政变进行了开脱，他声称哥伦比亚对巴拿马"管理不善、治理不当"，所以当哥伦比亚人拒绝这个平等条约后，"全体巴拿马人民便一同揭竿而起"。①

罗斯福试图掌握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然而他却在巴拿马挑起了革命，煽起了中美洲和华盛顿群众的激情。比诺一瓦里亚为保护其公司的投资而出卖巴拿马人权利的行径令巴拿马人义愤填膺，当美国人用金条收买了他们衣衫褴褛的军队以后，巴拿马人终于暂时平静下来。美国官员通过运河区直接和间接地控制着巴拿马，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主义再度觉醒，要求建立一

① 罗斯福：《书信集》，第3卷，第675页；迈克尔·L.康尼弗：《巴拿马与美国》（佐治亚州雅典，1992年），第33—34、60—61页；理查德·H.科林：《西奥多·罗斯福的加勒比海政策》（巴坦卢，1990年），第7—8章；论证较充分的观点，可参见理查德·莱尔：《傲慢的外交——美国对哥伦比亚的政策（1903—1922）》（特拉华州威尔明顿，1987年）。

种新型、公平的国家间关系。罗斯福在国内碰到的问题更多。他小心翼翼地利用报界的朋友使美国人做好了占领运河区的心理准备。不过，这种预防性的宣传并没有挡住批评声音的大量涌现，在《纽约时报》以及赫斯特报业集团各类报纸的带领下，批评者称罗斯福的占领行动是“邪恶的”，是“莽骑兵践踏着国际法的破碎残骸对另一个共和国的进攻”。《纽约世界报》的一篇报道披露了比诺一瓦里亚扮演的角色和其中所涉及的数百万美元的交易。参议院民主党人试图阻挠条约的批准，当时1904年的大选刚刚拉开序幕。罗斯福发起了猛烈的反攻，他称那些反对派是“一小撮尖声怪气的政治阉党”，代表的不过是东北部那帮半死不活的骑墙派人士。经过一番艰苦的斗争，1904年初他推动参议院批准了这个条约。长期以来健康每况愈下的海约翰经过这番折腾，精神进一步萎靡，于1905年最终去世。这次事件进一步强化了罗斯福对参议院的沮丧看法，他在1905年中期写道：“很明显，作为条约缔结权的组成部分，参议院是一个卑劣的机构。”[①]

与此同时，工程人员开始了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挖掘和船闸建造工作。科学家和医务工作者由于消除了黄热病和疟疾的病源而创造了一个可与运河建造相媲美的奇迹，正是这两种疾病毁掉了德·雷赛此前的工程项目。不过，这位法国人的失败，原因也在于他试图用私人资本完成世界上最宏大的工程项目。罗斯福了解私人市场的局限性，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私人商贸机会的扩大需要20世纪重商主义政府的干预。1906年，罗斯福参观了这项工程并坐在了其一庞大机组的操纵台前，由此他成为美国历史上在任期内离开美国本土的第一位总统。1914年运河开通以

---

① 《舆论》，1903年11月19日，第645页；麦尔斯·P. 杜瓦尔：《从加的斯到中国》（斯坦福，1947年），第411—412页；库珀：《武士与牧师》，第71页；罗斯福：《书信集》，第4卷，第1286页。

后，纽约到旧金山的航运距离从13600英里缩短到了5600英里。

三、干涉多米尼加

19世纪美国曾一再向加勒比—中美洲地区派出舰队和陆战部队，而1898年以后，美国出兵的频率进一步加快。在1898—1920年间，美国海军陆战队进入加勒比国家的次数不止20次。新运河的安全仅仅是导致干预的原因之一。1901年，也就是美国获得运河区之前大约两年的时候，罗斯福在年度咨文中宣布，针对"野蛮和半野蛮民族的干涉主义"是"非常令人遗憾但又十分必要的国际警察义务，这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必须承担的一种义务"。然而，私下里他却希望北美和欧洲的民众能够保持克制。不过，"如果任何南美国家对任何欧洲国家行为不端的话，就让欧洲国家打他的屁股吧"。他还进一步从表面上限制美国的权力，1901年底他对他的密友德国大使施佩克·冯·斯坦伯格说："我认为门罗主义也就等于是南美洲的门户开放政策"。然而，到1903年年中的时候，罗斯福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门罗主义的正确范围是墨西哥、加勒比以及运河的两个入口地区。[①]

在加勒比—中美洲地区运用门罗主义而在拉美其他地区则运用门户开放原则，这种区别有助于解释西奥多·罗斯福在前一地区的过火行为，以及他在后一地区多少更为温和的态度。随着美国的海外投资从1897年不足100万美元急剧增加到1914年的35亿美元，有近一半的投资流向了拉丁美洲，特别是墨西哥和罗斯福的门罗主义保护范围内的其他地区。担负保护本国公民及其财产安全任务的美国军官对这一地区腐败无能的恶政感到震惊。他

① 罗斯福：《书信集》，第3卷，第116、527页；库珀：《武士与牧师》，第71 72页。

们和美国记者一起强烈要求国务院加强干预，教导土著人民如何按照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的标准行事和改良。国务院做出了充分的回应，以至于这些民族把海军陆战队称作是“内务部队”。古巴受到了特别的关注：美国官员热切地希望由古巴管理自己的事务，但必须维护秩序并坚持《普拉特修正案》，因为当时在既没有政治、尤其没有经济控制权的情况下，古巴人治理他们岛屿的尝试无一例外地以动乱告终。允许古巴自治并由其自主建立秩序虽有一些好处，但在《普拉特修正案》之下美国的特权更多，所以，为了维护同时也是为了实践那些特权，罗斯福和陆军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于1906年对古巴动用了军队——尽管在公开场合强调海军陆战队是应古巴的请求才动用的。的确，美军的到来得到了古巴政府的同意，也得到了试图推翻政府的叛军的同意。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古巴自治的假象中，美国似乎既是古巴政府的保护人，同时也是叛军的代言人。但美国人将在古巴强行维持秩序却并非假象。[①]

不过，除了入侵巴拿马之外，罗斯福具有重大意义的干预行动于1904—1905年发生在圣多明各。这一事件的分析人士通常首先从美欧贸易公司的竞争谈起，然后是由此造成的局势动荡，最后是罗斯福出兵作为“国际警察”前去恢复秩序。不过，该事件的原因和含义却要深刻得多。

1900年，由于两种农业体系的出现，即依赖烟草和可可出口的北方商业集团和依赖于甘蔗种植园的南方集团的出现，多米尼加共和国顿时陷入社会动荡之中。两个体系都动荡不定，前者是因为可可种植取代了烟草种植，后者则是由于大量美国和古巴

① 理查德·C. 查利纳：《陆海军上将与美国对外政策（1898—1914）》，（普林斯顿，1973年），第167页；阿伦·R. 米利特和彼得·马斯洛斯基：《为了共同防御》（纽约，1984年），第319页；罗伯特·C. 海尔德布兰德：《权力与人民》（博士论文，艾奥瓦大学，1977年），第195—197页。

资金的流入，在开发甘蔗种植园的同时却把农民赶出了他们的土地，造成了食品短缺。糖业精英成为利用美国军队维持秩序——也即维护自身新兴的经济势力——的驱动力量。蔗糖的输出和商品的输入成为这个集团获利丰厚的热门生意。于是，纽约的圣多明各改良公司在19世纪90年代进入该国，控制了进出繁忙的海关，而美国所属的克莱德轮船公司则成了主要的承运人。不是欧洲人的威胁，而是来自北美的新投资，为美国的干预初步创造了条件。美国拥有2000万美元的投资，其中约1/3在于蔗糖业，这最终促使欧洲投资商在德法两国同行的带领下试图阻止北美资本的渗透。问题的核心是经济开发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动荡，而不是美国的地区战略利益面临威胁。那种战略威胁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公使威廉·F. 鲍威尔想像出来的，他和其他一些北美人多年来一直要求华盛顿占领这个国家。[①]

1904年初，由于该地区其他地方的一些危机，罗斯福敏锐地意识到了多米尼加问题的利害关系。在1902—1903年，英国人、德国人以及法国人曾经动用武力向腐朽的委内瑞拉政权讨债。欧洲各国已经征询过罗斯福的意见，但是罗斯福遵循让欧洲人“打拉美人的屁股”的政策，而且业已同意他们采取行动。令他感到诧异的是，欧洲人的入侵激怒了美国的公众舆论。此外，国际法院也支持这次动武，这有可能成为引发类似干预的一个危险先例。由于罗斯福开始感到不安，所以施佩克·冯·斯坦伯格建议他行使警察权力，这样欧洲国家就没有干预的必要了。1903年3月，罗斯福答复说，这个建议“对我来说是首次听到，我会尝试一下的……外部列强如果再次试图以武力讨债，将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当国务院向他警告说，美欧在本来就动荡不

① 麦克尔·鲍德：《多米尼加共和国资本主义农业的起源》，《拉美研究评论》第22卷第2期（1987年），尤其是第148—149页。

安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展开竞争有引发革命的危险，而这将损害美国的利益，这时罗斯福已经做好了采取行动的准备。“在圣多明各我想做的无非就是一名警察不得不作的事情。至于兼并这个岛屿，我的愿望就像一只填满肚子的大蟒蛇也许不得不把一只豪猪倒着吞下一样。”他准备采取行动，因为“圣地亚哥人对我们抱着一种似战非战的含糊态度”。①

1904 年年中，一个仲裁委员会让罗斯福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圣地亚哥改良公司的权利得到了承认。不过，多米尼加政府并没有向这家公司支付债务，而是由该公司接管一处重要的海关自己筹集债款，这时欧洲人的抱怨再度传来。圣地亚哥改良公司、美国外交人员以及言听计从的多米尼加政府（由于采取合作态度而得到了 120 万美元的资助）请求美国接管各处海关。罗斯福还派出舰队前去保护刚与美国达成交易的多米尼加政府，镇压该国愤怒的民众。1905 年 1 月，总统又炮制了一个保证该国领土完整的条约，条件是美国获得征收该国全部关税的权利。关税收入的 55%用于支付外债，其余 45%则由多米尼加人支配。令西奥多·罗斯福大为懊恼的是，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该项条约。反对派讨厌这种领土保证。另外，他们也开始怀疑，真正的受益者，可能既不是美国，也不是多米尼加的利益集团，而是外国的债券持有人。罗斯福公然违背参议院的决议以及宪法的规定，通过与多米尼加政府签订行政协定的方式使条约生效。但是，接管海关并不足以确保秩序的稳定。于是，总统不得不指示美国海军制止一切暴动。因为由美国的代理人管理海关，所以纽约的两大金融集团——J. P. 摩根和库恩一洛布公司在 1907 年收购了多米尼加的全部债务，使它完全落入了美国的控制之下。由于大势

① 德克斯特·珀金斯：《门罗主义（1867—1907）》（巴尔的摩，1937 年），第 394、408—409 页；罗斯福：《书信集》，第 4 卷，第 734 页。

已定，外国人被有效排斥，已无必要的领土保证条款也已被删除，所以 1907 年参议院最终批准了西奥多·罗斯福的条约。[①]

罗斯福总统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辩护，在 1905 年的国情咨文中他针对门罗主义提出了罗斯福推论。在否认美国拥有任何“版图扩充”意图的同时，他宣布美国惟一的愿望是希望“这块大陆上的其他共和国繁荣昌盛、生活幸福”，因此也要求“他们在自己的国度内维护秩序，在行事时要合理地顾及他们对外来人员所应付的责任”。美国将会为了“和平和正义”而进行干预。（并非有意要说反话，罗斯福还补充说，新政策“将会把给予古巴人民的发展和进步机会同样给予圣地亚哥人民”。）他在私下里写道，门罗主义不能再“被任何共和国当作一把保护伞，放任它们继续作为邪恶、散漫的土匪窝”。[②]

事实上，罗斯福不是维护而是完全颠倒了门罗主义：1823 年，门罗主义是为保护拉美革命者不受外来干涉而提出的，而 1905 年，罗斯福重新定义门罗主义却是为了保护美国针对拉美革命者的干涉主义。正如伊莱休·鲁特（国务卿海约翰的继任人）的描述，两者一个共同主题是，由于门罗主义是以美国的自我保护权为基础的，所以美国可以单方面地对它进行解释。在签署 1899 和 1907 年关于常设仲裁法庭的海牙会议公约的时候，作为签字的条件，华盛顿阐明了同样的立场。此外，罗斯福还通过行政权的运用重新界定了门罗主义，这种行政权大大扩大了总统的权威而进一步削弱了国会在外交政策方面已经在萎缩的权力。行政协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817 年，但是直到罗斯福 1905 年的政策实施以前，它们一直很少使用。罗斯福打开了使用行政协定

---

① 德克斯特·珀金斯：《门罗主义（1867—1907）》，第 413—414、427、435—436 页；伯顿：《罗斯福》，第 115—117 页。

② 詹姆斯·D. 理查森：《总统咨文与文件汇编》（20 卷本，纽约，1897—1922），第 16 卷，第 7375—7378 页；罗斯福：《书信集》，第 4 卷，第 1286 页。

的大门，以至于到20世纪末的时候，这种协定的使用已经远远超过了用以界定美国与其他国家间关系的条约。罗斯福认为权力的这种扩张是正当的，因为他不仅相信参议院没有能力处理外交政策，而且他还有更重要的理由，即总统“才是人民的管家”。即使没有宪法的明确授权，只要“这种行动”不为“宪法或法律所禁止”，那么行政首脑就可以贯彻他的意志。[①]

于是，在加勒比这类地区推行为美国的机会保驾护航的政策，引发了外部的挑战和内部的动荡，这些结果反过来又帮助创造了20世纪的帝王总统。鲁特或许最好地解释了其中的缘由。1906年，这位国务卿宣称，由于北美人第一次积累了“超过其内部开发所需的过剩资本”，而且“过剩资本仍在以不同寻常的速度增加”，所以“为商业和工业向南美和平扩张开辟了大量的机会”。接下来他又说，美洲人已经开始互相取长补短，因此，他们应当遵循“布莱恩凭借高瞻远瞩的政治才能为南北美洲所标明的以强大的商业走向和平繁荣的康庄大道”。鲁特早已把罗斯福称作是“华盛顿城内维护我们财产和制度的最伟大的保守势力”。[②]

当然，要在圣多明各实行布莱恩的政策，不仅需要西奥多·罗斯福的“保守势力”，其后继者的势力也是必不可少的。显然，罗斯福推论没有给多米尼加带来秩序，反而导致了更大的动荡。在华盛顿的襄助下，外国人垄断了蔗糖这一关键的出口行业，以及一般性的出口业务。在多米尼加，除了这些外国人以及依附于他们的精英集团，这个国家绝大多数的人口仍然极端贫困，这个国家的资源也同样没有得到开发——特别是人民口粮的生产。交

① 艾尔伯特·K. 韦恩伯格：《天定命运》（巴尔的摩，1935年），第429页；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和平之道》（纽约，1925年），第122—139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1906，两卷（华盛顿，1909年）第2卷，第1457—1461页；罗斯福：《书信集》，第4卷，第730页。

通体系也是殖民主义性质的，也就是说，建造它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连接多米尼加的城市及市场，而是为了尽快把出口作物运往港口以向海外销售。由于受到阶级、种族、外国垄断以及新殖民主义制度日益严重的剥削，多米尼加人开始相信，只有革命才能给他们带来生机。因此，1905 年的罗斯福推论不仅给北美人带来了巨大的机会，而且也导致了动荡的发生，1916 年伍德罗·威尔逊的干预行动以及此后长达 8 年的美国军事占领正是为了平息这些动荡。[①]

四、亚洲：门户的关闭

如果说，罗斯福在加勒比强制推行军事秩序的企图不能与成功混为一谈，那么他企图在亚洲玩弄均势政治的把戏也不能含混地认为是对秩序的追求。在上述两个案例中，罗斯福均没有表明他已经认识到了他所憎恶的动荡与混乱的根源，但是在亚洲，他至少已经逐步意识到，美国没有足够的能力解决中国的政治和日本的动机这类复杂问题。但不幸的是，直到其基于历史性的战略误判、以保护美国在亚洲的门户开放机会为目标的政策失败以后，他才逐步认识到这一问题。

义和团起义的结局以及外来干涉（正如后来中国历史学家对那一事件的提法）使俄国处在与中国讨价还价的主导地位。日本和美国无奈只得寻求机会阻挡沙皇的扩张主义。美国在俄国的利益出现了飞跃。在 1890—1894 年间，大约有 5—10 本关于俄国的书籍在美国出版发行，而在 1900—1904 年间则有 40 多本这样的书籍在美国面市。像《北美评论》和《大西洋月刊》这种广为

---

① 布鲁斯·J. 考尔德：《干涉的影响》（德克萨斯州奥斯丁，1984 年），尤其是前言第 34--42 页。

流行的杂志也在刊登第一手的报道和相关话题的文章。友谊的纽带依然存在，尤其是维特伯爵及其大西伯利亚铁路的代理商从美国购进大量建造铁轨的廉价钢材以后。维特还取消了某些农业机械的关税，从而使美国公司，比如国际收割机公司的市场份额从1901年的21%上升到1903年的28%。这两个伟大民族之间与日俱增的敌意来源于其他的问题，尤其是沙皇拒绝按照自己的承诺在1903年初从满洲撤军。在其他列强的鼓动下，中国提出了抗议，但是徒劳无获。美国的棉花出口商再度提醒华盛顿当局，重要的东北亚市场有可能落入俄国棉花集团的手中。美国官员认为，至少在西伯利亚铁路竣工以及俄国有一段和平时期来发展工业之前，维特难以贯彻其避免冲突的亚洲政策。1903年年中，海约翰在给美国驻华公使的信中写道："我们在俄国的势力……不在政府的军事和外交部门，而是维特本人以及俄国整个财政界"。1903年基希涅夫大屠杀披露以后，这种不信任情绪进一步加剧。纽约和其他地区的公众纷纷集会谴责沙皇，并募集了36.8万美元用于救助俄国犹太人。①

与此同时，日本人也得出结论认为，他们很可能与沙皇在满洲和朝鲜的野心发生碰撞。东京的亲俄官员受到了冷落，备战的序幕已经拉开，1902年1月日本同英国签订了同盟条约。担心德俄两国分别在欧亚崛起的英国人与決心制止德皇和沙皇扩张主义的日本人找到了共同目标，而且日本人还要报复这两位皇帝在1895—1897年间使其蒙受的奇耻大辱。罗斯福自视为英日同盟的非正式成员。他同样担心俄国，而且他还认为英、日两国共同承担着维护门户开放原则的义务。1903年，在日俄关系日趋紧张的时候，美国一直站在日本一边。1904年，日本发动突然袭

① 乔治·奎恩：《美国与俄罗斯的物质进步（1881—1906）》（博士论文，伊利诺斯大学，1942年），第158—166、179页。

击并摧毁沙皇太平洋舰队大部以后，罗斯福感到非常欣慰。1904年7月，他对海约翰说："日本终将获胜"，"日本人无意中帮了我们的大忙，因为他们帮的是文明人的忙……如果日本获胜，我们或许可以提供真诚的帮助，防止别国干涉，夺走她的胜利果实"——这里当然是指甲午战争后欧洲国家对日本的那种态度。以库恩一洛布集团总裁雅各布・席夫为首的一些银行家赞同罗斯福的主张。由于对沙皇的屠戮行为深恶痛绝，这些银行家同他们的英国同行共同为日本提供财政支持。以乔治・凯南为首的美国政论家也驱策着美国的舆论朝着同情日本的方向发展。凯南曾经是一名亲俄分子，但是经过一个月对"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他的一本著作的名称——的旅行体验，他转而成为北美批评沙皇政权的头号名人。他同罗斯福的关系非常密切。罗斯福曾在白宫的一次午餐会上宣布："如果大家都像我和凯南一样看待这场战争，我知道我们的舰队将会出现在什么地方。"[①]

有少数美国人持不同意见。詹姆斯・哈里逊・威尔逊仍在提醒当局，美俄友谊是稳定和开发亚洲的关键。1904年年中，威尔逊对美国外交家（以及中国问题专家）威廉・罗克希尔说，他"越来越有理由相信，国民对日本人任何不恰当的同情，或者任何使俄国疏远我们的政策都是一个重大的失误"。他强烈主张，与俄国达成能够确保"满洲门户开放"的协议，同时也与日本达成一个协议，允许日本人控制菲律宾，但条件是美国商人享有商业优惠。他认为，这样"我们就可以缔造一个新的帝国以恢复世界的均势！而我们则掌握着控制游戏的职权"。然而，反对威尔

① 罗斯福：《书信集》，第4卷，第865页；W. G. 比斯利：《现代日本的兴起》（伦敦，1990年），第150页；弗雷德里克・F. 特拉维斯：《乔治・凯南与美俄关系（1865—1924）》（俄亥俄州雅典，1990年）；泰勒・斯图尔茨：《美国人眼中的俄罗斯帝国（1894—1904）》（博士论文，密苏里大学，1942年），第222—223页。

逊及其支持者的势力十分强大。其中最强劲的一个反对意见是海福德·麦金德1904年1月向伦敦皇家地理协会提交的一篇论文中所列举的种种理由。这篇题为《历史的地理枢纽》的文章认为，随着世界已被完全发现，扩张主义将会被源于发展和中心地理位置的权势所取代。因此麦金德提出，英国海军（同时也暗指美国海军）与地处中心地位的俄国相比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俄国占据着世界的“枢纽地区”，而且正在得到开发，所以它有可能控制广阔的欧亚大陆。如果麦金德是正确的，那么马汉关于俄国威胁的警告也可能是相当准确的，但这位战略家提供的出路——建立一支庞大的舰队——可能就不是对症下药了。必须把俄国遏制在欧亚大陆之内，必须瓦解其权势。[1]

1905年初，沙皇果真利用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竣工部分向前线运送了比战争初期多几倍的人员和装备。日本人要在一场更加持久的战争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显然缺乏足够的资源。然而，1905年1月9日，即“流血的星期日”，圣彼得堡却爆发了反对沙皇的革命，同时日本又获得了第二次海战的胜利。这种局势表明，双方都需要和平。罗斯福主动表示愿意出面调停。1905年年中，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普茨茅斯，双方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拟定了和平条款。尽管日本在战争后期暴露了它的弱点，但它还是实现了大多数目标：在朝鲜享有独占权；接管至关重要重要的南满铁路，挡住了俄国南下的路线；割占具有战略意义的萨哈林岛南半部。由于日本没有同时获得战争赔偿，所以东京发生了骚乱。两国都同意恢复中国在满洲的主权，但是由于满洲北部的铁路权租让给了俄国，而南部的铁路权又租让给了日本，所以这不

---

① J. H. 威尔逊致罗克希尔，1904年6月30，威廉·W. 罗克希尔（柔克义）文件，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马萨诸塞州，剑桥；H. J. 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地理杂志》第23卷（1904年4月），尤其是第421—423、433—436、442页。

过是对门户开放政策所摆的一个空洞的姿态。

罗斯福因这次调停获得诺贝尔奖，但他没有获得日本遵守门户开放原则的保证，也没有在亚洲建立一个能够保护美国利益的均势格局。他不得不承认，日本不仅已经崛起为东北亚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它还拒绝继续保护美国的市场，尤其是在朝鲜，而1882年美韩条约中关于帮助朝鲜维护其独立的承诺（至少要表达“善意”）完全也被罗斯福置诸脑后。当日本在1905年把朝鲜变为保护国时，罗斯福毫无作为。罗斯福能够从日本人那里捞取的最大油水不过是《塔夫脱—桂太郎协定》（又是一个行政协定），其内容是美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势力，日本则相应承认美国对菲律宾的控制。但是，对罗斯福来说，更糟的情况还在后头。由于日本人打败俄国人而引发的1905年俄国革命，成为标志着20世纪开端的一系列革命之一。这些革命还包括：1906年的越南革命、波斯革命，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1911年的中国和墨西哥革命，最后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①]

乔治・凯南在获悉1905年圣彼得堡起义后非常高兴，特别是当他向1904—1905年的俄国战俘成功地灌输了反对沙皇的思想以后。然而，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远远超出了他的愿望或预料。像罗斯福一样，凯南一时难以明白的是，反对沙皇的信念竟然把他引上了这样一条道路。

五、结局

1905年，罗斯福的亚洲政策还遭受过另外两次沉重的打击。第一次打击起源于19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对中国移民的歧视政

①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纽约，1964年），第101—104、150页。

策。这种歧视在1904年的圣路易斯博览会上达到了极点，中国官方代表在博览会上受到了凌辱。北京拒绝与美国续签移民条约以示报复。中国各大港口的商人联合起来，共同抵制美货。作为美国产品的竞争者，欧洲人和日本人则对抵制运动听之任之。罗斯福非常震惊。他习惯于把一个效率非常低、特别不成功的人称作是"中国人"，这种个人习性表明了罗斯福对于中国人的歧视。罗斯福要求清朝官员迫使商人放弃抵制行动。清王朝先是做出了明确的答复，而后又在许多城市倒贴停止抵制美货的告示，从而表达了他们真实的感情。抵制美货运动最终结束了，但是，罗斯福又赶上了中国新一轮的排外运动。1904年，罗斯福请求J. P.摩根以及其他银行家挽救美国对汉口一广州这条重要铁路的租让控制权，不料又遭到第二次打击。罗斯福有所不知，事实上摩根已经秘密地帮助最初的特许权获得者美华开发公司把铁路的特许权以丰厚的利润卖给了比利时的利奥波德国王。这笔交易违背了美国对中国的承诺：该铁路将仅由美国人控制。由于中国人和罗斯福反对这次转让，摩根只得勉强地把特许权重新购回。中国由此认为，美国人与其他外国人一样不值得信任，所以要求收回特许权。罗斯福要求摩根坚决不要让步。由于没有有利可图的机会再次倒卖，加上对罗斯福一手控制的亚洲外交没有明显的信心，这位银行家还是把特许权卖给了北京。[①]

由于种族主义、日本的军事胜利、美国银行家的漠不关心以及日益高涨的中国革命的排外热情等因素的破坏，罗斯福大肆吹嘘的亚洲均势外交最后轰然坍塌。1906年，他时来运转，又得

---

① 谢尔曼·科克兰：《对中国的商业渗透与帝国主义》，见费正清与欧内斯特·R. 梅编：《从历史的观点看美国在中国的贸易》（马萨诸塞州剑桥，1985年），第190—194页；乔纳森·斯彭斯：《探索近代中国》（纽约，1990年），第139—140、237—238页；麦克尔·亨特：《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纽约，1983年），第277—278页。

到了调停法德摩洛哥危机的机会。由于决心帮助维持法—英同盟关系并遏制德国，罗斯福最终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但是这次调停对于扩大美国的利益没有多大意义。出于对北非感兴趣的美国制造商的利益考虑，他曾试图让各方做出门户开放的保证，但成效不大。不过，考虑到自西华德时代开始，美国的制造商和政府官员就浮言虚夸、大肆渲染亚洲市场的必要性，罗斯福亚洲政策的失败很可能导致严重的历史后果。1907 年，日本拒绝多种美国商品进入朝鲜，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亲日本的罗克希尔声称，东京不过是为了处理掉战时的过剩产品，但实际上日本收紧政策是迈向 1910 年全面占领朝鲜的一个步骤。同样是在 1907 年，日本伙同俄国彻底瓜分了满洲。罗斯福还受到了加利福尼亚反日骚乱的困扰，起因是日本人在该州的数量上升。罗斯福最后炮制出一个君子协定，由东京承诺控制移民，而华盛顿则尽力保护已经来美的日本人。然而，特别令人吃惊的是，罗斯福坦率地承认了加利福尼亚州的骚乱“是一个种族问题……一开始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①]

1906 年，美国官员评估了他们在“橙色计划”或称亚洲战争计划中所处的形势。他们认为，一旦与日本发生战争，菲律宾将难以据守，因此美国军队将不得不撤回夏威夷。国会拒绝在遥远的关岛和菲律宾建立太平洋军事基地，同时不同军种间的激烈竞争也使得制定统一的战略困难重重，此外，日本不断壮大的实力也制约着计划的制订。1907—1908 年，罗斯福派遣美国海军（当时由 22 艘现代战舰组成）进行了一次环球航行，并特意安排在日本作了停留，借以显示其军事触角的伸展范围。日本人的态

① 入江昭：《从民族主义到国际主义》（伦敦，1977 年），第 144 页；休·西顿·沃森：《俄罗斯帝国（1801—1907）》（牛津，1967 年），第 682 页；库珀：《武士与牧师》，第 111—112 页。

度非常友好，军舰也经受住了大海的考验，但这次航海对改变均势却是毫无意义。1899年，罗斯福曾经谴责那些反对占领菲律宾的人是"过时的人"。如今，也就是1907年，他又不得不承认这些岛屿应当比他的预期更早获得独立：它们"成了我们致命的弱点，是造成目前与日本相关的局势充满危险的全部症结所在"。最后一句话表明，他已经放弃了在满洲大市场维持门户开放政策的努力。1908年，罗斯福支持签订《鲁特—高平协定》（又一个行政协定）以后，一些疑问顿然消失，因为该协定规定，美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利益。《鲁特—高平协定》的签订使得异想天开的中国官员袁世凯的算盘落空，他试图怂恿美国以及其他外国企业进入满洲以牵制日本。[①]

在诸如汉密尔顿·霍尔特之类的富有的国际派人士的倡导之下，一些美国人在1907年危机期间建立了日本学会，试图在两大民族之间建立相互理解的网络。在随后的4年中，罗斯福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他警告他的朋友们，不能让西方列强试图阻止日本向亚洲大陆的"自然扩张"，否则日本就会向加拿大和美国大量移民。与此同时，他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激进了，他公开支持遗产税和所得税的征收，主张更加严格地规范各州之间的贸易，固定铁路运费，并且支持劳工运动。1907年，他谴责那些"拥有巨量财富的恶人"（尽管他当时正与J. P. 摩根合作以结束一场经济危机），同时他还谴责"掠夺性的财富"，要求联邦政府规

---

① 约翰·M. 多布森：《美国的崛起》（伊里诺斯州德科尔布，1978年），第130页；入江昭：《跨过太平洋》（纽约，1967年），第120页；保洛·E. 科莱塔：《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执政时期》（堪萨斯州劳伦斯，1973年），第209—210页；库珀：《武士与牧师》，第112页。

范股票交易活动，并把他荣获的诺贝尔奖金捐给了工业和平基金会。[1]

罗斯福接受在亚洲失败的事实与其国内改革计划的出笼看来发生在同一时期。对于这次“新政”他的朋友布鲁克斯·亚当斯早就提出过要求。不过，布鲁克斯所要求的新政是与美国开发亚洲的政策并行的，并不是要完全取代后者。罗斯福政策转变的这种巧合或许与他对亚洲的新看法并不相干。没有多人疑问的是，罗斯福短视的民族主义，对中国人冷嘲热讽的种族偏见（这也妨碍他理解加利福尼亚州针对日本人的种族主义），对日本的误解，对俄国虚弱性的低估，对美国军事力量的夸大以及无力操纵亚洲的均势使之符合美国的利益，等等，无不损害了他在1898—1905年间以在亚洲获取商业和战略机会为目标的美国外交政策。[2] 尽管胸怀推进美国机会的愿望，但是他的政策——从鼓励日本人盘剥朝鲜和满洲，到中国人抵制美货期间他的所作所为，乃至粤汉铁路租让权事件以及《鲁特—高平协定》——却助长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加剧了中国的动荡并帮助触发了中国的革命。

---

① 沃伦·F. 库埃尔：《寻求世界秩序》（拉什维尔，1969年），第106页；沃尔特·斯科尔斯和玛丽·斯科尔斯：《塔夫脱政府的对外政策》（密苏里州哥伦比亚，1970年），第121—122页；乔治·E. 毛里：《西奥多·罗斯福时代（1900—1912）》（纽约，1962年），第220—222页；罗斯福：《书信集》，第6卷，第1539页。

② 比尔：《罗斯福》，第456—459页。

第十章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与革命年代

1909—1913年间，前后历经两代人的美国外交史在加拿大、中美洲、墨西哥以及亚洲达到高潮，这段时间负责制定和实施美国外交政策的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和国务卿菲兰德·C. 诺克斯。许多学者并不恰当地认为，塔夫脱和诺克斯两人有时显得迟钝呆板、缺乏生气，但更多地是缺乏想像力，不过他俩对法律有着共同的爱好，对财产、先例、妥协、和解以及金钱的力量等法官们通用的词汇奉若圭臬。塔夫脱最开心的日子不是当总统的时候，而是后来在最高法院担任首席法官的时候。“事实是”，他当时说，“在我现在的生活中，我不记得我曾经当过总统。”[①]

塔夫脱有一个杰出的法律头脑。诺克斯与其前任鲁特一样，在一个由公司主宰的国家里，他是一流公司律师当中的佼佼者。而且，塔夫脱还有一份值得炫耀的履历，包括担任菲律宾总督、陆军部长、西奥多·罗斯福的外交调停人以及西奥多·罗斯福钦点的继承人等。莽骑兵很快就开始为他的选择感到后悔了，尽管无论他选择谁做继承人他很可能都会感到后悔。此外，罗斯福以及他在白宫的几位前任，留给塔夫脱和诺克斯的外交遗产最终导

① 詹姆斯·巴伯：《总统的性格》（新泽西州英格伍德克利夫斯，1972年），第175页。

致了一系列的动荡，事实上有几例已经是真正的革命，这是塔夫脱和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理解也难以解决的问题。由关税引发的暴动以及发生在中美洲、墨西哥以及中国的起义宣告了过去半个世纪历史的终结。当这些根深蒂固的政策为美国结出苦果的时候，塔夫脱和诺克斯不幸已在白宫和国务院当政。

一、克罗利、塔夫脱以及美国生活的前景

1909 年塔夫脱就职的时候，赫伯特·克罗利——此前一直是一份建筑杂志的小编辑——出版了《美国生活的前景》一书。罗斯福称此书是“多年以来对我国国情最为透彻、最具启发性的研究”。当这位不甘寂寞的前任总统制定出 1912 年重返白宫的计划后，政治观察家们很快便看到了克罗利对罗斯福思想的影响。这部书成了进步主义运动的一个路标，因为它通过对历史的诠释，提出了关于未来的真知灼见。克罗利认为，到 1909 年有三个历史性的主题已经成为关键问题：民族主义，它在内战以后的迸发使得国家不再是政治经济派别的简单集合；民主，在一个没有边疆的新兴工业化社会必须重新加以思考；效率，决定着在你死我活的国际竞争中谁将生存下来。尽管人们有时认为其中的任何一条都会同其他两条发生矛盾，但是克罗利认为，在 20 世纪，只有强大的、汉密尔顿式的民族主义政府才能拯救杰斐逊式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效率。与鼓吹通过公民投票和行使罢免权扩大民主的那些进步党人截然相反，克罗利认为现代民主需要保全一个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在这样的国家内，关键部门、即公司不应该通过反托拉斯措施的约束（因为这会导致效率低下），而应该通过联邦规章以及合法、强大的工会这一制衡力量反对派集团来加以约束。因此，克罗利是在试图调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过程中美国政治争论的内在矛盾：随着美国“人民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

他们总体上也相应地越来越民主了。他们的民主注定要通过国家生活的强化来实现。”①

国内的中央集权可以带来更多的民主（这可能要靠一个高效、廉洁的联邦官僚机构的恩典），克罗利的这一信念无非是一种信仰而已。然而，罗斯福愿意相信它，许多进步党人也因此顿感释然，因为他们的政治主张可能并不会像他们所担心的那样会遭到那么多的反对。不过，在外交领域，克罗利的计划看起来甚至更加前后一致，更有吸引力。外交领域的事务将由民族国家控制，其中最有效能的国家将主宰世界事务，并向全世界传播民主的福音（如果认为美国——正如它实际上表现的那样——是最有效能的国家的话）。克罗利无非是为美国人提出了一个20世纪的新使命。与约翰·温斯罗普1963年的“山巅之城”不同，克罗利的国家是在帝国主义竞技场上的国家。他主张停止高关税政策，通过降低关税来提高效率；主张有权动用军事力量（海洋并不能提供安全，而是“使可能的联系渠道成倍增加”）；总之，他赞成国际主义政策。必须愿为民族主义和民主而战：“基督教武士必须为福音传道者保驾护航”。克罗利警告说，如果进步党人不愿意为了高尚的民主目标而利用新兴的民族主义和现代战争，那么藏在暗处的邪恶的保守主义就会利用民族主义和战争武器为非民主的目标服务。②

接下来自然是制定一个明确的外交日程。国际义务是不可推卸的，因为“恰当地保障和平正是开启民主之源的政治条件”。他以一种有趣的预言的方式写道，在欧洲，美国必须准备放弃“中立地位”，转而采取干预政策以使“天平向比较和平地解决国

① 赫伯特·克罗利：《美国生活的前景》（纽约，1909年），第270—271页；埃里克·戈尔德曼：《面对命运》（纽约，1952年），第147页；戴维·W.莱维：《新合众国中的赫伯特·克罗利》（普林斯顿，1985年），第94—141页。

② 克罗利：《美国生活的前景》，第255—257、289、305、210页。

际难题的方向倾斜”。至于最受关注的拉丁美洲，他认为门罗主义已经过时，而罗斯福推论却非常合乎时宜；也就是说，美国和欧洲的利益在拉丁美洲是并行不悖的，所以华盛顿官员应当充当警察，以维护秩序兼催讨债务。“与南美人眼中的精英合作”可以大有作为，但是，在没有这种开明精英的一些国家则要使用铁腕统治。他特别担心墨西哥这个重要国家的“革命暴动”。加拿大必须与英国脱离，这样它就能够在北美体系中找到自己的归宿——或许要签订一个商业条约才能实现。这样，克罗利就构想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帝国，它从加拿大北部边境一直延伸到拉丁美洲，而美国则是帝国的中心。在亚洲，他承认菲律宾是美国外交的一个弱点，但是他认为必须以太平洋舰队保护这些岛屿，这样门户开放政策才能得到坚持。然后，才能够通过“大量的外交活动和或多或少的战争”对中国加以保护。美国人还会进一步了解到他们在“中国和日本的未来开发中”的重大利益。类似于在菲律宾的殖民主义是件好事，因为它“不会成为战争的理由，却能作为防止战争的安全阀。它为那些不甘寂寞且热衷于冒险的人……提供了一个纵情享乐的世界”。[1]

正如他的一位传记作家所言，克罗利把“国际化的帝国主义与民主化的民族主义结为一体”。[2] 正是这种结合使许多进步党人以及一些保守分子感到不可抗拒。这种系统明确的表述为他们在国内的所作所为以及在海外的为所欲为提供了辩护。塔夫脱和诺克斯对这种观点大部分表示接受，但是他们是有选择性的。塔夫脱的民族主义观更具怀疑精神，他对民主（国内的民主，或者是国外的民主，尤其是后者）的信赖也是如此。这位体重高达

---

① 查尔斯·福西：《自由主义的歧途》（纽约，1960年），第30—31页；克罗利：《美国生活的前景》，第261、293 312页。

② 福西：《自由主义的歧途》，第170页。

320 磅的总统承担不了过多的任务。他承认自己“对劳动要多讨厌就有多讨厌”，同时他还承认没有足够的能力应付自己的工作（正如他的首席助理所言，如果在 1913 年 3 月 4 日这一天完成一个轮回的话，塔夫脱可能要落后整整 3 年）。他内心对自己充满了怀疑，特别是在不得不追随罗斯福的政策这一点上。在举行就职典礼的那天早上，一场暴风雪袭击了华盛顿。罗斯福说，这正是结束其总统任职的恰当方式。塔夫脱回答说：“你错了。这是我的暴风雪。我早就知道，当我成为美国总统的时候，天将会很冷。”①

然而，这位新总统激励自己摆脱了克罗利建议的束缚，在实施反拉斯法方面远远超过了罗斯福。他打破了美孚石油、美国钢铁、国际收割机、烟草托拉斯以及其他垄断组织。他设立劳工部和联邦儿童署，但是他比克罗利以及后来的罗斯福对大政府控制大企业的好处持更多的怀疑态度。他希望做一名推行反托拉斯法的好法官，还希望做一名好管家，使国务院在为公司提供帮助时更有效率。以英国外交部的组织机构为蓝图，重组后的国务院设立了由专家领衔的区域局（例如远东局），建立了更加流畅的决策制度——在塔夫脱看来，这种制度将使“国务院在推进美国的外贸和海外利益方面成为绝对高效的工具”。②

在关税修订以及与加拿大的互惠制度方面，塔夫脱采纳了克罗利的分析，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09 年，佩恩关税法在众院获得通过，该法案的免税清单以及调低后的税率，令进出口商都感到十分满意。然而，保护主义势力在参院发起了反击，最

① 罗伯特·C. 海尔德布兰德：《权力与人民》（博士论文，艾奥瓦大学，1977 年），第 221 页；保洛·E. 科莱塔：《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执政时期》（堪萨斯州劳伦斯，1973 年），第 47 页。

② 斯图尔特·布鲁奇：《企业——一个自由民族的动态经济》，（马萨诸塞州剑桥，1990 年），第 388 页。

终通过的佩恩—奥尔德里奇关税法连克罗利主张的中等税率的标准也没有达到。塔夫脱不但没能恢复免税清单，而且后来还对这一结果表示赞赏，从而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他的谈话疏远了他同工业出口商、原材料进口商以及进步党的关税改革派之间的关系。罗斯福没有提供帮助。他早先曾经拒绝进行这场斗争，而现在他又袖手旁观。但是，更糟的情况还在后头。

塔夫脱认为，对外贸易对美国的繁荣正在变得日益关键，而且贸易和投资正在迅速地向北方发展。1909 年，美国向加拿大输出了价值 2.07 亿美元的商品，也即向美国的第二大客户英国输出的商品的两倍。自 1900 年开始，美国在加拿大的投资（特别是在矿产和森林业）几乎翻了两番，达到了 7.5 亿美元。此外，华盛顿的官员还在寻找破坏英—加经济联系的武器，特别是 1907 年以后，加拿大的新关税政策对英国市场实行优惠，对南部这个庞大邻国却采取歧视政策。无论塔夫脱总统还是威尔弗雷德·洛里埃总理都不想面对可能爆发的贸易战，但是美国人还有另外一套方式来驾驭外交。正如贸易关系局的查理·佩珀在致诺克斯的题为《加拿大的门户开放》的备忘录中所言，使加拿大脱离英国的贸易圈，可以削弱大英帝国整个的特惠关税体系，可以把“从西向东和从东向西”的贸易路线改变为“从北向南和从南向北”。塔夫脱完全支持这种路线的改变。他私下里对罗斯福说，如果可以通过谈判与加拿大签订一个互惠协定，就会使“它成为美国的一个附庸”。塔夫脱推动国会通过了他的议案，目的是尽快使北美大陆市场变成现实。但在渥太华，由于英国利益集团的有力支持，加上华盛顿政客关于美国未来可能兼并加拿大这种不合时宜的言论的刺激，保守派挫败了这次立法。克罗利的民族主

义过于露骨、过于唐突，难以实现任何伟大的外交目标。[①]

塔夫脱的言谈方式，或者更为准确地说，他对言谈满不在乎的态度使他屡屡遭受打击。与麦金莱和罗斯福不同，他不大注意控制新闻的发布，很少会见记者，拒绝提供信息，一副公众并无知情权的姿态。因此，批评家们对当局进行了攻击，而且也不像过去那样害怕当局的报复。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一位充满敌意的记者在描述塔夫脱外交政策时杜撰了“美元外交”这个词语。这个词语具有剥削和华尔街控制的含义。塔夫脱对这种指控非常敏感，尤其是对自己受制于华尔街的这种说法，因为他曾经宣称，华尔街作为一个集体“是他所碰到过的最大的蠢驴”。但是由于他没有对这个词语的使用表示任何反对，所以包括势力强大的助理国务卿弗朗西斯·亨廷顿·威尔逊在内的官员们也开始使用这个词语，用以描述塔夫脱对和平途径的探寻——即“以美元代替子弹”。塔夫脱在他致国会的最后一个国情咨文中最终使用了这个词语。事实上这个短语非常准确，只是它夸大了总统不愿使用武力的程度。在1894年普尔曼工人罢工期间，作为联邦法官，塔夫脱一直非常愿意下令“枪毙”罢工的领导人。无论作为罗斯福驻古巴和菲律宾的代表，还是作为下令出兵尼加拉瓜的总统，在使用武力时他都是毫无惧色。他驻亚洲的一位重要代表戴德（威拉德·斯特雷特）把金元外交恰当地定义为“海约翰的‘门户开放’政策在金融方面的一种体现”。当美元的功效不足时，从西华德到海约翰，美国所有的官员都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②]

---

① 这部分内容主要取自罗伯特·E. 汉尼计：《1911年的互惠问题——大陆主义与美国的世界政治》，《外交史》第4卷（1980冬），第1—18页；一种重要的解释见保罗·沃尔曼：《最惠国待遇——共和党修正派与美国的关税政策（1897—1912）》（查佩尔希尔，1992年），尤其是第136—167页。

② 海尔德布兰德：《权力与人民》，第214—215、244—246、261—262页。

事实上，正如塔夫脱已经认识到的，有两个原因使美元外交成了误导性的词汇。它不仅没有排除使用武力，而且美元在中美洲、加勒比、墨西哥以及亚洲具有如此大的破坏作用，以至于需要使用武力来恢复商业机会赖以存在的稳定条件。另外，使用美元并不意味着把外交拱手交给了银行家们。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官员对于新重商主义已经耳熟能详，他们知道政府在中美洲和中国的铁路建设中至少是起了根本性的作用，正如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所起的作用。帝国主义，说到底就是政府间的碰撞，也就是克罗利所说的民族主义间的碰撞。比如，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试图在亚洲把帝国主义转变成一种自由市场式的、门户开放的竞争，但是，就在1900年——如果说还不算久远的话——弹痕累累的北京大街上，美国的这种企图轰然坍塌在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之中。自由市场竞争悖论般地要求政府更多地参与。塔夫脱本人认为，把美国的政策称为“金元外交”，“必然会完全忽视一国政府在同外国政府的交往中所应发挥的最有用的职能。”因此，总统又在商务部设立了国外与国内商业局以帮助私人公司在海外进行竞争。[1] 总之，金元外交是政府、银行家、军方以及已经融入美国体系的富有的当地买办精英之间的一种伙伴关系。金元外交是克罗利强大的民族国家与第二次工业革命之间的联姻，所以它是乱伦的，因而也是高度危险的一种关系。

1910年，塔夫脱和诺克斯试图清除外交程序中的一个巨大障碍，当时总统强烈主张“事关国家荣誉的问题”应当像财产问题一样提交法庭裁决，此言一出令纽约的听众惊愕不已。在得到

---

① 马丁・J. 斯克拉：《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美国》（纽约，1992年），第88页，这是影响本书观点的一本著作；亨利・F. 普林格尔：《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生平与时代》（两卷本，纽约，1939年），第2卷，第678—683页；艾米莉・罗森堡：《传播美国梦》（纽约，1982年），第57、59页。

国际主义者和和平组织的迅速响应之后，诺克斯与英法两国签订了两份仲裁条约，宣布所有应可在法庭裁决的争端都应提交给一个仲裁法庭，而其他所有的问题可以提交一个高级联合委员会，由它决定采用仲裁还是其他可能的解决方式。对于无需诉诸武力便可以强制恢复秩序和公正程序的长期探求，终于实现了重大的、事实上是历史性的突破，这似乎就要造福于世界了。然而，塔夫脱却忽视了罗斯福的意见，也忽视了参议院的立场。罗斯福抨击这些条约是“草率的想法”，艾尔弗雷德·萨耶尔·马汉也声称，在国际法进一步成熟之前，美国的重大利益（比如门罗主义）是不能托付给联合委员会的。塔夫脱忽略了征询参议院的意见。结果，直到进步党人与洛奇一道拔掉了条约的所有牙齿，或者说剔除了条约对重大问题的约束力，洛奇才推动参议院以76比3的票数通过了这两个条约。从理论上说，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建立秩序的目标是好的，但是它与美国在海外寻求机会的外交政策并不相干。[1]

二、中美洲：机会、革命和大棒

在1906—1912年间，美国在中美洲寻求机会的行动达到了一个高潮。自从第二个《海约翰—庞斯福特条约》签订以及罗斯福推论提出以后，中美洲已经成了美国的禁脔。法国、英国特别是德国的经济侵蚀，不仅没有动摇美国对该地区事务的主宰，反而使华盛顿官员在这一地区扩大权势的任务变得更加重要。即将开通的巴拿马运河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不过从1906年到1912

[1] 沃伦·F. 库埃尔：《寻求世界秩序》（拉什维尔，1969年），第137—141页；威廉·E. 柳奇坦伯格：《进步主义与帝国主义——进步主义运动与美国对外政策（1898—1916）》，《密西西比流域历史评论》第39卷第3期（1952年），第491页。

年，北美人对该地区的政策，其核心自始至终都不是追求稳定和维持现状，而是鼓励一系列的革命。于是美国开始在中美洲制造混乱，特别是在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尤其是在尼加拉瓜。

自1893年开始，约塞·桑托斯·塞拉亚一直试图通过独裁统治来发展尼加拉瓜。他梦想把自己的权力扩大到一个统一的中美洲，这个梦想从一开始，也就是从19世纪30年代独立之初那段令人陶醉的日子开始，就从未实现过。华盛顿在巴拿马开凿运河的决定，彻底粉碎了塞拉亚富国强民并使尼加拉瓜成为全球贸易中心的梦想。他向欧洲人和日本人试探出资修建尼加拉瓜运河的可能，把特许权越来越多地交给美国以外的集团，而且还为捞取财富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把其他国家，特别是萨尔瓦多纳入它的控制之下。1906年以后，美国官员开始秘密援助萨尔瓦多的革命团体，因为他们明确保证对华盛顿持友好态度。北美人还强烈要求哥斯达黎加进攻尼加拉瓜。[①] 然而，塞拉亚的主要对手，危地马拉的领导人埃斯特拉达·卡夫雷拉却试图组织联盟反对尼加拉瓜。在1907年洪都拉斯（在危地马拉的支持下）与尼加拉瓜进行战争期间，就在塞拉亚逐渐占据上风的时候，西奥多·罗斯福和墨西哥的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进行了干预。调停的结果是成立了中美洲法院（以安德鲁·卡内基花费数百万美元在哥斯达黎加建造的一所大楼为基地），其职责是通过法律程序制止未来的战争。法院一直维持到1916年，由于它在该年的裁决违背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权利要求，所以美国有效地摧毁了它。

同时，华盛顿也搞垮了塞拉亚政权。1909年底，北美企业资助建设的东尼加拉瓜地区爆发了起义。当塞拉亚试图重获控制

① 托马斯·斯孔奥尔：《美国对中美洲的政策（1860—1911）》（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1991年），第171页。

权的时候，诺克斯（他本人在中美洲的水果种植园有相当大的投资）派出了500人的海军陆战队——实际上是去保护起义。塞拉亚的致命错误是，他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处决了俘虏的两名美国雇佣军。大为恼火的国务卿于是制定了“铁腕—诺克斯”政策：他派出舰队以显示他和塔夫脱的决心，要求塞拉亚立即退位，结果使这位独裁者流亡西班牙。不过，美国的干预才刚刚开始。许多尼加拉瓜人并不支持华盛顿为尼加拉瓜选择的政府，特别是在这个傀儡政权为了得到大笔贷款而把该国的铁路和国家银行的大部分利润都交给纽约的出资人以后。颇感诧异的美国公使埃利奥特·诺斯科特（他曾以为自己于1911年到达时会被当做救星一样受到欢迎）向国内发电说，不仅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反对尼加拉瓜新政权，而且“绝大多数的尼加拉瓜人都本能地对美国怀有敌意”——这在诺斯科特抵达的当天，市民们冲击政府大楼和军火库的行为中表达了出来。1912年，由一位德高望重的将军领导的反对华盛顿钦点总统阿道夫·迪亚斯的起义爆发后，塔夫脱派遣了2600人的部队前去镇压叛乱并保护迪亚斯政权。海军陆战队在尼加拉瓜一直驻留到1925年才最后撤退，当时的撤退行动还引发了另外一场起义。正如他们推翻塞拉亚政权以及在该地区的其他活动所表明的那样，美国官员根本没有反对革命的原则。在某些情况下，塔夫脱和诺克斯与罗斯福很相似，他们甚至更倾向于革命而不是秩序。他们只须设法区分哪些动乱是美国应该出资人支持的，哪些不是。[1]

洪都拉斯所发生的历史性转折，也证实了北美人更看重机会而不是秩序这一事实。尽管洪都拉斯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但是它

---

[1] 约塞·马德里斯致塔夫脱，1910年6月13日，《美国对外关系，1911年》（华盛顿，1915年），第655—656页；科莱塔：《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执政时期》，第188页。

拥有足够的土地，而且进行了公平的分配，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大部分农民一直能够养家糊口。美洲和欧洲水果市场的开辟刺激了香蕉种植园的急剧发展。到1910年，美国的公司控制了80%的香蕉种植园。这些公司不仅霸占了这个国家最好的土地和道路交通，而且还煽动战争以便控制政府。当亨廷顿·威尔逊抱怨“洪都拉斯的政治、金融以及经济动荡在地球上所有的国家中都创下了纪录”的时候，这种评价不仅适用于洪都拉斯人，而且也适用于北美人。1911年初，在美国“香蕉大王”萨姆·齐默雷的带领下，美国投资商和冒险家从新奥尔良动身前去夺取政权。当米吉尔·达维拉总统请求援助的时候，美国答应了他的请求，条件是美国有权干预和控制洪都拉斯的海关。愤怒的群众包围了洪都拉斯国会，他们威胁说，如果国会代表接受诺克斯—达维拉协议，定会让死无葬身之地，在这种情况下，洪都拉斯国会不出所料地拒绝了这项协议。齐默雷后来有效地控制了权力，他联合美国波士顿水果公司（或曰“大章鱼”——按照不久后拉美人的叫法）把洪都拉斯便成了典型的香蕉共和国。[①] 当暴动能为美国公民和企业带来权力的时候，美国就特别青睐这种暴动而不是稳定——尤其是某些当地政府所建立的稳定，因为这类政府在华盛顿看来是脆弱的，而且它们是否真心支持门罗主义和最近的罗斯福推论也值得怀疑。

三、墨西哥革命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墨西哥的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

① 《中美洲的匮乏与生存》（斯坦福，1979年），第115—118页；小C. D. 凯普纳：《香蕉业的社会视角》（纽约，1936年），第53—54页；小C. D. 凯普纳和J. H. 苏西尔：《香蕉帝国》（纽约，1935年），第107—12页。

就保证过他的国家将不会变成一个香蕉共和国，但是其欢迎美国投资的政策使墨西哥变成了美国的依附者。随着这独裁者的同僚们渐渐都上了年纪，一个个不思进取，日趋僵化，美元的流入也不断增加。190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北美人的投资已经达到5亿美元，其中的半数是在过去的6年内投入的。这些资金流向了油田租让、银矿和其他矿产经营以及大型种植园，包括为橡胶种植和农产品出口而开发的那些种植园。但是，这还仅仅是一个序幕。在1903—1910年间，各种投资急剧飚升，达到了1876—1900年间投资的3倍。到1910年，近20亿美元的美国资本控制了墨西哥43%的财富；1500万墨西哥人仅拥有33%，其余24%由其他外国投资者控制。在一些部门，美国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比如，美国人控制了2/3的橡胶生意，而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全球范围内的橡胶需求量才刚刚开始大量增加。在其他领域，比如石油，美国与其他外国投资商、特别是英国投资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不过，到1905年为止美国人似乎仍然控制着该领域。1904年，美国大银行家詹姆斯·斯派尔对德国大使说，“在美国人们有一种普遍的感觉，认为墨西哥无非就是美国经济的一个附庸，同样，从墨西哥边境到巴拿马运河的整个地区（中美洲全部）也被视为北美洲的附属部分。”一次，在访问过墨西哥以后，安德鲁·卡内基兴高采烈地说，“这个国家处处欣欣向荣，一派令人羡慕的太平景象”。[①]

卡内基没有深入地考察。大量的外国投资使墨西哥彻底发生了变化。由于种植园转而出口蔗糖和大麻，失去土地的农民急剧

① 弗雷德里希·卡茨：《在墨西哥的秘密战争——欧洲、美国与墨西哥革命》（芝加哥，1981年），第15—17、22页；小威廉·斯凯尔：《美国在墨西哥热带地区的投资（1897—1913）》，《商业史评论》第64卷（1900年夏），第217—254页；雷蒙·埃德瓦尔多·鲁伊斯：《胜利与悲剧——墨西哥人民的历史》（纽约，1992年），第292页。

增多，粮食的生产下降。1910年墨西哥种植的用于国内消费的玉米和大豆，还不及1867年。进口粮食主要来源于成本更高的美国，而富有的城乡精英阶层又有能力购买这些商品，因而价格上扬。由于20世纪初期农产品的出口增加，所以美国和墨西哥资本家掠夺农民土地的动力进一步加强了。美国不仅修建了把货物运往港口的铁路，而且还侵蚀和威胁了墨西哥人的社区生活，特别是在北墨西哥。心怀不满的农民在这个国家一向并不鲜见，但是到1910年他们比20年前又增加了许多，而且居无定所、更加激进的农业工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城市，资本流入造就出了一个新兴的、受过教育且政治上已经觉醒的中产阶级。这个群体并不激进，但是到1910年他们也提出了几项要求：让更多的墨西哥人参与管理自己的事务；让更多（像他们自己那样的）年轻新人取代以迪亚斯为核心的老人统治，因为当时迪亚斯的统治已将近40年了。[①]

1907年的美国经济恐慌，证明了墨西哥依附北部这个庞大邻国的代价。由于纽约资金枯竭，墨西哥的出口下降了，投资不见了，美国成千上万的墨西哥移民开始回国，动荡局势四处蔓延。美国在1898年战争中取得惊人的胜利以及古巴、波多黎各和巴拿马遭到帝国主义的迅速打击之后，迪亚斯对于依附的危险已经有所认识，他开始采取措施摆脱美国的经济控制。他尤其关切的是，进入墨西哥的美国公司已经不再是可以控制的中等规模的公司，而是1897年以后的兼并运动所造就的超大型企业，比如美孚石油和铁路公司这种难以控制的企业集团。他对美国（而不是英国）控制的许多铁路实行了国有化；通过征税提高流向北

① 弗雷德里希·卡茨：《1810年后农村地区的反抗活动》，见弗雷德里希·卡茨主编：《骚乱、造反与革命——墨西哥农村的社会冲突》（普林斯顿，1988年），第534—50页；约翰·梅森·哈特：《革命的墨西哥》（伯克利，1987年），第247—248页。

部边境的原材料价格；在1907—1908年间吸引欧洲资本填补纽约经济恐慌留下的资本空缺；对美孚石油进行了专门打击，不准它开采富油田，而且在1904—1910年间，把它在墨西哥照明和机油市场99%的份额削减到44%。同时，迪亚斯还把越来越多的优惠给了英国石油公司，特别是考德雷勋爵——其实力强大的企业抑制着美孚石油的扩张，到1910年控制了墨西哥石油生产的58%。[①]

罗斯福和塔夫脱并没有抱怨迪亚斯。然而，美国的投资商却不止是抱怨，在纽约花旗银行总裁詹姆斯·斯蒂尔曼的带领下，他们开始注意到弗朗西斯科·马德罗德所具备的吸引力，此人35岁左右，是迪亚斯的竞争对手。马德罗并不是革命主义者。出身于豪门的马德罗希望与迪亚斯联合执政，而不是罢黜他，但是这位老独裁者拒绝了他的提议，但接着又表示自己可能不会再参加总统竞选，于是这位年轻人开始了自己的竞选运动。然而迪亚斯一改前言，不仅参加了竞选，而且赢得由他一手操纵的选举，但接着又在突然间碰上了一颗政治鱼雷。马德罗发誓要推翻迪亚斯政权，他发表了一个温和的执政纲领以吸引新兴的中产阶级，并赋予他们权力。马德罗得到了两个与他很不相同、更为激进的人物的支持，他们是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和帕斯库尔·奥罗斯科。此二人分别在南部和北部、特别是在外资压力最大的那些地区发动了农民和农业工人。条件已经成熟。到1900年，82%的农民失去了土地，而1%的人口则控制着97%的肥沃土地。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特点，与其说是反对外国人的暴力活动（即使是在最血腥的冲突期间也很少攻击外国人，除了中国人），还

① 弗雷德里希·卡茨等：《波菲里奥时期墨西哥的土地使用权》（墨西哥城，1976年），第15—17页、60—61页；哈特：《革命的墨西哥》，第247—249页；卡茨：《1810年后农村地区的反抗活动》，第544页。

不如说是墨西哥人对迪亚斯的仇恨，因为他向北美人和英国人出卖了大量的财富。由于迪亚斯的权力日渐虚弱，塔夫脱和诺克斯发出了老总统已经失宠的信号。一个明显的信号是，他们允许马德罗的支持者从美国获得武器。迪亚斯意识到他必须赶在温和的反对行动转变成一场难以预料的起义之前下台。“马德罗已经把一只老虎放出笼子！”这位老人评论说。“现在就让我们看看他能否制住它。”①

马德罗没有能力控制。1911 年获取政权之后，不出所料，马德罗令人保留了许多迪亚斯的顾问。他没有进行任何重大的土地改革或触动任何外国资本，考虑到他与斯蒂尔曼、美国铁路企业家以及在反对迪亚斯的斗争中为他提供保护的权势强大的得克萨斯银行家（马德罗家族的男性与这些美国商人的儿子甚至在印第安那卡尔弗军事学院的同一间教室里学习）的亲密关系，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学者们直到很久以后才发现，为推翻迪亚斯，美孚石油很可能向马德罗提供了 50 到 100 万美元的援助。由于没有进行土地改革，使种植园重新回到农民手中，暴跳如雷的萨帕拉和他的军官们于 1911 年发布了《阿亚拉计划》。在北部的奥罗斯科的支援下，萨帕塔分子把斗争推向了更加激进的新阶段。随着农村和城市工人阶级暴动的蔓延，马德罗发现他同样已经失去了那些仍然忠于迪亚斯的军官们的支持。罢工、战斗以及土地的抢掠一时接踵而来。然而，马德罗无计可施，直到他任命维多利亚诺·韦尔塔掌管军队，才出现转机。韦尔塔平息了萨帕塔暴动，但是也逐步认识到马德罗过于软弱，不能统治这个国家。这位将军还得知，马德罗的失败已经惹恼了美国大使亨利·莱恩·

① 哈特：《革命的墨西哥》，第 238—249 页；鲁伊斯：《胜利与悲剧》，第 292—316 页；卡茨：《1810 年后农村地区的反抗活动》，第 551 页；卡茨：《在墨西哥的秘密战争》，第 39—40 页。

威尔逊。威尔逊是一位经验丰富且非常保守的外交家，由塔夫脱把他从智利调过来，负责处理愈演愈烈的墨西哥问题。威尔逊很快就对马德罗失去了兴趣和信任，因为他既不能维持和平，也不能维护财产权。墨西哥城的外交观察家指出，美国转而奉行反对马德罗的政策，有多种原因：他不愿与华盛顿签订贸易互惠条约；他愿意进一步接近欧洲人，甚至鼓励欧洲移民；他唤起了墨西哥的民族主义，由于深刻的历史原因，这种民族主义是反美的；他的工会和罢工立法违背了美国公司的利益；他不愿给与美孚石油和美国铁路公司特许权，而这些公司认为他们在帮助马德罗夺取政权的时候已经付出了代价。[①]

1912年9月15日，威尔逊发给马德罗一个照会，以强硬的言词概述了华盛顿的种种不满。照会要求逮捕和惩罚所有涉嫌谋杀美国公民（在1910—1912年间有47人被杀）的人，下令停止对美国公司的歧视性待遇，警告"违法乱纪以及动乱事件"必须立即制止。墨西哥外交部长否认这些指控，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考虑到威尔逊与古根海姆矿业企业的密切联系，马德罗政权很可能怀疑这位大使的态度是否公正客观。1911年，由于战斗已经扩大，塔夫脱在边境部署了两万人的部队以保护美国境内的财产和人身安全。由于试图化解危机，总统又遣散了部队，宣布这些部队只是在进行春季演习。考虑到他在菲律宾、古巴以及尼加拉瓜动武的个人记录，这种解释可能令人怀疑，而且总统发现他处在夹缝中间，左右受敌：一边是希望美国不要干涉墨西哥的人，另一边是希望用子弹弥补美元之不足的人。塔夫脱还曾试图通过实行武器禁运来遏制起义，但现在他又提出取消禁运，条件是马

① 哈特：《革命的墨西哥》，尤其是第245—248页；布鲁奇：《企业》，第389页；卡茨：《在墨西哥的秘密战争》，第46—48页。

德罗对威尔逊9月15日的要求能够做出令人满意的答复。[1]

马德罗已经失去了对“老虎”的控制，也失去了其强大邻国对他的支持。塔夫脱显然越来越认同威尔逊对马德罗的强烈反感。但诺克斯提出了异议。他不信任威尔逊，也不想由美军进行任何干涉，特别是塔夫脱政府在1912年大选中败北、成为政治跛鸭之后。1913年2月，韦尔塔将军与迪亚斯的侄子、极端保守的菲利克斯·迪亚斯达成协议以后，开始反对马德罗。菲利克斯·迪亚斯与威尔逊的关系非常亲密，以至于德国驻墨西哥城大使在2月份发往柏林的电报中说：“美国大使公开为迪亚斯工作，他当着我的面对马德罗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迪亚斯亲美。”韦尔塔抓获了马德罗，然后问威尔逊如何处置这个俘虏。威尔逊已经深深卷了进来。在他的办公室里韦尔塔和迪亚斯签订“大使馆协定”，彼此确立了新的伙伴关系。大使对韦尔塔说，他必须做“你认为对这个国家最为有利的任何事情”。当马德罗的妻子请求保护其丈夫安全的时候，威尔逊回答说他不能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事务。1913年2月21日，韦尔塔的士兵处死了马德罗和他的一位同党。北部地区迅即爆发了支持马德罗的暴动，其领导者为巴努斯蒂亚诺·卡兰萨。塔夫脱对威尔逊说，考虑到局势的不稳，韦尔塔也无力快速解决美国的财产要求，英国又拒绝承认杀害马德罗的凶手，加上自己目前的跛鸭地位，对于新总统不应予以承认。当选总统威尔逊将不得不就此做出决定。韦尔塔政权仅仅维持了一年。伍德罗·威尔逊施加的压力——以1914年美国出兵维拉克鲁斯为顶峰——促使韦尔塔被赶下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卡兰萨随后接管了这个国家并对美国所控制的石油

---

[1] 塔夫脱致威廉斯，1911年3月28日，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文件，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微缩胶卷，卷号365，95A。

资产提出了直接挑战。[1]

正如历史学家约翰·梅森·哈特所指出的，1911—1912年的“根本对抗”在于“以乡村共产主义者和农业工人为一方，以捍卫其资产的大庄园主和外国土地占有者为另一方的两派之间的对立。”由于拥有上亿美元的投资，外国土地占有者大部分是美国人。他们最初同迪亚斯一道把墨西哥从一个以1857年宪法为基础的、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的国家转变成了一个依赖出口和纽约资本的、阶级分歧日益加剧的国家。（到1912年，美国临时代办可能会强烈地报怨“无产阶级很不明智的要求”。）当迪亚斯最终试图抵制美国的商业侵略的时候，美国的投资者在一些权势庞大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先驱者的带领下，支持马德罗一派推翻了老独裁者。但是，迪亚斯受到了双重的谴责。他早年长期与美国合作的政策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又可以为马德罗所用，特别是1907年纽约恐慌爆发以后。一位严谨的观察家指出，1910年的起义“绝对具有义和团的性质……目标主要地指向……美国的利益。”[2] 当马德罗既不能控制武装农民的起义浪潮以及城市劳工的抗议活动，也不能制服波菲里奥势力的时候，亨利·莱恩·威尔逊与韦尔塔合作推翻了这位新总统。值得称道的是，塔夫脱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没有让美国军队进入墨西哥。但是，1865年后，美国对机会的寻求先是为20世纪墨西哥的一场社会大革命创造了条件，然后为了保护那些机会，又加速了这场革命的到来。博学多识的德国大使冯·伯恩斯托夫伯爵把这一事件置于它的历史背景当中来认识：塔夫脱和亨利·莱恩·

① 科莱塔：《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执政时期》，第178—181页；另一种不同的观点，见阿伦·奈特：《美国与墨西哥的关系（1910—1940）》（圣地亚哥，1987年），第57—78页；卡茨：《在墨西哥的秘密战争》，第94—95、103页。

② 引自鲁伊斯：《胜利与悲剧》，第301—302页。

威尔逊坚持了“美国一贯的政策，即通过革命以驯服的政权取代敌对的政权，而且不负任何正式责任。”[①]

四、中国：门户的关闭，革命的开始

与墨西哥爆发革命的过程几乎一样，中国也发生了动乱，尽管在这个更为复杂的事例中，美国只是试图对中国进行经济、文化剥削的六强之一。美国官员又一次发现，中央政府既不能满足外国人的要求，又无力保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外国的经济蚕食和威胁激发了当地人的强烈反抗；最后，反抗引发了革命——在中国比墨西哥更具排外性，而革命则成为20世纪最具历史意义的转折之一。

较之其他一些国家，比如日本和俄国，美国在华利益并不算大。美国的确在中国有3100名新教传教士（来自世界各地传教士总计3770名），但是1905年上升到5300万美元的出口到1912又下降到2400万美元，它们总计占美国对外出口总额的1%。对华投资在4000万到5000万美元的范围之内，但同样不到美国海外投资的2%。1912年，美国对华贸易甚至出现了逆差，因为它们进口了中国3000万美元的货物。另一方面，1912年美国人向日本输出了5300万美元的商品，进口为8100万美元。显然，与神话般的中国市场相比，日本市场虽没有那么神奇，但利润更大。然而，美国的官员都是一向从长计议的优秀的世界主义者，不是那种在每天结束的时候只关心账簿上数字的短视的买卖人，而且从长远来看，美国官员是决心要找到商品的销路以防止类似于1873—1897年那样的恐怖时代再一次出现。诺克斯和塔夫脱虔诚地相信，他们在中国正在维护一个近乎神圣的原则。诺克斯

① 引自卡茨：《在墨西哥的秘密战争》，第113页。

宣称："本届政府继承了前几任政府门户开放和保持中国领土完整的政策。"他认为坚持那一原则的关键是要在"中国宏大的铁路建设和其他事业"中确保"美国资本的参与"。那样华盛顿将会拥有"在保证维持现存政权方面大有作用"的"发言权"。但是还有比整个中国市场的利害关系更大的问题："只要美国占领着菲律宾"，诺克斯认为，"其他列强撇开我们控制中国就会充满危险，把美国排挤出任何对北京施加影响的〔大国〕联盟都是不可思议的。"①

因此国务卿坚持认为，美国对华贸易的潜力还没有完全发掘出来，因为美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帮助中国抵御外国列强的猛烈进攻，这些国家通过政府施压精心地配合私人企业的活动。当然，这种观点是对罗斯福的直接批评，因为他在1907—1908年没有反对日俄两国对满洲铁路系统的重新瓜分以及日本对朝鲜的占领。这种观点同时也表明了对戴德信念的强烈支持：如果有吉卜林般的勇气和中美之间的协调一致，美国就能够帮助中国阻止并击退帝国主义国家，从而使整个中国市场向更加顺乎自然规律的美国效率体制开放。由于戴德在1905年亲眼见证了日本征服朝鲜，1908年他为中国人制定的反对东京控制南满铁路的计划又被日本人挫败，所以他认为，正如他早在1904所说的那样，"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日本更令我痛恨了。"种族主义再一次起了重要的作用："俄国人是白人，这一点意义重大。"因此，戴德认为，利用铁路大亨E. H. 哈里曼的财富和他在俄国的人缘，可以达成一个协议，购买圣彼得堡控制的位于满洲的中东铁路，以此作为迫使日本出让南满的杠杆，由此可以同时恢复中国

① 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第二版，纽约，1980年），第81—82页；入江昭：《太平洋的疏离——日本与美国的扩张（1897—1911）》（马萨诸塞州剑桥，1972年），第123页；引语出自A. 惠特尼·格里斯沃尔德：《美国的远东政策》（纽约，1938年），第144—145页。

人的控制权和美国的机会。1908—1909 年，作为国务院新成立的远东事务司司长，戴德在完成了对整个计划的整合之后，开始与诺克斯和纽约银行家们一道为进攻做准备。即使是 1909 年哈里曼突然去世之后，他也没有改变既定方针。[①]

诺克斯和戴德决定把计划全部付诸实施，他们认为自己拥有中国人的强大支持。事实上，戴德最重要的支持者袁世凯和唐绍仪在 1909 年失去了权力，尽管中国官员仍然希望能够利用美国人来制衡欧洲人和日本人。由于戴德认为他还得到了英国资本的支持，所以他于 1909 年重返亚洲，策划如何由美国的银行团修建一条跨越满洲的铁路（锦州—瑷珲）。中国同意他的建议。然而在华盛顿，诺克斯却试图把这个立脚点扩大成为争夺整个满洲的舞台。他的计划要求满洲的所有铁路中立化和国际化。这个惊人的建议有赖于英国的合作，俄国人愿意出让中东铁路，日本同意放弃南满，并且中国政府能够维持国家的统一，制止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并顶住日益强大的外来压力。四个假设很快就都不成立了。英国的重大利益是印度而不是华北，英国愿意让日本在华北为所欲为，只要它在印度采取与英国合作的政策。就俄国人来说，他们没有把关键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东端出让的打算，特别是如果他们（像 1910 年那样）能够联合日本确保他们对满洲的瓜分并把令人恼火的美国关在门外的话。用历史学家孔华润的话说，诺克斯遏制日本的梦想“像许许多多的美梦一样……没能持续到天亮。”就在诺克斯提出计划的同一天（1909 年 11 月 13 日），日本人却在同俄国人探讨正式瓜分满洲的可能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在 1910 年 7 月 4 日签订了协定。尽管决心“防止俄国与日本之间达成任何协议”，但诺克斯却让这两个宿敌

① 麦克尔·亨特：《边疆防御与门户开放》（纽黑文，1972 年），第 144--145。

更加紧密地站在了一起。[1]

不过，事实证明，诺克斯和戴德最后一个假设的破产最为重要。在满洲受挫以后，塔夫脱强烈要求为在中国修建铁路而组建的欧洲银行团接纳美国资本。欧洲人表示反对，因为此举将不可避免地使俄国人和日本人也要求加入。塔夫脱最终取得了胜利。俄国人和日本人同样凯旋而归。总统这才发现自己成了准备修建武汉—广东以及武汉—成都铁路的 6 个联合起来的帝国主义中的一员。自 19 世纪 90 年代，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彰显了铁路的重要性以后，兴起了一场“收回利权”运动，该运动提出，只能用中国自己的资本和工程师修筑关键的铁路。银行团的行动和清政府的合作在 1911 年年中激起了反对外国人的抗议行动，并迅速扩大（特别是在武汉地区），而且得到了具有高度民族主义精神的新军的支持。传教士再一次成为攻击的目标。在汉口，暴民们杀害了英国浸礼会组织的 8 名成员。清廷请求袁世凯不要再称病隐退，要他出来恢复局势。塔夫脱和戴德非常高兴。总统希望满清政府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但是戴德知道它的末日已经来临。两人都非常支持具有军人风范的袁世凯，而反对起义军，因为——正如戴德对华尔街的朋友所言——“如果成立了共和国，将会出现混乱、接连不断的骚乱，对本分的银行家来说就不会有任何满意的生意，除非外国列强积极干预。”最初，袁世凯与起义军达成了一致，同意建立一个共和国取代满清王朝。接着他便违背与起

---

[1] 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第 78 -81 页；保罗·A. 瓦格：《一个神话的形成——1897—1912 的美国与中国》（密歇根州东兰辛，1968 年），第 104 页；戴德的强烈反日情绪，见戴德给 J. P. 摩根公司的信，1912 年 2 月 11 日，戴德（威拉德·斯特雷特）文件，康奈尔大学，纽约州伊萨卡。

义军的协议，建立了他个人的统治。[①]

1912 年，改良运动的核心领袖孙逸仙组建了国民党。孙逸仙非常了解美国，并声称国民党部分地吸取了美国宪法的精神，他直截了当地向华盛顿请求援助。塔夫脱和诺克斯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们不信任国民党，而是钟情于手握大权的袁世凯，认为袁能够最好地保护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中国的权利。这两位美国官员还效法威廉·西华德的精神，试图与其他列强组成一道坚固的防线，保护外国人的权利，并防止中国人使用以夷制夷的传统政策。列强都支持奉行独裁主义的袁世凯。伍德罗·威尔逊同样支持袁世凯。1916 年这位独裁者死后，随着国民党把中国引向了 1919 年以后的革命，美国的官员提高了警惕。在塔夫脱、威尔逊看来，要行使与美国新总统在加勒比、墨西哥、和中美洲所行使的同样职能，袁世凯似乎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在西方和日本的资本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和排外运动的催化剂以后，袁世凯仍旧准备重建秩序并保护类似门户开放这类西方国家主张的权利。[②]

1910 年底，罗斯福在致塔夫脱的一封信中指出了可以替代塔夫脱—诺克斯的政策的另外一种选择。像许多西方人一样，罗斯福根本没有意识到外部压力正在如何加速腐朽的清王朝的解体，以及列强的不时干预又是如何变成了收回利权运动和其他民族主义分子发动反对西方的抗议活动的焦点。然而，他知道日本方面的强硬路线，于是他对塔夫脱说，满洲和朝鲜是日本人至关重要的利益所在。“我们不能在这样的地区进行干涉，除非我们拥有与德国一样优秀的陆军或者与英国一样强大的海军。在中国

① 乔纳森·斯彭斯：《探索近代中国》（纽约，1990），第 251—266 页；丹尼尔·M. 克莱恩与托马斯·A. 布雷斯林：《一种普通关系——美国对中国共和主义革命的反对》（佛罗里达州迈阿密，1986 年），第 38—51 页，特别是第 49 页。

② 克莱恩与布雷斯林：《一种普通关系》，第 160—162 页。

实行门户开放的政策是件大好事，”但是“只要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决意要废除它，它就会彻底消失”。罗斯福愿意让日本人控制满洲，以便让美国能够相应控制棘手的加利福尼亚和加拿大移民问题。塔夫脱和诺克斯不同意这种另辟蹊径的看法。他们关心中国的领土完整，但是，他们的中立化计划和对银行团的要求生动地表明，他们也要求扩大美国在中国这一巨大市场的机会。在中国，当起义者推翻清王朝以后，戴德坦率地向他在摩根财团的主子们承认“计划已被打乱，犹如心窝遭到一记重拳”，他对此没有预见。不过他向摩根保证，袁世凯的胜利是件幸事，因为他的集团乐意“利用外资发展中国”。真可谓贼心不死。尽管美国人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在探索，但是塔夫脱、诺克斯以及戴德在中国既没能得到机会也没有建立秩序。同其他5个帝国主义列强一道，他们帮助制造了处于革命初期的中国的动荡和仇外情绪。[①]

罗斯福或许对塔夫脱外交政策的一个枝端末节更为满意。尽管到1906年大屠杀已基本停止，俄国仍然拒绝承认美国发给犹太人、罗马天主教教士以及基督教牧师的护照。在库恩—洛布集团总裁雅各布·席夫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废除规范俄美贸易的1832年条约以示报复。总统像往常一样迟迟没有采取行动，但是众议院却以仅有一票反对的票数通过决议，终止了这个条约。然后，塔夫脱才通知圣彼得堡，该条约不得不终止，尽管他还是希望以一个新的协议取代它。两国政府从来都没有签订过这样一个协定，美俄关系又踏上了自1867年以来的长期下滑的道路。

塔夫脱和诺克斯在中国的经历，把1865—1913这个时代美

① 沃尔特·斯科尔斯和玛丽·斯科尔斯：《塔夫脱政府的对外政策》（密苏里州哥伦比亚，1970年），第121—122页；戴德致哈里·P. 戴维森，1911年10月28日，戴德文件。

国外交的主旋律适时地推向了高潮。由于对更多的领土扩张已不感兴趣，又自认为已将国外民族的最佳利益铭记在心，所以美国人试图同欧洲和日本的帝国主义目标划清界限。但是，由于他们决意维护眼前的机会并创造新的机会，所以他们广泛地运用美国的权势。有时，比如在加拿大和中国，塔夫脱主要使用经济和政治权力。在其他情况下，比如在尼加拉瓜和墨西哥，美国官员又发现美元和子弹可以并行不悖。

塔夫脱政府的外交政策在美国外交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它们无论从细节还是从背景方面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全面探讨——因为他们完美地体现了美国对于海外市场的追求，这些市场对于满足第二次工业革命（或者说后达尔文时代的传教事业）的需求是必要的，同时还展示了这种追求如何导致了动荡甚至革命。塔夫脱在美国历史上的形象是一个近乎典型的美国保守派，特别是他那种与罗斯福全然不同的关于总统权力的概念和对法律近乎宗教般的膜拜，不过，他仍然遵循了美国内战后的扩张逻辑，结果他卷入了不是建设有序社会而是培育民族主义革命的美元外交。克罗利要求建立一种现代汉密尔顿式的国内体制来扩展杰斐逊式的民主和扩大美国在海外的经济成就。然而，塔夫脱必须应付一个新兴的工业社会，其政策激发了危险的民族主义和“革命起义”，而这正是克罗利最为担心的事情。

结论：重新叙述 1865—1913 年代

有关 1865—1913 年的史学研究深受下述观念的影响：美国人以秩序和稳定为目标，扮演着反革命力量的角色，而且——特别是对患有所谓“心理危机”的那些人来说——试图找到一条道路重返据称可能更为安定的前公司时代。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和罗伯特·威布极有影响的著作，以及西奥多·罗斯福的传记作家（特别是约翰·莫顿·布鲁姆以及霍华德·K. 比尔），为人们在写这段历史时即使不是全部也会部分地带有上述特征提供了理由。[①]

这类主题或许反映了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初期国内社会及政策的一些重要方面的特点。它们与外交事务没有多少关系，也没有反映负责制定外交政策的那些官员的特征。1865 年以后美国历史的核心主题是，这个国家发展为一个世界大国，也就是说，四大军事大国之一兼头号经济大国。这个时期是预示美国世纪到

①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古巴、菲律宾与天定命运》，见《美国政治中的妄想症及其他论文》（纽约，1965 年）；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年代》（纽约，1955 年）；罗伯特·威布：《寻求秩序（1877—1920）》（纽约，1967）；约翰·M. 布卢姆：《共和党人罗斯福》（马萨诸塞州剑桥，1954 年）；霍华德·K. 比尔：《西奥多·罗斯福与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历程》（巴尔的摩，1956 年）。理查德·H. 科林的《西奥多·罗斯福的加勒比海政策》（巴坦卢，1990 年）是较新的著作，但观点与前者类似。

来的先声。然而，同一时期，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亚洲、中国、墨西哥、古巴、尼加拉瓜、菲律宾、巴拿马、萨尔瓦多、夏威夷以及其他地区。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与引发这些革命并非没有联系。在所有这些革命中，美国的政策都起到了某种作用，在大部分情况下还是决定性的作用。

把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同这些动荡相联系的是内战后加速进行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具有深刻历史根源的种族主义。种族主义无处不在、千孔百面，无论帝国主义者身上还是反帝国主义者身上都能找到它的影子。在这两种相互补充的力量的推动下，美国人开始到他们选定的目标中寻求机会，破坏了许多地方的秩序。这一模式可以概括为：现代商业集团和传教组织对于机会的追求改变了当地的经济制度和文化；随着经济和文化变迁的发展，政治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直至当地人民分裂为亲美派（或曰买办）或反对派。起而反对现状的人可能来自两个派别：比如，在夏威夷和萨尔瓦多他们是亲美派；在菲律宾、中国、古巴，他们又是对华盛顿的政策强烈不满的人。同时，第三种类型的革命也产生了。这类革命以尼加拉瓜、巴拿马甚至古巴起义的初期为典型，它们要么由美国直接挑起，要么是得到了美国的热情鼓励。

有些学者认为美国官员对当地民族主义者，特别是反对欧洲帝国主义分子的民族主义者，怀有特别的同情心，这其实并未切中问题的要害。比如，在古巴，威廉·麦金莱无情地摧毁了当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在菲律宾也同样如此。在中国，只有在中国人似乎能够帮助维护门户开放原则，抵制欧洲人和日本人通过殖民化和建立保护领地关闭门户的企图的时候，美国官员才会与中国领导人合作。1910—1912 年，当这种维持门户开放的策略失败以后，美国便毫不犹豫地强行挤进了欧洲银行团。

几条共同的线索贯穿着这一系列的事件。第一条是，美国政府决心扩大市场控制的范围，同时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在中国和

夏威夷）扩大传教士的影响。第二条是，几乎在每一场革命的初期都需要出现一位强势总统——他拥有新工业革命所提供的力量和通讯手段，同时利用宪法关于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条款进行自我神化。无论是为了避免陷入干预的陷阱（例如在19世纪7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菲什和克利夫兰都分别避免进行直接干预），还是为了（在很大程度上更为重要）直接面对危险或革命的现实并在必要时通过使用武力来维护美国的机会，都需要某种新的总统体制。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伍德罗·威尔逊，在1908年的一系列演讲中指出，"与西班牙的战争……改变了"本国政府机构中"各部门间的平衡"。"外交问题再次成为首要的问题，就像政府成立之初那样，而在这些问题上，总统是必不可少的领袖。"[①] 不过，自从总统权力在安德鲁·约翰逊时期落到最低点以后，在外交领域正在形成更加强大的行政权力。1869年以后，这些权力的扩大是以牺牲国会（有时是宪法）的权力为基础的，因而不可能是直线式的，但是它既不是以历史的循环为特征，也不能用美国历史的循环论加以解释。菲什、艾弗尔特、弗里林海森、克利夫兰、布莱恩、特雷西、哈里森以及格雷沙姆等人屡创先例，频频缔约，并竭力推动国会立法，以至于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把美国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了东亚、巴西、萨摩亚、西非以及夏威夷和加勒比—中美洲地区。艾尔弗雷德·萨耶尔·马汉之类的帝国主义骨干分子知道，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甚至还需要更大的行政权力。1897年，马汉抱怨说，"通过兼并或者别的途径扩大美国范围的任何计划都会碰上宪法这个拦路虎"。[②] 让马汉感到满意的是，麦金莱、罗斯福和塔夫脱在清除"拦路虎"

---

① 伍德罗·威尔逊：《立宪政体》（纽约，1908年），58－59、78—80页。

② 艾尔弗雷德·萨耶尔·马汉：《美国的海权利益——现在与未来》（波士顿，1897年），第256—257页。

的问题已经走得相当远了，但是早在 1897 年以前这只猛兽就已经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削弱。

考虑到美国扩张的压力和逻辑，对于如何对付这个"拦路虎"，这个时代最后的三位总统没有多少选择余地。这种扩张在很多程度上根源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就，也是 1873 年后直至 1897 年间一系列的经济萧条所带来的社会、政治混乱所致。在这个脆弱、高度多元化的国家，恢复秩序主要依靠掌握联邦军队和州国民卫队的行政官员，在海外市场寻求出路的总统和生产商，以及 1894 年以后新出现的一个政党联盟——它帮助稳定了这套制度，隔离保护了公司和政治领导权。然而，海外的扩张却造成了更多的混乱，总统们使用了他们所能集聚的所有力量，要么利用动乱（比如在古巴、巴拿马以及尼加拉瓜），要么试图镇压（比如在菲律宾、1900 年的中国或圣多明各）。只有在很少的场合，比如在 1884 年的刚果或 1911—1912 年中国人的收回利权运动达到高潮时，美国总统才有过退却的打算，而且在中国这个事例中，退却实际上是向新的策略转变。20 世纪总统权力的根源，就这样在 19 世纪 80 年代至 1913 年间产生了，原因就在于美国的经济和外交政策制造了许多动乱，也在于稳定的秩序并不一定被认为是正常的或自然的，还在于利用或者——如果愿意的话——平息动乱都需要一支武装力量，即马汉、麦金莱、罗斯福、塔夫脱以及其他许多人主张建立的那种军事力量。作为总司令，总统控制着这支力量的使用权。

这种总统制在世界大国之中是独一无二的。欧洲和日本政府与它毫无相似之处。美国在这一时代的扩张也与欧洲和日本的扩张主义并不十分相似。美国既不想成为欧洲体系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不想模仿诸如英国、德国或日本的帝国主义。自 1776 年以来，美国人一直致力于建立自己的一套制度，以便适应自己不断变化的需要。不错，他们是在与欧洲人争夺世界权力。在世界权

力的欲望甚至是腐败面前他们像欧洲人一样不堪一击，这也是事实。菲律宾人、古巴人、中国人以及中美洲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美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任何区别，这同样是事实。然而与其他大国不同的是，美国拥有一块大陆用于繁衍和开发；它不会因人口过剩而渴望殖民地，也不会为原材料而渴望巨大的保护领地，同时也不用（像俄国那样）为建立重要的运输体系而渴望占领可以用作通往主要新建港口通道的广袤地区。美国外交的这些特点因为这样一种担心而得到强化：即宪法条款的效力不能越洋伸展到遥远的地方，或者扩及非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否则必然崩溃。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帝国主义分子同样具有这种担忧。像罗斯福和洛奇这些扩张主义者确实相信，美国可以控制波多黎各或菲律宾而无需扩大宪法的保护范围，只需让国会对宪法条款有挑肥拣瘦的权力即可（比如波多黎各的情况），或者用屠杀或隔离的办法来对待新征服的民族，就像美国政府以前对待美国土著人那样。

美国并不想加入欧洲人和日本人寻求土地和殖民帝国的行列。美国官员只想得到零散的、面积相对小的土地，以作为必要的商业扩张的基地。在创造和衡量工业成就的时候，美国人也不愿模仿欧洲人，或是沿用欧洲人或日本人的标准。正如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钱德勒所揭示的那样，安德鲁·卡内基、约翰·D. 洛克菲勒以及其他许多人是美国式联合体企业领导人的典范，他们在创新和制度化建设方面远远领先于其海外竞争对手。他们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向政府官员提出的外交政策要求也与这些

对手有显著区别，在后一方面卡内基尤为显著。[①]

因此，1865—1913 这个时代在实质内容上、同时也在时间顺序上为威尔逊所谓的新外交创造了条件。这种新外交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 20 世纪的国际关系，特别是美国外交的发展进程。1913 年以前的美国外交政策和威尔逊的新外交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就为动力的；都拥有一个巨大的互为犄角的大本营，它包括加勒比和中美洲在内，只要有必要，美国军队随时都可单方面轻而易举地为这个大本营提供安全保障；都对自身的文化特别是种族的优越性深信不疑；都倾向于单打独斗（另一方面也以孤立主义闻名），只与那些有时似乎认同美国的主要价值观的人，比如日本人和英国人，保持非正式的政治及个人联系；都相信由总统控制外交政策是必要的和有益的；都支持总统凌驾于一套新的政府机构，这套机构共同组成一个“推销员政府”以推进和维护至关重要的经济政策；[②] 而且——作为必然到来的高潮——都强烈地认为，由于美国已经表现出了无可置疑的竞争力，而且这一点并不是通过旧式的欧洲殖民纽带或联盟来实现的，因此新的世界秩序应当是经济开放的秩序（当然，不包括加勒比的某些地区和菲律宾）。

据说，美国是 20 世纪的第一个民族国家。科学创新、合理化和全球化的工业流程、多国公司、以现代通讯为基础的集权化的政治权威、军事干涉主义、狂热的民族主义、极端的种族主义

---

① 小艾尔弗雷德·D. 钱德勒：《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动力》（马萨诸塞州剑桥，1990 年）；把其中一些问题置于 1865—1913 年的背景中进行讨论的是：托尼·史密斯：《帝国主义的模式》（剑桥，1981 年），尤其是第 1—5、141—146 页；迈克尔·W. 多伊尔：《帝国》（伊萨卡，1986 年），特别是第 19—47 页。

② 艾米莉·罗森堡：《传播美国梦——美国的经济与文化扩张（1890—1945）》（纽约，1982 年），第 57—59 页。

以及——意义深远的——革命，共同塑造了20世纪的发展进程。在1865—1913年间，所有这些因素都能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找到。而且，所有这一切都与这个时期美国推行的外交政策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短论

Richard Dean Burns, *Guide to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700* (Santa Barbara, Calif., 1983), supersedes all other bibliography on pre-1981 materials. See also Gerald K. Haines and J. Samuel Walker, eds.,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A Historiographical Review* (Westport, Conn., 1981); Robert L. Beisner, *From the Old Diplomacy to the New, 1865–1900*, 2d ed. (Arlington Heights, Ill., 1986), with a superb bibliography; and the footnotes of this book.

Important overviews of the 1865–1900 years include Nell Irvin Painter, *Standing at Armageddon: The United States 1877–1919* (New York, 1987);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1987), surprisingly weak on the United States; Akira Iriye, *From Nationalism to Internationalism: U.S. Foreign Policy to 1914* (London, 1977), an important synthesis; Charles S. Campbell,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865–1900* (New York, 1976), the most detailed account, with a detailed bibliography as well; Beisner, *From the Old Diplomacy to the New,* noted already; Dexter Perkins, *The Monroe Doctrine, 1867–1907* (Baltimore, 1937), still a classic; Tennant S. McWilliams, *The New South Faces the World* (Baton Rouge, 1988), especially on the 1880s–1890s; Hans Ulrich Wehler, *Der Aufstiegdes amerikanischen Imperialismus . . . 1865–1900* (Göttingen, 1974), important on the classes that produced imperial policies; Jean Cazemajou, *American Expansionism and Foreign Policy, 1885–1908* (Paris, 1988), a key French scholar's interpretation, especially good on the social implications; Howard B. Schonberger, *Transportation to the Seaboard; The Communication Revolut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860–1900* (Westport, Conn., 1971), linking the transport revolution and expansionism; Emily S. Rosenberg, *Spreading the American Dream: American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pansion, 1890–1945* (New York, 1982), a pioneering examination of the governmental-cultural interaction; Milton Plesur, *America's Outward*

Thrust . . . 1865–1890 (DeKalb, Ill., 1971), good on cultural as well as political expansion; David Healy, *U.S. Expansionism* (Madison, 1970), lively reading by an important scholar of the era; John M. Dobson, *America's Ascent . . . 1880–1914* (DeKalb, Ill., 1978), good on the spreading-of-democracy ideal; William H. Becker and Samuel F. Wells, Jr., *Economics and World Power* (New York, 1984), essays by respected scholars, with David M. Pletcher's analysis of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especially important; Philip Darby, *Three Faces of Imperialism: British and American Approaches to Asia and Africa, 1870–1970* (New Haven, 1987), a useful comparative study; two quite different and important books by Ernest R. May, *Imperial Democracy* (1961; reprint, New York, 1991), and *American Imperialism: A Speculative Essay* (New York, 1968);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e Roots of the Modern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1969), a magisterial account that builds o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Walter LaFeber, *The New Empire* (New York, 1963), which stresses the 1873–97 depression and U.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Edward P. Crapol, *America for Americans* (Westport, Conn., 1973), an innovative look at anglophobia and U.S. economic expansion;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1987), especially its view of race in the 1880–1910 era; W. Stull Holt, *Treaties Defeated by the Senate* (Baltimore, 1933), still standard on the subject.

For broader studies of imperialism, start with two works by Wolfgang J. Mommsen,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trans. P. S. Falla (New York, 1980); and Mommsen and Jurgen Osterhammel, eds., *Imperialism and After* (Boston, 1986); Carl Parrini,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in Lloyd Gardner, ed., *Redefining the Past: Essays in Diplomatic History in Honor of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Corvallis, Oreg., 1986), especially for the 1890–1905 theorists; Tony Smith, *The Pattern of Imperialism* (New York, 1982), a comparative study, as is Michael W. Doyle, *Empires* (Ithaca, 1986); Richard Koebner, *Empire* (New York, 1961), a classic study; Robert B. Zevin,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Imperi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2 (1972): 316–60.

For post–Civil War diplomacy and the takeoff of the U.S. economic system in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mportant accounts

include Ernest N. Paolino, *The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Empire: William Henry Seward and U.S. Foreign Policy* (Ithaca, 1973); John M. Taylor, *William Henry Seward* (New York, 1992); Eric Foner, *Reconstruction: 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1863–1877* (New York, 1988); Adrian Cook, *The Alabama Claims* (Ithaca, 1975); Paul Holbo, *Tarnished Expansion: The Alaska Scandal, the Press, and Congress, 1867–1871* (Knoxville, 1983); Alfred D. Chandler, *Scale and Scope* (Cambridge, Mass., 1990), pivotal; Stuart Bruchey, *Enterprise* (Cambridge, Mass., 1989), excellent on economics, questionable on the foreign policy; Mira Wilkins, *The Emergenc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Cambridge, Mass., 1970), especially for the 1880s; Robert B. Davies, *Peacefully Working to Conquer the World: Singer Sewing Machines . . . 1854–1920* (New York, 1976), good case study; Mira Wilkins, *The History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1914* (Cambridge, 1989); Joseph F. Wall, *Andrew Carnegie* (New York, 1970), a model biography; Ron Chernow, *The House of Morgan* (New York, 1990), prize-winning; Martin J. Sklar, *The Corporat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Capitalism, 1890–1916* (New York, 1988), a superb analysis of the law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William H. Becker, *The Dynamics of 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 (Chicago, 1982), on smaller firms; Patrick J. Hearden, *Independence and Empire* (DeKalb, Ill., 1982), crucial on textile industry and overseas expansion; Tom E. Terrill, *The Tariff, Politic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874–1901* (Westport, Conn., 1973), an important overview; T. Jackson Lears, *No Place of Grace: Antimodern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1880–1920* (New York, 1981), excellent on the cultural ramifications of the economic turn; Robert W. Rydell, *All the World's a Fair: Visions of Empire at American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s, 1876–1916* (New York, 1985), pioneering; as is James Gilbert, *Perfect Cities* (Chicago, 1991).

On issues of race and social Darwinism, begin with George Fredrickson, *The Black Image in the White Mind, 1817–1914* (New York, 1971); Paul Gordon Lauren, *Power and Prejudice* (Boulder, Colo., 1988); Walter L. Williams, "U.S. Indian Policy and the Debate over Philippine Annexatio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6 (1980): 810–31, of signal importance; Robert Wooster, *The Military and U.S. Indian Policy, 1865–1903* (New York, 1988), on the split between military and federal authorities; Robert M. Utley, *Cavalier*

in Buckskin (Norman, Okla., 1988), on Custer by a leading historian of the West; Donald C. Bellomy, "Social Darwinism Revisited,"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n.s., 1 (1984): 1–129; and Cynthia Russett, *Darwin in America: The Intellectual Response, 1865–1912* (San Francisco, 1976), now a standard on the Darwinian impact.

Important recent studies on major figures, 1869–96, include William S. McFeeley, *Grant* (New York, 1981); Clifford W. Haury, "Hamilton Fish . . .," in Norman Graebner, ed., *Studies in American Diplomacy, 1865–1945* (Lanham, Md., 1985); David M. Pletcher, *The Awkward Years* (Columbia, Mo., 1962), the place to begin on the 1880s; Justus D. Doenecke, *The Presidencies of James A. Garfield and Chester A. Arthur* (Lawrence, Kan., 1981); Richard E. Welch, Jr., *The Presidencies of Grover Cleveland* (Lawrence, Kan., 1988); Michael J. Devine, *John W. Foster: Politics and Diplomacy in the Imperial Era, 1873–1917* (Athens, Ohio, 1981); H. E. Socolofsky and Allan B. Spetter, *The Presidency of Benjamin Harrison* (Lawrence, Kan., 1987); Alice F. Tyler, *The Foreign Policy of James G. Blaine* (Minneapolis, 1927), still a standard account, although R. Hal Williams is writing a new biography; Charles W. Calhoun, *Gilded Age Cato*, on Walter Quintin Gresham (Lexington, Ky., 1988); Frederick C. Drake, *The Empire of the Seas* (Honolulu, 1984), an important biography of Admiral Robert W. Shufeldt and his attempts to "open" Africa and Korea; Joseph Fry, *Henry S. Sanford* (Reno, 1982), who was at the intersect of business and foreign policy; Henry E. Mattox, *The Twilight of Amateur Diplomacy* (Kent, Ohio, 1989), on the turn in the U.S. Foreign Service in the 1890s.

For Pacific expansion before 1898, starting points are Ralph S. Kuykendall, *The Hawaiian Kingdom*, 3 vols. (Honolulu, 1938–67); Gary Y. Okihiro, *Cane Fires: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in Hawaii, 1865–1945* (Philadelphia, 1991); Thomas J. Osborne, *Empire Can Wait: American Opposition to Hawaiian Annexation, 1893–1898* (Kent, Ohio, 1981); Paul M. Kennedy, *The Samoan Tangle: A Study in Anglo-German-American Relations, 1878–1900* (New York, 1974); George H. Ryden,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Relation to Samoa* (New Haven, 1933); Thomas McCormick, *China Market* (Chicago, 1967); Arthur Power Dudden, *The American Pacific: From the Old China Trad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1992), highly readable.

For Latin America before 1898, important accounts include Per-

kins, *The Monroe Doctrine, 1867–1907*, noted previously; Lester D. Langley, *Struggle for the American Mediterranean: U.S.-European Rivalry in the Gulf-Caribbean, 1776–1904* (Athens, Ga., 1976); Thomas Schoonover, "Metropole Rivalry in Central America, 1820s to 1929: An Overview," in Ralph L. Woodward, ed., *Central America* (Westport, Conn., 1988); Thomas Schoonover, *The United States in Central America, 1860–1911* (Durham, N.C., 1991), a major contribution; Richard H. Bradford, *The Virginius Affair* (Boulder, Colo., 1980); Joyce S. Goldberg, *The Baltimore Affair* (Lincoln, Neb., 1986), now standard; William F. Sater, *Chil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thens, Ga., 1990), o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Craig L. Dozier, *Nicaragua's Mosquito Shore* (Tuscaloosa, Ala., 1985), an exemplary case study of Anglo-American competition; J. Valerie Fifer, *U.S. Perceptions of Latin America* (Manchester, 1991), on the "New West" theme; Joseph Smith, *Unequal Giants,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Brazil, 1889–1930* (Pittsburgh, 1991), important on the pivotal U.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hip; Achille Viallate, "Les États Unis et le Pan Américanisme," *Revue des Deux Mondes* 51 (1909): 419–45, for a contemporary view noting Blaine's importance.

On U.S.-Canada relations, Lawrence Martin, *The Presidents and the Prime Ministers . . . 1867–1982* (Toronto, 1982), is delightful; Robert Craig Brown, *Canada's National Policy, 1883–1900* (Princeton, 1964); Donald F. Warner, *The Idea of Continental Union . . . 1849–1893* (Lexington, Ky., 1960); James T. Gay, *American Fur Seal Diplomacy* (New York, 1987); and R. A. Shields, "Imperial Policy and Canadian-American Commercial Relations, 1880–1911,"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59 (1986): 108–21.

For U.S.-Africa, start with Peter Duignan and L. H. Gan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frica: A History* (Cambridge, 1984); Clarence Clendenen, Robert Collins, and Peter Duignan, *Americans in Africa, 1865–1890* (Palo Alto, Calif., 1966); Stig Förster, Wolfgang J. Mommsen, and Ronald Robinson, eds., *Bismarck, Europe, and Africa: The Berlin Conference 1884–1885 . . .* (London, 1988); Thomas J. Noer, *Briton, Boer and Yankee: The U.S. and South Africa, 1870–1914* (Kent, Ohio, 1978); John Hope Franklin, *George Washington Williams* (Chicago, 1985), an important biography that has the

Congo episode as a turning point; Sylvia M. Jacobs, *The African Nexus: Black American Perspectives on the European Partitioning of Africa, 1880–1920* (Westport, Conn., 1981).

For the U.S. military buildup, places to start include Russell F. Weigley, *History of the U.S. Army*, enlarged ed. (Bloomington, Ind., 1984); Carol Ann Reardon, *Soldiers and Scholars: The U.S. Army and the Uses of Military History, 1865–1920* (Lawrence, Kan., 1990), a different, useful perspective; Kenneth J. Hagan, *This People's Navy: The Making of American Sea Power* (New York, 1991); and Hagan's important *American Gunboat Diplomacy and the Old Navy, 1877–1889* (Westport, Conn., 1973); David F. Long, *Gold Braid and Foreign Relations: Diplomatic Activities of U.S. Naval Officers, 1798–1883* (Annapolis, 1988); B. Franklin Cooling, *Gray Steel and Blue Water Navy: The Formative Years of America's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1881–1917* (Hamden, Conn., 1979), a striking study; for Mahan, the basic source is Alfred T. Mahan, *Letters and Papers of Alfred Thayer Mahan*, 3 vols., ed. Robert Seager II and Doris D. Maguire (Annapolis, 1975).

For the British policy context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rucial works include Paul Kennedy, *The Realities Behind Diplomacy: Background Influences on British External Policy, 1865–1980* (London, 1981); Aaron L.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 (Princeton, 1988); John A. S. Grenville, *Lord Salisbury and Foreign Policy: The Close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London, 1964); James L. Garvin, *The Life of Joseph Chamberlain*, 3 vols. (London, 1932–4), a pivotal figure on British tariff and United States policies.

U.S.-Cuban relations, especially in the 1895–1906 years, can be found in two books by Jules R. Benjam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uba: Hegemony and Dependent Development, 1880–1934* (Pittsburgh, 1977),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uban Revolution* (Princeton, 1990); Louis A. Pérez, Jr., *Cuba Between Empires, 1878–1902* (Pittsburgh, 1983), especially good on Cuba's internal changes; Louis A. Pérez, Jr., *Cuba Under the Platt Amendment, 1902–1934* (Pittsburgh, 1986); Philip S. Foner, *The Spanish-Cuban-American War and the Birth of American Imperialism, 1895–1902*, 2 vols. (New York, 1972); Francisco Lopez Segrera, *Cuba: capitalismo*

dependiente y subdesarrollo (1510–1959) (Havana, 1972), a contemporary Cuban view; David Healy, *The U.S. in Cuba, 1898–1902* (Madison, 1963), the standard for U.S. policy; Gerald E. Poyo, *With All and for the Good of All . . .* (Durham, N.C., 1989), on Cuban nationalism develop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Roland I. Perusse, *The United States and Puerto Rico* (Melbourne, Fla., 1990).

For the 1898 war and ensuing debate, begin with Anne Cipriano Venzon,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New York, 1990); David F. Trask, *The War with Spain in 1898* (New York, 1981), the best one-volume history; H. Wayne Morgan, *America's Road to Empire* (New York, 1965), by an authority on the 1890s; John Dobson, *Reticent Expansionism* (Pittsburgh, 1988), a good synthesis on McKinley; Gerald F. Linderman, *The Mirror of War: American Society and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Ann Arbor, 1974); Anne Hummell Sherrill and Howard I. Kushner, *John Milton Hay* (New York, 1977), a good, brief biography with documents; Göran Rysted, *Ambiguous Imperialism* (Lund, Sweden, 1975), especially good on domestic politics; Robert L. Beisner, *Twelve Against Empire: The Anti-Imperialists, 1898–1900* (1968; reprint, New York, 1985, with new preface), the best monographic treatment of the debate; Fred Harvey Harrington, "The Anti-Imperialist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98–1900,"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22 (1935): 211–30, the pioneering essay; Philip S. Foner and Richard C. Winchester, eds., *Anti-imperialist Read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nti-imper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I: From the Mexican War to the Election of 1900* (New York, 1984), key primary sources; James E. Kerr, *The Insular Cases* (Port Washington, N.Y., 1982), on the critical court decisions; Raymond Carr, *Spain, 1808–1975* (Oxford, 1982), important for Spain's diplomacy, as is John L. Offner, *An Unwanted War* (Chapel Hill, 1992).

For the Philippines, Glenn Anthony May's work is pivotal, for example, *A Past Recovered*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1987); Kenton J. Clymer,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the Philippines* (New York, 1986); Daniel Schirmer and Stephen Shalom, eds., *The Philippines Reader* (Boston, 1987); Russell Roth, *Muddy Glory: America's "Indian Wars" in the Philippines, 1899–1935* (West Hanover, Mass., 1981); Stuart Creighton Miller, *"Benevolent Assimilation": The American Conquest of*

the Philippines, 1899–1903 (New York, 1982), which especially stresses racism; Brian M. Linn, *The U.S. Army and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Philippine War, 1899–1902* (Chapel Hill, 1989); David H. Bain, *Sitting in Darkness: Americans in the Philippines* (Boston, 1984),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it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or general works on the late 1890s to 1913 era, important accounts include Bradford Perkins, *The Great Rapprochement: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95–1914* (New York, 1968), the standard on the crucial U.S.-British relationship; Joseph A. Fry, "In Search of an Orderly World: U.S. Imperialism, 1898–1912," in John M. Carroll and George C. Herring, eds., *Modern American Diplomacy* (Wilmington, Del., 1986); Stuart Anderson, *Race and Rapprochement: Anglo-Saxonism an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895–1904* (Rutherford, N.J., 1981); Manfred Jon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Ithaca, 1984), a good overview. Fritz Blaich, *Amerikanische Firmen in Deutschland, 1890–1914* (Wiesbaden, 1984); Otto Zu Stolberg-Wernigerode,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Era of Bismarck* (Reading, Pa., 1937); and Alfred Vagts, *Deutschland und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in der Weltpolitik*, 2 vols. (New York, 1935), are three important German accounts, with Stolberg-Wernigerode examining the earlier years. Henry Blumenthal, *Illusion and Reality in Franco-American Diplomacy, 1914–1945* (Baton Rouge, 1986), standard; Charles W. Brooks, *America in France's Hopes and Fears* (New York, 1987), a two-volume pioneering work; Robert C. Hilderbrand, *Power and the People: Executive Management of Public Opinion in Foreign Affairs, 1897–1921* (Chapel Hill, 1981), an innovative and important approach; Calvin Dav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econd Hague Peace Conference . . . 1899–1914* (Durham, N.C., 1976); Warren F. Kuehl, *Seeking World Order: U.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1920* (Nashville, 1969), the important overview; Charles DeBenedetti, *The Peace Reform in American History* (Bloomington, Ind., 1985); Charles DeBenedetti, ed., *Peace Heroes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Bloomington, Ind., 1986); Sondra R. Herman, *Eleven Against War: Studies in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t Thought, 1908–1921* (Stanford, 1969); Sybil Oldfield, *Women Against the Iron Fist: Alternatives to Militarism, 1900–1989* (Oxford, 1989); Judith Papachristou, "American Women and Foreign Policy, 1898–

1905: Exploring Gender in Diplomatic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14 (1990): 493–509, important as a prototypical study for later research; Joel Silbey, ed., *To Advise and Consent: U.S. Congress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2 vols. (New York, 1991), with twenty-eight key articles.

For major figures, 1901–13, the following are important: Raymond A. Esthus, *Theodore Roosevelt*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ies* (Waltham, Mass., 1970); Richard H. Collin, *Theodore Roosevelt's Caribbean* (Baton Rouge, 1990), a highly detailed emphasis on the "context" of TR's diplomacy; Richard H. Collin, *Theodore Roosevelt, Culture, Diplomacy, and Expansion* (Baton Rouge, 1985); Serge Ricard, *Theodore Roosevelt et la justification de l'impérialisme* (Aix-en-Provence, 1986), more critical than Collin; Frederick Marks III, *Velvet on Iron* (Lincoln, Neb., 1979), an interesting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plomacy; David H. Burton, *Theodore Roosevelt: Confident Imperialist* (Philadelphia, 1968); Frank Nincovich, "Theodore Roosevelt: Civilization as Ideology," *Diplomatic History* 10 (1986): 221–45; Howard K. 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 (Baltimore, 1956), still a standard account; Thomas G. Dyer,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Idea of Race* (Baton Rouge, 1980), very important; Lewis L. Gould, *The Presidency of Theodore Roosevelt* (Lawrence, Kan., 1990); Charles E. Neu, *An Uncertain Friendship: Theodore Roosevelt and Japan 1906–1909* (Cambridge, Mass., 1966), key on the immigration issue; Walter Scholes and Marie Scholes,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Taft Administration* (Columbia, Mo., 1970), the best comprehensive account; Paolo E. Coletta, *The Presidency of William Howard Taft* (Lawrence, Kan., 1973), a good overview; Richard W. Leopold, *Elihu Root and the Conservative Tradition* (Boston, 1954); Kenton J. Clymer, *John Hay: The Gentleman as Diplomat* (Ann Arbor, 1975), a good biography that can be used with John Hay,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Hay,* 2 vols., ed. Roscoe R. Thayer (Boston, 1915); William C. Widenor, *Henry Cabot Lodge and the Search for 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erkeley, 1980); Kendrick A. Clements, *William Jennings Bryan: Missionary Isolationist* (Columbia, S.C., 1982); Richard W. Turk, *The Ambiguous Relationship: Theodore Roosevelt and Alfred Thayer Mahan* (New York, 1987).

On the U.S.-Asian (especially Chinese) relationship, the most

helpful accounts include: Warren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3d ed. (New York, 1990); Warren Cohen, ed., *New Frontiers in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New York, 1983), especially the Hunt, Iriye, Heinrichs, and May essays; Michael Schaller, *The U.S. and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New York, 1990); Michael H. Hunt,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S. and China to 1914* (New York, 1983); David L. Anderson, *Imperialism and Idealism: American Diplomats in China, 1861–1898* (Bloomington, Ind., 1986), for the background; Key Ray Chong, *Americans and Chinese Reform and Revolution, 1898–1922* (Lanham, Md., 1984), crucial for private citizens, such as Homer Lea, and on Sun Yat-sen; James Reed, *The Missionary Mind and American East Asia Policy* (Cambridge, Mass., 1985); Paul Varg,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ats . . . 1890–1952* (Princeton, 1958); Patricia R. Hill, *The World Their Household* (Ann Arbor, 1985), on Women's Foreign Mission movement; Jane Hunter,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of-the-Century China* (New Haven, 1984), on "cultural imperialism"; R. Arkush and Leo O. Lee, *Land Without Ghosts: Chinese Impressions of America from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Berkeley, 1989); Daniel M. Crane and Thomas A. Breslin, *An Ordinary Relationship: American Opposition to Republican Revolution in China* (Miami, Fla., 1986), highly important; Dennis L. Noble, *The Eagle and the Dragon: The U.S. Military in China, 1901–1937* (Westport, Conn., 1990), especially on the Boxers. Akira Iriye, *Pacific Estrangement: 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 1897–1911* (Cambridge, Mass., 1972), and Charles E. Neu, *The Troubled Encounter: The U.S. and Japan* (New York, 1975), both standard accounts; W. G. Beasley, *The Rise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 1990); Yur-Bok Lee and Wayne Patterson, eds., *One Hundred Years of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1882–1982* (University, Ala., 1986), key essays.

On Russia, the historical context is in Hugh Seton Watson, *The Russian Empire, 1801–1907* (Oxford, 1967); Dietrich Geyer, *Russian Imperialism . . . 1860–1914* (New Haven, 1987), stressing the domestic changes; Edward H. Zabriskie, *American-Russian Rivalry in the Far East, 1895–1914* (Philadelphia, 1946), still the best monograph; Frederick F. Travis, *George Kennan and the American-Russian*

Relationship, 1865–1924 (Athens, Ohio, 1990); John A. White, *Th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rinceton, 1964); Raymond A. Esthus, *Double Eagle and the Rising Sun: The Russians and Japanese at Portsmouth in 1905* (Durham, N.C., 1988); Gary Dean Best, *To Free a People: American Jewish Leaders and the Jewish Problem in Eastern Europe, 1890–1914* (Westport, Conn., 1982).

For the Americas, important accounts include two books by Lester D. Langley, *America and the Americas* (Athens, Ga., 1989), which provides the broad context, and *The Banana Wars: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 Empire* (Lexington, Ky., 1983); Barbara Stallings, *Banker to the Third World: U.S. Portfolio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1900–1986* (Berkeley, 1987); David Healy, *Drive to Hegemony: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Caribbean, 1898–1907* (Madison, 1988), a superb overview; Warren G. Kneer, *Great Britain and the Caribbean, 1900–1913* (East Lansing, Mich., 1975), stressing the U.S. role also; Thomas Schoonover, "Imperialism in Middle America: U.S., Britain, Germany, and France Compete for Transit Rights and Trade, 1820s–1920s," in Rhodri Jeffreys-Jones, ed., *Eagle Against Empire* (Aix-en-Provence, 1983); Dwight C. Miner, *The Fight for the Panama Route* (New York, 1940), still helpful; J. Michael Hogan, *The Panama Canal in American Politics* (Carbondale, Ill., 1986), good on 1903–4; Michael L. Conniff, *Panam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thens, Ga., 1992); Richard L. Lael, *Arrogant Diplomacy: U.S. Policy Toward Colombia, 1903–1922* (Wilmington, Del., 1987), the best book on the subject, and important on the canal; Bruce J. Calder, *The Impact of Intervention . . . 1916–1924* (Austin, Tex., 1984), very good on Roosevelt's intervention and Dominican Republic's conditions; Brenda Gayle Plummer, *Haiti and the Great Powers, 1902–1915* (Baton Rouge, 1988), an important analysis; Schoonover, *The U.S. in Central America*, noted previously, an innovative and detailed analysis; José Joaquin Morales, *De la Historia de Nicaragua de 1889–1912* (Granada, 1963), has good sections on Zelaya from a Nicaraguan point of view.

On U.S.-Mexico relations, David M. Pletcher, *Rails, Mines, and Progress: Seven American Promoters and Mexico, 1876–1910* (Ithaca, 1958), remains important background; Ramón Eduardo Ruiz, *Triumphs and Tragedy: A History of the Mexican People* (New York, 1992),

is a superb overview and sets the context; Alan Knight, *U.S.-Mexican Relations, 1910–1940* (San Diego, 1987), builds on Knight's two-volume work on Mexico and gives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also, Dan LaBotz, *Edward L. Doheny: Petroleum,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U.S. and Mexico* (Westport, Conn., 1991); Gilbert M. Joseph, *Revolution from Without: Yucatan,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24* (New York, 1982); Gregg Andrews, *Shoulder to Shoulder: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xican Revolution, 1910–1924* (Berkeley, 1991). Of special importance are two books by Friedrich Katz, *The Secret War in Mexico: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xican Revolution* (Chicago, 1981), and *Riot, Rebellion, and Revolution: Rural Social Conflict in Mexico* (Princeton, 1988), which Katz edited.